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一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5年 北京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21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61 年版译出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一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900×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6 · 插页 7 · 字数 634,000

1965 年 9 月第 1 版

196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 · 644 定价(四) 3.35 元

目 录*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3—4
*格奥尔格·维尔特。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 (1846年)·····	5—9
启示录·····	10—16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	17—26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 研究成果而作·····	27—203
第一版序言·····	29—31
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	32—38
1. 蒙昧时代·····	32—34
2. 野蛮时代·····	34—38
二 家庭·····	39—97
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98—113
四 希腊人的氏族·····	114—124
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125—136
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137—148
七 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149—165
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166—178
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179—203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卡·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一书 1884 年单行本	
前言	204
馬克思和洛貝尔图斯。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一书	
德文第一版序言	205—220
帝俄高級炸药顧問	221—223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224—231
“卡尔·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232—239
致“北方通报”杂志編輯部	240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241—261
当前的形势	262—263
致“社会主义者报”編輯委员会	264—265
不应该这样翻譯馬克思的著作	266—276
关于普魯士农民的历史。威·沃尔弗的小册子	
“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	277—289
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德文第三版序言	290—291
“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美国版附录	292—298
*紀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	299—300
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301—353
一	305—314
二	315—325
三	326—334
四	335—353
給“紐約人民报”編輯部的声明	354
*关于里昂玻璃厂工人的罢工	355
欧洲政局	356—364

約翰·菲力浦·貝克尔	365—371
“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序言	372—382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美国版序言	383—392
*給巴黎国际联誼节組織委員會的信	393—395
波克罕“紀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愛 国主义者”一書引言	396—402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403—410
“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書 序言	411—412
保护关稅制度和自由貿易。卡尔·馬克思的小冊子 “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的序言	413—431
*1889年魯尔矿工的罢工	432—434
可能派的代表資格证	435—437
*关于伦敦碼頭工人的罢工	438
資產階級让位了	439—444

弗·恩格斯的遺稿

*論未来的联合体	447
*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448—458
关于“农民战争”	459—460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461—527
小冊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序言草稿	528
小冊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提綱	529—530
小冊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結束部分提綱	531—533
*美国旅行印象	534—536

附 录

格·亚·洛帕廷給瑪·尼·奧沙尼娜的信的片断	539—541
1849 年的五月起义	542—544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545—568
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綱領的修正	569—570
恩格斯同“紐約人民报”編輯部的談話	571—572
1889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	573—585
給“工人选民”报編輯部的信	586—587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89 年 7 月 14—21 日)。告啟	
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	588—590
1889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II. 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	591—612
組織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	613—616
注释	619—726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27—766
人名索引	767—809
期刊索引	810—811
地名索引	812—81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族名索引	820—826
譯后記	827—828

插 图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封面	28—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的扉頁	181
“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的扉頁	303
“共产党宣言” 1888 年英文版的扉頁	405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手稿的一頁	475
弗·恩格斯修改的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綱領	570—571

弗·恩格斯

1883年5月—1889年12月

“共产党宣言” 1883年德文版序言¹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馬克思——这位对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大贡献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坟场，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根本谈不上对“宣言”做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如下一点。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馬克思一个人的^①。

^① 我在英译本序言[见本卷第408—409页。——编者注]中说过：“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²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的进展。但

这一点我已經屢次說过，但正是現在必須在“宣言”正文之前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載于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0年德文版本譯的，并根据1883年版本校对过

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魯塞爾重新會見馬克思時，他已經把這個思想整理出來，並且用幾乎像我在上面的敘述中所用的那樣明晰的語句向我說明了。”（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Verlag
Karl Dietrich
Klein (Herausg.)
Verlag
Karl Dietrich
Klein (Herausg.)
Verlag
Karl Dietrich
Klein (Herausg.)
Verlag
Karl Dietrich
Klein (Herausg.)

Der Sozialdemokrat

Zentral-Orga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Abonnements
preis für den Inland-Vertrag
jährlich 1.00 Mk. (einschl.
Post) und 1.20 Mk. (einschl.
Post) für den Ausland-Vertrag
vierteljährlich 25 Pf.
Einzelhefte 5 Pf.

Verlag
Karl Dietrich
Klein (Herausg.)
K. D. K.

Nr. 24.

Donnerstag, 7. Juni.

1893.

*格奥尔格·维尔特

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

(1846年)³

樱花盛开的时节，
我們找到了安身处，
樱花盛开的时节，
我們住到了法兰克福。

飯館老板對我們說：
“你們的穿着真难看！”
“你这討厭的老板，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把你的白酒給我們拿来，
把你的啤酒給我們拿来，
白酒和啤酒之外，
再端来烤肉当菜！”

酒桶龙头像雄鸡啼唱，
酒也流得嘩嘩响。

我們喝了一口，
味道同小便一样。

老板端来一只兔子，
配上芹菜，
对着这只死兔子，
我們怕得厉害。

當我們躺在床上，
作完我們的晚禱，
床上的臭虫就爬出来，
一直把我們咬到天亮。

这发生在法兰克福，
在那美丽的城里，
誰住在那儿吃过苦，
誰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們的朋友維尔特的这首詩，是我在馬克思的遺稿中找到的。德国无产階級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詩人維尔特，生在萊茵的德特莫耳特，他的父亲是那里的牧师——教区監督。1843年我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維尔特作为他的德国公司的經紀人来到布萊得弗德，我們一同快乐地度过了許多个星期天。1845年，馬克思和我住在布魯塞尔的时候，維尔特担任了他的商店的大陆代理人，并且設法把自己的总办事处也迁到布魯塞尔。1848年三月革命后^①，我們为了創辦“新萊茵报”，又都齐集在科伦。維尔特負責小品栏，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鋒利的小品栏。他的

① 由此到本文結束，都同手稿核対过。——編者注

主要作品之一是“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这篇作品描写了海涅在他的长詩“阿塔·特洛尔”^①中这样命名的李希諾夫斯基公爵的冒险事迹。一切事实都是符合现实生活的；我們是怎样知道这些事实的，改次大概我可以談談。这些关于施納普汉斯基的小品文，霍夫曼和康培书店 1849 年出版了单行本⁴，直到現在，还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在 1848 年 9 月 18 日，因为施納普汉斯基—李希諾夫斯基和普魯士將軍馮·奥尔斯瓦特（也是議會議員）一起騎馬去偵察那些前往援助法兰克福街垒战的农民队伍，他們两人都罪有应得地被农民們当做間諜杀死了，所以德意志帝国当局控訴維尔特侮辱已故的李希諾夫斯基。于是，早已在英国的維尔特，便在反动派封閉了“新莱茵报”很久之后，被判处了三个月的监禁。这三个月的监禁后来他也就服滿了，因为他为了事务不得不时常回到德国。

1850—1851 年，他为了另一家布萊得弗德的公司的事务前往西班牙，然后又去到西印度，并且几乎走遍了整个南美洲。在欧洲进行了短暫的訪問之后，他又回到自己喜爱的西印度。他不願放過在那里一睹海地的黑人皇帝苏路克⁵这个路易-拿破侖第三的真正原本的眼福。但是，正如威·沃尔弗 1856 年 8 月 28 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所說的，他遇到了

“防疫当局的刁难，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計劃，在旅途中染上黃热病，便回到哈瓦那。他躺倒在床上，又得了腦炎，7 月 30 日，我們的維尔特就在哈瓦那与世长辞了”。

我称他为德国无产階級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詩人**。的确，他的

^① 海涅“阿塔·特洛尔”第 1 章。——編者注

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同时，他不同于大多数诗人的地方，就是他把诗写好之后，就对之完全漠不关心了。他把自己的诗抄寄给马克思或我以后，就忘记了它们，往往很难使他在什么地方把这些诗刊印出来。只是在“新莱茵报”时期情形不同。其原因可以从維尔特在1851年4月28日从汉堡写给马克思的信的下述摘录中看出来。

“不过，我希望7月初在伦敦再和你见面，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些汉堡的 grasshoppers（蝗虫）了。在这里势必要使我过一种显赫的生活，但是我感到害怕。别的任何人，都会伸出双手去把它抓住。然而我年纪太老，不能变成市儈了，何况在大洋的彼岸还有着辽阔的西部……”

最近我写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没有一篇是写成了的，因为我看不出写作有什么意义和什么目的。你就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写一点东西，那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但是我呢？为了使同胞的嘴脸上露出白癡般的微笑，而讲些无聊的刻薄话和庸俗的笑料，实在是再可怜不过了！我的写作活动已经随着‘新莱茵报’的结束而永远结束了。

我应该承认：最近三年的时间白白浪费使我懊恼，但回忆起我们在科伦的相处却使我十分快乐。我们**没有**使自己丢脸。这是主要的！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期以来，谁也不会像‘新莱茵报’那样 *en canaille* [毫不客气地] 对待德国人民。

我不愿意说这是我的功绩，不过我也曾做过一份……

葡萄牙啊！西班牙啊！〈維尔特刚从那里回来〉^① 如果我们有你的美丽的天空、你的葡萄酒、你的橙子和桃金娘，那该多么好啊！但是连这个也没有！除了凄风苦雨和熏肉之外，什么也没有！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与凄风苦雨为伴的你的

格奥尔格·維尔特”

維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誠),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假如我把“新莱茵报”的某些小品文轉載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面,那末讀者中間有很多人会大惊失色。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儈的这种偏見,小市民的虛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褻言談而已。例如,一讀弗萊里格拉特的詩,的确就会想到,人們是完全沒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沒有誰像这位在詩中道貌岸然的弗萊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褻的小故事了。最后終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們会习惯于从容地談論他們自己白天或夜間所做的事情,談論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愜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語民族那样,就像荷馬和柏拉图,賀雷西和尤維納利斯那样,就像旧約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

不过,維尔特也写了一些不那么粗野的东西,我有时把其中一些寄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品栏。

写于1883年5月底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83年6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手稿核对过

署名:弗·恩格斯

启 示 录⁶

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在英国，除了少数力图尽可能把这門科学保持秘密的自由主义化的神学家而外，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它。

这门科学几乎完全是德国的。而且其中渗透到德国国界以外的少量东西，也决不是它最好的部分；这就是那以既摆脱了偏见和妥协又不失为基督教的东西而自豪的自由思想的批判：这些篇据说不是圣灵的直接启示，而是神通过圣灵对人道的启示，等等。这样，杜宾根学派（鲍尔、格夫勒雷尔等人）⁷ 在荷兰和瑞士就像在英国一样，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假如愿意稍微往前走一点，那就是追随施特劳斯。人所熟知的厄内斯特·勒南（他仅仅是德国批判家的可怜的剽窃者），便富有这种温和而完全是非历史的精神。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只有浸透着他的思想的美学的感伤情调和反映他的思想的枯燥文字，是属于他的。

不过，厄内斯特·勒南說得好：

“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不要把它們和現在的教区相比；它們更像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

这是对的。基督教同现代社会主义完全一样，是以各种宗派的形式，尤其是通过彼此矛盾的个人观点来掌握群众的，这些观点中有的比較明确，有的比較混乱，而后者又占絕大多数；不过所有

这些观点都敌视当时的制度，敌视“当局”。

我们就拿启示录来做例子。我们看到，它决不是全部新约中最难解和最神秘的，而倒是最简单和最清楚的一篇。我们应该暂时请读者相信我们打算在下面证明的事情，即：这一篇是在公元68年或69年1月间写成的，因而它不仅是新约中真正确定了日期的唯一的一篇，而且也是这些篇中最古老的一篇。公元68年时基督教的面貌如何，我们可以在这部书中看到，就像在一面镜子里看到一样。

首先是宗派，无穷无尽的宗派。在给亚细亚七教会的书信⁸中，至少提到三个宗派，关于它们，我们除此以外全无所知：尼哥拉派，巴兰派和被象征地叫做耶洗别的某个妇人的信徒。关于所有这三个宗派，书中说它们准许自己的信徒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自由恋爱”问题总要提到重要地位。有些人认为，这是革命进步，这是解脱不再需要的旧的传统羁绊；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受人欢迎的，便于掩盖各种各样自由的、轻浮的男女关系的学说。后者，即庸人，看来很快就在这里占了上风；“奸淫的事”始终和吃“祭偶像之物”相联系；这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是严格禁止的，然而，拒绝这一切，有时也会是危险的，或者至少是不愉快的。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所提到的自由恋爱的拥护者，一般都倾向于和一切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决不倾向于殉道。

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它是在新宗派、新宗教、新先知数以百计地出现的时代，以一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方式在巴勒斯坦产生的。基督教事实上是自发地形成的，是这些宗派中最发达的宗派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中间物，后来由于

加进了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斐洛的论点，稍后又由于受到斯多葛派⁹思想的广泛渗透，而形成一种教义。的确，如果我们可以把斐洛称为基督教教义之父，那末塞涅卡便是它的叔父。新约中有些地方几乎就像是从他的著作中逐字逐句抄下来的；另一方面，在柏西阿斯的讽刺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方，仿佛是从那时还不存在的新约上抄下来的。在这篇启示录中，所有这些教义的成分，连一点痕迹也没有。在这里，基督教是用流传到现在的一种最粗糙的形式来表现的。贯穿全书的只有一个教条：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但怎样得救和为什么得救——却根本无法解释。这里除了犹太人和异教徒的一种旧观念，即必须用牺牲来祈求神或众神的宽宥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这种观念被改造成基督教所特有的观念之后（实质上它使基督教成了普遍的宗教），它的内容是，基督之死是伟大的献祭，是一次而永远有效的献祭。

关于原罪——丝毫没有谈到。关于三位一体也只字未提。耶稣就是“羔羊”，但从属于神。例如，有一个地方（第15章第3节）把他和摩西并列起来了。书中不是有一个圣灵，而是有“神的七灵”（第3章第1节和第4章第5节）。被杀死的圣徒（殉教者）向神祈求报仇：

“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第6章第10节）——

这种感情后来在基督教道德的理论法典中被审慎地抹掉了，可是在实践中一当基督徒对异教徒占了上风，这种感情就表现出来了。

自然，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例如，在给七教会的书信中说：

“我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不说是基督徒〉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

犹太人，乃是撒但一会的人(第 2 章第 9 节)；

又說(第 3 章第 9 节)：

“那撒但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

可見，我們这位作者，在公元 69 年时，簡直絲毫也沒有想到：他就是宗教发展的新阶段，即注定要成为革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的阶段的代表者。同样，当圣徒站在神的宝座前的时候，首先走来的是 144 000 犹太人，十二个支派中各有 12 000 人，在他們之后，才允許贊同这个犹太教新阶段的异教徒近前。

这就是在新約中最古老的、其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唯一的一篇中所描繪的公元 68 年时基督教的样子。这一篇的作者是誰，我們不知道。他自称为約翰。他甚至並沒有冒充他是“使徒”約翰，虽然“新耶路撒冷”的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第 21 章第 14 节)。因而，在他写这一篇的时候，他們显然已經死去了。至于他是犹太人，这可以从他的希腊文中借用了大量希伯来語一点上看起来，文字語法錯乱，即使和新約其他各书相較也截然不同。所謂約翰福音、約翰书信和本篇，至少属于三个不同的作者，这从它們的文字可以得到清楚的证明，如果它們所闡述的全然互异的教义还不能证明的話。

几乎构成启示录全部內容的那些神迹，多半是从旧約中的古代先知以及他們后来的摹仿者那里逐字逐句抄来的，从但以理书(大約成于公元前 160 年，它預言的事件是数世紀以前就发生过的)起，到“以諾书”——公元开始前不久用希腊文写的一种伪經——为止。即使在抄来的神迹的安排上，独到的創造也是极其貧乏的。斐迪南·貝納里教授——我在下面所作的論述，应归功于他 1841 年在柏林大学的讲学——研究了各个章节和詩歌，指出

这位作者所臆造的每一个神迹是从哪里抄来的。因此，我們在这位“約翰”的一切幻想时都跟着他走是无益的。最好是立即来研究能够揭开这篇無論如何是一篇奇书的奥秘的那一点。

所有“約翰”的正統注释家，在过了一千八百多年之后，都还在期望，他的預言必将应驗，而“約翰”却和他們完全相反，他一再重复說：

“日期近了，这很快就要到来。”

这特別是指他所預言的、并且显然是指望看到的那一危机。

这一危机就是神和被叫做“反基督者”之間的一場伟大的最后决战。最重要的两章是第十三章和第十七章。我們略去不必要的飾文。“約翰”看到从海中上来一个七头十角（角對我們完全沒有关系）的兽：

“我看見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

这兽必将在四十二个月（神圣的七年的一半）中获得統治大地的权柄，与神和羔羊为敌，在此期間一切人必須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个兽的印記或兽名的数目。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 666。”

伊里奈烏斯在二世紀时就知道，受伤并医好了的兽指尼祿皇帝。尼祿是第一个对基督徒进行大迫害的人。在他死后，特別在亞該亞和亞細亞，广泛流行着一种謠传，說他沒有死，只是受了伤，不定什么时候会重新出現，并給全世界带来恐怖（塔西佗“編年史”第 6 章第 22 节）。同时，伊里奈烏斯还知道另外一种很古老的經文，其中表示那个名字的数目是 616，而不是 666。¹⁰

在第十七章里，这七个头的兽又出現了；这回在它身上騎着一

个名声坏的、穿朱紅色衣服的妇人，关于她的动人的描写，讀者可以在該书中找到。这里天使向約翰解說：

“你所看見的兽，先前有，如今沒有……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他必須暫時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并出自那七位之中……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众王的大城。”

可見，这里有两个明确的論点：（1）穿朱紅色衣服的妇人，就是管轄地上众王的大城——羅馬；（2）这一篇是在羅馬第六个皇帝統治期間写的；在他之后，来了另一位，他在位不久；然后“那七位之中”的一位又回来了，他受了伤，但却医好了，他的名字包含在这个神秘的数中，而且伊里奈烏斯已經知道，这就是尼祿。

从奧古斯都开始，順序是：奧古斯都，提比利烏斯，卡利古拉，克劳狄烏斯；第五是尼祿；第六是加尔巴，他的登基成了諸軍团暴动的信号，特別在高卢，是由加尔巴的继位者奥托¹¹領头来干的。可見，这一篇显然是在加尔巴統治期間写的，他在位的时期是 68 年 6 月 9 日到 69 年 1 月 15 日。而且这一篇中还預言尼祿很快就要回来。

現在談談最后一个证据——数目字。这个证据也是斐迪南·貝納里发现的，而且从那时以来，在科学界中从未引起爭論。

大約在公元前三百年，犹太人开始把他們的字母当做表示数目的符号来使用。故弄玄虛的犹太教的拉比认为这是进行神秘解释即喀巴拉的新方法。密語用組成这个密語的各个字母的数值之和来表达。他們把这种新科学叫做 gematriah，即几何学。我們这位“約翰”在这里也应用了这种科学。我們要证明的是：（1）这个数目包含着一个人的名字，而这个人便是尼祿，（2）我們的解答不仅适用于含有 666 这个数目的銘文，而且也适用于含有 616 这

个数目的同样古老的铭文。我们现在举出希伯来文字母和它们的数值：

נ (nun) n = 50	ק (koph) k = 100
ר (resch) r = 200	ס (samech) s = 60
ו (waw) 代替 o = 6	ר (resch) r = 200
נ (nun) n = 50	

尼祿凱撒，尼祿皇帝，用希腊文来写是 Nêron Kaisar。现在，假如我们不用希腊文的写法而用希伯来文字母来写拉丁文 Nero Caesar，那末 «Neron» 这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 «nun» 就去掉了，它的数值 50 也一起减去了。这就使我们得到另一个古老的经文 616，所以，证据完全是无可非议的。^①

这样，这神秘的一篇，现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约翰”预言尼祿将在 70 年左右回来，在他在位期间要施行恐怖统治，这种统治将继续四十二个月，即 1 260 日。过了这段期间之后，神就会出现，战胜尼祿这个反基督者，用火焚毁那座大城，并把魔鬼捆绑一千年。千年王国就会到来，等等。现在，所有这一切，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意义了，除非那些无知的人，也许仍在企图计算出最后审判的日子。但作为几乎最早的基督教的真实的图画，作为真正基督徒之一所描绘的图画，这一篇，比起新约其他各篇加在一起的价值还大。

载于 1883 年 8 月“进步”杂志
第 2 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进步”杂志

① 上面所引用的名字的写法，无论是带第二个 «nun» 或不带，都可以在犹太圣法经传中见到，因而是可靠的。

馬克思和“新萊茵報” (1848—1849年)¹²

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們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沒有結社和集会的权利。除了同盟得以从中吸收盟員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同盟在本国大約有三十个支部或小組，此外，在許多地方还有个别的盟員。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領袖馬克思，并且賴有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則性的和策略的綱領——“共产党宣言”。

这里應該談到的首先是綱領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們沒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无产階級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階級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強調和坚持整个无产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斗争所經歷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終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

終推動運動前進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優越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¹³

而關於德國黨，則特別指出：

“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君主專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動性。

但是，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後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等等（“共產黨宣言”第4章）¹⁴。

從來沒有一個策略綱領是像這個策略綱領一樣得到證實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後，已經受住了這次革命的考驗；並且從那時起，任何一個工人政黨要是背離了這個策略綱領，每次都因此而受到了懲罰。而現在，差不多過了四十年以後，它已成為歐洲——從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一切堅決而有覺悟的工人政黨的準則。

巴黎的二月事變加速了即將來臨的德國革命，從而還改變了這個革命的性質。德國資產階級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取得勝利，而是仰仗了法國工人革命才取得勝利的。它還沒有來得及把自己那些舊的敵人即君主專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徹底打倒，就已經不得不轉移陣綫來反對新的敵人即無產階級了。但這時，德國比法英兩國落后得多的經濟情況以及因此同樣落后的階級關係，立刻就發生作用了。

当时德国資產階級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气去爭得在国家中的絕對統治地位，也沒有爭得这种地位的迫切要求；无产階級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沒有組織起来，甚至還沒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組織，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质上是資產階級的危險敌人，但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附庸。資產階級不是被德国无产階級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階級已經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資產階級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貴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階級則由于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它的絕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資產階級最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爭得那些为独立地組成階級政党所必需的权利：出版、結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是資產階級为了它自己的統治必須爭得的，但它現在由于害怕工人竟不贊成这些权利。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員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間了。因此，德国无产階級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創辦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們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場合，都強調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階級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願意这样做，不願意站在已經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階級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創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創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已經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

者：我們對空想主義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們制定自己的綱領也不是為的這個。

當我們到達科倫的時候，那里已經由民主黨人，部分地也由共產黨人在籌備創辦大型報紙。他們想把報紙辦成純地方性的，即科倫的報紙，而把我們趕到柏林去。可是，我們（主要是由於有馬克思）在二十四小時內就把陣地奪了過來；報紙成了我們的了；不過我們做了讓步，把亨利希·畢爾格爾斯列入了編輯部。他只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第二號上），以後就什麼也沒有寫過。

當時我們要去的地方正是科倫，而不是柏林。首先，科倫是萊茵省的中心，而萊茵省經歷過法國革命，通過拿破侖法典¹⁵領會了現代法的觀念，發展了規模極大的工業，當時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國最先進的部分。我們根據自己的觀察，十分了解當時的柏林，知道它那里有剛剛誕生的資產階級，有口頭上勇敢，但行動上懦怯的奴顏婢膝的小市民，有還極不發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貴族的和宮廷的奴僕，我們知道它僅僅作為一個“王都”所具有的一切特點。但是，有決定意義的是：在柏林實行的是可憐的普魯士法，並且政治案件是由職業法官審理的；而在萊茵河地區實行的則是拿破侖法典，由於已經存在書報檢查制度，這個法典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報刊案件；人們受陪審法庭審判並不是由於政治上違法，而只是由於某種犯罪行為。在柏林，革命以後，年輕的施略費爾為了一點小事就被判處了一年徒刑¹⁶，而在萊茵河地區，我們卻享有絕對的出版自由，並且我們充分利用了這個自由。

我們於1848年6月1日開始出版報紙時，只擁有很少的股份資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並且股東本身也極不可靠。第一號出版后就有一半股東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個也沒有剩下。

編輯部的制度簡直是由馬克思一人獨裁。一家必須在一定時刻出版的大型日報，在任何別的制度下都不能徹底貫徹自己的方針。而在这方面馬克思的獨裁對我們來說是理所當然和無容置疑的，所以我們大家都樂於接受它。首先是有賴於馬克思的洞察力和堅定立場，這家日報成了革命年代德國最著名的報紙。

“新萊茵報”的政治綱領有兩個要點：

建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國和對俄國進行一場包括恢復波蘭的戰爭。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當時分為兩個派別：希望有一個民主的普魯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國變成瑞士式的聯邦共和國的南德意志派，後者當時幾乎完全是巴登人的派別。我們當時應該對這兩派都進行鬥爭。不論是將德國普魯士化，或者是將德國的小邦割據情況永遠保存下去，都是同無產階級利益相抵觸的。無產階級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國徹底統一成一個民族，只有這樣才能把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切瑣屑障礙除掉而掃清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較一較量的戰場。但是，建立普魯士的領導地位同樣也是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相抵觸的；普魯士國家及其全部制度、傳統和王朝，正是德國革命應當打倒的唯一的國內勁敵；此外，普魯士只有先把德國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奧地利從德國排除出去，才能統一德國。普魯士國家的消滅，奧地利國家的崩潰，德國真正統一成為共和國，——我們在最近將來的革命綱領只能是這樣的。要實現這個綱領，就要通過對俄戰爭，而且只有走這條路。關於這一點後面還要講到。

一般說來，報紙的語調完全不是莊嚴、嚴肅或激烈的。我們的敵人全是卑鄙的，我們對他們都一律採取了極端鄙視的態度。進

行密謀的君主國、權奸、貴族、“十字報”¹⁷——引起庸人極大的道義憤慨的整個“反動派”，我們只用嘲笑和諷刺來對待。但是，我們對那些由革命所創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們、法蘭克福議會和柏林議會（無論對其右派或左派），也沒有採取較好的態度。第一號報紙就開始刊載一篇文章來諷刺法蘭克福議會形同虛設，諷刺它的冗長的演說無濟於事，諷刺它的懦弱決議毫無用處。¹⁸ 這篇文章的代價就是使我們失去了一半股東。法蘭克福議會甚至不是一個辯論俱樂部；這裡幾乎沒有進行過什麼辯論，而大多數場合都是宣讀預先準備好的學院式論文，通過一些要用來鼓舞德國庸人，但卻無人理睬的決議。

柏林議會就具有較大的意義了，它同一種實際力量相對抗，它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蘭克福議會的渺茫太空進行討論和通過決議的。因此，它就受到了較大的注意。可是，我們對待那里的左派偶像，如舒爾采-德里奇、貝倫茲、埃爾斯納、施泰因等的態度，也像對待法蘭克福分子的態度一樣尖銳；我們無情地揭露了他們的猶豫不決、畏首畏尾和作細小打算的態度，向他們指出，他們怎樣用自己的妥協一步一步地出賣了革命。這一點自然引起了剛剛製造出這些偶像供自己使用的民主派小資產者的恐懼。但是，這種恐懼正好證明我們打中了目標。

同樣，我們也反對了小資產階級熱心散布的一種錯覺，仿佛革命已隨着三月事變而告結束，現在只需收穫它的果實了。在我們看來，2月和3月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義，那就是：它們不是長期革命運動的終點，相反地是長期革命運動的起點，在這個革命運動中，像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一樣，人民在自己的鬥爭過程中不斷發展起來，各個政黨越來越明顯地自成一家，直到

它們同各个大階級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完全相吻合為止，而无產階級則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繼奪得各个陣地。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資產階級想用它慣用的詞句——我們大家希望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誤會——來抹煞它与无產階級的階級对立的場合，我們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資產階級。而我們越是不让小資產階級對我們无產階級民主派发生誤解，它對我們就越順从，越好說話。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对工人政党做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我們已經体会到了。

最后，我們揭露了各种所謂國民議會的議會迷(用馬克思的說法)¹⁹。这些先生們放過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們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願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議會，但这种議會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決議能扭轉乾坤。这种愚不可及的自我欺騙，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們告誡他們：你們在議會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你們实际上的失敗。

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結果也正是这样。当“左派”获得多数时，政府便把整个議會解散了；政府能够这样做，因为議會已失去人民的信任。

当我后来讀到布日爾論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們在許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²⁰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們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馬拉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們已經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像我們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經結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

的革命。

我們曾公开声明，我們所代表的派別，只有在德国現有的官方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开始为达到我們党的真正目的而斗争；那时我們將对这个最极端的政党持反对派态度。

但是，事变却要使人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以外，还要表现出一种激昂的热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們正守在自己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們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們失敗以后，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論文向战敗者致敬。²¹

这时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我們。但是，使我們感到滿意的是，当各国資產階級和小市民对战敗者施加齷齪誹謗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們的報紙是高高举着被击潰了的无产階級的旗帜的唯一報紙。

我們的对外政策是很簡單的：贊助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場普遍的战争。从2月24日²²起，我們已經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运动越是具有整个欧洲的規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参加斗争。維也納事变、米兰事变、柏林事变不免延迟了俄国的进犯，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国，这一进犯的必然性就越是肯定无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末，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綫获得胜利了。

这一政策貫穿着俄軍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的每一号報紙，而俄軍的入侵完全证实了我們的預見并决定了革命的失敗。

在1849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報紙的語調就变得一期比一期更猛烈和热情。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八篇論文）²³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說，在他們解脫封建义务时，地主

是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騙取了他們的錢財和土地，他并且要求十亿塔勒的賠償費。

与此同时，在4月間以一組社論的形式，发表了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資本的著作²⁴，这一著作明确地指出了我們政策的社会目的。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場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銳化。特别是4、5两月間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在整个德国，人們都因为我們在普魯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八千駐軍和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編輯室內的八枝步枪和二百五十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紅色雅各宾帽，使得我們的报館在軍官們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簡單的奇襲来夺取的堡垒。

1849年5月18日，打击终于到来了。

德勒斯頓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鎮压下去了，伊塞隆的起义被包围了；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遍布軍队，在彻底鎮压普魯士萊茵区之后就要向普法尔茨和巴登进军。这时政府终于敢来进攻我們了。編輯部的一些人受到法庭迫害；另一些人作为非普魯士人被依法驅逐。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政府有整个軍团作为后盾。我們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們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枝和行装，奏着軍乐，高举着印成紅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飄揚旗帜，我們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伦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他們說：

“‘新萊茵報’的編輯們在向你們告別的時候，對你們給予他們的同情表示感謝。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²⁵

“新萊茵報”在它創辦即將一周年時就這樣停刊了。開始時它幾乎沒有任何資金，——我已經說過，人們答應給它的一筆不大的款子是沒有照付的，——而在9月已經差不多發行到五千份了。在科倫宣布戒嚴時，報紙曾一度被封；在10月中不得不一切重新從頭開始。但是，1849年5月，在它被禁止時，它又有了六千訂戶，而當時“科倫日報”²⁶，據該報自己承認也不過只有九千訂戶。沒有一家德文報紙——無論在以前或以後——像“新萊茵報”這樣有威力和有影響，這樣善于鼓舞無產階級群眾。

而這一點首先歸功於馬克思。

遭到打擊後，編輯部解散了。馬克思到巴黎去了，當時那里正準備着1849年6月13日²⁷到來的結局；威廉·沃尔弗這時已在法蘭克福議會里占有他的席位——當時這個議會必須在被從上面解散或是投向革命之間進行選擇；而我則到了普法爾茨，作了維利希志願部隊中的副官²⁸。

寫于1884年2月中—3月初

原文是德文

載于1884年3月13日“社會
民主黨人報”第11號

俄文譯自“社會民主黨人報”

署名：弗·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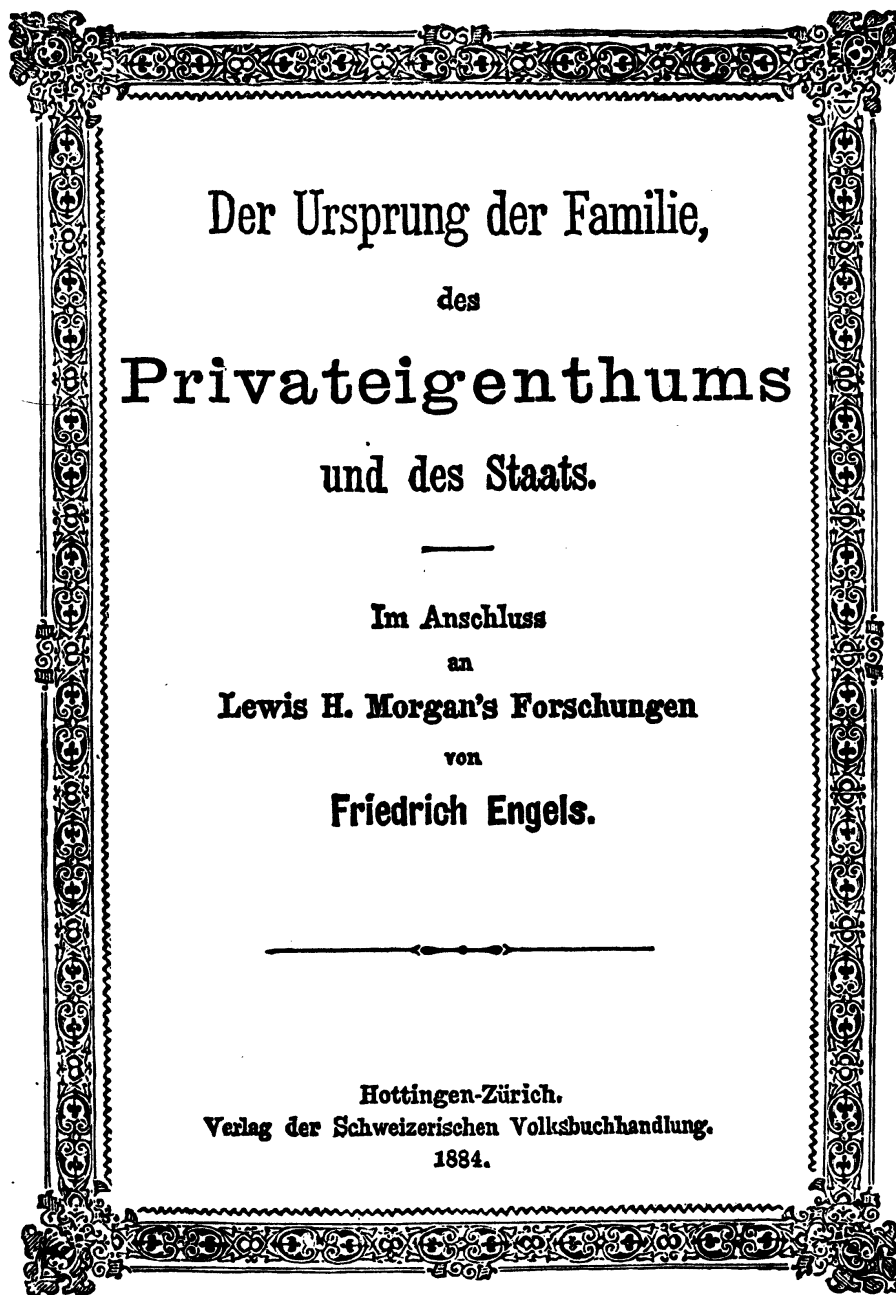
写于 1884 年 3 月底—5 月 26 日

1884 年以单行本在苏黎世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 1891 年版本译的，
并根据 1884 年版本校对过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封面

第一版序言

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着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正如德国的职业经济学家多年来热心地抄襲“資本論”同时又頑强地抹煞它一样，英国“史前”科学的代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①，也用了同样的办法。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詳細摘要³⁰中的批語，这些批語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抄录。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資料

①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By Lewis H. Morga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7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經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步过程的研究”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77年版]。該书在美国刊印，在伦敦极难买到。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

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們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①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但是，他的著作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四十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① 見本卷第 149 頁注^①。——譯者注

在后面的叙述中，讀者大体上很容易辨别出来，哪些是原来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新补充的。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在这里，摩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材料，而关于德意志人的章节——除了塔西佗以外——还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主义的贗品³¹。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最后，凡是沒有明确引证摩尔根而做出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

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直到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

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用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³²

家庭的发展是与此并行的，不过，这一发展对于时期的划分没有提供这样显著的标志罢了。

1. 蒙昧时代

1. 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

們以果实、坚果、根莖作为食物；分节語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經沒有一个是处在这种原始状态中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續了好几千年之久，但我們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們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們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2. 中級阶段。从采用魚类(虾类、貝壳类及其他水棲动物都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魚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們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們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的了。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謂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分都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一切大陆上，就是这一移居的证据。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領，就提供了新的食物：在热灰和烧穴(地灶)中煨烤的淀粉质的根莖和块根，以及随着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发明而間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猎物。像书籍中所描写的純粹的打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是从未有过的；靠猎物来維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經常沒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頗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和許多波利尼西亚人还是处在蒙昧时代的这个中級阶段上。

3. 高級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門之一。弓、弦、箭已經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經驗和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許多发明。如果把已經知道弓

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摩尔根认为向野蛮时代过渡就是从制陶术开始)的各民族,彼此对照一下,我們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經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資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木质纖維作成的手工織物(沒有織机),用树皮或芦葦編成的籃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經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有的地方已經使人能够用木材和木板来建筑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間,我們就可以看到这一切进步,这些印第安人虽然已經使用弓和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劍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2. 野蛮时代

1. 低級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編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塗上粘土使其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們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內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在此以前,我們可以把发展过程看作是一般的,适用于一定时期的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們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馴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謂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馴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馴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駝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却是最好的一种,

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2. 中級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馴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干磚(即用阳光晒干的生磚)和石头开始。

我們先从西大陆說起,因为在这里,在美洲被欧洲人征服以前,不論什么地方,都还没有越过这个阶段。

处于野蛮时代低級阶段的印第安人(凡是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都属于这种印第安人),到他們被發現的时候,已經知道在园圃里种植玉蜀黍,可能也知道种植南瓜、甜瓜及其他园圃植物的某种方法,这些东西构成他們食物的极为重要的部分;他們住在木造的房屋里,村落用木栅围起来。西北各部落,特别是住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的各部落,尚处于蒙昧时代高級阶段,他們既不知道陶器的制造,也不知道任何植物的种植。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謂普韦布洛³³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秘魯人,当他們被征服时,已經处于野蛮时代中級阶段:他們住的房屋是用干磚或石头造成的,类似城堡,并且在人工灌溉的园圃內种植玉蜀黍和其他各种依所住地区和气候而不同的食用植物,这些东西是他們食物的主要来源,他們甚至已經馴养了若干种动物:墨西哥人飼养吐綬鸡及其他禽类,秘魯人飼养羊駝。而且,他們还知道了金属的加工——唯有铁除外,因此他們还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西班牙人的征服打断了他們的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級阶段是从馴养供給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牲畜

的馴养和繁殖以及較大規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和閃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在欧亚两洲的雅利安人中間，家畜的名称还是共通的；而所栽培的植物的名称却差不多总是互异的。

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閃米特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以及沿奥克苏斯河及亚克薩尔特河、頓河和德涅泊河的草原上。动物的馴养，最初大概是在这种牧区的边缘上实行的。因此，后人便以为游牧民族是起源于这样一些地方，这种地方在实际上不仅根本不能成为人类的搖籃，而且相反地，对于蒙昧时代的人类祖先，甚至对于处于野蛮时代低級阶段的人們，都几乎是不适于居住的。反之，自从这些处于中級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于游牧生活以后，再也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河谷自願地回到他們的祖先居住过的森林区域去了。甚至当閃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繼續被挤向北部和西部的時候，要不是他們已經能够通过谷物的种植在亚洲西部的和欧洲的森林地带这种不大适宜的土壤上养活他們的牲畜，特别是在这里过冬，那他們也是不会移居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飼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雅利安人和閃米特人这两个人种的比較好的发展，或許应归功于他們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优良影响。的确，不得不差不多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們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級阶段而吃肉类和魚类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不管怎样，在这个阶段上，食人之风已在逐漸消失，仅仅当做一种宗教活动或魔法仪式（在这

儿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着。

3. 高級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盜^①时代的諾曼人^②,都属于这个阶段。

首先,我們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鏵的用家畜拉的耕犁;有耕犁以后,大规模的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其次,我們也看到,清除森林使之变为耕地和牧场,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鍬,也是不可能大规模进行的。同时,人口也开始急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到不大的地域内。而在田间耕作产生以前,要有极其特殊的条件才能把50万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之下;这样的事大概从来都没有过。

野蛮时代高級阶段的全盛时期,我們在荷馬的詩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轆轤、榨油和酿酒、轉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貨車和战車、用圓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設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都市、荷馬的史詩以及全部神話——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們把凱撒,甚至塔西佗对

① 海盜(Wikinger)系指中世紀斯堪的那維亞各国扰害英国、法国、南意大利、俄国等国沿海地区的半商海盜。——譯者注

② 在1884年版中不是“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盜时代的諾曼人”,而是“凱撒时代的德意志人(或者是我們更爱說的,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編者注

日耳曼人(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馬时代的希腊人,已經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的記述³⁴跟这种成就作一比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級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

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而描繪的这幅人类經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而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經包含有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爭辯的,因为它们是从直接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图景跟我們研究終了时将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較起来,就要显得太暗淡和可怜了;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間的显著对立。現在我們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法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現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輔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經營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二 家 庭

摩尔根一生的大部分，是在易洛魁人中間度过的，这种易洛魁人現在还居住在紐約州。他并且被一个易洛魁人部落（塞訥卡人部落）收养入族。他发现，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种同他們的实际的家庭关系相矛盾的亲属制度。在易洛魁人中間盛行的，是一种双方可以輕易离异的个体婚制，摩尔根把它称为“对偶家庭”。因此，这种夫妻的子女，是众所周知和大家公认的；对誰應該用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兄弟、姊妹等称呼，是不会有疑問的。但是，这些称呼的实际使用，却与此矛盾。易洛魁人的男子，不仅把自己亲生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們都称他为父亲。另一方面，他把自己姊妹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他們称他为舅父。相反地，易洛魁人的女子，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亲生的子女都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們都称她为母亲。她把自己兄弟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內姪和內姪女，她自己被称为他們的姑母。同样，兄弟的子女們互称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們也互称兄弟姊妹。反之，一个女人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則互称为表兄弟和表姊妹。这并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称呼，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緣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現；这种观点是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这

种亲属制度可以表现单个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系。不仅如此，这种亲属制度不仅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过例外）完全有效，而且在印度最古的居民中，在德干的达罗毗荼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中，也差不多毫无变更地实行着。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和纽约州的塞訥卡部落的易洛魁人用来表示亲属关系的名称，即使现在，也还有二百种以上不同的亲属关系是相同的。在印度的这些部落中间，正和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一样，从现行家庭形式中产生的亲属关系，也是同亲属制度相矛盾的。

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煞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人种全然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含糊过去，像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³⁵ 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说明终于找到了。在散得维齿（夏威夷）群岛上，本世纪上半叶还存在着一种家庭形式，这种家庭所产生的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姊妹、儿子和女儿、舅父和姑母、外甥和外甥女、内姪和内姪女，正好同美洲及古印度人的亲属制度所要求的一样。然而，好奇怪！夏威夷群岛上流行的亲属制度，又是同当地事实上存在的家庭形式不相符合的。就是说，那里凡是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毫无例外被看做兄弟姊妹；他们不仅被看做自己母亲及其姊妹或自己父亲及其兄弟的共同的子女，而

且毫无差别地被看做自己双亲的一切兄弟姊妹的共同的子女。因此，如果說美洲的亲属制度，是以在美洲已經不存在，而在夏威夷群島上尚可确实找到的比較原始的家庭形式为前提，那末，另一方面，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向我們指出了一种更加早期的家庭形式，誠然，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現在我們已經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证明了，但是它一定是存在过的，否則，就不会产生与它相适应的亲属制度。

“家庭，——摩尔根說，——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靜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較低阶段向較高阶段的发展，从較低的形式进到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不过是过一个长久的时期把家庭逐渐发生的进步記錄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經急剧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急剧的变化。”³⁶

“同样，——馬克思补充說，——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³⁷ 当家庭繼續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繼續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經超过它了。不过，正像居維叶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物骨骼的骨片，而确实地断定这种骨骼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里曾經有过这种已經絕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們也可以根据历史上所留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經存在过一种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絕迹的家庭形式。

刚刚讲过的那些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同現在所盛行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孩子有几个父亲和母亲。按照美洲的亲属制度（夏威夷的家庭是与它相适应的），兄弟和姊妹不能成为同一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反之，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以通常都是这种情形的家庭为前提。在这里，我們可以看見一系列家庭形式，这些家庭形式，是同那些迄今习惯上认为唯一通行

的形式正相矛盾的。传统的观念只知道有个体婚制，以及和它并存的一夫多妻制，甚至还有一妻多夫制，同时，正如满口仁义道德的庸人所应当做的那样，却把实践偷偷地但却毫不羞赧地逾越官方社会所定的界限这一事实完全隐瞒不说。反之，原始历史的研究却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们两者的子女都被看做大家共有的子女；这种状态，在彻底向个体婚制过渡以前，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这样的：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

摩尔根在这样追溯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大多数同行一致，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的痕迹³⁸，——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找出的这些痕迹，使我们并不是返回到杂乱性交关系的社会阶段，而只是返回到晚近得多的一个形式，即群婚制。那个原始社会阶段，即使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社会的化石中间，在落后了的蒙昧人中间，未必可以找到它在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了。巴霍芬的功绩，就在于他把这个问题着重提了出来进行研究。^①

① 巴霍芬把这种原始状态叫做杂婚，从而表明，他是多么不了解他所发现的，或者正确些说，他所猜到的东西。希腊人使用杂婚这个名词，是表示未婚男子或过个体婚生活的男子跟未婚的女子的性关系；这种情况，总是以一定的婚姻形

近年来，^② 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已成时髦了。人们想使人类免去这一“耻辱”。在这里，人们不仅以缺乏任何直接的证据为口实，而且还特别引用其他动物界的例子；从其他动物界里，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年版³⁹）搜集了许多事实，表明完全杂乱的性交关系在这里也是较低级发展阶段上的东西。但是，我从这一切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它们对于人类及其原始生活条件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脊椎动物长期的成对同居，用生理的原因足以说明；例如，在鸟类方面，是由于雌鸟在孵卵期间需要扶助；但是鸟类方面的牢固的一夫一妻制的例子，对于人类丝毫不能有所证明，因为人类并非起源于鸟类。如果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各种美德的最高峰，那末优胜的棕叶就应当属于蠕虫了，因为蠕虫在其50—200个关节或体节的每一节中都有完备的雌雄性器官，终生都在每个体节中自行交合。如果我们只限于谈哺乳动物，那末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出性生活的一切形式——杂交、类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个体婚制；所缺乏的只是多夫制，只有人类才能达到这一点。甚至我们的近亲——猿猴类，在雌雄的配合上也显露了种种可能的差别；如果再缩小范围，仅仅考察一下四种类人猿，那末在这里勒土尔诺只能说，它们有时是一夫一妻制，有时是多偶制，而索绪尔则根据吉罗-特龙的意见，断言它们是

式的存在为前提，在这个形式之外发生这种关系；并且至少包含着已有可能发生的卖淫。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在别的意义上使用过，我和摩尔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巴霍芬的极端重要的发现，到处都被他的幻想——即认为历史上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总是起源于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而不是起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弄得神秘化了，令人难以置信。

② 这一段和“血缘家庭”（见本卷第49页）那一节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一夫一妻制的。⁴⁰ 最近韦斯特馬尔克（“人类婚姻史” 1891 年伦敦版⁴¹）关于类人猿一夫一妻制的断語，也远不能作为证据。总之，現有的材料都是这样一种性质，以致誠实的勒士尔諾承认：

“不过，在哺乳动物中，智力发展的程度和性交关系的形式之間，根本没有严格的关系。”⁴²

而埃斯潘納斯（“論动物的社会” 1877 年版）則率直地說：

“群是我們在动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看来是由家庭构成的，但是家庭和群一开始就处在对抗之中，它們是以反比例发展的。”⁴³

从上述一切已經可以看出，我們关于类人猿的家庭集团及其他共居生活集团还几乎沒有絲毫确定的知識；現有的材料都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这原沒有什么稀奇。甚至我們关于蒙昧时代人类部落的一切材料，也是多么矛盾，多么需要批判的檢驗和精选呵！而观察猿猴社会，比观察人类社会，还要困难得多。因此，凡根据这样絕对不可靠的材料而作的任何結論，目下我們都應該加以駁斥。

反之，上面所引的埃斯潘納斯的論点却給了我們一个比較牢固的支点。高等动物的群和家庭并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埃斯潘納斯非常清楚地說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內的嫉妒是怎样地削弱或者暂时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

“在家庭紧密結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交关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差不多是自然地組成了群…… 为了使群能够組成，家庭的紐結須要放松，个体須要重新自由。因此，我們在鳥类中才极少見到有組織的群…… 反之，我們在哺乳动物中所以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組織的社会，正因为个体在这里沒有被家庭所吞沒…… 所以，群的集体感在其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我們可以毫不迟疑地說：如果說已經发展起来了一种比家庭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那末这只是由于它把起了根本

变化的家庭溶化在自身之中才能发生；并且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些家庭才有可能以后在无限优越的环境中重新組織起来。”（埃斯潘納斯“論动物的社会”；轉引自吉罗-特龙“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年版第518—520頁）

由此可見，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具有某种价值，——但只是反面的价值而已。在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們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場合，都只許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許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嫉妒，既联系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嫉妒，作为共居生活最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場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場合則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間趋于瓦解，在最好的場合，其进一步的发展也要受到阻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沒有的那种家庭。一种沒有武器的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的动物，即使互相隔絕，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韦斯特馬尔克根据猎人的口述所断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那样，也还能以不多的数量勉强活下去。但是，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从現今类人猿那样的生活条件向人的状态过渡，是根本无法解释的；这种类人猿給我們的印象，勿宁說是一种正在逐漸灭絕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軌的旁系。只此一点，已足以使人推翻把它們的家庭形式同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相提并論的任何說法了。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寬容，嫉妒的消除，則是形成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轉变。的确，我們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現在某些地

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較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們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嫉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动物所沒有的。不过，我們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的复杂情况，以致必然使我們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交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結蒂使我們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的时期，这样，动物婚姻形式的引证，就使我們恰好回到这些引证本来要使我們永远离开的那一点上去了。

那末，所謂杂乱的性交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現在或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沒有效力的。我們已經看到，由于嫉妒而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潰的。如果說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話，那就是：嫉妒是一种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血亲婚配的观念，也是如此。不仅兄弟和姊妹起初曾經是夫妇，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性交关系今日在許多民族中也还是允許的。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 1875 年版第 1 卷⁴⁴）证明，白令海峽沿岸的加惟基人、阿拉斯加附近的科迪亚克島上的人、英属北美內地的提納人，都有这种关系；勒土尔諾也提出了关于印第安赤北韦人、智利的庫庫人、加勒比人、印度支那半島的克伦人的同样事实的报告；至于古希腊人和古羅馬人关于帕提亚人、波斯人、斯基台人、匈奴人等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必說了。在血亲婚配尚未发现之前（这的确是一种发现，而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发现），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性交关系所引起的憎恶，并不大于其他不同輩的人們之間的性交关系；而后者即使今日在最市儈气的国家里也还在发生，

而且并不引起多大的惊愕；甚至年逾六十的老“姑娘”，如果她们十分富有的话，有时也可以嫁给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男子。不过，如果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家庭形式上抛弃那种与它们有关的血亲婚配的观念，——这种观念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而且往往是跟它们直接冲突的，——那末我们就得出一种只能叫做杂乱的性交关系的形式了。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这种关系的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乱得毫无秩序的。短时期的成对配偶，像现在甚至在群婚制中在大多数场合也有的那样，决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说韦斯特马尔克（他是最近的一个否认这种原始状态的人）把两性在生孩子以前成对同居的一切场合，都叫做婚姻，那末就应该说，这种婚姻也是完全可以在杂乱的性交关系状态下发生的，它跟杂乱状态，即没有由习俗规定的对性交关系的限制那种状态并不矛盾。当然，韦斯特马尔克是从如下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

“杂交状态包含着对个人爱好的压抑”，因而“卖淫是这种状态的最真实的形式”⁴⁵。

而我却以为，如果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那便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我们在研究群婚时，再来谈这个问题吧。

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1. **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和曾孙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

了祖先和子孙之間、双亲和子女之間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現代的說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血統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的这一阶段上,也包括相互的性交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看做自然而然的事。^①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

血緣家庭已經絕迹了。甚至在历史所記載的最蒙昧的民族中

① 馬克思在 1882 年春季所写的一封信中⁴⁶,以最严厉的語調,批評瓦格納的“尼貝龙根”歌詞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曲解。歌詞中說:“誰曾听說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⁴⁷瓦格納的这些“色情之神”,完全以現代方式,用一些血亲婚配的事情使自己的风流勾当更加聳人听聞;馬克思对此回答道:“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經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恩格斯在 1884 年版上加的注。)

瓦格納的一位法国友人和崇拜者,不同意这个注,說在瓦格納所根据的“老艾达”中,在“厄革斯德列克”中,洛基就曾指責弗萊雅說:“在諸神面前,你拥抱自己的哥哥。”似乎由此就可以看出,兄弟和姊妹結婚在那时候已經被禁止。不过,“厄革斯德列克”乃是对古代神話的信仰已經完全丧失的那一时代的表現;这是純粹疏善式的对神的諷刺。要是作为靡非斯特斐勒司的洛基在这里对弗萊雅作了这样的指責,那末这倒是反駁了瓦格納了。而且,在后边数行詩中,洛基对尼奧德尔說:“你同你的妹妹生了一个(这样的)儿子”(vidh systur thinni gatzu slikan mög)⁴⁸。尼奧德尔本不是亞薩神,而是瓦那神,所以他在“英格林加傳說”中說,兄弟和姊妹結婚,在瓦那国是很普通的,但在亞薩神中間并不如此。⁴⁹这大概是表明,瓦那神是比亚薩神更古的神。無論如何,尼奧德尔是作为同亞薩神一样的神生活在亞薩神中間的,因此,“厄革斯德列克”勿宁說是证明,在挪威的关于諸神的傳說产生的时代,兄弟和姊妹結婚至少在諸神之間尚未引起任何憎惡。要是想为瓦格納辯护,引用“艾达”倒不如引用歌德,歌德在关于神和舞妓的叙事詩中,說到妇女在寺院献身的宗教义务时也犯了同样的錯誤,他过于把这种风俗习惯比作現代的卖淫了。(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补加的注。)

間，也找不出它的一个不可爭辯的例子來。不過，夏威夷的親屬制度（這種制度至今還在整個波利尼西亞通行），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家庭一定是存在過的，因為它所表現的血緣親屬等級只有在這種家庭形式之下才能發生；同時，家庭後來的全部發展，也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點，因為這種發展要求以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作為必然的最初階段。

2. 普那路亞家庭。如果說家庭組織上的第一個進步在於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相互的性交關係，那末，第二個進步就在於對於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這種關係。這一進步，由於當事者的年齡比較接近，所以比第一個進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難得多。這一進步是逐漸實現的，大概^① 先從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和姊妹之間的性交關係開始，起初是在個別場合下，以後逐漸成為慣例（在夏威夷群島上，在本世紀尚有例外），最後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和姊妹之間的結婚，用現代的稱謂來說，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孫子女、以及曾孫子女之間結婚；按照摩爾根的看法，這一進步可以作為

“自然選擇原則是在怎樣發生作用的最好例證”⁵⁰。

不容置疑，凡血親婚配因這一進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發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之間的結婚當作慣例和義務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這一進步的影響有多麼強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來作證明；氏族就是由這一進步直接引起的，而且遠遠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構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羅馬我們還由氏族直接進入了

^① “大概”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文明时代。

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产制的共同的家庭经济（它毫无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后期），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这种规模虽然依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当确定的。不过，一旦发生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不许有性交关系的观念，这种观念就一定要影响到旧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这种新的家庭公社这时不一定要同家族集团相一致）。一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公社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公社的核心。摩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的家庭形式，便经过这样或类似的途径而由血缘家庭产生出来了。按照夏威夷的习俗，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即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或更远一些的姊妹——是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为兄弟，他们也不必再成为兄弟了，而是互称为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即所谓 *associé*〔伙伴〕。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些女子也互称为普那路亚。这是家庭结构的古典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又经历了一系列改变，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内是把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后更及于血统较远的）除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

这种家庭形式十分精确地向我们提供了美洲的制度所表现的亲属等级。我母亲的姊妹的子女，依然是我母亲的子女，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子女，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子女，他们全都是我的兄弟

姊妹；但是我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現在都是我母亲的內姪和內姪女，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現在都是我父亲的外甥和外甥女，而他們全都是我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了。因为，固然我母亲的姊妹的丈夫們依然是我母亲的丈夫們，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妻子們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妻子們——即使事实上不总是如此，在法理上却是如此——，但由于社会对于同胞兄弟姊妹之間的性交关系的非难，結果就使兄弟姊妹的子女（本来是毫无差別地被承认为兄弟姊妹的）划分为两类：有一些人像过去一样，相互之間依然是（血統較远的）兄弟姊妹，另一些人即一方面兄弟的子女和另一方面姊妹的子女，已經不能再成为兄弟姊妹，已經不能再有共同的双亲了——無論是共同的父亲，共同的母亲，或是共同的父母；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发生了分为外甥和外甥女、內姪和內姪女、表兄弟和表姊妹这些类别的必要，而这些类别在从前的家庭制度之下是沒有任何意义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在以某种个体婚制为基础的任何家庭形式下，似乎是极其荒誕的事情，現在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連最細微的地方，都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和自然的根据。普那路亚家庭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①，至少也應該和美洲的亲属制度同样流行过。

如果波利尼西亚的虔誠的传教士，像美洲早先的西班牙修道士一样，能够在这种反基督教的关系中看出一种比簡單的“丑事”^②更重要的东西，那末，大概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可以找到这

① “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② 被巴霍芬认为是他发现的，杂乱的性交关系（他把这种性交关系叫做“污泥生殖”[«Sumpfzeugung»]）的遺迹⁵¹，是来自群婚制的，現在关于这一点再不容怀疑了。“如果巴霍芬认为这种‘普那路亚’婚姻是‘非法的’，那末，那一时代的人也許要认为今日从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之間的結婚，近的和远的，大多数都是血亲婚配，正如亲兄弟和亲姊妹之間的結婚一样。”（馬克思語）⁵²

种已被证明确实存在于夏威夷群島上的家庭形式。如果說，凱撒曾告訴我們說，当时处于野蛮时代中級阶段的布列吞人，“每十个或十二个男子共妻，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⁵³，那末，这最好解释为群婚^①。野蛮时代的母亲不会有十个至十二个这样年龄的儿子，以致可以有共同的妻子們；而跟普那路亚家庭相适应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却能提供好多兄弟，因为每个男子的一切血統近的和远的兄弟都是他的兄弟。凱撒所謂“父母和子女”，大概是弄錯了；在这个制度下，固然还没有絕對排除父亲和儿子或母亲和女儿属于同一婚姻集团的可能性，但是却不容許父亲和女儿或母亲和儿子处在同一婚姻集团內。同样，从这种群婚形式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②出发，最容易說明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著作家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共妻情况的叙述。这也可以說明沃森和凱（“印度的居民”⁵⁴）所叙述的关于奧德（在恒河以北）的蒂庫尔人的情况，即：

“他們共同地生活〈即在性交关系上〉在大公社中，差不多毫无差別，要是他們之間有二人被視為夫妻，那末，这种关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

看来，氏族制度，在絕大多数場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誠然，澳大利亞的級別制度也可以成为氏族的出发点⁵⁵；澳大利亞人有氏族，但他們还没有普那路亚家庭，而只有更粗野的群婚形式。^③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誰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

①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編者注

② “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③ 在 1884 年版中不是“而只有更粗野的群婚形式”，而是“他們的組織具有十分个别的性质，我們无須加以注意”。——編者注

定的，但誰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子女，对于他們都担負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末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級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大功績，就在于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随着時間的进展而由此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簡便起見，我仍然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談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如果我們現在从普那路亚家庭中取它的两个典型集团之一，即由一群姊妹——同胞的和血統較远的，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等級、第二等級或更远的姊妹——連同她們的子女以及她們母方的同胞兄弟和血統較远的兄弟（按照我們的前提，他們不是她們的丈夫）所組成的集团来看，那末摆在我們面前的这一群人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員。她們全体有一个共同的女祖先；由于出自同一个女祖先，后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但是，这些姊妹的丈夫們，已經不能是她們的兄弟，从而不能是出自这个女祖先的，因而也不包括在后来成为氏族的这个血緣亲属集团以內了；然而，他們的子女却属于这个集团，因为只有唯一确知的母方世系才具有决定的作用。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間，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間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經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轉化为氏族了，換言之，即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結婚的女系血緣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而日益巩固起来，并且与同一部落內的其他氏族区别开来

了。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詳細談到。不过，我們既然看到氏族不仅是必然地，而且簡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的，那末我們就有理由认定，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证实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的和文明的民族中，几乎毫无疑问地都曾經存在过这种家庭形式^①。

当摩尔根写他的著作的时候，我們关于群婚的知識还是非常有限的。仅略略知道那組織为級別的澳大利亚人实行群婚，此外就是摩尔根早在 1871 年发表了他所得到的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家庭的材料⁵⁶。普那路亚家庭，一方面，对美洲印第安人中盛行的亲属制度（这一制度曾經作为摩尔根的全部研究的出发点）做了完备的說明；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一个可以引出母权制氏族的現成的出发点；最后，它乃是比澳大利亚的級別制度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摩尔根把这个形式看做必然先于对偶婚存在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且认定它普遍流行在更早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自从我們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以后，現在才知道摩尔根在这里走得太远了。不过，他仍然很幸运，在他的普那路亚家庭中碰到了最高的、典型的群婚形式，亦即可以用来最容易地說明向更高形式过渡的那种形式。

使我們的关于群婚的知識大大丰富起来的，是英国传教士劳里默·法森，他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古典地区——澳大利亚，对群婚做了多年的研究。⁵⁷他在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的澳大利亚黑人中发现了最低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整个部落分为两个級別：克洛基和庫米德。每个級別内部都严格禁止性交关系；反之，

^① 以下直到“对偶家庭”那一段（見本卷第 57 頁）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一級別的每个男子生来就是另一級別的每个女子的丈夫，而后者生来也是前者的妻子。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集团相互結婚，即級別和級別結婚。而且应当指出，这里除了两个外婚制級別的划分所造成的限制以外，不論年齡上的差別或亲近的血緣亲属关系，都不能成为性交关系的阻碍。对克洛基的任何男子說来，庫米德的每个女子都是他的当然的妻子；但是，他自己的女儿，既是庫米德女性所生，根据母权制也是庫米德，所以，她生来就是每个克洛基男人的妻子，从而也是自己父亲的妻子。不論如何，我們所知道的那种級別組織，对于这一点是沒有設下任何障碍的。所以，或者是在这种組織发生的那个时期，虽然已有限制血亲婚配的朦朧意向，但是人們还不把父母和子女間的性交关系看做怎样特别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級別制度就是从杂乱性交关系的状态中直接产生的；或者是在級別发生的时候，父母和子女間的性交关系业已为习俗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状态就表明在它以前曾經存在过血緣家庭，而它是走出血緣家庭的第一步。后面这一种情况，比較可信。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父母和子女間的婚姻关系的例子，还没有人提到过；而比較晚一些的外婚形式，即母权制氏族，照例也默然以禁止这种关系为前提，把这种禁例看做一种在氏族产生时就已存在的事情。

两个級別的制度，除了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以外，在更靠东部的达令河流域和东北部的昆士兰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制度通行頗广。它只排除母方兄弟姊妹間、母方兄弟的子女間、母方姊妹的子女間的結婚，因为他們都是属于同一級別的；反之，姊妹的子女和兄弟的子女却能相互結婚。进一步阻止血亲婚配的办法，可以在新南威尔士达令河流域的卡米拉罗依部落中間看到，在

那里，两个最初的级别分成四个，而这四个级别之中每一级别全体又都跟其他某一个一定的级别结婚。最初的两个级别生来就互为夫妻；根据母亲属于第一或第二级别，她的子女就属于第三或第四级别；这后两个同样互相结婚的级别，其子女又加入第一和第二级别。这样，一代总是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下一代则属于第三和第四级别，第三代又重新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根据这一制度，兄弟姊妹的子女（母方的）不得为夫妻，但是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这一特别而复杂的制度，由于母权制氏族的插入——无论如何是在较后的时期——而更加复杂。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研究这个了。这样，我们看到，阻止血亲婚配的意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然而这是本能地自发地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

群婚在澳大利亚还是一种级别婚，它是往往分布于全大陆的整个一级别的男子和同样广布的一级别的女子的群众性夫妻关系，——这种群婚，如果加以详细的观察，决不像习惯于娼妓制度的庸人幻想所描绘的那样可怕。相反地，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才仅仅开始猜测到有这种婚姻存在，只是不久以前才又对它争论起来。在皮相的观察者看来，它是一种不牢固的个体婚制，而在某些地方则是间或有通奸行为的多妻制。只有像法森和豪伊特那样，花费许多年工夫，才能在这些婚姻关系（普通的欧洲人喜欢在这些婚姻关系的实践中看到某种类似他的故乡现有的婚姻关系）中发现一种调节法则，根据这种法则，一个外地的澳大利亚黑人在离开本乡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说着他所不懂的语言的人们中间，往往依然可以在一个个地方或一个个部落里，找到没有一点反抗和怨恨地甘愿委身于他的女子，而有着几个妻子的男人，也愿意让一个妻

子給自己的客人去过夜。在欧洲人視為不道德和无法紀的地方，事实上都盛行着一种严格的法則。这些女子属于客人的通婚級別，因而她們生来就是他的妻子；把他們彼此結合起来的那个道德法則，同时又用剝夺权利的惩罚方法，禁止相互所属的通婚級別以外的任何性交关系。甚至在經常搶劫妇女的地方（某些地方还把这当作通例），也很慎重地遵守級別的法則。

順便提一下，搶劫妇女的現象，已經表現出向个体婚制过渡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現出这种迹象：当一个青年男子，在朋友們的帮助下劫得或拐得一个姑娘的时候，他們便輪流同她发生性交关系；但是在此以后，这个姑娘便被认为是那个发动搶劫的青年男子的妻子。反之，要是被劫来的女子背夫潜逃，而被另一个男子捕获，那末她就成为后者的妻子，前者就丧失了他的特权。这样，与繼續存在的群婚并行，并且在它的范围以內，又产生了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即或长或短时期內的成对配偶制以及与此并行的多妻制，于是在这里群婚也开始消亡，問題只在于：在欧洲人的影响下，首先消失的是什么——是群婚制还是奉行群婚制的澳大利亚黑人。

像澳大利亚所盛行的那种整个級別的結婚，無論如何，乃是群婚的一种十分低級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論，則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前者大概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后者則是以比較牢固定居的共产制公社为前提，并且直接导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两种婚姻形式之間，我們无疑还会发现某些中間阶段；在这里，目下摆在我們面前的还是一个刚刚敞開而尚未有人进入的研究領域。

3. 对偶家庭。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內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

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头脑中的混乱；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①看做一种杂乱的共妻，有时又把群婚看做一种任意的通奸。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类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使情况更加向前发展了。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承认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其数多至数百种。由于这种婚姻禁例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家庭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子女像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

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颧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⁵⁸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

^① 在1884年版中，这一句和前一句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或者带动它們来仿效自己。

由此可見，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縮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起初是血統較近的，后来是血統愈来愈远的亲属，最后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結果，只剩下一对結合得还不牢固的配偶，即一旦解体就无所谓婚姻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經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現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沒有关系了。所有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下，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点；而現在女子却稀少起来，不得不去寻找了。因此，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現搶劫和购买妇女的現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但是苏格兰的学究麦克伦南，却根据这些仅仅是有关求妻方法的迹象，虚构了他所謂的“搶劫婚姻”和“买卖婚姻”这两种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中間，締結婚姻并不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們商量），而是他們的母亲的事情。这样，訂婚的往往是两个彼此全不相識的人，只是到婚期临近时，才告訴他們业已訂婚。在婚礼之前，新郎贈送礼物給新娘的同氏族亲属（即新娘的母方亲属，而不是她的父亲和父亲的亲属）；这种礼物算是被出让的女儿的贖金。婚姻可以根据夫妇任何一方的意願而解除，但是在許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逐漸形成了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社会輿論；在夫妇不和时，双方的同氏族亲属便出而調解，只有在調解无效时，才实行离婚，而且，子女仍归妻方，以后双方都有重新結婚的自由。

这种对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愿意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庭经济解体。但是共产制家庭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庭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那种认为妇女在社会发展初期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我们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所继承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种地位到了对偶婚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訥卡部落的易洛魁人中做过多年传教士的阿瑟·萊特作证明。他说：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几个家庭的共产制家庭经济）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得到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貯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貯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甚至不敢有反抗的企图；家对于他变成了地狱，除了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或在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大多如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妇女在克兰（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权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⁵⁹

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全体或大多数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原始时代到处通行的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这种妇女统治的发现，乃是巴霍芬的第三个功绩。——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旅行家和传教士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妇女都担负奇重工作的报告，同上面所说的

并不矛盾。决定两性間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們所設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常常对妇女怀着比我們欧洲人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貴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做真正的貴妇人(lady, frowa, Frau = 夫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說来，她們也确是如此。

要弄清現在美洲的群婚^①是否已完全被对偶婚所排除的問題，必須更加仔細地研究一下还处于蒙昧时代高級阶段的西北部民族、特别是南美的各民族。关于后者，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随便性交的事例，使人很难設想在这里旧时的群婚已經完全克服。^② 無論如何，群婚的遺迹还是沒有完全消失的。在北美的至少四十个部落中，同长姊結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一切妹妹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遺风。而加利福尼亚半島的居民(蒙昧时代高級阶段)，据班克罗夫特說，則有一些节日，在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进行不加区别的性交⁶⁰。显然，这是指一些氏族，它們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为她們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則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女为他們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存着一点朦朧的記憶。^③ 这种

① 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編者注

② 这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③ 以下直到“对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見本卷第64頁)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在1884年版中，这一段的結尾是如下一段被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部分地利用又部分地删节了的文字：“古代世界的这类实践的遺迹是众所周知的，例如，腓尼基姑娘在阿斯塔塔节在寺庙中献身于过路男人的风俗；甚至中世紀的初夜权，也是大概由于

习俗在澳大利亚仍然盛行着。有些民族中，还有这种情形，即男性长者、酋长和巫师，利用共妻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自己独占大多数妇女；但是，他們在一定节日和民众大集会时，必須恢复以前的共妻制，让自己的妻子去和年輕的男子們寻乐。韦斯特馬尔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一书第 28—29 頁，举了許多例子，表明在印度的霍人、桑塔尔人、潘札人和科塔尔人部落中，在某些非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这种定期的沙特恩节⁶¹，即在一个短时期內重新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交关系。奇怪的是，韦斯特馬尔克由此得出一个結論，說这并不是他所否认的群婚的殘余，而是原始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交尾期的殘余。

在这里，我們便接触到了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广泛流行的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被巴霍芬說成是对违反古代神戒的贖罪，即妇女用以贖买貞操权利的贖罪，事实上不过是对一种贖身办法的神秘化的說法，妇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从古时存在过的共夫制之下贖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子的权利。这种贖身，是一种有限制的献身：巴比伦的女子每年須有一次在米莉塔庙里献身給男子；其他前亚細亚各民族把自己的姑娘送到阿娜伊蒂斯庙去住好几年，让她們在那里同自己的意中人进行自由恋爱，然后才允許她們結婚；穿上宗教外衣的类似的风俗，差不多在地中海和恒河之間的所有亚洲民族中間都可遇到。为贖身而做出的贖罪牺牲，随着時間的进展而愈来愈輕，正如巴霍芬已經指出的：

“年年提供的这种牺牲，让位于一次的供奉；从前是妇人的杂婚制，現在是姑娘的杂婚制；从前是在結婚后进行，現在是在結婚前进行；从前是不加区

克尔特氏族（克兰）而保持下来了了的普那路亚家庭的殘余，尽管德国的新浪漫派竭力抹煞这个事实，初夜权却极其頑强地存在着”。——編者注

別地献身于任何人，現在是只献身于某些一定的人了。”（“母权論”第XIX頁）

在其他民族中，沒有这种宗教的外衣；在有些民族中——在古代有色雷斯人、克尔特人等，在現代則有印度的許多土著居民、馬來亞各民族、太平洋地区的島民，和許多美洲印第安人——姑娘在出嫁以前，都享有极大的性的自由。特別是在南美洲，差不多到处都是如此，只要到过該大陆內地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阿加西斯（“巴西旅行記”1886年波士頓和紐約版第266頁⁶²）曾經談到一个印第安人世系的富有家庭。当他被介紹同这一家的女儿認識时，他問到她的父亲，意思是指她母亲的丈夫，一个正在参加对巴拉圭战争的軍官，但是母亲含笑回答道：Naõ tem pai, é filha da fortuna——她沒有父亲，她是一个偶然生的孩子。

“印第安妇女或混血种妇女，总是这样毫不害羞、毫无愧悔地談到她們的非婚生子女；这完全不是例外，似乎倒是相反的情形才是例外。孩子們……往往只知道母亲，因为一切的照顾和責任都落在她的身上；他們对于父亲却毫无所知；看来妇女也从来没有想到她或她的子女对他有什么要求。”

在这里使文明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在群婚制却是一种通例。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請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后的一个；在巴利阿里群島和在非洲的奥及娄人中，在古时都是如此；而在阿比西尼亚的巴里人中，現在也还是如此。在另一些民族中，則由一个有公职的人，——部落或氏族的首长、酋长、薩滿、祭司、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尽管新浪漫主义者竭力掩飾这一事实，但这种 *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至今还作为群婚的殘余，存在于阿拉斯加

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班克罗夫特“土著民族”第1卷第81頁)、墨西哥北部的塔胡人(同上,第584頁)及其他民族中;在整个中世紀,它至少存在于原为克尔特人的各个国家中,例如在阿腊貢;在这些地方,它是直接由群婚传下来的。在加斯梯里亚,农民虽然从来没有成为农奴,但在阿腊貢却盛行过极丑恶的农奴制,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做出裁决为止⁶³。在这个文件中說:

“茲決定并宣告,上述領主(senyors, 男爵)……亦不得在农民娶妻时与其妻同睡第一夜,或在結婚之夜,当新娘躺在床上时,跨越該床及該女子,作为自己統治的标志;上述領主亦不得違反农民的女儿或儿子的意志去差使他們,無論偿付报酬与否。”(据祖根海姆“农奴制度”1861年彼得堡版第355頁上的卡塔卢尼亚語原文。⁶⁴)

其次,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謂的“杂婚制”或“污泥生殖”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絕對正确的。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間的关系,愈是随着經濟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素朴的原始的性质,就愈使妇女感到屈辱和难堪;妇女也就愈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貞操、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結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这个进步决不可能发生在男子方面,这完全是由于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自然,这种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

对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时代高級阶段,只有个别地方是在野蛮时代低級阶段。这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时代,一夫一妻制之于文明时代一样。要使对偶家庭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一夫一

妻制，除了我們已經看到的一直起着作用的那些原因之外，還需要別的原因。在成對配偶制中，群已經減縮到它的最後單位，僅由兩個原子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選擇已經通過日益縮小婚姻關係的範圍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這一方面，它再也沒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沒有新的、社會的動力發生作用，那末，從成對配偶制中就沒有任何根據產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這種動力開始發生作用了。

我們現在撇開美洲這個對偶家庭的古典地區不談吧。沒有任何跡象可以使我們做出結論說，在美洲曾經發展起更高級的家庭形式，或者在美洲被發現和被征服以前，在這裏的什麼地方曾經存在過嚴格的一夫一妻制。而舊大陸的情況却不是這樣。

在舊大陸，家畜的馴養和畜群的繁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的來源，並產生了全新的社會關係。直到野蠻時代低級階段，固定的財富差不多只限於住房、衣服、粗糙的裝飾品以及獲得食物和製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簡單的家庭用具。天天都要重新獲得食物。現在，日益前進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和恒河地區，以及當時水草更豐富的奧克蘇斯河和亞克薩爾特河流域的雅利安人，住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閃米特人——已經有了馬、駱駝、驢、牛、綿羊、山羊和豬等畜群，這些財產，只須加以看管和最簡單的照顧，就可以愈來愈多地繁殖起來，供給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獲取食物的方法，現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打獵在從前曾經是必需的，如今也成為一種消遣了。

但是，這些新的財富歸誰所有呢？最初無疑是歸氏族所有。然而，對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發展起來了。很難說，亞伯拉罕族長被所謂摩西一經的作者看做畜群的占有者，究竟是由

于他作为家庭公社首领所拥有的权利，还是由于他作为实际上世襲的氏族首长而具有的地位。只有一点沒有疑問，那就是我們不應該把他設想为現代意义上的財產所有者。其次，沒有疑問的是，在成文历史的最初期，我們就已經到处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一家之长的特殊財產^①，完全同野蛮时代的工艺品一样，同金属器具、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隶一样。

因为这时奴隶制度也已經发明了。对于低級阶段的野蛮人來說，奴隶是沒有用处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处置战敗敌人的办法，与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們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同。男子被杀死或者当作兄弟編入胜利者的部落；妇女則作为妻子，或者把她們同她們的殘存的子女一起收养入族。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劳动力还不能生产超出維持它的費用的显著的余額。随着牧畜、金属加工、紡織以及田間耕作的采用，情况就改变了。正如以前容易得到的妻子現在具有了交換价值而可以购买一样，劳动力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特別是在畜群完全轉归家庭所有^②以后。家庭并不像牲畜那样迅速地繁殖起来，現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看管牲畜；为了这个目的，正可以利用被俘虏的敌人，何况这些敌人像牲畜一样，也是很容易繁殖的。

这些財富，一旦轉归各个家庭^③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給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偶婚給家庭添加了一个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母亲以外，它又确立了确实的生身的父亲，而且这个生身的父亲，大概比今天的許多“父

① 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財產”，而是“私有財產”。——編者注

② 在1884年版中不是“家庭所有”，而是“私人所有”。——編者注

③ “各个家庭”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亲”还要确实一些。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在离婚时，他就随身带走这些劳动工具，而妻子则保留有她的家庭用具。所以，根据当时社会的习惯，丈夫也是食物的新来源——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奴隶的所有者。但是根据同一社会的习惯，他的子女却不能继承他的财产，因为关于继承问题有如下的情形。

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制度，氏族成员死亡以后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由于构成财产的物品不多，在实践上大概就转归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所有，就是说，转归母方的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最初他们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由他们来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在父亲自己的氏族内。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转归他母亲的姊妹的子女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不许继承的。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保留

下来,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巴霍芬所搜集的关于母权制的许多遗迹的材料可以充分证明;至于这一革命是怎样容易地完成的,可以从许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看出来;在那里,部分地由于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改变了的生活方式(从森林移居大草原)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文明和传教士的道德上的影响,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发生,现在还在进行。在密苏里河流域的八个部落中,有六个是实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继承权的,只有两个还按女系。在肖尼人、迈阿米人和德拉华人各部落中,已形成一种习俗,即用父亲氏族的族姓之一来给子女取名字,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列入父亲的氏族,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直接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马克思语)⁶⁵因此,就发生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混乱,这种混乱只有通过向父权制的过渡才能消除,而且确实这样部分地被消除了。“一般说来,这似乎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渡。”(马克思语)⁶⁶至于①研究比较法的法学家们对这一过渡在旧大陆的各文化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说法,——当然几乎全部只是一些假说而已,——见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

① 由此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論”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⁶⁷。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却是丝毫也没有消除的。

这样确立的男子独裁制的第一个结果，表现在这时发生的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上。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不是多妻制（关于这一点后边再讲），而是

“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在闪米特类型的家庭中，这个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整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以内照管畜群”⁶⁸。

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的家庭。Familia〔家庭〕这个词，起初并不是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相结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 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familia, id est patrimonium（家庭，即遗产），就是按遗嘱传授的。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因此，这一用语并不比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庭制度更早，这种家庭制度是在采用田间耕作和奴隶制合法化以后，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腊人分

离以后发生的。”⁶⁹

对这一点，馬克思补充說：“現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 (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⁷⁰

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为了保证妻子的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絕對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①

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現，我們便进入成文历史的領域，同时也进入那比較法学能給我們以很大帮助的領域了。而比較法学在这里也确实促成了重大的进步。我們感謝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第60—100頁），他向我們证明了，今天我們在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中还可以見到的那种称为 Zadruga [扎德魯加]（大意为大家庭）和 Bratstvo（胞族社）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以及在东方各民族中所見到的那种形式有所改变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一个由群婚中产生并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家庭到現代世界的个体家庭的过渡阶段。至少对于旧大陆各文化民族說来，对于雅利安人和閃米特人說来，这一点看来是已經得到证明了。

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魯加是这种家庭公社的現存的最好的例子。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們的妻子，他們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儲存，共同占有剩余

^① 以下直到“在說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見本卷第72頁）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产品。公社处于一个家长 (domácin) 的最高管理之下, 家长对外代表公社, 有权出让小物品, 掌管賬目, 并对賬目和对整个家务的正常經營負責。他是选举产生的, 不一定是最年长者。妇女和她們的工作受主妇 (domáčica) 领导, 主妇通常是家长的妻子。主妇在公社姑娘择婿时, 也起着重要的, 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 最高权力集中在家庭會議, 即全体成年男女的會議。家长向这个會議作报告; 會議通过各項最后的决定, 对公社成員間的爭端进行裁判, 以及对比較重大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等做出决定。

只是在大約十年以前, 才证明了在俄国也还繼續存在着这种大家庭公社⁷¹; 現在大家都承认, 这种家庭公社, 像农村公社一样在俄国的民間习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在俄罗斯最古的法典——即雅罗斯拉夫的“真理”⁷² 中, 曾經提到它們, 其名称 (vervj) 和达尔馬戚亚法典⁷³ 中所用的相同; 在波兰和捷克的史料中, 也可以找到它們。

根据霍伊斯勒 (“德意志私法制度”⁷⁴) 的意見, 德意志人的經濟单位起初也不是現代意义上的个体家庭, 而是由几代人或者說几个个体家庭所构成的、并且往往还包括許多非自由人的“家庭公社”。羅馬的家庭也被归在这种类型以內, 因此, 家长的絕對权力, 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員对家长的无权地位, 近来是受到很大怀疑的。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中, 大概也存在过类似的家庭公社; 在法国的尼韦尔內, 直到法国革命时期, 这种家庭公社还以 parçonneries 为名称保存着; 而在法兰斯孔太, 它直到現在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卢昂地区 (在索恩—卢瓦尔省), 还可以見到巨大的农民住房, 中間是公用的很高的、直达屋頂的大厅, 四周是臥室, 由六級至八級的

梯子登入，在这里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

在印度，实行共同耕作的家庭公社，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奈阿尔科斯⁷⁵就已经提到过，它今天也还存在于原来那些地方，即旁遮普和该国的整个西北部。在高加索，柯瓦列夫斯基本人就可以证明这种家庭公社的存在。在阿尔及利亚，它还存在于卡比尔人中间。甚至在美洲，它大概也曾经存在过；苏里塔所记述的古墨西哥的«calpullis»⁷⁶，人们就想把它看做是家庭公社；而库诺夫（“外国”杂志 1890 年第 42—44 期）⁷⁷ 十分清楚地证明，在秘鲁被征服时，存在过一种类似马尔克制度的东西（而且很奇怪，这种马尔克也叫做 marca），实行定期的重新分配土地，从而实行土地的个体耕作。

无论如何，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就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对于它在旧大陆各文化民族和其他若干民族中，在从母权制家庭向个体家庭的过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不能有所怀疑了。在以后的阐述中，我们还要说到柯瓦列夫斯基所作的进一步的结论，即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远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就是从这个过渡阶段中发展起来的。

谈到这种家庭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应当指出，至少在俄国，大家都知道，家长对于公社的年轻妇女，特别是对他的儿媳常常滥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作为后房；俄罗斯民歌对于这点有很好的描写。

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夫一妻制以前，我们再就多妻制和多夫制说几句话。这两种婚姻形式，只能算

是例外，可以說是历史的奢侈品，除非它們在某一个国家内同时并存，但是大家知道这是沒有的事。因此，由于被多妻制所排除的男子并不能向因多夫制而成为多余的妇女求得安慰，而且男女的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論多妻制或多夫制的婚姻形式都不能成为普遍通行的形式。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人物才能办到。在閃米特人的家长制家庭中，只有家长本人，至多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其余的人都以一人一妻为滿足。現在整个东方还是如此；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貴人物的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关于它起源于群婚^①这个无疑是不无兴趣的問題，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而在实践上，多夫制的容让性看来要比伊斯兰教徒的富于嫉妒的后房制度大得多。例如至少在印度的納伊尔人中間，虽然每三、四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个妻子，但是他們每人同时还可以和別的三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第四个……妻子。奇怪的是，麦克伦南在叙述这种婚姻俱乐部时（其成員可以同时加入几个俱乐部），竟沒有发现俱乐部婚姻这个新的范疇。不过，这种婚姻俱乐部的风俗，决不是真正的多夫制；恰好相反，正如吉罗-特龙所已經指出的，这只是群婚的一种特殊形式；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則过着多夫制的生活。^②

4. 一夫一妻制家庭。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級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

^① 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編者注

^② 最后一句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統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資格继承他們父亲的財產。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这种关系現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破坏夫妻忠誠这时仍然是丈夫的权利，这一点至少有习俗作保证（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 明确地規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不把姘妇带到家里来⁷⁸）；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权利也行使得愈来愈广泛；如果妻子回想起昔日的性的实践而想加以恢复时，她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

这种新的家庭形式的最严酷的例子，我們在希腊人中間可以看到。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⁷⁹，神話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較自由和比較受尊敬的位置，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們就看到妇女已經由于男子的統治和女奴隶的競争而降低了。^① 只要讀一下“奥德賽”，就可以看到特里曼珠是怎样打断他母亲的話并迫使她緘默。⁸⁰ 在荷馬的史詩中，被俘虏的年輕妇女都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軍事首領們按照他們的軍阶依次选择其中的最美丽者；大家也知道全部“伊利亚特”都是以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爭夺这样一个女奴隶的糾紛为中心的。荷馬的史

① 在 1884 年版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的：“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們就看到，妇女处于半幽禁的地位，以便保证子女确凿可靠地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以下直到“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監視”（見本卷第 77 頁）以前的一段文字，除利用了 1884 年版中原有的几句话以外，几乎完全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詩每提到一个重要的英雄，都要讲到同他共享帳篷和枕席的被俘的姑娘。这些姑娘也被带回胜利者的故乡和家里去同居，例如在埃斯庫罗斯的作品中，亚加米农对珈桑德拉就是这样做的⁸¹；同这些女奴隶所生的儿子可以得到父亲遗产的一小部分，并被认为是自由民；特夫克尔就是铁拉孟的这样一个非婚生的儿子，他可以按父名给自己取名字的。对于正式的妻子，则要她容忍这一切，要她自己严格保持貞操和夫妻的忠誠。虽然英雄时代的希腊妇女比文明时代的妇女更受尊敬，但是归根結蒂，她对于男子說来仍不过是他的婚生的嗣子的母亲、他的主要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他可以随意納这些女奴隶为妾，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輕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这种性质它到现在还保存着。

談到較后时期的希腊人，应该把多立斯人同伊奥尼亚人区别开来。前者以斯巴达为典范，他們的婚姻关系在許多方面甚至比荷馬本人所描写的婚姻关系还要古老。在斯巴达，是一种由国家根据当地的观点而改变了的对偶婚制，这种对偶婚制在許多方面还像群婚。不育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国王阿拿克散德里德（公元前560年）由于妻子不育，另娶了一个，有着两个家庭；大約在同一时期，国王阿里斯东曾有两个妻子不育，便娶了第三个，而把前两人中的一个退了。另一方面，几个兄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妻子；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朋友的妻子，就可以和那个朋友共同享有她，而把自己的妻子交給一个像俾斯麦所說的壯健的“种馬”去支配，即使这个家伙本人并不属于公民之列，也认为是合乎体統的事情。在

普卢塔克的作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一个斯巴达妇女，叫一个向她求爱的人，去取得她的丈夫的许可，按照舍曼的看法，可以认为在习俗上甚至存在着更大的自由。⁸² 所以，真正的通奸，妻背夫不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另一方面，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时代，还不知有家庭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赫罗泰则另自居住在庄园里，因此，斯巴达人⁸³ 占有他们妻子的机会比较少。在这些条件下，斯巴达的妇女自然要比其他希腊妇女占着受人尊敬得多的地位。斯巴达的妇女和一部分优秀的雅典艺妓，在希腊，是受古人尊崇并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值得记载的唯一的妇女。

我们看到，在以雅典人为代表的伊奥尼亚人中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姑娘们只学习纺织缝纫，至多也不过学一点读写而已。她们过着差不多是幽居的生活，只能同别的妇女有所交往。妇女所住的房间是在家中的单独一部分，在楼上或者在后屋中，男子，特别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内，如果有男子来到家里，妇女就躲到那里去。妇女没有女奴隶作伴就不能离家外出；她们在家里实际上受着严格的监视；阿里斯托芬曾经提到摩罗西安狗，说人们饲养它们是为了吓走通奸者⁸⁴，而且，至少在亚洲各城市，还用阉人来监视妇女，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在希沃斯岛上就制造这种阉人出售，据瓦克斯穆特说，并不是只卖给野蛮人⁸⁵。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妻子被称为 oikurema⁸⁶，即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这个词是一个中性名词），所以在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丈夫从事竞技运动和公共事业，而妻子不许参加；此外，丈夫还常常有女奴隶供他使用；而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对他来说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

术趣味而高出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巴达妇女由于性格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样。但是，在做妇人之前，必须先当艺妓，这种情况成了对雅典家庭的最严厉的非难。

这种雅典家庭随着时间的进展，成了一种范例，不仅其余的伊奥尼亚人，而且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所有希腊人都逐渐按照这种范例来建立他们的家庭关系。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希腊妇女仍然常常可以找到欺瞒自己丈夫的机会，而耻于向自己的妻子表示任何爱情的丈夫，就同艺妓纵情取乐；但对妇女的侮辱，却在男子身上得到了报复，而侮辱了男子本身，直到他们堕落到违反自然地玩弄男童，并且用加尼米德的神话使他们的神以及他们自己都受到侮辱为止。

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做的考察，一夫一妻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① 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在其他方面，个体婚制对希腊人来说就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所谓夫妇义务^②。

① 在1884年版中不是“经济条件”，而是“社会条件”；从“即以私有制”起的后半句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② 最后一句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可見，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間的好和而出現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現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所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現的。在馬克思和我于 1846 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話：“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間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⁸⁷ 現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間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細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們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

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沒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

“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的逐渐消亡而缩小到更加狭小的范围内，但仍然围绕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的最初期…… 这种旧制度最后终于消失在新的杂婚形式中，这种新的杂婚形式在文明时代仍然伴随着人类，就像一个暗影一般罩在家庭上面。”⁸⁸

摩尔根所說的杂婚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交关系，这种性交关系，大家知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盛行于整个文明时代，而且日益变为公开的卖淫了。^①

① 以下直到“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見本卷第 79 頁)以前的一段文字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这种杂婚制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贖买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牺牲。为金錢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爱神庙举行的，所得的錢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財庫。阿尔明尼亚的阿娜伊蒂斯庙、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庙的庙奴⁸⁹，以及印度神庙中的宗教舞女，即所謂 Bajaderen（葡萄牙語 bailadeira——舞女一詞的訛誤），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些女尼代替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在其他各民族中，这种杂婚制起源于允許姑娘們在結婚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制的殘余，只不过这种殘余是通过其他途徑传到今天的。随着财产不均現象的产生，亦即早在野蛮时代高級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現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伴侶，也出現了与强制女奴隶献身于男性的現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由此可見，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遺產是两重的，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自相矛盾的一样：一方面是一夫一妻制，另方面則是杂婚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繼續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別为統治階級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針對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針對着妇女：她們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絕對統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則。

但是，在一夫一妻制內部第二种矛盾也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同靠杂婚制取乐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遺弃的妻子。^①正如吃

① 这句话和前一句话都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了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沒有矛盾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矛盾的这一面。尽管如此，男子的想法似乎仍然不是这样，直到他們的妻子教訓了他們，使他們更明白为止。随着个体婚制，出現了两种經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經常的情人和戴綠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是桂冠是由失敗者寬宏大量地給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終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了。子女是否确凿无疑地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像从前一样，至多只能依据道德的信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在第三一二条規定：

«L'enfant conçu pendant le mariage a pour père le mari»
——“凡在結婚以后怀胎的嬰兒，以該夫为父”。

个体婚制三千年来存在的最后結果，便是如此。

这样，在个体家庭中，在它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起源，并且男女之間的冲突由于丈夫的独占統治而明白显露出来的場合，我們就看到了，它是自文明时代起分裂为各个階級的社会在其中运动着、但是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縮图。自然，我在这里所說的，只是指个体婚制的如下一些場合，即夫妻生活确实是按照整个这一制度的最初性质所体现的規則来进行，而妻子反抗丈夫的統治的場合。至于說并不是一切婚姻都是这样进行的，这一点再沒有人比德国庸人知道得更清楚了，他不知道怎样做家中的主人，正如他不知道怎样做国家的主人一样，所以，他的妻子有充分权利夺取不配由他掌握的权柄。但是他却自以为，他比他的同样不幸的、比他本人更常遇到恶劣得多的境遇的法国同志要优越得多。

不过，个体家庭决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具有像希腊人中間所有的那种古典的粗野形式。罗马人作为世界的未来征服者，具有虽不比希腊人细致但比他们远大的见识，在罗马人中間，妇女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敬。罗马的男子认为，妻子的贞操已经由于他对妻子有生杀之权而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此外，这里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自由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在个体婚制发展方面的最大进步，无疑是随着德意志人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的，因为在德意志人中間，大概由于他们贫穷的缘故，一夫一妻制在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从对偶婚中完全发展起来。我们是根据塔西佗所提到的如下三种情况而得出这个结论的。第一，尽管婚姻十分神圣，——“他们以一个妻子为满足，妇女生活在被贞操防卫起来的环境中”⁹⁰，——但是在他们的显贵和部落首长中間仍然盛行多妻制，正如我们在实行对偶婚的美洲人中間看到的情况一样。第二，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在他们那里只是在前此不久的时候才得以完成，因为母亲的兄弟——按照母权制是最近的男性的同氏族亲属——在他们那里仍然被认为是比自己的生身父亲更亲近的亲属，这一点也是与美洲印第安人的观点相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常常说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間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第三，在德意志人中間，妇女享有很大的尊敬并且对公共事务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同一夫一妻制所特有的男子的统治直接矛盾的。差不多在这一切方面，德意志人都是与斯巴达人相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斯巴达人中間，对偶婚也是没有完全消失的。^① 因此，在这一方面，一个崭新的要素也随着德

^① 前半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意志人的出現而獲得了世界的統治。在各民族混合的過程中，在羅馬世界的廢墟上發展起來的新的——一夫一妻制，使丈夫的統治具有了比較溫和的形式，而使婦女至少從外表上看來有了古典古代所從未有過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從而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種可能性，在這種可能性的基礎上，從一夫一妻制之中——因情況的不同，或在它的內部，或與它並行，或違反它——發展起來了我們應歸功於一夫一妻制的最偉大的道德進步：整個過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現代的個人性愛。

但是，這個進步無疑是由這樣的情況所引起的，即德意志人還生活在對偶家庭中，他們在可能的範圍內把適應於對偶家庭的婦女地位搬用於一夫一妻制；這一進步決不是由於德意志人的什麼傳奇性的、神奇的酷愛道德純潔的癖性所引起的，這種癖性可以歸結為：對偶婚制在實際上並不像一夫一妻制那樣具有明顯的道德的矛盾。反之，德意志人在其遷徙時期，特別是在向東南方，即黑海沿岸草原游牧民族區遷徙時期，在道德上墮落得很厲害，除騎馬術以外，他們還從這些游牧民族那里染上了丑惡的反自然的惡習，阿米亞努斯關於泰發耳人，普羅科皮阿斯關於海魯萊人的敘述就是明顯的證明。⁹¹

但是，如果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家庭形式中，一夫一妻制是現代的性愛能在其中發展起來的唯一形式，那末這並不是說，現代的性愛完全或主要是作為夫婦相互的愛而在這一形式中發展起來的。在丈夫統治下的牢固的個體婚制的本質，是排斥這一點的。在一切歷史上主動的階級中間，即在一切統治階級中間，婚姻的締結，仍然和對偶婚以來的作法相同，——即仍然是一種由父母安排的、權衡利害的事情。所以，第一個出現在歷史上的性愛形式，亦

即作为热恋，作为每个人（至少是統治階級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热恋，作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这正是性爱的特性），而第一个出現的性爱形式，那种中世紀的騎士之爱，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凡斯人的騎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們的詩人們又加以歌頌的。《Albas》，用德文來說就是破曉歌，成了普罗凡斯爱情詩的精华。⁹² 它用热烈的笔調描写騎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別人的妻子——的床上，門外站着侍卫，一見晨曦(alba)初上，便通知騎士，使他能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发觉；接着是叙述离別的情景，这是歌詞的最高潮。北部法兰西人和堂堂的德意志人，也学到了这种詩体和与它相适应的騎士爱的方式，而我們的老沃尔弗拉姆·馮·埃申巴赫也以这种挑逗性的主題留下了三首美妙的詩歌，我觉得这些詩歌比他的三篇很长的英雄詩更好。

在今日的資產階級中間，締結婚姻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国家中，父母照旧为年輕的資產階級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其結果自然是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杂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沒有任何药物可治的。相反地，在各个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許資產階級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階級选择妻子；因此，恋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結婚的基础，而且根据新教伪善的精神，为了体面，也經常以此为前提。在这里，丈夫实行杂婚并不那么厉害，而妻子的通奸也比較少些。不过，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們結婚后和結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而各个新教国家的資產者又大多数都是些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場合来看，也只不

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夫妇同居罢了。小说就是这两种婚姻方式的最好的镜子：法国的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的^①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在两种场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不是常常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法国资产者害怕德国小说的枯燥，正如德国的庸人害怕法国小说的“不道德”一样。可是，最近，自从“柏林成为世界都市”以来，德国小说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描写当地早就为人所知的杂婚和通奸了。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②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所以，傅立叶的一句话，可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说：

“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构成一种美德。”⁹³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一夫一妻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

① 在1884年版中是：“德国的和瑞典的”。——编者注

② 以下直到“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以前的一段文字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統治的任何刺激了。况且，在这里也沒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維護男子統治的資產階級法权，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們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是要錢的，而因为工人貧穷的緣故，它对于工人对他的妻子的关系是沒有任何意义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場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們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現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許还遺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統治的最后殘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即使在最热烈的爱情和双方都保持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也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了。所以，一夫一妻制的經常伴侶——杂婚和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收回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們就宁願分离。一句話，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一夫一妻制，是在这个名詞的詞源学意义上說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詞的历史意义上說的。^①

誠然，我們的法学家认为，立法的进步使妇女愈来愈失去申訴不平的任何根据。現代各文明国家的立法愈来愈承认，第一，为了使婚姻有效，它必須是一种双方自願締結的契約；第二，在結婚同居期間，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須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这两种要求都能彻底实现，那末妇女就有了她們所能希望的一切了。

① 这一章以下的所有文字，除了最后一段，即以“現在讓我們再回过来談摩尔根吧”（見本卷第 97 頁）开始那一段以外，都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
——編者注

这种純法律的論据，同激进的共和派資产者用来击退和安撫无产者的論据完全一致。劳动契約仿佛是由双方自願締結的。但是，这种契約的締結之所以被认为出于自願，只是因为法律在紙面上規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至于不同的階級地位給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經濟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而在劳动契約有效期間，只要任何一方沒有明白表示抛弃自己的权利，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至于經濟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抛弃掉，这仍然与法律毫不相干。

在婚姻关系上，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在形式上证明是自願，也就十分滿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现实生活是怎樣的，这种自願是怎样造成的，关于这些，法律和法学家都可以置之不問。但是，把各国的法制做一个最簡單的比較，也会向法学家們表明，这种自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法律保证子女继承父母財產的应得部分，因而不能剝夺他們继承权的各国，——在德国，在采用法国法制的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子女的婚事必須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采用英国法制的各国，法律并不要求結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在这些国家，父母在传授自己的遺產时有着完全的自由，他們可以任意剝夺子女的继承权。很明显，尽管如此，甚至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和美国，在有財產可继承的階級中間，結婚的自由在事实上絲毫也不比在法国和德国更多些。

男女在婚姻方面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見得更好些。我們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經濟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在包括許多夫婦和他們的子女的古代理产制家庭經濟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

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僕，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那末她们仍然会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劳动而有独立的收入，那末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了。在这方面，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劳动部门直到医务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有收入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律上的特殊权利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露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 * *

这样，我們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級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之間，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統治和多妻制。

以上全部論述证明，在这种順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是，自古就有的杂婚制現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是变化，愈是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是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蝕作用也就愈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蝕，比对妇女的腐蝕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間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墮落，而且即令她們也远沒有墮落到普通所想像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敗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所以，举例來說，长期的未婚夫状态，十之八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預备学校。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的迄今存在的經濟基础，以及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財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財富必須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沒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

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絕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末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性交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但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一夫一妻制与它同归于尽吗？

在这里，一个在一夫一妻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

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体态的美

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經引起异性間的性交的欲望，同誰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無論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距离現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締結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則安心順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現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赫都向我們歌頌牧人的爱情的喜悦和痛苦，这些牧人以及郎格的达夫尼斯和赫洛娅⁹⁴，全都是不参与国家事务，不参与自由民生活的奴隶。而在奴隶的爱情关系以外，我們所遇到的爱情关系只是灭亡中的古代世界的崩潰的产物，而且是与同样也处在官方社会以外的妇女——艺妓，即异地妇女或被释放的女奴隶发生的关系；在雅典是在它灭亡的前夜，在羅馬是在帝政时代。如果說在自由民男女之間确实发生过爱情关系，那只是就婚后通奸而言的。所以，对于那位古代的古典爱情詩人老阿那克里翁來說，現代意义上的性爱竟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致被愛者的性別对于他來說也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

現代的性愛，同單純的性欲，同古代的愛，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愛者的互愛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愛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愛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結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來說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結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險，直至拿生命作孤注，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場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評價，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問：它是結婚的

还是私通的，而且要問：是不是由于愛情，由于相互的愛而发生的？自然，在封建的或資產階級的实践中，这个新的标准，并不比其他一切道德标准更受重視——对它簡直就置之不理。不过，对它也不見得更輕視；它和其他道德标准一样——在理論上，在紙面上，也是被承認的。目前它也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

中世紀是从古代世界随性愛的萌芽而告停頓的时候开始的，即是从通奸开始的。我們已經叙述过那創造了破曉歌的騎士愛。从这种力图破坏婚約的愛情，到那應該成为婚約的基础的愛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段路程騎士們是走不到头的。甚至我們由輕浮的羅曼語系民族进而考察有德行的德意志人时，在“尼貝龙根之歌”中也可以发现，克里姆希耳德虽然暗中鍾情于齐格弗里特，并不亚于齐格弗里特对她的鍾情，但是当貢特尔宣布已把她許配給一个騎士(他没有說出他的名字)时，她却簡單地回答道：

“您不必問我；您要我怎样，我总是照办；老爷，您要我嫁給誰，我就乐意和他訂婚。”⁹⁵

她甚至連想也沒有想，她的愛情在这里一般說来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貢特尔向布龙希耳德求婚，埃特策耳向克里姆希耳德求婚，他們一次也不曾見過她們；同样，在“古德龙”⁹⁶中，愛爾蘭的齐格班特向挪威的烏黛求婚，黑盖林格的黑特耳向愛爾蘭的希尔达求婚，以及莫爾蘭的齐格弗里特、諾曼的哈尔特木特和西兰的黑尔維希向古德龙求婚，都是如此；只有古德龙才第一次自願嫁給黑尔維希。按照通例，年輕王公的未婚妻都是由父母选择的，要是他們还活着的話；反之，在双亲已去世的时候，他就同大諸侯們商議，自行选择，在这种場合，大諸侯們的意見总是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不能不如此。对于騎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种

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願。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問題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愛情呢?

中世紀城市的行会市民,也是如此。单是保护着他的那些特权,附有各种限制的行会規約,在法律上把他或者同别的行会、或者同本行会的同事、或者同他的帮工和学徒分开的种种人为的界限,就大大縮小了他寻求适当的妻子的范围。至于这些女子当中誰是最适当的,在这种复杂錯綜的体系下,决定这个問題的絕對不是他个人的意願,而是家庭的利益。

因此,直到中世紀末期,在絕大多数場合,婚姻的締結仍然和最初一样,不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的事情。起初,人們一出世就已經結了婚——同整个一群异性結了婚。在較后的各种群婚形式中,大概仍然存在着类似的状态,只是群的范围逐漸縮小罢了。在对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亲給自己的子女安排婚事的;在这里关于新的亲戚关系的考虑也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新的亲戚关系应该保证年輕夫妇在氏族和部落中占有更牢固的地位。当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統治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締結便完全依經濟上的考虑为轉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規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們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們的财产来規定价格的。当事人双方的相互愛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統治階級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沒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視的被压迫階級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从地理发现的時代起,資本主义生产通过世界貿易和

工場手工业而准备取得世界統治的时候它所遇到的状况。应该认为,这种結婚方式对于資本主义生产是非常合适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世界历史的諷刺是无穷无尽的——正是資本主义生产注定要把这种結婚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它把一切变成了商品,从而消灭了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古老的关系,它用买卖、“自由”契約代替了世代相因的习俗,历史的法。英国的法学家亨·薩·梅恩說,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們的全部进步就在于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从身分到契約],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約所規定的状态⁹⁷,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說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早已說过了⁹⁸。

然而,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人們才能締結契約。創造这种“自由”而“平等”的人們,正是資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則,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为負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但是这同迄今为止的訂立婚約的实践怎么能协调起来呢?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解,婚姻是一种契約,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終身的肉体 and 精神的命运。不错,这种契約那时在形式上确是自願締結的;沒有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就不能解决问题。不过人人都非常明白,这一同意是如何取得的,实际上是誰在訂立婚約。既然在締結别的契約时要求真正自由的决定,那末在訂立婚約时为什么不要求这种自由

呢？难道两个将要結合的青年人沒有权利自由地处理他們自己、他們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嗎？难道性爱不是由于騎士而成为时髦，难道夫妇之爱不是性爱的正确的资产階級形式而同騎士的通奸之爱相反嗎？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难道相爱者彼此結婚而不是同任何別人結婚不同样也是他們的义务嗎？难道相爱者的这种权利不是高于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嗎？既然自由的、个人选择的权利已經无礼地侵入教会和宗教的領域，它怎么能在老一代支配下一代的身体、精神、财产、幸福和不幸这种难以容忍的要求面前停步呢？

这些問題，在社会的一切旧有的联系已經松弛，而一切因襲的观念已經动搖的时候，是不能不提出来的。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十倍；現在展現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他們赶紧去占据其余的七个四分之一。传统的中世紀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籬，同旧日的狹隘的故乡藩籬一起崩潰了。在人的外界視綫和内心視綫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視野。在为印度的財富、墨西哥和波托西的金矿銀矿所引誘的青年人看来，循規蹈矩以及好几世代留传下来的荣耀的行会特权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资产階級的漫游騎士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浪漫事迹和爱情幻想，但都是按照资产階級的方式，而且归根到底是抱着资产階級的目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在兴起的资产階級，特別是在現存制度最受动搖的新教国家里，都愈来愈承认在婚姻方面也有締結契約的自由，并用上述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自由。婚姻仍然是階級的婚姻，但在階級内部則承认当事者都享有某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在紙面上，在道德理論上以及在詩歌描写上，再也沒有比

认为不以相互性爱和夫妻真正自由同意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了。总之，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仅是 *droit de l'homme*^① 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 *droit de la femme*〔妇女的权利〕。

但是，人的这种权利有一点是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谓权利不同的。当后者在实践上只限于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而对于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则直接或间接地化为乌有的时候，历史的讽刺又重新出现了。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压迫阶级中间，像我们所已看到的，这种婚姻却是通例。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会有别的动机了。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末，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我们已经看到，巴霍芬认为由群婚向个体婚的过渡这一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妇女，是多么的正确；只有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进步才应归功于男子；在历史上，后一进步实质上是使妇女地位恶化，而便利了男子的不忠实。因此，只要那种迫使妇女容忍男子的这些通常的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未来的担心——一旦消失，那末由此而达到的妇女的平等地位，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来判断，

① 双关语：«droit de l'homme» 既有“人的权利”的意思，也有“男子的权利”的意思。——编者注

与其說会促进妇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說会在无比大的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但是，一夫一妻制却会非常肯定地失掉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統治，第二，婚姻的不可离异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統治是他的經濟統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离异性，部分地是一夫一妻制所賴以产生的經濟状况的結果，部分地是这种經濟状况和一夫一妻制之間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在今天，这种不可离异性已經遭到千万次的破坏。如果說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繼續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間，尤其在男子中間，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經消失或者已經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無論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会使人們省得陷入离婚訴訟的无益的泥污中。

这样，我們現在关于資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將永远不会用金錢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經濟后果而拒絕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們一經出現，对于今日人們认为他們應該做的一切，他們都將不去理会，他們自己將知道他們應該怎样行动，他們自己將造成他們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輿論——如此而已。

現在讓我們再回過來談摩爾根吧，我們已經把他丟開很遠了。對於在文明時期發展起來的社會制度進行歷史的考察，是超出了他的著作的範圍的。所以，他只是非常簡單地論述了一下一夫一妻制在這一時期的命運。他也認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進一步發展是一種進步，是一種向兩性權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這一目標他並不認為已經達到了。不過，他說：

“如果承認家庭已經依次經過四種形式而現在正處在第五種形式中這一事實，那就要產生一個問題：這一形式在將來會不會永久存在？可能的答案只有一個：它正如過去的情形一樣，一定要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着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它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它將反映社會制度的發展狀況。既然一夫一妻制家庭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已經改進了，而在現代特別顯著，那末至少可以推測，它能夠有更進一步的改進，直至達到兩性的平等為止。如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遙遠的將來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那就不能事先預言，它的後繼者將具有什麼性質了。”⁹⁹

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我們現在來談一談摩爾根的另一發現，這一發現至少與他根據親屬制度把原始家庭形式恢復起來有着同等重要的意義。摩爾根證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內部用動物名稱命名的血族團體，實質上是與希臘人的 *genea*〔氏族〕和羅馬人的 *gentes*〔氏族〕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臘—羅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上古時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會組織，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組織極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蠻人進入文明時代為止，甚至再往後一點（就現有資料而言），是一切野蠻人所共有的制度。摩爾根證明了這一切以後，便一下子說明了希臘、羅馬上古史中最困難的地方，同時，出乎意料地給我們闡明了國家產生以前原始時代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徵。雖然這個發現在人們知道它之後顯得十分簡單，但是，摩爾根只是最近才做到這一點的；在他於 1871 年出版的前一部著作¹⁰⁰ 中，他還沒有看透這個秘密，而這個秘密一揭開之後，就使一向那樣自信的英國原始歷史學家們暫時^① 沉默了下來。

摩爾根到處用以表示這種血族團體的拉丁語 *gens*〔氏族〕一

① “暫時”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詞，像同意义的希腊語 *genos* 一詞一样，来源于一般雅利安語的字根 *gan*（德語为 *kan*，因为在德語中，通例是用 *k* 代替雅利安語的 *g*），*gan* 的意思是“生育”。*Gens*, *genos*, 梵語的 *dschanas*, 哥特語（依照上面所說的通例）的 *kuni*, 古代斯堪的那維亞語和盎格魯撒克遜語的 *kyn*, 英語的 *kin*, 中古高地德意志語的 *künne*, 都同样表示血族、世系，不过拉丁語的 *gens* 和希臘語的 *genos*, 都是专用以表示这样的一种血族团体，这种团体自夸有共同的世系（这里指的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男祖先），并且借某种社会的和宗教的制度而組成一个特殊的公社。但是这种公社的起源与本性，我們的一切历史家迄今为止却一直弄不清楚。

我們在前面，在研究普那路亞家庭时，已經看到原始形式的氏族是怎样构成的。它所包括的成員，是一切由于普那路亞婚姻，并依照这种婚姻中必然占統治地位的观念，而构成一个确定的女祖先即氏族創立者的公认后代的人。由于在这种家庭形式下父系血統不能确定，所以只承认女系。又因为兄弟不得娶自己的姊妹为妻，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妇女結婚，所以，根据母权制，同这些异族妇女所生的子女，便列在氏族以外。这样，留在血族团体内部的只有各代女儿的子孙；儿子的子孙則归入其母亲的氏族。当这种血緣亲属集团构成一个与同一部落內其他类似集团相对來說的特殊集团时，它又是什么样子呢？

摩尔根举出易洛魁人的氏族，特別是塞訥卡部落的氏族，作为这种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这个部落內有八个氏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1）狼，（2）熊，（3）龟，（4）海狸，（5）鹿，（6）鷓，（7）蒼鷺，（8）鷹。每个氏族內都盛行以下的习俗：

1. 氏族推选一个酋长（平时的首脑）和一个首領（軍事領袖）。

酋长必須从本氏族成員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內世襲，亦即一有空缺，必須立刻重新补上；軍事首領，也可以从氏族以外的人中选出，有时他的职位可以暫缺。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別一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酋长。所有的人，無論男女，都参加选举。不过选举須經其余七个氏族确认，只有在这以后，当选为酋长的人才正式就职，就职仪式則由全易洛魁联盟的总議事会举行。这样做的意义，在后面就可以看出来。酋长在氏族內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純粹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沒有强制的手段。此外，由于他的职位，他也是塞訥卡部落議事会以及全体易洛魁人联盟的議事会的成員。軍事首領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布命令。

2. 氏族可以任意撤換酋长和軍事首領。这仍是由男女共同决定的。被撤換的人，此后便成为和其他私人一样的普通战士。此外，部落議事会也可以甚至违反氏族的意志而撤換酋长。

3. 氏族的任何成員都不得在氏族內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規則，維系氏族的紐帶；这是极其肯定的血緣亲属关系的否定表現，賴有这种血緣亲属关系，它所联合起来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族。摩尔根由于发现了这个簡單的事实，就第一次闡明了氏族的本质。从前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报告，把构成氏族制度的各种集团，糊里糊塗地、不加分別地混为一談，統称为部落、克兰、宗族等等，而且往往說，在这种集团內部禁止通婚，这证明以前人們对于氏族的本质是多么不了解。这便造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麦克伦南先生就在这个混乱中得以充当拿破侖，用强力的判決建立了这样的秩序：一切部落分为部落內部禁止通婚的（外婚制的）和

許可通婚的（內婚制的）两种。他这样把問題彻底混淆以后，便埋头于最深沉的研究中，去探討在他的两个荒誕无稽的范疇中，究竟哪一种較古：是外婚还是內婚。自从发现了那以血緣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其成員間不能通婚的氏族之后，这种荒謬的說法就不攻自破了。不言而喻，在我們所見到的易洛魁人所处的那种发展阶段上，氏族內部禁止通婚是被严格遵守着的。

4. 死者的財產轉归其余的同氏族人所有，它必須留在氏族中。由于易洛魁人所能遺留的东西为数很少，所以他的遺產就由他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分享；男子死时，由他的同胞兄弟、姊妹以及母亲的兄弟分享；妇女死时，由她的子女和同胞姊妹而不是由她的兄弟分享。根据同一理由，夫妇不能彼此继承，子女也不得继承父亲。

5. 同氏族人必須相互援助、保护，特別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作到这一点；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絕對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假使一个氏族成員被外族人杀害了，那末被害者的全氏族必須实行血族复仇。起初是試行調解；行凶者的氏族議事会开会，大抵用道歉与贈送厚礼的方式，向被害者的氏族議事会提議和平了結事件。如果提議被接受，事情就算解决了。否則，受害的氏族就指定一个或几个复仇者，他們的义务就是去寻出行凶者，把他杀死。如果这样做了，行凶者的氏族也沒有訴怨的权利，事情就算了結了。

6. 氏族有一定的名称或一套名称，在全部落內只有該氏族才能使用这些名称，因此，氏族个别成員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名称一开始就同氏族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

7. 氏族可以收养外人入族，并用这个办法吸收他們为整个部

落的成員。这样，未杀死的俘虏，由于被一个氏族收养入族，就成为塞訥卡部落的成員，从而获得了氏族和部落的一切权利。收养外人入族的事情，是根据氏族的个别成員的提議而实行的：男子可以提議收养外人为兄弟或姊妹；女子可以提議收养外人为自己的孩子；为了确认这种收养，必須举行入族典礼。某些因特殊情形而人丁不旺的氏族，常常由于大批收养別一氏族（得到它的同意）的人入族而重新兴旺起来。在易洛魁人中間，入族典礼是在部落議事会的公共集会上举行的，实际上已經把它变为一种宗教仪式。

8. 印第安人的氏族有无特殊的宗教节日，很难确定；不过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多少都是和氏族联系在一起的。在易洛魁人的每年六个宗教节日期間，各个氏族的酋长和軍事首領，由于他們的职位，都被列在“信仰守护人”以內，而执行祭司的职能。

9. 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紐約州境內四周都为白种人包围的易洛魁人，他們的墓地現在已經絕迹了，但从前是存在过的。在其他印第安人中間，这种墓地还保存着；例如，和易洛魁人有近亲关系的吐斯卡罗腊人，他們虽然是基督徒，但在墓地上，每一氏族都独成一排，所以，总是把母亲而不是把父亲和孩子埋在一排。而在易洛魁人中間，死者的全氏族都要参加葬仪，安排坟墓，宣讀悼詞等等。

10. 氏族有議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这种議事会选举、撤換酋长和軍事首領，以及其余的“信仰守护人”；它作出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員接受贖金(Wergeld)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它收养外人加入氏族。总之，它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

典型的印第安人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

“它的全体成員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論酋长或軍事首領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們是由血族关系結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則，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組織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这就可以說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¹⁰¹

到发现美洲的时候，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已依照母权制而組成氏族。仅在某几个部落如达科塔人中間，氏族才衰落下去了；在另外几个部落中間，如在奥季布瓦，奥馬哈等部落中間，氏族已經是依照父权制而組成的了。

在許多有五六个以上氏族的印第安人部落中間，我們可以遇到一种特殊的集团，每个集团有三、四个或更多的氏族；摩尔根用希腊語确切地表达了印第安語的名称，把这种集团叫做“夫拉特里”（胞族）。例如，塞訥卡部落有两个胞族；第一个胞族包括 1—4 四个氏族，第二个胞族包括 5—8 四个氏族。更詳細地研究起来便可发现，这种胞族大抵是当初由部落分裂成的最初的氏族；因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須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随着部落的增殖，每个氏族又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这些氏族如今也作为单个的氏族而存在；而包括一切女儿氏族的最初的氏族，則作为胞族而繼續存在。在塞訥卡人和大多数其他印第安人中間，一个胞族內的各氏族被认为是兄弟氏族，而別个胞族的各氏族則被认为是它們的从兄弟氏族，——这种称呼，在美洲亲属制度中，像我們在前边所看到的，都具有极现实而明确的意义。塞訥卡人起初也不能在胞族內通婚，但是这种习俗久已废除了，如今只限于氏族。塞訥卡部落有一种传说，“熊”和“鹿”两个氏族是最初的氏族，其他氏族都是从这两个氏族派生的。

这个新組織建立以后，便根据需要而加以改变；要是某一胞族的一些氏族灭亡了，那末为平均起見，有时就从别的胞族中撥几个氏族去补充它。因此，我們在不同的部落中間，可以看到名称相同的氏族以不同的方式集結在各胞族中。

易洛魁人的胞族的职能，部分地是社会性质的，部分地是宗教性质的。（1）胞族間互作球戏；每一胞族选出自己的优秀球員，其余的人按胞族旁立观看，并以本胞族球員的获胜打賭。（2）在部落議事会上，每个胞族的酋长和軍事首領坐在一起，两个胞族彼此相对，每个演說者在讲话时，都把各胞族的代表当作特别的团体。（3）如果部落內发生杀人事件，而行凶者与被害者不属于同一个胞族时，被害者的氏族往往訴諸自己的兄弟氏族；于是这些氏族就举行胞族議事会，把对方胞族作为一个团体进行交涉，使对方胞族也召集自己的議事会，以謀求事件的解决。因此，在这里，胞族又以最初的氏族的資格出現，并且比它派生的較微弱的单个氏族更有获胜的希望。（4）在重要人物死亡时，对方胞族办理安葬和丧礼，而死者胞族的成員則以死者的近亲服丧人資格参与葬仪。酋长死时，对方胞族将缺位一事通知易洛魁人的联盟議事会。（5）在选举酋长时，胞族議事会也出面参預。兄弟氏族对选举的确认，被认为是一种当然的事情；但另一个胞族的氏族則可能提出异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胞族的議事会即召开会议；如果議事会认为异議是正当的，选举就算无效。（6）从前，易洛魁人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神秘仪式，白种人把它称为 *medicine-lodges* [巫术集会]。这种神秘仪式在塞訥卡人那里，是由两个宗教团体举行的；新會員入会时还举行正式的入会的仪式；两个胞族中各有一个这样的团体。（7）在征服时期¹⁰²，住在特拉斯卡拉四个区的四个 *lineages*（血族），如

果是——而这差不多是肯定的——四个胞族的话，那末这证明，像希腊人的胞族以及德意志人的类似的血族团体一样，这种胞族也都有军事单位的意义；这四个 lineages 在作战时各成一队，各穿自己的制服，有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首领。

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几个胞族就古典形式来说则组成一个部落；而那些大大衰微的部落则往往没有胞族这种中间环节。那末，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有什么特征呢？

1. 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这也跟丹麦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 isarnholt (丹麦语为 jarnved, limes Danicus)、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萨克森森林和 branibor (斯拉夫语，意即“防卫林”，勃兰登堡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相同。由这种不确定的疆界所隔开的地区，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为相邻部落所承认，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以免他人侵占。疆界的不确定，多半仅在人口巨量增加的时候，才会在实际上感到不方便。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发生的，而不是有意选择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该部落给自己取的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的总称为“日耳曼人”是由凯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

2. 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

前还在美洲发生,即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說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2 000人以下;但是彻罗基部落却有26 000人,这是在合众国說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第安人。

3. 有宣布氏族所选出的酋长和軍事首領正式就职的权利。

4. 有撤換他們的权利,甚至可以违反他們氏族的愿望而撤換他們。由于这些酋长和軍事首領都是部落議事会的成員,所以部落对待他們有这种权利乃是当然的。凡已經組成部落联盟以及加入該联盟的一切部落都有代表参加联盟議事会的地方,上述权利便轉归联盟議事会了。

5. 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話)和崇拜仪式。

“印第安人,是一个按照野蛮人方式信教的民族。”¹⁰³

他們的神話迄今还远沒有批判地加以研究;他們已經給自己的宗教观念——各种精灵——賦予人的形象,但是他們还处在野蛮时代低級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謂偶像。这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对大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各部落各有其正規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組成部分;每一部落各自庆祝自己的节日。

6. 有討論公共事务的部落議事会。它是由各个氏族的酋长和軍事首領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們是随时都可以撤換的;議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員,这些成員有权加入討論和发表自己的意見;決議則由議事会作出。按照通例,每个出席的人都可以随意发表意見,妇女也可以通过她們所选定的发言人陈述自己的意見。在易洛魁人中間,最后的决定

需要一致通过，跟德意志人的馬尔克公社在解决某些問題时一样。特别是，調整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也包括在部落議事会的权限之內；部落議事会接受和派遣使者，宣战及媾和。要是发生战争，大半都由志愿兵来进行。在原則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沒有同其他部落訂立明确的和平条約，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中。反对这种敌人的軍事行动，多半由一些优秀的战士来組織；这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組織起来，即时出动。部落的領土若被侵犯，其防卫也多半由志愿兵来担任。这种队伍的出发和归来，总要举行公共的典礼。这种出征并不需要得到部落議事会的同意，沒有人去征求这种同意，也沒有人給予这种同意。这正和塔西佗所記述的德意志人扈从队伍的私人出征一样¹⁰⁴，不过德意志人的扈从队伍，已具有比較經常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在平时也有組織，在战时团结其他志愿兵的强固核心了。这种武装队伍的人数一般不多；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出征，即使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也是由不大的战斗力量来进行的。假如有几支这样的队伍为了一次大規模战事而联合起来时，其中每支队伍只服从它自己的首領；作战計劃的統一，則有这些首領的議事会作一定程度的保证。据阿米亚努斯·馬尔塞利努斯的記載，四世紀阿勒曼尼人在上萊茵的作战方法，就是如此。

7. 在有些部落中間，有一个最高的首領，但他的权力并不大。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議事会召集會議作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的措施。在这里我們看到了一种具有执行权力的官員的微弱萌芽，不过它在进一步发展方面多半都沒有結果；这种官員，如我們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虽不是到处，但在多数場

合，都是由最高軍事首长发展来的。

絕大多數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沒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們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絕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們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面。亲属部落間的联盟，常因暫时的紧急需要而結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結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跨出了形成民族〔Nation〕的第一步。在合众国，我們在易洛魁人中間，便可以見到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他們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这里，他們大概是巨大的达科塔族的一个分支）迁移出来，經過长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紐約州，而分成了五个部落：塞訥卡，卡尤加，奥嫩多加，欧奈达及摩霍克。他們以捕魚、打猎及原始园艺为业；住在大半用栏栅防卫起来的村落中。他們的人数从未超过二万；五个部落中有几个共同的氏族；他們說着同一种語言的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連結的、为五个部落所瓜分的地区。由于这个地区是他們不久以前才征服得来的，所以这些部落便慣于团結起来，以对付被他們所驅逐的部落，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样至迟到十五世紀初，就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永世联盟”，这种联盟，一經意識到它所具有的力量，便立刻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在1675年前后，当它达到了强盛的頂峰的时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广大土地，把这些地方上的居民一部分驅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納貢。易洛魁人联盟是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級阶段的印第安人（因而，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¹⁰⁵和秘魯人除外）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社会組織。联盟的基本特点如下：

1. 五个血緣亲属部落，以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完全平等

和独立为基础，結成永世联盟。这种血緣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基础。五个部落中有三个称为父亲部落，互为兄弟部落；其余两个称为儿子部落，也互为兄弟部落。有三个氏族——最老的——在五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另外有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这些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其成員在所有五个部落中都被认为是兄弟。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語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现和证明。

2. 联盟的机关是联盟議事会，由五十个地位和权限平等的酋长組成；这个議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的决定。

3. 这五十个酋长，在联盟成立时，被分配在各部落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設立的新的公职。当出現缺位时，有关的氏族便重新进行选举，同时有关的氏族也可以随时把他們撤換下来；不过委任权則属于联盟議事会。

4. 联盟的这些酋长們，在他們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議事会和表决的权利。

5. 联盟議事会的一切決議，須經全体一致通过。

6. 表决是按部落举行的，这样，每个部落以及每个部落內的議事会全体成員，都必須一致贊成，決議才算有效。

7. 五个部落議事会中每一个都可以召集联盟議事会，但联盟議事会本身不得自行召集。

8. 會議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每个易洛魁人都可以发言；但只有議事会才能作决定。

9. 联盟沒有一长制首长，即沒有主掌执行权的首脑。

10. 但联盟有两个具有平等职能和平等权力的最高軍事首长（类似斯巴达人的两“王”，羅馬的两执政官）。

易洛魁人在其中生活了四百余年、而且直至今日还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就是如此。我依据摩尔根，詳細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因为我們在这里有可能去研究还不知有**国家**的社会組織。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經常有关的成員相脫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所以毛勒凭其正确的直觉，确认德意志的馬尔克制度是一种純粹社会的制度，虽然它以后大部分成了国家的基础，但在本质上它是和国家不同的。因此，毛勒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所研究的，是公共权力逐漸从馬尔克、村落、田庄、城市等最初的組織中产生，并与之并行而产生的情形。¹⁰⁶ 我們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出，一个原来統一的部落怎样逐漸散布于广闊的大陆；各部落怎样通过分裂而轉化为各民族〔Völker〕，轉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語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来統一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在部落內部，个别氏族怎样分裂为好几个氏族，老的母亲氏族以胞族的形式保存下来，但是这些最老的氏族的名称，在彼此相距极远的、老早就分离了的部落中間仍是一样的——“狼”和“熊”在大多数印第安部落中仍然是氏族的名称。一般說来，上述的社会制度适用于印第安人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許多部落沒有达到亲属部落联盟的程度罢了。

我們也看到，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末差不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极其自然的）要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組織。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緣亲属关系，并且它們之中每个都是閉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是又互相补充。归它們管轄的事情，包括低級阶段上的野蛮人的全部公共事务。所以，我們凡遇見某一民族是把氏族作为社会单位时，我們也就可以去找类似前面所讲的那种部落組織；凡有充足資料的

地方，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我们不仅能找出这种组织，而且会确信，即使在沒有这种资料的场合，只要与美洲社会制度作一比較，也有助于我们解决最困难的爭論与疑难。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沒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沒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一切爭端和糾紛，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經濟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經營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財產，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經濟暂时使用，——可是，絲毫沒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問題，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不会有貧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經濟和氏族都知道它們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殘废者所負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內。他們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沒有的。当易洛魁人在 1651 年前后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¹⁰⁷ 的时候，他們曾建議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的平等的成員加入他們的联盟；只是在被征服者拒絕了这个建議之后，才被驅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贊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贊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不久以前，我們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榜样。卡弗尔人—祖魯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

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¹⁰⁸ 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军队训练，也不知道什么是队列动作。英国人诉苦说，卡弗尔人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的能力和毅力。“他们的一条最小的筋都暴栗起来，坚硬如钢，像鞭条一样。”——一位英国的画家这样说。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要是我们把他们的状况和现代绝大多数文明人的状况作一比较，那末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无产者或小农同古代自由的氏族成员之间，差别是极其巨大的。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它没有超出部落的范围；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部落联盟的建立就已经意味着这种组织开始崩溃，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企图也表明了这一点。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只是到后来，才因物质利益的影响而稍微缓和一些。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因此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

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但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①。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5页。——译者注

四

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而组织起来了。胞族可能是没有的，在多立斯人中间就是这样；部落联盟也可能不是到处都成立的，但无论如何氏族是基本的单位。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处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所以，希腊人的氏族已经不再是易洛魁人的那种古老的氏族了，群婚^①的痕迹正开始显著地消失。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与此同时，正在产生的私有财富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二个缺口是第一个缺口的自然结果：既然在实行父权制以后，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夫所有，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法权的基础，于是，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不仅容许少女在氏族内出嫁，而且还非这样做不可了。

根据格罗特的希腊史¹⁰⁹，其中雅典的氏族是建筑在以下的基

^① 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础上面的：

1. 共同的宗教节日和祀奉一定的神的独占权。这种神被认为是氏族的祖先，并具有独特的别名以表明其地位。

2. 共同的墓地(参看狄摩西尼“反駁欧布利得”¹¹⁰)。

3. 相互继承权。

4. 在受到侵害时提供帮助、保护和支援的相互义务。

5. 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事关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时候，在氏族内部通婚的相互权利和义务。

6. 拥有——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共同财产以及自己的 Archon(首长)和司库。

此后，几个氏族结合而为一个比较不那么密切的胞族；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共同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以及在胞族成员被杀害时进行追究的权利。一个部落的所有胞族，又有共同的定期举行的祭典，由一个从贵族(Eupatriden)中间选出的 Phylobasileus(部落长)主持。

格罗特所说的，就是这样。马克思补充说：“但是，透过希腊氏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蒙昧人(例如易洛魁人)。”¹¹¹ 要是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那就看得更加清楚。

事实上，希腊的氏族还具有以下的特征：

7. 按照父权制计算的世系。

8. 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但和女继承人结婚例外，这一例外及其成为律令，就证实古时的惯例仍然有效。这也是从下述普遍通行的惯例中产生的，即妇女出嫁后，就不再参与本氏族的宗教仪式，而改行她丈夫的氏族的宗教仪式，加入她丈夫的胞族。根据这一点以及狄凯阿尔科斯的著名的一段话看来¹¹²，可知外婚乃是通例，

而貝克尔在“哈里克尔”一书中徑直认为，无论什么人都不得在本氏族内部通婚。¹¹³

9. 收养外人入族的权利；这是用家庭收养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有公开的手續，而且只限于例外情形。

10. 选举和撤換首长的权利。我們知道，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的首长；但是，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到过这一职务是在一定的家庭里世襲的。在野蛮时代結束以前，总是不大可能有严格的^①世襲制的，因为这种世襲制是同富人和穷人在氏族内部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秩序不相容的。

不仅格罗特，而且尼布尔、蒙森以及先前的其他一切古典古代历史家，都沒有解决氏族問題。不論他們多么正确地叙述了氏族的許多特征，但是他們总是把氏族看做**家庭集团**，因此便不能理解氏族的本性和起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組織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內，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內；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內，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內。国家在其公法上也不承认家庭，到今日为止，家庭不过存在于私法上而已。然而我們的全部历史科学直至現在都是从一个荒誕的假定出发的，这种假定尤其是在十八世紀已成为不可侵犯的了，即以为那未必早于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在其周围逐漸凝結起来的**核心**。

馬克思补充說：“格罗特先生应当进一步指出，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話中引伸出他們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們自己所造成

^① “严格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的神話及其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¹¹⁴

摩尔根爱引用格罗特的話，因为后者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格罗特又說到，每个雅典氏族都有一个从它的想像中的祖先传給他們的名稱；在梭伦时代以前，死者的财产一律由同氏族人(gennêtes)继承，在梭伦时代以后，死者如无遺言，其财产亦由同氏族人继承；遇有杀害事件，首先是被害者的近亲有权利和义务向法庭控告犯罪者，其次是同氏族人，最后是胞族成員：

“我們所知道的关于最古的雅典法律的一切，都是以氏族及胞族的区分为基础的。”¹¹⁵

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馬克思語)¹¹⁶ 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既然他們很自然地认为这种祖先純粹是神話人物，他們便根本沒有可能解释氏族是怎样从許多彼此相邻的、甚至起初沒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单是为了解释氏族的存在，他們还是非这样做不可。这样他們便陷入了說空話的圈子，不能超出这样一个論題：系譜的确是一种虛构，但氏族是一个现实，因之，格罗特終於說(括弧內的話是馬克思加的)：

“我們很少听到这种系譜，因为仅仅在一定的、特別隆重的場合才公开把它提出来。可是，比較不出名的氏族也有其共同的宗教仪式”(这真稀奇呵，格罗特先生!)，“有共同的超人的祖先和系譜，像比較有名的氏族一样”(格罗特先生，这在比較不出名的氏族那里真十分稀奇呵!)；“根本的結構和观念的基础”(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而是现实的，用普通德語說是肉欲的!)“在一切氏族中間都是相同的。”¹¹⁷

馬克思把摩尔根对这个問題的答案概括如下：“与原始形态的氏族——希腊人像其他凡人一样也曾有过这种形式的氏族——相适应的血緣亲属制度，使氏族一切成員得以知道相互的亲属关系。

他們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物。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这种事物就湮没无闻了。氏族名称创造了一个系谱，相形之下，个体家庭的系谱便显得没有意义。这种氏族名称，现在应当证明具有这种名称的人有共同世系；但是氏族的系谱已经十分湮远，以致氏族的成员，除了有较近的共同祖先的少数场合以外，已经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有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了。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而且除了收养外人入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争辩的证据。反之，像格罗特^①和尼布尔所做的那样，实际否定氏族成员间的任何亲属关系，从而把氏族变为纯粹虚构和幻想的产物，这是只有‘观念的’、亦即螻居式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的联系（尤其是一夫一妻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即幻想的系谱创造了现实的氏族。”¹¹⁸

胞族，像在美国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这种母亲氏族常常表示所有这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比如，据格罗特说：

“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承认在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共同的神为其祖先。”¹¹⁹

所以，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马的诗篇中，还把胞族看做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说：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可以帮助胞族，部落可以帮助部落。¹²⁰此外，胞族在其成员被害时有追究的

^①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不是格罗特，而是格罗特经常引用其著作的公元二世纪的古希腊学者波克鲁斯。——编者注

权利和义务；可見在較早的时代，胞族也有血族复仇的义务。其次，胞族有共同的神殿和节日，而且，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的对自然的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話，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約并在它們内部进行的。再次，胞族有一个胞族长 (phratriarchos)，据德·庫郎歇說，它还有全体大会，通过必須执行的決定，拥有审判的和行政的权力。¹²¹ 甚至以后的輕視氏族的國家，也給胞族保留下了若干公共的行政性的职能。

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細密的集团划分，是以有意識的和有計劃的干涉自发造成的秩序为前提的。至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的，希腊历史都沒有提到，希腊人自己关于他們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記憶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

聚居在一个比較不大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們也看到，只有基本方言相同的部落才結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統治的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語言。

在荷馬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場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 [kleine Vö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們的独立性。它們已經住在有城牆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財產上的差別，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貴族分子。各个小民族 [Völkchen]，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

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組織如下：

1. 常設的权力机关为**議事会** (bulê)，这种議事会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首长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的一部分人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貴族分子的机会；狄奥尼修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議事会正是这样由貴族 (kratistoi) 組成的¹²²。議事会对于一切重要問題作出最后决定；例如，在埃斯庫罗斯的作品中就談到过忒拜議事会曾作了一个当时必須遵守的决定，即为伊托克利斯举行荣誉葬礼，而波呂涅克斯的尸体則让狗吃掉。¹²³ 随着国家的設立，这种議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2. **人民大会** (agora)。我們在易洛魁人中間已經看到，当議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按照規定的程序参加討論，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間，这种“围立” [Umstand] (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語) 已經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人民大会由議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項重要問題；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見埃斯庫罗斯的“求援女”)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級的权力，因为，正如舍曼所說(“希腊的古代”)，

“当談到一件須要人民协助来执行的事情的时候，荷馬并未向我們指出任何可以违反人民意志而强迫他們来这样做的手段”¹²⁴。

原来，当部落中的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可以用来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长成的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無論在判断議事会或者在判断巴賽勒斯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

3. **軍事首长**(巴賽勒斯)。关于这一点馬克思說道：“欧洲的学

者們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們把巴賽勒斯变为現代意义上的君主。美国共和主义者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极其辛辣地、但很公正地說到阿諛逢迎的格萊斯頓先生和他的‘世界的少年时代’一书¹²⁵：

‘格萊斯頓先生向我們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領袖描写成国王和公侯，而且添加了紳士的风味；但是他本人不得不承认：整个說来，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长子继承的习惯或法律虽然已經規定得很充分，但不是十二分地明确’。¹²⁶

大概，带有这种保留条件的长子继承制，在格萊斯頓先生本人看来，也是已經充分地尽管不是十二分明确地失掉了任何意义的。

我們已經看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长职位是怎样继承的。一切职位多数場合都是在氏族內部选举的，因而是在氏族範圍內世襲的。在递补遺缺时，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兄弟，或姊妹的儿子，逐漸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擯弃他。因此，如果說在希腊人中間，在父权制統治之下，巴賽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给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末这仅仅证明，儿子們在这里可能指望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是說不經過人民选举就承认继承合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在易洛魁人和希腊人中間所看到的，是氏族內部的特殊的显貴家庭的最初萌芽，而在希腊人那里，还是未来的世襲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因此，可以推想希腊人的巴賽勒斯，正像罗馬的“王”（勒克斯）一样，必須是或者由人民选举的，或者为人民的公认的机关——議事会或人民大会——所认可的。

在“伊利亚特”里，“勇士的統領”亚加米农，并不是作为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軍的最高統帅而出現的。当希腊人中間发生內訌时，奥德賽在一段著名的話中指明了他的这一地位：

多头制是不好的，应该有一人做统帅等等（此外还有一节人人爱诵的关于权杖的诗，但这是后人加的）。¹²⁷“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来说，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亚加米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是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甚至非自由民，如牧猪人优瑞士以及其他的人，都是‘神的’（*dioi* 和 *theioi*），这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①。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 *basileia* [巴赛勒斯] 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马克思语）¹²⁸

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而被赋予的。关于民政、行政的权限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巴赛勒斯由于职位的关系大概也是议会的成员。这样，把“巴赛勒斯”一词译成德语的 «König» 在语源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 «König» (Kuning) 是由 Kuni、Künne 而来的，即“氏族首长”的意

①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接着还有一句为恩格斯所省略的话：“奥德赛用来称呼亚加米农的‘科伊腊诺斯’ (*κοίρανος*) 这个词和‘巴赛勒斯’这个词一样，也仅仅意味着‘战争中军队的统帅’。”——编者注

思。不过，古希腊文的“巴塞勒斯”跟现代意义的 «König»（国王）一词是完全不相符合的。修昔的底斯把古代的 *basileia* 很确定地叫做 *patrikê*，即由氏族产生的意思，并说，*basileia* 有明确规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权限。¹²⁹ 亚里士多德也说，英雄时代的 *basileia* 是对自由人的统率，巴塞勒斯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¹³⁰；可见，巴塞勒斯并未握有后世所谓的统治权力。^①

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于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会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

① 就像对于希腊的巴塞勒斯一样，阿兹蒂克人的军事首长也被误解为近代的王公。摩尔根最先对于西班牙人的起初是出于误会和夸张，后来简直是说谎的报告作了历史的批判，并证明，墨西哥人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但他们的发展程度略微超过了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社会制度在根据被曲解了的报告来推论的范围内说，相当于以下的情形：这是一个包括三个部落的联盟，它征服了其他几个部落并使之朝贡；它由联盟议事会和联盟军事首长来管理，西班牙人就是把把这个联盟军事首长变成了“皇帝”。

产的新形式,因而是給不断加速的財富积累,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現象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级剝削无产者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統治永久化。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現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国家是怎样部分地靠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設置新机关的办法来排挤掉它們，最后全部代之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而发展起来的；受这些国家权力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是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的——关于这一切，至少是它的始初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希腊来加以研究。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繪出来了，我要补充的大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經濟内容。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凱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人民大会，人民議事会和巴賽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財產，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級阶段末期已經比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以外，还已經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貿易，已經逐漸脫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間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員，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

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做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塞勒斯请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总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合并为统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但这样一来就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许不属于全阿提卡任何部落并且始终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民的第一步。提修斯所制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 Eupatriden（贵族）、Geomoren（农民）和 Demiurgen（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未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法权上的差别。^①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新的、

^① 在 1884 年版中这句话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因为其余两个阶级并未获得任何特殊的权利”。——编者注

暗中发展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使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塞勒斯一职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时，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睬氏族，也不理睬胞族。而旧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此，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以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

面写着这块地已經以多少錢抵押給某某人了。沒有豎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貴族高利貸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許作佃戶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維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給新主人,那他就謝天謝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錢不够还債,或者債務沒有抵押保证,那末債務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債務。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滿足,那末他可以把債務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們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我們暫且回轉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上而他們可以說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們意志的状况,在易洛魁人中間是不能想像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生活資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富人与穷人、剝削者与被剝削者之間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們所能达到的自然界限以內,他們是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們的小小园圃中的歉收,他們的河流湖泊內的魚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絕迹以外,他們知道他們获取生活資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結果。所产生的一定是生活資料,尽管有时很少,有时較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争的对立階級。生产是在极狹隘的范围內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却以今日人

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结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于是利用产品来反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论哪一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后果的控制。

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年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旧的美好时光的虔诚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穿了一系列其他次要的

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內，特別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員相互杂居，已經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門——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內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間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現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內是沒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創設新的官职为这种利益服务。奴隶的数量已經大大增加，在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經大大超过自由的雅典人；氏族制度最初是不知道奴隶制的，因而也就不知道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后，貿易把許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是为了易于賺錢而移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們既沒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傳統的容忍精神，他們仍然是人民中間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

一句話，氏族制度已經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鏟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經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間，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門間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創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官职都設置起来了。这时，年輕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軍事力量，而在操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間，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軍事力量，用以进行个别的小規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設置了諾克拉里，即小規模的区，每个部落設十二个；每一諾克拉里必須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員，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騎士。这个設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

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公元前 594 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了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

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例如禁止締結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而做到的。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土地的最大数额，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一下。然后又对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有以下

几点：

議事会規定由四百人組成，每一部落为一百人；因此在这里，部落依然是基础。不过这是新的国家組織从旧制度中接受下来的唯一方面。至于其他方面，梭伦把公民按照他們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階級；五百、三百及一百五十袋谷物（一袋約等于四十一公升），为前三个階級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額；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則属于第四階級。只有三个上等階級的人才能担任一切官职；只有第一階級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官职；第四階級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在这里都要作关于自己活动的报告；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階級在这里占多数。貴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財富特权的形式恢复起来；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此外，四个階級都是新的军队組織的基础。前两个階級提供騎兵，第三階級提供重装步兵，第四階級提供不穿甲冑的輕装步兵或在海軍中服务，大概还領餉銀。

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財產。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們的地产的多寡来規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階級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緣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敗。

然而，按照財產来規定政治权利的办法，并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設施。虽然这种办法在国家制度的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許多国家，而且恰好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雅典，它也只起了暫时的作用；从亚里斯泰迪茲的时候起，一切官职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¹³¹

其后八十年間，雅典社会就逐漸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

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精巧手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发生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另一方面，就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都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编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受人保护的外来的移民。¹³²

这时，党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时（公元前 509 年）才最终被推翻，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¹³³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撤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代替它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以已经用诺克拉里试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经常居住的地区了；现在要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

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自治区，即所谓德莫。居住在每个德莫内的公民（德莫特），选举出自己的区长（德马赫）和司库、以及

审理輕微案件的三十个法官。各个德莫同样也有自己的神殿及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祀奉他們的神职人員。德莫的最高权力，属于德莫特大会。摩尔根說得对，这是美洲市鎮自治区的一种原型。¹³⁴当时在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开始时所依据的单位，正好和現代国家在最高发展阶段上最后要达到的单位相同。

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現在它被叫做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組織，而且也是一种軍事組織；它选出一个菲拉赫^①即部落长，指揮騎兵；一个塔克色阿赫，指揮步兵；一个兵法家，統率在部落境內招募的全体軍人。其次，它提供五艘配有船員和船长的战船；并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英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称。最后，它选举五十名代表参加雅典議事会。

最終的結果是雅典国家。它是由十个部落所选出的五百名代表組成的議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級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員掌管各行政部門和司法事务。在雅典沒有总攬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員。

由于实施这个新制度和容納大量被保护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释放的奴隶，——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便受到排挤而不再过問社会事务；它們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会社。不过，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因襲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很久，只是逐漸才消亡下去。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个国家設施中可以

① 来源于古希腊文的“菲拉”(部落)一詞。——編者注

看出来。

我們已經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軍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們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奴隶。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当作警察来使用，警察是和國家一样古老的，所以十八世紀的质朴的法国人才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 (nations policées)^①。这样，雅典人在創立他們國家的同时，也創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騎馬的弓箭手組成的真正的宪兵队，或者如德国南部和瑞士所說的 Landjäger^②。不过，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隶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賤的，以致他們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事。这仍是旧的氏族思想。国家是不能沒有警察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輕，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員視為卑賤的行业受到尊敬。

現在已經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財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現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于其上的階級对立，已經不再是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間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間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連妇女和儿童在內，約为 9 万人，而男女奴隶为 365 000 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为 45 000 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 18 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許多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房屋很大的手工工場內一起工作。但是，

① 双关語：«policé»——“文明的”，«police»——“警察”。——編者注

② 方言，意即宪兵。——譯者注

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¹³⁵，——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事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

六 羅馬的氏族和国家

从羅馬建城的傳說中可以看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由許多拉丁氏族（傳說有一百个）联合而成的一个部落；不久又加入了一个薩伯力安部落，似乎也有一百个氏族；最后加入的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分子构成的第三个部落，据傳說它也有百个氏族。初看起来，这全部故事证明，在这里除了氏族以外，再沒有自然形成的任何东西，連氏族本身在許多情况下，也只不过是故土上繼續存在的母亲氏族的分支而已。各个部落都带有人工构成的痕迹，但它們大部分都是由有亲属关系的分子构成的，并且不是按照人工造成的部落而是按照古代自然长成的部落的样子构成的；也可能，有一个真正的老部落作了三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的核心。中間环节——胞族，是由十个氏族組成的，叫做庫里亚；因此，共有三十个庫里亚。

人們公认，羅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說，希腊氏族是我們在美洲紅种人中間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末，这对于羅馬氏族也完全适用。因此，我們在这里只須簡單地談談。

羅馬的氏族，至少在該城存在的早期，有以下的制度：

1. 氏族成員的相互继承权；財產仍保留在氏族以內。在羅馬

氏族里，也像在希腊氏族里一样，由于父权制已经盛行，所以女系后裔已经沒有继承权。根据我們所知道的最古的羅馬成文法即十二銅表法¹³⁶，首先是子女作为直接继承人继承财产；要是沒有子女，則由阿格納蒂（男系亲属）继承；倘若連阿格納蒂也沒有，則由同氏族人继承。無論在哪种情况下，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以內的。在这里我們看到，由財富的增加和一夫一妻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已逐漸滲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初——如前面所說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限于阿格納蒂，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不言而喻，这和十二銅表法上的順序是相反的。

2. 占有共同的墓地。克劳狄名門氏族，在由勒吉利城迁到羅馬时，得到了一块土地，此外还在城內得到了一块共同墓地。还在奥古斯都时代，死在条多堡森林的瓦魯斯的首級运到羅馬后¹³⁷，即埋在 *gentilitius tumulus* [氏族坟山]；可見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独特的坟山。^①

3. 共同的宗教节日。这些 *sacra gentilitia* [氏族祭典] 是众所周知的。

4. 氏族内部不得通婚。这在羅馬似乎从来沒有成为一种成文法，但却是一种习俗。在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羅馬人夫妇中，沒有一对夫妇的氏族名称是相同的。继承权也证实了这一慣例。妇女出嫁后就丧失了她的阿格納蒂的权利，而退出自己的氏族；不論她或她的子女都不能继承她的父亲或这个父亲的兄弟，因为不然的話，父亲的氏族就会失掉一部分财产。这一慣例只有在

^① “可見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独特的坟山” 这句话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女子不許和同氏族人結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5. 土地共有。这在原始时代，从部落土地开始实行分配的时候起，始終是存在的。在各拉丁部落中間，我們看到，土地一部分为部落所有，一部分为氏族所有，一部分为家庭所有，那时这种家庭未必是^①个体家庭。相传罗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給了个人，每人大約一公頃(二羅馬亩)。但是后来我們也看到为氏族所有的土地，至于那为共和国全部內政史所环绕的国有土地，就更不必說了。

6. 同氏族人有互相保护和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一点，成文历史仅有片断的記載；羅馬国家，一开始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以致防御侵害的权利就不能不落到了它的手里。当亚庇烏斯·克劳狄烏斯被捕时，他的氏族的全体成員，包括他的私敌在內，都穿上丧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¹³⁸时，各氏族都联合起来，贖回他們的被俘的同氏族人；元老院則**禁止**它們这样做。

7. 用氏族名称的权利。这种权利一直到帝政时代还保持着；被释放的奴隶，可以采用他們从前的主人的氏族名称，但不能获得氏族的权利。

8. 收养外人入族的权利。其办法是收养到某一家庭中（像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然后就算收养入族。

9. 关于选举和撤換首长的权利，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到过。但是，由于在羅馬存在的最初时期，从选举产生的王起，自上而下一切官职都是选举或任命的，同时，庫里亚的祭司也是由庫里亚选举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断，氏族首长（principes）也定然如此，虽然氏

^① 在1884年版中不是“未必是”，而是“并不定然是”。——編者注

族首长从氏族内同一家庭选出的办法可能已成为惯例。

罗马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易洛魁人”¹³⁹。

直到今天^①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关于罗马氏族制度的概念还是多么混乱，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在蒙森关于共和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氏族名称的著作（“罗马研究”1864年柏林版第1卷¹⁴⁰）中，有这样一段话：

“除了血族的一切男性成员以外，——被收养入族和受保护的人包括在内，但奴隶当然除外，——血族的名称也给予妇女…… 部落〈蒙森在这里如此翻译 *gens* 一词〉这是……一个从共同的——真实的、假定的、甚至虚构的——世系中产生的，由共同的节日、墓地和继承习惯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一切有人身自由的个人，因而也包括妇女，都可以而且必须算在该共同体内。但是，确定结了婚的妇女的氏族名称却成了一种困难。当妇女只能同自己血族的成员结婚时，这一困难自然是不存在的；所以可以证明，有一个长时期，妇女和氏族以外的人结婚，比同血族以内的人结婚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gentis enuptio*）到第六世纪时，还被当作赏给个人的特权…… 但是，凡是实行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地方，妇女在最古的时代一定要转入夫方的部落。毫无疑问，依照古代的宗教婚姻，妇女完全加入夫方的法权的和宗教的公社，而脱离她自己的公社。谁不知道出嫁的妇女就丧失了在本氏族内继承遗产或将自己的遗产传给本氏族成员的权利，而加入同自己的丈夫、子女以及他们所有同氏族人的继承团体呢？假使她被她的丈夫收养为孩子而加入他的家庭，那末她怎能和他的血族不相干呢？”（第8—11页）

可见，蒙森断言，属于某一氏族的罗马女子，最初只能在她的

^① 以下直到“从而证明蒙森说得不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见本卷第143—144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氏族內部結婚，因而，羅馬的氏族是內婚制，不是外婚制。這種跟其他民族的全部經歷相矛盾的观点，主要是（即使不完全是）以李維著作中引起很多爭論的唯一的一段話（第 39 卷第 19 章）¹⁴¹ 為依据的，這段話說，元老院于羅馬城建立 568 年即公元前 186 年，曾作出如下的決議：

«uti Feceniae Hispalae datio, deminutio, gentis enuptio, tutoris optio item esset quasi ei vir testamento dedisset; utique ei ingenuo nubere liceret, neu quid ei qui eam duxisset, ob id fraudi ignominiaeve esset», ——“費策妮婭·希斯帕拉有處理她的財產、減少她的財產、在氏族以外結婚、給自己選定保護人的權利，如同她的〈已故的〉丈夫曾用遺囑把這個權利授予她一樣；她可以和一個完全自由的人結婚，不能認為娶她為妻的人是做了不好的或可恥的事情”。

毫無疑問，在這裡，一個被釋放的女奴隸費策妮婭獲得了在氏族以外結婚的權利。同樣無疑的是，丈夫也有權用遺囑的方式允許妻子在他死後有權在氏族以外結婚。但是在哪一個氏族以外呢？

如果像蒙森所推測的那樣，婦女必須在她的氏族內部結婚，那末她在結婚以後仍然是留在該氏族以內的。不過，第一，正是這個關於氏族內部通婚的斷言，尚待證明。第二，如果婦女必須在她的氏族內部結婚，那末，男子自然也應當如此，因為不如此他就會找不到妻子。這樣一來，就成了丈夫可以用遺囑把一項他自己也沒有並且自己也享受不到的權利傳給他的妻子了；這從法律的观点來看是荒謬的。蒙森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又推測道：

“為了在氏族以外結婚，在法律上，大概不僅需要得到掌權者的同意，而且需要得到全體氏族成員的同意。”（第 10 頁注）

這首先是一個非常大胆的推測；其次，它跟上面所引的那段話

的明确語意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这个权利給予她的；元老院給予她的显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給予她的一样多；但是元老院給予她的乃是沒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絕對权利，以便她如果使用这个权利，她的新丈夫也不应因此而受到損害；元老院甚至責成现在的和将来的执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她因此而遭到任何煩惱。这样，蒙森的推測便全然不能成立了。

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氏族的男子結婚，而她本人仍留在她原来的氏族內。这样一来，依照上面所引的那一段文字，她的丈夫就是有权允許他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結婚。这就是說，他有权处理他所不属于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謬的事，用不着多說的。

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測，即妇女第一次結婚是嫁給别的氏族的男子，結婚后她便立即轉入夫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实上对于这类場合所容許的那样。这样一来，一切相互关系立刻就不言自明了。妇女由于結婚而脫离她的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的一員，但她并不是血緣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使她不受因結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內部通婚的一切規定的束縛；其次，她已經被接受到氏族的婚姻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时继承他的財產，即一个氏族成員的財產。为了把財產保存在氏族以內，她必須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結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結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嗎？如果一定要造成例外，那末除了把这份財產遺留給她的第一个丈夫之外，試問誰有資格授权她这样做呢？在他把一部分財產遺留給她，而同时允許她通过結婚或当作結婚的結果而把这一部分財產交給别的氏族的

瞬間，這份財產還是屬於他的；因而，他實際上只是處置他自己的財產。至於這個婦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氏族的关系，那末，正是他通過自由意志的行為——結婚，使她加入了這個氏族；因此，同樣自然的是，也正是他可以授權她通過第二次結婚而退出這個氏族。一句話，只要我們拋棄羅馬氏族實行內婚制的奇怪觀念，而同摩爾根一起承認它最初是實行外婚制的氏族，那末問題就很簡單而不言自明了。

還有最後一種推測，這種推測也有它的擁護者，而且它的擁護者似乎最多。根據這個推測，上面那段話似乎只是說：

“被釋放的奴婢 (*libertae*) 沒有特別的許可，不得 *e gente enubere* (在氏族以外結婚)，也不得作出任何同 *capitis deminutio minima* [喪失家庭權利] 有關，結果使 *liberta* 脫離氏族團體的行為。”(朗格“羅馬的古代” 1856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195 頁，那里談到我們從李維著作中引用的那段話時，引用了胡施克的話¹⁴²)

如果這一推測是正確的，那末這段話對於完全自由的羅馬婦女的地位根本就什麼也沒有證明；更談不上她們應在氏族內部結婚的義務了。

Enuptio gentis [在氏族以外結婚] 一語，只有上面那段話提到它，在全部羅馬文獻中再沒有遇見過；*enubere*——與外人結婚——一語只遇見三次，也是在李維的著作中，而且和氏族無關。那種虛幻的、認為羅馬婦女只能在本氏族內部結婚的看法，其來源僅僅是這一段話。但是這種看法是絕對站不住腳的。因為，這段話或者只是與被釋放的女奴隸所受的特殊限制有關，那末它對於完全自由的婦女 (*ingenuae*) 就根本沒有證明什麼東西；或者它也適用於完全自由的婦女，那末它倒證明婦女按照通例是在本氏族以外結

婚的，而結婚以后便轉入夫方的氏族，从而证明蒙森說得不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

在羅馬建城差不多三百年后，氏族联系还这样牢固，以致一个名門氏族，即法比氏族，經元老院許可，竟以自己的力量征伐了邻近的魏伊城。据說有三百零六个法比人出征，尽为伏兵所杀；只剩下一个男孩，延續了这个氏族。

我們已經說过，十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胞族在这里叫做庫里亚，它有着比希腊胞族更重要的社会职能。每一个庫里亚都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圣物和祭司；全体祭司构成羅馬祭司团之一。十个庫里亚构成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像其余的拉丁部落一样，最初大概有一个选举的首长——軍事首长兼最高祭司。所有三个部落合在一起，构成羅馬人民，即 *populus romanus*。

这样，只有身为氏族成員，并且通过自己的氏族而为庫里亚成員和部落成員的人，才能属于羅馬人民。羅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正像尼布尔最先正确地叙述的那样，是由三百个氏族的首长組成的¹⁴³；正因为如此，他們作为氏族的首长被称为 *patres*，即父老，而他們全体則构成元老院（長老議事会，由 *senex*——老者一詞而来）。氏族首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貴；这些家庭自称为貴族，并且企求加入元老院和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時間的进展，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种企求就变成实际的权利，这一点在关于罗慕洛賜給第一批元老及其子孙以貴族身分和特权的傳說中得到了反映。元老院像雅典 *bulê*〔議事会〕一样，在許多事情上有决定权，有权預先討論其中比較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新法律。这些新法律，最后由叫做 *comitia*

curiata (庫里亞大会)的人民大会通过。来参加大会的人民按庫里亞分組,而在每个庫里亞內大概又按氏族分組;在通过決議时三十个庫里亞各有一票表决权。庫里亞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一切高級公职人員,包括勒克斯(所謂王)在內,宣战(但由元老院媾和),并以最高法院資格,在一切事关判处羅馬公民死刑的場合,根据各方的上訴作最后的决定。最后,与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并列的,还有勒克斯,他完全相当于希腊的巴塞勒斯,但决不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样¹⁴⁴ 几乎是专制君主。^① 他同样也是軍事首长、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他不掌握民政方面的权力,也决沒有处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权力,除非这些权力来自軍事首长的惩戒权或法庭审判长的判决执行权。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襲的;相反地,他大概是由其前任推荐,先由庫里亞大会选出,然后在第二次大会上正式就职的。他也是可以撤換的,高傲的塔克文的命运,便是证明。

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羅馬人在所謂王时代也生活在一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們当中发展起来的軍事民主制下。誠然,庫里亞和部落可能一部分是人为的組織,但它們都是按照它們所由发生并且还从四面包围着它們的那种真正的、自然

① 拉丁語的 rex (勒克斯),相当于克尔特-爱尔兰語的 righ (部落长)和哥特語的 reiks。Reiks 一詞,像德語 Fürst的本义(与英語的 first,丹麦語的 förste 相同,意即“第一”)一样,也是氏族长或部落长的意思,这从哥特人在四世紀时对于后世的王即全体人民的軍事首长已有特別名称即 thiudans (提烏丹斯)一事中已可以看出来。在烏尔菲拉所翻譯的聖經中,不是把阿尔塔薛西斯和希罗德叫做 reiks,而只是叫做 thiudans,把提比利烏斯皇帝的国家不叫做 reiki,而叫做 thiudinassus。在哥特的 thiudans (我們不大确切地把这个詞譯为王 Thiudareiks) 的名字 Theodorich (狄奧多里希)亦即迪特里希中,两种意义合而为一了。

产生的社会的模型造成的。尽管自然产生的贵族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尽管担任勒克斯的人力图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制度的最初的根本性质，而全部问题就在于此。

这时，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而扩大了了的罗马地区上的人口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要是拉丁地区的居民。所有这些新的臣民（关于被保护民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都处在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 *populus romanus* 即道地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人身自由的人，可以占有地产，必须纳税和服兵役。可是他们却不能担任任何官职；既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也不能参与征服得来的国有土地的分配。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权的平民。由于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并有武装，于是就成了一种同现在根本禁止增加外人的旧的 *populus* 相对抗的可怕力量了。加以土地看来几乎是平均分配于 *populus* 和平民之间的，而商业和工业的财富，虽然还不十分发达，也主要是在平民手中。

由于全部传说的罗马上古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这种黑暗又因后世受过法学教育的作家们（他们的著作还是我们的材料来源）的唯理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报告而更加浓厚，因而，关于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发生的时间、进程和动因，都不可能说出什么确定的意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革命的原因在于平民和 *populus* 之间的斗争。

据说是由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这位勒克斯依照希腊的榜样特别是梭伦的榜样制定的新制度，设立了新的人民大会；能参加或不许参加这个大会，不分 *populus* 和平民都依是否服兵役而定。

凡是应服兵役的男子，都按其财产分为六个阶级。前五个阶级中每个阶级的最低财产额为：一、10 万阿司；二、75 000 阿司；三、5 万阿司；四、25 000 阿司；五、11 000 阿司；据杜罗·德·拉·马尔计算，这些数目大约相当于 14 000、10 500、7 000、3 600 和 1 570 馬克¹⁴⁵。第六阶级为无产者，是由那些没有什么财产、不服兵役和不納稅的人构成的。在新的百人团人民大会 (comitia centuriata) 上，公民以军队方式按連队来編組，每队 100 人，称百人团，每个百人团有一票表决权。但是，第一阶级出 80 个百人团，第二阶级出 22 个，第三阶级出 20 个，第四阶级出 22 个，第五阶级出 30 个，而第六阶级，为了体面起见，也准出一个。此外，还有从最富裕的公民中征集的騎士所組成的 18 个百人团；一共有 193 个百人团；多数票为 97 票。但騎士和第一阶级合在一起就有 98 票，即占多数；只要他們意見一致，就可以不征詢其余阶级的意見，決議也就有效了。

以前庫里亚大会的一切政治权利（除了若干名义上的权利以外），現在都归这个新的百人团大会了；这样一来，庫里亚和构成它們的各氏族，像在雅典一样，就降为純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团体，并且作为这样的团体还苟延殘喘了很久，而庫里亚大会不久就完全消失了。为了把三个旧的血族部落也从国家中排除出去，便設立了四个地区部落，每个地区部落居住羅馬城的四分之一，并享有一系列的政治权利。

这样，在羅馬也是在所謂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緣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

对不許服兵役和不許有武装的所謂无产者。

只是在那一位僭取了真正王权的最后一个勒克斯，即高傲的塔克文被驅逐以后，在两个拥有同等权力（像在易洛魁人那里那样）的軍事首长（执政官）代替了一个勒克斯以后，这个新制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羅馬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也就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演变，这里包括，共和国的貴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貴族溶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金錢巨头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所有者和金錢巨头逐渐吞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生的广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給帝政而且也給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开辟了道路。

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①的氏族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們不能詳細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种不同的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間以或多或少純粹的形式存在着的氏族制度，或者亚洲的文化民族的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迹了。^② 这两者是到处都可以見到的。只举几个例子：在人們还不知道什么是氏族的时候，那一位曾經費了莫大气力去攪混氏族問題的麦克伦南，就已經表明了氏族的存在，并且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卡尔梅克人、切尔克斯人、薩莫耶特人^③ 的氏族，以及三个印度民族——华拉耳人、馬加爾人、曼尼普尔人的氏族。¹⁴⁶ 不久以前，馬·柯瓦列夫斯基也发现并描述了北蕭胡人、显胡苏人、斯万人和高加索部落的其他氏族。¹⁴⁷ 在这里，我們只对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存在，作若干簡短的評述。

① “德意志人”，过去譯为“日耳曼人”。在我国习惯上，“日耳曼人”是指中古以前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是指那以后的德意志人。但在德文中和恩格斯这篇著作中，却没有这样的区别。恩格斯在本卷第 105 頁指明：“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总称为‘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給他們取的……”。本篇中所用的“德意志人”、“德語”、“高地德意志語”、“德意志国家”等等詞，都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則，譯为“德意志”，不再一一加以区别。恩格斯在个别地方使用日耳曼一詞的，則依原文譯为“日耳曼”。——譯者注

② 以下直到“在这里，我們只对克尔特人……作若干簡短的評述”以前的一段文字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③ 过去称涅涅茨人。——編者注

凯尔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們看到了仍然充滿着活力的氏族；在爱尔兰，甚至到今天，在英国人用暴力破坏了氏族以后，它至少还本能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識中；在苏格兰，在上世紀中叶，它还处于全盛时期，在这里它也只是由于英国人的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灭的。

在威尔士被英国人征服以前数世紀¹⁴⁸，即迟于十一世紀所制定的古代威尔士的法律，还表明有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虽然这只是一般普遍流行的早期习俗的稀有殘余；每个家庭有供自己耕作的五英亩土地；此外，另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收获物实行分配。就其跟爱尔兰和苏格兰类似这一点來說，毫無疑問这种农村公社乃是一种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对威尔士法律的重新考查——我沒有时间去这样做（我的摘要是在 1869 年做的¹⁴⁹）——未必能直接证实这一点。然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的材料却直接证明，到十一世紀时，凯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沒有被一夫一妻制所代替。在威尔士，婚姻只有滿了七年之后才是不能解除的，或者更确切些說，才是不能取消的。甚至只差三夜就滿七年，夫妻还是可以分离的。那时财产便要分开：由妻子划分，丈夫任选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慣例来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他必須把妻子的嫁妝和其他某些东西还给她；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的，那她便少得一点。如有三个子女，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即其中的一个。如果妻子在离婚后重新結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时，即使她的一只脚已經踏上新夫的床，也要順从前夫的要求。但是如果他們業已同居七年，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結婚，他們也就成了夫妻。在結婚以前，少女的貞操完全不严格遵守，也不要求遵守；与此有关的規定，具有非常輕佻的性质，是和资产阶级的道

德完全不相适应的。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这是允许他这样作的三种场合之一，在其余场合殴打妻子是要受罚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权要求别的补偿了；因为

“对于同一罪行，或者要求贖罪，或者要求报复，但两者不可得兼”。¹⁵⁰

妻子可据以要求离婚而且在分财产时自己的权利又丝毫不受损失的原因，是非常多样的：只要丈夫口有臭气就够了。为贖回初夜权而付给部落首领或国王的贖金（*gobr merch*，中世纪的 *mar-cheta* 这个名称、法语的 *marquette* 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法典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妇女在人民大会上享有表决权。我们再补充一点，在爱尔兰已经证明有类似情况存在；在那里，暂时性的婚姻也非常流行，在离婚时，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确规定的照顾，甚至对她的家务劳动也要给以报酬；在那里，还有“长妻”与其他诸妻并存的事；而在分配遗产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差别。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对偶婚的图景，与这种对偶婚比较起来，北美现行的婚姻形式，似乎是严格的，不过，对于一个在凯撒时代还过着群婚生活的民族来说，在十一世纪有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爱尔兰氏族（即 *sept*；部落称为 *clainne*，克兰）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它不仅记在古代法典中，而且在十七世纪被派到爱尔兰以便把克兰的领地变成英王王室领地的英国法学家们也对它作过记述。直到那时，土地只要未被首领变为自己的私有领地，就仍是克兰或氏族的公共财产。如果某一氏族成员死亡，因而一户经济不再存在，氏族首长（英国法学家称之为 *caput cognationis*）便把全部氏族土地在其他各户中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体上一定是依照德意志通行的惯例来进行的。即在今日，还可以见到一些属于所谓 *rundale*〔朗得尔〕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这

种村田是很多的。农民们，即租种以前属于整个氏族而后来被英国征服者所侵占的土地的个体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纳租金，但却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Gewanne»〔“块”〕，如摩塞尔河沿岸所称呼的那样；每个人在每一块中都有一份；沼地和牧场归公共使用。在五十年前，重新分配土地依旧时常举行，有时每年举行。这种实行朗得尔制度的村落的地界图，看去极似摩塞尔河沿岸或霍赫瓦尔特山脉的德意志人的那种农家公社。氏族此外还继续存在于«factions»〔“帮”〕中。爱尔兰农民常常分成各种帮，它们是以看来毫无意思和十分荒诞的差别为根据的，这种差别为英国人所全然不解，并且它们除了彼此之间进行心爱的盛大毆斗而外，似乎别无任何目的。这是被消灭了的氏族的人工的复活，氏族灭亡后才产生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以特殊的方式证明了遗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氏族人还一道住在他们旧有的地区内；比如在三十年代，莫纳根郡的绝大多数居民只有四个姓，换言之，即起源于四个氏族或克兰。^①

在苏格兰，氏族制度是随着 1745 年起义的被镇压而灭亡

^① 在爱尔兰度过的那几天中¹⁵¹，我重新鲜明地意识到那里的乡村居民还是多么厉害地生活在氏族时代的观念中。农民向土地所有者租地耕种，土地所有者

在农民的眼中还儼然是一种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兰的首领；农民以租金的方式向他纳贡，但认为在困难时也应得到他的帮助。在那里还认为，一切比较富裕的人，当自己的比较贫苦的邻居有急需时，必须帮助他们，这种帮助，并不是施舍，而是比较富有的克兰的成员或克兰的首长理所当然地应给予比较贫苦的克兰的成员。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抱怨无法使爱尔兰农民接受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财产概念，绝不能灌输到爱尔兰人头脑中去。当具有这种素朴氏族观念的爱尔兰人突然投身到英国或美国的大城市，落到一个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全然不同的环境中时，他们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会多么容易迷惑惶乱，失去一切依托并且往往大批地成为伤风败俗的牺牲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加的注。）

的。¹⁵² 至于苏格兰的克兰是这个制度的哪一环节，尚待研究；但它是这样一个环节，则是沒有疑問的。在瓦尔特·司各脫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摩尔根說，这种克兰，

“就其組織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的标本，氏族生活支配氏族成員的显著实例…… 从他們的紛爭和血族复仇上，从按克兰划分地区上，从他們的共同使用土地上，从克兰的成員对于首領的忠誠以及彼此間的忠誠上，我們处处都看到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的特征…… 世系是按照父权制計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兰內，而妇女的子女則轉入他們父亲的克兰里去”¹⁵³。

至于从前在苏格兰盛行过母权制，这从下述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据貝达說，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继承的。¹⁵⁴ 甚至普那路亚家庭的殘余，在威尔士人以及苏格兰人中間还以初夜权的形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紀，那时，要是初夜权沒有贖回，克兰的首領或国王，便可以作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后代表者，对于每个新娘享有这个权利。^①

* * *

德意志人在各民族大迁徙以前，曾組織成为氏族，这是沒有疑問的。他們只是在公元前数世紀，才占居了多瑙河、萊茵河、維斯拉河和北海之間的地区；基姆布利人和条頓人正处在大迁徙中，而

① 在 1884 年版中在这句話后面接着还有一段話，恩格斯后来在 1891 年版中把它略去了。这段話是：“这种权利——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区經常可以見到——在俄国人当中也流行过；到十世紀时被奧里珈女大公废除。”往下是一段叙述“尼韦尔內和法兰斯孔太的与塞尔維亞—克罗地亚地区的斯拉夫人家家庭公社相似的共产制的农奴家庭”的話，这段話，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把它移到第二章中，略加修改后作为一个补充列入該章（見本卷第 71—72 頁）。——編者注

苏維汇人只是到凱撒时代才穩定地定居下来。凱撒談到苏維汇人时明确地說过：他們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 (*gentibus cognationibusque*) 分开居住的¹⁵⁵；而在 *gens Julia* [尤利氏族] 的一个羅馬人的口中，*gentibus* 这个名詞有着完全确定的和不容誤解的意义。这适用于全体德意志人；他們甚至在被征服的羅馬各行省似乎还按氏族居住。从“阿勒曼尼法典”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多瑙河以南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們是按血族 (*genealogiae*) 分开居住的。¹⁵⁶ 这里使用的 *genealogia* 一詞，与后来的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① 不久以前，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一种見解，說这些 *genealogiae* 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在它們之間进行分配，农村公社只是后来才从它們当中发展起来的。¹⁵⁷ 关于 *fara* 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那里，——从而，在哥特部落和赫米奥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里，——*fara* 一詞的含义和“阿勒曼尼法典”上的 *genealogia* 一詞的含义虽不完全相同，却也相差无几。这里在我們面前的究竟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詞，这个名

① 以下直到“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見本卷第156頁）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以代替1884年版中的如下一段文字：“这样我們就看到，德意志民族之一，并且恰恰又是苏維汇人，在这里是按氏族即 *gentes* 分居的，每个氏族都有确定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的氏族称为 *fara*，而‘勃艮第法典’中所使用的氏族成員 (*faramanni*) 一詞，同时也指勃艮第人，这是針對着羅馬居民說的，后者自然不包括在勃艮第氏族內。因而在勃艮第人那里，土地的分配也是按照氏族进行的。日耳曼法学家們好几百年为之絞尽脑汁的 *faramanni* 問題，这样就可解决。在德意志人中并不是到处都把氏族称为 *fara*，尽管我們在一个哥特系的民族和另一个赫米奥南(高地德意志)系的民族那里可以发现这个名称。在德語中用来表示亲属关系的字根是很多的，这些字根同时使用在我們可以推断是和氏族有关的詞語中。”——編者注

詞又是什么,关于這個問題,語言的遺迹沒有給我們提供答案。在語源上,哥特語的 *kuni*,中部高地德意志語的 *künne* 是和希臘語的 *genos*,拉丁語的 *gens* 相當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義上來使用的。婦女的名字來自同一個詞根,如希臘語的 *gyne*、斯拉夫語的 *žena*、哥特語的 *qvino*,古斯堪的那維亞語的 *kona*, *kuna* 等,這表明曾存在過母權制時代。——在倫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剛才說過的,我們看到 *fāra* 一詞,這個詞被格林假定來源於詞根 *fisan*,意即生育,我則傾向於認為它來源於更顯而易見的詞根 *faran*,意即騎馬^①、游牧、返回,用來表示不言而喻只是由親屬構成的游牧群的某個一定的部分。這個詞,在起初是向東方,後來又向西方遷徙的許多世紀中,漸漸地被用來指血族共同體本身了。——其次,哥特語的 *sibja*,盎格魯撒克遜語的 *sib*,古代高地德意志語的 *sippia*, *sippa*,都是親屬^②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那維亞語中,僅有複數的 *sifjar* (親屬) 一詞;單數只用作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後,在“希爾德布蘭德之歌”¹⁵⁸ 中還見到另外一種用語,它出現在希爾德布蘭德問哈杜布蘭德的話中:

“在人民中間的男子中,誰是你的父親……或你是哪一血族的?” (*«eddo huêlîhhes cnuosles du sîs»*.)

要是德意志語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稱,那末這恐怕就是哥特語的 *kuni* 了;這不僅因為它和親屬語中相應的說法一致,而且因為最初表示氏族長或部落長的 *kuning* (王^③) 一詞就是從 *kuni* 這個字演變來的。*sibja* (親屬) 這個詞似乎無須加以考慮;至少,

① 德語是 *fahren*。——編者注

② 德語是 *Sippe*。——編者注

③ 德語是 *König*。——編者注

sifjar 在古代斯堪的那維亞語中，不僅表示有血親關係的人，而且也表示有姻親關係的人，即包括至少兩個氏族的成員；因此，sif 這個詞本身是不能表示氏族的。

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臘人那里一樣，在德意志人那里，騎兵隊和楔形步兵縱隊的战斗隊形，也是按氏族的組織來編的；如果說，塔西佗說的是按家庭和親屬關係¹⁵⁹，那末這種不明確的用語的來由是，在塔西佗時代氏族在羅馬早已不再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團體而存在了。

有決定意義的是塔西佗的這一段話，在那里他說：母親的兄弟把他的外甥看做是自己的兒子；有些人甚至認為舅父和外甥之間的血緣關係，比父子之間的血緣關係還要神聖和密切，所以当要求人質的時候，那個將受到約束的人的姊妹的兒子被認為是比他自己的兒子還要大的保證。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按照母權制組織起來的、因而是最初的氏族活生生的殘余，而且這種殘余還被當作德意志人所特有的一種東西。^① 假使這種氏族成員把自己的兒子當作某一莊嚴義務的擔保物，而這個兒子卻成了父親違約的犧牲品，那末這只是父親本人的事情。但是假如成為犧牲品的是姊妹的兒

① 起源于母權制時代並在許多民族中間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間的特別密切的關係，希臘人從英雄時代的神話中才知道。據狄奧多羅斯（第4卷第34頁）說，梅里格爾殺死了鐵斯特士的兒子們，也就是自己母親阿耳泰婭的兄弟們。阿耳泰婭認為這種行為是一種無可饒恕的罪行，她詛咒凶手——她自己的兒子，並祈求他死。“據說，諸神聽從了她的願望，結束了梅里格爾的生命。”又據狄奧多羅斯（第4卷第43和44頁）說，海格立斯率領下的亞爾古船英雄在色雷斯登陸，他們在那里發現，菲尼士由於受到他的新妻子的教唆，殘酷虐待被他遺棄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奧帕特爾所生的兩個兒子。但在亞爾古船英雄中間，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奧帕特爾的兄弟們，也就是被虐待者的母親的兄弟們。他們立刻保護他們的兩個外甥，釋放他們並殺死看守者。¹⁶⁰

子，那末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氏族法规；孩子或青年的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责任；这个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德意志人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迹，那末仅仅这一个地方也就够了。^①

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的关于诸神的晚景和世界的毁灭的《Völuspá》¹⁶¹ 中，有一个地方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那是关于大约八百年以后的事情的。在这个“女预言者的预言”中，——如现在班格和布格所证明的¹⁶²，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在描述大灾难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时说道：

«Broedhr munu berjask ok at bönum verdask,
munu *systrungar* sifjum spilla».

“兄弟們將互相仇視，互相殺戮，
姊妹的兒子們就要毀壞親屬關係了。”

Systrungr 一字是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意思，在诗人看来，姊妹的子女否认相互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比兄弟互相残杀还要罪大恶极。起加强作用的是表示母方亲属关系的 *systrungar* 一詞；要是不用这个詞，而用 *syskina-börn*（兄弟和姊妹的子女）或 *syskina-synir*（兄弟和姊妹的兒子們），那末第二行对于第一行就不是加强，而是减弱了。由此可见，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盗时代，在斯堪的那维亚关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

但是，在塔西佗时代，至少在他较为熟悉^② 的德意志人中间，

① 以下直到“但是，在塔西佗时代，”（見本卷第 157 頁）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② “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母权制已經让位給父权制了；父亲的遺產由子女继承；如果沒有子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許母亲的兄弟参加继承这一事实，是和刚刚所說的习俗的保存有关系的，并证明德意志人的父权制在当时还是多么新近。直到进入中世紀很久之后，也仍然可以見到母权制的殘余。那时，在人們中間，特別是在农奴中間，似乎仍然不大信賴父亲的血統；所以，当領主向某个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农奴的时候，在奥格斯堡、巴塞尔和凱則尔斯劳頓，就要求有六个最近的血緣亲属，而且是只限于母方的亲属来宣誓证实被告的农奴身分(毛勒“都市制度”第1卷第381頁¹⁶³)。

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殘余，这就是在羅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締結条約时，貴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被俘而作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說来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鼓舞他們的战斗勇气；他們认为妇女是一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們也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取妇女的意見；例如，利珀河畔布魯克泰人的女祭司魏勒姐，就曾經是巴达維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中，戚維利斯領導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搖了羅馬人在高卢的全部統治。¹⁶⁴ 在家庭內妻子的統治看来是无可爭辯的；自然，一切家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則打猎，飲酒或游手好閑。塔西佗就是这样說的；但是由于他沒有說誰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說，奴隶只納貢，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动，看来就必須由成年男子来負擔了。

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漸接近一夫一妻制的对偶婚制。这还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因为还允許显貴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貞操，一般說来，是严格遵守的(这和凯尔特人相反)，同样，塔西佗

也特別熱情地說到德意志人的婚姻關係的不可破壞性。他只是舉出妻子的通姦，作為離婚的理由。不過，他的話在這裡留下了很多漏洞，而且過於明顯地用來給淫蕩的羅馬人作為美德的鏡子了。有一點是真實的：即使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經是這種世上少有的美德騎士，那末，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觸，便足以使他們墮落到其餘一般歐洲人的水平；在羅馬世界中，嚴格道德的最後痕迹消失得比德語還要快。只消讀一讀圖爾的格雷哥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這點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羅馬那樣，盛行驕奢淫逸的享樂生活，因此，在這方面，即使我們沒有給德意志人加上那種從未成為任何一個地方的整個民族的通例的節欲行為，他們也比羅馬世界優越得多。

從氏族制度中產生了繼承父親或親屬的友誼關係和仇敵關係的義務；同樣，也繼承用以代替血族復仇的殺人或傷人贖金。這種贖金，在上一代還被認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現在已經證明，在成百個民族中都是這樣，這是起源於氏族制度的血族復仇的一種普遍的較緩和的形式。這種贖金，就像款待客人的義務一樣，我們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間也可以看到；塔西佗關於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亞志”第 21 章），與摩爾根關於印第安人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幾乎在細節上都是一致的。

塔西佗時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最終分配了耕地以及與此有關的那些地方應如何理解，像這種熱烈而無止境的爭論，如今已是過去的事了。既然已經證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實行過土地由氏族後來又由共產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據凱撒證明，在蘇維匯人當中就是如此，¹⁶⁵——繼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實行過把土地分配給單個家庭並定期實行重新分配；既然已經確定，耕地的這種定期

重新分配的办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还保存到今日，关于这問題就不必再費一詞了。如果从凱撒到塔西佗的一百五十年間，德意志人从凱撒所明确指出的苏維汇人那里有过的共同耕作（他說，他們完全沒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过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个体耕作，那末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內，而且沒有任何外来干涉，要从共同耕作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讀到他說得很簡洁的話：他們每年更換（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时还留下充分的公有土地。¹⁶⁶ 这是和德意志人当时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适应的一种耕作和土地占有阶段。^①

上面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样子保留下来，未加改变。在这个期間，問題已轉到另一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經证明（見前述书第44頁^②），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現代的孤立的家庭之間的中間阶段，它虽不是到处流行，但却流行很广。在这以后，問題已經不再像毛勒和瓦茨爭論不下的那样——是土地公有还是土地私有，而是关于土地公有的形式是什么了。毫無疑問，在凱撒时代，苏維汇人不仅有过土地公有，而且也有过共同核算的共同耕作。至于他們的經濟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間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是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問題将来还会长久爭論的。但柯瓦列夫斯基认定，塔西佗所描述的状况，不是以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为前提的；只是过了很久，由于

① 以下直到“在凱撒时期，一部分德意志人……”（見本卷第161頁）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70—71頁。——編者注

人口增加，农村公社才从这种家庭公社中发展起来。

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在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村落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像一个共同的马尔克一样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块土地，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荒蕪。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是很多的，因之，任何争夺土地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新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分配，这一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和沼地依然是公共的。

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已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较之以前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见解，能更好地解释资料，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 *Codex Laurehamensis*¹⁶⁷，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解释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解决；但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

在凯撒时期，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

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步。他们居住在木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林中居民的衣服：粗糙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贵人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¹⁶⁸（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凯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货币很少使用，数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货币。他们不制造金银装饰品，也不重视这些。铁是很少见的，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似乎主要靠输入，而不是自行开采的。鲁恩文字是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的，仅仅用作暗号，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作祭品的做法还在流行。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刚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极为容易，因而其金属业和纺织业的独立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毫无疑问建立起了这样的工业。在什列斯维希沼地所发现的武器——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和二世末的罗马铸币一起——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这些东西即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是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的。向文明的罗马帝国的迁徙，使这种独立发展起来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拿青铜手镯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阿速夫海沿岸发现的青铜手镯，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镯同出于一个作坊，但它们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

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到处都有氏族首长（principes）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

而比較重大的事情則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在野蛮时代低級阶段上，至少在我們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氏族才有人民大会，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沒有的。氏族首长 (principes) 和軍事首領 (duces) 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首长已經部分地靠部落成員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他們——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出的；向父权制的过渡，像在希腊和羅馬一样，使官职由选举逐渐变为世襲，从而促进了各氏族中貴族家庭的产生。这种古代的所謂部落貴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或在它以后不久便消灭了。軍事首长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与世系无关。他們的权力很小，必須以自己的榜样来影响別人；至于軍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說，是握在祭司們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王或部落长是大会主席；决定由人民来作；怨声表示反对，喝采、敲打武器表示贊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訴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和反自然的淫行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首长为主席的全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首长只能是訴訟的領導者和审問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拘何时何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

部落联盟从凱撒时代起就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已經有了王；最高軍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羅馬人中間一样，已經图謀夺取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但这种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絕對的統治者；不过他們已經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鎖了。被释放的奴隶一般是处于低微地位的，因为他們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的手下，他們当中的受到寵幸的人却往往获得高官、財富和荣

誉。羅馬帝国被征服以后，在成了大国国王的軍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在法兰克人中間，国王的奴隶和被释放者，起初在宮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貴族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們当中产生的。

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制度。我們在美洲紅种人中間就已經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进行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間，已經成为經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軍事首領，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他們对他个人必須效忠，而他對他們亦然。首領养活他們，奖賞他們，并且按等級制来組織他們；对于小規模的征战，他們充当卫队和战斗預备队；对于大規模的征战，他們是現成的軍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在意大利奧多亚克麾下所表現的那樣，但是他們仍然包含着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萌芽；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們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們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經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搶劫，才能把他們糾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領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他的队伍帶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組成的輔助軍，在羅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輔助軍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編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詛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經初具雛形。在羅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們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羅馬人出身的宮廷奴僕一起，成了后来的貴族的第二个主要組成部分。

由此可見，一般說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

中，也有过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只要社会一超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

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据塔西佗說，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們从凱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萊茵河左岸的烏济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內，共为 18 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約有 10 万人^①，这已經大大超过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易洛魁人不到 2 万人，但已成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果我們根据現有材料，把萊茵河附近定居的比較著名的民族的位置在地图上画出来，那末每一个这样的民族所占的面积平均約等于普魯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約为 1 万平方公里，或 182 平方地理里。但是，羅馬人的 *Germania Magna* [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維斯拉河为止，占有依整数計共 5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人口为 10 万人，那末整个 *Germania Magna* 的人口总数，应达 500 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來說，这是一个很大的

① 这里所举的数字，在狄奥多洛斯关于高卢的克尔特人的一节文字中可以得到证实。他說：“在高卢住着人口不等的許多民族，其中最大者，人口約为 20 万人，最小者約为 5 万人。”（*Diodorus Siculus*, V, 25.）因而，平均起来是 125 000 人；各个高卢民族，由于其发展程度較高，所以人口一定比德意志人多一些。

数目,虽然就今日的条件——一平方公里 10 人,或一平方地理里 550 人——来说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喀尔巴阡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以及其他的人,——它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基本集团¹⁶⁹,而这些在公元前一百八十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柏修斯作过雇佣兵的部落,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 100 万人,那末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数目,就至少有 600 万了。

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长的;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什列斯维希沼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硬币来判断,是属于三世纪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商务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綫,从北海起到黑海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直接证明。斗争持续了三百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基本部分(斯堪的那维亚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东南推进,形成了漫长的进攻綫的左翼;进攻綫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奥南人),向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现今所谓法兰克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的任务,就落在印格伏南人身上。到五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

在这一文明的坟墓旁边了。羅馬的世界霸权的创子，创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經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語未予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語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訛誤百出的拉丁語；一切民族差別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諾里克人都不再存在，他們都变成羅馬人了。羅馬的行政和羅馬法到处都摧毀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毀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殘余。新賜予的羅馬公民权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現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現。新民族〔neue Nationen〕的要素到处都已具备；各行省的拉丁方言日益分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結成新民族〔neue Nation〕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說創造力了。对于广大領土上的广大人群來說，只有一个把他們联結起来的紐带，这就是羅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時間的推移却成了他們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摧毀了羅馬，羅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經不再是統治的了，已經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們現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利尔、米兰。羅馬国家变成了一架龐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稅捐、国家的差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淵；地方官、收稅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羅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結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內維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說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

社会状况也同样是絕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羅馬的統治已經建立在殘酷剝削被征服的各行省的基础上；帝制不但沒有消除这种剝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規。帝国越是走向沒落，稅捐和賦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統治着各民族的羅馬人的营生；只有在高利貸方面，他們才超过这些民族而空前絕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毀灭了；而殘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才有，不过，这一部分不在我們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貧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敗，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羅馬人的世界統治的最終結果。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門，現在它更是这样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Latifundien），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場，在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在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經營大規模的园艺业，——部分地为了滿足領主的奢侈生活，部分地为了在城市市場上出售。大牧場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却随着領主的貧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敗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經濟，已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規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現在小規模經營又成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了。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別租給繳納一定款項的世襲佃农，或者租給 *partiarum* [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們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或者仅仅九分之一，他們与其說是佃农，勿宁說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地却是租給隶农，他們每年繳納一定的款項，附着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

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被认为是自由人，他們不能和自由人通婚，他們相互間的婚姻也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是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做简单的同居（contubernium）。他們是中世紀农奴的前輩。

古代的奴隶制，已經过时了。無論在乡村的大規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場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經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因为銷售它的产品的市場已經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龐大的生产已收縮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納大量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用的奴隶，还存留在社会上。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却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不配由自由的羅馬人来做，而現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羅馬人了。因此，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贅的被释放的奴隶的数目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和貧困化的自由人（就像从前美国各蓄奴州的 poor whites〔白种貧民〕一样）的数目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沒有关系的。它在羅馬帝国和奴隶制和睦相处了好几世紀，以后也从来沒有阻碍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沒有阻碍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的买卖奴隶，也沒有阻碍过后世的买卖黑奴。^① 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視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羅馬世界便陷入了絕境：奴隶制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視。前者是已經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① 据克雷莫納的主教利烏特普朗德說，十世紀在凡尔登，也就是說，在神圣德意志帝国，制造閹人成了一个主要的行业，因为把这些閹人輸入西班牙，供摩尔人的后宮使用，可获厚利。¹⁷⁰

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打破这种绝境。

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关于高卢的为最多。在这里，与隶农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农。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粗暴蹂躏，他们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护；不仅农民个人这样做，而且整个公社也这样做，以致四世纪的皇帝们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寻求保护的人这样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转让给给他，而他则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这也就是神圣的教会所注意到，并且在九和十世纪竭力用来扩张神的统治和教会地产的诡计。诚然，在那个时候，即公元475年左右，马赛的主教萨耳维安还愤怒地反对这种掠夺，说罗马官吏和大地主的压迫已经达到不可忍受的地步，以致许多“罗马人”纷纷逃往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罗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罗马统治之下。¹⁷¹那时常常发生父母因贫穷而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的事情，为禁止这种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就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来自己分配。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比较少，所以有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而是部分地归全体人民所有，部分地归各个部落和氏族所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为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场没有分配而共同使用；这种使用，以及所分得的耕地的耕种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俗和全体的

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愈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愈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愈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其成员间原先的亲属关系的痕迹还往往是很显著的。这样，至少在马尔克公社保存下来了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斯堪的那维亚，——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

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关系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末，这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Volk〕内因征服而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规模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加以组织。但是，它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部分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只有另一种国家才能胜任。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

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撒利法兰克人不仅完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还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

配給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別是全部較大的森林地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軍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財產变为王室的財產，从人民方面把它盜窃过来而以礼物或恩賜的方式分給他的扈从队。这种起初由他的私人扈从以及其余的下級軍事首长組成的扈从队，不久就膨脹了起来，这不仅由于其中补入了羅馬人即羅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羅曼口語、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而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了的人，而且还由于，其中也补入了奴隶、农奴和被释放的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宮廷，他就从他們中間挑选自己的寵幸者。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作为礼物送給他們，后来就以采邑的方式賜給他們——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逝世时为止。¹⁷² 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貴族的基础。

不仅如此。由于国家幅員广闊，所以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的工具来管理了；氏族首长議事会即使沒有老早消失，也已經不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繼續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愈来愈变成純粹是下級軍事首长和新貴人的會議。正如从前共和制末期羅馬的农民一样，法兰克的人民大众，即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也由于連年內战和征服战争、特別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憊不堪和彻底破产了。这种起初构成全部軍隊，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軍隊核心的农民，到九世紀之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以前由国王直接召集的自由农民的自卫軍，現在已經由新貴人的家僕所組成的軍隊代替。在这些家僕中，还有一些依附农民，他們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国王而不知有其他主人，而更早一点

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国王的农民的后裔。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贵人的相应的跋扈（在这种贵人之中还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图把自己的职位变成世袭的郡守¹⁷³），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查理大帝死后五十年，法兰克王国便软弱地伏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四百年前罗马帝国伏在法兰克人的脚下一样。

不仅从无力抵御外敌来说是这样，而且从内部社会的秩序（不如说是社会的无秩序）来说，差不多也是这样。自由的法兰克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先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的他们，不得不去乞求新贵人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王的权力太弱了，已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像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经常变化的租佃形式——不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经过几代之后，他们大多数都变成了农奴。自由农民等级消灭得多么迅速，这从伊尔米农所编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当时在巴黎附近，现在在巴黎市内）的地产登记册¹⁷⁴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个修道院的地产散布四周，面积极为广大。还在查理大帝在世的时候，就住有2788户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兰克人。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半农奴，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保护人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归他所有，然后再将这块土地交给农民终身使用，这个曾被萨耳维安宣布为背神行为的习俗，如今到处被教会施加在农民身上了。现在日益盛行的徭役，

其原型既是羅馬的安加利，即为国家所服的强制劳役¹⁷⁵，又是德意志馬尔克公社成員为修桥、筑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的工役。这样一来，广大民众在过了四百年以后好像完全又回到他們原来的状况上去了。

然而，这不过证明：第一，沒落时期羅馬帝国的社会分化和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四百年間，并没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样的必然性重新产生了同样的财产分配和同样的居民阶级。在羅馬帝国存在的最后数百年間，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統治，而在德意志人統治地位的最初数百年間，也没有恢复这一統治。这是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为前提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占統治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农。要把使用奴隶劳动的羅馬大庄园經濟或使用徭役的新的大規模經營嫁接在这种社会上是多么不可能，这可以从查理大帝的規模龐大的然而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有名的皇室田庄的实验中得到证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继续了这种实验，也只是对修道院說来这种試驗才有一些成效；但是修道院乃是以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正常的社会組織；它們可能会有例外的成績，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不是一个例外。

但在这四百年間，毕竟是前进了一步。即使我們在这一时期的末尾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毕竟已經不同了。古代的奴隶制已經消失了；破产的、貧穷的、視劳动为奴隶賤事的自由人也已經消失。介于羅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間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正在灭亡中的羅馬国粹，它的“无益的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經死亡并且被埋葬了。九世紀的社会

階級，不是在垂死的文明的衰亡中，而是在新文明誕生的陣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無論是主人還是僕從，跟他們的羅馬前輩比較起來，已經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權勢的地主和服勞役的農民之間的關係，對羅馬人來說曾經是古代世界毫無出路的沒落形式，現在對新的世代來說成了新的發展的起點。其次，不論這四百年看起來多么像白白度過，可是卻留下了一個重大的成果：這就是一些現代的民族〔*moderne Nationalitäten*〕，亦即西歐人類為了未來的歷史而實現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組合。德意志人確實重新使歐洲有了生氣，因此，日耳曼時期的國家破壞過程才不是以諾曼-薩拉秦人的征服而告終，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護關係（依附制度¹⁷⁶）的進一步發展為封建制度而告終，而人口也有了這樣巨大的增長，以致能夠完好無恙地經受了不到二百年後的十字軍遠征的大流血。^①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麼靈丹妙藥，給垂死的歐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們的沙文主義的歷史著作所虛構的那樣，德意志種族天生有一種特別的魔力呢？決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當時，是一個天資高的雅利安部落，並且正處在充滿生命力的發展中。但是使歐洲返老還童的，並不是他們的特殊的民族特點，而只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制度而已。

他們的個人才能和勇敢，他們的愛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總之，是羅馬人所喪失的一切品質，——只有這些品質才能從羅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了新的國家，養成了新的民族〔*neue Nationalitäten*〕——所有這一切，如果不是高級階段野蠻人的特徵，如果不是他們的氏族制度的果實，又

① 從“而人口也有了這樣巨大的增長”起直至句末，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是什么呢？

如果說，德意志人改革了一夫一妻制的古代形式，緩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統治，給了妇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时期都更高的地位，那末，使他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蛮状态、他們的氏族习惯，如果不是他們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遺风，又是什么呢？

如果說，他們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以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帶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階級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紀农奴制的最殘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結和抵抗的手段，而这两种东西無論在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階級那里都沒有这样現成，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蛮状态、如果不是他們的純粹野蛮人的按氏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說，他們能把那种在他們的故乡已經实行的比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羅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轉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提高到普及的地位，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立叶最早指出的¹⁷⁷，給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階級而逐漸获得解放的手段(*fournit aux cultivateurs des moyens d'affranchissement collectif et progressif*^①)，因此之故，这种形式大大胜过于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經過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沒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紀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階級而逐漸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們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們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沒有达到

① 給土地耕种者提供了一个获得集体和逐漸解放的手段。——編者注

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所努力达到并已经达到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

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我們已經根据希腊人、羅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討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們来研究一下那在野蛮时代高級阶段已經破坏了氏族社会組織，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出現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經濟条件。在这里，馬克思的“資本論”对我們來說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級阶段发生，在高級阶段繼續发展起来，就我們所有的資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級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現在我們就从这一阶段开始。

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紅种人为例；在这一阶段上，我們发现了已經充分发展的氏族制度。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两个^①；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儿氏族，对这些女儿氏族來說，母亲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們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联盟至少在个别場合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这种簡單的組織，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完全适应的。它无非是这些社会条件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結構；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組織

① “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 1891 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权利和义务之间还没有任何差别；参加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社会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是比较稠密的，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其中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①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这样，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的虚伪的法律根据。

^① 特别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见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在沙罗特皇后群岛上的海达人部落中，还有700口人聚居为一家。在努特卡人中间，常常是整个部落聚居为一家。

*Максим Колосовский
из Ленинграда 1927 г. от автора.*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ß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von

Friedrich Engels.

Vierte Auflage.
Gesetz und Verordnungen.



Stuttgart
Verlag von J. G. M. Dietz
1892.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的扉頁

但是，人并不是到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取；但已经驯服的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以至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是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导致暂时的分工。例如，在许多地方，都发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不可置疑的遗迹；在这种作坊中发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大概是靠全体和为全体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终身手艺人至今仍然如此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是一种例外的现象。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①的时候，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

^① 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Sondereigentum»），而是“私有财产”（«Privateigentum»）。——编者注

句話，牲畜獲得了貨幣的職能，在這個階段上就已經當貨幣用了。在商品交換剛剛產生的時候，對貨幣商品的需求，就以這樣的必然性和速度發展起來了。

園圃種植業大概是野蠻低級階段的亞洲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裡作為農田耕作的先驅而出現不遲於中級階段。在圖蘭平原的氣候條件下，沒有供漫長而嚴寒的冬季用的飼料儲備，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種植，在這裡就成了必要條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為家畜飼料而種植，它很快也成了人類的美食。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財產，最初是交給氏族使用，後來由氏族交給家庭公社使用，最後^①便交給個人使用；他們對耕地或許有一定的占有權，但是更多的權利是沒有的。

在這一階段工業的成就中，特別重要的有兩種。第一是織布機；第二是礦石冶煉和金屬加工。銅、錫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銅是頂頂重要的金屬；青銅可以製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並不能排擠掉石器；這一點只有鐵才能做到，而當時還不知道冶鐵。金和銀已開始用於手飾和裝飾，其價值肯定已比銅和青銅高。

一切部門——畜牧業、農業、家庭手工業——中生產的增加，使人的勞動力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同時，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個體家庭的每個成員所擔負的每日的勞動量。吸收新的勞動力成為人們嚮往的事情了。戰爭提供了新的勞動力：俘虜被變成了奴隸。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在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使財富增加並且使生產場所擴大的同時，在既定的總的歷史條件下，必然地帶來了奴隸制。從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中，

^① “交給家庭公社使用，最後”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編者注

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在家庭中便发生了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加它的消费，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和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而妇女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仍然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

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随着男子在家庭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定下来,并且永久化了。但这样一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

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不仅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而且在1066年的海斯丁斯会战中都还使用石斧。¹⁷⁸但是,进步现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间断地、更加迅速地进行着。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的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

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发达；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是铸造的货币，只是简单地按重量交换罢了。

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提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

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¹⁷⁹，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末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 * *

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有牲畜

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列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从而也就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进一步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发端，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较大规模的和较小规模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一直扩展到遥远的市场，从而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似乎最有用的居民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实际上非常有限的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愈来愈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愈来愈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不过，在我們正在考察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年輕的商人階級还絲毫沒有預感到它所面临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个階級正在形成并且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而这就够了。随着它，出現了金属貨幣即鑄币，随着金属貨幣就出現了非生产者統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隱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誰握有它，誰就統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誰首先握有了它呢？商人。对貨幣的崇拜掌握在他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他尽心竭力地叫人們知道，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應該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貨幣面前。他在实践上证明，其他一切財富形式，在这种財富本身的化身面前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以后貨幣的权力再也沒有像在它的这个青年时代那样，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橫暴的形式表現出来。在使用貨幣购买商品之后，出現了貨幣借貸，随着貨幣借貸出現了利息和高利貸。后世的立法，沒有一个像古雅典和古羅馬的立法那样殘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債務者投在高利貸債权者的脚下，——这两种立法，都是純粹由于經濟强制，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

除了表現为商品和奴隶的財富以外，除了貨幣財富以外，这时还出現了表現为地产的財富。各个人对于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給予他們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現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些小块土地作为世襲財產而属于他們了。他們最近首先力求實現的，正是要摆脱氏族公社索取这些小块土地的权利，这种权利對他們已成为桎梏了。这种桎梏他們是摆脱了，但是不久他們也失去了新的土地所有权。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毫无阻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

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纽带。这意味着什么,和土地私有权同时被发明出来的货币,向他做了说明。土地现在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所有权刚一确立,抵押制就被发明出来了(见关于雅典的一节)。像杂婚和卖淫紧紧跟着一夫一妻制而来一样,如今抵押制也紧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而来了。你们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权,现在你们得到它了——*tu l'as voulu, George Dandin!* [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乔治·唐丹!]^①

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既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旧的部落贵族不相符合,就把部落贵族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②,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样了。面对着没有它的参与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

① 莫里哀“乔治·唐丹”第一幕第九场。——编者注

② 雅典奴隶的人数见前第117页[见本卷第135页。——编者注]。在科林斯城全盛时代,奴隶的人数达46万人,在埃伊纳达47万人;在这两个地方奴隶的人数都等于自由民的十倍。

同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了起来，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间居住着。直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末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时常遭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可勉强进行。除了氏族团体有责任并且能够予以保证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生产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对立的。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但是，每一个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甚至还包括外地人在内；因此，这种机关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而在每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与氏族公社无关的居民，他们在国内已经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像罗马的情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被逐渐容纳到血缘亲属的氏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种闭关自守的享有特权的团体对抗着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产生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

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間連續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統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頂多容許阶级斗争在經濟領域內以所謂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經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毀。它被**国家**代替了。

* * *

前面我們已經分別研究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羅馬,氏族社会变成了閉关自守的貴族,貴族的四周則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沒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毀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貴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羅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間,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領土的直接結果而产生的,氏族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統治这样广闊的領土的。但是,由于同这种征服相联系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争,也不是更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同一經濟发展阶段,从而社会的經濟基础仍然和从前一样,所以,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馬尔克制度的形式,繼續存在几个世紀;甚至在以后的貴族氏族和城市望族的氏族中,甚至在农民的氏族中,例如在迪特馬尔申^①,还以削弱了的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

^① 对于氏族的本质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个历史学家**,是尼布尔,这应归功于他熟悉迪特馬尔申¹⁸⁰的氏族。但是他的錯誤也是直接由此而来的。

可見，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¹⁸¹勿宁說，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調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經濟利益互相冲突的階級，不致在无謂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駕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緩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和旧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由血緣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已經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們是以氏族成員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們已經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許公民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实现他們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們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組織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們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羅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組織的旧办法以前，曾經需要进行多么頑强而长久的斗争。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設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組織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階級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組織已經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括在居民以内；9万雅典公民，对于365 000 奴隶來說，只是一个特权階級。雅典民主制的国民軍，是一种貴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

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僻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已经有不少故事可讲了。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国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衣不蔽体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

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等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这也表现在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上面。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

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愈增长，股份公司愈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愈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愈容易实现。除了美国以外，最新的法兰西共和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甚至一本正经的瑞士，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份贡献。不过，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国，除英国以外，新德意志帝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很难说普选制究竟是把谁抬得更高些，是把俾斯麦还是把布莱希勒德。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

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階級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組織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陈列在一起。

* * *

所以，根据以上所述，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結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費也归結为产品在較大或較小的共产制公社內部的直接分配。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內实现的，但是它的伴侶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們知道，产品的結局将是怎样：他們把产品消費掉，产品不离开他們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們来說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經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規則，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間的交換，——这是如何发生的，我們前面已經探討过了。商品生产逐漸地成了統治的形式。

随着商品生产，即不是为了自己消費而是为了交換的生产的出現，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換的时候交出自已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結局将会怎样。当貨幣以及随貨幣而来的商人作为

生产者之间的中介人插进来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种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和认识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在这个生产形式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力量，终究是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在较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着多久就又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

变为奴隶，人力^①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一夫一妻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②；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

^① 在1884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劳动力”。——编者注

^② 拉萨尔的“既得权体系”¹⁸²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命题：罗马的

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是这样就不可获得罢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末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遗嘱制同罗马本身一样古老，以致在罗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遗嘱制的时代”，遗嘱制勿宁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期从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年黑格尔派，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伸出罗马的法权规范，从而便得出了上述的完全违反历史的论断。这在该书不足为奇的，因为该书根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在罗马的继承制中财产的转移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法学家，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远。

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也应该是好的。所以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举行叛乱，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①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末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

^① 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作这个工作了。现在我只想指出，傅立叶已经把一夫一妻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做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刻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 (les familles incohérentes) 是一种经济单位。

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社會的分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着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摩爾根“古代社會”第552頁）¹⁸³

卡·馬克思“僱傭劳动与資本”一書 一八八四年单行本前言¹⁸⁴

这部著作最初問世是在 1849 年，从 4 月 4 日起以社論的形式陸續发表在“新萊茵报”上。它的基础是 1847 年馬克思在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¹⁸⁵做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在报纸上没有載完；虽然在第 269 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續”字样，但这个諾言并未执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勒斯頓、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巴登等地发生起义——使报纸本身被查封了（1849 年 5 月 19 日）。

写于 1884 年 6 月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84 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卡尔·馬克思的小册子“僱傭劳动与資本”

俄文是按 1891 年版本譯的

馬克思和洛貝爾图斯

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¹⁸⁶

本书是 1846 年到 1847 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馬克思已經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經濟观的基本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魯东“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¹⁸⁷ 一书，使他有機會發揮这些基本点，以同这个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間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見解对立。自从他們两人在巴黎常常終夜爭論經濟問題以来，他們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魯东的著作证明，兩人之間現在已經橫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鴻沟；置之不理在當時已經不可能了；所以，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

馬克思对蒲魯东的总的評价，可以在这篇序言后面的那篇于 1865 年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17 和 18 号上发表的文章里¹⁸⁸ 看到。这是馬克思为該报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馮·施韦泽先生把那家报纸引上封建的、政府的軌道的企图暴露了，这迫使我們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为該报撰稿。¹⁸⁹

对于德国，本书恰恰在現在这个时候具有馬克思本人从来也料想不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他向蒲魯东开火，却命中了他当时連姓名都不知道的今日的利祿之徒的神灵洛貝爾图斯呢？

这里不是詳談馬克思同洛貝爾图斯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

很快就有机会来做的。¹⁹⁰ 这里只想指出，洛貝爾圖斯指責馬克思“剽窃”他、“在自己的‘資本論’中不指明出处大量利用了”¹⁹¹ 他的“認識”¹⁹² 一书，这样的指責是因热狂而进行誹謗。这种誹謗只能解释为这位无人賞識的天才十分煩惱，和他对普魯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經濟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馬克思既沒有看到这个指責，也沒有看到洛貝爾圖斯的上述著作；关于洛貝爾圖斯，他所知道的，总共只有那三封“社会問題书簡”¹⁹³，而且就連这些也决不是在 1858 年或 1859 年以前知道的。

洛貝爾圖斯更有理由地宣称，在这些信里，他早在蒲魯东之前就已經发现了“蒲魯东的构成价值”¹⁹⁴；当然他在这里是再度錯誤地自炫为第一个发现者。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他在我們这本书里也一起受到了批判，而这就使我必须簡略地分析一下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經濟状况的認識”这本“創业的”小书(1842)，因为这本小书除了(又是不自觉地)包含着魏特林式的共产主义之外还預先披露了蒲魯东的見解。

現代社会主义，不論哪一派，只要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出发，几乎沒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論相銜接。李嘉图在 1817 年他的“原理”¹⁹⁵ 中，一开头就提出两个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資本家（利潤）和工人（工資）这三个階級之間。在英国，早在 1821 年，就已經从这两个原理中做出了社会主义的結論¹⁹⁶，并且有一部分提得这样尖銳和这样果斷，使得那些現在几乎完全被忘記了的、很大一部分靠馬克思才再次发现的文献，在“資本論”出版以前，一直是不可超越的东西。这些情况改次再談吧。所以，如果說洛貝爾圖斯自己在 1842 年从

上述原理引出了社會主義的結論，那對於一個德國人來說在當時肯定是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是在德國才算一個新發現。馬克思在批判有類似妄想的蒲魯東時已經證明，這樣應用李嘉圖的理論是毫不新奇的。

“只要對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有一點點了解，就不會不知道，這個國家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在各個不同時候幾乎都提倡過**平均主義地**（即社會主義地）應用李嘉圖的理論。我們可以給蒲魯東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經濟學’（1827年版），威廉·湯普遜的‘為人類謀取最大福祉的財富分配原則’（1824年版），托·婁·艾德門茲的‘實踐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經濟學’（1828年版）等等，這一類的著作的名稱還可以寫上四頁。現在我們且來聽聽一位英國共產主義者布雷先生是怎麼說的。這裡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勞動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中最重要的一段話。”¹⁹⁷ 單單這裡從布雷的著作中引出的幾段話，就把洛貝爾圖斯要求的優先權取消了很大一部分。

那時候，馬克思還從來沒有到過不列顛博物館的閱覽室。除了巴黎和布魯塞爾圖書館的書籍，除了我的書籍和札記以外，他只是在我們於1845年夏天一起到英國作六星期的旅行的時候，瀏覽了曼徹斯特可以找到的書籍。可見，上述的書籍在四十年代並不像現在這樣難找到。如果說，儘管這樣，洛貝爾圖斯始終不知道有這些書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魯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魯士所特有的社會主義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現在也終於被公認為這樣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愛的普魯士，洛貝爾圖斯也不是一直都很安寧的。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

冊”¹⁹⁸。其中，在第 40 頁上從經濟學家對李嘉圖提出的種種非難中舉出了下述第二個責難：

“如果一個產品的交換價值等於它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一個勞動日的交換價值就等於一個勞動日的產品。換句話說，工資應當等於勞動的產品。但是實際情形恰好相反。”馬克思對此加了下面的注釋：“經濟學家^①對李嘉圖的這種非難，後來被社會主義者抓住了。他們假定這個公式在理論上是正確的，責備實際與理論相矛盾，要求資產階級社會在實踐中貫徹它的理論原則的臆想的結論。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至少就是這樣把李嘉圖的交換價值公式倒轉過來反對政治經濟學。”¹⁹⁹ 在同一个注釋里提到了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這本書當時在哪一個書店里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貝爾圖斯有充分機會來親自確定，他的 1842 年的發現究竟是不是新的。他不這樣做，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發現，簡直把這點看成是舉世無雙的，以致根本想不到，馬克思也能像他洛貝爾圖斯一樣，獨自從李嘉圖的理論中引出自己的結論。決不可能！馬克思“剽竊”了他，——然而正是這個馬克思向他提供過一切機會來讓他確信，這些結論早在他們兩人之前很久，至少是以洛貝爾圖斯還保持著的那種粗糙形式，在英國已經有人說到了！

上面說的就是李嘉圖理論的最簡單的社會主義的應用。這樣應用的結果，在很多情況下都產生了李嘉圖望塵莫及的對於剩餘價值的起源和本質的認識；洛貝爾圖斯也是其中的一個。先不說他在这方面除了別人早已說過，並且說得至少是同樣好的以外，什麼也沒有提供；他的敘述還犯了同他的前輩一樣的毛病，——把勞

① 馬克思寫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編者注

動、資本、價值等等經濟學範疇，按經濟學家們傳授給他的那種粗糙的、只看表面現象的樣子盲目地接受下來，而不研究它們的內容。這樣一來，他就不僅切斷了自己一切進一步發展的道路，——同馬克思相反，馬克思是第一個從這幾條六十四年來被反復背誦的原理中得出一些東西的人，——而且為自己开辟了通向烏托邦的大道，這一點我們就會看到。

李嘉圖理論的上述應用，——認為全部社會產品，即工人的產品屬於唯一的、真正的生產者，即工人，——直接引導到共產主義。但是，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這種應用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因為這只不過是把道德運用於經濟學而已。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規律，產品的絕大部分不是屬於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如果我們說：這是不公平的，不應該這樣，那末這句話同經濟學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們不過是說，這些經濟事實同我們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馬克思從來不把他的共產主義要求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的、我們眼見一天甚於一天的崩潰上；他只說了剩餘價值由無酬勞動構成這個簡單的事實。但是，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在世界歷史上卻可以是正確的。如果群眾的道德意識宣布某一經濟事實，如當年的奴隸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這就證明這一經濟事實本身已經過時，其他經濟事實已經出現，因而原來的事實已經變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維持了。因此，在經濟學的形式上的謬誤後面，可能隱藏着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不過這裡不是詳細探討剩餘價值理論的意義和歷史的地方。

除此以外，從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中還可以引出別的結論，而且這一點已經做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決

定的。但是，情况却是，在这个可恶的世界上，商品的出售时而高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并且这还不只是竞争引起的波动所产生的结果。利润率也具有一种对所有资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势，正如商品价格具有借供求关系把自己恢复到劳动价值的趋势一样。但是，利润率是按照投入一个工业企业的总资本来计算的。由于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年产品可以体现出同样的劳动量，因而代表同等价值，两部门的工资又同样高，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预付资本可以并且常常是另一个生产部门的两倍或三倍，这里，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就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矛盾了，这一点李嘉图本人已经发现。如果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利润率就不可能是平均的，如果利润率平均了，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就不能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两个经济规律的矛盾，两个经济规律的二律背反；这个矛盾的实际解决，照李嘉图的说法（第1章第4节和第5节²⁰⁰），占上风的照例是利润率而不是价值。

李嘉图的价值定义，尽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善良的资产者喜爱和珍贵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善良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界的邪恶而感到自己最高尚的感情深受伤害，这个世界，虽然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但是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在肆无

忌憚地拋棄公平原則。特別是小資產者，他們的誠實勞動——即使只是他的幫工和學徒的勞動——在大生產和機器的競爭下天天跌價，特別是小生產者，必然會迫切希望有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產品按它的勞動價值來交換終於成為完全的毫無例外的真理，換句話說，他們必然迫切希望有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里只有商品生產的一個規律絕對地不折不扣地發生作用，而唯一能夠保證這條規律發生作用的那些條件，即商品生產以至資本主義生產的其他規律都排除了。

這種空想在現代小資產者（現實的或精神的）的思想中是多麼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實就可證明：這種空想早在1831年已經由約翰·格雷系統地發揮過²⁰¹；在三十年代，英國還在實際上試辦並在理論上宣揚過；1842年洛貝爾圖斯在德國，1846年蒲魯東在法國，都把它宣布為最新真理；1871年洛貝爾圖斯再次把它宣稱為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並當做他的社會遺囑²⁰²；1884年，它又在—群利祿之徒中間找到了信徒，這些人以信奉洛貝爾圖斯為名，準備借普魯士國家社會主義謀取一己的私利。²⁰³

馬克思不論在反對蒲魯東還是在反對格雷（見本書附錄²⁰⁴）的時候，都極其透徹地批判了這種空想，因此，我在這裡只就洛貝爾圖斯所特有的對這種空想的論證和描繪的形式發表幾點意見。

前面已經說過，洛貝爾圖斯把經濟學概念的傳統的定義完全按照經濟學家所傳授給他的樣子接受了下來。他絲毫沒有想到要加以研究。他認為，價值是

“一物同另一物相比在數量上的值，而這個值被理解為尺度”²⁰⁵。

這個說得輕一點也是非常模糊的定義，至多告訴我們價值大

致像个什么样子，却决沒有說出它是什么。可是，洛貝爾圖斯关于价值能向我們說的全在这里了，可見，他是在寻求一个处于价值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瓦格納先生称贊不已的抽象思維能力²⁰⁶，以三十頁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乱七八糟地攪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結論說：真正的价值尺度并不存在，我們必須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滿足。劳动可以充当这种代用的尺度，但是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用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时才是这样，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或者由于采取了措施”²⁰⁷才保证是这样。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們解释商品的代价“是劳动”，而且仅仅是劳动，以及为什么是劳动，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是沒有任何实际联系的。

劳动也是按照經濟學家們那里的样子被盲目地接受下来的。不仅如此，洛貝爾圖斯虽然也用两句話提到了劳动强度的差别，但是劳动还是非常籠統地当做“成为代价的东西”，从而也就是衡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問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付出的。生产者为了生产一天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費了十天，还是只費一天，他們用的工具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他們的劳动时间是耗費在生产社会必需的物品和生产社会需要的数量上，还是耗費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或者虽然需要但却在数量上是多于需要还是少于需要，——对于所有这些却一字不提，只是說：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須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在其他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貝爾圖斯总还随时准备站在全国观点上，从社会了望台的高处俯瞰单个生产者之間的关系，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做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自己那本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駛向劳动貨幣的烏托邦，而对劳动

的創造价值的特点进行的任何研究，都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法通过的礁石。在这里他的本能比他的抽象思維能力强得多，——順便說說，在洛貝爾圖斯那里，抽象思維能力只是通过最具体的思想空虛才揭示出来的。

过渡到烏托邦的事，一揮手之間就完成了。为保证按劳动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成为毫无例外的常規而采取的“措施”，沒有引起任何困难。这一派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魯东，都煞費苦心地揣摩过用什么社会机构来实现这个目的。他們至少是設法通过經濟途徑，通过进行交换的商品所有者本身的活动，来解决經濟問題。洛貝爾圖斯却解决得輕便多了。他作为一个道地的普魯士人，求助于国家：国家政权的一道命令就能实行这个改革。

这样一来，价值就幸运地被“規定”了，但是，这絕對沒有規定出洛貝爾圖斯痴心妄想的对这規定的首創权。相反，格雷和布雷以及其他許多人早在洛貝爾圖斯以前很久，就令人生厌地反复表示过同样的思想：他們一心希望有一些措施能使产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只按它們的劳动价值相互交换。

国家这样規定了价值——至少是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因为洛貝爾圖斯也是有分寸的，——之后，就发行它的劳动紙币，預支給工业資本家，工业資本家用它給工人发工資，工人再用他們得到的劳动紙币购买产品，于是劳动紙币又流回它的出发点。这进行得多么奇妙，我們應該听听洛貝爾圖斯本人說的話：

“至于第二个条件，那末，要使票券上注明的价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件产品的人才能取得一张精确标明生产那件产品的劳动量的票券。誰交出了一个两天劳动的产品，誰就取得一张标明‘两天’的票券。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規則来发行票券，第二个条件也一定能实现。

因为照我們的假定，貨物的真正价值总是同制造这个貨物所耗費的劳动量一致的，而这个劳动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計时单位，所以无论誰交出一件耗費两天劳动的产品，得到注明两天的票券，这表明或者证明的不多不少恰恰是同他实际交出的一样的价值，——并且，因为**只有真正把一件产品投入流通的人，才能取得一个这样的证明**，所以，毫无疑问，票券上注明的价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滿足社会的要求。不論我們把分工的范围想像得多么广闊，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規則，**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总额必定恰恰等于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可是因为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恰恰等于被证明的价值总额，所以**后者也必然会与实际存在的价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滿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第 166—167 頁)

如果說，洛貝爾圖斯以前的不幸是他的新发现总是来得太迟，那末，这一次他至少在一种独创性上建立了功勋：在他的竞争者中间还找不到一个人敢于以这样幼稚天真、透彻明淨、可以說道地的波美拉尼亚形式說出关于劳动貨幣烏托邦的痴話。既然对于每一张票券都提供了一个相应的价值对象，而且没有一个价值对象不是取得一张相应的票券而交出的，所以，票券上的总额必然总是同价值对象的总额相抵，計算下来連一絲一毫余额也沒有，一秒钟劳动都不差，連資格再老的国庫出納处的會計也不能找出絲毫計算上的差錯。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在現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工业資本家都是完全由自己負責进行生产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随他的意。但是，对他說来，社会需要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是所需要的对象的质量、品种，还是它們的数量，都是这样。今天还不能充分迅速供应的东西，明天可能供应得大大超过需要。尽管如此，需要毕竟是这样那样地好坏得到了滿足，而总的說来生产的毕竟也是需要的东西。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通过竞争解决的。竞争又怎样

解決問題的呢？非常簡單：凡是品種、數量不符合當前社會需要的商品，競爭就使它們的價格落到它們的勞動價值之下，通過這種曲折的途徑，使生產者感覺到，他們或者是生產了根本不需要的東西，或者東西本身雖然需要，但生產的數量已經超過需要、成為多餘的了。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商品價格對商品價值的不斷背離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只有在這個條件下並由於這個條件，商品價值才能存在。只有通過競爭的波動從而通過商品價格的波動，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才能得到貫徹，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這一點才能成為現實。因此，價值的表現形式——價格，通常看來同它所表現的價值多少有些不同，這種命運是價值和大多數社會關係所共同的。國王和他所代表的王國在大多數場合下看來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一個進行交換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如果誰想把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這一點確立起來，而又禁止競爭用加壓力於價格的辦法，即一般說來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來確立這種對價值的決定，那就不過是證明，至少在這方面，他採取了空想主義者慣有的輕視經濟規律的態度。

第二、競爭使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在進行交換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發生作用，從而也就使得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社會生產組織和制度得以實現。單個的商品生產者只有通過產品的跌價和漲價才親眼看到社會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是，洛貝爾图斯等人代表著的那種空想卻恰恰要廢除這個唯一的調節者。如果這時我們問，我們有什麼保證，能使每種產品都生產必要的數量而不是過多，能使我們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類，同時卻窒息在甜菜糖堆里和淹死在馬鈴薯酒里，能使我們不致一面裸

着身体沒有褲子穿，同时却有千千万万褲子鈕扣滾滾而来，——那末，洛貝爾圖斯就会得意洋洋地把他那本漂亮的賬指給我們看，按照这本賬，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銷不出去的酒、每一顆縫不到褲子上去的鈕扣，都发过正确無誤的票券，一切都严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滿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誰要是不信，可以去請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國庫出納处的會計 X，他审核过賬目，查明無誤，这个人在出納上从未出过差錯，完全可靠。

現在，我們再看看洛貝爾圖斯的又一个天真的表現——用他的空想消除工商业危机。从商品生产以世界市場的范围来进行之后，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們为之生产、却对其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是不了解的市場之間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場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①因此，如果禁止竞争通过价格的起落把世界市場情况告訴单个生产者，那他們就完全被蒙住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使生产者一点也不知道他們为之生产的市場的情况，——这的确是一个医治危机症的妙方，甚至艾曾巴尔特医生也会因此羡慕洛貝爾圖斯呢。

現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洛貝爾圖斯徑直用“劳动”来决定商品价值，頂多只提到了一下劳动的不同强度。如果他研究过劳动通过什么和怎样創造、从而决定价值并成为价值的尺度，他就会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論从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来說，还是从它对社会总的需求方面來說都是必要的劳动。这就

① 至少直到不久以前的情况还是这样。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場上的垄断由于法国、德国、特别是美国参加世界貿易而被打破以后，似乎有一种新的平衡形式在起作用。危机前的普遍繁荣时期一直没有到来。如果它永远不再出現，則經常的停滯加一些輕微的波动将成为現代工业的常态。

會使他遇到一個問題：單個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是怎樣適應社會的總的需求的；而同時他的整個烏托邦也就搞不成了。這一次，他的確是寧可“抽象”，亦即把問題的實質“抽象”掉。

現在，我們終於走到了一個地方，這裡洛貝爾圖斯真的向我們顯示了一些新鮮東西，一些把他同他的無數伙伴——勞動貨幣的交換經濟論者——區別開來的東西。那些人要求實行這種交換制度，目的是要廢除資本對僱傭勞動的剝削。每個生產者應該取得他的產品的十足勞動價值。他們在這一點上，從格雷到蒲魯東，都是一致的。洛貝爾圖斯說，無論如何不能這樣。僱傭勞動和對僱傭勞動的剝削要保留下來。

第一、工人在任何可以設想的社會制度下都不能取得他的產品的全部價值以供消費；總存在許多在經濟上是非生產性的，但又是必要的職能，它們的費用要從生產出來的基金中開支，而有關人員的生活費用也要從中開支。——這一點，只有在現在這種分工還起作用的時候才是正確的。在一個普遍有義務參加生產勞動的社會中——這樣的社會也是“可以設想的”啊——這種情況就會消失。但是，社會儲備和積累基金的必要性總還是存在的，因此，到了那時，雖然這些工人即所有的人都將占有和享受他們的全部產品，但每一個單個的人也還不會享受到他的“十足的勞動收入”。對於從勞動產品中拿出一部分來維持經濟上非生產性的職能這一點，其他的勞動貨幣空想家也沒有忽視。不過，他們是讓工人為這個目的通過一般的民主途徑向自己徵稅，而洛貝爾圖斯則相反，他的 1842 年的全部社會改革方案都是為當時的普魯士國家而安排的，把事情全部交給官僚去決定，由他們從上面規定工人應在自己的產品中分得多少並且把這一部分恩賜給工人。

第二、可是地租和利潤也應該不折不扣地保存下去。因為地主和工業資本家也從事了一定的，即使從經濟方面說是非生產性的、但是對社會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必需的活動，因此，他們以地租和利潤的形式得到一定的報酬，——顯然，這就是在 1842 年也根本不算什麼新論點。實在說，憑他們做的那一點事情，並且做得夠壞的，他們現在所得到的真是太多了，但是洛貝爾圖斯偏認為一個特權階級至少在今後五百年內還是必要的，所以，現在的剩餘價值率——為了表達確切，我用了這個說法——還應該繼續存在下去，不過不應該再提高。現在的剩餘價值率，洛貝爾圖斯假設為 200%，即工人在一天勞動十二小時以後得到的不是十二小時而是四小時的票券，其餘八小時生產的價值應當在地主和資本家之間分配。因此，洛貝爾圖斯的勞動券簡直是個騙局。只有波美拉尼亞的騎士領主才能設想，工人階級會同意為了四小時的票券而工作十二小時。如果把資本主義生產的戲法翻譯成這樣坦白的話，它就成為了赤裸裸的搶劫，那末，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了。發給工人的每一張票券就會變成直接教唆叛亂的東西，並且觸犯德意志帝國刑法典第一一〇條²⁰⁸。只有除了波美拉尼亞騎士領地上的實際上還處於半農奴地位的短工以外從沒有見過任何別的無產階級的人，——在那些領地上，棍子和鞭子當權，村里所有漂亮女人都歸入領主老爺的後宮，——才想得出這樣來侮辱工人。我們的保守派倒真是我們的最大的革命家。

不過，如果我們的工人非常溫順地讓人愚弄，以為辛苦勞動了整整十二個小時實際上只勞動了四個小時，那末他們在工資上就會得到一個保證：從此以後他們從自己產品中得到的份額永遠不會低於三分之一。這實際上是用孩子的喇叭吹出的未來的音樂，

根本不值一談。因此，如果說洛貝爾圖斯在勞動貨幣交換烏托邦方面有了什麼新貢獻，那末，這個新貢獻就是幼稚，遠遠落在他以前和以後無數同道的貢獻之下。

洛貝爾圖斯的“認識”一書，在出版的當時，無疑是一本重要的書。它對李嘉圖價值理論的繼續發展，在一個方向上是頗有希望的開端。儘管這一著作只是對他來說和對德國來說才是新東西，但是總的說來它還是同比他高明的英國先驅者們的著作處在同一個水平上。但這僅僅是一個開端，從這一點出發，只是通過尋根究底的、批判的、進一步的工作，才能在理論上有真正的收穫。但是，他一開頭也在第二個方向即烏托邦的方向上繼續發展李嘉圖的理論，從而切斷了自己上述發展的道路。於是他失去了一切批判的第一個條件——不抱偏見。他為事先確定的目標而全力以赴，成了一個有偏見的經濟學家。他一陷入自己的烏托邦的圈套，就斷絕了在科學上進步的一切可能。從1842年直到死去，他一直在兜圈子，老是重複他第一本書已經說過或暗示過的同一思想，他感到自己不被人所了解，在沒有東西可供剽竊的地方發覺被人剽竊，最後，並非無意地拒絕承認自己只是重新發現了實際上人家早已發現的東西。

譯文有些地方同已經出版的法文原文不同。這是以馬克思親筆的訂正為根據的，已經準備好的一個法文新版本中也做了這些訂正。²⁰⁹

本書用語同“資本論”不盡相同，例如這裡說的是作為商品的勞動 [*Arbeit*]、勞動的買賣，而不是勞動力 [*Arbeitskraft*]，看來這一點無須再提請注意了。

本版收入下列附录作为补充：（1）1859年柏林出版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中論述第一个，即約翰·格雷提出的劳动貨幣交換烏托邦的一段，（2）馬克思1848年在布魯塞爾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²¹⁰的譯文，这个演說和“哲學的貧困”属于著者的同一个发展时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4年10月23日于伦敦

載于1885年1月“新时代”杂志
第1期和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
版的卡尔·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2年
德文版本譯的

帝俄高級炸藥顧問²¹¹

大家知道，俄国政府使用一切手段要同西欧各国簽訂关于引渡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的協議。

大家也知道，这个政府首先需要同英国达成这样的協議。

最后，大家知道，俄国官方要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

于是，1885年1月13日俾斯麦同俄国簽訂協議，規定任何一个俄国政治流亡者，只要俄国随心所欲地控告他是可能的弑君犯或炸藥使用者，就應該被引渡。²¹²

1月15日奧里珈·諾維柯娃女士，就是那位在1877年和1878年土耳其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間为俄国的利益而非常出色地使高貴的格萊斯頓先生上了当的諾維柯娃女士，在“派尔-麦尔新聞”上发表了一篇对英国的呼吁书。²¹³ 呼吁书要求英国，再也不要容許加特曼、克魯泡特金及斯捷普尼亚克这样一些人在英国領土上进行“目的是在俄国杀害我們”的秘密活动，——現在炸藥轉眼就要在英国人自己的脚下爆炸了。俄国在对待俄国革命者的問題上要求于英国的，难道不正是英国自己在对待爱尔兰炸藥使用者問題上現在必須要求于美国的嗎？

1月24日早晨在伦敦公布了普俄協議。

而1月24日午后2时在一刻鐘之內伦敦就发生了三起炸藥爆炸，造成的損失比以前各次爆炸加在一起还要重大，至少伤了七

个人，又有消息說是十八个人。

这些爆炸发生得太巧了，使人不能不产生一个问题：这些爆炸对誰有好处？这些在其他方面毫无目的的爆炸，这些不是对付某一个人的、威胁性的爆炸（其受害者不仅有下級警官和資產者，而且有工人和他們的妻子儿女），究竟最合誰的利益呢？誰呢？是那些受尽英国政府殘酷折磨——特別是在被监禁期間——，并且被怀疑安放炸药的爱尔兰人呢？还是那个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施加特別的压力，以促使英国輿論对炸药使用者产生盲目狂怒，就不能达到自己目的——簽訂关于引渡的協議——的俄国政府呢？

当波兰流亡者——除极少数人以外——不愿意按照俄国外交和警察方面的希望伪造俄国紙币的时候，俄国政府曾經把包括樞密官卡緬斯基在內的代理人派到国外去慫恿流亡者这样干，当这样做也不成功的时候，卡緬斯基先生以及和他一伙的先生們就自己动手伪造起俄国紙币来了。所有这一切在亨·乔治 1875 年于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货币伪造者或俄国政府的代理人”²¹⁴ 中有詳細叙述。瑞士的、伦敦的，大概还有巴黎的警察，都能說出一些他們在追緝俄国的货币伪造者的时候，照例总是怎样碰到一些俄国使館坚决阻撓他們追緝的人。

俄国官方为了用毒药和匕首等等除掉妨碍它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巴尔干半島近百年的历史可以提供足够的实例。仅仅提出 1855 年在巴黎出版的埃利阿斯·雷尼奧的“多瑙河各公国史”²¹⁵ 这本著名的书就足够了。俄国外交机关經常掌握着各种各样的代理人，其中也有被利用来干各种卑鄙勾当，然后就被丢在一边的人。

因此，我暂时还没有根据来确定 1885 年 1 月 24 日伦敦的爆炸事件是俄国干的。炸药可能是爱尔兰人安放的，但更可能的是

他們按照俄國的主意和收受俄國的錢財而干出來的。

俄國革命者採取的鬥爭方式是由需要決定的，是由他們的敵人本身的行動決定的。他們為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對本國的人民和歷史負責。但是那些沒有必要在西歐像小學生那樣學步這種鬥爭的先生們，却竭力把革命弄到施因德漢斯的水平，他們的槍甚至不是用來對付真正的敵人，而是對付一般公眾，——這些先生們絕對不是俄國革命的追隨者和同盟者，而是它的最凶惡的敵人。除俄國官方以外這些功績不合任何人的利益，這一點搞清楚以後，問題只在於：這些先生中間誰是俄國沙皇政府的不自主的代理人，而誰是自願的、領津貼的代理人。

1885年1月25日於倫敦

載於1885年1月29日“社會
民主黨人報”第5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社會民主黨人報”

THE COMMONWEAL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alist League.

Vol. 1.—No. 2.

MARCH, 1885.

ONE PENNY.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²¹⁶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場显然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超过了国外市場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經過一个长久的經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結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貿易，并且威胁說，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們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約翰·布萊特所說，“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駐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預政权——实行人民宪章²¹⁷；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支持他們，二者之間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该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①来实现宪章。这时 1847 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① 在德譯本中不是“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而是“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編者注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该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²¹⁸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活动^①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²¹⁹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²²⁰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②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民族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尔兰^③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呵！

① 在德译本中不是“活动”，而是“政治活动”。——编者注

② 在德译本中不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而是“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编者注

③ 在德译本中不是“爱尔兰”，而是“卫星”。——编者注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器量较小的^①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②重新出现的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就变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所领导的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反对^③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而且还容许把它推广到差不多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逐渐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使工人地位低于雇主或不利于工人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曾经誓死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²²¹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

① 在德译本中不是“器量较小的”，而是“沾染市儇习气较深的”。——编者注

② 在德译本中不是“自然而然地”，而是“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编者注

③ 在德译本中不是“反对”，而是“激烈反对”。——编者注

的議會改革²²² 已經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現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議會中討論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規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說来不会比德国的更不平等。“議員支薪”和縮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議會”——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說宪章运动已經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①。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鎮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馬克思常說的，变成了它的遺囑执行人。路易-拿破侖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統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独立^②，而英国的工厂主們不得不^③ 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說，工业資本家的这种統治的結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現代工业的搖籃来說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气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年这二十年間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輸出与輸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資本家手中的財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誠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現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軌。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說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軍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現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

① 在德譯本中不是“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而是“奇特的命运”。——編者注

② 在德譯本中不是“独立”，而是“某种程度的独立”。——編者注

③ 在德譯本中不是“不得不”，而是“也沒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編者注

业人口^①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烏有。

我們发现,工人階級中只有两种“受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們的工作日規定在較为合理的限度內,这使他們的体质得到了恢复^②,并且給了他們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們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們的状况无疑要比 1848 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們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們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縮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說服工厂主同意縮短工作時間,尽管他們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銷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資本家們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絕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門的組織。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們的有組織的力量。机械工、粗細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 1848 年以来,他們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滿意他們,而且他們也非常滿意雇主。他們形成了工人階級中的貴族;他們为自己爭到了比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們是萊昂·里維先生和吉芬先生^③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資本家和整个資本家階級來說,他們現在的确是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① 在德譯本中不是“农业人口”,而是“农业工人”。——編者注

② 在德譯本中不是“工作日”,而是“通常工作日”,不是“恢复”,而是“一定程度的恢复”。——編者注

③ 在德譯本中这里加有:“(以及可敬的路約·布伦坦諾先生)”。——編者注

但是，談到广大工人群众，他們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現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²²³ 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滿了无穷的貧困、絕望和飢餓，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 and 精神的墮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是例外；在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規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規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規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的輪子压軋着工人。

这就是 1847 年的自由貿易政策和工业資本家二十年的統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 1866 年的破产之后，1873 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暫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續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该到来的时候即 1877 年或 1878 年发生，但是从 1876 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門都处于經常停滯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們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慣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蕭条，所有部門的所有市場上都出現經常的过饱和現象——这就是我們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貿易論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設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設是一个純粹的妄想。現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別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創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讓英国資本家获得更大的財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淪为赤貧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們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

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結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現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現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場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結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現在新的市場一天比一天少起来，連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現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額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結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貿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 1883 年不列顛协会南港會議上，該协会的經濟組主席英格利斯·鮑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說：

“英国获得巨額利潤的日子已經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門的发展停頓了。几乎可以說，英国正进入停滯状态。”²²⁴

但是結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須繼續增长和扩大，否則必定死亡。即使現在，仅仅縮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場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額，就意味着停滯、貧穷，一方面資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須經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經常的扩大現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絕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問題：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 1848—1868 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受保护的”工人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况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沾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并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写于 1885 年 2 月中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85 年 3 月 1 日“公益”杂志
第 2 期，并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
1885 年 6 月“新时代”杂志第 6 期

俄文译自“公益”杂志，
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 面前”一书序言²²⁵

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审讯，只要把有关这些审讯的主要事件汇集起来就够了。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1848年3月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封建官僚专制的反动势力已经大大恢复了元气，以致到10月底就面临了第二次决定性战斗。维也纳在经过长期的英勇抵抗之后终于陷落，这也给了普鲁士权奸搞政变的勇气。在他们看来，驯服的柏林“国民议会”还是太狂放了。议会应当解散，革命应当结束。

1848年11月8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组成。9日它决定把议会所在地由柏林迁往勃兰登堡，让议会能够在刺刀的保护下“自由”开会，而不受柏林革命影响的惊扰。议会拒绝迁移；市民自卫团拒绝起来反对议会。市民自卫团还没有起来抵抗，内阁就把它解散了，并且解除了它的武装，宣布柏林戒严。议会于11月13日控告内阁叛国，以此作为回答。内阁就把议会从柏林的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11月15日议会决定，在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这个拒绝纳税的决议只有在人民武装抗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当时在市民自卫团手中还保留着足够的武器。尽管如此，几乎到处都只限于消极抵抗。只有少数地方准备以暴力对抗暴

力。科伦萊茵省民主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就是采取这种行动的最勇敢的号召，該委员会由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組成。²²⁶

进行斗争来反对在柏林胜利完成了的政变，这在萊茵地区不可能取得成果，对这一点委员会并没有发生误解。萊茵省有五个要塞；仅仅在萊茵本省、在威斯特伐里亚、美因兹、法兰克福和卢森堡就几乎駐有普魯士全部军队的三分之一，其中有許多团是从东部各省調来的。市民自卫团在科伦和其他城市已經被解散并且被解除了武装。但是，問題并不是要在科伦这个本身于数周前才解除戒严的城市里取得直接的胜利。問題在于給其他省份作出一个榜样，从而挽回萊茵省的革命荣誉。而这一点是已經做到了。

普魯士資產階級——它曾經由于害怕当时正在觉醒的无产階級突然发动，而把自己的重要的障地一个一个让給了政府，它早就为自己过去的权力欲感到了后悔，它从3月开始就完全被吓昏了，因为威胁性地面对着它的，一方面是糾集在专制制度周围的旧社会的各种势力，一方面是逐渐觉悟到自己階級地位的年輕的无产階級，——这个普魯士資產階級采取了它在紧要关头一贯采取的做法：它屈服了。而工人并不那么愚蠢，在沒有資產階級的情况下去为資產階級作斗争；对他们來說——特別是在萊茵——普魯士問題本来就是純粹地方性的問題；如果工人为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赴湯蹈火，那也是在整個德国范围内，是为了整个德国。“普魯士的領導地位”²²⁷ 那时在工人当中就已經沒有作用了，——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征兆。

一句話，政府胜利了。一个月以后，在12月5日，政府得以彻底解散还在苟延殘喘的柏林議會，并强行制定了一个新宪法，而这个宪法也只是在它完全变成一出制宪鬧剧之后，才真正生效。

呼吁书发表的第二天，即 11 月 20 日，三个署名的人被传到法院偵查員那里；以煽动叛乱罪对他们起訴。当时甚至在科伦也还談不到逮捕。2 月 7 日“新萊茵报”經受了它的第一次报刊案件；馬克思、我和发行負責人科尔夫出席陪审法庭受审，并被宣判无罪。²²⁸ 第二天，审理了委员会案件。²²⁹ 人民已經預先做出了自己的判決，在十四天以前把被告施奈德尔选为科伦議員。

馬克思的辯护詞自然构成审訊的最高潮。这个辯护詞特別从两方面来看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这里向資產階級陪審員們說明，他所进行的，使他成为站在他們面前的被告的这些事情，其实是他們的階級，即資產階級的事情，他們不仅有义务和責任去完成，而且应当由此得出最坚决的結論。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表明德国的，特別是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在革命时期的态度。問題是应当由誰来統治，是糾集在专制君主制周围的社会势力和国家势力——封建大地主、軍隊、官僚、僧侶——，还是資產階級？正在形成的无產階級之所以关心这一斗争，仅仅因为它将由于資產階級的胜利而获得本身发展的場地，将在它总有一天会战胜其他一切階級的斗争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当与他們为敌的政府在他們主力所在地襲击他們，解散他們的議會，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并对他們本身实行戒严的时候，他們絲毫也沒有采取行动。这时共产主义者补上了这个缺口，号召資產階級去完成純粹是它分內的事情。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應該組成与旧的封建社会相反的新社会，應該一致行动。号召当然沒有奏效，同时却出現了这样的历史諷刺：現在，同一个資產階級一方面审判革命的无產階級的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审判反革命的

政府。

第二，——这一点使辯护詞在現在仍然有特別的重要性——它維護了革命观点，反对了政府的虛伪的法制，它这样做所采取的方式，在今天对某些人來說还可以当做范例。——我們那时号召过人民拿起武器来反对政府嗎？是的，我們是这样做了。而且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破坏了法律，抛弃了法制基础嗎？是的，然而政府早在我們破坏这些法律以前就撕毀了它們，把它們擲在人民的脚下，法制基础也就不再存在了。可以把我們作为战敗了的敌人消灭，但不能判我們有罪。

各个官方政党，从“十字报”到“法兰克福报”²³⁰ 都指責社会民主工党，說它是革命党，說它不想承认 1866 年和 1871 年制定的法制基础，从而就置身于公法之外——所有的人，直到民族自由党为止，至少都是这样說。²³¹ 我且不談这种怪論：仿佛某一个人維護某种意見就会置身于公法之外。真正的警察国家就是这样的，它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在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1866 年的法制基础难道不是革命的基础嗎？联邦宪法破坏了，又向联邦成員宣了战。²³² 俾斯麦說，不，是別人破坏了联邦。对此我們可以这样回答，一个革命政党如果不能为每一次武装发动找到一些至少像俾斯麦为他在 1866 年的活动而找到的同样好的法制基础，那它就太愚蠢了。然后，內战被挑起了，因为 1866 年战争不是別的，正是內战。但是，任何內战^① 都是革命战争。这次战争是用革

① “內战”一詞，原文为 Bürgerkrieg，俄文为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中文譯为“內战”。按此詞源出于古羅馬，系指一部分羅馬公民与另一部分羅馬公民之間的武装斗争（直譯应为“公民战争”）。后来用此詞专指国内各政党、各阶级之間的武装斗争，与 inner Krieg, междоусобная война（亦譯“內战”）意义不同。——譯者注

命的手段进行的。人们同外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人，把意大利的军队和舰只引进战斗，把可以获得德国莱茵地区这一前景作为对波拿巴的钓饵。匈牙利军团被组织起来了，这个军团应当为了革命的目的去反对自己世袭的君主；在匈牙利依靠克拉普卡，正像在意大利依靠加里波第那样。胜利了，吞并了三个受命于天的王国：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拿骚，这三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至少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是正統的、“世袭的”和“受命于天的”。²³³ 最后，把帝国宪法强加给联邦其他成员，这些邦，例如萨克森，就像普鲁士当年接受提尔西特和约一样，自愿地接受了这部宪法。²³⁴

对此我应当埋怨吗？不，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做。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但是对于那些做过这一切事情的人，完全有权要求他们不要指责别人是革命者。德意志帝国是革命的产物，当然，这是一个特种的革命，但毕竟还是革命。一个人可以做的，别人做做也无妨。革命仍然是革命，不管由普鲁士国王完成，还是由锅炉修补工完成，都是一样。如果现存的政府利用现行法律来摆脱它的反对者，那末它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政府所做的。但是，如果它以为要完全把他们吓倒只需要大喝一声：你们是革命者！那末它用这种办法最多只能吓倒庸人。整个欧洲却会响起一个回声“你自己就是革命者！”

但是，如果要求放弃从历史关系中必然产生的革命本质，而被这样要求的政党又是先被置于公法之外，即法律之外，然后又要求它承认正是对它说来是废止了的法制基础²³⁵，那简直就可笑极了。

关于这一点居然还要費一番唇舌，这又一次证明了德国在政治上的落后。在世界其他国家，每个人都知道，目前整个政治情况正是革命的结果。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受命于革命政府。在英国，甚至连輝格党人马考莱也承认，现代法制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revolutions heaped upon revolutions）的基础之上的。近百年来，美国每逢7月4日都纪念自己的革命。²³⁶在这些国家里，大多数都存在着一些在现存法制不能加以约束时就不再受其约束的政党。但是，如果有人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指责保皇党人或波拿巴派是革命者，那他准会受到嘲笑。

只有在德国，——在那里，政治上还没有彻底解决过什么问题（否则它就不会被割裂为两部分，即奥地利和所谓德国），正因为这样，过去了的、但刚刚被克服了一半的时代的观念也就在人们头脑中不朽地存在下去（因此德国人才自称为思想家的民族），——只有在这样的德国还会要求一个政党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受现存的所谓法制的约束；要求这个政党预先保证，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也不要推翻它与之斗争的法制基础，即使能做到也不要做，换句话说，它必须承担使现存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义务。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再是“革命者的”用意只此而已。

但是，德国小市民——他们的意见仍然代表着德国的舆论——是特别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革命。1848年革命是工人替他们进行的，而这次革命使他们感到害怕。但是他们却忍受了更多的革命。因为在德国，近三百年来革命是由诸侯进行的，而革命也就适合诸侯们的要求。他们在自己领土上的全部最高权力以至于他们的主权都是反叛皇帝的成果。普鲁士首先为他

們做出好榜样。普魯士只是在“大选帝侯”^①胜利完成反对其宗主波兰王国的暴动并建立不依附于波兰的普魯士公国以后，才成为一个王国。²³⁷ 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普魯士的反德意志帝国的暴动是經常进行的；它“唾弃”帝国宪法的程度比我們勇敢的白拉克唾弃反社会党人法的程度还要严重。后来发生了法国革命，諸侯和小市民都同样悲哀和叹息不已地忍受了这次革命。根据 1803 年帝国代表會議的決議，法国人和俄国人用最革命的方法把德意志帝国分配給德国的諸侯，因为这些諸侯自己对于瓜分不能取得一致意見。²³⁸ 然后来了拿破侖，他让那些受到他特別保护的巴登、巴伐利亚和維尔騰堡的諸侯能够占据所有在他們領土之內和在他們領土之間而直接参加帝国的伯爵領地、男爵領地和城市。接着这三个叛国者成功地发动了反对它們皇帝的最后一次叛乱，在拿破侖的帮助下获得主权，从而彻底摧毀了古老的日耳曼帝国。²³⁹ 从此以后，德国实际上的皇帝拿破侖几乎每隔三年就把德国在他的忠实奴仆，德国的以及其他的諸侯中間重新分配一次。最后，终于从外国的統治下光荣解放出来了，維也納會議，即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奖賞，就把德国当做一块供普遍賠償之用的土地分配和拍卖給沒落的諸侯，居住在大約两千块互相隔离的小块土地上的德国小市民像綿羊一样被分配給三十六个不同的君主，在今天他們对这些君主中的大多数人还像對他們世襲的君主一样表现出“順民的忠誠”。这一切难道不是革命的嗎，施納普汉斯基-利希諾夫斯基在法兰克福議會中大声說道：历史权利沒有任何日期！²⁴⁰ 他說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沒有日期的！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勃兰登堡选帝侯。——編者注

因此,德国小市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要求,就只有一个意义:这个党应当成为像小市民自己那样的小市民的党,决不要参加革命,而只是忍受革命。但是通过反革命和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府也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只能意味着:当革命由俾斯麦为了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好的,但是,当革命为了反对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坏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7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85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

致“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²⁴¹

1885年8月25日于泽稷

閣下：

我在亡友卡尔·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卡尔·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答复。这一答复不知当时为什么沒有发表，由于目前仍然可能引起俄国讀者的兴趣，特寄上請您处理。

請接受我的致意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
第29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²⁴²

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但它从1836年起持续到了1852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在国外的散布，这个运动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展开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质上是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了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

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有系统的历史只有一个主要来源。这就是所谓的黑书：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和1854年柏林版，上下两卷²⁴³。本世纪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书，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期的非共产主义著作的蓝本。

我在这里所能谈的只是一个梗概，这个梗概也只限于同盟本身；只能谈一谈为了解“揭露”^①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我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把马克思和我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这一光辉青

① 即“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译者注

春时期的历史的丰富材料整理一下。

* * *

1836年，从德国流亡者于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联盟”中分出了最急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原先那个只剩下雅科布·费奈迭这类最不活动的分子的同盟，很快便完全消失了；当警察在1840年破获它在德国的几个支部时，它几乎只剩下一个影子。相反地，新的同盟却发展得比较迅速。它原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具有巴貝夫主义²⁴⁴传统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做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在德国也决不是没有在当时时机准备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它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貝斯领导的Société des saisons〔四季社〕的德国分支。法国人在1839年5月12日举行了起义；同盟各支部曾同他们一起行动，因而也同他们一起遭到了失败。²⁴⁵

德国人之中被捕的有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鮑威尔；路易-菲力浦政府满足于把他们比较长期地监禁之后驱逐出境。²⁴⁶两人都到伦敦去了。沙佩尔出生在拿騷的魏耳堡；他在吉森的林学院学习时于1832年参加了格奥尔格·毕希納組織的密谋活动，于1833年4月3日参加了袭击法兰克福警察崗哨的行动²⁴⁷，逃亡国外，并于1834年2月参加了馬志尼向薩瓦的进军。²⁴⁸他身材魁伟，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

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像他从“蠢惑者”²⁴⁹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經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和他的理智是有距离的，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亨利希·鲍威尔生于法兰克尼亚，是皮鞋匠；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伙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

鲍威尔到达伦敦后，遇见了曾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的沙佩尔，他靠教授语文维持生活；他们两人一起恢复了同盟的各种中断了的联系，使伦敦成了同盟的中心。在这里（或许更早些时候在巴黎）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伦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闖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无论如何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1843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的狭隘平均共产主义^①，我当时还用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与之对立，——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所留给我的良好印象。

^① 我把平均共产主义，如上所述理解为全部或主要以要求平等为依据的共产主义。

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較小的程度上）一样，結社、集会的自由便利了他們。早在1840年2月7日，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就已經成立，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²⁵⁰这个协会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員的地方；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动最有知識的會員，协会的領導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伦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当时尚称为“秘所”。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是采用的。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利用了它們。在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的盟員便参加歌咏团、体操会等团体。联系主要是靠不断来往的盟員来維持，这些盟員在必要时也充任特使。在这两方面，各政府的高明才略給了同盟很大帮助，这些政府把它們看不慣的工人——十有九个是同盟盟員——全都驅逐出境，結果就把他們变成了特使。

恢复了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貝克尔（一个智慧非凡的人，但也像許多德国人一样由于本身的不穩定而垮台）和其他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忠于魏特林共产主义体系的坚强組織。这里不是批評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論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馬克思在1844年巴黎“前进报”上所說的話：“（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論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諧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論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光輝灿烂的处女作比較一下，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較一下，我們就能够預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²⁵¹这个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們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沒有发

育完全。

在德国也有了許多支部，这些支部由于当时的情况而带有短暫的性质；但是，新成立的支部远远多于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以后（1846 年底）才在柏林（門特耳）和馬格德堡（貝克）发现了同盟的踪迹，但进一步追寻就无能为力了。

在巴黎，1840 年还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散的成員重新聚集起来。

同盟骨干是裁縫。德国裁縫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有。在巴黎，德語在裁縫业中占有如此主要地位，以致 1846 年我在那里認識的一个从德隆赫姆航海直达法国的挪威裁縫，在一年半內几乎沒有学会一个法文字，而德語却学得很好。1847 年，在巴黎各支部中，有两个主要是由裁縫組成的，有一个主要是由家具工人組成的。

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明显地出現了一个新的情况：同盟逐漸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語同外国人交往的一切民族的代表，这是斯堪的那維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亚尔薩斯人。1847 年，一个穿軍服的英国近卫擲弹兵也成了常客。协会不久便命名为**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在會員证上至少用二十种文字写着（虽然某些地方不免有錯誤）“人人皆兄弟！”这句话。像公开的团体一样，秘密的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的国际性；起初这种国际性还是狭义的：在实践上，是由于盟員的民族成分复杂，在理論上，是由于认为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須是欧洲規模的。当时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基础已經打下了。

通过流亡在伦敦的 1839 年 5 月 12 日的起义伙伴，同盟和法国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和波兰急进派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波兰的官方流亡者，也和馬志尼一样，当然与其說是盟友，毋宁說是敌人。英国的宪章派，由于他們的运动具有特殊的英国性质，被看做不革命的而拋到一边。同盟的伦敦領導者們只是后来通过我才同他們建立了联系。

此外，随着事变的发展，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們仍然把巴黎看作革命策源地，当时也有充分理由这样看，但是已經摆脱对巴黎密謀活动家的依賴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也提高了。人們可以感到，运动日益在德国工人階級中間扎根，这些德国工人負有成为北欧和东欧工人的旗手的历史使命。他們拥有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論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他的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最后，5 月 12 日的經驗表明，举行盲动的企图已經應該放弃。如果說当时人們仍然把每个事变解释为风暴来临的預兆，如果說当时人們仍然完全保留着半密謀性的章程，那末，这主要是由于老革命者固执己見，他們的見解已經开始同那些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較正确的观点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会学說很不确定，它有一个很大的、根源于社会关系本身的缺点。一般地說，同盟的成員是工人，但他們几乎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剝削他們的也多半只是小作坊师傅。就是在規模很大的裁縫业中，在由于裁縫手工业变成了替大資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业而形成的今天所謂的服装业中的剝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一方面，剝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終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此外，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許

多流传下来的行会观念。这些手工业者的最大光荣是：虽然他们本身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只不过是刚刚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的、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对立地位，但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并且能够组成（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但是，有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是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的。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博爱”和“正义”暂时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正在形成。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²⁵²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

新观点了。

但是，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主要是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說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了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現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現象了。这些运动現在已經被看做現代被压迫階級即无产階級的运动，被看做他們反对統治階級即資产階級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階級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階級斗争和过去一切階級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現代被压迫階級即无产階級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階級划分，从而摆脱階級斗争，就不能爭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現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設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階級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們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們两人已經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們已經在知識分子中間，特別在德国西部的知識分子中間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組織的无产階級建立了广泛联系。我們有义务科学地論证我們的观点，但是，对我們來說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階級，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階級相信我們的信念是正确的。我們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們在布魯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取得了“德意志—布魯塞尔报”²⁵³，該报一直到二月革命始終是我們的机关报。我們通过朱利安·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²⁵⁴的編輯，我是該报的撰稿人。我們也和布魯塞尔的民主党人（馬克思是民主协会副主席），以及“改革报”²⁵⁵（我向該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

国运动的报道) 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結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 我們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組織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

我們同正义者同盟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 我們当然是知道的; 1843 年沙佩尔建議我加入同盟, 当时我自然拒絕了这个建議。但是, 我們不仅同伦敦的盟員經常保持通訊联系, 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們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 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 我們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 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員的理論观点。我們在問題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場合, 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通訊員分发各种石印通告, 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 有一个年轻的威斯特伐里亚大学生海尔曼·克利盖, 到了美洲, 在那里作为同盟特使出現, 和一个瘋子哈罗·哈林建立了联系, 企图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变革; 他創辦了一家报纸^①, 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滿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我們在一个通告里反对了他, 这个通告立即发生了作用: 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²⁵⁶

后来, 魏特林到了布魯塞尔。但这时他已經不再是一个天真年青的帮工裁縫, 被自己的才能所震惊, 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了。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卓越而受忌妒者追逐的大人物, 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和陷阱; 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国家的預言家, 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建

^① “人民論坛报”。——編者注

成天堂的現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他在伦敦时就已經和同盟盟員发生爭吵，在布魯塞尔（在那里特别是馬克思夫妇对他表現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他也还是同任何人都合不来。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預言家的使命。

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不觉发生的轉变。他們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原始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魏特林所著“貧苦罪人們的福音”²⁵⁷一书中有个別的天才論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結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多半起初是掌握在阿尔勃萊希特这种蠢貨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庫尔曼这种詐取錢財的騙人預言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語句翻譯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見“共产主义宣言”中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节）²⁵⁸，这种通过克利盖和有关著作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仅仅由于它軟弱无力就已經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厌恶了。过去的理論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錯誤，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員相信馬克思和我的新理論是正确的。当时伦敦领导者中有两个人无疑促进了这种体会，他們在理論理解能力上大大超过上面所說的那些人。这两个人，是海尔布朗的細工画家卡尔·普芬德和紹林吉亚的裁縫格奥尔格·埃卡留斯。^①

① 普芬德約在八年前死于伦敦。他具有一副精細独特的头脑，有談諧、譏諷和舌辯的才能。埃卡留斯，大家都知道，后来曾多年任国际工人协会总書記，在参加协会总委员会的人当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如下老盟員：埃卡留斯、普芬德、列斯納、罗赫納、馬克思和我。后来埃卡留斯完全献身于英国工会运动。

一句話，1847年春天莫尔到布魯塞尔去找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們再三邀請我們加入同盟。他說，他們确信我們的观点一般正确，也确信必須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謀性的传统和方式。如果我們愿意加入同盟，我們將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闡述我們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們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当时条件的适当組織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組織。

至于說在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須有一个哪怕只以宣传为目的的組織，至于說这个組織由于它将不只具有地方性质，所以即使在德国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組織，对此我們是沒有怀疑过的。而同盟就正是这样一个組織。我們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現在同盟代表們自己承认，并且已經消除；甚至还邀請我們参加改組工作。我們能拒絕嗎？当然不能。于是我們加入了同盟。馬克思在布魯塞尔把比較靠近我們的人組成同盟的支部，而我則經常到巴黎的三个支部去。

1847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魯塞尔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里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組。密謀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同盟現在已經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統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沒有阶级、沒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第一条这样說。²⁵⁹ 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謀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时

期——已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的团体。这个新章程曾交付——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 1847 年 12 月 8 日最后通过。这个章程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书第一卷第 239 页附录十。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于同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举行的。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它就被送到伦敦去付印。自那时起，它已遍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由公开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十七年以后，这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把它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二月革命爆发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刻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但当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那里事实上已经完全处于戒严状态，德国人已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举行集会了。我们大家都已准备到巴黎去，而新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决定解散自己，把它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并且授权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议（1848 年 3 月 3 日）的五个人刚一分手，警察就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起来，并迫使他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他正好要去的法国。

不久我们大家又在巴黎会面了。在这里拟定了下面的由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曾在整个德国传播，并且许

多人直到今天还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²⁶⁰

1. 全德国宣布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3. 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4. 武装全体人民。
7. 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 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
9. 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
11. 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者阶级支配。
14. 限制继承权。
15. 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
16. 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17. 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德国千百万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少数人今后仍力图使之受压迫的人，才能争得自己的权

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权力。

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卡尔·沙佩尔 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 约·莫尔 威·沃尔弗

当时在巴黎人们热中于组织革命义勇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组成队伍，准备去解放自己的祖国。德国义勇军是由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太因三人领导的。由于一切外国工人在革命以后不但立刻失掉工作，而且还在社会上受到排挤，所以愿意加入这种义勇军的人数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用组织义勇军的办法来排除外国工人，于是决定给予他们 l'étape du soldat，即行军营舍和每日五十生丁的津贴，直到他们到达边境为止，在那里，经常被感动得流泪的外交部长、饒舌家拉馬丁就有办法把他们出卖给有关政府。

我们十分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正在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摆布，——这一点是有拉馬丁作保证的。由于维也纳和柏林的革命取得胜利，组织义勇军已经毫无意义；然而，儿戏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²⁶¹，在里面说服工人不要去参加义勇军，而应当单个返回祖国，在那里为加强运动而进行活动。我们的老友弗洛孔当时任临时政府委员，为那些由我们派回国的工人争得了许给义勇军的同样的旅途便利。这样我们就送了三四百个工人回到德国去，其中绝大多数是同盟盟员。

当时很容易预见到，在正在高涨的人民群众的运动面前，同盟

是个极其软弱的工具。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解散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比较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不想恢复这种联系，而各人自行其是，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开展小小的分散的运动。最后，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条件是非常不同的，以致同盟要发指示也只能发出极为一般的指示；而这种指示通过报刊来传播是要好得多的。一句话，自从使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消失时起，这样的秘密同盟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对于刚刚使这个秘密同盟摆脱了最后一点密谋性残余的人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但同盟却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明了。在有“新莱茵报”作为坚强中心的莱茵河一带，在拿骚，在莱茵黑森等等地方，到处都是由同盟盟员领导极端民主运动。在汉堡也是如此。在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优势地位妨碍了这样做。在布勒斯劳，威廉·沃尔弗成效卓著地活动到1848年夏天；他并且在西里西亚获得了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委任状。最后，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1850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形形色色的坏家伙“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主义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

討好一切人。他們特別致力於組織罷工，組織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記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場所。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們感到必須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們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們。波尔恩参加了1849年5月德勒斯顿的起义²⁶²，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則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紙上存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1850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須取締它，而它的分支則經過許多年以后才被取締。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的波尔恩沒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馬克思著作譯成行会語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譯成甜膩的德語。

随着1849年巴黎的六月十三日²⁶³，随着德国五月起义的失敗和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的鎮压，1848年革命的这个伟大时期便結束了。但是，反动派的胜利这时还决不是最后的胜利。必須把分散的革命力量以及同盟的力量重新組織起来。像1848年以前一样，形势使得无产阶级任何公开組織都不可能；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組織起来。

1849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成員重新聚集在伦敦；只缺少沙佩尔和莫尔。沙佩尔当时被监禁于維斯巴登，1850年春天被释后也到了伦敦。莫尔在完成了許多极危险的执行任务和进行宣传的出差以后——最后他在萊茵省普魯士軍隊中为普法尔茨炮兵队招募騎乘炮手——加入了維利希部队的伯桑松工人連，在牟尔克河战役中在罗騰菲尔斯桥边头部中弹牺牲。

但这时維利希在舞台上出現了。維利希是 1845 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我們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深信自己命定要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并以这种预言家身分直接要求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不过，这一新宗教的宣传暂时还没有越出維利希所指挥的流亡者兵营的范围。

同盟就这样重新组织起来，发表了刊登在附录(九, 第一号)中的 1850 年 3 月的“告同盟书”²⁶⁴，亨利希·鮑威尔作为特使被派到德国去。由馬克思和我校审的这篇告同盟书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各次欧洲革命——1815 年、1830 年、1848—1852 年、1870 年——間隔的时间，在我們这一世紀是十五年到十八年）中在德国无疑会作为使社会摆脱共产主义工人的救星而首先获得政权。因此，在那里所说的，有许多今天也还适用。亨利希·鮑威尔的出使得到了完全的成功。这个矮小快活的皮鞋匠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是离开了工作，有些是独立进行工作的过去的盟员重新集合在一个积极的组织内，其中也包括“工人兄弟会”当时的领袖。同盟开始在各个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和体育团体中起着比 1848 年以前还要大得多的领导作用，所以在 1850 年 6 月印出的最近一期（三个月一期）告各支部书已经可以指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周游德国的波恩大学生叔尔茨（后来在美国作过部长）“发现所有可用的力量都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见附录九, 第二号）²⁶⁵。同盟无疑是在德国唯一有意义的革命

組織。

然而这个組織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活动，这主要取决于革命新高涨的前景能否实现。而这一点在 1850 年期间愈来愈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曾经准备了 1848 年革命的 1847 年工业危机已经消除；一个新的、空前未有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每个长着眼睛来看事物，并且用它看过事物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1848 年的革命风暴正在逐渐平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还十分巩固，并且，——这是反动派不知道的——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的一切义愤和一切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碰得粉碎。”马克思和我在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1850 年 5 月至 10 月国际述评”一文里这样写过（1850 年汉堡版第 5、6 两期合刊第 153 页）。²⁶⁶

但是，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做邪说，那时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马志尼、科苏特以及那些不大显要的德国名人像卢格、金克尔、戈克等等一类人，群集在伦敦，他们不但为各自的祖国，并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些未来的临时政府，而全部问题不过是要用举借革命贷款的办法在美国取得必要的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建立理所当然的各个共和国。因此，像

維利希这样一个人落入这种圈套，連怀有旧日革命热情的沙佩尔也任人愚弄，以及多数伦敦工人（大部分是流亡者）也跟着他們滾入資產階級民主派革命制造者的陣营，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話，我們所坚持的沉着态度并不合乎这班人的口味；他們认为，應該开始制造革命；我們极为坚决地拒絕了这种做法。于是发生了分裂。关于以后的情况，可在“揭露”里讀到。接着，諾特荣克首先被捕，后来又有豪普特在汉堡被捕，后者成了叛徒，竟泄露了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員的姓名，并且还必須在法庭审判时充当主要证人；他的亲戚不愿蒙受这种耻辱，便把他送到里約热內卢去了，后来他在那里做了商人，由于他有功，先被任命为普魯士总領事，后又被任命为德国总領事。現在他又在欧洲了。^①

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伦被告的名单列在下面：
(1)彼·格·勒泽尔，雪茄烟制造工人；(2)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后来去世时是进步党邦議會議員；(3)彼得·諾特荣克，裁縫，数年前在布勒斯劳去世，那时正作摄影师；(4)威·約·賴夫；(5)海尔曼·貝克尔博士，現任科伦市市长，上議院議員；(6)罗兰特·丹尼尔斯博士，医生，案件以后几年死于在獄中所得的肺病；(7)卡尔·奥托，化学家；(8)阿伯拉罕·雅科比博士，目前在紐約当医生；(9)約·雅·克莱因博士，目前在科伦当医生并任市議員；(10)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但他当时已在伦敦；(11)約·路·埃尔哈特，店員；(12)弗里德里希·列斯納，裁縫，目前住在伦敦。經

^① 沙佩尔在六十年代末在伦敦去世。維利希参加了美国内战，并且著有战功；他任准将时在默尔弗里斯博罗(田納西州)战役中胸部受伤，但又治愈；約于十年前在美国去世。关于上面說过的其他人，我还要指出：亨利希·鮑威尔在澳大利亚失踪了，魏特林和艾韦貝克在美国去世。

过 1852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12 日的公开审判，他們之中由陪审法庭按叛国罪判处六年徒刑的有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諾特荣克，判处五年徒刑的有賴夫、奥托和貝克尔，判处三年徒刑的有列斯納；丹尼尔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特宣告无罪。

从科伦案件时起就結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我們解散了我們的同盟；又几个月以后，維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²⁶⁷ 也一命嗚呼了。

* * *

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一个世代。那时，德国是一个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現在它已經是一个工业不断急遽发展的大工业国了。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認識到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和自己同資本在历史上經濟上的对立，因为那时这种对立本身还刚刚产生。現在，哪怕只是想稍稍延迟一下德国无产阶级发展到完全理解它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地位的过程，也必須对整个德国无产阶级使用非常法了。那时，已理解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个人到二十人悄悄地举行集会。現在，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的組織，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間的自然联系，即使沒有任何章程、委员会、決議以及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个德意志帝国了。俾斯麦在欧洲、在德国境外是公断人；而在国内，却如馬克思还在 1844 年就已預見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长，对这个巨人來說，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經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寬闊的两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建筑变为废墟。不仅如此，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現在

已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連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它來說也成为一种桎梏了；单靠那种認識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語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同盟在 1847 年至 1852 年所代表的学說，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囈語，看做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說，現在，这个学說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了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說的創始人、当时受到人們的憎恨和誹謗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經常被請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顧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 年 10 月 8 日于伦敦

載于 1885 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
卡尔·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一书，并載于 1885 年 11 月 12、19 和 2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6—4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揭露科伦
共产党人案件”

LE SOCIALISTE

Organe du Parti ouvrier

LE NUMERO : 80 CENTIMES
 Abonnements : France, 3 m. 1 fr. 50; 6 m. 3 fr.; 12 m. 6 fr.
 Etranger, — 2 fr. — 4 fr. — 8 fr.

PARAISANT LE SAMEDI
 Comité de Rédaction :
 O. DEVILAS, R. FAÏSAC, J. QUERÉDÉ, P. LAFARGUE, A. LE TAILLEUR.

RÉDACTION ET ADMINISTRATION :
 17, rue du Croissant, Paris.
 ANNONCES : au bureau du Journal

当前的形势²⁶⁸

1885年10月12日于伦敦

……只要你们不抱各种错觉，我就不认为10月4日是一个失败。问题是要压倒机会主义派，——他们的确被压倒了。但是为了压倒他们，需要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即从右面和左面施加压力。毫无疑问，右面的压力比原来预料的更强。但是因此也就正在形成革命得多的形势。

资产者，不管是大的或小的，都宁愿要公开的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而不要隐蔽的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宁愿要已经把国家盗窃一空而发了财的人，而不要想靠国家发财的人；宁愿要昨天的保守派，而不要明天的保守派。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在法国，仅仅从王位觊觎者人数众多这一点来说，君主国就不可能存在。如果它可能存在，那就要成为一个迹象，表明俾斯麦派有理由说法国在退化了。但是正在退化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且德国和英国，情况同法国一样。

共和国一直是最少引起三个君主派²⁶⁹ 纷争的政府，这个政府使三派联合成一个保守党。一当君主制复辟的可能性提上日程，

保守党馬上就会分裂为三派，而共和党人則不得不聚集在一个唯一可能的政府周围；目前，这样的政府大概可能是克列孟梭的内閣。

克列孟梭無論如何总比費里和威尔逊进步些。非常重要的一项是：让他不是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私有制維護者的身分，而是以反对君主国的共和国拯救者的身分取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被迫或多或少地遵守自己的諾言；反之，他就会效法其他像路易-菲力浦那样的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共和国”²⁷⁰；我們掌握政权，共和国就可以高枕无忧；只要内閣在我們手中，就不必再向我們提起那些所許諾的改革。

我想，4日投票选举君主派的人，已經被自己的胜利吓倒了；18日会产生多少有利于克列孟梭的結果²⁷¹，机会主义派会取得某些胜利，这并不是由于受到尊重，而是由于受到鄙視，庸人会对自己說：有了这么多的保皇派和波拿巴派，到头来我还需要一些机会主义派。不过，18日的形势将被确定；法国是一个充滿意外事件的国家，所以，我暫不发表最后的意見。

但是，激进派和君主派無論如何是会彼此对峙的。共和国将要遭到的危險，足以迫使小資产者稍多地傾向极左派，而在其他情況下，他們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这正是我們共产主义者所需要的形势。至今我还没有什么根据来认为法国这种特別彻底的政治发展进程会发生偏向：邏輯跟1792—1794年一样，只不过那时危险来自反法同盟，而現在危险是来自国内各君主派的同盟罢了。如果仔細观察一下，这次危险将小于那次……

載于1885年10月17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8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社会主义者报”

致“社会主义者报”編輯委员会

公民們：

貴报在 17 日摘載了我写給一位編委的私信^①。这封信写得很匆忙，因为怕誤了邮班，甚至沒有来得及再看一遍。因此，請允許我澄清一下这封信中我的思想表达得不够清楚的地方。

我在談到克列孟梭先生是法国激进主义的旗手时說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不是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私有制維護者的身分，而是以反对君主国的共和国拯救者的身分取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被迫或多或少地遵守自己的諾言；反之，他就（这里應該加：可能）会效法其他像路易-菲力浦那样的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共和国；我們掌握政权，共和国就可以高枕无忧；只要內閣在我們手中，就不必再向我們提起那些所許諾的改革。”

首先，我沒有任何权利断言：如果克列孟梭先生采用通常的議會政府途徑取得政权，他就一定会“效法其他人”。其次，我不是一个仅仅以政府善意或恶意来解释政府的行动的人；这种意愿本身取决于不以政府为轉移的原因，即取决于总的形势。因此，这里談的不是克列孟梭先生的善意或恶意。談的是：为了工人政党的利益，让激进派在实施他們的綱領成了他們保持政权的唯一办法的

^① 見本卷第 262—263 頁。——編者注

形势下取得政权。我們希望：議會中的二百名保皇派将足以造成这样的形势。

弗·恩格斯

1885年10月21日于伦敦

載于1885年10月31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10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社会主义者报”

不應該这样翻譯馬克思的著作²⁷²

“資本論”第一卷，就問題涉及把它譯成外文而論，是公共財產。因此，雖然在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當中都很清楚地知道，這本書的翻譯工作正在進行，並將由馬克思遺著受托人負責出版，但是，在這個譯本出版以前，如果出現另一個準確的好譯本，誰也沒有理由反對。

約翰·布羅德豪斯翻譯的本卷開頭幾頁的譯文刊登在10月份的“今日”雜誌上。我肯定地講：譯文遠遠沒有忠實地表達原文，這是因為布羅德豪斯先生完全沒有具備一個馬克思著作的翻譯者應該具備的才能。

翻譯這樣的著作，只是通曉標準德語是不夠的。馬克思精於使用日常生活用語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語；他創造新詞，他舉例時涉及一切科學部門，他援引十幾種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須徹底精通德語——口頭語和標準語，另外還要知道一些德國人的生活。

舉個例子來說。有一次，幾個牛津大學畢業班的学生划着一只四槳小船橫渡多維爾海峽。報紙報道說：其中有一個人 «catch a crab»^①。“科倫日報”駐倫敦記者照字面上理解了這句話，並且

① 直譯是：“捉住了一只螃蟹”；轉意是：“槳入水過深而難舉”。——編者注

老老实实在向自己的報紙報道說，“螃蟹夾住了一個划船人的槳”。如果說，一個在倫敦住過多年的人，遇到他不熟悉的部門的術語，都會犯這樣荒唐的粗暴的錯誤，那末一個只是馬馬虎虎懂得一點書面德語的人，着手翻譯一個最難翻譯的德國作家的作品，又會弄出什麼結果來呢？而我們的确也將看到，布羅德豪斯先生是一個“捉螃蟹”的頭等能手。

但是，在這裡，對翻譯者還有更多的要求。馬克思是當代具有最簡潔最有力的風格的作家之一。為了確切地表達這種風格，不僅要精通德語，而且要精通英語。布羅德豪斯先生看來雖然是一個相當有才能的新聞工作者，但他所掌握的英語只限於滿足一般的寫作要求。對於這種目的，他的英語知識足夠了，但是，這種英語卻不能用來翻譯“資本論”。富有表現力的德語應該用富有表現力的英語來表達，必須使用最好的詞匯，新創造的德文名詞要求創造相應的新的英文名詞。但是，布羅德豪斯先生一碰到這些問題，他不僅缺乏詞匯，而且缺乏勇氣。稍微增加一點他的有限的慣用的詞匯，稍微有一點超出英文日常書刊慣用語的新東西，都使他感到可怕。於是他不敢去冒這種異端的危險，而寧願用他以為不刺耳、但是模糊了作者原意的比較含混的用語來表達難譯的德文詞，或者，更壞的是，當這樣的詞一再出現時，他却用許多不同的詞來翻譯，忘記了一個術語始終都應該用一個意思相同的詞來表達。例如，就在第一章的一個標題中，他把 *Wertgrösse* [價值量] 譯成了 «extent of value», 忽略了 *Grösse* [量] 是固定的數學名詞，意思和 «magnitude» 這個名詞一樣，或者是一定的數量，而 «extent» 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別的含意。又如，甚至像 *Arbeitszeit* 即“勞動時間” [«labour-time»] 這樣一個簡單的新詞，他都感到太難辦了，他把這個詞譯

成：(1) «time-labour», 这个詞的意思是——如果說它有什么意思的話——按照時間付酬的劳动或是“服”一定期限 [time] 苦役 [hard labour] 的人所付出的劳动；(2) «time of labour» [“劳动的时间”]；(3) «labour-time» [“劳动時間”]；(4) «period of labour» [“劳动期間”] (*Arbeitsperiode*)——这个名詞，馬克思在第二卷中指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同时，我們都清楚地知道，劳动時間这个“范疇”是整本书中最基本的“范疇”之一，在不到十頁的譯文中就把它譯成了四种不同的名詞，这是决不能寬恕的。

馬克思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首先是有用的物品；作为有用物的商品既可以从质的方面也可以从量的方面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許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业。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一部分是由于被計量的物的性质不同，一部分是約定俗成的。”^①

① “資本論” 1883 年第三版第一卷中这一段話的德文原文如下：«Jedes solches Ding ist ein Ganzes vieler Eigenschaften und kann daher nach verschiedenen Seiten nützlich sein. Diese verschiedenen Seiten und daher die mannigfachen Gebrauchsweisen der Dinge zu entdecken ist geschichtliche Tat. So ist die Findung gesellschaftlicher Masse für die Quantität der nützlichen Dinge. Die Verschiedenheit der Warenmasse entspringt teils aus der verschiedenen Natur der zu messenden Gegenstände, teils aus Konvention»。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話的英文譯文如下：«Any such thing is a whole in itself, the sum of many qualities or properties, and may therefore be useful in different ways. To discover these different ways and therefore the various uses to which a thing may be put, is the *act of history*. So, too, is the finding and fixing of *socially recognised standards of measure* for the quantity of useful things. The diversity of the modes of measuring commodities arises partly from the diversity of the nature of the objects to be measured, partly from convention»。——編者注

布罗德豪斯先生把这段話譯成下面这样：

“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有用形式，是時間的事情。因此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容量之所以不同，一部分是由于不同的性质”^①等等。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找到物的各种有用方面构成历史进步的实质部分，按照布罗德豪斯先生的說法，这只是時間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社会尺度的确定也是这样。按照布罗德豪斯先生的說法，“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还是“時間的事情”；当然，馬克思从来没有为这种尺度費过心思。最后，布罗德豪斯錯誤地把 *Maße* (尺度) 和 *Masse* (容量) 混为一談，从而把不知什么时候捉住的一只头号“螃蟹”送給了馬克思。

往下馬克思說道：“不論財富的社会形式〈实现占有和分配的特殊占有制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財富的物质內容。”^② 布罗德豪斯先生譯为：

“使用价值构成財富的真实基础，这种基础始終是使用价值的社会形式。”^③

这不是自恃过高的鄙俗，就是彻头彻尾的荒唐。

① 布罗德豪斯的譯文如下：«To discover these various ways, and consequently the multifarious modes in which an object may be of use, is a work of time. So, consequently, is the finding of the social measure for the quantity of useful things. The diversity in the bulk of commodities arises partly from the different nature», etc. — 編者注

②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如下：«Gebrauchswerte bilden den stofflichen Inhalt des Reichtums, welches immer seine gesellschaftliche Form sei».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句话的英文譯文如下：«Use-values form the material out of which wealth is made up, whatever may be the social form of that wealth». — 編者注

③ 布罗德豪斯的譯文如下：«Use values constitute the actual basis of wealth which is always their social form». — 編者注

商品的第二个方面是它的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可以按照一定的不断改变的比例互相交换,即一切商品都有交换价值,——这个事实说明,这些商品含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我不谈布罗德豪斯先生在这里翻译马克思这本书的一个最细致的分析时所采取的轻率态度,我径直谈谈该书中下面这个地方,马克思在这个地方说:“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在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的时候,才加以考虑。”他接着说:“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掉。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①

而布罗德豪斯先生译为:

“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交换比例的特点,显然正是这些被抽出的使用价

① 这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 «Dies gemeinsame kann nicht eine geometrische, physikalische, chemische oder sonstige natürliche Eigenschaft der Waren sein. Ihre körperlichen Eigenschaften kommen überhaupt nur in Betracht, soweit selbe sie nutzbar machen, also zu Gebrauchswerten. Andererseits aber ist es gerade die Abstraktion von ihren Gebrauchswerten, was das Austauschverhältnis der Waren augenscheinlich charakterisiert. Innerhalb desselben gilt ein Gebrauchswert grade so viel wie jeder andre, wenn er nur in gehöriger Proportion vorhanden ist».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 «This something common to all commodities cannot be a geometrical, physical, chemical or other natural property. In fact their material properties come into consideration only in so far as they make them useful, that is, in so far as they turn them into use-values. But it is the very act of *making abstraction from their use-values* which *evidently* is the characteristic point of the exchange-*relation* of commodities. *Within this relation*, one use-value is equivalent to any other, so long as it is provided in *sufficient* proportion». ——编者注

值。只要比例相同，一种使用价值本身就与另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①

这样一来，布罗德豪斯先生——我們暫且撇开他的較小的誤譯不談——就强迫馬克思說出与他实际上讲的恰恰相反的話来。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关系的特点是下面这个事实：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完全抽象掉，商品被看做是根本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馬克思著作的翻譯者則强迫馬克思說：交换比例（这里根本談不到这个）的特点正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只不过是“被抽出的”罢了！而往下隔了几行，他的笔下就出現了馬克思的这样一句話：“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不管它是抽象的使用价值还是具体的使用价值。我們有理由問：“你懂不懂你讀的东西？”

对这个問題作肯定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們看到，布罗德豪斯先生一再重复这种錯誤的理解。馬克思在刚刚提到的那句話后面繼續說道：“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即抽象掉〉，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們手里也已經起了变化。如果我們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象掉，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成分和形式抽象掉。”^②

① 布罗德豪斯的譯文如下：《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precisely *these use-values in the abstract* which *apparently* characterise the exchange-ratio of the commodities. *In itself*, one use-value is worth just as much as another if it exists in the *same* proportion》。——編者注

② 这段話的德文原文如下：《Sieht man nun vom Gebrauchswert der Warenkörper ab, so bleibt ihnen nur noch eine Eigenschaft, die von Arbeitsprodukten. Jedoch ist uns auch das Arbeitsprodukt bereits in der Hand verwandelt. Abstrahieren wir von seinem Gebrauchswert, so abstrahieren wir auch von den körperlichen Bestandteilen und

布罗德豪斯先生把这段話譯成英文后成了这样：

“如果我們把使用价值和商品的实体分开，那就只剩下了〈在哪里？在使用价值中还是在实体中？〉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們手里就大改旧观。如果我們撇开劳动产品而抽出它的使用价值，那末也就是抽出它的使用价值所由构成的本质和形式。”^③

馬克思又說：“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們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象掉，就得到它們的上面所确定的价值。”^④ 布罗德豪斯先生把这段話譯成这样：

“在商品的交换比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看起来是同它們的使用价值完

Formen, die es zum Gebrauchswert machen»。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話的英文譯文如下：«Now, if we *leave out of consideration*» (that is, make abstraction from) «the use-values of the commodities, there remains *to them* but one property: that of being the products of labour. But even this product of labour has already undergone a change in our hands. If we make abstraction *from its use-value*, we also make abstraction *from the bodily components* and forms which *make it into* a use-value»。——編者注

③ 布罗德豪斯的譯文如下：«If we *separate* use-values *from* the actual material of the commodities, there remains» (where? with the use-values or with the actual material?) «one property only, that of the product of labour. But the product of labour is already transmuted in our hands. If we abstract *from it its use-value*, we *abstract also the stamina and form* which *constitute its* use-value»。——編者注

④ 这段話的德文原文如下：«Im Austauschverhältnis der Waren selbst erschien uns ihr Tauschwert als etwas von ihren Gebrauchswerten durchaus unabhängiges. Abstrahiert man nun wirklich vom Gebrauchswert der Arbeitsprodukte, so erhält man ihren Wert wie er eben bestimmt ward»。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話的英文譯文如下：«In the exchange-*relation* of commodities, their exchange-value presented itself to us as something perfectly independent of their use-values. Now, if we actually make abstraction *from the use-value* of the products of labour, we arrive at their value, as *previously* determined by us»。——編者注

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現在真正撇开劳动产品而抽出使用价值,就得到它們的那时所确定的价值。”^①

毫無疑問,对于布罗德豪斯先生說来,除了从錢柜或金庫中取錢这种物理方式的抽法以外,他再也沒有听見過任何别的抽法了。但是一个翻譯馬克思著作的人,把抽象法和减法 [abstraction and subtraction] 等同起来是决不应当的。

再举一个把德文的意思譯成英文后变得毫无意思的例子。馬克思最細致的分析之一就是揭示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作为使用价值的創造者的劳动是与作为价值的創造者的劳动不同的特殊性质的劳动。一种是特定种类的劳动,如紡紗、織布、耕地等;另一种是人的生产活动的共同属性,是紡紗、織布、耕地等等所共有的、可以用一个共同的名詞“劳动”把这一切包括进去的属性。一种是具体劳动,另一种是抽象劳动。一种是技术意义上的劳动,另一种是經濟意义上的劳动。簡言之:英文有能够表示这两种劳动的名詞——一个是不同于 labour 的 *work*; 一个是不同于 work 的 *labour*。馬克思做了这个分析之后,接着說道:“起初我們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現为价值而論,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② 布罗德豪斯先生硬要证明,他絲毫也不懂得馬克

① 布罗德豪斯的譯文如下: «In the exchange-ratio of commodities their exchange-value appears to us as something altogether independent of their use-value. If we now in effect abstract *the use-value from the labour-products*, we have their value as it is *then* determined». ——編者注

② 这段話的德文原文如下: «Ursprünglich erschien uns die *Ware* als ein Zwieschlächtiges, Gebrauchswert und Tauschwert. Später zeigte sich, dass auch die Arbeit, soweit sie in Wert ausgedrückt ist, nicht mehr

思的分析，他把上面這句話譯成这样：

“首先我們看到，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混合物。后来我們看到，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論，它具有那种属性只是因为它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者。”^③

馬克思說“白”的时候，布罗德豪斯先生看不出为什么他不能譯成“黑”。

这个例子就談到这里吧。我們再举个更滑稽的例子。馬克思說：“在市民社会中，流行着一种 *fictio juris* [法律上的虚构]，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购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識。”²⁷³ 虽然“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純粹是个英文詞，而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²⁷⁴ 也出版一百多年了，但布罗德豪斯先生还是觉得这个名詞太难办。他把它譯成“在普通人中間” [«amongst ordinary people»]，于是就把这个意思变成了毫无意思的东西。因为正是“普通人”經常苦于不知道自己需要购买的商的本性和价值而受到小店主的欺騙等等。

使用价值的生产 (*Herstellung*) 被譯成“使用价值的确定 [*establishing*]”。馬克思說：“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变成金鋼石，金

dieselben Merkmale besitzt, die ihr als Erzeugerin von Gebrauchswerten zukommen»。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話的英文譯文如下：«Originally a commodity presented itself to us as something duplex: Use-value and Exchange-value. Further on we saw that labour, too, as far as it is expressed in value, *does no longer possess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which belong to it in its capacity as a creator of use-value»。——編者注

③ 布罗德豪斯的譯文如下：«We saw the commodity first as a *compound* of Use-value and Exchange-value. Then we saw that labour, so far as it is expressed in value, *only possesses that character so far as* it is a generator of use-value»。——編者注

鋼石的价值会低于磚的价值。”布罗德豪斯先生看来不知道金鋼石是碳的同素异形体，因此把煤变成了焦炭。同样，他把“巴西金鋼石矿的总产量”^①变成了“总产量的利潤总额”。^②“印度的原始公社”在他的笔下成了“可敬的[venerable]公社”。馬克思說：“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steckt, 这最好譯做“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时耗費了”〉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③布罗德豪斯先生則說：

“商品的使用价值包含着一定量的生产力或有用劳动，”^④

这样一来，就不仅把质变成了量，而且把已經耗費的生产活动变成了应当耗費的生产力。

够了。我本来可以举出十倍以上的例子来证明，布罗德豪斯

①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如下：《Gesamtausbeute der brasilischen Diamantgruben》。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句话的英文譯文如下：《Total yield of the Brazilian diamond mines》。——編者注

② 布罗德豪斯的譯文如下：《The entire profits of the whole yield》。——編者注

③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如下：《In dem Gebrauchswert jeder Ware steckt eine bestimmte zweckmässig produktive Tätigkeit oder nützliche Arbeit》。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句话的英文譯文如下：《In the use-value of a commodity is contained》(steckt, which has better be translat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use-value of a commodity there had been spent) 《a certain productive activity, adapted to the peculiar purpose, or a certain useful labour》。——編者注

④ 布罗德豪斯的譯文如下：《In the use-value of a commodity is contained a certain quantity of productive power or useful labour》。——編者注

先生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不是一个能够翻譯馬克思著作的人，特別是因为他显然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①

写于 1885 年 10 月

原文是英文

載于 1885 年 11 月“公益”
杂志第 10 期

俄文譯自“公益”杂志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資本論”不是一本可以根据合同来翻譯的书。这本书的翻譯工作正由卓越的翻譯家們进行，但是，由于他們不能把自己的全部時間都投入這項工作，所以，耽誤了。現在虽然还不能准确地确定出书日期，但是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讀者明年定能讀到英文版的“資本論”。

关于普魯士农民的历史

威·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²⁷⁵

为了使人了解沃尔弗这一著作，我认为有必要在它前面写几句话。

德国在易北河以东、厄尔士山脉和理森山以北的地区，是中世纪下半叶从入侵这里的斯拉夫人手中夺过来并被德国移民重新日耳曼化了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被分赐给参加征服行动的德国骑士和男爵，他们以村庄的“创业者”的身分出现，把自己的领地划成一块块村庄耕地，而每块村庄耕地又分成某些大小相等的农民份地，即胡菲。每一块胡菲在本村庄都有一块带院子和菜园的宅基。这些胡菲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从法兰克（莱茵法兰克尼亚和尼德兰）、萨克森、弗里西安迁到这里来的移民；为此，移民有义务对创业者，即骑士或男爵，担负很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代役租和工役。农民只要担负这些赋役，就是自己胡菲的世袭占有者。此外，他们在创业者（后来的领主）的森林中还享有西德意志农民在他们公共马尔克中享有的同样的权利，如采伐、放牧、采集橡实饲料等等。村庄的耕地实行强制的轮作制，大多数是按照三圃制分为冬耕地、春耕地、休闲地来耕种。休闲地和留茬地供创业者和农民共同放牧之用。村庄中的一切事务都在同村人即胡菲所有者的会议上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贵族创业者的

权利只限于征收貢賦、在休閑地和留茬地上共同放牧、收取森林收益的剩余部分并主持同村人會議，而同村人全都是人身自由的人。这就是从易北河直到东普魯士和西里西亚的德国农民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总的說来要比当时西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农民所处的状况好得多；后者那时为了自己旧日的世襲权利，已經同封建主进行激烈的、經常爆发的斗争，并且大多数人已經陷入了一种痛苦得多的、威胁着甚至完全剝夺了他們的人身自由的依附形式。

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封建主不断增长的对货币的需要，自然在东北部也产生了违反过去的契約、压榨和剝削农民的企图，但是其規模和成效远沒有南德意志那样大。易北河以东人口还很稀少，荒地很多；开垦这些荒地、扩展农业、建立可以收取地租的新村庄，在这里对大封建地主說来也仍然是发财致富的最可靠的手段。而且在这里，在德意志帝国同波兰交界的地方，已經形成了一些比較大的邦：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薩克森选帝侯国（西里西亚属于奥地利），因此，同处于分散割据状态的萊茵各省、同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相比，这里的内部和平維持得較好，貴族的紛爭和掠夺也受到了比較有力的压制；而受这样的連年战争之苦最深的总是农民。

只是在同被征服的波兰普魯士或立陶宛普魯士的村庄毗邻的地方，貴族的企图才比較經常地表現出来，他們企图使根据德国封建习惯法迁来的移民屈服于农奴依附状态，同他們的普魯士和波兰的臣民一样。在波美拉尼亚，以及在普魯士的騎士团²⁷⁶領地中，就有这种情况；在西里西亚，这种情况比較少些。

易北河以东的农民，由于处在这种比較有利的状况中，所以在

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前后五十年左右，几乎沒有受到南德意志和西德意志的强大农民运动的影响；当1525年革命爆发的时候，也只是在东普魯士有一点微弱的回声，沒有費多大力气就被鎮压了下去。易北河以东的农民把自己的起义兄弟交給命运支配，因而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在伟大的农民战争曾經剧烈进行的那些地方，农民徑直被变成了农奴，担負着毫无限制的、完全由封建領主任意决定的徭役和賦役，而他們的自由的馬尔克干脆成了領主的財產，只是在封建主开恩的情况下他們才繼續享有。德国貴族徒然地追求了整个中世紀而現在在封建經濟解体时期終於达到了的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理想状态，也开始漸漸扩展到易北河以东的土地上来了。不仅农民根据契約規定使用領主森林的权利——在这种权利还没有受到限制的場合——变成了封建領主可以随时取消的恩准，不仅违法地增加了徭役和代役租，而且还增加了各种新的賦役，例如被认为是农奴依附状态的特征的接租費（农戶戶主死亡时向封建主繳的費用）；或者使通常的傳統的賦役具有只是农奴而不是自由人担負的那种賦役的性质。这样一来，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易北河以东的自由农民，起初是在事实上，很快又在法律上变成了农奴。

同时，封建貴族愈来愈資产階級化了。他們欠城市貨幣資本家的債務愈来愈多，因此，貨幣便成了他們的迫切需要。但是，能够从农民即自己的农奴身上榨取的并不是貨幣，而首先只是劳动或农产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經營的农民經濟，除了維持从事劳动的占有者的最低下的生活以外，只能提供最少量的剩余农产品。而在近旁，就是面积广、收入大的寺院土地，这些土地是由占有者出資，在內行的監督下，用依附农或农奴的徭役劳动来耕种的。这

种經營方法，小貴族在此以前在自己的領地上几乎从来不能够运用，就是大貴族和諸侯能够这样做的也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而現在，由于国内安定，到处都能够經營大規模的經濟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对貨币的需要，也日益迫使貴族这样做。于是由封建領主出資依靠农奴的徭役劳动来耕种大庄园，就逐渐成了貴族的收入来源，用来补偿由于不再从事过了时的騎士掠夺而遭受的損失了。但是，从哪里得到所需要的土地呢？誠然，貴族都占有面积多少是比較大的土地，但是这些土地，除了少数例外，已經全部租給了世襲的佃农²⁷⁷，这些佃农只要担負規定的賦役，他們对于自己的田庄和胡菲以及公有地便享有与領主本人同样的权利。这里必須找个解决办法，为此，首先需要把农民变为农奴。其实，即使把农奴从他們的家园中驅逐出去，从违法和使用暴力方面說来是一种不亚于驅逐自由佃农的行为，但是，用已經通行的羅馬法为驅逐农奴作辯护还是要容易得多。一句話，在把农民变成了农奴之后，便按照所需要的数量把他們从土地上驅逐出去，或者使他們作为无地农，即仅有茅屋和小菜园的短工，再定居在領主的土地上。貴族从前的筑垒城堡已經让位給新的、多少开放了些的农村府第，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的自由农民的数量多許多倍的田庄就應該让位給农奴的簡陋茅屋了。

領主的地产——在西里西亚叫做农庄——安排妥当之后，剩下的問題只是用农民的劳力来耕种。于是农奴制的另一个有利方面又在这里表現出来了。以前契約上有一定規定的农民的各种徭役已經完全不合乎这个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徭役义务都只限于从事公益劳动，例如建筑道路、桥梁等，以及領主城堡中的建筑劳动、妇女和少女在城堡中从事各种工艺劳动和杂役。但是

一旦农民变成了农奴，而以羅馬法为依据的法学家又把这种农奴和羅馬的奴隶等同起来，領主們也就唱起完全不同的調子来了。現在，他們在法院里有法学家的支持，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要求农民从事各种毫无限制的工役。只要領主一有吩咐，农民就是荒废自己的田地，让自己应收获的庄稼泡在雨水中烂掉，也得去为領主服徭役、搬运、耕耘、播种、收割。而农民用谷物或貨币交納的代役租也同样被提高到了最高限度。

不仅如此。同样高貴的領主王公——这种領主王公在易北河以东到处都有——也需要貨币，需要大量的貨币。他們允許貴族压榨自己的农民，为此，貴族也允許他們向农民征收国稅——貴族本身当然是免稅的！而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就是，这个領主王公还在实际上批准把封建領主过去早已废除的主持封建的自由农民裁判所的权利，变为实行領主裁判和建立領地警察的权利；因此，領主不仅成了警察头子，而且甚至在涉及他們自身的案件中也成了审判自己的农民的唯一裁判官，因而农民只能向領主本人控訴領主。这样一来，領主身兼立法者、裁判官和判决执行人，他成了自己領地上的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統治者。

甚至在俄国也不可能找到类似的不光彩的状况，因为在俄国农民总算还有他們的自治团体。这种不光彩的状况，在三十年战争和起了救命作用的耶拿之敗²⁷⁸之間的这段时期中，达到了頂峰。三十年战争的灾难，使貴族得以彻底奴役农民；由于无数农民經濟的荒废，就有可能毫无阻碍地把它們并入騎士領地的农庄。在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强制下到处流浪的居民开始定居下来，就使貴族有了方便的借口把农村居民作为农奴捆縛在土地上。但即使这样，也为时不长。因为，当战争所造成的可怕創伤在以后的

五十年中刚开始結疤，田地刚重新开始耕种，人口刚开始增加的时候，高貴的封建領主又对农民土地和农民劳动起了貪心。領主农庄还不够大，容不下可以从农奴身上榨取的全部劳动——榨取在这里用的是它字面上的意义。把农民貶为无地农、农奴般的短工的办法，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从十八世紀初开始，这种办法便日益盛行起来了，它現在叫做“驅逐农民”。根据情况能“驅逐”多少农民就“驅逐”多少；最初还留下为完成驅使畜力的劳役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农民，而使其余的农民都变成无地农（打谷工，茅屋工，合同工²⁷⁹以及其他具有类似名称的人）。他們为了一間茅屋和一小块种馬鈴薯的地，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領地上做苦工，而得到极其微薄的日工資——谷物和微不足道的一点錢。凡是領主比較富裕，能够使用自己耕畜的地方，就把其余的农民也“驅逐”出去，而他們的胡菲便并入領主的經濟。可見，德国貴族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貴族的一切大地产，都是由掠夺来的农民土地构成的；即使把这些土地无偿地从掠夺者手中夺回来，也不能說是使他們完全得到了应有的恶报。实际上，还应该向他們要求赔偿。

逐漸地，領主王公們开始注意到，这种对貴族极其有利的办法完全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农民沒有被驅逐以前，他們还繳納国稅，而自从他們的胡菲被并入免税的农庄以后，国家从这里不能得到分文，而从重新定居下来的无地农那里得到的也不过是一点小錢。被逐农民中有一部分对經營农庄說来是多余的，他們便干脆被赶走了；于是这些农民就成了自由人，也就是說，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农村人口在縮减，而当領主王公开始用在农民中征兵的廉价方法来补充自己的費用龐大的雇佣軍的时候，这对他們远

远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此，在整个十八世紀中，特别是在普魯士，为了制止驅逐农民发布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但是，这些命令的命运同查理大帝的敕令²⁸⁰以后历届德国政府所写的无数文牘廢紙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命运一样，仍然是紙上空談；貴族对它們毫不在意，驅逐农民繼續进行。

甚至法国大革命給予頑固的封建貴族的严厉教訓，也只是在一个很短時間使他們感到恐惧。一切依然如故；弗里德里希二世无法做到的事情²⁸¹，他的軟弱而目光不远的侄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更无法做到。但是，报复临头了。1806年10月14日，整个普魯士国家一天之內就在耶拿和奧埃爾施太特被打碎了。普魯士农民有一切理由比庆祝普魯士从莫耳維茨到色当的胜利更隆重地庆祝这个日子，像庆祝1848年3月18日那样。²⁸²只是到这时，被赶到俄国边境的普魯士政府才终于模糊地理解到，依靠經常处于被逐出自己家园的威胁之下的服徭役的农奴的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的子弟的。只是到这时，普魯士政府才终于觉察到，农民竟也是人。現在應該采取措施了。

但是和約刚刚締結，宮廷和政府刚刚回到柏林，高尙的意念便像三月阳光下的冰雪一样化掉了。有名的1807年10月9日敕令虽然在紙面上废除了农奴制或世襲依附关系这种名称（而这也只是从1810年圣馬丁节才开始！）²⁸³，但是实际上几乎一切都依然如故。事情至此就停了下来。怯懦透頂、昏庸透頂的国王照旧万般听命于掠夺农民的貴族，結果从1808年到1810年就頒布了四个命令，不顾1807年敕令，重新允許領主在一系列場合下驅逐农民。²⁸⁴只有当拿破侖对俄战争已經迫近的时候，才又想到需要农民，于是頒布了1811年9月14日敕令²⁸⁵，建議农民和領主在两

年以内就贖免徭役和賦役以及向領主贖免最高所有权的問題达成一个和睦的協議，而且过了这一期限，皇家委员会就要根据規定的条例强制地实行这种協議。条例的基本原則規定，农民如果让出自己土地的三分之一（或付出其貨幣价值），应该成为他剩下的土地的自由的所有者。但是，甚至这种对貴族非常有利的贖免办法仍然是一种幻想，因为貴族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而阻撓这种办法的实现；于是两年以后，拿破侖又打到国内来了。

为了赶走拿破侖，吓破了胆的国王曾經不断許愿在将来制定宪法和实行人民代議制度，但是拿破侖刚刚被赶出国去，一切动听的諾言又被忘得干干淨淨。在1816年5月29日——滑铁卢胜利后还不到一年！——便頒布了关于1811年敕令的声明，腔調完全变了。²⁸⁶可以贖免封建賦役的事情，在这里已經不再是一种規定，而是一种例外了：它只适用于已經在土地稅务簿上登記了的（因此是面积比較大的）耕地，而且农户使用这些耕地在西里西亚要从1749年算起，在东普魯士要从1752年，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要从1763年^①，在西普魯士要从1774年算起！而且也允許保留播种和收获时的一些徭役。而当1817年終於认真地处理贖免委员会問題的时候，土地立法的退步大大超过了土地委员会的进步。接着，在1821年6月7日，又頒布了新的贖免条例²⁸⁸，

① 普魯士的奸猾是无孔不入的。在这里这种奸猾的作风甚至也表現在日期上。为什么选择1763年呢？这只是由于次年即1764年7月12日弗里德里希二世頒布了一个严格的敕令，責成頑固的貴族在一年以内，使有关的占有者在那些从1740年特别是七年战争²⁸⁷开始以后被大量侵占的农民家园和无地农居住地上定居下来，否則就要受到懲罰。如果說这个敕令产生了一些效果的話，那末这些效果也由于照顾貴族的利益在1816年又被取消了。

重新規定对贖免权利加以限制，只把这种权利授予比較大的农户，即所謂的自給戶²⁸⁹，而对于小农户——无地农、茅屋工、打谷工，一句話，一切定居下来的短工——都明确地規定要永远担負徭役和其他各种封建賦役。从此以后，这便成了一种通例。只是从1845年起，才破例地允許在薩克森²⁹⁰和西里西亞不經領主和农民双方協議（这当然用不着法律規定）而贖免这种賦役。²⁹¹此外，还把以货币或谷物計算的，用来永远贖免賦役的資本化的款額規定为地租的二十五倍；每次付款都不得少于一百塔勒^①，而早在1809年，在国有土地上已經允許农民用地租的二十倍进行贖免了。一句話，这个“理性的国家”²⁹²的有名的开明土地立法只追求一个目的：从封建制度下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西。

实际的結果是与这些可怜的措施相称的。土地委员会完全領会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正如沃尔弗用具体例证清楚地說明的，这些委员会所关心的是在贖免时用妥善的办法欺騙农民，使貴族得利。从1816年到1848年，有70 582个农户面积总計达5 158 827摩尔根土地被贖免了，这个数目占負有徭役义务的比較大的农户总数的七分之六。但是，小农户中贖免的却只有289 651戶（其中西里西亞、勃兰登堡、薩克森的农户占228 000戶以上）。一年贖免的徭役总日数共計：畜力劳役5 978 295日、人力劳役16 869 824日。高貴的貴族由此获得的补偿是：应清償資本化的款額18 544 766塔勒，货币地租每年1 599 992塔勒，以实物地租交納的黑麦每年260 069舍費耳^②，最后还有农民让出的土地1 533 050摩尔

① 塔勒是普魯士旧时銀币，一塔勒等于3馬克。——編者注

② 舍費耳是普魯士旧时容量单位，一舍費耳等于54.962公升。——編者注

根^①。这样一来，除了其他各种补偿以外，原来的封建領主还得到了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

1848年终于使鼠目寸光而又高傲自大的普魯士土容克們醒悟过来了。农民——特别是在大地产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强制地使居民变为做短工的无地农的现象获得了最充分发展的西里西亚——襲击了城堡，烧毁了已經簽訂的贖免文契，并且迫使領主立据保证以后不再征收賦役。誠然，就連当时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也看做是大逆不道的这些过火行为，被軍事力量镇压下去了，并且招致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当时即使最沒有脑筋的容克脑壳也明白：征徭役已經不可能了，与其要求这些造反的农民服徭役，不如根本不再征徭役！現在的問題只是要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西；而占有土地的貴族也就真的恬不知耻地为放弃这些已經无法得到的賦役而要求补偿。于是，当反动派稍微感到已經多少站稳了脚跟的时候，就满足了这种要求。

可是起初还是頒布了1848年10月9日法令，它規定停止办理一切至今尚未結束的贖免案件和与此有关的訴訟事务，以及領主和农民之間的一系列其它訴訟事务。²⁹⁴因此，1807年以来的全部有名的土地立法都遭到了这个法令的譴責。但是当柏林的所謂国民議會刚刚被順利地驅散，并成功地实行了政变^②以后，封建官僚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来为貴族采取有效的步驟。1848年12月20日，这个內閣发出了一个临时法令，規定除了少数例外，在原来的基础上恢复农民的賦役等等，直

① 关于这个統計数字，見奧·麥岑“普魯士国家的土地”第1卷第432頁及以下各頁。²⁹³

② 見本卷第232—233頁。——編者注

到将来进行調整时为止。²⁹⁵ 这一法令便成了我們的沃尔弗在“新萊茵报”上闡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导因。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直到 1850 年 3 月 2 日才通过了新的、最后的贖免法。²⁹⁶ 对于直到現在仍然被普魯士爱国者捧上了天的 1807—1847 年間的土地立法的譴責，最尖銳的莫过于在这一法律的緒論中——当然这是违反他們的心愿的，——而且是由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亲口发出的譴責。

簡言之，有一些无关紧要的賦役簡單地被废除了，而其他各种賦役則規定化为貨幣地租，加以資本化，折合为十八倍的款額加以贖免；为了在支付資本化的款項时进行仲裁，成立了地租銀行，銀行采取众所周知的分期付款办法以地租的二十倍向領主交付款額，而农民只有在五十六年中分期付款清了欠款以后才能摆脱一切义务。

內閣在它的緒論中譴責了过去的全部土地立法，而議院的委员会則譴責了新法律。这一法律是不应当适用于萊茵河左岸地区的，因为法国革命早就使这个地区摆脱了这一切破烂东西。委员会同意做这种限制，其理由是該法案的第一〇九条条文中最多只有一条适用于这个地区，

“而其余的一切規定对于这些地方完全不合适，不仅如此，而且还很容易在那里引起混乱和不必要的騷动……因为萊茵河左岸地区的立法在废除土地賦役方面大大超过了現在打算采取的步骤”²⁹⁷，

所以，不能指望萊茵地区的居民愿意再一次使自己处于新普魯士的理想环境中。

現在終於认真地着手清除封建的劳动形式和剝削形式了。在几年的时间內，农民的贖免工作已經进行完毕。从 1850 年到 1865

年底通过贖免而获得自由的有：（1）剩下的那部分比較大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他們只有 12 706 人，土地面积为 352 305 摩尔根；（2）包括无地农在內的小土地所有者，在 1848 年以前贖免的将近 29 万人，而在以后 15 年中贖免的有 1 014 341 人。这样的結果，大农户所贖免的劳役是：畜力劳役只有 356 274 日，贖免的人力劳役是 6 670 507 日。用土地作补偿的也只是比較大的农户，总共只有 113 071 摩尔根，必須用黑麦交納的年地租是 55 522 舍費耳。同时，土地貴族得到了 3 890 136 塔勒的新的年貨幣地租，此外在农民最后清償了資本化的款額时还得到了 19 697 483 塔勒^①。

普魯士的所有封建地产，包括国有农庄在內，为了自愿地把过去——包括本世紀在內——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土地的一部分归还給农民而迫使农民从口袋中付出的款額，根据麦岑計算（第 1 卷第 437 頁）是 213 861 035 塔勒。但是这个数目大大縮小了。因为在这里“只”把每摩尔根的耕地算 20 塔勒，每摩尔根林地算 10 塔勒，每舍費耳黑麦算 1 塔勒，就是說比实际价格低得多。况且，这里所根据的只是“完全确实有案可查的契約”，就是說，至少是那些由双方私人达成的協議都未估計在內。麦岑本人也說，他所引用的关于被贖免的賦役，自然，还有关于为此而付出的补偿費的資料，只不过是“最起碼的”。

因此，我們可以认为，农民为了摆脱非法地加在他們身上的賦役而交付給貴族和官厅的款額，至少也有 3 亿塔勒，而且可能达 10 亿馬克。

10 亿馬克，只不过把在四百年內掠夺去的土地以免征賦役的

① 这些数字是麦岑的两个統計表上的总計数的差額（第 1 卷第 432 和 434 頁）。²⁹⁸

形式换回很小很小一部分！这是很小很小一部分，因为贵族和官厅已把大得多的部分作为世袭领地以及其他贵族领地和国有农庄攫为己有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11月24日于伦敦

载于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
(1886年霍廷根—苏黎世版)一书，
作为导言的第二部分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里西亚的十亿”

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²⁹⁹一書德文第三版序言

“霧月十八日”在初版問世三十三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絲毫沒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靂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詛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誤入迷途的懲罰，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沒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馬克思发表一篇簡练的諷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內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³⁰⁰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英雄除了給予完全应得的蔑視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別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繪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

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結局；因而階級斗争借以进行、階級斗争的結果借以表現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現得最为鮮明。法国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統一的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这种統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沒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馬克思不仅特別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細節，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沒有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規律，根据这个規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領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态領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階級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現，而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冲突，又为它們的經濟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約。这个規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檢驗了他的这个規律；即使已經过了三十三年，我們还是應該承认，这个檢驗获得了輝煌的成果。

弗·恩·

写于 1885 年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85 年在汉堡出版的
卡尔·馬克思“路易·波拿
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

俄文譯自“路易·波拿巴
的霧月十八日”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³⁰¹

用讲英語的讀者的本族語言呈獻給他們的这本书，是四十多年以前写的。那时作者还年輕，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無論优点或缺点都沒有什么使他臉紅的地方。这本书譯成英文，完全不是作者倡議的。不过他还是可以讲几句话，为他沒有阻止出版这个譯本“作个辯护”。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过去。現代政治經濟学的規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沒有明确提出）就是：資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瑣細的哄騙和欺詐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瑣細的騙人伎俩，那些使他們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同样，一个經紀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个月，他就会發現，要想廉价购入棉紗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經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粗鄙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頂峰。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那里時間就是金錢，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純粹是为了節約時間和劳动。在工

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谷物法的废除³⁰²、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印度的家庭手工织布业几乎完全被排挤、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全世界的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迅速增长以及其他的次要原因，引起了英国大工业这样巨大的发展，以致 1844 年的工业状况同这种巨大的发展相比，都显得是原始的和微不足道的了。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保持竞争还有用处。这样，实物工资制 [truck-system] 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³⁰³，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

业部門中远不是这样——在資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經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病痛。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病痛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資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資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內容，工人必須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創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費資本家一文錢，但仍然落入資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万德比尔特們，全部生产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們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結果的，并不是工人的某些小的病痛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資本主义 1847 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鮮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現象，現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經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經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貧民窟”中間，有許多地方修建了寬闊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經消失了，“七日規”³⁰⁴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 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詩的笔調来描写的地区，現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經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的破

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 1885 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³⁰⁵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对头，它们如同我在 1844 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经达到与 1844 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³⁰⁶，——“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我刚刚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 12 000 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 1844 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³⁰⁷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在美国，有两种情况长期阻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充分显露出来。这就是：私人购买土地容易和廉价以及移民的流入。在许多年中，这使得大多数的美国本地居民在年青力壮的时候就“退出”雇佣劳动，变成农场主、商人或雇主，而沉重的雇佣劳动，当一辈子无产者的境遇，多半落到移民的身上。但是美国已经度过这个早期阶段。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更为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越来越快地从国家和各州的手里转到私有者手里。防止无产者形成一个固定阶级的大安全阀，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了。美国目前存在着一个终身的甚至世袭的无产者阶级。一个六千万人口的国家，一个正在顽强地——而且十分有可能成功地——力图成为世界上主导工业国的国家，是不能经常给自己输入雇佣工人阶级的，即使每年有 50 万移民流入也不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向是要使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少数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这种趋向，尽管经常受其他的社会因素的反反对和抵抗，在美国还是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强有力；结果就形成了美国本地的雇佣工人阶级，诚然，他们和移民比起来是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但是他们一天天地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和移民的团结，日益尖锐地感觉到自己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他们比较容易地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梯的那些日子。所以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真正美国的毅力，既然大西洋彼岸事变的发展至少要比欧洲快一倍，那末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美国将怎样在这方面也占居主导地位。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或详细地——列举 1844 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做到过得去，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而翻译本书

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使我不能着手这项工作；第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即将出版），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东西。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 1825 年到 1842 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 1842 年到 1868 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波动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 1868 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早了一些）德国、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以“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①为题发表在 1885 年 3 月 1 日伦敦“公益”杂志上的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这四十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 年 2 月 25 日于伦敦

载于 1887 年在纽约出版的
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① 见本卷第 224—231 页。——编者注

*紀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³⁰⁸

今天晚上全世界的工人和你們一起同時紀念無產階級發展過程中的最光榮和最富悲劇性的一个阶段。1871年，工人階級从有自己的历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作为首都的大城市中掌握了政权。但是，很可惜！这像梦一样消逝了。受到前法兰西帝国雇佣軍和普軍两面夹攻的公社，由于遭到空前的、永远不能从我們記憶中消失的屠杀，很快就被扼杀了。胜利了的反动派恣意橫行；好像社会主义已經淹死在血泊之中，而无產階級已經注定要永世受奴役了。

从这次失敗以来，已經过了十五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在一切国家中，为土地占有者和資本家效劳的政权，不择手段，企图摧毁工人的任何一点起义意图。它們究竟得到些什么呢？

放眼环顾一下吧。革命的工人社会主义比任何时候都富有生命力，它現在已經是一支使所有掌权者——無論是法国激进派、俾斯麦、美国的交易所巨头，或者是全俄罗斯的沙皇——胆战心惊的力量。

但是，岂止如此而已。

我們已經能使我們的所有敌人，不管他們做什么，都得事与愿违地为我們工作。

他們想置国际于死地。而无产者的国际团結，各国革命工人的友誼，已經比公社前夕巩固千倍，广泛千倍。国际不再需要原来

意义上的組織了；国际賴有欧洲和美洲工人自然的真誠的合作而活着并且在成长着。

在德国，俾斯麦用尽了一切手段，直到最卑鄙的手段，来扼杀工人运动。結果是：在公社以前他的对头有四个社会主义議員，在他迫害以后，目前选出了二十五个。工人們嘲笑这位首相：即使出錢雇他，他的革命宣传也不会做得比現在更出色了。

在法国，你們被强加了一个連名投票法³⁰⁹，这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专门为了保证只让律师、記者和其他政治冒险家——資本的代言人——当选而发明的。这个选举富人的制度給资产阶级带来了什么呢？它在法国議會会内部造成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仅仅出現在舞台上，就足以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造成混乱。

我們的形势就是这样。所有事件都变得对我們有利了。为阻撓无产阶级成功而精心策划的种种措施，只是加速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敌人在做对我們有利的事，他們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他們在这方面做得又多又好，所以今天，1886年3月18日，千百万工人，从加利福尼亚和阿韦龙的无产者矿工到西伯利亚的苦役矿工，都从内心发出了一致的呼声：

“公社万岁！工人的国际团结万岁！”

写于 1886 年 3 月 15 日

原文是法文

載于 1886 年 3 月 27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31 号

俄文譯自“社会主义者报”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³¹⁰

写于 1886 年初

載于 1886 年“新时代”杂志第 4 期
和第 5 期，并于 1888 年以单行本
在斯图加特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
第 21 卷譯出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VON
FRIEDRICH ENGELS

REVIDIRTER SONDER-ABDRUCK AUS DER „NEUEN ZEIT“

MIT ANHANG:
KARL MARX ÜBER FEUERBACH
VOM JAHRE 1845.

STUTT 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1888.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扉頁

—

我們面前的这部著作^①使我們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時間來說距离我們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現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經相隔整整一个世紀了。然而这終究是德国准备 1848 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 1848 年的繼續，仅仅是革命遺囑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十八世紀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紀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們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們本人則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獄。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們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終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經被推崇为普魯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們的迂腐晦澀的言詞后面，在他們的笨拙枯燥的語句里面竟能隱藏着革命嗎？不正是

① 《Ludwig Feuerbach》， von C. N. Starke, Dr. phil. — Stuttgart, Ferd. Encke, 1885 [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維希·費尔巴哈” 1885 年斯图加特斐·恩克书店版]。

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嗎？但是不論政府或自由派都沒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个人 在 1833 年已經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³¹¹

举个例子來說吧。不論哪一个哲学命題都沒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題那样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这个命題就是：

“凡是現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实的。”³¹²

这显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現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現实的。在他看来，現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稅制”为例——都已經无条件地是現实的。³¹³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題，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魯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說：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內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說，在我們看来，它終究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繼續存在，那末，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辯护和說明。当时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該有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見，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国是現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国也是現实的。法国的君

主制在 1789 年已經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尔談論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轉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來說已經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們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現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現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①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們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頂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結束了以为人的思維和行动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認識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現成的、一經发现就只要熟讀死記的教条了；現在，真理是包含在認識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認識的較低阶段上升到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謂絕對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

^① 歌德的悲劇“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場（“浮士德的书齋”）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話的套用。——編者注

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經获得的絕對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認識的領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認識領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領域中也是如此。历史同認識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級到高級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說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來說，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資產階級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場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穩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辯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終的絕對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絕對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維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誠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認識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時間和条件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絕對的——这就是辯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絕對的东西。

我們在这里沒有必要去研究这种看法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現狀相符合的問題，自然科学預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無論如何，我們現在距离社会历史开始

下降的轉折点还相当远，我們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問題。

但是这里必須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闡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結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³¹⁴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終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結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終点变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終点，即绝对观念——其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說不出什么来，——使自己“外化”（即轉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維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終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終点設想成这样：人类将达到正是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認識，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認識已經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內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辯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悶死。哲学的認識是这样，历史的实践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們在“法哲学”的結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頑强而毫无結果地向他的臣民約許的那种等級制君主政体中得到实现，就是說，应当在有产階級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

資產階級關係的、有限的和溫和的間接統治中得到實現；在這裡還用思辨的方法給我們證明了貴族的必要性。

可見，單是體系的內部需要就足以說明，為什麼徹底革命的思維方法竟產生了極其溫和的政治結論。這個結論的特殊形式當然是由下列情況造成的：黑格爾是一個德國人而且和他的同時代人歌德一樣地拖着一根庸人的辮子。歌德和黑格爾各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奧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脫去德國的庸人氣味。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妨礙黑格爾的體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體系所不可比擬的巨大領域，而且沒有妨礙它在這一領域中發展了現在還令人驚奇的豐富思想。精神現象學（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學和精神古生物學類似的學問，是對個人意識各個發展階段的闡述，這些階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識在歷史上所經過的各個階段的縮影）、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而精神哲學又分成各個歷史部門來研究，如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哲學史、美學等等，——在所有這些不同的歷史領域中，黑格爾都力求找出並指出貫穿這些領域的發展綫索；同時，因為他不僅是一個富於創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個學識淵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個領域中都起了劃時代的作用。當然，由於“體系”的需要，他在這裡常常不得不求救於強制性的結構，這些結構直到現在還引起他的渺小的敵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這些結構僅僅是他的建築物的骨架和腳手架；人們只要不是無謂地停留在它們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廈裡面去，那就會發現無數的珍寶，這些珍寶就是在今天也還具有充分的價值。在一切哲學家看來，正是“體系”是暫時性的東西，因為體系產生於人的精神的永恆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

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們就会达到所謂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終結，而历史是一定要繼續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經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既然我們了解到(对获得这种了解來說，归根到底沒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們的帮助更大)：这样給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終結了。我們就把沿着这个途徑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別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維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終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給我們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宮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認識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續了几十年，而且决沒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地，正是在1830到1840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統治达到了頂点，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讀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識”就是从这些通俗讀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綫胜利仅仅是一种內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黑格尔的整个学說，如我們所看到的，給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闊的活动場所；而在当时的理論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別重視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領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

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頻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說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費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費的要多得多。到三十年代末，他的学派內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左翼，即所謂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統的虔信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問題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們的学說直到目前为止曾經得到了政府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1840年，正統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們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經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問題已經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現存的国家了。如果說，在“德国年鉴”³¹⁵中实践的終极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場，那末，在1842年的“莱茵报”³¹⁶上青年黑格尔派已經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現，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領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轉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間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穌传”³¹⁷成了头一个推动力。后来，布魯諾·鮑威尔反对該书中所闡述的福音神話发生說，证明許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两人之間的爭論是在“自我意識”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神奇的福音故事是如何发生的，是在宗教团体內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神話发生的途徑形成的呢，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个問題竟扩展为这样一个問題：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

体”呢，还是“自我意識”；最后，出現了施蒂納，現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襲了好多东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³¹⁸ 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識”。

我們不打算更詳細地考察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的这一方面。在我們看来，更重要的是：由于对現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們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絕對观念的“外化”，好像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論如何，思維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們就在这个矛盾中徬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費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³¹⁹ 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賴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們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賴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們的宗教幻想所創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們所固有的本质的虛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像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驗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們一时都成为費尔巴哈派了。馬克思曾經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見），这可以从“神圣家族”³²⁰ 中看出来。

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調赢得了广大的讀者，无論如何，在抽象而費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統治以后，使人們的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爱

的過度崇拜也是這樣。這種崇拜，雖然不能加以辯護，但是情有可原，因為它是反對已經變得不能容忍的“純粹思維”的專制的。但是我們不應當忘記，從1844年起在德國的“有教養的”人們中間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來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正是把費爾巴哈的這兩個弱點當做自己的出發點的。它以美文學的詞句代替了科學的認識，主張靠“愛”來實現人類的解放，而不主張用經濟上改革生產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一句話，它沉溺在令人厭惡的美文學和泛愛的空談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爾·格律恩先生。

還有一點不應當忘記，這就是：黑格爾學派雖然解體了，但是黑格爾哲學並沒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勞斯和鮑威爾各自抓住黑格爾哲學的一個方面，在論戰中互相攻擊。費爾巴哈突破了黑格爾的體系，並且干脆把它拋在一旁。但是僅僅宣布一種哲學是錯誤的，還制服不了這種哲學。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辦法加以消除的。必須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它，就是說，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下面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任務是怎樣實現的。

但是這時，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氣地把任何哲學都撇在一旁，正如費爾巴哈把他的黑格爾撇在一旁一樣。這樣一來，費爾巴哈本人也被擠到後台去了。

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①，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

① 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³²¹

神的觀念。

因此，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像一切宗教一樣，其根源在於蒙昧時代的狹隘而愚昧的觀念。但是，這個問題，只是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的長期冬眠中覺醒以後，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來，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思維對存在的地位問題，這個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也起過巨大作用的問題：什麼是本原的，是精神，還是自然界？——這個問題以尖銳的形式針對着教會提了出來：世界是神創造的呢，還是從來就有的？

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說來是本原的，從而歸根到底以某種方式承認創世說的人（在哲學家那里，例如在黑格爾那里，創世說往往採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還要混亂而荒唐的形式），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本來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這裡也不能在別的意義上被使用。下面我們就可以看到，如果給它們加上別的意思，就會造成怎樣的混亂。

但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我們關於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於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個問題叫做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絕大多數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爾那里，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所認識的，正是這個世界的思想內容，也就是那種使世界成為絕對觀念的逐漸實現的東西，這個絕對觀念是從

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他的哲学是正确的，所以他的哲学也就是唯一正确的；只要人类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另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植物和动物身体中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說；而当勒威耶从这个太阳系学說所提供的數據，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³²²，哥白尼的学說就被证实了。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論者企图复活休謨的观点（在那里休謨的观点从来没有絕迹），那末，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論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車，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絕的羞羞答答的作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費爾巴哈这一长时期內，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样，只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們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經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論的观点来調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結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來說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費爾巴哈的評述中，首先研究費爾巴哈对思維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問題的立場。在簡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見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澀难解的哲学語言来闡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死守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詞句而大大貶低了黑格尔。在这个导言以后，他詳細地叙述了費爾巴哈的有关著作中一貫表現出来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过像整本书一样，决不是到处都不能避免的哲学用語堆砌得

太多了。作者愈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費尔巴哈本人的用語，愈是把各种学派、特别是在今天像传染病一样流行的、自称为哲学派别的那些学派的用語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愈大。

費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誠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統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驅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不可遏止地意識到，黑格尔的“絕對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邏輯范疇的預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虛幻殘余；我們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們的意識和思維，不論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純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費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見，即不反对事情本质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詞的偏見。他說：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識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像生理学家、狹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萊肖特所认为的那样，不是像他們从他們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样，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³²³

費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十八世紀所表現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談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談，十八世紀的唯物主义現在就以这种形式繼續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

畢希納、福格特和摩萊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賣。但是，像唯心主義一樣，唯物主義也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隨着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自從歷史也被唯物主義地解釋的時候起，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也在这里開辟出來了。

上一世紀的唯物主義主要是機械唯物主義，因為那時在所有的自然科學中達到了某種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學，而且只有剛體（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學，簡言之，即重量的力學。化學剛剛處於幼稚的燃素說的形態中。生物學尚在襁褓中；對植物和動物的機體只作過極粗淺的研究，並用純粹機械的原因來加以解釋；正如在笛卡兒看來動物是機器一樣，在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者看來，人是機器。僅僅運用力學的尺度來衡量化學過程和有機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力學定律雖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較高的定律排擠到次要地位），這是法國古典唯物主義的一個特有的、但在當時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這種唯物主義的第二個特有的局限性在於：它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历史發展中的物質。這是同當時的自然科學狀況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哲學思維方法相適應的。人們知道自然界是處在永恆的運動中。但是根據當時的想法，這種運動是永遠繞着一個圓圈旋轉，因而始終停留在同一地點；總是產生同一的結果。這種想法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陽系發生說剛剛提出，而且還只是被看做純粹的奇談。地球發展史，即地質學，還完全沒有人知道，而關於現今的生物是由簡單到複雜這樣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結果的看法，當時還根本不可能科學地提出來。因此，對自然界的非历史的

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因此，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五十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超出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末，使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叫卖者的学

說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費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問題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認識材料以空前的規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連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們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細胞、能量的轉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論，費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間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給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評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異議，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虛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費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聞的生活。因而，現在已經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終沒有为費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錯了。

第二，費尔巴哈說，純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識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們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謂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費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縛，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說：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考察。

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说：

“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19页）“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在我们看来，实在论只是在我們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图时使我们不致误入迷途而已。难道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不是理想的力量吗？”（第VIII页）

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但这些目的必然地至多是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联系；然而连康德都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先验的唯心主义”，这决不是因为那里面也讲到过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于别的理由，这理由施达克是会记得的。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

沉湎于不能實現的理想的庸人傾向(參見“現象學”³²⁴)。

第二，決不能避免這種情況：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甚至吃喝也是由於通過頭腦感覺到的飢渴引起的，並且是由於同樣通過頭腦感覺到的飽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機、意志，總之，成為“理想的意圖”，並且通過這種形態變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個人只是由於他追求“理想的意圖”並承認“理想的力量”對他的影響，就成了唯心主義者，那末任何一個發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義者了，這樣怎麼還會有唯物主義者呢？

第三，認為人類（至少在現時）總的說來是沿着進步方向運動的這種信念，是同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絕對不相干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同自然神論者³²⁵ 伏爾泰和盧梭一樣，幾乎狂熱地抱有這種信念，並且往往為它付出最大的個人犧牲。如果說，有誰為了“對真理和正義的熱誠”（就這句話的正面的意思說）而獻出了整個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羅就是這樣的人。由此可見，施達克把這一切說成是唯心主義，這只是證明：“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以及兩個派別的全部對立，在這裡對他來說已經失去了任何意義。

事實上，施達克在這裡向庸人的那種由於教士的多年誹謗而對“唯物主義”這個名稱產生的偏見做了不可饒恕的讓步，雖然這也許是不自覺的。庸人把唯物主義理解為貪吃、酗酒、娛目、肉欲、虛榮、愛財、吝嗇、貪婪、牟利、投機，簡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戀着的一切齷齪行為；而把唯心主義理解為對美德、普遍的人類愛的信仰，總之，對“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別人面前夸耀這個“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這樣的時候才相信這個“美好世

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义大吹大擂的大学讲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也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此饶了读者吧。

三

我們一接觸到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和倫理學，他的真正的唯心主義就顯露出來了。費爾巴哈決不希望廢除宗教，他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學本身應當溶化在宗教中。

“人類的各個時期彼此借以區別的，僅僅是宗教的變遷。某一歷史運動，只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時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應當存在於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質。”³²⁶（引自施達克的书第 168 頁）

按照費爾巴哈的看法，宗教是與人之間的感情的關係、心靈的關係，過去這種關係是在現實的虛幻反映中（借助於一個神或許多神這些人類特性的虛幻反映）尋找自己的真理，現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間接地在我和你之間的愛中尋找自己的真理了。歸根到底，在費爾巴哈那里，性愛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實現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與人之間的、特別是兩性之間的感情關係，是自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性愛特別是在最近八百年間獲得了這樣的意義和地位，竟成了這個時期中一切詩歌必須環繞着旋轉的軸心了。現存的實在的宗教只限於使國家對性愛的管理即婚姻立法高度神聖化；這種宗教也許明天就會完全消失，但是愛情和友誼的實踐並不會發生絲毫變化。在法國，在 1793 到 1798 年這個期間，基督教的确曾經消失到這種程度，連拿破侖去恢復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難，但是在這一期間，並沒有感覺到需要用費爾巴哈的新宗教去

代替它。

在这里，費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們彼此間以相互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愛、友誼、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把这些关系和某种特殊的、在他看来也属于过去的宗教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关系只有在人們用宗教一詞使之高度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純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看做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記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滿的。宗教一詞是从 *religare* 一詞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間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語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加在这个詞上的意义，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得到的，而是按照語源所应该具有的。因此，为了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貴的名詞不致从語言中消失，性愛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四十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說的，他們也认为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对我们說：Donc, l'athéisme c'est votre religion! [因此，无神論就是你們的宗教!] 費尔巴哈想根据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建立真正的宗教，这等于把現代化学当做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沒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是可以存在的了。况且，炼金术和宗教之間是有很紧密的联系。哲人之石有許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紀埃及和希腊的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說的形成上也出了一分力量。柯普和拜特洛所提供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費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論断是絕對錯誤的：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

历史上的伟大轉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旧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不进行宣传，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們便失掉任何抵抗力；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們一接触正在崩潰的羅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經濟、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仅仅在研究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时候，我們才发现：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而且，甚至在基督教的領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來說，也只表現在資產階級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十三世紀起到十七世紀止；同时，这种色彩不能像費爾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整个中世紀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紀只知道一种意識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已經强大得足以建立他們自己的、同他們的階級地位相适应的意識形态了，这时他們才进行了他們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訴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堵住他們的道路时，他們才理会宗教；但是他們沒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敗。

在我們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階級对立和階級統治为基础的社會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現純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經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們沒有理由去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同样，对历史上的伟大的階級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也已經被流行的历史編纂学弄得够模糊了，我們沒有必要去把这一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純附属品，使这

种理解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見，現在我們已經超过費尔巴哈多么远了。現在連他那贊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都不堪卒讀了。

費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这个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人的映像。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許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許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想像的形象。費尔巴哈在每一頁上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費尔巴哈，一談到某种比人們之間的純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

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一个方面——道德。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較起来，費尔巴哈的惊人的貧乏又使我們詫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說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內容是现实的。法律、經濟、政治的全部領域連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費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沒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終是宗教哲学中所說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們終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連这最后一点差別也消失了。的确，在

費爾巴哈那里間或也有這樣的命題：

“皇宮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³²⁷——“如果你因為飢餓、貧困而身體內沒有營養物，那末你的頭腦中、你的感覺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沒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³²⁸——“政治應當成為我們的宗教。”³²⁹等等。

但是，費爾巴哈完全不知道利用這些命題，這些命題仍舊是純粹的空話，甚至施達克也不得不承認，政治對費爾巴哈是一個不可通過的區域，而

“關於社會的科學，即社會學，對他來說，是一個 *terra incognita* [未知的地帶]”³³⁰。

在善惡對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爾比起來也是很膚淺的。黑格爾指出：

“人們以為，當他們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他們就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們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³³¹

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动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裡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旧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杆，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历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但是，費爾巴哈就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歷史對他來說是一個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領域。甚至他的名言：

“當人剛剛脫離自然界的時侯，他也只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

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³³²——

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仍然是毫无结果的。

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末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准则推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瘠和空泛。

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费尔巴哈的道德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它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它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是说得很直截了当的：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

关于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費爾巴哈无条件地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間，在中世紀的农奴和領主之間，难道談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嗎？被压迫階級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和“由于正当理由”变成了統治階級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嗎？——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現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自从資產階級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并在发展資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級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漸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以来，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滿足，絕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資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絕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維持生活，所以資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給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說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給予的多。关于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况是否好一些呢？就連“薩多瓦的小学教师”³³³不也是一个神話人物嗎？

不仅如此。根据費爾巴哈的道德論，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們的投机始終都是得当的。如果我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損失，就是說，如果我經常賺錢的話，那末費爾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並沒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我一样地是自愿到交易所里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机交易时是

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样。如果他賠了錢，那末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算錯了，而且，在我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我甚至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的架子来。在交易所里，只要爱不純粹是一个温情的字眼，也是由爱統治一切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別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完成和实际从事的事情。同时，如果我在那里正确地預見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賭赢了，那末我就执行了費尔巴哈道德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我还会成为富翁。換句話說，費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現代資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

可是爱呵！——真的，在費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創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階級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調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別、不分等級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飲吧！

簡單扼要地說，費尔巴哈的道德論是和它的一切前驅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一样軟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階級，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們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話。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則表現在战争、爭吵、訴訟、家庭糾紛、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剝削中。

但是，費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也毫无

結果呢？理由很簡單，因為費爾巴哈不能找到從他自己所極端憎惡的抽象王國通向活生生的現實世界的道路。他緊緊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裡，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話。無論關於現實的自然界或關於現實的人，他都不能對我們說出任何確定的東西。但是，要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需把這些人當作在歷史中行動的人去研究。而費爾巴哈反對這樣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 1848 年對他來說只意味着和現實世界的最後分離，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這方面，主要又要歸咎於德國的狀況，這種狀況使他落得這種可憐的結局。

但是費爾巴哈所沒有走的一步，終究是有人要走的。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費爾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須由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一步發展費爾巴哈觀點的工作，是由馬克思於 1845 年在“神聖家族”中開始的。

四

施特劳斯、鮑威尔、施蒂納、費尔巴哈，就他們沒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这一点來說，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施特劳斯写了“耶穌传”和“教义学”³³⁴以后，就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鮑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施蒂納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魯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宝贝；唯有費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駕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來說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沒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簡單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本人除了矯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貧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內容相抗衡。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結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①

① 請允許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說明。近来人們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論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說几句话，把这个問題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間，我在一定程度上独

同黑格爾哲學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結果。这就是說，人們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来理解；他們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沒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識領域里去了。

黑格爾不是簡單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說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辯证方法，是被当做出发点的。但是这个方法在黑格爾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爾那里，辯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絕對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全部現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邏輯学”中詳細探討过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預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轉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並沒有意識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經過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識；这个自我意識，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掙脫出来，直到絕對概念終於在黑格爾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

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論的創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論的闡发。但是，絕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經濟和历史領域內），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專門的領域外，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远不会是現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的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的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①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

^① 见“一个手艺人所阐述的人脑活动的实质”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335

中，前進的發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暫時的倒退，終究會給自己開辟出道路，——這個偉大的基本思想，特別是從黑格爾以來，已經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識，以致它在這種一般形式中未必會遭到反對了。但是，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一回事，把這個思想具體地實際運用於每一個研究領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們在研究工作中始終從這個觀點出發，那末關於最終解決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遠不會提出了；人們就始終會意識到他們所獲得的一切知識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識到他們在獲得知識時所處的環境對這些知識的制約性；人們也不再敬重還在不斷流行的舊形而上學所不能克服的對立，即真理和謬誤、善和惡、同一和差別、必然和偶然之間的對立了；人們知道：這些對立只有相對的意義；今天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認識都有它隱蔽着的、以後會顯露出來的錯誤的方面，同樣，今天已經被認為是錯誤的認識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從前才能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性隱藏在裏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舊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黑格爾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當作一成不變的東西去研究，它的殘余還牢牢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這種方法在當時是有重大的歷史根據的。必須先研究事物，而後才能研究過程。必須先知道一個事物是什麼，而後才能覺察這個事物中所發生的變化。自然科學中的情形正是這樣。認為事物是既成的東西的舊形而上學，是從那種把非生物和生物當作既成事物來研究的自然科學中產生的。而當這種研究已經進展到可以向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即可以過渡到系統地研究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發生的變化的時候，在哲學領域內

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紀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紀,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結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們这个世紀的产儿。

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們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認識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細胞,发现細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們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規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細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的轉化,它向我們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謂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謂位能、热、放射(光或輻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轉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現,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結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轉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們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內,都是少数原始单細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徑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們現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領域內的过程之間的联系,而且总的說来

也能指出各個領域之間的联系了，这样，我們就能够依靠經驗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繪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謂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繪：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純粹的想像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預測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說出了十分荒唐的見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們对自然研究的結果只是辯证地即从它們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們这个时代是令人滿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辯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訓練的头脑违背他們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終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現在也被我們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漸实现，而且当然始終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漸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預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絕對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絕對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內在联系。这样，人們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漸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里一样，應該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

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人們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期望的目的而創造自己的歷史，卻不管這種歷史的結局如何，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影響所產生的結果，就是歷史。因此，問題也在于，這許多個別的人所期望的是什麼。願望是由激情或思慮來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激情或思慮的杠杆是各式各樣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動機，如功名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憎惡，或者甚至是各種純粹個人的怪癖。但是，一方面，我們已經看到，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個別願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它們的動機對全部結果來說同樣地只有從屬的意義。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在這些動機背後隱藏着的又是什麼樣的動力？在行動者的頭腦中以這些動機的形式出現的歷史原因又是什麼？

舊唯物主義從來沒有給自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因此，它的歷史觀——如果它有某種歷史觀的話，——本質上也是實用主義的，它按照行動的動機來判斷一切，把歷史人物分為君子和小人，並且照例認為君子是受騙者，而小人是得勝者。舊唯物主義由此得出結論說，在歷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東西；而我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內自己背叛了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後面的是什麼，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麼。不徹底的地方並不在於承認精神的動力，而在於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反之，歷史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所代表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人物的表面動機和真實動機都決不是歷史事變的最終原因，認為這些動機後面還有應當加以探究的別的動力；但是

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³³⁶。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許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力;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

約以來，在英國，誰都知道，土地貴族 (landed aristocracy) 和資產階級 (middle class) 這兩個階級爭奪統治的要求，是英國全部政治鬥爭的中心。在法國，隨著波旁王室的返國，同樣的事實也被人們意識到了；復辟時期的歷史家，從梯葉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爾，總是指出這一事實是理解中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的鑰匙。而從 1830 年起，在這兩個國家里，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已被承認是為爭奪統治而鬥爭的第三個戰士。當時關係已經非常簡單化，只有故意閉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見，這三大階級的鬥爭和它們的利益衝突是現代歷史的動力，至少是這兩個最先進國家的現代歷史的動力。

但是這些階級是怎樣產生的呢？初看起來，從前大規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還可以（至少首先是）歸於政治原因，歸於暴力掠奪，但是這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來說就不行了。在這裡，顯而易見，這兩個大階級的起源和發展是由于純粹經濟的原因。而同樣明顯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正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一樣，首先是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的，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由于經濟關係發生變化，确切些說，是由于生產方式發生變化而產生的兩個階級。最初是從行會手工業到工場手工業的過渡，隨後又是從工場手工業到使用蒸汽和機器的大工業的過渡，使這兩個階級發展起來了。在一定階段上，資產階級使用的新的生產力——首先是分工和許多局部工人在一個綜合性手工工場里的聯合——以及通過生產力發展起來的交換條件和交換需要，同現存的、歷史上繼承下來的而且被法律神聖化的生產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說，同封建社會制度的行會特權以及許多其他的個人特權和地方特權（這些特權對於非特權等級來說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資產

階級所代表的生產力，起來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會師傅所代表的生產秩序；結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國是逐漸被打碎的，在法國是一下子被打碎的，在德國還沒有被打碎。但是，正像工場手工業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曾經和封建的生產秩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現在已經同代替封建生產秩序的資產階級生產秩序相衝突了。被這種秩序、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隘範圍所束縛的大工業，一方面使全體廣大人民群眾愈來愈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生產出愈來愈多的沒有銷路的产品。生產過剩和大眾的貧困，兩者互為因果，這就是大工業所陷入的荒謬的矛盾，這個矛盾必然地要求通過改變生產方式來使生產力擺脫桎梏。

因此，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任何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任何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儘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着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裡，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係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观点看來（這種观点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性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和這種看法符合的。就個別的人說，他的行動的一切動力，都一定要通過他的頭腦，一定要轉變為他的願望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一個階級統治着），也一定要通過國家的願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一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願望（不論是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一內容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願望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

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优势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係的發展決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擁有巨量生產資料和交通工具的現代，國家都不是一個具有獨立發展的獨立領域，而它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那末，以前的一切時期就必然更是這樣了，那時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還沒有使用這樣豐富的輔助手段來進行，因而這種生產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們。既然在今天這個大工業和鐵路的時代，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那末，在以前的時代，國家就必然更加是這樣了，那時每一代人都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費一生中的時間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因而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地依賴於這種物質需要。對從前各個時代的歷史的研究，只要在這方面是認真進行的，都會最充分地證實這一點；但是，不用說，在這裡不能進行這種研究了。

如果說國家和公法是由經濟關係決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這樣，因為私法本質上只是確認單個人之間的現存的、在一定情況下是正常的經濟關係。但是，這種確認所採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們可以把舊的封建法權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來，並且賦予這種形式以資產階級的內容，甚至直接給封建的名稱加上資產階級的含意，就像在英國與民族的全部發展相一致而發生的那樣；但是人們也可以像在西歐大陸上那樣，把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即羅馬法以及它對簡單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律關係（如買主和賣主、債權人和債務人、契約、債務等等）所作的無比明確的規定作為基礎。這樣做時，為了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半封建的社會的利益，人們可以或者是簡單地通過審

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个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像法兰西 Code civile [民法典] 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

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所以,

現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經濟內容則什麼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兩個獨立的領域，兩者各有自己的獨立的历史發展，本身都可以系統地加以描述，並要求徹底根除一切內部矛盾，以便作出這種描述。

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採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在這裡，觀念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繫，愈來愈混亂，愈來愈被一些中間環節弄模糊了。但是這一聯繫是存在着的。從十五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復興時代，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市民階級的產物，同樣，從那時起重新覺醒的哲學也是如此。哲學的內容本質上僅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階級發展為大資產階級的過程相適應的思想的哲學表現。在前一世紀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經濟學家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那裡，這種情形是表現得很明顯的，而在黑格爾學派那裡，這一情況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過了。

現在我們再簡略地談談宗教，因為宗教離開物質生活最遠，而且好像是同物質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時代從人們關於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圍的外部自然的錯誤的、最原始的觀念中產生的。但是，任何意識形態一經產生，就同現有的觀念材料相結合而發展起來，並對這些材料作進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識形態了，就是說，它就不是把思想當作獨立地發展的、僅僅服從自身規律的獨立本質來處理了。頭腦中發生這一思想過程的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歸根到底決定着這一思想過程的進行，這一事實，對這些人來說必然是沒有意識到的，否則，全部意識形態就完結了。因此，大部分是每個有血統關係的民族集團所共有的這些最初的宗教觀念，在這些集團分裂以後，便在每個民族那裡依各自

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限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的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种企图清楚地表现了拿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为了使它成为国教并使它适合于成为国教这个目的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³³⁷它在二百五十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³³⁸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

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說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零工和各种僕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开始采取民族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叛乱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溃；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囊括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³³⁹英国的国家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

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家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归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³⁴⁰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比埃尔·培尔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也只能是一些说明。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中提供；而在这里我敢肯定地说，在其他著作中这种证据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

再是要從頭腦中想出聯系，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種聯系了。這樣，對於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麼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於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

* * *

隨着 1848 年革命的爆發，“有教養的”德國拋棄了理論，轉入了實踐的領域。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小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已經為真正的大工業所代替；德國重新出現在世界市場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國³⁴¹ 至少排除了由於小邦割據、封建殘余和官僚制度在這一發展道路上造成的最顯著的弊病。但是隨着思辨^① 離開哲學家的書房而在證券交易所里築起自己的殿堂，有教養的德國也就失去了在德國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時代曾經是德國的光榮的偉大理論興趣，失去了那種不管所得成果在實踐上是否能實現，不管它是否違警都同樣地熱中於純粹科學研究的興趣。誠然，德國的官方自然科學，特別是在專門研究的領域中仍然保持着時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國“科學”雜誌已經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個別事實之間的巨大聯系方面，在把這些聯系概括為規律方面所獲得的決定性的成就，現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國，而不像從前那樣出在德國。而在包括哲學在內的历史科學的領域內，那種舊有的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已隨着古典哲學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動腦筋的折衷主義，是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這種科學的官方代表都變成資產階級和現存國家的毫無掩飾的思想家，但這已經是在資產階級和現存國家同工人階級處於公

^① 原文是《Spekulation》，在這裡是一個雙關語，既有“思辨”的意思，又有“投機”的意思。——譯者注

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德国人的理論兴趣，現在只是在工人階級中还没有衰退，繼續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沒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沒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鎖钥的新派別，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階級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階級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給“紐約人民報”編輯部的聲明³⁴²

聖路易斯市“密蘇里共和黨人報”上出現關於該報記者訪問我的報道，因此我必須作如下聲明：

的確，麥肯尼斯先生曾經作為該報代表訪問過我，並且向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當時他以名譽擔保，答應我在未經我過目以前決不發表一個字。但是後來他就再也沒有到我這裡來了。因此我特聲明：本人對於他所發表的材料不負任何責任，尤其是我曾有機會親自證實，麥肯尼斯先生沒有足夠的知識，即使他有最好的願望，恐怕也未必能正確理解我的談話。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於倫敦

寫於 1886 年 4 月 29 日

原文是德文

載於 1886 年 7 月 8 日
“紐約人民報”第 162 號

俄文譯自“紐約人民報”

*关于里昂玻璃厂工人的罢工

看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³⁴³决心要百般表明，它像历届政府一样，完全是资本家的政府。它不以曾经袒护德卡兹维耳的矿业公司³⁴⁴为满足，现在在里昂表现得更加厉害了。在那里，一家玻璃工厂发生了罢工；有几个工贼继续上工，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被搬到工厂来住。他们当中有一人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名叫利特内尔，当他的家用什物运往工厂的时候，罢工工人跟在后面向他发出嘘叫声。装家用什物的小车刚到里面，工厂大门刚刚关上，从窗口向围墙外的人们的射击便开始了，手枪子弹和大粒的霰弹四处纷飞，打伤了三十人左右。人群当然四散了。后来警察和司法当局出面干涉。但是，不是去逮捕曾经开枪的资本家和他们的僕从，不是的！而是去逮捕许多罢工工人，说他们侵犯了劳动自由！刚刚发生的这个事件，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德卡兹维耳使巴黎投社会主义者的票数从三万张增加到十万多张³⁴⁵，而里昂附近的拉-缪拉提埃尔所发生的流血事件的后果将更加巨大。

写于1886年5月8日和14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86年5月15日“公益”杂志
第18期

俄文译自“公益”杂志

署名：弗·恩·

欧洲政局³⁴⁶

1878年3月，迪斯累里把四艘装甲舰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单是这些军舰的出现，就制止了俄军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和破坏圣斯蒂凡诺条约。柏林和约暂时调整了东方局势。³⁴⁷俾斯麦得以使俄国政府与奥地利政府达成协议。奥地利不公开地得到了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权，保加利亚和鲁美利亚则被置于俄国的极大影响之下。这种情况使人能够设想，如果俾斯麦将来让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他就会把萨罗尼加和马其顿留给奥地利。

但是此外，波斯尼亚已经给奥地利了，正如俄国在1794年把大部分波兰本土让给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然后在1814年再把它收回一样。³⁴⁸波斯尼亚是奥地利的一个固定吸血罐，是匈牙利和奥地利西部的纠纷的苹果，而且是土耳其的一个证据，证明奥地利人也像俄国人一样为它准备着波兰的命运。从此以后，土耳其不再信任奥地利，这是俄国政府政策的重要胜利。

在塞尔维亚曾经有斯拉夫主义、因此也是俄罗斯主义的倾向，但是自从它解放以来，它沿袭了奥地利资产阶级发展的全部办法。年轻人到奥地利的大学上学，官僚制度、法典、诉讼程序、学校，都照抄奥地利的样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俄国不能让保加利亚也这样效法他人，它不愿意为奥地利火中取栗。因此保加利亚就被建成为俄国的总督管辖区。官厅、军官和士官、官吏，总之一切制

度都是俄国式的。赏给保加利亚的巴滕貝克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表弟。

俄国政府的統治(先直接,后間接),不到四年就破坏了保加利亚人对俄国的一切好感,虽然这种好感曾經是情深意摯的。居民們对于“解放者”的厚顏无耻越来越反感,甚至像巴滕貝克这样一个沒有政治观点、只愿效忠沙皇、但是要求別人尊重自己的温和的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馴服了。

同时在俄国,事态也在发展着;政府用严厉的措施才得以暂时驅散了虚无主义者。但是这还不够,它还需要輿論的支持,它必須轉移人們对国内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困难的注意,最后它还需要一点爱国幻影。在拿破侖第三时期,萊茵河左岸曾把革命的激情轉移到国际事务上;俄国政府也同样建議激动不安的人民去征服君士坦丁堡,“解放”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們联合成一个俄国領導下的大联邦。但是只引出这个幻影还是不够的,必須再做些事情,以便把这个幻影弄到现实中来。

情势是有利的。亚尔薩斯和洛林的兼并,播下了法国和德国不和的种子,看来这会使这两个国家保持中立。奥地利单独是不能对付俄国的,因为它的最有效的进攻武器——号召波兰人——始終会被普魯士打掉。而占領波斯尼亚这一强盜行为,又造成了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間的亚尔薩斯。意大利站在标价最高的方面,也就是說,站在俄国方面,俄国給它提供了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又加上了达尔馬戚亚和的黎波里。英国的态度如何?主张和平的亲俄派格萊斯頓,听从俄国的誘劝,在和平时期占領了埃及。³⁴⁹这就造成了英法之間的长期不和,这也使土耳其人不能与掠夺了土耳其,即把土耳其的領地埃及攫为己有的英国人結成同

盟。此外，俄国人在亚洲的军事准备已有相当的进展，能够在战争一爆发就给英国人在印度增添许多麻烦。俄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得心应手，他们的外交获得了全綫的胜利。

保加利亚人对于俄国的暴政的愤懑，成了开始军事行动的借口。1885年夏，保加利亚与鲁美利亚开始受到诱骗，说它们可以合并（这种合并，圣斯蒂凡诺和约保证过，柏林条约又取消了）；人们对它们说，如果它们再投入俄国这个解放者的怀抱，俄国政府就会执行自己的使命，完成这种合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保加利亚人应当首先赶走巴滕贝格。后者及时做了戒备，他破例地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他实现了完全于自己有利的、俄国本想用来对付他的那种合并。从此以后，巴滕贝格和沙皇之间便开始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这个斗争起初是隐蔽的，曲折的。人们为巴尔干的小国制造了路易·波拿巴的妙论的新版，按照这种妙论，如果至今还是分散的民族〔Volk〕，例如意大利或德意志，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Nation〕，那末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就有权要求领土补偿。塞尔维亚吞下了这枚诱饵，向保加利亚宣战。俄国的胜利就在于：为它的利益而燃起的这场战争，全世界都看到是在奥地利保护下进行的，奥地利不敢阻止这场战争，它害怕俄国派会在塞尔维亚上台。而俄国方面则瓦解了保加利亚的军队，它召回全体俄国军官，即整个总参谋部和全部校级军官，一直到营长。

然而，出乎一切意料，保加利亚人在没有俄国军官的情况下，以二比三的力量击溃了塞尔维亚人，赢得了惊愕的欧洲的尊敬和钦佩。胜利的原因有二：首先，亚历山大·巴滕贝格虽然是一个很差的政治家，然而却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他用在普鲁士学校中学到

的东西来指挥战争，而塞尔维亚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模仿奥地利的。因此这是1866年波希米亚战役的再版。³⁵⁰此外，塞尔维亚人六十年来生活在奥地利的官僚主义制度下，这个制度既没有给予他们有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反而破坏和瓦解了曾经构成他们对付土耳其人的力量的民族公社的残余。相反地，在保加利亚人那里，土耳其人并没有触动这些原始的制度；这也是保加利亚人特别勇敢的原因。

所以，对于俄国说来，这是一次新的失败；一切得从头开始。为对抗革命因素而煽起的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一天比一天增强，已经成为政府的危险。沙皇前往克里木，俄国报纸报道他将完成一番伟绩；他竭力拉拢苏丹，不断向苏丹表明：他的昔日盟友（奥地利和英国）正在出卖他，掠夺他；而法国已完全受命于俄国，并且盲目地跟着它走。但是苏丹竟充耳不闻，所以大批武装仍放在俄国的西部和南部暂不动用。

沙皇从克里木回来了（在今年6月）。但是在这段时期，沙文主义的浪潮高涨，政府对于这种日益蔓延的运动不能制止，反而连自己也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所以不得不让莫斯科市长^①在他的向沙皇的献辞中大叫占领君士坦丁堡。³⁵¹受将军们影响和庇护的报纸公开说，它们等待着沙皇对他的障碍物奥地利和德国采取有力的行动；而政府却缺少勇气迫使报纸不说话。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比沙皇更强有力，后者由于害怕革命，由于担心斯拉夫主义者与立宪派、虚无主义者，最后，与所有心怀不满的人联合起来，只好让步了。

① 尼·亚·阿列克谢也夫。——编者注

財政困难使局勢复杂化。誰也不愿意借錢給这个从1870年至1875年在倫敦已經借了100 075万法郎和正在威胁着欧洲和平的政府。两三年以前，俾斯麦帮助这个政府在德国借到37 500万法郎，但是这笔借款老早就已經吃光了，而沒有俾斯麦的签字，德国人是不会拿出一文錢来的。而这个签字只有以屈辱性的条件为代价才能得到。国家紙币发行量太大了，一个銀卢布值四个法郎，一个紙卢布值两个法郎二十生丁。武装耗費了巨款。

总之，得采取行动。或者是在君士坦丁堡問題上获胜，或者是革命。吉尔斯曾訪問俾斯麦，并向他介紹了形勢，此人对形勢有很好的了解。为了奥地利的利益，俾斯麦本来是愿意节制沙皇政府的食欲的，这个政府的貪而无厌使他不安。但是，俄国的革命意味着俾斯麦制度的垮台。沒有俄国这个反动势力的巨大的后备軍，容克地主在普魯士的統治連一天也維持不住。俄国的革命会立刻改变德国的局勢，它会一举而破坏对俾斯麦万能的盲目信仰(这种信仰是他取得統治階級支持的保证)，它会促进德国革命的成熟。

俾斯麦知道沙皇制度的存在是他的全部制度的基础，他急忙到維也納去通知他的朋友，說面对着这种危险應該丟开自尊心的問題，必須給沙皇一点成功的面子，奥地利和德国为了自己的正确利益應該向俄国屈膝。此外，如果奥地利的先生們一定要干涉保加利亚，他就撒手不管了；到那时他們就会看到結局如何。卡耳諾基让步了，亚历山大·巴滕貝克成了牺牲品，于是俾斯麦便急忙亲自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吉尔斯。

不幸，保加利亚人表現了出人意料的、“被神圣俄罗斯解放的”斯拉夫民族所不應該有的魄力和政治才能。巴滕貝克夜間被捕，可是保加利亚人也抓到了密謀者，并且任命了一个能干的、果断的

廉洁的政府——这是一种刚被解放的民族完全不应该有的品质。他们又要巴滕貝克回来，然而后者暴露了自己的整个弱点，逃走了。但是保加利亚人是改不了的。无论有无巴滕貝克，他们总是反抗沙皇的无上命令，迫使英雄的考耳巴尔斯在整个欧洲面前当众出丑。³⁵²

沙皇盛怒可想而知。拉攏了俾斯麦，击败了奥地利的反抗，如今却受到这个小国的阻撓，而这个小小国只不过昨天才存在，多亏他或他的父亲^①才享有“独立”，却不愿去理解这种独立仅仅意味着盲目服从“解放者”的命令。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是已经忘恩负义了，可是保加利亚人却越出了一切界限。当真接受独立了！真是罪该万死！

为了从革命中得救，可怜的沙皇不得不向前迈出新的一步。但是每走这样一步却越来越危险，因为这是在冒着引起俄国外交一向竭力避免的欧洲战争的风险。当然，如果俄国政府直接干涉保加利亚，如果这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那末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公开敌对的时刻就会到来。那时就不可能是局部战争，而是全面战争了。如果对统治欧洲的那些骗子手的高尚品质有所了解，就不可能预料双方的阵容。俾斯麦如果不能用其他方法制止俄国的革命，他是能站在俄国方面去反对奥地利的。但是更可能的是，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战争一旦爆发，德国就会援助奥地利，以防它完全覆灭。

在春天来临以前——因为在冬季，在4月以前，俄军在多瑙河不能展开大战，——沙皇竭力诱骗土耳其人入其圈套，而奥地利和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英国对土耳其的背信，又減輕了他的負担。他的目的是占領达达尼尔，从而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內湖，以此造成一个攻不进的避难港来建立强大的海軍，从这里控制拿破侖所謂的“法国的內湖”，即地中海。但是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而他的索非亚的拥护者已經把他的秘密計劃泄露出来了。

局势就是如此。为了避免俄国的革命，沙皇需要君士坦丁堡。俾斯麦动搖不定，他很想找到一个避免这两种情况的方法。

* * *

而法国呢？

十六年来一直想报仇的法国爱国者认为，再也没有比利用可能出现的情况更自然的了。然而，对于我們的党說来問題并不那么简单，正如这个问题对于沙文主义的先生們說来也不简单一样。在俄国的帮助和保护下进行一場复仇战争，可能会在法国引起革命或反革命。在发生革命而使社会主义者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与俄国的联盟就会垮台。首先俄国人就会立即与俾斯麦媾和，以便与德国人一同扑向革命的法国。那时，在法国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就不会通过战争来阻碍俄国革命。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可能的是保皇派的反革命。沙皇很希望他的密友奥尔良王朝复辟，只有这个政府才答应他根据优惠的条件結成巩固的联盟。而一旦开始战争，就会使用保皇派軍官来准备这个复辟。如果遭到一点点局部的挫折——这是难免的，——就可以大叫：这是共和制的过错；为了得到胜利和俄国无条件的支持，需要一个巩固的君主政府，一句话，需要菲力浦七世^①。保皇派將軍們将要消

^① 奥尔良的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巴黎伯爵。——編者注

极怠工，这样才能把失败归咎于共和制政府；这样君主制就恢复起来。果真菲力浦七世登上王位，那些国王和皇帝就立即会彼此商量，他们将不是互相吞并，而是瓜分欧洲，吞并小国。在消灭法兰西共和国以后，就会召开新的維也納會議，在这个會議上，法国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罪孽可能成为夺走它全部或部分亚尔薩斯—洛林的借口。君主們就会嘲笑那些共和主义者們太天真了，竟然对沙皇政府与共和国之間結成真誠联盟的可能信以为真。

此外，布朗热將軍对凡是愿意听他讲话的人所讲的“**需要战争来阻碍社会革命**”这句话是否真实呢？如果这句话是真实的，那就让这句话作为对社会主义政党的警告吧。布朗热这位好心人有說大話的习气，这对于一个軍人說来也許情有可原，但是这表明他是一个缺少政治头脑的人。他无论如何拯救不了共和国。他处于社会主义者和奥尔良派之間，可能与后者达成協議，只要后者向他保证与俄国結成联盟。总而言之，**法国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的处境也和沙皇一样，社会革命的幽灵已經出現在他們面前，而他們只知道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

在法国、俄国和德国，种种事件都于我們有利，所以我們目前可以希望仅仅維持 *status quo* [现状]。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相反，全面战争則会把我們抛进一个无法預料的領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們的党在德国就会遭到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命运。毫无疑问，事件归根結底是会有利于我們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時間，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碍啊！

把欧洲推向战争的力量是巨大的。到处采用的普魯士軍事制度，要全面貫徹，需要十二年到十六年的時間。經過这段時間以

后，后备部队的骨干就都是有掌握武器能力的人了。这十二年到十六年到处都已过去了，到处都有在军队中服役十二年到十六年的人。因此，到处都已准备好战争，所以德国人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优越之处。这意味着，威胁我们的战争会把上千万的兵士投入战场。那时老头子威廉也许死了。俾斯麦的地位会有所动摇，他可能掀起战争，以保全自己。而各地的交易所实际上已经相信，老头子刚一闭眼，战争就要爆发。

这场战争如果开始，其目的只能是阻碍革命；在俄国，是要预防斯拉夫主义者、立宪派、虚无主义者、农民这些不满分子的总发动；在德国，是要支持俾斯麦；在法国，是要压制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运动和恢复君主制。

对于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说来，并不存在亚尔萨斯问题。德国社会主义者清楚地知道，他们从来就反对的 1871 年的兼并，是俾斯麦反动的内外政策的支点。两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关心维护和平，因为正是他们必须支付全部战费。

写于 1886 年 10 月 25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86 年 11 月 6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63 号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署名：弗·恩格斯

約翰·菲力浦·貝克尔

死亡又一次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的先进战士的行列中打开了一个缺口。12月7日，約翰·菲力浦·貝克尔在日内瓦逝世了。

1809年，貝克尔生于福兰肯塔尔(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早在二十年代，刚刚脱离童年他就参加了自己故乡的政治运动。七月革命之后，三十年代初期，这个运动具有了共和主义性质，貝克尔就成了这个运动最积极最坚决的参加者之一。他曾多次被捕，被交付法庭审讯，被宣告无罪，但是最后不得不从得胜了的反动派那里逃出来。他来到瑞士，定居在俾尔，取得了瑞士公民权。在这里他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一方面他关心各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事务，关心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欧洲流亡者的革命尝试，另一方面他也关心瑞士民主派夺取各别州的政权的斗争。大家知道，这个斗争，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初，汇成了对贵族州和教权派州的一系列武装进攻。貝克尔跟大多数这种“叛乱”都或多或少有些牵连，所以他终于被判处逐出他的新家乡伯尔尼州十年。这些小型的战斗的使命终于在1847年由对宗得崩德的战争³⁵³完成了；貝克尔当时是瑞士军队的军官，他忠于自己的职守，在向琉森进军中，他带领了他所在的那个师的前卫部队。

1848年的二月革命爆发了，随后在志愿队的支持下在巴登作

了实行共和制的嘗試。在黑克尔进军³⁵⁴时，貝克尔組織了一个流亡者軍团，但只是在黑克尔已經再次被打退以后他才赶到边界。这个后来大部分被拘留在法国的軍团，在1849年成了普法尔茨軍和巴登軍某些优秀部队的核心。

1849年春在羅馬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时候，貝克尔想用这个軍团为羅馬組成一支輔助部队。他到馬賽去組織骨干，着手招兵。但是，大家知道，法国政府当时准备扼杀羅馬共和国，让教皇^①回去。自然它要阻撓調軍队去援助它的羅馬的敌人。貝克尔已經雇好了船，但却接到一个坚决的声明說，船只如果有絲毫离港的企图，就将被击沉。

正在这时爆发了德国的革命。³⁵⁵貝克尔立即赶到卡尔斯卢厄；軍团也跟着他去了，后来在伯宁指揮下加入了战斗，而由維利希在伯桑松組成的1848年旧軍团的另一部分，成了維利希的志愿队的核心。貝克尔被任命为全巴登人民自卫团长官，也就是除常备軍外所有部队的长官，于是他立即着手組織人民自卫团。一开始他就遭到受反动資產階級支配的政府及其首脑布伦坦諾的反抗。貝克尔的命令遇到了相反的命令，他对武器和軍用装具的要求被忽視，或者干脆被拒絕。6月6日开始以革命武装力量恐吓政府，貝克尔非常积极参与行动，这次嘗試沒有发生决定性的效果³⁵⁶，但是貝克尔及其部队此时却被匆忙地从卡尔斯卢厄調到尼喀河去对付敌人。

在这里战事漸漸展开，而結局也快見分曉了。貝克尔帶領他的志愿队和人民自卫团占領了奧登林山。他既沒有炮兵，也沒有

① 庇护九世。——編者注

騎兵，不得不把自己人数不多的部队分散占领广阔的、不利的地点，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足够力量转入进攻。然而，他在6月15日打了一次漂亮仗，把他那些被波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围困在希尔施霍恩城堡中的哈瑙体操家们³⁵⁷解救了出来。

当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革命军最高统帅的时候，贝克尔是第五师（全是人民自卫团，而且只有步兵）师长，任务是抗击在人数上至少六倍于他的波伊克尔军。但是后来不久就发生一些事件：普鲁士第一军越过莱茵河到了盖尔曼尔斯海姆，梅洛斯拉夫斯基迎着这个军运动，6月21日瓦格霍伊泽尔战败。贝克尔这时占领着海得尔堡，从北面来进攻的是馮·格勒本的普鲁士第二军，从东北进攻的是波伊克尔军，各有两万多人；在西南是希尔什菲尔德的普鲁士人，人数也在两万以上。从瓦格霍伊泽尔逃出来的人，即大批巴登军、常备军和人民自卫团，都拥向海得尔堡，以便绕过平原上对他们封锁了的道路翻山走长途前往卡尔斯卢厄和拉施塔特。

这次退却要由贝克尔率领他那些刚刚招募来的、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来掩护，而且像往常一样，没有骑兵和炮兵。他让退却者得以退却到相当距离以后，在22日晚8时从海得尔堡出动到訥卡格芒德，在那里休息了几个小时，在23日到达辛斯海姆，在这里虽然同敌人极其接近，但他还是让部队休息了几小时，同时保持战斗队形，在当晚到达艾宾根，而在24日晚8时越过布列頓到达杜尔拉赫，在这里又被卷入此时已经联合起来的普法尔茨—巴登部队无秩序的退却。贝克尔在这里接收了残余的普法尔茨部队归自己指挥，这时不仅要掩护梅洛斯拉夫斯基退却，而且要守住杜尔拉赫，直到完全退出卡尔斯卢厄为止。像往常一样，他现在还是没有炮兵，因为配属给他的炮兵已经离开了。

貝克尔尽可能加紧挖战壕以加强杜尔拉赫，第二天（6月25日）早晨两个普魯士师和波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就从三方面发起进攻。他不仅打退了一切进攻，而且尽管只能用步騎枪射击去对付敌人的火炮射击，他还是不止一次地轉为进攻；經過四小时的战斗以后，他率領部队秩序井然地退却了，沒有遇到被派出来迂迴的队伍的阻撓；而且他只是在得知卡尔斯卢厄已經撤退，交給他的任务已經完成之后，才实行退却。

这无疑是整个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最光輝的一段。貝克尔率領的人大多数不过是两三个星期以前才招募来的，而且都是些毫无經驗的新兵，由临时客串的軍官和軍士勉强訓練了一下，差不多不知道紀律是什么东西，——他率領这样的人在四十八小时之內走了八十公里以上或者說十一德里以上的路程，而且还是作为被击潰的、被消灭了一半的军队的后卫部队在退却。他在夜間开始了这次轉移，帶領他們通过敌人的战綫到达杜尔拉赫，秩序井然，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們能对普魯士人进行这次战役中为数不多的战斗之一，在这次战斗中革命軍完全达到了目的。这次战績即使对老部队說也是很荣誉的，而对这样一些年輕的兵士說来則是极罕見极光荣的事情。

到达牟尔克河以后，貝克尔就带着他那一师占領了拉施塔特以东的陣地，并光荣地参加了6月29日和30日的战斗。其結果是人所共知的：比他多五倍以上的大批敌人越过維尔騰堡的地界迂迴了这个陣地，并从右翼向这个陣地进攻。此时战局的命运表面上也已經决定了：战局是以革命軍被迫轉移到瑞士境內而告終的。

到这时为止貝克尔主要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以后他大大前进了一步。对德国特别是南德的“純粹的共和派”更进一

步的認識和 1849 年革命时所取得的經驗，都向他证明，今后必須用另一种方式来行动。貝克尔从青年时代起对无产阶级就有深切的同情，現在这种同情有了更加具体的形式；他明白，资产阶级到处都是反动政党的核心，而真正革命力量的核心則只能是无产阶级。一个凭感性的共产主义者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了。

他还有一次曾經试图組織志愿队；这是在 1860 年，加里波第胜利进军西西里島之后的事情。貝克尔从日内瓦出发前往热那亚，以便和加里波第协同进行准备工作。但是加里波第的迅速胜利以及为君主制的利益而利用胜利果实的意大利军队的干預，使运动終止了。同时到处都在預料，来年会爆发对奥地利的新战争。大家都知道，俄国想利用路易-拿破侖和意大利向奥地利实行报复，并完成它在 1859 年的未竟之业。意大利政府派了一个总参谋部的高级官員到热那亚去見貝克尔，向他表示：如果他同意在德国进行有利于意大利的反奥宣传，就可以得到意大利军队的一个上校軍銜，拿优厚的薪金和出差費，还可以指揮由他自己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編組的軍团。但无产者貝克尔断然拒絕了；他决不想为君主們效劳。

这是他組織志愿队的最后一次尝试。不久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貝克尔就是它的創立者之一。他出席了为国际奠基的有名的圣馬丁堂群众大会。³⁵⁸ 他組織了瑞士罗曼語区的德国工人和当地工人，創辦了該团体的机关刊物“先驅”³⁵⁹，他出席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并站在对«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³⁶⁰ 和瑞士汝拉地区的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最前列。

国际解体以后，貝克尔公开出面的机会就比較少了。但尽管这样，他总是深入工人运动，并且利用广泛的通信和許許多多到日

內瓦來拜訪他的客人，不斷地影響運動的進程。1882年馬克思會在他那裡度過一天，今年9月間七十七歲的貝克尔還經過普法爾茨和比利時旅行到倫敦和巴黎，在這個期間我很幸運地把他接到我這裡住了兩個星期，同他在一起談古論今。但是過了不到兩個月，電報竟傳來了他的逝世的消息！

貝克尔是一個少有的人。完全可以用**強健**這樣一個詞來形容他。直到他生命結束前他的身心還是很健全的。他像個巨人，很有力氣，而且儀表堂堂，由於難能可貴的稟賦和健康有益的活動，他像他的身體那樣和諧地發揮了他那雖沒有上過學但決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才智。他是少數全憑天性來選擇正確道路的人中的一個。因此他才這樣容易同革命運動的發展步調一致，在第七十八年的時候也像在十八歲那樣精神抖擻地站在最前列。1814年他還是一個同過往的哥薩克玩耍的小孩子，1820年看到了刺殺科采布的桑得被處死，二十年代時還是一個不明確的對立派，但一直在不斷發展，到1886年就完全達到運動的高水平。同時他並不像1848年大多數“嚴肅的”共和派那樣，是一個抑鬱寡歡而不明事理的人，——他是歡樂的普法爾茨的真正樂觀的兒子，對酒、女人和歌曲的喜愛並不亞於其他任何人。他生長在“尼貝龍根之歌”³⁶¹的故鄉，伏爾姆斯附近，甚至在晚年也還像我國古代英雄史詩中的人物那樣，在擊劍的間隙快活而詼諧地向敵人呼喊，在沒有人可砍殺的時候就編寫民歌；提琴手福耳克尔就應該是這個樣子，而且只能是這個樣子。

但他最出色的才能無疑是軍事才能。在巴登他所做的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得多。別的從常備軍學校中訓練出來的軍官覺得在這裡的是一些和自己完全格格不入的，幾乎不服管教的還不成其為

兵士的人，而貝克尔却在瑞士民兵这所簡陋的学校里学会了他自己一整套組織艺术、战术和战略，所以国民軍对他說来并不是什么格格不入的东西，其不可避免的缺点也不是什么怪事。在其他精神沮丧或非常激动的場合下，貝克尔却仍然从容不迫，寻找一个又一个出路；他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人，善于用开玩笑来給他們鼓劲，終于控制了他們。1870年的普魯士將軍中，妒忌他帶着一师新兵从海得尔堡轉移到杜尔拉赫这件事的岂止一人而已，那时他率領的新兵几乎完全沒有受过訓練，但是却保持着立即投入战斗并順利地进行战斗的能力。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他竟能使配屬給他的、任何人对之都无法可想的普法尔茨兵士投入战斗，甚至迫使他們在開闊地上轉入进攻。貝克尔的逝世，使我們丧失了我們有过的唯一一位德国革命將領。

这是一个光荣地参加过三代人的解放斗争的人。

工人們将把他作为自己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銘記在心里。

1886年12月9日于伦敦

載于1886年12月17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5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論住宅問題”³⁶²一書第二版序言

本書是我 1872 年發表在萊比錫“人民國家報”³⁶³上的三篇文章的再版。恰好在那時，法國的幾十億法郎涌入了德國³⁶⁴；國債償清了，要塞和兵營建築起來了，武器和軍事裝備更新了。游閑的資本以及流通中的貨幣額都突然大大增加，而這一切都恰好發生在德國不僅作為一個“統一國家”，並且還作為一個大工業國登上世界舞臺的時候。這幾十億法郎有力地推動了年輕的大工業；首先是這幾十億法郎，在戰後引起了一個短暫的富於幻想的繁榮時期，隨後又在 1873 年至 1874 年引起了一次巨大的破產，這次破產證明德國是一個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上活動的工業國家。

當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這樣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向大工業過渡，並且這個過渡還由於情況極其順利而加速的時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發展為工業中心的大城市里來；另一方面，這些舊城市的布局已經不適合新的大工業的條件和與此相應的交通；街道在加寬，新的街道在開辟，鐵路鋪到市里。正當工人成群湧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現了工人以及以工人為主顧的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一開始就作為工業中心而產生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現象幾乎不存在。例如曼徹斯特、里昂、布萊得弗德、巴門—愛北斐特就是這樣。相反，在倫敦、巴黎、柏林

和維也納這些地方，住宅缺乏現象曾經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樣繼續存在着。

正是這種标志着德國發生工業革命的急性病似的住宅缺乏現象，使當時的報刊上登滿了關於“住宅問題”的文章，各種社會庸醫乘機而出。在“人民國家報”上也出現了一系列這樣的文章。一位匿名作者，後來自稱是維爾騰堡的醫學博士阿·米爾柏格先生，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利用這個問題讓德國工人領悟一下蒲魯東的社會萬應靈丹的奇效³⁶⁵。當我向編輯部表示我對於刊載這些奇文感到驚異的時候，編輯部就請我對這些文章做一個答復，而我也就照辦了（第一篇：“蒲魯東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在這一組文章以後不久，我又發表了另一組文章，這裡我以艾米爾·扎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書³⁶⁶為例分析了這個問題上的資產階級慈善主義觀點（第二篇：“資產階級怎樣解決住宅問題”）。米爾柏格博士先生過了很久以後對我的文章賜予了答復³⁶⁷，迫使我不進行答辯（第三篇：“再論蒲魯東和住宅問題”）。這場論戰以及我對這個問題的專門研究便到此結束。這就是出過單行本的這三組文章的產生經過。既然現在需要出新版，那末我無疑要再一次歸功於德意志帝國政府的盛情關懷，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樣使銷路大增，所以我這裡謹向它深致謝意。

為了出新版，我把正文校閱了一遍，稍微做了一些增補和注釋，並在第一篇中改正了一個小小的經濟學錯誤³⁶⁸，因為我的論敵米爾柏格博士很可惜沒有發覺它。

在作這次校閱時，我深深感到國際工人運動在最近十四年來已經有了多么巨大的進步。那時的事實還是：“二十年以來，除了蒲魯東的著作以外，操羅曼語的工人就沒有過任何別的精神食

糧”³⁶⁹，至多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对蒲魯东主义所做的更加片面的說明，在巴枯宁的眼中，蒲魯东是“我們共同的导师”——*notre maître à nous tous*。虽然当时蒲魯东主义者在法国只是工人中間的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們才具有明确規定的綱領，才能够在巴黎公社时期担任經濟方面的領導。在比利时，蒲魯东主义曾在瓦龙工人中間独占統治，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都是坚决的蒲魯东主义者。現在呢？在法国，工人已經完全抛弃了蒲魯东；他只是在激进資产者和小資产階級中間还有一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魯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却對他們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經把瓦龙人从运动的領導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經废黜了蒲魯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样，七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汹涌来潮已經退落下去，并把蒲魯东主义的殘余也带走了；在意大利，新的党还处在純洁化和形成的过程中，而在西班牙，一直忠实于国际总委员会的新馬德里联合会，已經由一个小小的核心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党³⁷⁰，从共和派的报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資产階級共和派对工人的影响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前輩即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罗曼語地区的工人中間，蒲魯东的著作已經被遺忘而由“資本論”、“共产主义宣言”以及馬克思学派的其他許多著作代替了；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統治地位的无产階級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資料，——現在也成了罗曼語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階級的要求。

但是，既然蒲魯东主义甚至已經被罗曼語各国工人彻底抛弃，

既然它現在已經按照自己的真正使命，只是表達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資產階級激進派所懷的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欲望，那麼今天何必再來談論它呢？又何必把這些文章翻印出來，再對一個已經死了的論敵作鬥爭呢？

第一，因為這些文章並不僅限於同蒲魯東及其德國代表進行論戰。由於馬克思和我之間有分工，我的任務就是要在定期報刊上，因而特別是要在同敵對見解的鬥爭中，發表我們的見解，以便讓馬克思有時間去寫作他那部偉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必須採用論戰的形式即在反對其他種種觀點的過程中，來敘述我們的觀點。這次也是這樣。本書第一篇和第三篇不僅包含對蒲魯東關於這個問題所持見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對我們自己觀點的敘述。

第二，蒲魯東在歐洲工人運動史上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以致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他忘掉。雖然他在理論上已經被駁倒，在實踐中已經被排斥在一邊，但是他仍然保持着歷史的意義。誰要是稍微詳細地研究現代社會主義，誰也就應當研究運動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觀點”。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³⁷¹一書，是在蒲魯東提出他的實際的社會改良方案以前幾年問世的；馬克思當時只能發現蒲魯東交換銀行的萌芽，並加以批判。因此，在這方面，馬克思的著作就由這本小冊子來補充，可惜補充得很不夠。馬克思自己一定會把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

最後，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直到現在在德國還有很多的代表。一方面是以讲坛社會主義者和各種慈善家為代表，在他們那里把工人變為自己住宅所有者的願望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我這部著作用來反對他們也仍然是適時的。另一方

面，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在德国这个市僧气 *par excellence* [占优势] 的国家里，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和大规模地铲除着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市僧气的时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倾向对于运动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国工人在最近八年来反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反对警察和法官的斗争中辉煌地表现出他们具有惊人健全的头脑。但是必须完全明白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是存在着。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

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对自己住宅的所有权。但是，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工业发展，对这一点作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注解。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菜园或土地的所有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分在事实上相当稳定地占有的条件下使用带菜园或土地的房屋。同园艺业或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多半是自己家园的租佃者。家庭工业同园艺业和耕作业，以及同

穩定的住宅的這種結合，不只是在手工織布業還跟機器織機作鬥爭的地方，例如下萊茵、威斯特伐里亞、薩克森厄爾士山脈和西里西亞到處可以看見，而且只要在有某個家庭工業部門作為一種農村副業扎住了根的地方，例如在紹林吉亞山和勒恩一帶，也到處可以看見。在討論煙草專營問題時已經查明，甚至雪茄煙製造業也已經具有了農村家庭工業的性質。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小農中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例如幾年前在艾費耳³⁷²那樣，資產階級報刊立刻就叫嚷要培植適宜的家庭工業，作為唯一的救濟辦法。事實上，德國小農中間日益加劇的貧困，以及德國工業的一般狀況，都使農村家庭工業繼續推廣起來。這是德國特有的現象。我們在法國只是作為一種例外才能找到類似的情況，例如在養蠶業地區；在沒有小農存在的英格蘭，農村家庭工業是靠農業短工的妻子兒女的勞動來維持的；只有在愛爾蘭，我們才像在德國一樣可以看見由真正的農民家庭經營的成農業中的家庭工業。我們在這裡自然不用去說俄國和其他還沒有進入世界工業市場的国家了。

所以，在德國的遼闊的土地上，目前工業的狀況初看起來相當於採用機器以前到處盛行過的那種狀況。但只是初看起來才是這樣。先前那種同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農村家庭工業，至少在工業正在發展的国家里，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础，但同時也是工人階級精神上和政治上極其低下的基础。手工勞動產品及其生產費用決定了市場價格；並且在當時勞動生產率遠較今日為低的條件下，市場的銷售量通常比供應量增長得更快。十八世紀中葉在英國和在法國的一部分，特別是紡織工業中的情況，就是這樣。而當時剛從三十年戰爭的創傷中恢復過來，並且處在最不利條件下的德國，情況

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为世界市場而生产的唯一家庭工业，即亚麻織布业，經受着各种捐稅和封建义务的重压，以至兼做織工的农民的生活并没有超过其他农民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虽然如此，当时家庭工业工人終究是过着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的生活。

随着机器的采用，这种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价格已經由机器生产的产品来决定，家庭工业工人所得的工資就随着这种价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資，否則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为无产者，也就是說要抛弃自己的——不論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屋子、菜园和小块土地。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一步。因此，旧日农村手工織工經營园艺业和耕作业，就成了手織机同机器織机的斗争到处都拖得如此长久的原因，这个斗争在德国至今还没有結束。在这个斗争中，特别是在英国，初次显示出：以前是工人較好生活的基础的那种情况，即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資料，現在对他們來說已經成为一种障碍和不幸了。在工业方面，机器織机打敗了他們的手織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們的小农业。然而，当許多人共同劳动以及应用机器和科学在这两个生产部門中都已經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屋子、菜园、小块土地和他們的織布机仍然把他們束縛在已經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現在占有房屋和菜园已經远不及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流动那样有价值了。任何一个工厂工人都不会同一个在緩慢地餓死然而肯定要餓死的农村手工織工交換地位了。

德国在世界市場上出現得晚；我們的大工业产生于四十年代，它通过 1848 年的革命获得了初步的高涨，并且只是在 1866 年和 1870 年的革命至少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

展了起來。然而，這時它發現，世界市場大部分已經被佔據了。供應日用品的是英國，供應精緻奢侈品的是法國。德國既不能用價格來擊敗英國，又不能用質量來擊敗法國。因此，只好循着德國生產已經走慣了的道路，首先是帶着對英國說來太瑣碎、對法國說來太低劣的商品擠進世界市場。德國人慣用的先送優良貨樣後交劣等商品的騙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場上受到了嚴酷的懲罰，幾乎完全不能施展了；另一方面，在生產過剩條件下進行競爭，甚至漸漸促使體面的英國人走上了降低產品質量的歪路，從而幫助了在這一行里無可匹敵的德國人。這樣，我國就終於建立了大工業，並且開始在世界市場上起一定作用了。但是我國大工業幾乎是專為國內市場工作（只有製鐵業是例外，它的生產水平大大超過了國內的需要），所以構成我國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業至多只為小商品供應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則大部分由農村家庭工業來供應。

於是，自己的小屋子和小塊土地的占有給予現代工人的“恩惠”，就十分輝煌地表現出來了。任何地方——甚至愛爾蘭的家庭工業也不見得要除外——的工資都不像德國家庭工業中的工資那樣低到了可恥的地步。全家人從自己的菜園或小塊土地上辛苦得來的東西，被資本家用競爭從勞動力價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同意接受任何一種計件工資，因為不這樣他們就什麼也得不到，而單靠自己的農產品又不能維持生活；另一方面，因為正是這種農業和土地所有制把他們束縛於一個地點，阻礙他們另找職業。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德國才具有在世界市場上銷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競爭能力。資本的全部利潤都用扣除正常工資的方法榨取出來，而全部剩餘價值則可以白送給買主。這就是大部分德國出口商品價格

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

正是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甚地把其余各个工业部門的德国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欧各国工人的水平之下。这种传统地保持在大大低于劳动力价值以下的劳动价格，像鉛秤錘一样也压低了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資，使它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而且，城市中劳动报酬很低的家庭工业也占据了旧日的手工业的地位，并且在这里也压低了一般的工資水平。

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在比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經是工人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結合，占有房屋、菜园和土地，稳定的住宅——現在在大工业的統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鎖，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資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門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扣除工資过活和发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工人占有住宅，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一切农业灾难的唯一单方！

这是問題的一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业已經成了德国出口貿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因此，它广泛散布于德国，并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广地散布开来。小农自从他的为滿足自己消費的家庭工业劳动被成农业和机器工业的廉价产品所消灭，而他的牲畜以及厩肥生产因为馬尔克制度、公共馬尔克和强制的輪作制遭受破坏而被消灭的时候起，就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这种破产就把备受高利貸者盘剝的小农强迫地赶到現代家庭工业中来。正像爱尔兰地主的的地租一样，德国的高利貸者的抵押利息也不能由土地的收益来偿付，而只能由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的工資来偿付。而随着家庭工业的散布，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

現代的工業運動。這種由家庭工業造成的農業地區的革命化，就使德國境內工業革命散佈的地區要比英國和法國廣闊得多；我國工業發展的水平較低，就使這個革命尤其有必要向橫闊方面散佈。這就說明，為什麼德國同英國和法國相反，革命的工人運動在全國廣大地區得到這樣有力的傳播，而不只是局限於中心城市。這又說明，為什麼這個運動的發展是平靜的、穩定的和不可遏止的。很清楚，在德國只有當大多數小城市和大部分農村地區已經成熟到實行變革的時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勝利起義才有可能。在多少正常的發展條件下，我們決不可能像巴黎人在1848年和1871年那樣去取得工人的勝利，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這裡革命的首都也就不會像巴黎在上述兩個場合那樣敗於反動的外省。在法國，運動一向都是發源于首都，而在德國則是發源于大工業、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工業地區；首都只是後來才被攻克。因此，可能將來首先發動的也仍然是法國人，但是徹底的結局只能在德國打出來。

然而，這種由於散佈廣闊而成為德國決定性的生產部門，同時又使德國農民階級越來越革命化的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本身又不過是進一步變革的始初階段。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那樣（“資本論”第3版第1卷第484—495頁³⁷³），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機器和工廠生產也會為它們敲響喪鐘。敲響喪鐘的時刻看來已經很近了。但是農村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被機器和工廠生產所消滅，在德國就意味着千百萬農村生產者的生計被斷絕，幾乎一半德國小農被剝奪，不只是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而且是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和小地產轉化為領主的大農場——也就是意味著一場犧牲農民而有利於資本和大地產的工業和農業的革命。如果德國注定連這個變革也要在舊的社會條件下

完成，那末這樣的變革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個轉折點。如果那時其他任何一國的工人階級都還沒有首先發動，那末德國一定會開始攻擊，而“光榮戰鬥軍”的農民子弟一定會給予英勇援助。

這樣，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給每個工人一幢歸他所有的小屋子，從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縛在他的資本家那里——現在就變成完全另一個樣子了。實現這種空想，就是把一切小的農村房主變成為工業的家庭工人，結束那些被卷入“社會漩渦”的小農舊日的閉塞狀況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極其低下的狀況；就是使工業革命推廣到農業地區，從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動最保守階級變成革命的苗圃，這一切的結果，就是使從事家庭工業的農民被機器剝奪，被強迫走上起義的道路。

只要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慈善家在執行其資本家的社會職能時，還在繼續顛倒地實現他們的理想而有利于社會革命，我們是樂于讓他們去自我欣賞這個理想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10日于倫敦

載于1887年1月15和22日
“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和4號，
并載于1887年在霍廷根—蘇黎
世出版的弗·恩格斯“論住宅問
題”一書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論住宅問題”

美国工人运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³⁷⁴

自从我应译者^①的希望写完本书的“附录”^②以来，已经过去十个月了。在这十个月中，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在其他任何国家中至少需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变革。1886年2月，美国的社会舆论在一点上几乎是一致的，即认为：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③，因此，使欧洲社会四分五裂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共和国不可能发生，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外国引入的植物，它决不能在美国的土壤上生根。然而正是在那个时候，越来越近的阶级斗争已经呈现出它的巨大阴影：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人³⁷⁷和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人举行了罢工，特别是全国都在准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广大运动，这个运动说在5月开始就在5月开

① 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92—298页。——编者注

③ 我在1844年写的那本书用英文出版是有道理的，这恰恰是因为，现代美国的工业所处的状况几乎正好相当于四十年代，也就是我所考察的时期的英国工业的状态。情况相似到何等程度，发表在伦敦“时代”月刊3、4、5和6月号上的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论“美国工人运动”的那些文章³⁷⁵已经证明。我之所以更乐意提到这些出色的文章，还因为这使我有可能会同时批驳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毫无顾忌地散布的对艾威林的可恶的诽谤。³⁷⁶（恩格斯在1887年的单行本上加的注。）

始了。³⁷⁸ 我的“附录”表明，当时我已经正确地估计了这些征兆，预料到会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但是，当时谁也不能料到，运动会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以这样不可遏制的力量爆发出来，会以燎原烈火的速度蔓延开来，会从根本上震撼^① 美国社会。

但是事实摆在那里，駁不倒也辯不掉。我很有趣地听去年夏天賞光訪問我的美国記者們告訴我，美国統治階級对此是感到多么惊慌；“新的轉折”使他們束手无策，陷入了恐惧和张皇失措的状态。但是，那时运动还刚刚开始，那个由于黑奴制度的废除和工业的迅速发展而成为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階級只不过举行了一連串杂乱的、显然是互不联系的騷动。在年底以前，这种混乱的社会痙攣就开始采取确定的方向了。广大工人群众在国内辽阔的地区掀起自发的本能的运动，他們对于到处都是同样的、由同样原因造成的悲惨的社会状况的普遍不滿同时爆发出来，这就使这些群众意識到一个事实：他們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特殊的階級，一个实际上多少是血統的雇佣工人即无产者的階級。这种意識由于一种純粹美国人的本能使他們迅速地采取解放自己的下一步驟——組織具有自己的綱領并以夺取国会大厦和白宮为目标的工人政党。5月，掀起了爭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芝加哥和密尔窩基等地发生了騷动，統治階級試圖用暴力和殘酷的階級的司法机关来鎮压工人階級方兴未艾的反抗高潮。11月，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組成了新的工人政党，而且在紐約、芝加哥和密尔窩基进行了选举。³⁷⁹ 在此以前，5月和11月只能使美国資產階級想起凭合众国公債息票取息；从今以后，5月和11月将使他們同时想起美国工人階級

^① 在德文版中不是“震撼”，而是“現在已經在震撼”。——編者注

拿出自己的息票要求付息的日期了。

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完全相信，他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在现存社会关系下是固定的阶级；又经历了好多年，这种阶级意识才引导他们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于统治阶级各种派别所组织的一切旧政党并且同这些政党对立的^①政党。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而且在一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已经有了十七世纪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在这个较为良好的土地上，工人阶级在十个月中就经历了本身发展的这两个阶段。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工人群众感觉到他们的悲惨状况的共同性和他们的利益的共同性，感觉到同其他一切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他们为了表达这种感觉并把它变成行动，已经把每个自由国家里为这种目的而预备的政治机器开动了起来，——这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是要找到一剂医治这些共同苦难的共同药物，并且把它体现在新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中。而整个运动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这一步，在美国尚待完成。

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订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

这个纲领，无论它最初的形式如何，但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定

^① 在德文版中不是“对立的”，而是“敌对的”。——编者注

的方向发展。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造成鸿沟的原因，在美国和在欧洲是一样的；消除这种鸿沟的手段到处也都是相同的。因此，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①一定会同经过六十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欧洲战斗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相一致。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新的党也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凭借着它的形成这一事实本身就力图夺取政权，那末它在怎样对待一旦夺得的^②政权这个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纽约和东部的其他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组织是按职业联合的路线进行的，每一个城市都组织了强大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在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于去年11月把亨利·乔治选为他们的旗手，因此，联合会的临时竞选纲领中浸透了他的原则。在西北部大城市里，竞选是在很不明确的工人纲领的基础上进行的，亨利·乔治的理论的影响即使已经看得出来，那也只是刚刚看得出。在这些人口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心里，新的阶级运动已经充分带有政治性，同时，在全国，我们发现两个分布很广的工人组织，即“劳动骑士”³⁸⁰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中只有后者才具有符合上述现代欧洲观点的纲领。

在美国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三种多少已经确定的形式中，第一种，即亨利·乔治领导的纽约的运动，目前主要是地方性的。纽约无疑是合众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城市，但纽约不是巴黎，合众国不是法兰西。我认为亨利·乔治的目前这样的纲领是太狭隘了，它不

^① 在德文版中不是“归根到底”，而是“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删去了：“一旦夺得的”。——编者注

能作为越出地方性运动范围以外的任何运动的基础，即使作为总运动中的一个短期阶段的基础也不行。在亨利·乔治看来，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是人们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的、籠罩一切的原因。但从历史上看来，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亚細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說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說他們的人身被占有。在羅馬共和国衰落时期，当自由的意大利农民被剥夺了田地的时候，他們形成了一个同 1861 年以前南部各蓄奴州里的“白种貧民”相似的阶级；在奴隶和“白种貧民”^①这两个同样无力解放自己的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古代世界崩潰了。在中世紀，封建剝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剝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們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們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縛在土地上，而且必須以劳动或产品的形式給地主进貢。直到近代的黎明时期，即到十五世紀末，农民大規模被剝夺才給現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②，这些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除了向旁人出卖劳动力以外就不能生活。但是，如果說土地被剝夺使这个阶级产生，那末，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即現代的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則使它长存下去，使它人数增加，并使它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和負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特殊阶级。所有这些，馬克思都詳細地論述过了（“資本論”第七篇“所謂原始积累”³⁸¹）。馬克思认为，現代的阶级对抗和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③，原因就是工人阶级被剝夺了

① 在德文版中不是“白种貧民”，而是“貧穷的自由人”。——編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不是“农民大規模被剝夺給現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而是“农民大規模被剝夺了，并且这次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条件逐渐把成为无产者的农民变成了現代雇佣工人阶级，变成了人”。——編者注

③ 在德文版中不是“处境恶化”，而是“現今的屈辱”。——編者注

一切生产资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土地。

亨利·乔治既然宣布土地垄断是贫穷困苦的唯一原因，自然就认为医治它们的药剂是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要求把土地交给社会，但不仅是土地，而是同样还有其他一切生产资料。但是，即使我们撇开其他生产资料的问题不谈，这里也还有另外一个差别。土地如何处理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求共同占有土地和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种，对其他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矿山、铁路、工厂等等也是一样；亨利·乔治却只限于像现在这样把土地出租给单个的人，仅仅把土地的分配调整一下，并把地租用于公众的需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于私人的需要。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实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的变革；亨利·乔治所要求的，是把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实质上^①就是李嘉图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极端派提出的东西，这一派也要求由国家没收地租。

当然，如果认定亨利·乔治已经把话一下子说完了，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只有照我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来考虑他的理论。

美国工人运动的第二个大派别是由劳动骑士组成的。看来，这一派对运动的现阶段来说是最典型的，同时无疑也是最有力的。这是一个以无数的“集会”形式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的巨大团体，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色彩的个人的和地方的意见。他们共有着一个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不明确的纲领，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与其说是实际上无法遵行的章程，不如说是这种本能的感觉：

^① 在德文版中，“实质上”的后面加有：“早已”。——编者注

他們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团结起来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們成为国内的一支伟大力量。这是真正美国式的怪现象：最现代的趋向披上了最中世纪的外衣，而最民主的、甚至叛逆的精神隐藏在表面的、但实际上毫无力量的专制之下，——这就是劳动骑士向欧洲观察家展示的一幅图画。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这种纯粹是表面的怪现象上，我们就不可能不看到，在这个广泛的团体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这种巨大的潜力正在缓慢地但确实地发展成实际的力量。劳动骑士是整个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不管它的起源和历史如何，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和细小的怪诞行为，不管它的纲领和章程怎样，这里存在的是美国实际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产儿，是把他們联合起来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纽带，它不仅使他們的敌人，而且也使他們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使他們对未来的胜利满怀骄傲的希望。只说劳动骑士有能力发展，那是不确切的；他們是经常处于蓬勃的发展和改造的过程中。这是一块正在涌起正在发酵的由可塑性材料构成的实体，并且正在寻找适合它本性的形式。这种形式无疑是会找到的，因为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到那时，劳动骑士是否保留现在这个名称，那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一个局外观察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原料必定锻造出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从而锻造出整个美国社会的未来。

第三个派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只有一个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且，它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来的，因为直到最近，它的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移民，他們用的是本国语言，并且大多数人都不懂得美国通用的语言。但是，如果说这个党是起源于外国，那

末，它同时也就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并且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①，这种理解远远超过了美国工人迄今所达到的理解水平。这对美国无产者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掌握并利用欧洲的阶级伙伴在四十年斗争中所得到的智慧和精神上的成果，从而加速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到来。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的整个战斗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负有在运动中起极重要作用的使命。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掉外国服装。它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占绝对多数的而且是本地人的美国人靠攏。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

参加运动的广大群众的各种分子——他们实质上并不敌对，但是由于出发点不同而在实际上彼此隔膜——融合一起的过程，需要有一些时间，并且不能不发生一些摩擦，这种摩擦在某些地方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了。例如，劳动骑士在东部城市的某些地方和有组织的工会进行着地方性的斗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摩擦也发生在劳动骑士内部，那里根本谈不到和平和协调。这并不是能使资本家欢呼的那种瓦解的象征。这只是标志着，初次^②按共同方向行动的无数的工人群众还没有找到适当地表达他们共同利益的东西，也没有找到最适合于斗争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找到保证胜

① 在德文版中“理解”后面的那句话改做：“这是迄今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从美国工人中看到的理解”。——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不是“初次”，而是“现在终于”。——编者注

利所必需的紀律^①。这在目前只是为了伟大的革命战争而进行的第一次群众性征兵，是就地独自集合和装备起来的队伍，它们正在为组成一支统一的大军而汇合起来，但是还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统一的进军计划。正在汇合的各部队往往彼此阻挡道路；出现了混乱、怒气冲冲的争论，甚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但是，最终目的的一致性终究会战胜一切小风波。这些分散的争吵不休的队伍很快就会列成一个长长的战斗横队，将在敌人面前摆成一条严整的战线，在威严的沉寂里閃射出武器的寒光，有勇敢的先驱兵在前，有坚定的预备队殿后。

达到这种结果，把各种独立的部队联合成一支具有临时^②纲领——不管这个纲领如何不够，但只要它真正是工人的纲领就行——的全国性的工人大军，这就是在美国须要完成的下一个巨大的步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制定无愧乎这个运动的纲领，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做许多事情，只要它愿意像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只占工人阶级少数的时候那样行动就行。这个策略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是用以下的话陈述的：

“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在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

① 在德文版中删去了：“也没有……纪律”。——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不是“临时”，而是“共同的”。——编者注

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³⁸²

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四十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这个策略到处都引向胜利，目前欧洲所有的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在同一旗帜下的统一的^①军队一样在战斗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26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的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87年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和2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① 在德文版中，“统一的”的后面加有：“伟大的”。——编者注

*給巴黎国际联誼节 組織委员会的信³⁸³

公民們：

我們現在面临着极严重的危險。战争在威胁着我們，痛恨战争而且具有唯一的共同的利益的法国和德国无产者将在这次战争中被迫互相殘杀。

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是軍国主义，是在大陆各大国施行了普魯士式的軍事制度。

这个制度被說成是武装全民以保卫本国領土和本国权利。这是撒謊。

普魯士制度取代了有限征兵制和富人可出錢找代役者的代役制，因为它把国家的一切資源——人力和物力的資源都交由掌权者支配。但是它沒有能够建立一支国民軍。

普魯士制度把应征服兵役的公民分为两类。第一类編入常备軍，而第二类則立即被派定为后备軍或地方部队。这后一类得不到或者几乎得不到任何軍事訓練；但前一类則一直服役两三年，——这段時間足以把他們造成一支俯首貼耳、按紀律机械行动

的軍隊，時刻準備對外進行征服，對內殘酷鎮壓人民運動。這是因為——我們不應該忘記——採用這個制度的一切政府，害怕本國工人比害怕國外與之競爭的政府要厲害得多。

這個制度由於有彈性所以能大大擴張。的確，哪怕僅僅還有一個年輕人沒有被編入隊列，現有資源就不能算已經用盡。因而各國之間才這樣為擁有一支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軍隊而進行無休止的競爭；某個國家增加一次武裝力量，別的国家就都會這樣做，甚至有过之無不及。而這是非常花錢的。人民已經被軍費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了。和平越來越變得幾乎比戰爭更花錢，於是戰爭終於已經不是什麼可怕的災難，而成了一種能夠結束不堪忍受的狀況的救世的危機。

這就使各國的陰謀家，那些熱衷於渾水摸魚的家伙，得以把人民推向戰爭。

那末，用什麼辦法來對付呢？

廢除普魯士式的制度，代之以真正的國民軍這所普通的學校，使每個能夠扛槍的公民都加入這所學校，時間要嚴格規定，以學會當兵的本領所必須的時間為限；把經過這種訓練的人造就成預備隊的基干人員，按地區很好地組織起來，使每個城市、每個縣都有它自己的一個營，這個營的人都彼此認識，團結一致，有武器、服裝，必要時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隨時出動。這就是說，每個人家裏都有槍械和裝備，像瑞士那樣。

首先實行這種制度的那國人民，會使自己的軍事實力增加一倍而同時還會使自己的軍事預算減少一半。他們將用武裝本國全體公民這一事實來證明他們對和平的熱愛，因為這支由人民自己組成的軍隊是根本不能用來對外進行征服的，正像在保衛祖國領

土时是根本不可战胜的一样。而且，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五十发子弹，还会有哪一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2月13日于伦敦

載于1887年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79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波克罕“紀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 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³⁸⁴

本书作者西吉茲蒙特·波克罕 1825 年 3 月 29 日生于格洛高。1844 年他在柏林讀完中学后，先在布勒斯劳、后又在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讀大学。1847 年为了服兵役，他不得不作为服役期三年的志愿兵参加了格洛高的炮兵，因为他太穷，担負不起服役期一年的花費。1848 年革命爆发后，波克罕参加民主集会，因而被軍事法庭偵訊，以逃往柏林而得免。在柏林，他起初沒有遭到追捕，仍然在运动中积极活动，并且坚决参加了攻打軍械庫。³⁸⁵ 为此他将遭逮捕，又以逃亡而得免，这次他逃往瑞士。当司徒卢威于 1848 年 9 月間在瑞士組織志愿軍向巴登黑林山脉进軍时³⁸⁶，波克罕参加了进軍并被俘，一直被囚到 1849 年 5 月巴登革命³⁸⁷ 释放囚人的时候。

波克罕去卡尔斯卢厄，以便作为一个兵士为革命出力。当約翰·菲力浦·貝克尔被任命为全部人民自卫团的指揮官时，他委托波克罕建立一个炮队，但政府最初給炮队发的只是些沒有馬匹的火炮。馬匹一直沒有領到，而六月六日运动³⁸⁸ 爆发了，較坚决的人想用这次运动迫使萎靡不振的、其中一部分人純粹是叛徒的临时政府比較有力地行动起来。波克罕也和貝克尔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直接效果仅仅是：貝克尔以及他的全部志愿軍

和人民自衛團都被調出卡爾斯盧厄，派往尼喀河戰場。波克罕和他的炮隊無法跟着貝克爾走，他還沒有領到拉炮的馬匹。當他終於領到馬匹時，——因為政府首腦布倫坦諾先生那時一心要甩開革命的炮隊，——普魯士軍隊已經佔領了普法爾茨，所以波克罕炮隊的第一個戰役就是佔領克尼林根橋附近的陣地，掩護普法爾茨的軍隊向巴登的領土轉移。

波克罕的炮隊同普法爾茨部隊以及尙在卡爾斯盧厄地區駐扎的巴登部隊一起，這時向北推進。6月21日，炮隊投入布蘭肯洛赫附近的戰鬥，並且光榮地參加了烏布施塔特戰役（6月25日）。在為佔領牟爾克河的陣地而改編軍隊時，波克罕和他的所有火炮都配屬給奧博爾斯基師，並且在爭奪庫本海姆的戰鬥中卓著功勳。

革命軍隊向瑞士領土退却後，波克罕去日內瓦。在那裡，他遇見了他的老首長和朋友約·菲·貝克爾，以及一些比較年青的戰友，他們已經結成了一個在苦難的流亡生活中極盡歡樂之可能的集體。1849年秋天我路過日內瓦時，曾和他們度過幾天歡樂的日子。由於卡爾·福格特先生的駭人謊言而得到一個最冤枉的身後惡名“硫磺幫”的，就是這個集體。³⁸⁹

但是，歡樂持續不久。1850年夏天，无情的聯邦委員會的權力也壓到無辜的“硫磺幫”身上來了，大多數歡樂的年青人必須離開瑞士，因為他們屬於應予驅逐的那一類流亡者。波克罕去巴黎，以後又去斯特拉斯堡。但是在這裡他也呆不下去。1851年2月，他被逮捕并被押送到加來，以便乘船送往英國。在三個月當中，他被人從一個地方拖到另一個地方，多半是帶着鐐銬，先後經過二十個監獄。但是，他每到一處，共和派事先就知道了，他們迎接這位被押送的囚人，給他送去丰盛的食物，款待和賄賂憲兵和官吏，盡

可能安排下一步的行程。就是這樣，他最後來到了英國。

的確，他在倫敦遇到了比在日內瓦或者甚至比在法國都嚴重得多的流亡困苦，但是在这里他也沒有失掉他那種與生俱來的機智。他尋找任何一種工作，最初在利物浦的一家僑民企業里找到了事做，那里需要德籍職員做翻譯，來應付大批離開了又一次幸運地被安撫下去的古老祖國的德國流亡者。同時，他還尋找別的事務關係，而且是这样順利，竟然在克里木戰爭之初弄了一輪船各種各樣的貨物開到巴拉克拉瓦去，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分別賣給了軍隊指揮部和英國軍官。他回來時淨剩純利 15 000 英鎊（30 萬馬克）。但是，這一次成功却促使他進一步去作投機活動。他又聯繫上了一項為英國政府供貨的合同。這時已經進行媾和談判，所以政府就在合同里提出一個條件：如貨到之日媾和的先決條件已被接受，政府可以拒絕收貨。波克罕同意了這點。當他和他的輪船到達博斯普魯斯海峽時，和約已經簽訂了。輪船租的只是去程，輪船的船長這時由於可以得到大宗有利可圖的返航載貨，於是就要求馬上卸貨，可是波克罕在擠得滿滿的港口里根本無法找到一個地方存放歸他處理的貨物，於是船長就把所有貨物隨便卸到了一處海岸上。波克罕就這樣和他的那些枉費力氣運來的箱子、貨包和大木桶呆在那里，束手無策地看着當時從土耳其的各個角落和整個歐洲跑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各種惡棍把他的貨物偷個精光。他回到英國後又成了一個像過去一樣的窮人，15 000 英鎊全丟了。但是他那種不可摧毀的機智的性格並沒有丟失。他在投機活動上丟掉了金錢，但是却學會了在實業界辦事和交往的本領。他還發現，他對酒類的質量有一種特別敏銳的鑒別力，並且成功地為波爾多的各家出口商號做代理人。

但同时他尽可能地参加政治运动。在卡尔斯卢厄和日内瓦，他认识了李卜克内西。由于福格特的丑剧，他同马克思建立了联系³⁹⁰，这也就是我和他再次会见的理由。波克罕虽然没有用一定的纲领来约束自己，却一直追随着最革命的党派。他的主要的政治活动，是同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即俄国专制制度作斗争。为了更好地观察俄国的旨在征服巴尔干国家和间接统治西欧的阴谋，他学会了俄文，并且研究俄国的报刊和流亡者的作品多年。同时，他还译出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我们俄国情况”³⁹¹一书，书中抨击了由赫尔岑开其端（后来由巴枯宁所继承）并为西欧的俄国流亡者所效法的虚伪风气，即在西欧不是传播他们所熟知的俄国真相，而是散布合乎他们的民族的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口味的通常奇谈。他还在柏林的“未来报”³⁹²、“人民国家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写了很多论俄国的文章。

1876年夏天，他在去德国的路上于巴登魏勒尔得了中风症，整个左半身终身瘫痪。他不得不放下他的事业。几年以后，他的妻子死去。他由于患肺病而不得不搬到海斯丁斯去，到温和的海洋性气候的英国南海岸去。瘫痪也好，疾病也好，微薄的、不能经常得到保证的生活费用也好，都不能摧折他那无比坚强的精神力量。他的书信中总是洋溢着激奋的欢乐，他的笑声感染着同他见面的人。他爱好的读物是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1885年12月16日，他患肺炎去世。

“极端爱国主义者”一文在对法战争结束后就在“人民国家报”上出现，此后不久又出单行本。这本书，对于官方的和资产阶级的德意志一向沉湎于超爱国主义的陶醉于胜利的情况来说，已成了

一付非常有效的解毒剂。的确，最好不过的清醒剂莫过于回忆一下現在被捧到天上的普魯士当年曾經在法国人的进犯之下，即在現在被蔑視为战敗者的法国人的进犯之下被可耻地摧毀。而这付药剂也应该有特別大的效力，因为，关于十分糟糕的事实的叙述是从这样一本书中摘来的，在这本书中，一位普魯士將軍^①，而且还是高級軍事学校的校长，根据普魯士的官方文件描繪了这个可耻的时代；而且应该承认描繪得很客观，并不夸大³⁹³。一支大的軍隊，像任何其他的大社会机体一样，在一次大失敗以后最好是好好想一想，承认自己过去的过失。在耶拿战役之后，普魯士人就处于这种状态。另一次是在 1850 年之后，的确，他們那时沒有遭到大的失敗，但是在一系列小征伐——对丹麦和对南德的征伐——之后以及在 1850 年第一次大动員过程中，他們的軍事上的十分衰敗，無論是对他們自己还是对全世界來說都是完全清楚的了；也是在那时，他們只有以华沙的和奧里繆茨的政治耻辱为代价才主动避免了真正的失敗。³⁹⁴ 为了懂得如何改进，他們曾不得不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无情的批判。他們的軍事学术界（其中曾出現了克劳塞維茨这样的第一流人物，但从那时起便无止境地降低了自己的水平）在这种必不可免的自我检查的情况下这时又重新振兴起来。这次自我检查的成果之一就是赫夫內尔的著作，波克罕的书即取材于此。

即使現在，仍然有必要經常使人回忆一下这个时代：傲慢和失敗、国王无能的时代，迷恋于自己的两面手法的普魯士外交官愚蠢奸詐的时代，貴族軍官在极其懦怯的叛卖中仍然大言不慚的时代，

① 爱德华·馮·赫夫內尔。——編者注

完全背離人民的、建立在說謊和欺騙之上的國家制度總崩潰的時代。德國的庸人（也包括貴族和王公）現在有時比當時更為妄自尊大和沙文主義；外交行動顯然更蠻橫了，不過還保留着過去的两面手法；貴族軍官人數的自然的增加和人為的增加已使他們又能占據先前那種在軍隊中的統治地位，國家也日益背離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變成一個大地主、交易所經紀人和大工業家的集團來剝削人民。當然，如果再走到戰爭的地步，普魯士德意志的軍隊憑它在組織上是所有別的軍隊的榜樣這一點來說，是會比它的敵人和它的盟友占有相當大的優勢的。但是，它再也得不到像在最近兩次戰爭³⁹⁵時期那樣的優勢了。舉例來說，那時由於特殊的幸運情勢而形成的高級指揮的統一，以及下級指揮官的相應的絕對服從，都不見得會照樣再一次出現。目前流行於土地貴族以及軍人貴族——一直到皇帝的侍衛官——同交易所投機家之間的事務勾結關係，對於前綫軍隊的供給很容易地會成為致命的東西。德意志會有它的盟友，但是一有機會，它就會拋棄盟友，而這些盟友也就會拋棄它。最後，對於普魯士德意志來說，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那時會有 800 萬到 1 000 萬的士兵彼此殘殺，同時把整個歐洲都吃得干乾淨淨，比任何時候的蝗蟲群還要吃得厲害。三十年戰爭所造成的大破壞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來並遍及整個大陸；到處是飢荒、瘟疫，軍隊和人民羣眾因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我們在商業、工業和信貸方面的人造機構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態，其結局是普遍的破產；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在街上而無人拾取；絕對無法預料，這一切將怎樣了結，誰會成為鬥爭中的勝利者；只有一個結果是絕對沒

有疑問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為工人階級的最后勝利造成條件。

如果已達頂點的軍備競爭制度終於產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前景就是這樣。國王和國家要人老爺們，這就是你們的才略把舊歐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們再也沒有別的方法，只能開始跳一場最后的大戰舞，那我們是不會哭泣的。就算戰爭可能會把我們暫時拋到後面去，就算它會把我們已經爭得的某些陣地奪去。但是，如果你們放縱你們以后將無法對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時情況如何，在悲劇結束時你們必將垮台，而無產階級的勝利不是已經爭得，就是終於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於倫敦

載於1888年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的西·波克罕“紀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一書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紀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³⁹⁶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秘密团体的工人组织的纲领发表的。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³⁹⁷杂志上。同时也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是委员们都被逮捕，并且在经过十八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从10月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告中有七个人被判处了三年至六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时，便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国际应该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当时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互相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智慧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是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半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去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②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³⁹⁸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一来，“宣言”本身就重新提到前台上来了。从1850年

① 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他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1862—1864年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② 比万。——编者注

PRICE TWOPENC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y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FREDERICK ENGELS,
1888.



London:
WILLIAM REEVES, 185, FLEET STREET, E.C.

“共产党宣言” 1888 年英文版的扉页

起，德文原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紐約把它譯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³⁹⁹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譯成法文，刊载在紐約的“社会主义者报”上。⁴⁰⁰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現过两种多少有些曲解的英文譯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譯的第一个俄文本約于1863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刊印⁴⁰¹；由英勇的維拉·查苏利奇翻譯的第二个俄文本，則于1882年同样在日内瓦出版。⁴⁰²新的丹麦文譯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譯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有人根据这后一版本譯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馬德里出版。⁴⁰³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則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十二个。阿尔明尼亚文譯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沒有出版問世。有人告訴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馬克思的姓名，而譯者又拒絕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出版。关于后来用其他文字出版的譯本，我虽然听說过，但是沒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現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現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綱領。

可是，当我們写这个“宣言”时，我們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謂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說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經变成純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們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綴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不伤及資本和利潤。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階級运动以外，宁

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雕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身分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⁴⁰⁴，所以我们也丝毫沒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沒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

这个思想。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一书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的进展。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个别地方本可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从1848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1年伦敦特鲁洛夫版第15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⁴⁰⁵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①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By Frederick Engels. Translated by Florence K. Wishnewetzky. New York, Lovell—London, W. Reeves, 1888.

度問題所提出的意見(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見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权利来加以修改。”⁴⁰⁶

本版譯文是由譯过馬克思“資本論”一书大部分的賽米尔·穆尔先生翻譯的。我同他一起把譯文校閱过一遍,并且我还加进了一些历史备考性的附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于伦敦

載于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
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共产党宣言”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 古典哲學的終結”^①一書序言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序言中說，1845年我們兩人在布魯塞爾決定“共同鑽研我們的見解”——特別是由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同德國哲學思想體系的見解之間的对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八開本兩厚冊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亞的出版社，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耗子的牙齒去批判了”⁴⁰⁷。

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四十多年，馬克思也已逝世了。不論他或我，都再沒有過機會回到這個題目上來。關於我們和黑格爾的關係，我們曾經在某些地方做了說明，但是無論哪個地方都說得不够全面系統。至於費爾巴哈，雖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爾哲學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中間環節，我們却從來沒有回顧過他。

這期間，馬克思的世界觀遠在德國和歐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語言中都找到了代表。另一方面，德國的古典哲學在國外，特別是在英國和斯堪的那維亞各國，好像有點要復活的样子。

① 見本卷第301—353頁。——編者注

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殘羹剩汁,看来已惹得人人都討厭起来了。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們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們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簡要而有系統的說明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們还欠着一笔信誉債,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們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費尔巴哈給我們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編輯部要我写一篇批評文章来評述施达克那本論費尔巴哈的书⁴⁰⁸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該杂志 1886 年第 4 期和第 5 期上,現在这个版本是經過修訂的单行本。

把这几頁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 1845—1846 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讀了一遍。其中关于費尔巴哈的一章沒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还多么不够。在旧稿里面对于費尔巴哈的学說本身沒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們現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馬克思的一本旧筆記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⁴⁰⁹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筆記,根本沒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筆記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貴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 年 2 月 21 日于伦敦

載于 1888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 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 21 卷譯出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貿易^①

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
自由貿易的演說”的序言⁴¹⁰

1847 年底，在布魯塞尔举行了一次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會議。⁴¹¹ 这是英国工厂主在他們当时开展的爭取自由貿易运动中的一次战略机动。他們一面庆祝国内 1846 年废除谷物法⁴¹² 的胜利，一面到大陆去，以大陆各国向英国自由輸入谷物的权利为交换条件，要求让英国的工业品自由輸入大陆各个市場。在这次會議上，馬克思报名为演讲人之一，但是，不出所料，事情是这样安排的：該他发言之前，會議就閉幕了。因此，馬克思只好把原来准备說的关于自由貿易的話，对布魯塞尔民主协会讲了，他当时是这一国际組織的副主席之一。⁴¹³

由于实行自由貿易还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問題目前在美國已經提上日程，所以人們认为发表馬克思演說的英譯文是有好处的，并且請我为这个英譯文写一篇序言。

馬克思說：“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剝夺独立劳动者、使

① 这是正在紐約出版的馬克思关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由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譯成德文；馬克思“哲学的貧困”一书的附录二，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第 188 頁及以下各頁)的序言(由本文作者自譯)。因为这篇序言首先是为美国讀者写的，所以德国的保护关税政策只能順便提到。不久本文作者也許还有机会專門就德国的情况来探討這個問題。(恩格斯在德譯文上加的注。)

国民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为資本、用暴力方法縮短由旧生产方式向現代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⁴¹⁴ 保护关税制度在十七世紀产生的时期是这样，在十九世紀的許多年代里，仍然是这样。保护关税制度当时被认为是西欧一切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只有德国的小邦和瑞士的州是例外，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喜欢这种制度，而是因为在这样的領土上无法采用这种制度。

現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十八世紀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而且，好像保护关税率还不够似的，反对法国革命的几次战争又帮了忙，确保了英国对新工业方法的垄断。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們的殖民市場之間的联系达二十多年之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貿易打开了这些市場。南美各殖民地脱离了它們的欧洲宗主国，英国侵占了法国和荷兰的所有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漸征服——这就把所有这些广大領土的居民变成了英国商品的消費者。于是，英国在国内市場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外国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費者实行自由貿易作了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結合，到战争終了时，即1815年，英国就已經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門的世界貿易的实际垄断者。

在战后的和平年代中，这种垄断权力繼續扩大和加强。英国在战争时期所取得的优势逐年增长；看来，它把它的一切可能的竞争者愈来愈远地抛在后面了。使輸出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长，实际上成了关系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在它的道路上看来只有两个障碍：其他国家的禁止性立法或保护关税立法以及輸入英国的原料和食品进口稅。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农学派及其英国继承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貿易学說，就在約翰牛的国家里流行起来。在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对工厂主說来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打败了一切外国竞争者，他们的生存本身也依赖于出口的扩大。在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只有利于食品和原料的生产者，只有利于有农业收入的人，在英国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收地租的人，即土地贵族。而对于工厂主，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是有害的。由于征收原料稅，用这种原料加工的商品的价格便提高了；由于征收食品稅，劳动的价格便提高了；保护关税制度使英国工厂主在这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外国竞争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而由于其他所有国家主要是向英国輸出农产品并且主要是从英国輸入工业品，所以，废除英国对谷物和原料的保护关税，一般地說同时也就是呼吁其他国家废除，或者至少是降低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稅。

經過长期的、剧烈的斗争以后，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取得了胜利，他们在当时实际上就已经是全民族的领导阶级，他们的阶级利益当时被认为是主要的民族利益。土地贵族被迫让步。谷物稅和其他原料稅被废除了。自由貿易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下一个任务是，使其他一切国家都改信自由貿易的宗教，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而其他一切国家则成为从属的农业区。

这就是召开布魯塞尔會議和馬克思准备这篇演說的时代背景。虽然他承认，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在 1847 年的德国，保护关税制度还可能有利于工业资本家；虽然他证明，自由貿易并不是能够消除工人阶级身受的一切禍害的万应灵药，甚至还可能加重这些禍害，但是，他归根結蒂并且在原則上还是表示贊成自由貿易。在

他看来，自由貿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只有实行自由貿易，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的速度愈快，也就会愈快、愈充分地实现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一边是世襲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襲的貧困；供过于求，市場无法容納日益增加的工业品产量；不断重复出現周期——工商业繁荣、生产过剩、危机、恐慌、經常的蕭条、逐漸复苏，而复苏并不是长期好轉的先兆，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新的危机的先兆；一句話，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生产力所依賴的社会制度变成了生产力不能忍受的桎梏；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实行社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真正的生产者、广大人民群众从雇佣奴役状况中解放出来。而由于自由貿易是这种历史演进的自然的、正常的环境，是最迅速地使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得以造成的經濟培养基，——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馬克思才宣布贊成自由貿易。

无論如何，紧接着自由貿易在英国获胜以后的那些年代，看来是证实了对于随这个胜利而来的繁荣所抱的最大希望。不列顛的貿易达到了神話般的規模；英国在世界市場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冶铁厂和新的紡織厂大批出現，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門。誠然，在 1857 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但是，危机被克服了，貿易和工业很快又重新蓬勃高涨起来，直到 1866 年爆发了新的恐慌为止，这次恐慌看来标志着世界經濟史上的一个新的轉折点。

1848 年到 1866 年期間不列顛工业和貿易的空前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废除食品和原料的保护关税引起的。但是，也

不仅是这个原因。同时还发生了其他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促进了这一发展。在这些年代中，发现并开采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手段；在这些年代中，用蒸汽发动的运输工具最后战胜了其他各种运输工具；在海洋上，輪船現在已經排挤了帆船；在陆地上，铁路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占第一位，碎石公路次之；运输現在变得比过去快三倍，而过去的运费比現在貴三倍。因此，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利用蒸汽进行生产的英国工业，依靠損害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外国家庭工业而扩大了自己的統治，这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难道其他各国就应该袖手而坐，温順地听任这些变化使自己淪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简单的农业附庸嗎？

其他各国并没有这样做。法国在将近两百年中在自己的工业的周围筑起了一道保护关税和禁止性关税的真正的万里长城，并且在一切奢侈品和工艺品的生产方面达到了甚至連英国也不敢不服气的优越地位。瑞士在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拥有了英国的竞争也損害不了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工业部門。德国实行了比欧洲大陆其他任何大国都自由化得多的稅率，以一种甚至比英国还要快的速度发展着自己的工业。而美国由于 1861 年的內战一下子使它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也不得不設法滿足突然产生的对各种工业品的需求，而它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随着战争的停止，战争所产生的需求沒有了；但是新的工业依然存在，并且要碰上英国的竞争。由于战争，在美国人們的一个認識便成熟了，这就是：一个人口达三千五百万的民族，其人口至多在四十年內就能增加一倍，又具有巨大的资源，而周围的邻国在許多年中还不得不主要从事农业，那末这样的民族有“天定命运”

(«manifest destiny»)⁴¹⁵ 在主要消費品方面不論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不依賴外国工业。于是,美国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

大約在十五年以前,我和一个看来是同制铁业有关系的、有学識的格拉斯哥商人同乘火車。当話題談到美国的时候,他就向我大发关于自由貿易的老一套高論:“像美国人这样精明的生意人居然向自己本地的冶金工业家和工厂主进貢,而他們本来可以在我們国家里买到的商品即使不是更好,至少也是同样好,而且比他們的便宜得多,这难道不令人費解嗎?”他还向我举出例子,证明美国人为了使几个貪婪的冶金工业家发财,担負着多么高额的賦稅。我回答說:“我想这个問題还有另外一面。您知道,在煤炭、水力、铁矿和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国棉花和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沒有的大量資源和优越条件;而只有当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时候,这些資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您也应该承认,現在,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民族不能只靠农业为生,因为这等于让自己注定永远处于野蛮状态和从属地位;在我們的时代,任何一个大民族沒有自己的工业都不能生存。所以,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一切希望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末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貿易,进行比如說五十年的費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領先于美国工业約一百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說二十五年中堵住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绝对把握地坚信,二十五年以后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場上占有一个地位。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經濟、最短捷呢?这就是問題所在。如果您想从格拉斯哥到伦敦去,您可以乘議會火車⁴¹⁶,每英里花一辨士,每小时走十二英里。但是您不会这样做。您的時間太宝貴了,您会坐特別快車,

每英里花二辨士，每小时走四十英里。所以，美国人情愿花特别快車的錢，以特别快車的速度前进。”我这位苏格兰的自由貿易論者无言以对。

因此，作为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手段，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有益于还在繼續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尙未充分发展的資本家階級，而且也可以有益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它从未見過封建制度、但是已經达到势必从农业向工业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新兴資本家階級。美国既处于这种状况，便决定轉而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自从实行了这一决定以来，大約經過了我对我的旅伴所說的那个二十五年，如果当时我没有讲錯的話，那末保护关税制度对美国已經應該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而現在要变成障碍了。

这就是我一些時間以来所持的看法。大約两年以前，我对一位美国的保护关税論者說过：“我确信，如果美国实行自由貿易，它十年以內将在世界市場上打敗英国。”

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穷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轉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門，同时也就直接或間接地損害了其他一切工业部門，因此你就必須把它們也保护起来。这样一来你又会給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門造成損失，你就必須补偿它的亏损，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其他一切部門，并且使它們也有权利要求补偿，——就这样繼續下去，*in infinitum*〔沒有尽头〕。美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用保护关税制度扼杀一个重要工业部門的令人吃惊的例子。1856年合众国的航运进出口总额共計 641 604 850 美元；其中 75.2%用美国船只載运，只有 24.8%用外国船只載运。不列顛的远洋輪船当时就已經排挤美国的帆船了，但是，在 1860 年的海上貿易总额

762 288 550 美元中，美国船只的载运量仍然占 66.5%。内战爆发了，对美国的造船业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一措施非常成功，以致美国国旗在公海上几乎完全消失了。1887 年合众国的海上貿易总额共达 1 408 502 979 美元，但是其中只有 13.8% 用美国船只载运，而 86.2% 都用外国船只载运。1856 年美国船只载运的商品总值为 482 268 274 美元，1860 年为 507 247 757 美元。1887 年就下降到 194 356 746 美元。^① 四十年前，美国国旗是不列颠国旗的最危险的竞争者，在海洋上大有超过不列颠国旗之势；现在它完全不行了。在造船业方面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既扼杀了航运业，又扼杀了造船业。

还有一点。生产方法的改进在当代是这样迅速地接连不断地出现，是这样突然而彻底地改变着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的性质，以致昨天还可能有不少好处的一种保护关税税率，到今天就变了。我们从财政部长 1887 年度的报告中再举另一个例子吧：

“近年来在羊毛精梳机上实现的改进，使所谓精梳毛織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精梳毛織品在很大程度上排挤了做男服用的普通毛織品。这种变化……给我们本国的这些〈精梳毛織类的〉商品的生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因为用来制造这些商品的羊毛，同用来制造普通毛織品的羊毛，所抽的税是一样的；然而，普通毛織品每磅价格在 80 分以下的，税额是每磅 35 分和 *ad valorem* [价值的] 35%，而精梳毛織品价格在 80 分以下的，税额是每磅 10 分至 24 分和 *ad valorem* 35%。在某些情况下，用来制造精梳毛織品的羊毛，所抽的税竟超过了成品税。”

这样一来，昨天保护本国工业的措施，今天变成了对外国进口

^①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etc., for the Year 1887》. Washington, 1887, pp. XXVIII, XXIX [“财政部长 1887 年年度报告” 1887 年华盛頓版第 XXVIII、XXIX 頁] ⁴¹⁷。

商的奖励，財政部长^①說得对：

“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如果稅率不做相应的改变，精梳毛織品的生产在我国很快就要停止。”(第 XIX 頁)

但是，要改变稅率，你就必須同从目前这种情况中得到好处的制造普通毛織品的工厂主作斗争；你就必須大干一場，以便在国会两院中赢得多数，并且最后赢得国内的社会輿論；于是問題就是：这样做上算嗎？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一旦实行起来，就不容易再摆脱了。无论确定公平的稅率是多么困难，但怎么也沒有轉过来实行自由貿易的困难大。使英国有可能在不多的几年中就实现了这一过渡的那些条件是不会重新出現的。但是，就是在英国，1823年(哈斯基森)开始的斗争也是在1842年才获得初次的成功(皮尔稅則)⁴¹⁸，而且在谷物法废除以后又繼續了好几年。所以，在絲紡織业(还害怕外国竞争的唯一的工业部門)中保护关税制度起初就延长了許多年，后来又被允許以另一种十分可耻的形式存在下去；紡織工业的其他部門都遵从限制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工作时间的工厂法令⁴¹⁹，絲紡織业却作为重大例外享有不受一般規則約束的优待，可以雇用比紡織工业其他部門年龄更小的童工，可以强迫童工和未成年工工作更长的時間。伪善的自由貿易派对外国竞争者取消了垄断地位，但是他們又用損害英国儿童健康和生命的办法恢复了它。

但是在将来，任何一个国家从保护关税制度向自由貿易过渡

① 查理·費尔柴耳德。——編者注

的时候都不可能处于英国当时所处的那种状况，当时英国工业的一切部門，或者說几乎一切部門都能够在自由市場上同外国竞争相对抗。早在可以期望有这种幸运的状况以前很久，就会出现实现这一过渡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会在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門中在不同的時間表現出来；这些部門的彼此矛盾的利益将会引起最有启发意味的爭吵、議會走廊中的阴谋詭計和議會会场內的勾心斗角。机器制造厂、机械厂或造船厂的厂主可能认为，对铁工厂厂主的保护关税制度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商品的价格。这一点，而且仅仅只是这一点阻碍着他們的出口；制造棉織品的厂主会說，如果不是紡紗厂的厂主处于保护关税制度的保护之下，使他不得不用高价去买棉紗的話，他本来是可以把英国布从中国和印度的市場中排挤出去的，如此等等。民族工业的某一个部門一旦彻底占領了国内市場，出口便成了它的必然要求。在資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工业部門不是扩大，就是衰落。一个行业不可能維持原状不变；停止扩大就是破产的开始；力学和化学方面的进步不断排挤着人的劳动，并且促使資本更加迅速地增殖和积聚，从而在每一个停滞的工业部門中都造成工人和資本的过剩，过剩的工人和資本在任何地方都用不上，因为同一过程也发生在其他一切部門。于是，从国内貿易向出口貿易过渡便成为各有关工业部門的生死存亡的問題了，但是，另外一些人的既定的权利和既得的利益却同它們发生矛盾，因为对于这些人，保护关税制度在目前比自由貿易更可靠、更有利。这样便发生了自由貿易派同保护关税派之間的长期而頑强的斗争；双方对于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很快就会从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人手中轉入职业政治家、各传统政党的头目們的手中，对这些人有好处的不是解决問題，而是問題永远悬而不决；在花去大量的

時間、精力和金錢以后，实行了有时是有利于这一方、有时是有利于那一方的一系列妥协，这些妥协虽然决不是重大的，但也是朝自由貿易方向的緩慢进步，——在保护关税制度沒有使民族完全不能容忍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而这种情况看来恰好在現在也正在美国发生着。

可是，还有另一种最坏的保护关税制度，——就是德国正在实行的那种。德国在1815年以后也馬上开始感到有必要更迅速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个条件就是废除德国各小邦之間的无数关税壁垒和它們的形形色色的財政立法以建立国内市場，換句話說，就是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即 Zollverein⁴²⁰。要实现这一点，基础只能是与其說旨在保护本国生产不如說旨在增加国家收入的自由主义稅率。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无法說服各小邦加入关税同盟。因此，新的德国稅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一些工业部門，但是在它实行的当时，却是自由貿易立法的典型。現在它还是那样，尽管从1830年以来大多数德国工业家就已經大声疾呼要求向保护关税制度过渡。但是，在实行这种非常自由主义的稅率的情况下，尽管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德国家庭工业遭到依靠蒸汽进行生产的英国工厂竞争的无情压制，从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在德国还是逐渐地实现了；現在这一过渡几乎已經完成。德国从农业国轉变为工业国也是以同样速度进行的；从1866年开始，一些有利的政治事件也促进了这个轉变，这就是：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全德国的立法机关，从而保证了工商业立法的一致，以及币制的統一和度量衡制度的統一；最后是法国的几十亿的流入。这样一来，到1874年，德国在对外貿易額方面在世界市場上就占居了第二位而仅次于大不列

顛^①，而在工业和交通方面德国采用的蒸汽发动机，比欧洲大陆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因此，这也就证明，甚至在現在，尽管英国工业領先很远，一个大国也能够成功地在自由市場上同英国竞争。

这时，陣綫突然发生了变化：正当自由貿易看来对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的时候，德国却轉而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一轉变毫无疑问是荒唐的，但却是可以解释的。当德国还是粮食輸出国的時候，整个农业集团，正如整个航运业一样，都狂热地主张自由貿易。但是在1874年德国不仅不能出口粮食，而且需要进口大量的粮食。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大量的廉价谷物开始涌向欧洲市場；这些谷物到了哪里，那里的土地的货币收入就会减少，地租也会因此减少；从这个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农业集团就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与此同时，德国工业家由于法国的几十亿的流入造成的生产极度过剩的后果而吃着苦头，英国则由于工业从1866年危机以后一直处于經常蕭条的状况中，用国内卖不出去的商品充斥它能进入的一切市場，以不惜亏蝕的低价在国外抛售这些商品。当时德国工业家虽然本身也与出口有莫大的利害关系，但是他們已經开始把保护关税制度看做保证自己独占国内市场的手段了。而完全由土地貴族和地主掌握政府便非常高兴地利用这一机会，为地主和工业家提供保护关税借以使收地租者获利。1878年，便对农产品和工业品都实行了高额的保护稅率。⁴²²

結果，德国工业品的出口从此以后便直接由本国消費者承担

① 1874年的进出口总额(单位为百万美元)：大不列顛——3 300；德国——2 325；法国——1 665；合众国——1 245 (科尔布“統計”1875年萊比錫第7版第790頁⁴²¹)。

費用了。無論在哪里，只要有可能，就成立了“瑞恩”或者“托拉斯”来調节出口貿易，甚至調节生产本身。德国的制铁业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大部分是股份公司的手中，它們合在一起能够生产的铁，比全国所能吸收的一般消費量大約多三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互相竞争，这些公司成立了托拉斯，負責在这些公司之間分配同外国人簽訂的合同，在每一个具体場合都确定應該由哪一家公司来具体供应。这个托拉斯在几年以前甚至还同几个英国铁工厂的厂主达成了協議，但是協議已經不再存在了。同样，威斯特伐里亚各煤矿（它們每年生产 3 000 万吨左右）也成立了托拉斯来調节生产、定貨和价格。总之，任何一个德国工业家通常都会告訴你，保护关税給予他的只有一点：他在国外市場上被迫以不惜亏蝕的价格出售商品而遭受的損失可能在國內市場上得到补偿。但是，不仅如此。这种对工业家实行的荒唐的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給他們的一种賄賂，以便誘使他們支持一种更荒唐的給予农业集团的垄断权。不仅所有农产品要征收与年俱增的高額进口稅，而且由容克老爷在他們領地上經營的某些加工农业原料的企业，实际上也由公众掏錢津貼。甜菜糖工业不仅受到关税的保护，而且还得到作为出口奖金的巨額款項。一位熟悉內情的人指出，即使把出口的糖全部抛在海里，工厂主还是可以从政府奖金中取得利潤。同样地，由于一項最新立法，馬鈴薯酒厂的厂主們也每年从公众的腰包中得到大約 900 万美元的贈款。由于在德国的东北部几乎每一个大土地所有者都或者有一个甜菜糖厂，或者有一个馬鈴薯酒厂，或者两者同时兼有，所以毫不奇怪，世界上就真正充滿着他們的产品了。

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导致破产的政策，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廉

价劳动力来維持自己的工业在中立市場上的地位的国家來說，会加倍地导致破产。在德国，因为存在大量人口（尽管人口外流，人口还在迅速增加），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工資也只能維持在吃不飽的水平上，而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工資就要提高。那时，德国的工业家就不能够像現在极其常見的那樣，用克扣自己工人的正常工資的办法来补偿自己商品的不惜亏蝕的低价了，他們就会被排挤出市場了。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正在杀害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法国也由于保护关税制度的后果而吃了苦头。在这里，这种独占統治地位达二百年的制度几乎成了民族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同时它仍然愈来愈成为絆脚石。生产方法的經常变化已經处在日程上了，但是保护关税制度擋住了这条道路。絲絨的背面現在都用細棉綫織成；法国工厂主或者要为购买这种棉綫付出由保护关税造成的高价，或者要遭到官厅无限期的延宕，这种延宕完全抵消了政府由于这一价格而給的出口補助費，所以，絲絨工业就从里昂向克雷弗尔德轉移，因为那里細棉綫的进口稅要低得多。前面已經談到，法国出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在这个部門中法国貨的精美程度直到現在还是无法超过的，但是在全世界这种产品的主要消費者是那些沒有受过教育、毫无审美能力的我們当代的資本家暴发戶，別人常常把便宜而低劣的德国或英国的假貨冒充真正的法国貨以极其昂貴的价錢卖給他們，他們也感到十分滿意。銷售这种除法国以外哪里也不能制造的特产的市場正在不断縮小，法国工业品的出口額只是勉强能保持原来的水平，不久就要下降。法国能够用什么样的新商品去代替那些出口銷路正在衰落的商品呢？如果說这里还有什么办法的話，那就只是实行大胆的自由貿易

易办法，把法国工业家从他們所习惯的温室般的环境中带到同外国对手竞争的新鲜空气中去。的确，如果不是由于科布頓的 1860 年条约⁴²³ 而采取了走向自由貿易的軟弱而不坚决的步骤，整个法国貿易早就会开始縮减了。但是，这一步驟的作用几乎已經消失了，需要有更加强有力的这一类滋补剂。

俄国未必值得一提。在那里，关税要用黄金，而不是用国内流通的貶了值的货币来支付，而保护稅率首先也是用来为貧困的政府提供它同外国債主打交道所必需的硬币；这种稅率用彻底排挤外国商品的办法完成它的保护关税的使命的一天，也就是俄国政府破产的一天。但是，这个政府却在安慰它的臣民，要他們相信有希望靠这种稅率把俄国变成一个食品、原料、工业品、工艺品都不仰仗外国人的完全自給的国家。相信这个幽灵般的、隔絕和孤立于世界其他地方之外的俄罗斯帝国的人，其水平同一个爱国的普魯士中尉不相上下，这个中尉到店里去要买一个球形仪——不是地球仪或天球仪，而是普魯士球形仪。

现在还是回过来談美国吧。已經有足够的征兆說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經为合众国尽到了力，这一制度取消得愈早，对一切人就愈好。这些征兆之一，就是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門中成立了“瑞恩”和“托拉斯”，为的是更充分地利用給予它們的垄断权。“瑞恩”和“托拉斯”是道地的美国組織；凡是它們利用了天然优势的地方，人們尽管不乐意，一般也要服从它們。宾夕法尼亚的石油生产变成垄断組織“美孚油公司”⁴²⁴，是完全合乎資本主义生产規律的过程。但是，精糖厂的厂主們企图把民族給予它們防御外国竞争的保護变成垄断权来反对本国消費者，即反对給予这一保护的民族本身，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然而，大糖厂主成立“托拉斯”的目

的正是在这里。⁴²⁵ 而糖业托拉斯也并不是絕无仅有的一个。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門中成立类似的托拉斯，是一种最可靠的标志，表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它保护生产者，已經不是为了防御外国进口商，而是为了防御国内消費者；它至少在該部門中已經生产出足够多的，甚至是太多的工厂主；它塞到这些工厂主的錢袋中去的錢，是舍掉的錢，——同德国的情况完全一样。

在美国以及其他各国，有一个为保护关税制度辯护的論据，說自由貿易只会对英国有利。有一个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情况相反，就是在英国不仅农业主和大地主，甚至連工厂主也都成了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就在自由貿易論者“曼彻斯特学派”⁴²⁶ 的故乡，在 1886 年 11 月 1 日，曼彻斯特商会討論了下面这个決議：

“本商会原指望其他各国会以英国为榜样实行自由貿易，但是在徒然等待了四十年以后，本商会认为，已經是重新考虑这个問題的时候了。”

誠然，決議是被否決了，但是是 22 票对 21 票！况且这是发生在棉紡織工业的中心，即英国工业在自由市場中仍然无疑占着优势的唯一的部門的中心！但是問題在于，甚至在这个部門中，发明創造的天才也已从英国轉移到美国去了。棉紡織工业的紡紗机和織布机方面的最新改进几乎全部都出自美国，而曼彻斯特不得不只是加以采用。在各种工业发明方面，美国已經肯定地起着主导作用，而德国正在同英国爭夺第二位。英国越来越認識到，它的工业垄断地位是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同其他各国相比，它正在不断丧失地盘，而它的竞争者却正在取得进展，它将落到只得满足于作为許多工业国之一的地位，而不再像过去梦想的那样，要成为“世界工厂”。为了躲开这种迫在眉睫的命运，那些在四十年前认

为唯有自由貿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儿子們，現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用“誠实的貿易”和懲罰性稅率等要求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当英国工业家开始认为自由貿易会使他們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們对付外国人竞争的时候，这些竞争者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且用英国自己的武器——自由貿易去摧毁日益軟弱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关头也就来到了。

但是，我已經談过，保护关税制度实行起来容易，摆脱就不那么容易了。立法机关采用了保护关税制度以后，就造成了一些同这一制度有了很大的利害关系的集团，并且对这些集团承担了責任。而在这些与此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門——中，并不是每个集团在同一時間都同样决心面对公开的竞争。有些人会在后面拖拖拉拉地走，另一些人則已經不需要保护关税制度这个保姆。这种处境上的差别，将引起常見的議会走廊上的阴谋，而且本身也就是一种可靠的保证，可以在問題的解决将有利于自由貿易的时候，使那些被保护的工业部門受到非常寬厚的待遇，正如在 1846 年以后英国有关絲紡織业的情况那样。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这种过渡只是在原則上解决，自由貿易派就必須屈从于这种情况。

关于自由貿易和保护关税制度的問題，完全是在現代資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因此对于我們，即爭取消灭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义者說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兴趣。但是，它間接使我們感到兴趣，原因在于我們應該希望現代生产制度尽可能自由地、迅速地发展和扩大，因为同它一起，也将发展起作为它的必然后果并且必定要把它整个加以摧毁的經濟現象：生产过剩造成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貧困；这种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市場充斥和伴随着

恐慌的危机或者生产和貿易方面的經常停滯；社会划分成人数很少的大資本家階級和人数众多的实际是世襲的雇佣奴隶——无产者階級，这些无产者的人数在不断增长，但同时却受到节约劳动的新机器的排挤；一句話，社会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彻底改造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的經濟制度以外，沒有别的出路。从这一观点出发，馬克思在四十年前宣告原則上贊成自由貿易这个更进步的办法，也就是能更快地把資本主义社会带进那个死胡同的办法。但是，如果說馬克思根据这个理由宣告贊成自由貿易，那末，这不是会成为現代社会秩序的每一个拥护者反对自由貿易的理由嗎？如果确定說自由貿易是革命的，那末，一切好公民不是就要投票贊成保护关税制度这个保守的办法了嗎？

如果目前有一个国家要实行自由貿易，那当然不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者高兴。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自由貿易已經成了工业資本家的一种必要。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拒絕自由貿易而要抓住保护关税制度不放，以便使社会主义者对期待中的社会浩劫大失所望，那末这也絲毫无損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①。保护关税制度是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办法，因此也是人为地制造雇佣工人的办法。不能造成前者而不造成后者。雇佣工人到处都跟踪着工厂主；他們像賀雷西的“黑色的关怀”一样坐在騎士背后，無論騎士跑到哪里都无法摆脱它。⁴²⁷ 逃避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逃避自己的行动的必然后果是不可能的。以剝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使財富同受雇的、受剝削的工人人数成比例地增长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增加雇佣工人階級亦即注定有朝

^① 在德文版中不是“那末这也絲毫无損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而是“那末最失望的将不是別人，而是这个国家本身”。——編者注

一日要摧毁这个制度本身的那一阶级的人数。同时，也没有任何解救办法；你总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总要加速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积累和集中，同时也就要加速生产革命的工人阶级。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还是实行自由貿易，对于最终结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在最终结局到来以前的延缓时期也未必会有什么关系。在这一天到来以前很久，保护关税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有希望获得成功而力求在世界市場上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 1888 年 4 月—5 月初

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 1888 年 7 月“新时代”杂志第 7 期，用英文载于 1888 年 8 月“劳动旗帜”周报，并载于 1888 年在波士顿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自由貿易”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自由貿易”，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1889年魯尔矿工的罢工⁴²⁸

德国矿工的罢工对我们说来是一件大事。像宪章运动时期英国矿工那样，德国煤矿工人也最后进入运动，而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步。运动是在威斯特伐里亚煤矿区的北部开始的，——在这个地区每年可以采煤4500万吨，而开采的地区甚至还不到一半，因为那里的煤要从500碼的深处采出。这个地区的矿工过去一直是善良的臣民，爱国、听话，而且信教；他们为第七军输送了极好的步兵（我很了解他们，我生长的城市只在这个煤矿区南面六七英里）。现在他们由于当地资本家的欺压而愤慨到了极点。在矿场——差不多全是股份企业——支付大量股息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不断下降。可是，名义周工资仍保持在原有水平上，有时甚至好像还有所提高，因为工人被迫加班工作很多时间：每班连续工作不是8小时，而是12—16小时，等于每周做9到12班。广泛开设雇主店铺[truck-shops]，冒充“合作”商店。在计算采煤量时工人通常要受骗；整车整车的煤都被认为装的是劣质煤或分量装得不够而报废。从去年冬天开始，工人一再警告说，如果情况不改善，他们就要宣布罢工。但是一切仍然如故，他们终于罢工了，而他们要这样做是预先警告过的；矿主撒谎否定这一事实。一星期以后有7万人罢工。雇主不得不出钱支持罢工，因为他们每月只给工人发一次工资，他们手里总是控制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他们必须把这一

个月的工資发給罢工者。这样一来，雇主們就落进了自己設下的网罗。后来工人派了一个有名的代表团去見皇帝^①——这是个虛荣、自負的纨绔小儿，——他接見了代表团，威胁說：如果他們轉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并使当局蒙受耻辱，他就要下令毫不留情地把他們枪毙。⁴²⁹（实际上在波洪已經这样試办了，那里有一个中尉，一个十九岁的小子，命令他的士兵向罢工者开枪，但大多数都是朝天打的。）然而整个帝国还是为这些罢工者所震惊。派到罢工区去的有一个軍区司令^②，还有內务大臣^③；为了說服矿主让步用尽了一切办法。皇帝甚至建議他們慷慨一些，并在內閣中声言：“我的士兵駐在那里是为了維持秩序，而不是为了保证矿主得到大量利潤”。

由于自由主义反对派（他們在国会里的席位一个接一个地失掉，因为工人都轉到我們这边来了）的干預，取得了妥协，矿工也复工了。但他們刚刚开工，雇主就食言了：开除了几个为首的人（他們原来是答应不这样做的），不顾讲定了的条件，不經工人同意就加班加点，等等。罢工再起的危險出現了。冲突还没有解决，但是我确信被吓坏了的政府定会迫使雇主让步，至少是暂时让步。后来罢工扩展到二号和三号煤矿区。这个地区暂时还没有被“社会主义传染病”侵入，因为凡是到那里去进行鼓动的人，一旦落入法网，在德国其他任何地方可能只蹲几个月監獄，在这里就要蹲几年。政府的确对工人做了让步，但这是否就够了呢，将来自有分曉。学习威斯特伐里亚矿工榜样的有薩克森煤矿区的工人，还有

① 威廉二世。——編者注

② 阿耳貝迪耳。——編者注

③ 黑尔富特。——編者注

更东一些的两个西里西亚煤矿区的工人。可見，最近三星期在德国至少有12万煤矿工人罢工。受他們“传染”的有比利时和波希米亚的矿工，而在德国，那些早在今年春天就已在酝酿罢工的工业部門，都已經停工了。⁴³⁰ 这样一来，毫无疑问，德国煤矿工人是同自己的兄弟联合在一起进行反对資本的斗争的；这对我們的队伍是一个重要的增援，因为他們都是些出色的人，而且差不多都服过兵役。他們对皇帝和神甫的信念动搖了。所以，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它做了些什么，如果不触动資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滿足工人的要求。德国政府是既不可能，甚至也不愿意做这种尝试。在德国，政府是第一次被迫做出一副对罢工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場的样子。因此，它就永远失去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貞操。威廉也好，俾斯麦也好，都不得不在十几万罢工工人的大軍面前低下头来。单单这一点就已經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績了。

写于1889年5月底

載于1889年6月“工人領袖”杂志第1卷第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工人領袖”杂志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于1960年“苏共历史問題”杂志第6期

可能派的代表資格證⁴³¹

可能派巴黎代表大會的幾個擁護者——“星報”⁴³²的多少有點名氣的斯密斯·赫丁利先生，周刊的赫·伯羅斯先生和貝贊特女士——沒完沒了地重複說，他們的代表大會是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而馬克思派代表大會僅由一些只代表自己的人組成，所以他們不敢答應可能派的要求：向可能派出示自己的代表資格證。馬克思派代表大會的英國代表無疑會尋找而且一定會找到機會來證實對他們的非難是造謠，因此我們可以暫時不談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只指出，可能派要求馬克思派承認在第二天（或許在第三天？）進行的對他們自己的代表資格證的審查無效，並要求重新審查這些代表資格證，可能派能夠對馬克思派代表大會加的侮辱莫過於此了；然而，可能派自己在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里卻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他們把自己的代表資格證交由馬克思派審查這一義務。

上面的話是如何正確地說明了問題，可能派是如何比馬克思派更有理由僅僅向自己的朋友出示自己的代表資格證，這些可以由阿德勒博士在馬克思派代表大會上就他所知關於可能派的“奧地利”代表的情況做的報道來證明。由於這個報道說明可能派用什麼方法製造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代表，所以就應該把這一方法公諸於世。

在可能派的代表名單里，“奧地利”一欄里有下列組織：“維也

納面包工人联合会”、“上奥地利和薩尔茨堡联合会”、“波希米亚、莫拉維亚和西里西亚工人联合会”。阿德勒博士在最近三年来惊人坚毅地、极有步驟地和坚定地从事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改組工作，他知道奥地利任何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工人团体，他向代表大会报告說，所有这些团体不管有些什么优点，但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們并不存在。

当巴黎知道馬克思派代表大会于星期日开幕并有奥地利的代表出席之后，星期一就有两个奥地利人找到代表大会来，同阿德勒博士見了面。他們对他說，他們是面包工人，在巴黎已經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了，有一个姓多博希的匈牙利面包工人邀他們作为“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就是这个代表大会嗎？阿德勒向他們詢問了詳情，把事情弄清楚了：他們被邀請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都有出席证；他們同时还对邀請他們的人說，他們除代表自己外絕對不代表任何人，但他們得到回答說，这毫无关系，因为奥地利是一个专制国家，所以不要求有真正的代表資格证；現在他們才知道，真正的奥地利代表出席了另一个代表大会；他們現在怎么办呢？奥地利代表對他們說，他們無論在这个还是在那个代表大会上都沒有权利当代表。他們約定下次会面。过了一两天他們又来了，出席了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的會議，之后他們說他們认为必須摆脫这种假代表的处境，——但怎样摆脫呢？有人建議他們退还代表資格证。原来他們沒有这种东西。那就退还你們的出席证。他們答应这样做，后来回来說，他們已經这样做了。

这就是可能派及其英国拥护者們所謂“真正代表性”的例证。而在匈牙利团体的印得滿滿的名单里，名称都用一些錯字很巧妙地遮掩起来，只能认出几个似乎真設有团体的地点。这些社团，据

馬克思派代表大會真正的匈牙利代表們說，也只存在于可能派想出來的奇異的國境里；在這裡謊撒得太不像話了。“社會問題研究小組及克羅地亞、斯拉窩尼亞、達爾馬戚亞、的里雅斯特和阜姆聯盟”——在這個響亮的名稱上蓋上了它那一眼就看得出是在巴黎刻制的圖章。但在所有這一切的後面，竟連三個土利街的裁縫⁴³³都沒有，真難以設想！

其次，有人對我們說，把可能派的代表大會說成只不過是工聯代表大會，這是絕對不符合事實的。赫伯特·伯羅斯先生就曾對這個誣蔑極為惱火，他說：除一些英國工聯主義者以外，“所有的代表”都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都以這樣的身分代表著自己相應的團體。好吧，我們僅僅舉一個例子來看看。馬德里的“社會主義者報”⁴³⁴（7月26日）關於西班牙的可能派代表說了些什麼呢？它說，“他們說他們代表著兩萬社會主義者，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那些既讓卡洛斯派⁴³⁵加入也讓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加入的團體”的代表，是根本不問政治的俱樂部的代表，也就是說，實際上是英國稱之為工聯的那些組織的代表而已。

寫於1889年8月初

原文是英文

載於1889年8月10日“工人選民”
第2卷第32號

俄文譯自“工人選民”

*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⁴³⁶

我羡慕你们，羡慕你们参加码头工人的罢工。这是我们近年来最有希望的一次运动，我还能看到这次运动，感到很自豪，很高兴。如果马克思还活着并亲眼看到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如果这些不幸的、被压迫的人们——他们已经沦为无产阶级最底层，被各行各业所遗弃，为了得到工作每天早晨在码头的大门口简直是在打架，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并以自己的坚定的精神使强大的码头公司害怕，那的确我们就无须乎为工人阶级的任何一部分感到悲观失望了。这一事件意味着在东头⁴³⁷真正的生活已经开始，一旦获得成功就会改变这个地方的整个性质。要知道，这里的居民，那些在极端贫困中挨日子的穷人，由于没有自信心和缺乏组织，所以对于他们可以说：*lasciate ogni speranza* … [把一切希望抛弃吧……]^①如果码头工人组织起来，其他各种工人也一定会跟着他们这样做……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运动，我对那些能够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再一次表示羡慕。

写于1889年8月20日和26日之间

载于1889年8月31日“工人选民”
第2卷第3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工人选民”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① 但丁“地狱篇”第三首歌。——编者注

資產階級讓位了⁴³⁸

在各國資產階級中，至今還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階級意識即政治意識的，無疑是英國資產階級。我們德國的資產階級又愚蠢又胆怯；它甚至不會抓住工人階級在 1848 年為它爭得的政治統治，並保持在自己手里；在德國，工人階級首先必須清除本國資產階級早就應當消滅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式專制制度的殘余。法國資產階級比起別國資產階級來，是最自私、最貪圖享乐的，它利令智昏，甚至看不到自己未來的利益；它只顧眼前，不管將來；它由於瘋狂地追逐暴利，正干着極端可耻的賄買勾當，把實行所得稅制宣布為社會主義者的叛國罪，每一次罷工它都一定是用步槍齊射來對付，其結果是，在這個實行普選權的共和國里，工人要取得勝利，除了暴力革命外，幾乎沒有別的办法。英國資產階級既不像法國資產階級那樣貪婪到愚蠢的程度，也不像德國資產階級那樣胆怯到愚蠢的程度。它在自己大凱旋時期經常向工人做讓步；就連它的眼光最短淺的那一部分，即保守的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也不怕給城市工人相當規模的選舉權，僅僅由於工人們自己的過錯，從 1868 年以來在議會里沒有得到四十至五十個席位。但是從那時起，整個資產階級——保守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也使擴大的選舉權適用於農業區，使各選區的規模大致相等，這樣一來至少有三十個新選區交給了工人階級支配。德國資產階級從來沒

有能力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来领导和代表国家，法国资产阶级每天都在证明——在新近举行的选举⁴³⁹中又一次证明，——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它一度比其他任何一国资产阶级都更多地具有的这种能力，而英国资产阶级（包括溶合于它的所谓贵族在内）则直到最近还显示出它有一定的能力来发挥——尽管是到某种程度为止——领导阶级的作用。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看来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

在伦敦，同旧的市政管理——同西蒂本身的设施和管理——有关的一切，都还是纯粹中世纪的东西。伦敦港这个世界上第一流港口也属于这一类。码头主(wharfingers)、驳船主(lightermen)和船夫(watermen)组成了各种享有特权的、有的甚至还带有中世纪的外表的真正的行会。这些古老的行会特权近七十年来由于码头公司的垄断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整个巨大的伦敦港就转入少数对它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的特权的行帮手中。所有这些特权的、畸形的东西，由于无数乱糟糟的和矛盾百出的议会法令的促成和助长——甚至这个法律迷宫成了它们最好的护符，——就永久化了并且成了所谓不可侵犯的。但是，在这些行帮对商界夸耀自己中世纪特权并使伦敦成为世界上收费最高的港口的同时，这些行帮的成员也就变成了真正的资产者，他们除对自己的主顾外还对自己的工人进行无耻透顶的剥削，用这种方法同时享受中世纪行会的利益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

但是，既然这种剥削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进行的，那末即使有中世纪的外表，它还是要服从这个社会的规律。大企业吞并小企业，或者至少是把它捏在自己的凯旋车上。大码头公司成了码头主、驳船主和船夫的行会的主宰，从而成了整个伦敦

港的主宰。这样一来，在它們面前就展开了利潤源源而来的前景。这个前景使得它們眼花繚乱。它們花了成百万的錢去办荒唐事；因为这样的公司有好几个，所以它們之間就展开了竞争战，这又花了成百万的錢，又增添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建筑物，使得公司瀕临破产，直到最后即大約两年前它們才联合起来。

在这期間，伦敦的貿易已經走过了它的頂点。哈佛尔、安特卫普、汉堡以及开凿了新的海上运河的阿姆斯特丹，把原先以伦敦为中心的貿易中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吸引去了。利物浦、赫尔和格拉斯哥也都占去了自己的一份。新建的碼頭都空着，股息减少了，有的甚至一点也得不到，股票也下跌了；那些固执的、在旧时良辰美景中养尊处优慣了的碼頭經理和傲慢不逊的金融巨头，都不知所措。伦敦港貿易額相对下降和絕對下降的真正原因他們不想承认。而只要这些原因带有地方性质，那末成为原因的就仅仅是这些人本身的毫无道理的傲慢以及造成这种傲慢的根源，即他們的特权地位、西蒂和伦敦港的中世紀的、早已过时的制度，这种制度按理說早該送进英国博物館同埃及木乃伊和亚述石怪陈列在一起了。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沒有容忍过类似的狂妄行为。在利物浦，这种情况刚一露头，在萌芽状态就被消除了，而港口的整个制度都現代化了。在伦敦，商界在受害，在抱怨，但还是容忍了这一切。资产阶级（其广大成員要为这些荒唐事付出代价）在垄断組織的面前低了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低了头。它已經沒有更多的精力来摆脱这种使整个伦敦生存条件随时有停頓危险的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就在这时爆发了碼頭工人的罢工。⁴⁴⁰ 暴动并不是受碼頭公

司掠奪的資產階級掀起的，而是受它們剝削的工人掀起的；窮人中最窮的人，東頭無產者的最底層，向碼頭巨頭們挑戰了。這時資產階級終於想起，碼頭巨頭們也是它的敵人，罷工工人展開鬥爭不僅合乎他們本身的利益，而且間接也合乎資產階級的利益。公眾同情罷工，資產階級人士空前慷慨地解囊相助，其奧秘也就在這裡。但也是只此而已。工人投入了戰鬥，資產階級為他們吶喊和鼓掌助威；工人打了勝仗，他們不僅證明高傲的碼頭公司巨頭們是可以戰勝的，而且以自己的鬥爭和勝利震動了整個輿論界，以致使港口的碼頭壟斷和封建制度現在不能再繼續存在下去了，不久的將來恐怕就要送進英國博物館。

這個任務資產階級早就應該完成了。但是它不能或者不想去做。現在工人擔當了下來，而且立即就要完成了。換句話說，這是資產階級自己把自己的使命推給了工人。

下面是另一番情景。現在讓我們撇開中世紀的倫敦，而來談談郎卡郡的現代化紡紗工廠。現在，這裡 1888 年收穫的棉花已經用完，而 1889 年的還沒有上市，所以這正是原棉投機的大好時機。有一個姓斯廷斯特蘭德的荷蘭富翁，同其他一些同行的商人組成了一個“瑞恩”來收購全部現有棉花並相應抬高價格。紡紗工廠主們反抗的辦法只能是縮減消耗，即在新棉上市以前使各自的工廠每周停工幾天或完全停工。這種試驗他們已經進行了六個星期了。但事情正如以前每逢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一樣，總是搞不好，因為這些工廠主中有很多人負債累累，部分或者全部停工會使他們瀕於毀滅。而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大部分工廠停工，從而抬高紗價；而他們自己則打算繼續開工，從較高的紗價中獲利。十多年來已經表明，只有一個辦法能迫使棉紡織工廠全部停工，——且不論

最終目的是什麼——這個辦法就是：降低工資，譬如說，降低5%。這樣就會發生罷工，或者是工廠主們自己會關閉工廠；而這樣一來，在反對工人的鬥爭中，工廠主們就無條件團結了起來，就連那些不知道將來能不能再使自己的機器轉動起來的人，也會把自己的機器停下來。

在既成的情況下，今天降低工資是不適宜的。但是，不這樣做又怎麼能使所有工廠停工呢？而由於沒有普遍停工，才使紡紗工廠主們毫無辦法地讓投機商擺布了六個星期。因此，就採取了一個現代工業史上絕無僅有的步驟。

廠主通過自己的中央委員會“正式”吁請工會中央委員會：讓有組織的工人為共同利益通過組織罷工的辦法迫使那些反抗的廠主們停工。廠主老爺們承認自己無能採取共同行動，請求以前他們痛恨的工會俯允對他們自己，即對廠主採取強迫手段，使他們，即廠主，迫不得已終於作為一個階級為本階級的利益而一致行動。他們是為工人所迫這樣做的，因為他們自己對此無能為力！

工人俯允了，而且只要威脅一下就行。過了二十四小時，棉花投機商們的“瑞恩”就被摧毀了。這表明：廠主能做到什麼，而工人又能做到什麼。

這樣一來，在這裡，在現代各大工業部門中最現代化的部門里，也像在中世紀的倫敦那樣，資產階級暴露出自己無能維護本階級的利益。不僅如此，它還對此直認不諱，由於它吁請有組織的工人強迫廠主自己維護自己的基本的階級利益，因而它不僅自己聲明自己讓位，而且認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是自己的有能力的、負有執政使命的繼承者。它自己宣布：即使每一單個的廠主還能夠領導他自己的工廠，只有有組織的工人才能領導整個棉紡織工業。

这换成普通話來說就是：厂主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作为領薪金的企业领导人来为有組織的工人服务。

写于 1889 年 9 月底—10 月初

原文是德文

載于 1889 年 10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0 号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署名：弗·恩格斯

· 弗·恩格斯的遺稿

*論未來的联合体⁴⁴¹

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論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經濟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識形态的附带物掩飾和遮盖了。古代的巴力斯⁴⁴²、中世紀的城市或行会、封建的土地貴族联盟——这一切都有意識形态的附带目的，这些附带目的，它們是奉为神圣的，而在城市望族的血族团体和行会中，則来源于氏族社会的回忆、传统和象征，同古代的巴力斯的情况差不多。只有資本主义商业社会才是完全清醒的和务实的，然而庸俗的。

未來的联合体将把后者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对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結合起来，并且这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写于1884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7年第1版
第16卷第1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 民族国家的产生⁴⁴³

当居于統治地位的封建貴族的瘋狂爭斗的喧叫充塞着中世紀的時候，被压迫階級的靜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創造着使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条件。固然，在农村里貴族老爷們还是作威作福，折磨农奴，靠他們的血汗过着奢侈生活，騎馬踐踏他們的庄稼，强奸他們的妻女。但是，周围已經兴起了城市：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萊茵河畔，古羅馬的自治市从灰烬中复活了；在其他地方，特別在德意志内部，兴建着新的城市，这些城市总是用护城牆和护城壕圍繞着，只有用大量軍队才能攻下，因此是比貴族的城堡强大得多的要塞。在这些城牆和城壕的后面，发展了中世紀的手工业（十足市民行会的和小的），积累起最初的資本，产生了城市相互之間和城市与外界之間商业来往的需要，而与这种需要同时，也逐漸产生了保护商业来往的手段。

在十五世紀，市民对社会來說，已經比封建貴族更为必要了。誠然，农业仍旧是广大居民的营生，因而是主要的生产部門。但是，少数分散的在某些地方尙未遭到貴族侵夺的自由农民却充分证明，在农业中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貴族的寄生和压榨，而是农民的劳动。而且，貴族的需求也增加和改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他們自己也离不了城市；他們唯一的生产工具（鎧甲和武器）还是从城市

得到的！本國的呢絨、家具和裝飾品，意大利的絲織品，布拉班特的花邊，北方的毛皮，阿拉伯的香水，列萬特的水果，印度的香料——所有這一切，除了肥皂以外，貴族都是從市民那裡買到的。某種程度的世界貿易發展起來了；意大利人在地中海上航行，並越過地中海沿大西洋岸直達弗蘭德；漢撒同盟的人在荷蘭人和英國人加緊競爭的情況下仍然控制着北海和波羅的海。南方和北方各海上貿易中心之間的聯系通過陸地來保持，實現這種聯系的道路則通過德意志。貴族越來越成為多餘並且阻礙着發展，而市民卻成為體現着進一步發展生產、貿易、教育、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階級了。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生產和交換的這一切進步其實是很受限制的。生產仍然被純粹行會手工業的形式束縛着，因而本身還保持着封建的性質。貿易仍然處於歐洲水域之內，並且沒有超出歐洲和遠東國家交換產品的列萬特沿海城市以外。但是不管手工業及其市民手工業者多么微小，多么受限制，他們還是有足夠的力量來推翻封建社會；他們至少是在前進，而貴族却是停滯不動的。

在這裡，市民階級有一件對付封建主義的有力武器——貨幣。貨幣在中世紀早期的典型封建經濟中幾乎是沒有地位的。封建主或者用勞役形式，或者用實物形式，從他的農奴那裡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婦女紡織亞麻和羊毛，縫制衣服；男人耕田；兒童放牧主人的牲口，給主人採集林果、鳥窩和墊圈草；此外，全家還要繳納谷物、蔬菜、蛋類、奶油、干酪、家禽、幼畜以及其他許多東西。每一座封建莊園都自給自足，甚至軍費也是征收實物。沒有商業來往和交換，用不着貨幣。那時歐洲被壓到很低的水平，一切都得再從頭做起，因而貨幣當時所具有的社會職能比它的純粹政治職能

小得多；貨幣是納稅用的，並且主要靠掠奪取得。

現在所有這一切都完全改變了。貨幣重新成為普遍的交換手段，因而貨幣量大大增加。貴族沒有貨幣也不行了。但是，由於他們很少有或者說沒有東西可賣，再加上這時掠奪也完全不再那麼容易，所以他們不得不決定向城市的高利貸者借貸。騎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轰開以前很久，就已經被貨幣破壞了。實際上，火藥只不過像為貨幣服務的法警而已。貨幣是市民階級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貨幣關係排擠了人身關係和貨幣貢賦排擠了實物貢賦的地方，封建關係就讓位於資產階級關係。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村中繼續存在着古老朴拙的自然經濟，但是已經有整個地區，例如在荷蘭、比利時和下萊茵，農民都向主人繳納貨幣，而不是徭役租和實物租了；在那裡，主與奴都已經向變為地主與佃農邁出了踏實的第一步，因而封建主義的政治制度在農村中也喪失了它的社會基礎。

在十五世紀末，貨幣已經把封建制度破壞和從內部侵蝕到何等程度，從西歐在這一時期被黃金熱所迷這一點看得很清楚。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的是**黃金**；**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要的第一件東西。這種到遠方去冒險尋找黃金的渴望，雖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實現的，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已經與封建主義不相容了，封建主義的基礎是農業，它對外征討主要是為了**取得土地**。而且，航海業是確定的**資產階級**的行業，它把自己的反封建性質也烙印到了現代的一切艦隊上。

因此，在十五世紀時，封建制度在整個西歐都處於十分衰敗的狀態。在封建地區中，到處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有自己的法

和武裝的市民的城市；它們通過貨幣，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會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從屬於自己；即使在農村中，在農業由於特別有利的條件而得到發展的地方，舊的封建桎梏在貨幣的影響下也開始鬆弛了；只有在新征服的地方，例如在易北河以東的德意志，或者在其他遠離通商道路的落後地區里，才繼續盛行舊的貴族統治。但是，無論在城市或農村，到處都增加了這樣的居民，他們首先要求結束連綿不斷毫無意義的戰爭，停止那種總是引起內戰——甚至當外敵盤據國土時還在內戰——的封建主之間的爭吵，結束那種不間斷地延續了整個中世紀的、毫無目的的破壞狀態。這些居民本身還過於軟弱，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所以就向整個封建制度的首腦即王權尋求有力的支持。在這裡，我們就從探討社會關係進到了探討國家關係，從經濟方面轉到政治方面來了。

從中世紀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漸發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äten〕，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大家知道，大多數羅馬舊行省內的被征服者即農民和市民，把勝利者即日耳曼統治者同化了。因此，現代的民族〔Nationalitäten〕也同樣是被壓迫階級的產物。關於怎樣在一個地方發生了融合，而在另一個地方卻發生了分離，我們從門克編制的中洛林各區地圖上^①可以看到一個明確的圖景。只要看一下這個地圖上的羅曼語和德語地名的分界綫就知道，這條分界綫在比利時和下洛林一段上，和一百年前法語與德語的分界綫基本上是一致的。某些地方還可以看到狹窄的爭議地帶，即

① *Spruner-Menke*. «Hand-Atlas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eren Zeit». 3. Aufl., Gotha, 1874, Karte № 32 (施普魯奈爾—門克“中古史和近代史教學地圖集”1874年哥達第3版第32圖)。

两种語言爭夺优势的地方；但是大体上已十分清楚，哪儿應該仍然是德語地区，哪儿應該仍然是罗曼語地区。地图上大多数地名所具有的古下法兰克語形式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語形式证明，它們是九世紀的，最迟是十世紀的，所以，分界綫到卡罗林王朝末期就已經基本上划定了。在罗曼語的那一面，特別是在語言分界綫附近，可以找到由德語的专名和罗曼語的地名标志合并起来的混合地名，例如，在麦士河以西凡尔登附近有：Eppone curtis, Rotfridi curtis, Ingolini curtis, Teudegisilo-villa，即今天的伊佩庫尔、雷庫尔-勒-克勒、厄尔河岸阿姆布兰庫尔、提埃尔維耳。它們是罗曼語土地上的法兰克封建主的領地，小块的德意志移民区，先后被罗曼化的。在城市和某些农业地区里有較大的德意志移民区，它們比較长期地保存了自己的語言，例如“路易之歌”⁴⁴⁴就是在九世紀末从这种移民区里出現的；但是，842年的国王和王公的誓文⁴⁴⁵（在誓文中罗曼語已經作为法兰克王国的正式語言出現）則证明，法兰克的大部分封建主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罗曼化了。

一旦划分为語族（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和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⁴⁴⁶的战争不談），很自然，这些語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ä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洛林这个混合国家⁴⁴⁷的迅速崩潰，說明了早在九世紀的时候这一自发过程就已是如何强烈。虽然在整個中世紀时期，語言的分界綫和国家的分界綫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也許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別的大国家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是中世紀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在这每一个中世紀国家里，国王是整个封建等級制的最上級，

是附庸不能撇開不要的最高首腦，而同時他們又不斷反叛這個最高首腦。整個封建經濟的基本關係（分封土地以取得一定的人身服役和貢賦），在處於最初和最簡單的形式時，就已經為鬥爭提供了充分的材料；特別是當有這樣多的人要找借口的時候更是如此。而到中世紀後期，當所有各地的采邑關係造成了一團亂麻般的權利和義務，——賜給的、剝奪的、重新恢復的、因罪過喪失的、作了改變的或另作限制的，——這團亂麻又不可能解開的時候，情況是怎樣的呢？例如，大膽查理在他的一部分土地上是皇帝的臣僕，而在另一部分土地上則是法蘭西國王的臣僕；但另一方面，法蘭西國王，大膽查理的領主，在某些地區同時又是其附庸大膽查理的臣僕。這樣，衝突怎能避免呢？因此，才有向心力和離心力在漫長的世紀中變化不定地起着作用，向心力使附庸歸向中心即王權，因為只有這個中心才能保護他們防禦外敵和互相防禦，而向心力則經常地、必然地變為離心力；因此，才在王權和附庸之間進行着不斷的鬥爭，凶野的喊叫在這整個漫長時期中淹沒了一切，這時掠奪是自由的男子唯一值得干的行業；因此，才發生無窮無盡的、接連不斷的一大串背叛、暗殺、毒害、陰謀和各種簡直無法想像的卑鄙勾當，這些勾當又都隱藏在騎士精神的美妙名義後面，也沒有妨礙無休止地大談榮譽和忠誠。

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王權在混亂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與分裂成叛亂的各附庸國的狀態對抗。在封建主義表層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傾向王權，正像王權傾向它們一樣。王權和市民階級的聯盟發端於十世紀；這一聯盟往往因衝突而破裂（要知道在整個中世紀期間，事情並不是一直朝一個方向發展的），

破裂后又重新恢复，并且越发坚固、越发强大，直到这一联盟帮助王权取得最后胜利，而王权則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

無論国王或市民，都从成长着的**法学家**等級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持。随着羅馬法被重新发现，教士即封建时代的法律顧問和非宗教界的法学家之間确立了分工。不言而喻，这批新的法学家实质上属于市民等級；而且，他們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來說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階級的。羅馬法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的社會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但是，中世紀的市民階級所有制还同封建的限制密切交織在一起，例如，这种所有制主要由特权构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來說，羅馬法比当时的市民階級的关系要先进得多。但是，市民階級所有制进一步的历史发展，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变成純粹的私有制。这种发展理应在羅馬法中找到强大的助力；因为在羅馬法中，凡是中世紀后期的市民階級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經有了現成的了。

誠然，在很多情况下，羅馬法为貴族进一步压迫农民提供了借口，例如，当农民不能提出书面证明使自己免除普通的义务的时候，就是这样。但这並沒有使問題的实质有所改变。即使沒有羅馬法，貴族也能找到各种这样的借口，并且每天都在找到这样的借口。不管怎样，实施这种絕對不承认封建关系和充分預料到現代私有制的法律，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我們已經看到，在中世紀后期的社會中，封建貴族是怎样在經濟方面开始成为多余，甚至成为障碍；它是怎样在政治上也阻碍着城市的发展，阻碍着当时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的民

族國家的發展。儘管如此，還是有一種情況在維持着封建貴族：直到此時為止他們仍然保持着軍事上的壟斷地位，沒有他們就不能進行戰爭，一個仗也不能打。這種局面也必須改變，應該採取最後步驟向封建貴族表明：他們統治社會和國家的時期結束了，他們即使在戰場上作為騎士也不再需要了。

同封建制度作鬥爭而使用本身就是封建的軍隊（這種軍隊的兵士同他們的直接的封建領主的聯繫要比他們同國王軍隊指揮官的聯繫更為緊密），顯然意味着陷入絕境，走不了一步。所以，從十四世紀初起，國王們就力圖擺脫這種封建軍隊，建立自己的軍隊。從這時起我們就看到，在國王軍隊中，由召募的或僱傭的軍隊組成的部分不斷增長。最初，大部分是由城市游民和逃亡農奴——倫巴第人、熱那亞人、德意志人、比利時人以及其他組成的步兵，他們被用來駐防城市或圍攻，在野戰中開頭幾乎是不使用他們的。但是到中世紀末，我們就已經看到還有騎士同他們的不知用什麼方法召集的扈從隊去受雇於外國君主，這種跡象表明了封建的軍事制度的徹底崩潰。

同時，在城市和在自由農民中間（在還保留着自由農民或重新出現自由農民的地方），形成了建立能作戰的步兵的基本條件。在這以前，騎士和他們的騎兵扈從與其說是軍隊的核心，不如說就是軍隊本身；隨軍征伐的大群農奴後備步兵是不算數的，看來他們到戰場上只是為了逃跑和搶劫。在封建制度繼續繁榮時期，即十三世紀末以前，進行和決定一切戰爭的是騎兵。從這以後，情況改變了，而且各地是同時改變的。在英國，農奴制度逐漸消滅，組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自由農民即自耕農（yeomen）或佃農的階級，他們是善於使用當時英國的民族武器——弓箭——的新步兵的來源。

这种射箭手不論在行軍中是否騎馬，在作战时总是徒步的，他們的出現乃是使英国軍队的战术起根本变化的推动力量。从十四世紀起，在地形和其他条件容許的地方，英国的騎士是选择徒步战斗的。射箭手先开始战斗，挫折敌人的斗志，后边就是徒步騎士的密集方陣等候敌人的攻击，或者待适当时机向前冲鋒，只有一部分騎士仍然騎着馬，以便在紧要关头側击增援。当年英国人在法国不断取得胜利⁴⁴⁸，主要正是由于在軍队中恢复了防御因素。这些战役大部分是結合着进攻性反击的防御战，像威灵頓在西班牙和比利时进行的战役一样。随着法国人采用新战术（可能是从他們雇佣的意大利弩手起着英国射箭手的作用的时候起），英国人的胜利就告終了。

同样，在十四世紀初期，弗兰德各城市的步兵已經敢于在平地战斗中对抗法国的騎士，并且时常取胜；而阿尔勃萊希特皇帝背信弃义，企图把帝国的瑞士自由农民出卖給奥地利大公（他本人也是奥地利大公）的結果，則是推动了第一支現代的、負有全欧威名的步兵的建立。⁴⁴⁹ 由于瑞士人战胜奥地利人，特别是战胜勃艮第人，才最終使鎧甲騎士（騎馬的或下馬的）屈服于步兵，使封建軍队屈服于新兴的現代軍队，使騎士屈服于市民和自由农民。瑞士人为了一开始就证明自己的共和国——欧洲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資產階級性质，立即便把他們的軍事榮譽变成了金錢。一切政治上的考虑全都消失了：各州变成了召募事务所，为出价最高的人鳴鼓召募雇佣兵。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德意志，也响起了募兵的鼓声；但是，瑞士政府的厚顏无耻（它好像只是为了出卖自己的国民而存在），直到德意志各邦君在民族耻辱最深重时期超过它为止，始終是无人能及的。

其次，同樣在十四世紀，阿拉伯人把火藥和大炮的使用方法經過西班牙傳到了歐洲。直到中世紀末，小型火器還不重要，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英國射箭手的弓在克雷西步兵的滑膛槍在滑鐵盧射得一樣遠，或許更準確些（雖然動作不同）。⁴⁵⁰ 野炮也處於幼年時期；相反，重炮却已經多次打穿騎士城堡的無掩蔽的石牆，向封建貴族宣告：他們的統治隨著火藥的出現而告終了。

印刷術的推廣，古代文化研究的復興，從 1450 年起日益強大和日益普遍的整個文化運動，所有這一切都給市民階級和王權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帶來了好處。

所有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於這些原因朝同一方向日益加快的互相影響不斷增長，其共同作用便一年年強大），在十五世紀下半葉就保證了對封建制度的勝利，儘管還不是市民階級的勝利，而是王權的勝利。在歐洲各個地方，直到尚未走完封建制度道路的邊遠地區，王權都同時取得了勝利。在比利牛斯半島，當地的兩個屬羅曼語族的部落合併成西班牙王國，於是說普羅凡斯語的阿臘貢王國就屈服於卡斯梯里亞的標準語⁴⁵¹；第三個部落則把它各語言區（加利西亞除外）合併成為葡萄牙王國即伊比利亞的荷蘭；這個王國從內地分了出去，並且用它的海上活動證明了它獨立存在的權利。

在法國，路易十一在勃艮第這個中間國家⁴⁵² 滅亡以後，終於在當時還是極為殘缺不全的法國領土上恢復了以王權為代表的民族統一，以致他的繼承者^① 就已經能夠干涉意大利的內亂⁴⁵³；而這個統一僅僅由於宗教改革⁴⁵⁴ 才一度在短期內成為問題。

① 查理八世。——編者注

英国终于停止了它在法国的唐·吉訶德式的会使它继续流血的侵略战争；封建贵族在蔷薇战争⁴⁵⁵中寻找补偿，也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他们互相毁灭了，都鐸王朝登上了王位，权力之大超过了以前和以后的所有王朝。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早已合并。波兰自从和立陶宛合并⁴⁵⁶以后，在王权尚未削弱的情况下，进入了它的光辉时期；甚至在俄国，在征服了诸侯同时，又挣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种局面由伊万三世最后固定下来。全欧洲只剩下两个国家，那里没有王权；也没有那时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或者说，它们只是名义上存在，这就是意大利和德意志。

写于 1884 年底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35 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6 期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关于“农民战争”⁴⁵⁷

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的瓦解，以及城市的发展，这两个过程引起了地方分权制；因此就产生了实行君主专制的直接必要性，通过君主专制把民族结合起来。君主专制必然是专制的，正是由于一切因素的离心性。但是，不应该庸俗地理解它的专制性质；[它]是在时而同等级的代表机关时而同叛乱的封建主和城市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等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被它取消；因此，应该宁可把它看成是等级的君主制（仍然是封建君主制，但却是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

第一号革命——它是比英国革命更为欧洲式的革命，它成为欧洲式的革命比法国革命快得多，——在瑞士、荷兰、苏格兰、英格兰以及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瑞典（早在古斯塔夫·瓦萨时期）和丹麦（在这里只是在1660年通过正统专制形式）都获得了胜利。

I. ① 在德国的原因。德国历史溯源。在民族大迁徙的英雄时

① 恩格斯标上罗马数字 I 的这段话，在手稿中是放在标有罗马数字 II 的那段话之后。——编者注

代以后,德国灭亡。由查理大帝实现的德国复兴仅仅来源于法国。与此同时而来的还有罗马帝国的思想。被奥托重新发扬。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非德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德国在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由于这种政策——掠夺意大利各城市——而垮台。因此,分割的局面——*excepto casu revolutionis*〔更不必说反叛事件〕——日益加剧。德国从“空位时期”⁴⁵⁸到十五世纪这一时期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德国从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封建制度在诸侯的压迫下的瓦解(皇帝作为领主王公是帝国骑士的反对者,而作为皇帝是他们的维护者)。农民的逐渐解放,——直到十五世纪相反的过程开始为止。在经济方面,德国完全处于当时各国的水平上。——有决定意义的是:德国由于地方割据和长期未遭入侵,并不怎样强烈地感到需要民族统一,不像法国那样(百年战争),不像刚刚从摩尔人手中夺回的西班牙那样,不像不久前才赶走鞑靼人的俄国那样,也不像英国那样(蔷薇战争);同样有决定意义的是,恰恰在这个时期,皇帝们也处于十分可怜的地位。

II. 从文艺复兴[开始],文艺复兴在欧洲以封建制度普遍崩溃和城市繁荣为基础所采取的那种形式。然后,到处都是民族的君主专制,德国和意大利例外。

III. 宗教改革作为共同愿望等等的唯一可能的通俗表现形式所具有的性质。

写于1884年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庫”1948年版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⁴⁵⁹

写于 1887 年 12 月底—1888 年 3 月

第一次发表于 1895—1896 年“新时代”杂志第 1 卷第 22—26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手稿中没有的部分
是按杂志译的)

現在，讓我們把我們的理論应用于今天的德国历史，应用于它的血和铁的暴力实践。从这里，我們将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血和铁的政策暂时必然得到成功，为什么它最終必然破产。

維也納會議在 1815 年瓜分了并卖掉了欧洲，它的这种做法向全世界表明了君主們和国家要人們完全无能。各民族反对拿破侖的普遍战争，是各民族的遭拿破侖践踏的民族意識的反映。为了报答这一点，参加維也納會議的国君們和外交家們更加无耻地践踏了这种民族意識。最小的王朝比最大的民族还受重視。德国和意大利又被分割为各个小邦，波兰第四次被瓜分，匈牙利仍然被奴役。甚至不能說，这样对待这些民族是不公道的，誰叫它們容許这样做，誰叫它們把俄国沙皇^①当做自己的解放者来欢迎呢？

可是，这种情况是长不了的。从中世紀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阶级的正常政治組織，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協調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沒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統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

^① 亚历山大一世。——編者注

样，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

因此，1848年革命的目的，到处（法国除外）都是既要满足自由要求又要满足民族要求。可是，在第一次冲击得胜的资产阶级的背后，到处都出现了威胁性的无产阶级形象；争得胜利的实际上是这一阶级，这就把资产阶级驱入了刚被打败的敌人亦即君主、官僚、半封建和军事的反动派的怀抱，革命在1849年也就败在这些反动派手里。在匈牙利，情况并不是如此，但俄国人闯进了匈牙利，镇压了革命。俄国的沙皇^①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来到了华沙，在那里，他以欧洲仲裁人的身分进行裁判。他任命他的驯服工具——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为丹麦的王位继承者。他使普鲁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因为他不许普鲁士有一点点利用德国人的统一意愿的欲望，强迫它恢复联邦议会，强迫它屈服于奥地利。⁴⁶⁰ 这样，革命的全部结果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建立了外表上立宪但精神上依旧的政体；俄国的沙皇比以前更甚地统治着欧洲。

可是，事实上，革命已用它的巨大力量甚至使各个四分五裂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脱离了旧的传统常规。资产阶级取得了一部分、即使是小小的一部分政治权力，而资产阶级的每一个政治成就都被它用在促进工业繁荣方面。幸运地度过了“疯狂年”⁴⁶¹ 清楚地向它证明：现在必须永远结束旧日的昏睡和懒散状态。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雨以及其他种种

^① 尼古拉一世。——译者注

情况，世界市场的联系空前扩大了，商业空前繁荣起来；在这里，就是要抓紧时机，要保证自己得到应得的一份东西。从 1830 年、特别从 1840 年以来，在莱茵河地区、萨克森、西里西亚、柏林以及南部个别城市出现的大工业萌芽，现在已迅速地发展和扩充起来，农业地区的家庭工业散布得日益广泛，铁路建筑的速度加快了，而这时已达到巨大规模的移民，则造成了不需要任何津贴的德国横渡大西洋的轮船航运业。德国商人规模空前地在一切海外商埠站住了脚，他们在世界商业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并且慢慢地不仅推销英国的工业品，而且开始推销起德国的工业品来。

可是，德国的小邦割据状况及其形形色色的工商业立法，必然很快就变成了束缚这种猛烈增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商业的一种不堪忍受的桎梏。每走几里路，便出现不同的票据法，不同的工业活动条件，到处都会碰到各种不同的挑剔、官僚的和国库的刁难，甚至还常常碰到行会限制，使官方的特许证也无济于事！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户籍立法⁴⁶²和居留限制，使资本家无法把他们所支配的劳动力以足够的数量投到那些有矿石、有煤、有水力以及有其他有利的自然条件因而给工业企业提供了基础的地方去！无障碍地大量利用本国劳动力的这种可能性，是工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可是，爱国的厂主从各处召集工人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警察当局和济贫所反对新移民定居。统一的全德国的公民权，全体帝国公民迁徙完全自由，统一的工商业立法——这些现在已不再是狂热的大学生们的爱国幻想，而是工业生存的必要条件了。

加之，在每一个邦和小邦里，都有各不相同的货币，各不相同的度量衡，往往在同一个邦里就有两三种度量衡。而在所有这些种

類繁多的錢幣和度量衡中，沒有一種是得到世界市場承認的。因此，毫不奇怪：往來於世界市場或者被迫同進口商品競爭的商人和廠主們，除了使用自己的所有這許多錢幣和度量衡以外，還必須使用外國的；棉綫要按英磅來稱，絲綢料子要按公尺來量，對外國要按英鎊、美元和法郎來計算！在幣制流通範圍受到這種限制的情況下，怎樣能產生大的信用機關呢？這裡是古爾登紙幣，那裡是普魯士塔勒，此外還有金塔勒，“新三分之二”塔勒，銀行馬克，流通馬克，二十古爾登幣制，二十四古爾登幣制，而所有這一切又都是處在無限的行市計算和行市波動之中的。⁴⁶³

即使這一切最終都能克服，但是在所有這些摩擦中已花費了多少力量，消耗了多少金錢和時間啊！同時，在德國，人們最後也開始注意到：在今天，時間即金錢。

年輕的德國工業必須在世界市場上顯一顯身手，它只有通過輸出才能壯大起來。為此，它在外國就必須享有國際法的保護。英、美、法三國的商人在國外甚至比在家里更能自由行動。他們的大使館保護他們，必要時還有幾艘軍艦來保護他們。但是德國人呢？在近東，至少奧地利人在一定程度上還能指望自己的大使館，在其他地方，大使館對他們就沒有多大幫助。可是，當一個普魯士商人在國外向他的大使訴說遭到損害時，他幾乎總是得到這樣的回答：“你完全自作自受，你在這兒尋求什麼呢？你為什麼不安安靜靜地呆在家里呢？”而小邦的臣民則到處都是完全沒有權利的。德國商人不管走到哪里，到處都請求外國——法國、英國和美國——保護，或者很快就歸化於新的祖國。^①即使他們的大使想保

^① 恩格斯用鉛筆在頁邊上寫着：“維爾特”。——編者注

护他們，但又有什么用呢？德国大使本身，在海外也是被人看做像擦皮鞋的人那样的。

由此可見，对于一个統一的“祖国”的要求，是有一种强烈的物质背景的。这种要求已不再是德国大学生联合会會員們在瓦特堡紀念大会⁴⁶⁴ 期間所表現的一种烟雾般模糊的冲动了，那时，“勇气和力量在德国人的心灵中燃烧”，那时，按照法国的調子唱着：这种要求“使青年們怀着剧烈的痛苦为祖国而战，为祖国牺牲”^①，以求恢复想像中的中世紀的帝国庄严，然而这些怀着剧烈痛苦的青年一上年紀，就变成了极平常的、专制君主的忠实奴僕。同时，这种要求也已不再是律師們和其他資產階級思想家們在汉巴赫大典⁴⁶⁵ 期間所发出的那种离地面近得多的統一呼声了，这些人自以为爱好自由和統一是为了自由和統一本身，他們根本没有注意到：按照瑞士的方式把德国变成由各个州組成的共和国（这是他們中間最清醒的人的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就像上述大学生們的霍亨索伦帝国⁴⁶⁶ 一样。不，这是从讲求实际的商人和工业家的直接的業務需要中冒出的渴望，他們渴望扫清从历史上遺留下来的阻碍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全部小邦废物，他們渴望消除一切不必要的摩擦，因为要是德国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場，就先要在家里消除这种摩擦，而他們的所有竞争者都已避免了这种摩擦。德国的統一已成了經濟上的必要。而現在要求統一的人都知道，他們想要什么东西。他們是在商业中受的教育，并且是为了商业而受教育的，他們善于經營商业，并且善于讲价錢。他們知道：討价必須很高，但让价也必須慷慨。他們歌唱“德国人的祖国”，其中也包括施梯里亚、

① 这两处引文，都引自卡·欣克耳的诗“同盟之歌”。——編者注

提罗耳和“充滿胜利和荣誉的奥地利强国”^①，他們并且歌唱：

“从麦士到默麦尔，
从艾契河到貝耳特，
德国呀，至高无上的德国，
超过世界上的一切。”^②

可是，在現金交易中，他們甘愿同意給这一势将日益变得更辽阔的祖国⁴⁶⁷ 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25—30%。他們的統一計劃已制訂好了，可能很快就会实现。

但是，德国的統一不光是德国的問題。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如果没有外国的非常明显的干涉，就不再能解决一項全德性的事务。^③ 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征服了西里西亚。⁴⁶⁹ 1803年，法国和俄国直接强迫按照帝国代表會議的总決議对神圣羅馬帝国进行了改組。⁴⁷⁰ 后来，拿破侖根据自己的方便安排了德国。最后，在維也納會議上^④，主要是俄国，其次是英国和法国，又把德国分割成三十六个邦，共二百多块互相隔絕的大小土地，同时，德国的君主們，完全像在1802—1803年的累根斯堡帝国議会上一樣⁴⁷¹，真心一意地帮助这样做，从而使这种分割情况更加恶化。另外，德国有若干块土地还被割让給外国君主。这样一来，德国不仅变得軟弱无力、孤立无援，在内部爭斗中弄得精疲力尽，注定在政治上、軍事上、甚至工业上都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而且，更坏的是，法国和俄国由于已成的习惯，取得了分割德国的

① 引自恩·摩·阿倫特的詩“德国人的祖国”。——編者注

② 引自霍夫曼·馮·法勒斯累本的詩“德国人之歌”。——編者注

③ 恩格斯在頁边上用鉛笔写着：“威斯特伐里亚和帖欣的和約”⁴⁶⁸。——編者注

④ 在手稿上，恩格斯在这一行上面亲笔写着：“德国—波兰”。——編者注

权利，正像法国和奥地利攫取了监视意大利、使它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权利一样。沙皇尼古拉在 1850 年由于享有这种所谓的权利，才极端蛮横地不许擅自对宪法做任何修改，强迫恢复联邦议会——德国虚弱无力的象征。

可见，争取德国的统一不仅要反对君主和其他内部敌人，而且也要反对外国。不然的话，就要依靠外国的帮助。而当时外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法国，路易·波拿巴曾利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农民的帮助下当上总统，并在军队的帮助下登上帝座。可是，一个新的、由军队制造出来的、在 1815 年法国版图内的拿破仑皇帝，则是一种死产了的徒劳的事情。这个再生的拿破仑帝国，意味着把法国扩张到莱茵河地区，实现法国沙文主义的传统梦想。但是，首先，占领莱茵河地区并不是路易·波拿巴力所能及的。在这方面的每一个尝试，结果都会使欧洲结成反法同盟。然而，提高法国威望和使军队得到新荣誉的时机到来了，这种时机是由一场几乎为全欧洲一致同意进行的反俄战争引起的，原来俄国曾经利用西欧的革命时期，悄悄地占据多瑙河各公国，并准备一场新的征服土耳其的战争。英国同法国结成了同盟，奥地利对二者表示友好，只有英勇的普鲁士去吻昨天还打着自己的俄国鞭子，并且继续保持亲俄的中立。可是，无论英国或者法国都不想使敌人遭到严重失败，因此，战争便以俄国遭受小小屈辱和俄法结成反奥同盟而告终。^①

^① 克里木战争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错中错的大喜剧，在这个喜剧中，每换一场人们都会问：这一场谁将受骗？可是，这一喜剧是以无数的财富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在战争前夜，奥地利就进军多瑙河各公国；俄国人在奥地利人面

克里木战争使法国成了欧洲的領導强国，而使冒险家路易-拿破侖成了当代的伟人，这当然是用不着多說的。但是，克里木战争并没有使法国的領土增多，因而使法国孕育着一場新战争，在这场新战争中，路易-拿破侖要完成他的真正使命——成为“帝国扩大者”^②。这场新战争早在前一次战争时期就已这样做了准备：允許撒丁加入西方列强的同盟，充当法兰西帝国的僕从国，特别是充当該帝国反对奥地利的前哨；其次，这场战争也是在締結和約时路易-拿破侖同以惩罚奥地利为最大滿足的俄国达成協議⁴⁷²所准备

前撤退。因此，在奥地利繼續保持中立的时候，俄国在陆地边界上同土耳其作战就不可能了。但是，要使奥地利作为同盟国在这条边界上参加战争，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使战争成为真正的战争，以便恢复波兰，使俄国的西部边界永远东移。这样一来，普魯士也就会被迫参加（俄国那时还正在通过普魯士得到它的全部进口商品）；俄国不論在陆上或者海上都会受到封鎖。很快就会失敗。但是，这并非各同盟国的意图。相反，它們感到高兴的是，現在能免除一場真正的战争的一切危險。帕麦斯顿建議把战場轉移到克里木去——这是俄国所希望的，——而路易-拿破侖就很乐意地同意这样做了。战争在克里木进行，可能始終是一場假装的战争，这样，所有主要的参加者都会感到滿意。但是，尼古拉皇帝却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一場真正的战争，而忘記了，这个地方对于一場假装的战争是极其有利的，而对于一場真正的战争就非常不利。俄国在防御方面的长处——它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資源貧乏的广闊地区，——在俄国进行任何进攻战时都会变成对它本身不利的反面东西，而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克里木这一方面表現得如此明显。按理要成为入侵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竟成了俄国军队的坟墓，因为尼古拉以殘忍而愚蠢的輕率态度把俄国的軍团一个个赶往塞瓦斯托波尔，一直到仲冬还在赶。当最后一支仓促招募起来的、装备很差的、粮食供应可怜的軍队損失了三分之二人員（整营整营的人倒毙在暴风雪中），殘余部队无力把敌人驅逐出俄国土地的时候，傲慢而愚蠢的尼古拉就可悲地垮台了，他服毒自杀了。从此以后，战争又成了假装的战争，而且很快就締結了和約。

② 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帝国扩大者”（«Mehrere des Reiches»）这一說法，这是中世紀神圣羅馬帝国皇帝的封号的一部分。——編者注

好的。

路易-拿破侖現在成了歐洲資產階級的偶像。這不僅是因為他在1851年12月2日“拯救了社會”，當時，他雖然借此消滅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但只是為了拯救它的社會統治。不僅是因為他表明了，普選制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變成壓迫群眾的工具；不僅是因為在他的統治下工業、商業、特別是投機事業和交易所欺騙勾當盛況空前。而首先是因為，資產階級認為他是同它骨肉相連的第一個“大政治家”。他像任何真正的資產者一樣，也是暴發戶。他曾“歷盡千辛萬苦”：在意大利是燒炭黨人的密謀家，在瑞士是炮兵軍官，在英國是負債累累的貴族流浪漢和特別警察⁴⁷³，可是，無論在何時何地，他都是王位追求者，——就是這樣一個人以自己的冒險經歷，以自己在一切國家里的道德敗壞行為，使自己成了法國人的皇帝，並成為歐洲命運的主宰，就像典型的資產者——美國人通過一系列真正的和欺騙性的破產使自己成為百萬富翁一樣。他做了皇帝之後，不僅使政治為資本家發財致富和交易所欺騙勾當服務，而且完全按照證券交易所的規則來推行政治本身，用“民族原則”⁴⁷⁴來進行投機。使德國和意大利處於分割狀態，對法國以往所執行的政策來說，曾經是法國的一種不可讓予的基本權利；路易-拿破侖則立即着手零星售賣這種基本權利以換取所謂補償。他願意幫助意大利和德國消除分割狀態，但是有一個條件：德國和意大利向民族統一方面每前進一步，都要割讓領土給他做報酬。這樣一來，不僅使法國沙文主義得到滿足，不僅使帝國逐步向1801年的疆界⁴⁷⁵擴展，而且又使法國重新處於特別開明的、解放各民族的強國地位，使路易-拿破侖處於各被壓迫民族的保衛者的地位。於是，整個開明的、為民族理想所振奮的資產階級——因

为它非常关心从世界市場上肃清一切阻碍商业的东西，——都异口同声地欢呼这一解放世界的开明活动。

这种情况在意大利首先开始。^① 在这里，从 1849 年起便是奥地利的无限統治，而当时奥地利是全欧洲的替罪羊。克里木战争的小得可怜的结果，人们不是归罪于只想进行一场假装的战争的西方强国的不坚决，而是归罪于奥地利的动摇态度，但这种动摇态度却是西方列强本身应負最大责任的。而俄国则由于奥地利人进军普魯特河——这是报答俄国 1849 年在匈牙利的帮助的——而遭到过伤害（虽然正是这种进军拯救了俄国），所以很高兴奥地利遭到任何攻击。普魯士已不再算数了，在巴黎和会上它就已受到了 en canaille〔毫不客气的〕侮辱。因此，在俄国协助下准备好的解放意大利“一直到亚得利亚海”的战争，在 1859 年春天开始，到夏天就在明乔河地区结束了。奥地利没有被赶出意大利，意大利没有“一直解放到亚得利亚海”，也没有得到統一，撒丁的領土是扩大了，但是，法国占领了薩瓦和尼斯，从而达到了它在意大利那边的 1801 年的疆界。⁴⁷⁶

可是，意大利人是不以此为滿足的。在意大利，当时純粹的工場手工业还占統治地位，大工业还处于襁褓之中。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剥夺和无产阶级化；它在城市中还占有它自己的生产資料，在农村里，工业劳动是占有土地的小农或者佃农的副业。因此，资产阶级的毅力还没有受到它和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破坏。而因为意大利的分割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奥地利統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統治的保护下，君主們把苛政推

① 恩格斯用鉛笔在頁边上写着：“奥尔西尼”。——編者注

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土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一边。可是，在1859年，外来的统治除了在威尼斯以外都被推翻了，法俄两国已使奥地利不能再干涉意大利，已不再有人害怕这种干涉了。而意大利也出了一个有古代风的英雄——加里波第，他能够创造奇迹，并且已创造了奇迹。他率领千人志愿军，推翻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实际上统一了意大利，粉碎了波拿巴政策的人为罗网。意大利得到了自由，而且实际上得到了统一，——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路易-拿破仑施展了阴谋，而是由于进行了革命。

从意大利战争以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对任何人都不再是秘密了。战胜大拿破仑的人应受到惩罚，——但是，l'un après l'autre ——一个挨一个来。俄国和奥地利都已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接着就是普鲁士了。而普鲁士这时正遭到空前的鄙视；它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政策是胆怯的、可怜的，同它在1795年巴塞尔和约时期的政策一样。⁴⁷⁷ 由于实行“行动自由政策”⁴⁷⁸，它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它在欧洲完全陷于孤立；它的所有大小邻邦都喜欢看到普鲁士如何被粉碎这样一出戏；它的行动自由原来只是为了可以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而已。

的确，在185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里，到处，首先在莱茵河地区本身，人们普遍都相信：莱茵河左岸不可挽救地要落到法国手里。诚然，人们并不怎样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可是都认为：这就同命中注定的厄运一样要来临的，同时——让我们尊重真实情况——人们也并不特别害怕。农民和小资产者，又想起了真正给他们带来了自由的法国人时代；在资产阶级中间，金融贵族，特别是科伦的金融贵族，已被深深地卷进巴黎的«Crédit Mobilier»⁴⁷⁹ 和其他波

拿巴主义的空头公司的騙局，并且大声叫喊兼并。^①

但是，萊茵河左岸的喪失不仅会削弱普魯士，而且也会削弱德国。而德国已比先前更加分裂了。由于普魯士在意大利战争中采取中立，奥地利和普魯士之間比以往更加疏远了，小君主敗类們以恐惧而又渴望的眼光注視着路易-拿破侖，把他看做是将来重新建立的萊茵联邦⁴⁸⁰的保护者——这就是官方德国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又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全民族的联合力量才能避免分裂的危险。

可是，怎样把全民族的力量联合起来呢？几乎全是烟雾般模糊的1848年的尝试都已遭到了失败，但正由于这种失败，才使某些烟雾消散，在这以后，就有三条道路摆在人们面前。

第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消除一切独立的邦而达到真正统一的道路，亦即实行公开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意大利刚刚达到了目的；薩瓦王朝参加了革命，因而获得了意大利的王冠。但是，这样一种勇敢行动，我们德国的薩瓦分子——霍亨索伦王朝，甚至它的最大胆的卡富尔分子——俾斯麦之流，都是完全没有能力采取的。一切事情都要由人民自己来做，——而在争夺萊茵河左岸的战争中，他们也会做好必须做的事情。普魯士人不可避免地將渡萊茵河而退却，萊茵河要塞附近将进行持久的围攻战，随后德国南部的君主們无疑将实行叛变，——这一切就足以引起一个使整个王朝制度土崩瓦解的民族运动。这样一来，路易-拿破侖便会是首先插劍入鞘的人。第二帝国只能对反动的国家作战，它在这些国家面

^① 当时，这是萊茵河地区的普遍情绪，这种情况，是馬克思和我在当地屡次体验到的。順便提一下，萊茵河左岸的工业家当时常問我：在实行法国的关税税率下，他們的工业将会怎么样。

前是以法国革命的继承者、各民族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对付本身处在革命中的人民，它是软弱无力的；而且，胜利的德国革命还可能在推翻整个法兰西帝国方面起推动作用。这是最有利的情况；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即君主们成了运动的主宰的时候，莱茵河左岸就会暂时被割让给法国，君主们的积极或消极的背叛就会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并且会造成一种危急局面，使德国没有第二条出路，只有实行革命，赶走所有君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

按照当时的情况，只有在路易-拿破仑发动为建立莱茵疆界的战争的情况下，才能踏上这条统一德国的道路。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发生——其原因，下面很快就会谈到。但民族统一的问题也随之不再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生死存亡问题，即在灭亡的威胁下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了。民族可以暂时等待一下。

第二条道路是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统一。1815年，奥地利自愿地保持了拿破仑战争强加于它的那种局面，即成为领土收缩、领土集中的国家。它已不再要求先前从它那里分割出去的德国南部领土了；它只满足于把那些在地理上和战略上同保全下来的君主国核心有关联的新旧地区合并了过来。德意志的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分离的局面，由约瑟夫二世的保护关税政策开始造成，由弗兰茨一世在意大利的警察统治加剧，并由德意志帝国的解体⁴⁸¹和莱茵联邦的建立而达到极点，这种局面，事实上在1815年以后仍然起着作用。梅特涅用一道真正的万里长城把自己的邦靠着德意志那边围起来。关税不放德意志的物质产品过去，书报检查则不放精神产品过去，无法形容的护照把戏使个人的交往减到最低限度。在邦内，实行一种甚至在德意志也是独一无二的横暴的专制制度，以防止任何即使是最微小的政治运动。因此，奥地利一直是

同德意志的整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格格不入的。1848年，至少精神上的障壁大部分已经消除，但是，那一年的事件及其后果，并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部分接近；相反，奥地利日益以自己的独立的大国地位自傲。因此，虽然驻联邦要塞⁴⁸²的奥地利士兵受到欢迎，普鲁士士兵受到憎恨和譏笑，虽然奥地利在天主教占优势的整个南部和西部仍然得人心和受尊敬，但是，除了德意志中小邦的一些君主以外，毕竟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考虑过在奥地利统治下统一德意志。

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奥地利本身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尽管它仍悄悄地在做浪漫的帝国梦。奥地利的税界渐渐成了德意志内部唯一残存的障壁，因而显得更加突出。独立的大国政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意味着为了特殊的奥地利利益，从而为了意大利、匈牙利等等利益而牺牲德意志的利益。不论在革命前或者在革命后，奥地利都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而且也是唯一保全下来的、以信仰天主教为特色的大邦。三月以后的政府⁴⁸³越是力图恢复教士和耶稣会教徒的旧统治，它就越是不可能取得新教徒占三分之一、二之国家的霸权。最后，要在奥地利统治下统一德意志，只有毁灭普鲁士才有可能。但是，如果说这后一种情况本身对德意志并不意味着不幸，那末，不论奥地利毁灭普鲁士或者普鲁士毁灭奥地利，在俄国革命于最近的将来胜利以前（在胜利以后，这种毁灭就是多余的，因为到那时成了多余的奥地利本身必然会崩溃），毕竟是极端危险的。

简言之，德意志在奥地利保护下的统一是一种浪漫的梦想；当德意志的中小君主1863年为了宣布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为德意志皇帝而在法兰克福聚会时，就表明这是一种梦想。普鲁士国

王干脆不参加，这出皇帝喜剧就可怜地化为泡影了。⁴⁸⁴

剩下的第三条道路是：以普鲁士为首的統一。这条道路实际上已采取了，所以它把我們从思辨的領域又引到实际的“现实政策”⁴⁸⁵的那种坚实的、即使頗为骯髒的土地上来。

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普鲁士便像对待波兰那样把德意志只看做有待征服的領土，从这里能割走多少就割走多少，但是不言而喻，必須同別人一道瓜分这种領土。同外国一道——首先同法国一道——瓜分德意志，是普鲁士从1740年以来的“德意志使命”。*«Je vais, je crois, jouer votre jeu; si les as me viennent, nous partagerons»*（我想，我会帮您大忙的；如果我得到王牌，那我們就分享），——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在第一次出征时給法国大使的临别贈言。⁴⁸⁶ 由于普鲁士忠实于这一“德意志使命”，它在1795年締結巴塞尔和約时出卖了德意志，它为了换取扩张自己領土的諾言而預先同意（1796年8月5日的条約）把萊茵河左岸割让給法国，并且确实也在俄法两国所强加的帝国代表会总決議中得到了出卖帝国的报酬。⁴⁸⁷ 1805年，一当拿破侖拿汉諾威来引誘它的时候（这个誘餌总是可以引它上鈎），它就又做了一次出卖，这次是出卖了它的盟友俄国和奥地利；但是，它是这样陷到它所特有的愚蠢的狡猾之中，以致被卷进对拿破侖的战争，在耶拿城下遭到了应有的惩罚。⁴⁸⁸ 由于这次打击仍有余痛，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甚至在1813年和1814年的胜利以后还想放弃德国西部的全部前哨，只打算占有德国的东北部，像奥地利那样尽可能不过問德国的事情——这样做就会把整个德国西部变成受俄国或法国保护的一个新萊茵联邦。这一計劃并没有实现；国王事与愿违，被迫接受了威斯特伐里亚和萊茵省，同时也就被迫接受了一种新的“德意志使命”。

兼并至此暫告結束(小片土地的購買除外)。國內旧的容克官僚制度又漸漸興旺起來；在極端危急時刻許給人民的實施憲法的諾言堅決不予履行。但是，不管怎樣，資產階級在普魯士也日益興起，因為這時如果沒有工商業，即便是目空一切的普魯士邦也等於零。必須慢慢地、固執地、一点一滴地在經濟上向資產階級做出讓步。但另一方面，這類讓步使普魯士有理由指望，它的“德意志使命”將得到支持：當時普魯士為了掃除楔入它的兩半國土之間的外國稅界，請求鄰近的各個德意志邦建立統一的關稅。這樣就產生了關稅同盟，它在1830年以前只不過是一種善良願望（當時只有黑森—達姆斯塔德參加），但到後來，在政治、經濟的發展逐步加速的情況下，很快就使德意志境內的大部分地區在經濟上歸并于普魯士。⁴⁸⁹ 不屬於普魯士的沿海各邦，一直到1848年以後仍然沒有加入同盟。

關稅同盟是普魯士的一個巨大成就。它意味着戰勝了奧地利的勢力，這還算不了什麼。主要的是：它把中小邦的整個資產階級都吸引到普魯士一邊來。除了薩克森，德意志任何一個邦的工業發展程度都沒有達到哪怕是接近普魯士的工業水平；這不僅要歸功于自然的和歷史的前提，而且要歸功于比較大的關稅地區和國內市場。同時，關稅同盟愈擴大，加入這一國內市場的小邦愈多，這些邦的新興資產者也就愈習慣于把普魯士看成是自己在經濟上的前衛和將來在政治上的前衛。而資產者怎么唱，教授們也就怎么和。在柏林，黑格爾分子從哲學上論證普魯士負有領導德意志的使命，而在海得爾堡，施洛塞爾的學生們，特別是霍伊塞爾和蓋爾溫努斯，則從歷史上證明這一點。這樣做當然是預定：普魯士將改變它的全部政治體制，將實現資產階級思想家的

要求。^①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对普魯士邦特別偏爱而产生的，并不像意大利资产者在皮蒙特公开站在民族运动和立宪运动前列以后就承认它是领导国家那样。不，这样做是不情愿的；资产者认为普魯士的禍害最小，因为奥地利把他們排斥在它的市場之外，因为普魯士同奥地利比起来，由于普魯士在財政上吝啬，所以毕竟具有某种资产阶级的性质。有两种好制度使普魯士优越于其他各个大邦：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教育制。它是在极端困难时期实行起这类制度的，而在比較好的日子里，它只满足于馬虎地实行和有意地歪曲，而使它們失去在一定情况下所具有的危险性质。但在紙面上它們繼續存在着，这样，普魯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众中的潜力有朝一日發揮到其他任何地方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资产阶级使自己适应了这两种制度；一年的志愿兵即资产阶级子弟的兵役义务，是在1840年左右通过行贿的办法，轻而易举地、相当廉价地免掉的，况且当时军队本身并不怎么重视从工商界征募来的后备軍⁴⁹⁰軍官。而由于施行义务教育的结果，在普魯士无疑还留下相当多的具有一定基本知識的人，这对资产阶级是非常有用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这批人最后甚至不够用了。^② 抱怨实行这两种制度开支大即征稅多的呼声^③，主要是小

① 1842年，“萊茵报”从这一观点出发討論了普魯士的霸权問題。1843年夏天，盖尔温努斯在奥斯坦德就对我說过：普魯士必須领导德意志，但是，为此就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普魯士必須实施宪法，必須实行出版自由，必須执行鮮明的对外政策。

② 甚至在“文化斗争”⁴⁹¹时期，萊茵省的厂主也向我訴苦說，他們沒有办法把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的工人任命为监工，因为这些工人缺乏足够的学校教育。在信仰天主教的地区，情况更是如此。

③ 恩格斯在頁边上写着：“资产阶级中等学校”。——編者注

資產階級發出的；日益得勢的資產階級却考慮到，大國付出費用雖然討厭，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是關係到未來的大國地位的，這些費用將從增高的利潤中得到綽綽有餘的補償。

簡言之，德國的資產者並沒有對普魯士的盛情抱任何幻想。如果說，從 1840 年以來，普魯士霸權的思想在他們中間開始流行，那末，這僅僅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和在這樣的限度內：普魯士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發展較快，因而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居于德國資產階級的前列；早就實施憲法的南方的羅泰克派和韋爾凱爾派被普魯士北方的康普豪森派、漢澤曼派和米爾德派擠到後台，律師和教授們被商人和廠主們擠到後台。而且事實上，在 1848 年前幾年，在普魯士自由派中間，特別在萊茵河地區自由派中間，已能感覺到一種同南方的聯邦自由派⁴⁹²迥然不同的革命氣息。當時，出現了兩首從十六世紀以來最優秀的政治性民歌：切希市長之歌和馮·德羅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⁴⁹³，它們的大不敬性質今天簡直使一些老年人震驚，而這些人在 1846 年曾經快活地合唱：

還從來沒有過一個人，
像切希市長那樣不幸，
他只不過差了兩步，
未能击中這頭肥豬！

但是，這一切都不能不迅速改變。二月革命來到了，接着便是維也納的三月時期和柏林的三月十八日革命。資產階級沒有經過嚴重的鬥爭就取得了勝利，它根本沒有想到當鬥爭到來時進行嚴重的鬥爭。因為正是這個在不久前還向當時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獻媚（特別在萊茵河地區）的資產階級，現在突然發覺，它不僅養育了個別工人，而且養育了一個工人階級，即一個雖然還半在睡夢

之中、但已漸漸覺醒的、按其真正的本性來說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同時，這個到處為資產階級爭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已經提出了——特別在法國——同整個資產階級制度的存在不相容的要求；1848年6月23日，巴黎第一次爆發了兩個階級之間的一場可怕的鬥爭；經過四天的戰鬥以後，無產階級失敗了。從此以後，在整個歐洲，大批資產階級都站到反動派一邊去，同在工人幫助下剛剛被它推翻的專制官僚、封建主和教士聯合起來，反對“社會的敵人”，即回過頭來反對工人。

在普魯士，這種情況以下述形式表現出來：資產階級拋棄了它自己選出的代表，以暗的或明的欣喜心情坐視政府在1848年11月驅散他們。從這時起在普魯士當權十年之久的容克官僚內閣，雖然不得不以憲法的形式進行統治，但是却通過一系列煩瑣的、甚至在普魯士也是前所未聞的挑剔和壓迫來進行報復，而受害最大的則是資產階級。⁴⁹⁴但是，資產階級悔罪認過，毫無怨言地忍受着百般踢打，把這看成是對它過去的革命貪欲的懲罰，它現在慢慢學會這樣考慮，而後來它也這樣宣布了：我們畢竟是狗啊！

後來，攝政時期到來了。曼托伊費爾為了證明自己忠於王室，曾用密探包圍王位繼承者^①，即現今的皇帝，就像現在普特卡默用密探包圍“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一樣。當王位繼承者變成了攝政者以後，自然馬上就把曼托伊費爾一脚踢開，“新紀元”⁴⁹⁵就開始了。這不過是換景而已。攝政王恩准資產者再度成為自由資產者。資產者滿意地享用了這種恩准，但是他們卻以為，現在他們已大權在握，普魯士邦必須唯他們之命是聽了。但是，這根本就不

① 威廉親王，即後來的威廉一世皇帝。——編者注

御用报刊所說的“权威人物”的本意。軍队的改組，不能不成为自由资产者付給“新紀元”的代价。政府这时只是要求把普遍兵役义务制实行到 1816 年左右曾經实行过的那种程度。从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場出发，这一点根本就无法反对，否則就不可容許地同他們自己所說的关于普魯士的威望和德意志使命的詞句相矛盾。但是，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法定服役期最长为两年作为贊同的条件。这一点，就其本身來說，完全是合理的，但是問題在于是否能爭得这种条件，国内的自由资产階級是否愿意不惜任何牺牲把这种条件維護到底。政府坚持三年的服役期，議院則坚持两年；冲突爆发了。⁴⁹⁶ 而随着軍事問題上的冲突，对外政策对国内政策來說又有了决定性意义。

我們已經看到，普魯士由于它在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中所采取的态度，已經弄得沒有人瞧得起它。这种可怜政策部分地是由軍队的恶劣状况造成的。由于早在 1848 年以前就已經是未經各等級同意不得征收新稅或举办公債，但为此召集各等級的代表又非所愿，所以，軍队所需要的錢一直不够，在这种无限吝嗇的情况下，軍队就完全衰敗了。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就已根深蒂固的閱兵精神和制式教练精神，更使事情糟糕透頂。这支用閱兵精神教育出来的軍队 1848 年在丹麦战场上曾經是多么无用，可以在瓦德西伯爵的著作中看到。1850 年的动員是一次彻底的失敗：什么东西都缺，不缺的又多半不适用。⁴⁹⁷ 誠然，議院批准的錢帮了些忙；軍队摆脱了陈規旧习；野战勤务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开始挤掉閱兵勤务。可是，軍队的人数仍然同 1820 年左右一样，而其他所有大国，特别是法国（这时威胁也恰好是来自法国），都已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兵力。然而在普魯士是普遍义务兵役制；每一个

普魯士人在紙面上都是士兵，但在人口由 1 050 万（1817 年）增长到 1 775 万（1858 年）的时候，軍隊的固定編制却不允許把三分之一以上能服兵役的人征集起来并加以訓練。現在，政府要求把軍隊扩大到差不多完全同 1817 年以来的人口增长情况相适应。可是，正是自由派議員們，正是这些不断要求政府領導德国，要求它对外保持德国威望，恢复德国的国际威信的人，現在却吝啬得要命，討价还价，要是不以两年服役期为基础就什么也不愿同意。那末，他們是否有力量去实现他們为此頑强坚持的意志呢？是否有人民，或者哪怕只有資產階級，站在他們后面，愿意采取坚决行动呢？

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欢呼他們对俾斯麦的口头斗争，但在实际上，它組織了一个虽然是不自觉、但其实却是反对普魯士議院多数派政策的运动。丹麦对霍尔施坦宪法的干涉以及想用暴力使什列斯維希丹麦化的企图，引起了德国資產者的憤怒。⁴⁹⁸ 受大国鄙視，这是他們习以为常的；但遭到小小的丹麦脚踢，却使他們大为恼火。民族联盟⁴⁹⁹ 建立了；恰好是小邦的資產階級构成了它的力量。而民族联盟尽管完全是自由主义的，但首先要求在普魯士领导下实现全国統一，尽可能是在自由主义的普魯士领导下，不得已时，現在这样的普魯士也行。最后，要清除德国人在世界市場上居于第二流人物的可怜地位，懲罰丹麦，并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向各大国显一显威风，这就是民族联盟首先要求的。同时，由普魯士領導的要求，現在已完全摆脱了直到 1850 年还免除不了的模糊和迷惘状态。人們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要求意味着把奥地利攆出德意志，实际上消灭小邦的主权，这两件事不經過內战、不經過瓜分德意志就不可能做到。但是，人們已不再害怕內战，而

瓜分也不过是給奥地利的禁止性关税做个总结罢了。德国的工商业已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德国的布满世界市場的商行网已如此扩展和如此稠密，以致家里的小邦制度以及国外的无权和无保护状态已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而当德国资产阶级历来所掌握的一个最强大的政治組織对柏林議員們实际上投不信任票的时候，这些議員們却还在为兵役期討价还价！

这就是俾斯麦准备积极干涉对外政策时的形势。

俾斯麦就是路易-拿破侖，是个从法国冒险主义的王位追求者变成了普魯士土容克和德国大学学生会會員的路易-拿破侖。完全像路易-拿破侖一样，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換一換場合，真可以在紐約交易所里同万德比尔特家族和杰伊·古耳德家族較量一番，而他的私人事业也的确干得很不錯。但是，同这种在实际生活方面发达的头脑相联系的，往往是一种相应的狹隘眼界，而在这方面，俾斯麦則超过了他的法国前輩。后者在流浪时期毕竟亲自制訂了一种“拿破侖观念”⁵⁰⁰——誠然，是按照他自己的尺寸做成的，——而俾斯麦，我們将会看到，却从来没有弄出一点点自己的政治观念来，而只是把別人的現成观念拼凑在一起。可是，这种狹隘性恰好是他的幸运。否則，他就根本干不出从特殊的普魯士观点出发去設想全部世界历史的事来；要是在他的这种极端普魯士的世界观上面有一个小洞，透点阳光进来，那他就会对他的全部使命感到茫然，而他的荣誉就会到此結束。的确，当他按自己的方式执行了他的特殊的、外部强加于他的使命时，他也就走进了死胡同；我們将会看到，由于他根本缺乏合理的观念，由于他无法理解他自己所創造的历史形势，他不得不进行怎样的跳跃。

如果說，路易-拿破侖由于他过去的經歷，已习惯于在选择手段方面无所顾忌，那末，俾斯麦从普魯士政策的历史中，特別从所謂大选帝侯^①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政策的历史中，学会了更少顾虑地行事，从而他就能保持着一种自命高尚的想法；他在这一点上一一直是忠实于祖国傳統的。他那务实的敏感教导他，必要时应当收一收自己的容克貪欲；而一到看起来沒有必要这样做时，这种貪欲就又突出地显露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沒落的象征。他的政治的方法便是大学学生会會員的方法；他把在大学生酒館中借以逃出圈套的那种对喝啤酒慣例所做的滑稽的字面解释，在議院中毫不客气地应用于普魯士宪法；他在外交上所实行的全部新花招，都是从大学学生会的学生那里抄襲来的。但是，如果說路易-拿破侖在紧要关头往往搖摆不定，譬如在 1851 年政变时，莫尔尼不得不积极地用暴力迫使他去完成业已开始的事业，又如在 1870 年战争前夜，他的犹豫不决毀坏了他的整个地位；那末，应当說，在俾斯麦身上，就从来沒有出現过这种情况。他从来沒有失掉过意志的力量；在很久以前，这种力量就变成了公开的野蛮举动。而他的成功的秘密首先就在这里。德国的所有統治階級，不論是容克还是資产者，已經失掉了最后一点点毅力，在“有教养的”德国，缺乏意志已經习以为常了，以致在他們中間唯一真正还有意志的人正因为如此就成了他們的最伟大人物和統治他們大家的暴君，在他面前，他們违背理智和良心，像他們自己所說的，情愿“跳过棍子”。当然，在“沒有教养的”德国，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工人已經表明，他們有一种甚至俾斯麦的坚强意志也无法对付的意志。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編者注

在我們这位勃兰登堡的容克面前已展現了一种光輝前程，只要他有勇气和聪明去干就行了。难道路易-拿破侖不是由于驅散了資產階級的議會、但增加了它的利潤，因而成了它的偶像嗎？而俾斯麥不是也同樣有使資產者對假拿破侖深表欽佩的辦事才干嗎？像路易-拿破侖傾心于他的富爾德那樣，俾斯麥不是也傾心于他的布萊希勒德嗎？1864年在德國，在由于吝嗇而想要縮短兵役期限的議院里的資產者議員同議院外的即民族聯盟中的那些不惜任何代價地追求民族功績（為此就需要軍隊）的資產者之間，不是出現了矛盾嗎？1851年在法國，在壓制總統權力的眾議院里的資產者同想要得到安定和強有力政府（不惜任何代價的安定）的議院外的資產者之間，不是也存在着同樣的矛盾，而路易-拿破侖不是通過驅散議會空談家並保證資產者得到安定而解決了這一矛盾嗎？德國的情況豈不是更有利于進行一次勇敢的打擊嗎？資產階級不是已經提出了一個非常現成的改組軍隊的計劃，資產階級本身不是強烈地要求有一位能實現它的計劃、能把奧地利排除出德意志、能把各個小邦在普魯士領導下聯合起來的有魄力的普魯士政治家嗎？如果說，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採取一種不太客氣的態度對待普魯士憲法，不得不把議院內外的思想家撇在一邊來獎賞他們的功勞，那末，不是也可以像路易·波拿巴那樣依靠普選權嗎？有什麼東西能比實行普選權更民主呢？路易-拿破侖不是曾經證明，——只要處理得當，它就根本沒有危險嗎？如果資產階級頑強起來，這種普選權豈不正好就是向廣大人民群眾呼喚、向新興社會運動賣弄風情的手段嗎？

俾斯麥着手干了。應當重復路易-拿破侖的政變，應當使德國資產階級明白實際的力量對比，應當用暴力粉碎它的自由主義的

自我欺騙，但应当实现它的那种同普魯士的愿望相吻合的民族要求。首先是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成了采取行动的借口。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經准备好了基础。1863年，俾斯麦在反对起义的波兰人⁵⁰¹的斗争中，由于作了警察式的效劳，已把俄国沙皇^①拉攏过来；路易-拿破侖也被說服了，他可能用他那心爱的“民族原則”来为他对俾斯麦计划采取冷淡（甚至是暗中促进）的态度进行辯护；在英国，首相是帕麦斯顿，他把矮小的約翰·罗素勋爵安插进外交部做大臣，好让他在那里出丑。可見，奥地利是同普魯士竞争德意志霸权的，正是在这种勾当中它最不甘心落在普魯士后面，何况在1850年和1851年它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曾經扮演过尼古拉皇帝的劊子手的角色，所作所为事实上比普魯士还要卑鄙。⁵⁰²可見，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不管俾斯麦怎样仇恨奥地利，也不管奥地利怎样想在普魯士身上泄憤，可是，在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七世逝世以后，二者还是只好共同——在俄法两国的默許下——来干涉丹麦。只要欧洲仍然保持中立，胜利預先就有了保证；情况也就这样发生了；两个公国被征服，根据和約被割让。⁵⁰³

普魯士在这场战争中还抱着一个附带目的，就是把它从1850年起按新原則训练的并在1860年改組和加强的軍队在敌人面前試驗一番。这支軍队出乎意料良好地显了身手，而且是在各种各样的战争环境中显身手的。針发枪远远胜于前装枪，并且士兵懂得正确地使用它，这一点，已經在日德兰的吕恩比战斗中得到了证明，在战斗中，配置在一道綠篱后面的80名普魯士兵用連射把比自己多了两倍的丹麦人打得落花流水。同时，有机会发现了，奥地

① 亚历山大二世。——編者注

利人从意大利战争中和从法国人的战斗方法中只取得了下面一个教训：射击是根本不适用的，真正的士兵必须立即用刺刀冲刺敌人；于是就把这一点牢牢地记住了，因为再好不过的事情莫过于敌军在后装枪枪口前面采取这种战术。为了使奥地利人有机会尽快地在实际上体会这一点，和约规定把两个公国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纯粹暂时的局面，这种局面不能不使冲突接二连三发生，从而使俾斯麦完全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利用这类冲突中的一个来对奥地利进行严重打击。在实行传统的普鲁士政策——用馮·济貝耳先生的話說，是“毫无顾忌地彻底利用”有利形势——的情况下，以把德国人从丹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借口，把什列斯維希北部的大約二十万丹麦居民并入德国，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一无所得的人只是德意志各小邦和德国资产阶级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王位候补者——奥古斯滕堡公爵。

可見，俾斯麦在两个公国里是违背着德国资产阶级的意志而实现了它的意志的。他赶走了丹麦人，他向外国发出了挑战，而外国也没有动一动。可是，刚刚被解放的公国却被当做被征服的国家来看待，它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考虑，奥地利和普鲁士直截了当地暂时把它们瓜分了。普鲁士又成了一个大国，它不再是欧洲这辆馬車的第五个輪子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愿望正在完全实现，但是，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道路。因此，普鲁士的军事冲突继续进行，甚至越来越不容易得到解决。俾斯麦演出的第二幕就要开场了。

* * *

丹麦战争已实现了一部分民族愿望。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获得了“解放”，列强使德国受辱于丹麦的华沙議定书和伦敦議定

书⁵⁰⁴ 也被撕毀，拋在列强的脚下，列强也默不作声。奥地利和普魯士又站在一起，两国軍隊并肩作战，并且取得了胜利，任何一个統治者都不会想到去侵犯德国領土了。路易-拿破侖对萊茵河地区的貪欲——这种貪欲迄今为止一直由于別的事情（意大利革命、波兰起义、丹麦糾紛，最后还有对墨西哥的远征⁵⁰⁵）而被擱置——已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因此，对于一个保守的普魯士政治家來說，世界局势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合乎他的愿望的。但是，俾斯麦一直到 1871 年从来不是保守的，在这个时候特別不保守，而德国資產階級也完全沒有滿足。

德国資產階級仍旧处在那个尽人皆知的矛盾当中。一方面，它要求由自己，也就是說，由一个从自由主义議院多数派中选出的內閣独享政权；而这样一个內閣就得同国王所代表的旧制度进行十年的斗爭，直到它的新权力最終被承认为止，而这就意味着国内的十年虛弱。但是另一方面，資產階級要求革命地改造德国，这种改造只有通过暴力、因而也只有通过真正的独裁才能实现。然而，从 1848 年以来，資產階級在每一个决定性时刻都一再证明：它根本沒有必要的毅力去实现其中的一个要求，更不用說实现两个要求了。在政治上，只有两种决定性的力量：有組織的国家暴力——軍隊和人民群众沒有組織的自发的暴力。資產階級在 1848 年就已不再向群众呼吁了；它害怕他們甚于害怕专制制度。可是，軍隊根本不是由它掌握的。掌握軍隊的自然是俾斯麦。

在仍然繼續进行的宪法冲突中，俾斯麦极其坚决地同資產階級的議会要求进行了斗爭。但是，他却抱着实现它的民族要求的热烈愿望；要知道，这种要求是同普魯士政策的最隱秘的內心愿望相吻合的。如果他現在再一次违背資產階級的意志去实现它的意

志，如果他按照資產階級所擬定的那個樣子去實現德國統一，那末，衝突就會自行消除，而俾斯麥也必然會像他的原型——路易-拿破侖那樣，變成資產者的偶像。

資產階級給他指明了目的，路易-拿破侖則給他指明了達到目的途徑；俾斯麥所要做的，只是實現這種目的而已。

要使普魯士來領導德意志，不僅應當用暴力把奧地利趕出德意志聯邦，而且應當使德意志各個小邦屈服。德國人反對德國人這樣一種“活潑快樂的戰爭”⁵⁰⁶，對普魯士的政策來說，歷來就是擴張領土的一種主要手段；任何一個雄赳赳的普魯士人都是不怕這類事情的。第二種主要手段——同外國人結成同盟反對德國人——同樣也不可能引起任何懷疑。多情的俄國沙皇亞歷山大是時刻願意效勞的。路易-拿破侖從來不否認普魯士在德意志所負的使命是起皮蒙特的作用，他十分樂意同俾斯麥做交易。如果有可能，他是寧願通過和平途徑，即以補償的形式獲得他所需要的東西的。加之，他根本不需要一下子獲得整個萊茵河左岸；如果為了普魯士的每個新進展而把左岸一部分一部分地、一片一片地給他，那末，這就會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仍能達到目的。而在法國沙文主義者的心目中，萊茵河地區的一個平方德里就抵得上整個薩瓦和尼斯。於是，同路易-拿破侖的談判就開始了，並且得到他准許擴張普魯士並建立北德意志聯邦。為此，曾經要給他萊茵河地區的一片德意志領土，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①在同果沃內談判時，俾斯麥談到了萊茵巴伐利亞和萊茵黑森。⁵⁰⁷誠然，他後來曾經否認了這一點。可是，一個外交家，特別是普魯士的外交家，對於他

① 恩格斯用鉛筆在頁邊上寫着：“分界綫——美因河綫”（見本卷第 497 頁）。——編者注

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真理施加温和的暴力，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真理就是女人，也就是說，在容克的概念中，这种暴力对于她老实說是非常愉快的。路易-拿破侖不会那么愚蠢，要是普魯士不答应給他报酬，他是不允許它扩张領土的；正像布萊希勒德不会无息貸款那样。可是，他对普魯士人認識得很不够，最后他还是受騙了。总之，在把路易-拿破侖稳住以后，普魯士就同意大利結成同盟，以“打击心臟”。

各国的庸人們对这一說法深感憤慨。这是完全不对的。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 [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这一說法只不过证明：俾斯麦是如实看待 1866 年的德国内战⁵⁰⁸ 的，就是說，把它看做革命；所以他决心用革命手段进行这场革命。而他也就这样干了。他对联邦議会的做法是革命的。他不服从这个联邦机关依据宪法做出的决定，反而責备它违背联邦条約，——这純粹是一种遁辞，——他破坏了联邦，宣布了新宪法和一个在革命普选制基础上选出的帝国国会，最后还把联邦議会赶出法兰克福。⁵⁰⁹ 在上西里西亚，他組織了一个由革命將軍克拉普卡和其他革命軍官指揮的匈牙利軍团，該軍团的士兵是匈牙利的投誠分子和战俘，他們必須向他們自己的合法的大元帅开战。^① 在征服了波希米亚以后，俾斯麦发布了一个“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⁵¹⁰，这个宣言的内容也是同正統主义传统尖銳矛盾的。在簽訂和約以后，他还为普魯士夺得了三个合法君主——德意志联邦成員——和一个自由市⁵¹¹ 的全部属地，而且对君主（他們同普魯士国王一样都是“受命于天的君主”）的这种驅逐，并没有使他的基督教的和

① 恩格斯用鉛筆在頁边上写着：“誓詞”。——編者注

正統主义的良心有任何不安。簡言之，这是一场用革命手段实现的完全彻底的革命。当然，我們决不因此而責备他。相反，我們要責备他的是：他是不够革命的，他只是一个从上面进行的普魯士革命者，他开始整个革命时所采取的立場使他只能把革命实现一半；他一走上兼并的道路，就满足于四个可怜的小邦。

可是，現在小拿破侖从后面走了出来，要求給他报酬。在战争期間，他在萊茵河地区本来是能取得他想取得的一切东西的：因为無論整个領土或者要塞当时都处于无防御状态。他犹豫了起来，他期待一場曠日持久的战争使双方疲憊不堪，而現在却出現了这样一些迅速的打击：奥地利在八天之內就被打倒了。他首先要求得到俾斯麦对果沃內將軍所說的那种可能的补偿——萊茵巴伐利亚和萊茵黑森(包括美因茲)。但是，即使俾斯麦愿意，他現在也不能这样做了。在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給他加上了新的义务。在普魯士已經充当了保护德国的角色的时刻，它是不可能把打开萊茵河中部的钥匙——美因茲出卖給外国人的。俾斯麦以拒絕作为回答。路易-拿破侖愿意讲讲价錢；他只要求得到卢森堡、兰道、薩尔魯伊和薩尔布呂肯采煤区。但是，俾斯麦現在連这一点也不能让步了，何况，这一次也对普魯士領土提出了要求。誰叫路易-拿破侖不在适当时机，即在普魯士人被牵制在波希米亚的时候自己去占領呢？总而言之，給法国的补偿成了一句空話。俾斯麦知道，这意味着以后同法国作战，但这一点正好是他求之不得的。

在簽訂和約时，普魯士这一次并没有那么毫无顾忌地利用有利形势，像它过去在順利时刻常干的那样。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薩克森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已被拉进新的北德意志联邦，因而得到了饒恕。巴伐利亚、維尔騰堡和巴登是应当得到寬待的，因为俾

斯麦打算同它們簽訂秘密的攻守同盟。而奧地利——難道俾斯麥不是已經給它效了勞，把它同德國和意大利束縛在一起的傳統羈絆斬斷了嗎？他不是已經第一次給奧地利造成了它夢寐以求的獨立的大國地位了嗎？當他在波希米亞戰勝奧地利的時候，他實際上不是比奧地利本身更清楚地懂得什麼東西對奧地利有好处嗎？奧地利如果頭腦健全，難道不是一定會明白，兩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和在領土上唇齒相依，已經把普魯士所統一的德國變成了它的必然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了嗎？

這樣，普魯士有生以來，第一次能夠在自己頭上罩上了寬宏大量的靈光，——因為它要拋香腸來引火腿。

在波希米亞戰場上，被打垮的不僅有奧地利，而且還有德國資產階級。俾斯麥向資產階級證明了：他比它本身還知道得清楚，什麼東西對它更有利。議院要使衝突繼續下去已不能想像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奢望已經長期地被埋葬了，但是它的民族要求却一天天地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實現着。俾斯麥用使資產階級本身感到驚奇的速度和準確性實現着它的民族綱領。所以，俾斯麥 *incorpore vili*——用它自己的污穢的身體——清楚地向它表明它是怎樣萎靡不振和沒有毅力、怎樣根本無能去實現自己的綱領以後，就對它表示寬宏大量，來到了現在實際上已被解除武裝的議院，以便推卸在衝突時期違背憲法規定的責任。感激涕零的議院贊同了這種在目前已無害處的進步。⁵¹²

然而，資產階級仍然被提醒了：在凱尼格列茨城下⁵¹³ 被打敗的也有它。北德意志聯邦憲法是按照在憲法衝突中得到正確解釋的普魯士憲法的样子仿制出來的。拒絕納稅已被禁止。普魯士國王不依靠議會的什麼多數就任命了聯邦首相和他的大臣。已經由

冲突而确立了的军队对议会的独立地位，在帝国国会面前也保持了下来。但是，这一帝国国会的議員們自以为了不起，认为他們是通过普选制选出来的。同时，有两个社会主义者^①坐在他們中間，这也向他們提醒(虽然是用不愉快的方式提醒)这一事实。在議會成員中，第一次出現了社会主义議員，无产階級代表。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最初，这一切并没有什么意义。現在要做的是：为了资产階級的利益去加强和利用新获得的国家統一(至少是北部的統一)，并且用这种办法把德国南部的资产者也引誘到新的联邦中来。联邦宪法从各邦的主管范围内夺走了在經濟上极为重要的立法部門，并把它們交給联邦去掌管：整个联邦領土內共同的公民权和迁徙自由，戶籍权，以及工业、商业、关税、航行、鑄币、度量衡、铁路、水路、邮电、特許证、銀行、整个对外政策、領事館、保护国外商业、卫生警察、刑法、訴訟程序等等方面的立法权。現在，这些問題的大部分，都通过立法的方式，一般按照自由主义的精神迅速地解决了。这样，小邦制度的最严重的贅瘤(这种贅瘤一方面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資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其严重地阻碍了普魯士統治者的欲望)，终于(终于!)被消除了。可是，这决不是什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像現在已变成了沙文主义者的资产者大吹大擂的那样，而只是对法国革命早在七十年以前就已做过、其他一切文明国家也早已实现的事情进行了非常非常不及时的和不完全的模仿。何須大事吹嘘，倒是应当感到慚愧：“有高度教养的”德国在这方面来得最迟。

^① 奧·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內西。——編者注

在北德意志联邦存在的整个时期，俾斯麦在经济方面是很乐意迎合资产阶级的，甚至在讨论议会的权限问题时，他所显示的也不过是带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这是他的最风头的时期；有时甚至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真具有特殊的普鲁士狭隘性，他是不是真没有能力理解在世界历史中除了军队和以军队为基础的外交计谋以外还有其他更强大的力量。

对奥地利和平孕育着对法国战争，俾斯麦不仅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希望这样。正是这场战争应当提供一种手段来建立德国资产阶级期望于他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① 想把关税议会⁵¹⁵ 逐步变成帝国国会，从而把南部各邦慢慢拉进北部联邦的企图，在德国南部议员们高喊反对扩张权限的呼声中遭到了破产。那些刚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邦政府的态度更为不利。只有拿出一个新的、明显的证据，证明普鲁士不仅比这些政府强大得多，而且强大到足以保护它们的地步，——也就是说，只有进行一场新的、全德性的战争，才能很快地使它们投降。加之，美因河分界线⁵¹⁶，虽然是由俾斯麦和路易-拿破仑事先在暗中商定的，但在胜利以后，看起来却像是后者强加给普鲁士的；因此，同德国南部联合一起，就是侵犯了这一次正式承认法国人享有的分割德国的权利，就是战争的理由。

同时，路易-拿破仑不得不进行探索，看看是不是能在德国边

① 早在对奥地利战争以前，德国某一个中等邦的大臣曾就俾斯麦的一套蛊惑性的德国政策提出询问，俾斯麦回答说：不管怎么说，他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国，把德意志联邦毁灭。——“怎么，您认为德国各中等邦到那时会袖手旁观吗？”——“你们德国各中等邦将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么一来，德国人将会怎样呢？”——“到那时，我把他们带到巴黎去，在那里把他们统一起来。”（这是上述大臣在对奥地利战争前夕在巴黎叙述的，在战争期间由“曼彻斯特卫报”⁵¹⁴ 驻巴黎通讯员克罗弗德夫人在该报上发表。）

境的某个地方找到一片土地，把它当做对薩多瓦的补偿。在組成北德意志联邦的时候，是沒有把卢森堡包括在內的，因此，它現在成了一个同荷兰組成君合国，一般來說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同时，卢森堡几乎同亚尔薩斯一样法国化，它十分傾向于法国，而不傾向于它所真正痛恨的普魯士。

卢森堡是中世紀末期以来德国悲慘的政治状况会使德法边界地区发生什么变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尤其是因为，卢森堡在1866年以前一直在名义上属于德国，所以这个例子更显得突出。虽然它在1830年以前是由法国部分和德国部分各半組成的，但是德国部分也早已处在占优势的法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卢森堡王朝的德国皇帝⁵¹⁷，按其語言和教养來說，都是法国人。从卢森堡被并入勃艮第領土(1440年)以来，它像其他尼德兰国家一样，同德国一直只保持着形式上的联系；1815年，接收它加入德意志联邦，也沒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什么变化。1830年以后，卢森堡的法国部分，还有德国部分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都归比利时所有。但是，卢森堡的殘存的德国部分，一切东西仍然按照法国方式保存了下来：在法院里，在政府机构里，在議院里，一切手續都用法語来办理，所有公私文件、全部商业簿記都用法文来写，所有中等学校都用法語教学。有教养的人用的語言，过去是，現在仍然是法語——当然，这是一种在高地德意志語的音变的压力下像呻吟和喘息一样的法語。总之，在卢森堡使用两种語言：萊茵法兰克民間方言和法語，而高地德意志語始終是一种外地語。駐扎在首都的普魯士駐軍，与其說使这一切改善了，不如說使这一切恶化了。这种情况对德国來說是够可耻的，然而这是事实。而卢森堡的这种自愿法国化，使亚尔薩斯和德意志洛林的类似过程也得到真实的說明。

荷兰国王^①，卢森堡的握有主权的公爵，恰好非常需要现款，于是就表示愿意把公国出卖给路易-拿破侖。卢森堡人是会无条件地同意把自己并入法国的，他们在 1870 年战争时期所采取的立场便是证明。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普鲁士不可能提出什么不同意见，因为把卢森堡排除出德国的是它自己。它的军队是作为德意志联邦要塞的联邦驻军驻扎在卢森堡首都的；一旦卢森堡不再是联邦要塞，这支军队在那里就不再有任何驻扎的权利了。可是，它们为什么不回老家呢，俾斯麦为什么不能允许这种兼并呢？

这只是因为：他陷入其中的那些矛盾，现在已暴露出来了。1866 年以前，对普鲁士来说，德国只不过是一种供兼并的领土，必须同外国一道来瓜分它。1866 年以后，对普鲁士来说，德国则成了受保护的领土，必须保卫它，以防止外国侵犯。诚然，德国的整片整片土地曾经为了普鲁士的利益而被排除在重新建立的所谓德国之外。但是现在，德意志民族对自己的领土所享有的权利，给普鲁士国王加上了这样一种义务：不让旧联邦的这几部分领土并入外国，要让它们将来能够加入新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这就是意大利被阻止在提罗耳边境⁵¹⁸上的原因，这就是卢森堡现在不能转入路易-拿破侖之手的原因。真正革命政府是能够公开宣布这一点的，可是，皇家普鲁士的革命者却做不到，因为他已经最终地把德国变成了一种梅特涅的“地理概念”⁵¹⁹。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他是自己置身于违法的地位，他只有对国际法做一番他所心爱的那一套大学学生会会员酒馆式的解释才能脱身。

如果说，他没有为此而直截了当地受到嘲笑，那只是因为：路

① 威廉三世。——编者注

易-拿破侖在 1867 年春天还根本沒有准备进行一場大战。在伦敦會議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普魯士人撤出了卢森堡；这个要塞被毀掉，公国宣布中立。⁵²⁰ 战争又延緩了。

路易-拿破侖是不可能因此就安心的。他只有在萊茵河地区得到相应的补偿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普魯士势力增强。他愿意以得到少許东西为滿足，甚至还可以因此而做出某种让步，但他一无所得，他完全受騙了。可是，波拿巴帝国若要在法国存在，只有在法国边界逐步向萊茵河推进，法国仍然是——实际上的或者哪怕是想像中的——欧洲的仲裁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推进边界沒有成功，仲裁人的地位已經受到威胁，波拿巴主义报刊大叫为薩多瓦报仇，因此，路易-拿破侖如果想保住他的王位，他就必須仍然忠实于他所扮演的角色，用暴力攫取他过去尽管帮了別人的忙，做好事，但並沒有好好得到的东西。

因此，双方都既从外交上也从軍事上积极准备进行战争。而这时又发生了下面一个外交事件：

西班牙在寻求一个王位候补者。3 月間^①，法国駐柏林大使貝內代提風聞霍亨索伦王朝的列奥波特亲王覬覦这一王位，他受巴黎委托对此事进行查詢。副大臣馮·梯勒以名誉担保：普魯士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貝內代提回到巴黎时打听到皇帝的意見是：“这种候补分明是反民族的，該国将不会同意，一定会加以防范的。”

附带說一下，路易-拿破侖在这里证明了：他的地位已經十分不穩。事实上，“为薩多瓦报仇”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普魯士亲

^① 1869 年。——編者注

王在西班牙即位，因为由此必然会引起种种不愉快事情，普鲁士将卷入西班牙各党派的内部关系之中，甚至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微不足道的普鲁士舰队会遭到失败，在任何情况下普鲁士都会在欧洲面前陷入一种极端可笑的境地，可是，路易·波拿巴已经不能让自己演这一类戏了。他的威信已经大大低落，以致不得不服传统观点的支配，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一个德意志君主登上西班牙王位，就会把法国置于受两面夹攻的境地，因而这种做法是不能容忍的，——这是一种从1830年以来就显得幼稚可笑的观点。

这样，貝內代提就去拜访俾斯麦，以便从他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并向他阐明法国的立场（1869年5月11日）。他从俾斯麦那里没有打听到什么特别确定的东西。可是，俾斯麦却从他那里打听到了想要知道的东西：提出列奥波特为候补者就意味着立即对法作战。这样一来，俾斯麦就有可能爱在什么时候发动战争就在什么时候发动了。

果然，在1870年7月，列奥波特的候补地位又一次冒了出来，并且，不管路易-拿破仑怎样表示不愿意作战，还是立即引起了战争。路易-拿破仑不仅看到，他已陷入了别人的圈套。他也知道，问题已关系到他的帝位，他并不相信他的波拿巴主义硫磺帮⁵²¹是诚实的，即使它曾向他保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直到护腿套的最后一个扣子；他更不相信它的军事和行政才能。但是，他自己的过去经历的逻辑结果驱使他走向灭亡，他的动摇适足以加速他的毁灭。

相反，俾斯麦不仅在军事上已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而且这一次他实际上有人民作为后盾，因为在双方进行种种外交欺骗之后，人民只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场不仅为了莱茵河地区，而且

为了民族生存的战争。预备兵和后备军士兵——1813年以来第一次——又心甘情愿地斗志昂扬地云集于战旗之下。不管这种种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也不管俾斯麦是否擅自把两千年民族遗产中的哪一部分许给了路易-拿破侖，都是无所谓，——问题在于要使外国永远知道：它不应当干预德国的内部事务，德国没有义务要用割让德国领土的办法支持摇摇欲坠的路易-拿破侖宝座。于是，在这种民族高潮面前，一切阶级差别都消失了，德国南部各个宫廷关于莱茵联邦的一切打算以及被逐君主的一切复辟企图，都化为乌有了。

双方都寻找同盟者。路易-拿破侖对奥地利和丹麦有把握，对意大利也颇有把握。俾斯麦得到俄国的支持。可是，奥地利像往常一样没有准备，在9月2日以前没有能够进行积极的干涉，——而在9月2日，路易-拿破侖已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加之，俄国已通知奥地利：一旦奥地利进攻普鲁士，它将进攻奥地利。在意大利，路易-拿破侖所实行的下面那种两面派政策得到了报应：他想掀起民族统一运动，但同时却想在这种民族统一面前保护教皇；他继续用军队占领罗马，现在这支军队他在本国很需要，然而，要是不使意大利承担尊重罗马和教皇主权的义务，就不可能把军队撤回；而这又会妨碍意大利来帮它的忙。最后，丹麦从俄国得到命令，叫它不要乱动。

可是，比起一切外交谈判来，对战争局部化更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德国的武装力量从施皮歇恩和维尔特到色当的迅速打击⁵²²。路易-拿破侖的军队每战必败，最后有四分之三的人成了德国的战俘。这并不怪士兵，他们作战是够勇敢的，而是怪领导人和政府当局。但是，如果有人像路易-拿破侖那样，在一帮坏蛋的协

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在十八年当中只通过让这帮坏蛋去剝削法国的办法来維持这个帝国，让这一帮人高踞国家的一切决定性职位，而让他們的帮凶占据一切次要的地位，那末，要是他不愿意被人抛弃，就不应当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在不到五个星期里，多年来使欧洲庸人惊奇不已的整个帝国大厦崩潰了；9月4日的革命⁵²³只不过是清除瓦礫，而为了建立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发动战争的俾斯麦，却突然在一个好日子里扮演了法兰西共和国締造者的角色。

按照俾斯麦自己的宣言，进行战争并不是反对法国人民，而是反对路易-拿破侖的。随着后者的垮台，进行战争也就沒有任何理由了。9月4日的政府也是这样想像的——在別的問題上决不是如此天真，——所以当俾斯麦現在突然露出了普魯士容克的面目时，它就十分惊惶了。

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像普魯士容克那样痛恨法国人。問題不仅在于：免稅的容克曾經在遭受虐待时期大吃苦头，这种迫害是法国人在1806—1813年間加在容克头上的，是由他們自己的驕傲自大引起的；而且，更坏的是：不信神的法国人用无法无天的革命攪乱了人們的头脑，以致容克們昔日的权势甚至在旧普魯士也大部分被葬送了；穷得可怜的容克們不得不为了殘存的权势而一年又一年地进行頑强斗争，而他們中間的一大部分人已經淪为衣履不全的寄生貴族。为了这些，必須对法国进行报复，而由俾斯麦指揮的军队里的容克軍官所关心的也就是这个。在普魯士制定了法国的战争賠款单，根据这个单子在法国确定各城市和各省份应繳战争賠款的数额，——当然，是对法国所拥有的財富做了多得多的估計的。用一种示威式的毫不留情的方式来征用食物、粮秣、衣服、鞋

靴，等等。阿尔登的一个市长，由于声明无法交出这类东西，竟不由分說地被打了二十五棍；这件事巴黎政府曾經公布了官方的证明。那些似乎专门学过 1813 年普魯士“民軍条例”⁵²⁴ 而完全按照这个条例行动的自由射手們一經拿获，即被殘忍地就地枪决。关于把挂钟送回国来的故事也是真实的，“科伦日报”本身就曾經报道过。只是在普魯士人看来，这种挂钟并不是偷来的，而是在巴黎附近的荒废別墅里找到的一种无主之物，是为了祖国的亲人而沒收的。由此可見，俾斯麦指揮下的容克們所关心的是：尽管士兵和不少軍官的所作所为无可責难，但是战争还是要保持特殊的普魯士性质，并且硬要法国人也明白这一点；可是，法国人却让整个軍隊对容克的卑劣行为負責。

不过，就是这帮容克还是要对法国人民表示史无前例的敬意。当想要解围巴黎的一切尝试遭到失敗，全部法軍都被击退，布尔巴基向德国人的交通綫实行最后一次大規模进攻也以失敗告終的时候；当整个欧洲外交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让法国去听天由命的时候，挨餓的巴黎終於被迫投降了。⁵²⁵ 当容克們終於有可能胜利地进入不信神的人的巢穴，并对巴黎的造反分子彻底地进行报复——1814 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和 1815 年威灵頓都沒有让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們的心臟激烈地跳动起来了；現在他們可以痛痛快地惩治一下革命的搖籃和故乡了。

巴黎投降了，它交出了两亿賠款；要塞交給了普魯士人；城防軍在胜利者面前放下了武器，交出了他們的野炮；巴黎要塞圍牆的大炮都被拆除了；国家的所有一切反抗手段都接二連三地交出去了。但是，巴黎的真正保卫者——国民自卫軍，武装的巴黎人民——仍然是不可侵犯的；沒有人敢要求他們交出武器，無論是枪

支或者是大炮。^① 为了向全世界宣告胜利的德国军队在武装的巴黎人民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了脚步，胜利者没有进入巴黎，只满足于获准把爱丽舍园——一个公园！——占领了三天，而这个地方四周都受巴黎人的哨兵保护、监视和包围！没有一个德国兵走进巴黎市政厅，没有一个德国兵踏上林荫道，而得以进入路弗尔宫去赏鉴艺术珍品的几个人必须请求批准，否则便是违反投降条件。法国被击溃了，巴黎被饿倒了，可是，巴黎人民用自己的光荣的过去为自己争得了这样的尊敬：没有一个胜利者敢要求他们解除武装，没有一个胜利者胆敢搜查他们的家，胆敢用胜利游行来玷污这些街道——经历了多次革命的战场。仿佛是那位新出炉的德国皇帝^② 在活着的巴黎革命者面前脱帽致敬，就像他的哥哥^③ 当年在死难的柏林三月战士⁵²⁶ 面前脱帽致敬那样，仿佛是整个德国军队都站在皇帝背后，举枪致敬。

可是，这也是俾斯麦不得不承担的唯一牺牲。他竟说什么在法国并没有能同他签订和约的政府，——这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不论在9月4日或者在1月28日都是一样，——他以此为借口纯粹按普鲁士方式彻底利用他的胜利，直到彻底打倒了法国以后才同意签订和约。在签订和约时，他又按照美好的旧普鲁士方式“毫无顾忌地利用有利形势”。不仅榨取了五十亿战争赔款这样一笔空前巨大的款子，而且还从法国手中夺走了两个省——亚尔萨斯和德意志洛林（包括麦茨和斯特拉斯堡），把它们并入德国。⁵²⁷ 从这

① 正是这些属于国民自卫军而不是属于国家因而没有交给普鲁士人的大炮，梯也尔在1871年3月18日下令要从巴黎人那儿偷过来，这就成了起义的导火线，由此产生了公社。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一兼并开始，俾斯麦第一次以独立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他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实现从外面强加于他的纲领，而是去实现他自己脑子活动的产物了；在这里他就犯了他的第一个大错误^①。

亚尔萨斯是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法国基本上占领的。黎塞留这样做是背弃了亨利四世的下述坚定原则的：

“让说西班牙语的地方归西班牙人，让说德语的地方归德国人，而让说法语的地方归我。”

黎塞留所根据的，是莱茵的自然疆界、古高卢的历史疆界这一原则。这是一件蠢事；但是，囊括了洛林、比利时的法语区、甚至法兰斯孔太的德意志帝国，却无权指责法国兼并说德语的地方。如果说，路易十四 1681 年在和平时期曾经借助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亲法政党而占领了该市⁵²⁸，那末，普鲁士没有必要对此表示愤懑，它在 1796 年也曾经对帝国自由市纽伦堡同样施加暴力（虽然未能成功），而且根本没有一个普鲁士政党要它这样做。^②

洛林是在 1735 年由奥地利根据维也纳和约出卖给法国的⁵³¹，在 1766 年最终为法国占有。它在几世纪当中只是在名义上属于

① 以下直到“俾斯麦已达到目的”（见本卷第 513 页）以前的各段文字，由于缺少这几页手稿，这一部分是按照“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原文复制的（见 1895—1896 年“新时代”第 1 卷第 25 期第 772—776 页）。——编者注

② 人们指责路易十四，说他曾在最和平的时期驱使他的“归并议会”⁵²⁹覬覦不属于他的德国地区。因此，即使出于最恶毒的嫉妒也不能对普鲁士人说什么了。情况恰好相反。普鲁士人在 1795 年直接破坏帝国宪法而同法国单独媾和⁵³⁰，并且把分界线后头各个同样背信弃义的小邻邦团结在自己周围，结成了第一个北德意志联邦，在此之后，他们就利用了同奥地利结盟的不得不单独继续作战的德国南部帝国官员的窘境，企图在法兰克尼亚实行兼并。他们在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它们当时属于普鲁士）按照路易的样子建立了“归并议会”，对一系列邻邦提出了领土要求，相形之下，倒使路易的法律论据成了十分显然令

德意志帝国，它的历代公爵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法国人，而且几乎一直同法国结盟。

在法国革命以前，在佛日山脉中有许多小封君，他们在德国面前表示自己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帝国官员，而在法国面前则承认它对他們拥有主权；他們就从这种双重地位中得到好处，如果德意志帝国容忍这种情况，而不向邦君們追究责任，那末，当法国根据自己的主权保护这些地区的居民免遭被逐邦君侵犯的时候，德意志帝国就不应当抱怨。

整个来说，这片德国领土在革命前几乎完全没有法国化。在内部交往中，德语仍然是学校用语和官厅用语，至少在阿尔萨斯如此。法国政府保护着这些德国省份，这些省份经历了长期战争的破坏以后，现在，从十八世纪初起，在自己的土地上再也看不到敌人了。由绵延不断的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不可能引诱阿尔萨斯人回到母亲的怀抱；他們至少能过着安宁与和平的日子，他們知道自己的处境，因而居于领导地位的庸人們便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天定的道路。而且他們的命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须知，霍尔施坦人也是受外来的丹麦统治的。

但是法国革命发生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从来不敢指望从德国手中得到的东西，由法国送给它們了。封建枷锁打碎了。从属的、服徭役的农民变成了自由人，他們在许多场合下成了自己的宅院

人信服的。后来，当德国人被击退，而法国人进入法兰克尼亚的时候，以拯救者自命的普鲁士人就占领了紐伦堡周围地区，包括直到城墙的市郊在内，并且诱使心惊胆战的紐伦堡庸人签订了一项条约（1796年9月2日），在不许犹太人进入城内的条件下规定该市归普鲁士统治。但是，卡尔大公紧接着又转入进攻，于1796年9月3日和4日在维尔茨堡打败了法国人，于是普鲁士硬要紐伦堡人接受自己的德意志使命这样一种企图也就烟消云散了。

和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城市望族的統治和行会特权消失了。貴族也被赶走了。而在小邦君和貴族的領土上，农民效法邻人，赶走了邦君、政府机关和貴族，并宣布自己是自由的法国公民。在法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参加革命的热情都不像說德語的地方那么高。所以，当德意志帝国向革命宣战的时候，当德国人不仅自己現在还服服貼貼地带着鎖鏈，而且还让人利用自己来把旧的奴隶制重新强加于法国人，把刚被赶走的封建主重新强加于亚尔薩斯农民的时候，亚尔薩斯人和洛林人就不再属于德意志民族了，他們学会了憎恨和鄙視德国人，在斯特拉斯堡写出了“馬賽曲”，配上了譜，而且首先由亚尔薩斯人唱起来。德意志的法国人不管語言和过去經歷如何，在几百个戰場上，在为革命进行的斗爭中，已經同本来的法国人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了。

大革命不是使敦克尔克的佛来米人、布列塔尼的凯尔特人和科西嘉的意大利人发生了同样的奇迹嗎？如果我們抱怨德国人也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末，我們岂不是忘記了使这样的事有可能发生的我們的全部历史嗎？难道我們忘記了，整个萊茵河左岸即使只是消极地参加了革命，但是在 1814 年德国人再度攻入的时候仍然是亲法的，并且直到 1848 年革命使德国人在萊茵居民的心目中恢复名誉以前也一直是亲法的嗎？难道我們忘記了，海涅的法国狂、甚至他的波拿巴主义也不过是萊茵河左岸人民普遍情緒的反映嗎？

1814 年，联軍在向前推进期間，正好在亚尔薩斯和德意志洛林遭到了最坚决的敌視，受到了人民本身最激烈的反抗；因为在这里人們感到有再度变成德国人的危險。而当时在那里人們还是几乎光說德語的。可是，当脫离法国的危險过去了的时候，当德国浪

漫主义沙文主义者的兼并欲被打消的时候，人們就认为有必要在語言方面也更紧密地同法国融合在一起，从这时起，学校就像卢森堡人自愿实行过的那样法国化了。但这种转变过程毕竟是非常緩慢的；只有現在这一代资产阶级才真正法国化了，而农民和工人还是說德語的。这大致上同卢森堡的情况一样：除了一部分教会讲坛以外，书面德語已被法語排挤了，但德国的民間方言只是在語言交界处失去了地盘，而且，作为日常用語，它在这里比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应用得更为广泛。

这就是俾斯麦和普魯士容克冒着危險要使之再度德国化的地方，他們是被那种看来同德国一切問題密不可分的沙文主义浪漫主义的复活支持着的。要想使“馬賽曲”的故乡斯特拉斯堡德国化，就好像要想使加里波第的故乡尼斯法国化一样荒謬。但是在尼斯，路易-拿破侖至少还遵守了礼貌，他让兼并問題由投票来决定，——这一招成功了。撇开普魯士人有充分理由厌恶这类革命措施不談，——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某一个地方的人民群众要求归并于普魯士的事情，——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正是这里的居民比本来的法国人本身更一心一德地留恋法国。因此就赤裸裸地用暴力割了出来。这是对法国革命的一种报复行动；被夺走的正是由于革命才同法国融合为一的土地之一。

从軍事上来看，这种兼并肯定是有一定目的的。占領了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以后，德国就有了一道极其强固的防御綫。只要比利时和瑞士保持中立，法国人就只能在麦茨和佛日山脉之間的狭长地带采取大規模进攻行动，此外，科布伦茨、麦茨、斯特拉斯堡、美因茲还能形成世界上最坚固、最巨大的四边形要塞区。但是，这种四边形要塞区，像奥地利在伦巴第的四边形要塞区⁵³²一样，也是

一半处在敌人領土上,在那里充当鎮压居民的基地的。而且,为了使四边形的要塞区連成一气,就必须越出德語区,就必须兼并 25 万本来的法国人。

因此,战略上的巨大利益是唯一能够为兼并辯护的理由。可是,这种利益能不能比得上由此而遭到的損失呢?

年輕的德意志帝国由于公开而率直地宣布粗野的暴力是自己的基本原則而使自己在道义上遭到了巨大的損失,对于这种損失,这位普魯士的容克是不加考虑的。相反,他要的是倔强的、用暴力加以鎮压的臣民;他們是普魯士威力日益增强的证据;实际上他也从来没有什么别的证据。但是,他却不能不考虑兼并的政治后果。而这种后果是显而易見的。早在兼并在法律上生效以前,馬克思就在国际的一个通告中就兼并一事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亚尔薩斯和洛林的被兼并使俄国成为欧洲的仲裁人。⁵³³ 而且,在俾斯麦本人于 1888 年 2 月 6 日的帝国国会演說中向万能的沙皇——战争与和平的主宰訴苦,最終承认了这句话的真实⁵³⁴ 以前,社会民主党人也曾在帝国国会的讲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說过。

的确,这是非常明显的。由于从法国手中夺走两个狂热爱国的省份,于是就把法国投入了任何一个能給它带来收复这两个省份的希望的人的怀抱,并且使它变成了自己的永久的敌人。不錯,在这方面当之无愧地并且誠心誠意地代表德国庸人的俾斯麦,要求法国人不仅应当在国法上、而且应当在道义上放弃亚尔薩斯—洛林,甚至应当欢迎革命法国的这两个地区“重归故国”(尽管这两个地区根本不想这个故国)。然而,很遺憾,法国人并不这样做,正像德国人在拿破侖战争时期在道义上不放弃莱茵河左岸一样,虽然这一地区当时根本不希望回到德国人那里去。只要亚尔薩斯人

和洛林人要求回到法国，法国将力图而且必然力图重新得到他们，将寻找而且必然寻找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而包括寻找盟友。而它用来对付德国的天然同盟者就是俄国。

如果大陆西部的这两个最大最强的民族因彼此敌视而相互抵消，如果再加上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而使它们相互斗争，那末，从中得利的只有当时行动更加自由的俄国，——而俄国的侵略野心越是有指望从法国得到无条件的支持，它就越少受到德国方面的阻挠。俾斯麦难道不是把法国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也就是使它不得不乞求同俄国结盟，只要俄国答应使失去的省份归还它，它就一定甘愿把君士坦丁堡让给俄国吗？如果说，虽然如此，和平仍然已经维持了十七年之久，那末，这难道不只是由于法国和俄国实行的后备军制度要提供足数受过训练的每年的兵员至少需要十六年，而德国在最近实行改革以后甚至需要二十五年吗？亚尔萨斯—洛林被兼并是在最近十七年中支配着整个欧洲政治的因素，这种兼并在目前不也是以战争威胁着我们这部分世界的全部危机的主要原因吗？消除这一事实，和平就有保证！

那些说带有高地德意志语腔调的法语的亚尔萨斯资产者，混血种的纨绔子，一举一动比任何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还要法国化，他们瞧不起歌德，而醉心于拉辛，但终究摆脱不了自己出身于德国这样一种秘密的亏心事，正是这个原因才使他们以轻蔑的口吻妄谈德国的一切，以致从来不适于充当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调停人，——这些亚尔萨斯资产者诚然是些卑贱的家伙，不管他们是牟尔豪森的工厂主还是巴黎的记者。可是，使他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不正是最近三百年的德国历史吗？几乎所有侨外的德国人，特别是商人，不是在不久以前还都同亚尔萨斯人一样吗？他们否认自

己出身于德国，他們以一种真正的自我折磨的精神冒充着异邦的、自己新祖国的国籍，同时，像亚尔薩斯人那样自愿地把自己置于至少是同样的可笑境地，而亚尔薩斯人毕竟多少是由外界情况使然的。例如在英国，从1815年到1840年迁移到那里去的全部德国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英国化了，他們在自己人中間也几乎只說英語，直到今天，例如在曼彻斯特交易所里，还有不少老德国庸人在那儿跑来跑去，只要能把他們看成是地道的英国人，他們就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半财产。从1848年以来，在这方面才发生了变化，而从1870年起，当甚至預备役尉官也来到了英国，而且柏林把自己的部队派到那里去的时候，普魯士的高傲自大就代替了以往的卑躬屈节，这在外国同样把我們弄得很可笑。

难道从1871年起，同德国合并就使亚尔薩斯人更高兴一些嗎？恰好相反。他們被置于独裁統治之下，而邻邦法国却是实行共和制度的。在他們那里实行了煩瑣的、討厭的普魯土地方行政长官制度，而同这种制度比較起来，臭名远揚的法国行政长官的那种受法律严格調节的干涉制度还是可貴的。殘存的出版自由、集会和結社权很快就取消了，固执的市政委员会也解散了，德国的官僚被任命为市长。相反地，对于“名流”，即完全法国化了的貴族和资产者，却百般奉迎，他們对即使不亲德、但是說德語的农民和工人——他們构成了还能試图与之和解的唯一因素——的压榨却受到了保护。而这样做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得到的是：1887年2月，当整个德国受到恐吓，并且俾斯麦的卡特尔多数派被送进了帝国国会⁵³⁵的时候，亚尔薩斯—洛林选举了清一色的极端亲法派，而抛弃了哪怕有一点点同情德国人的嫌疑的人。

如果說，現在亚尔薩斯人是这个样子，那末我們有权对此大发

雷霆嗎？絕對沒有。他們厌恶兼并是一个历史事实，对这一事实应当加以解释，而不应当破口大罵。在这里我們应当問一下自己：德国要犯好多好大的历史罪过，才使亚尔薩斯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緒？如果企图使亚尔薩斯人重新德国化已經过了十七年，他們还异口同声地向我們大声疾呼：請不要對我們这样做吧，那末，我們的新德意志帝国从外面看上去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們是否有权設想，两次順利的战争和俾斯麦的十七年独裁就足以消除三百年的可耻历史的全部后果呢？

俾斯麦已达到目的。他的新普魯士德意志帝国已在凡尔賽路易十四的豪华宮殿里公开宣布成立。⁵³⁶ 法国无力地倒在他的脚下；他本人不敢碰一下的倔强的巴黎，被梯也尔挑动进行了公社起义，后来被遣返归国的前帝国軍队的士兵打垮了。所有欧洲庸人現在都贊揚俾斯麦，就像他們在五十年代贊揚他的原型路易·波拿巴一样。在俄国的帮助下，德国成了欧洲的第一个强国，而德国的全部权力都落到了独裁者俾斯麦手中。現在的問題是他能利用这种权力做些什么。如果說，他迄今为止虽然不是用資產阶级的手段、而是用波拿巴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資產阶级的統一計劃，那末現在，这个課題已大致完成了，現在应当制訂自己的計劃，应当表明他自己的头脑能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来。而这一点一定会在新帝国内部的建設中表現出来。

德国社会是由大地主、农民、資產者、小資產者和工人組成的；他們又分成三个主要階級。

比較大的地产都集中在少数富豪(特別是在西里西亞)和大量中等地主手中，后者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魯士各省最多。也正是这些普魯士的容克，在整个这一階級中或多或少地占着統治地位。

他們通过管事来經營自己的大部分地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本身是農業主，此外，他們往往又是土豆酒廠和甜菜糖廠的老板。他們的地產只要有可能就作為長子繼承的地產固定在家庭中。較小的兒子則參加軍隊或者擔任國家文職，因此，這種占有土地的小貴族還拖帶着一批更小的軍官貴族和官吏貴族，這些人還在不斷增加，因為從資產階級的較高級軍官和官吏中也產生出大批貴族。在這整個貴族族類的最底層，自然就形成了大量寄生貴族，即貴族的流氓無產階級，他們靠借債、賭博、耍賴、乞討和充當政治間諜過日子。整個這一幫人構成了普魯士的容克階級，成了舊普魯士國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可是，這個容克階級的占有土地的核心本身，是站得極其不穩固的。必須按照該等級的身分來生活，因而就使開支與日俱增；把年紀較小的兒子扶養到尉官和陪審官，給女兒陪嫁，所有這一切都得花錢；而由於這些義務是其他一切考慮都必須讓路的義務，因此，入不敷出以及訂立票據，甚至典當，也就不足為奇了。總而言之，這整個容克階級經常處於深淵的邊緣；各種災難，不管是戰爭、歉收或商業危機，都有使他們墮入深淵的危險；因此，一百多年來，他們只有依靠國家的各種幫助才免于滅亡，而且實際上只是由於有國家幫助才繼續生存下去，也就不足為怪了。這個只靠人工維持的階級是註定要滅亡的；任何國家幫助都不能使它長期生存下去。可是，這個階級一消失，舊的普魯士國家也就消失了。

農民是政治上不怎麼積極的因素。在他們本身是所有者的情況下，他們就日益遭到破產，這是由於被奪走了古老的公共馬爾克或公共牧場（沒有這種牧場，他們就無法餵養牲畜）的小農經濟這樣一種不利的生產條件造成的。在他們是佃農的情況下，他們的

状况就更糟。小农生产主要以自然经济为前提，在货币经济下它是要灭亡的。因此，债务越来越多，他们大批被抵押债权人剥夺，不得不借助家庭手工业以求不致完全被赶出自己的一块土地。在政治方面，农民多半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反动的：在莱茵河地区，由于对普鲁士人怀有旧恨，他们是教皇至上派；在其他地区，他们是分立派，或者是新教的保守派。宗教感情仍然是这一阶级的社会利益或政治利益的表现。

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谈过了。自 1848 年起，它经历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德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了 1847 年商业危机以后由于当时海洋轮船航运业的创立、由于铁路的大规模扩建以及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而引起的巨大的工业发展。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渴望消除由小邦造成的交往阻塞状态，渴望在世界市场上同它的国外竞争者争得同等地位，才引起了俾斯麦的革命。这时，由于法国的数十亿金钱涌入德国，在资产阶级面前便展现了一个狂热地从事企业活动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它通过全德范围内的破产⁵³⁷第一次证明了：它是一个伟大的工业民族。它当时在经济上已经是居民中最强大的阶级；国家必须服从它的经济利益；1848 年革命使国家具有了外表上的宪法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同样在政治上进行统治并扩大它的这种统治。尽管如此，它离实际的政治统治仍然很远。在同俾斯麦的冲突中，它并没有取得胜利；冲突是通过从上面实现德国革命的办法消除的，这就更清楚地向它表明了，行政权这时至多也只是非常间接地依附于它的，它既不能撤换大臣或任命大臣，也不能支配军队。而且，它在强有力的行政权面前是胆怯而又软弱的；但容克也是这个样子，并且资产阶级由于同革命的产业工人阶级有着直接的经

济对立，所以它比起容克来还有更多的理由。可是不容置疑：它必然要在經濟上逐步消灭容克階級，在一切有产階級中，它是唯一有前途的階級。

組成小資產階級的首先是中世紀手工业者的殘余分子，这种人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德国要比西欧其他国家多得多；其次是沒落的資產者；再其次是无产居民中上升为小商人的分子。随着大工业的扩展，整个小資產階級的生存已丧失了最后的一点点稳定性；职业的改变和周期性的破产已成了常規。这个曾經构成德国庸人基本核心的、过去非常稳定的階級，現在已不像先前那样滿意、温順、卑屈、虔誠和体面了，它已陷入了茫无前途、对上帝給它决定的命运感到不滿的状态。手工业者的殘余分子大叫大喊要恢复行会特权，其他人則有一部分已变成了温和的民主进步党人⁵³⁸，有一部分甚至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并且在有些地方直接参加了工人运动。

最后是工人。农业工人，至少德国东部的农业工人仍然处于半农奴状态，这些工人是不能算数的。相反，在城市工人中間，社会民主党已得到了迅速的进展，而且随着大工业使人民群众无产階級化从而使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階級对立极度尖銳而日益发展。即使社会民主党工人在一定时期內还分裂成两个相互斗争的党⁵³⁹，但是从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以来，两个党之間的原則性对立几乎已完全消失了。正統拉薩尔主义及其想“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特殊要求，已漸漸消声匿迹，并已日益证明自己沒有力量建立一个波拿巴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核心。个别领导人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損害，已由群众的健全嗅觉弥补了。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的联合，还受到差不多完全是个人問題的

阻撓,而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实现的。但即使是在分裂时期,并且尽管是发生了分裂,运动还是足够强大的,因而使工业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并且麻痹了资产阶级对还不依赖它的政府所作的斗争。其实,德国资产阶级自1848年以来就已经不能摆脱赤色幽灵了。

这种阶级划分,就是议会和邦议会中党派划分的基础。大地主和一部分农民构成了保守党人⁵⁴⁰;工业资产阶级构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右翼——民族自由党⁵⁴¹,而它的左翼——被削弱的民主党或所谓进步党,是由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工人支持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最后,工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政党——社会民主党,加入这个党的也有小资者。

一个处于俾斯麦地位、并有俾斯麦的过去经历的人,如果对事态有一些了解,他就一定会对自己说:像当时那个样子的容克阶级是一个没有生存能力的阶级;在一切有产阶级中,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希望有前途(我们在这里且不谈工人阶级,我们并不想要求俾斯麦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他越是让他的新帝国逐步过渡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帝国的生存就越是有可靠的保证。我们决不会要求他去做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做的事情。立即过渡到使帝国国会拥有决定性权力(类似英国下院所拥有的那种权力)的议会制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甚至是不明智的;议会形式的俾斯麦独裁,对他本人来说,在最初肯定还是必须实行的;我们绝不责备他在最初保持了这种独裁;我们只问:应当利用独裁达到什么目的。可以不必怀疑的是:奠定一种同英国宪制相当的制度的基础,是唯一的一条有希望保证新帝国拥有巩固的基础和得到平静的内部发展的道路。他的容克阶级中大部分是无法挽救的了;让这一部分遭到面临的灭亡的命运之后,看来仍然有可能从其余一部分

和新的分子中組成一個獨立的大地主的階級，這一階級本身將僅僅是資產階級的裝飾品；而資產階級甚至在擁有充分權力時也一定會使它在國家中享有代表職位，同時還一定會使它享有各種肥缺和很大的勢力。如果向資產階級做出了反正不能長期拒絕做出的政治讓步（至少從有產階級的观点出發應當如此判斷），向它慢慢地、甚至一点一滴地做出這些讓步，至少能把新帝國引上這樣一條道路：使它可以趕上在政治上遙遙領先的西歐其他國家，最終擺脫封建主義的最後殘余，擺脫那種在官僚當中仍然很盛行的庸人傳統，最主要的是使它可以在那些決不算年輕的締造者們嗚呼哀哉之前站得住腳。

況且，做到這一切根本不是怎麼困難的。無論是容克或者是資產者，甚至連平平常常的毅力都沒有。容克在最近六十年来已证明了這一點，在這六十年中，國家經常不顧這幫唐·吉訶德的反對而實行有利於他們自己的措施。從漫長的歷史中也習慣於讓步的資產階級，在衝突以後余痛猶深；從此以後，俾斯麥的成就更挫敗了它的反抗力量，而它由於害怕越來越有威脅性的工人運動，更是什麼都談不上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實現了資產階級民族願望的人，在實現它的一般說來並不高的政治要求時，是不難保持合乎他心意的任何一種速度的。他只要認清目的就行了。

從有產階級的观点看來，這是唯一合理的道路。從工人階級的观点看來，要建立牢固的資產階級統治顯然已經太晚了。在德國，大工業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在這樣的時候形成的：無產階級已經能夠幾乎與資產階級同時獨立地走上政治舞台，因而，這兩個階級的鬥爭早在資產階級爭得獨占的或主要的政治權力以前就已開始了。可是，即使在德國實行平靜的和巩固

的資產階級統治已經太晚，但在 1870 年，从一般有产階級的利益出发，向这种資產階級統治迈进仍然是最好的政策。的确，只有这样做才能肃清繼續盛行于立法和行政部門的腐朽封建主义时代的大量殘余；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成果逐步地移植到德国的土地上来，簡言之，只有这样做才能剪掉德国的过长而又过时的辮子，才能有意識地、最終地把它引上現代发展的道路，才能使它的政治状况适应于它的工业状况。以后，一旦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斗争終於发生，它至少会在正常的环境中进行，在这种环境中，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种斗争是为了什么，而不像我們 1848 年在德国所看到的，是在一片混乱、模糊不清、利益混杂、茫然失措的状态中进行的。区别只在于：这一次将只有有产者感到茫然失措；工人階級知道自己要求什么。

在 1871 年德国的形势下，像俾斯麦这样一个人实际上就不得不在各階級之間采取一种随风轉舵的政策了。这一点是无須責难他的。問題仅仅在于：这种政策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如果这种政策，不管采取的速度如何，但却是有意識地、坚定地走向建立最終的資產階級統治，那末，在根据有产階級立場而实行的政策一般所能做到的范围里說，它就是同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如果这种政策是走向保持旧普魯士国家，走向使德国逐步普魯士化，那末它就是反动的，是注定要遭到最后失败的。如果这种政策仅仅走向保持俾斯麦的統治，那末它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政策，其結局必然同任何波拿巴主义一样。

* * *

最近的任务就是帝国宪法。作为材料，一方面有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另一方面有同德国南部各邦簽訂的条約。⁵⁴² 俾斯麦制訂

帝国宪法时所倚重的因素，一方面是在联邦会议中有代表的各个王朝⁵⁴³，另一方面是在帝国国会中有代表的人民。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条约，已经给各王朝的要求设下了一定的范围。相反，人民却要求大大增加自己在政权中所占的一份。人民已经在战场上争得了不受外来干涉的独立和统一（在能谈到这一点的范围内）；正是人民首先要决定应当怎样利用这种独立，应当怎样具体地实现并利用这种统一。即使人民承认了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条约中的法制基础，那也丝毫不妨碍他们在新宪法中享有一份比在以往宪法中更大的权力。帝国国会实际上是体现了新“统一”的唯一机关。帝国国会说的话愈有分量，帝国宪法愈摆脱各邦宪法的牵制，新帝国就一定会团结得愈紧密，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普鲁士人就一定愈溶化于德国人。

对于每一个不光看到自己鼻子的人来说，这一点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但俾斯麦不这样想。相反地，他却利用战后盛行的爱国狂热来诱导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不仅不去扩大人民权利，甚至不去明确规定人民权利，要他们只限于在帝国宪法中简单地重复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条约中的法制基础。各个小党想在宪法中表现人民自由权的种种企图都遭到了拒绝，甚至天主教中央党提出要把普鲁士宪法的条文——保障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教会独立的条文——列入宪法的提议也遭到了拒绝。可见，普鲁士宪法尽管受到了双重、三重的限制，但比帝国宪法还是多一些自由主义的色彩。捐税不是每年进行表决，而是由“法律”一劳永逸地规定下来，因而，帝国国会就被剥夺了拒绝纳税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德国以外的立宪世界无法理解的普鲁士理论，就运用到德国来了，根据这一理论，人民代表只有权在纸面上否决支出，而政府却以现金

的形式把收入装进腰包。可是，当帝国国会这样剥夺了最好的权力手段，并被降到普魯士議院——那个被 1849 年和 1850 年宪法修改⁵⁴⁴、曼托伊費尔作风、宪法冲突和薩多瓦所摧毁的普魯士議院——的屈辱地位的时候，联邦會議基本上却享有旧联邦議会在形式上所占有的种种绝对权力，并且是实际上享有这种权力，因为它身上已解除了那些束缚联邦議会的桎梏。联邦會議不仅在立法上同帝国国会一起拥有决定权，而且它也是最高的行政机关，因为它可以頒布实施帝国法律的細則，此外，它还可以对“实施帝国法律时所产生的缺点……”做出决定，即对在其他文明国家只有用新法律才可以纠正的缺点做出决定（第七条第三款，这一条看起来很像法律学中的詭辯）。

可見，俾斯麦并不是在代表民族统一的帝国国会中给自己寻找主要支柱，而是在代表分立主义分裂的联邦會議中给自己寻找主要支柱。虽然他也装扮成民族思想的代表者，但是并没有勇气真正站在民族或它的代表者的前列；民主应当为他服务，而不是他为民主服务；与其說他依靠人民，不如說他依靠幕后的阴谋，依靠那种巧妙使用外交手腕、依靠糖餅和鞭子在联邦會議中拼凑即使是不大听话的多数派。这里向我们暴露出来的短浅目光和卑劣观点，是完全同我们迄今所认识的这个人的性格相吻合的。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到奇怪：他的巨大成就竟没有使他哪怕暂时升高到超出他本人的水平。

但是，实际情况却使问题归结为：使全部帝国宪法具有一个唯一的稳固的轴心——一个帝国首相。联邦會議应当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这种地位使其他责任行政权成为不可能，可能的只有帝国首相的责任行政权，因而使帝国责任大臣无法存在。实际上，想通过

任命責任內閣來調整帝國行政的任何企圖，都被看成是破壞聯邦會議權利的行為，都遭到了無法克服的反抗。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憲法是“按照”俾斯麥的“身段剪裁”的。憲法是向實行他的個人統治的道路上更邁進了一步，這種統治是通過平衡帝國國會中各政党的力量、平衡聯邦會議中分立主義各邦的力量來實現的，——即在波拿巴主義道路上更邁進了一步。

不過，不能說，新的帝國憲法——除開向巴伐利亞和維爾騰堡所做的個別讓步以外——是一個直接的退步。但這也就是對它所能說的最好評語了。資產階級的經濟需要基本上得到了滿足，而它的政治要求——只要它還提出——卻受到了像在憲法沖突時期的那種阻礙。

只要它還提出政治要求！實際上也不能否認，這類要求在民族自由黨手中已縮小到十分可憐的程度，而且還在一天天縮小。這班老爺們不僅不去要求俾斯麥做到使他們便於同他合作，反而一有可能就力圖迎合他，甚至沒有可能或者不能容許的時候也常常這樣做。俾斯麥瞧不起他們，這一點沒有一個人能歸罪於他，——他的容克們難道就更好一些、更丈夫氣一些（哪怕是一絲一毫）嗎？

另一個應當體現出帝國統一的領域——貨幣流通領域，已經用1873—1875年的貨幣法和銀行法作了整頓。實行金本位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實行得很緩慢和搖擺不定，一直到今天還沒有最後鞏固下來。已採用的幣制——以三分之一塔勒為一個十進位的單位，取名馬克，作為這種幣制的基础——是澤特貝爾在三十年代末提出的；實際上貨幣單位是二十金馬克的金幣。把它的價值稍微變換一下，就能使它或者同英國的金鎊、或者同二十五個金法郎、或者同五個金美元完全等值，因而就同世界市場上三大幣制之

一发生了联系。大家都宁愿建立独特的币制，从而就给贸易和兑换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帝国国库券法和银行法，限制了各小邦和各小邦银行的证券投机活动，而且，由于这时发生了危机，这些法律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谨慎态度，这种态度是完全适合在这一领域内还缺乏经验的德国的。在这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整个说来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

最后，还应当司法方面实施协同一致的立法。德国各中等邦为反对把帝国权限也扩展到实质性的民法方面去所进行的反抗，已被克服了；但民法典仍然处在草拟的过程中，而刑法典、刑事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商业法、破产条例以及审判制度已经统一地制订出来。消除各小邦形式上的和实质性的各种各样法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前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而新法律的主要功绩也就在于消除上述法规，——它们的内容的功绩倒是小得多。

英国法学家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法的历史，这种历史经历了中世纪，它拯救了很大一份古日耳曼人的自由，它不知警察国家为何物（这种国家在萌芽状态中就被十七世纪的两次革命扼杀了），它在两百年来公民自由的不断发展中达到了最高峰。法国法学家所依据的是大革命，这一革命在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和专制的警察专横以后，把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在拿破仑颁布的它的经典法典中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而我们德国法学家所依据的历史基础是怎样的呢？无非是延长了数世纪之久的、被动的、大部分由外来打击所推动的、至今还没有完成的那种中世纪残余的瓦解过程；无非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封建容克和行会师傅像幽灵一样在徘徊，在寻找新的躯体；无非是这样一种法律秩序，这种秩序，即使君主们的秘密司法在 1848 年

已被消灭，但警察专横还是一天天在它上面打开缺口。新帝国法典的編纂者，就是从一切坏学校中的这个最坏的学校毕业的，他們的大作也恰好与此相称。撇开純司法方面不談，政治自由在这类法典中是很受約束的。如果說，陪审員法庭⁵⁴⁵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拥有了参与压制工人阶级的手段，那末，国家則尽量利用限制陪审員法庭的办法使自己不致遭到资产阶级反对派复兴的危险。刑法典的政治条款往往是模稜两可、含糊不清的，就好像这些条款是按照当前帝国法庭的身段剪裁的，而这种法庭又是按照这些条款的身段剪裁的一样。新的法典对普魯士法來說是一个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像普魯士法这样一种令人討厭的东西，在今天就連施特克尔也搞不出来了，即使給他行割礼他也搞不出来。可是，迄今一直实施法国法律的各省，却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褪了色的复制本和經典原本之間的区别。正是由于民族自由党背离了自己的綱領，所以才有可能使国家暴力靠牺牲公民自由这样加强起来，才有可能造成这第一个真正的退步。

还应当提一下帝国出版法。刑法典基本上已規定了与此有关的实质性法律。因此，給整个帝国做出划一的、形式上的規定，并且清除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的保证金和印花稅，就成了这一法律的主要内容，同时，这也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唯一进步。

为了让普魯士能再一次证明自己是模范国，于是就在那里实行了所謂自治。任务是要肃清可恶的封建主义残余，同时实际上尽可能使一切原封不动。县組織法 [Kreisordnung] 便是为此服务的。⁵⁴⁶ 容克老爷們的領地警察权已經成了一种时代錯誤。它作为一种封建特权在名义上是被废除了，但在实际上又由于建立了独立的領地区 [Gutsbezirke] 而恢复了，在这里，地主或者亲自担任拥

有乡长[ländlicher Gemeindevorsteher]权力的領地区长[Gutsvorsteher],或者任命这种領地区长;此外,也是由于把区[Amtsbezirk]的全部警察权和警察裁判权都交給了区长[Amtsvorsteher],这种区长在农村中自然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大地主,从而乡也处在他們的监督之下。单个人的封建特权被废除了,但是与这种特权相联系的无限权力却轉到了整个階級手里。通过类似的魔法,英国大地主变成了治安法官,变成了农村行政机关、警察机关和下級司法机关的主人,从而使自己在現代化的新称号下繼續享有各种重要的、但用旧的封建形式已无法維持的权力地位。然而,这是英国“自治”和德国“自治”之間的唯一相似之处。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英国大臣敢于在議會中提議:被选出的乡鎮官吏应当經過批准,在选举不适当的情况下由政府强制任命代替者,設置拥有普魯士县长、专区政府[Bezirksregierungen]委員和总督那种权力的国家官吏,行使那种由县組織法規定的行政管理机关有干預乡鎮、区和县的内部事务的权利,甚至提議采取在操英語和实施英国法律的国家聞所未聞的禁止訴諸法律保护的措施,像在县組織法的每一頁上几乎都可以发现的那樣。所以,县議會和省議會仍然按照旧的封建方式由三个等級——大地主、市和乡的代表組成,而在英国,甚至一个最保守的内閣也提出了一項法案,把各郡的全部管理权移交給了几乎按照普选制选出的机构。⁵⁴⁷

东部六个省的县組織法的議案(1871年)是第一个征兆,它表明,俾斯麦决不打算让普魯士溶化于德国,相反地,他是想更加强东部这六个省,即旧普魯士制度的巩固堡垒。容克們还是保留了一切重要的权力地位,不过把名称改变了一下,而德国的奴隶們,这些地区的农业工人——雇农和短工,却依然像过去一样实际上

处于农奴地位，只准他們参加两种公共活动：当兵和在帝国国会选举时充当容克的一帮盲目投票者。俾斯麦这样做，給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帮的忙是无法形容的，是值得万分感謝的。

但是，对容克老爷們的蠢举能說些什么呢？他們竟像嬌生慣养的孩子一样，拳打脚踢地反对这一专门为了他們的利益、为了繼續保持他們的特权（只是稍使名称現代化一番而已）而制訂的县組織法。普魯士的貴族院，或者更确切些說，容克院，最初否决了这个几乎整整拖了一年的議案，而在用二十四名新“老爷”来“革新貴族院”以后才通过了該議案。在这里，普魯士的容克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小气的、頑固的和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他們不能像英国大地主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形成一个能够在民族生活中起历史作用的独立大党的核心。因而，他們便证明了自己完全沒有头脑；俾斯麦也只好向全世界表明，他們同样还完全沒有性格。一种稍微巧妙的压力就把他們变成了 sans phrase〔赤裸裸的〕俾斯麦党。“文化斗争”就是要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实现了普魯士德意志帝国計劃，必然使一切以旧日的单独发展为凭借的反普魯士分子联合成一个政党，以作为反击。这些形形色色的分子，在教皇至上主义⁵⁴⁸中找到了一面共同的旗帜。由于常人理智（甚至是无数正統天主教徒的常人理智）对教皇永无謬誤这一新教条的反抗，另一方面又由于教皇国被取消和教皇在羅馬遭到所謂監禁⁵⁴⁹，就迫使天主教的一切勇于战斗的力量更紧密地結合在一起。于是，还在战争期間，即1870年秋天，在普魯士邦議會中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天主教中央党；它只有五十七个人进入1871年第一届德意志帝国国会，但每經一次选举都有所增加，最后超过了一百个人。它是由十分复杂的分子組成的。在普魯士，

它的主要力量是那些仍然把自己看做“出于无奈的普魯士人”的萊茵小农，此外还有威斯特伐里亚的閔斯德主教管区和帕德波恩主教管区的天主教大地主和农民以及天主教的西里西亚人。它的第二支大队人馬，是由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徒特别是巴伐利亚人組成的。可是，中央党的力量，与其說在于天主教的宗教，不如說在于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目前要求統治德国的道地的普魯士制度的反感。这种反感在天主教地区表現得特別强烈。同时，在那里还可以感到对現在被逐出德国的奥地利的同情。同这两种流行的情緒相适应，中央党采取了坚决的分立主义和联邦主义的立場。

中央党的这种基本上是反普魯士的性质，很快就被帝国国会中其余小党团觉察出来了，这些小党团是由于地方性的原因——不是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出于民族性质和一般性质的原因——而反对普魯士的。不仅信奉天主教的波兰派和亚尔薩斯派，甚至还有信奉新教的韦耳夫派⁵⁵⁰，都同中央党結成了紧密的同盟。即使各資产階級自由主义党团从来沒有弄清所謂教皇至上派的真正性质，但他們仍然表明了，他們对真正事态有一定了解，因为他們把中央党叫做“沒有祖国”和“敌視帝国”的党……^①

① 手稿到此中断。——編者注

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序言草稿

本书是我的“欧·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一部分的再版，它包括了在该书中题为“暴力论”⁵⁵¹的三章。这三章早先已被译成俄文而单独出现，作为附录收在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⁵⁵²一书俄文版中。这一版只做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但对于单独出版来说，必须再做特别的增补。

既然我是用德文出版一本以“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为题的小册子，德国读者就有权要求我不隐瞒我对近三十年来暴力在本国历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的想法。因此，我增加了一个第四章，这一章当然只能就主要的历史关节做些阐述。或许以后我能有机会更详细地论述这个题目吧。

写于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1895—1896年
“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22期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第四章提綱

(1) 1848年。[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意大利,德国,波兰,匈牙利。

(2) 波拿巴明目张胆的征服政策: 民族要求与补偿相交换。意大利。

(3) 作为回答——[普魯士]军队的改組。冲突。俾斯麦。政策不新奇。

(4) 德国局势。統一: (1) 由革命实现, (2) 由奥地利实现, (3) 由普魯士实现(关税同盟)。

(5) 1864年和1866年的战争。各种革命手段。

(6) 俾斯麦的好时光——1870年以前。

(7) 对法战争。^① 帝国。对亚尔萨斯—洛林之兼并。俄国——仲裁者。

(8) 俾斯麦终于成为反动分子, 愚蠢了。文化斗争(非宗教的婚姻)。保护关税政策及大地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殖民狂

① 此处还有恩格斯写在同一頁上后又划掉的(看来是他在写作中使用过以后划掉的)簡記: “1. 作战方法。軍稅。自由射手。[窃取]挂钟。杖罰。容克的报复的殘酷性——从上层到下层。——2. [第二]帝国之傾覆。——3. 向巴黎致敬! 4. 数十亿和亚尔萨斯—洛林。”——編者注

热。对俾斯麦的侮辱。——反社会党人法。⁵⁵³——对联合会的压制。——社会改革。——因兼并亚尔萨斯而产生的軍国主义。——容克[在俾斯麦身上]突出到首位,因为缺乏其他思想。

写于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
恩格斯文庫”1948年版第10卷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第四章結束部分提綱

- I. 三个阶级：两个卑鄙齷齪，其中一个在衰落，一个在兴起；第三个是只要求资产阶级要 fairplay [光明正大地办事] 的工人。因此，在这后两个阶级之间随风转舵是合适的——可是办不到了！政策是：加强整个国家暴力，特别是使财政独立（铁路国有化，专营）。警察国家以及司法中的普鲁士法制原则。

1848 年的两重性质——“自由主义的”和“民族的”性质，也在 1870—1888 年的德国显示出来。

俾斯麦不得不依靠帝国国会和人民，为此，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必须完全自由，哪怕是定个方向。

- II. 1. 建设[帝国]
- a. 经济上——恶劣的币制改革已经是主要成就。
 - b. 政治上——警察国家的再建和 1876 年的反资产阶级的审判法，法国审判法的恶劣抄本。——民法典的不确定。——帝国法庭是最后一环。1879 年。

2. 在献媚政策和侮辱俾斯麦[案件]中所表現的思想貧乏。

sans phrase [十足的]俾斯麦党。

3. 濫設企业的狂热和破产。他的参与。卑鄙齷齪的保守的容克同资产者一样无耻。

4. [俾斯麦]完全变成了容克。

a. 保护关税等等; 资产者和容克的联合, 后者得到最大份額。

b. 1882 年实行烟草专卖的尝试遭到失败。

c. 殖民狂热。

5. 波拿巴式的社会政策。

a. 反社会党人法; 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儲蓄会遭迫害。

b. 社会改革之类的粪便 [Sozial-reformscheisse]。

III. 6. 对外政策。战争的危險, 兼并的結果。軍队的扩充。七年期限法⁵⁵⁵。把各期应征人員完全征集起来以后, 再把 1870 年以前的适龄人員也征集起来, 以便再保持一个时期的优势。

IV. 結果: a. 这两个人^①一死国内大势就会陷于瓦解状态: 沒有皇帝的帝国是沒有的! 无产階級被逼上革命道路, 社会民主党随着反社会党人法的废止而空前壮大, ——混乱。

① 俾斯麦和皇帝威廉一世。——編者注

b. 这一切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比战争还要坏的和平,不然就是世界大战。

写于 1887 年 12 月底—1888 年 3 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 1895—1896 年
“新时代”杂志第 1 卷第 26 期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美国旅行印象⁵⁵⁶

我們通常都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東西而远远超过了我們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現代的人們根据現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則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人也总是竭力使我們相信这种看法。他們瞧不起我們，认为我們是迟疑的、带有各种陈腐偏見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实际的人；而他們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 (the most go ahead nation)，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純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馬上进行試驗，这个方案一旦被認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諸实行。在美国，一切都應該是新的，一切都應該是合理的，一切都應該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跟我們不同。

在“柏林号”輪船上，我第一次遇到一大群美国人。他們大多数是很可爱的人，有男有女，比英国人容易接近，有时談吐过于直率一些，而在其他方面，就跟任何地方穿着較好的人們差不多。他們的特点至多是一种独特的小资产阶级的姿态，这不是畏首畏尾、缺乏自信的德国小资产者的姿态，也不是英国小资产者的姿态；这种姿态由于同十分自信的举止結合，由于好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東西，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天性。年輕一些的女人尤其給人一

种天真的印象，这在欧洲只有在小一些的城市里才可以看到。当她们手挽着手或者挽着男子的手臂，精神饱满地、几乎是横冲直撞地走在甲板上的时候，她们那种跳跳蹦蹦的步子，她们那种一阵风吹来便正正经经地按住裙子的姿态，都同我们的农村姑娘一模一样。她们老是使我想起瑞典女人，——她们和瑞典女人一样健壮高大，——我也总是觉得，她们随时准备向人行礼请安，就像瑞典女人所做的那样。我的美国旅伴们也继承了一点日耳曼种族所固有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笨拙，还完全没有克服掉。总之，我对美国人的第一个印象无论如何说明不了他们对欧洲人的民族优越性，也无论如何说明不了他们是一个崭新的、年轻的民族典型。相反地，我倒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是仍然顽固地坚持着继承下来的、在欧洲被认为是过时了的小资产阶级习惯的人；在这方面，我们欧洲人同美国人相比，就跟巴黎人同外省人相比一样。

在纽约，当我第一次走进我的卧室的时候，我发现了什么呢？令人想像不到的最老式的家具，带铜环或弓形拉手的抽屉柜，这在本世纪初是很时髦的，在欧洲只有农村里还保存着；紧挨着的是一些比较新式的英国或法国用具，不过也已经相当陈旧了，而且大部分都摆得不是地方；最新的东西是一张巨大的摇椅，摇动起来弧形有二百四十度，这也是过了时的。到处都是这样；椅子、桌子和衣橱，大部分看来都像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纽约街上的马车也是旧式的，乍看起来，好像这种式样的马车在欧洲任何一个农家的院子里都找不到。当然，如果再靠近一点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种马车是大大改进了的，很舒适，装有很好的弹簧，特别轻便，而且是用特别结实的木料制成的，尽管有这一切改进，旧的形式却仍然没有动。伦敦在四十年代初期还有出租马车，旅客从后面上车，在左

右两边面对面地坐着，像在公共馬車里一样；1850年以后，这种馬車就絕迹了。而在波士頓，这种带輪子的厢子今天还很盛行——就我所知，波士頓是实际上还在用出租馬車的唯一的美国城市。設備豪華、房間数以百計的現代美国旅館，从它們純粹美国式的布局中可以看出：它們是从人烟稀少的地方的偏僻的农民住戶演变来的，而这些农民住戶，就是在今天，还偶尔收費供給旅客食宿（这我回头再談）。由此可見这些旅館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我們看来，不仅是奇怪的，而且簡直是太不合时宜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凡是想尝一尝三十年战争时期在欧洲旅行的滋味的人，都应该到美国随便哪个山区去一趟，旅行到铁路綫的終点，再从这里坐乡間馬車到野外去。我們四个人就这样到阿德朗达克山脉去游覽了一次，我們从来也沒有像坐在这輛馬車的頂上那样哈哈大笑过。一輛样式无法形容的旧的破馬車，有名的古代普魯士拖車跟它比起来，就像是豪華的轎式馬車了，車頂上和車廂里有六个或九个那样的坐位，这就是所謂馬車。还有那公路，对不起，那簡直不是公路；我們也很难管它叫路：上山和下山，有两道車輪走过的痕迹深深陷在沙质的粘土里……①

写于1888年9月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40年第1版第28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譯的

① 手稿到此中断。——編者注

附 录

格·亞·洛帕廷給瑪·尼· 奧沙尼娜的信的片断⁵⁵⁷

1883年9月20日于倫敦

……我不能不把我和恩格斯初次会晤的結果告訴您，因為我想他的一些意見會使您感到愉快的。

我們談了很多俄國的事情，談了我們的政治復興和社會復興的事業大概將怎樣進行。果然不出所料，觀點是極其近似的；我們往往說出了對方所想的和要說的話。他也認為（同馬克思一樣，也同我一樣），目前俄國的革命黨或行動黨的任務並不在於宣傳新的社會主義的理想，甚至也不在於力圖借助於我們的同志組成的臨時政府來實現這個還遠遠沒有制定的理想，而在於調動一切力量，（1）或者迫使沙皇召開國民代表會議，（2）或者用威吓沙皇等辦法來造成深刻的混亂，這種混亂會用另一種方式導致國民代表會議或類似的會議的召開。同我一樣，他相信，這樣的會議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激進的改造，不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會的改造。他相信選舉時期的重大意義，這就是說，宣傳的成效是一切小冊子和湊近耳朵講不能比的。他認為，純粹自由主義的憲法，不要深刻的經濟改造，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怕這種危險。他相信在人民生活的實際情況中已經為在新的基礎上改造社會積累了足夠的材料。當然，他不相信共產主義或其他類似的東西會馬上實現，而只是相

信，在人民的生活和心灵里已經成熟了的東西會馬上實現。他相信人民會給自己找到善于表达自己的需要和願望等等的人。他相信，這種改造或革命一旦開始，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住它。因此，重要的只有一點，即摧毀致命的停滯力量，立即使人民和社會擺脫因循守舊的狀況，製造一種混亂，這種混亂將迫使政府和人民從事內部改造，將掀動平靜的人民的海洋，引起對全面的社會改造事業的全民注意和全民熱情。而結果會自然而然出現，而且出現的那些結果，恰恰是在這個時代可能的、合乎願望的、可以實現的。

所有這一切我寫得太簡單了，但是我現在不能寫得更詳細一些。況且所有這一切對您也許不完全合意，所以我要趕快把他稱贊俄國革命黨的其他意見一字不差地轉告您。這些意見是：

“現在一切都取決於最近的將來在彼得堡所要做出的事情，整個歐洲一切有思想、有遠見和有觀察力的人們的眼光現在都集中到了彼得堡。”

“俄國是本世紀的法國。新的社會改造的革命首倡權理所當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屬於俄國。”

“……沙皇制度的滅亡，將消滅歐洲君主制的最後堡壘，消除俄國的‘侵略性’，消除波蘭對俄國的仇恨以及其他許多事情，這樣就會導致列強的完全另外的組合，會把奧地利碰得粉碎，並且會在各國有力地推進內部改造。”

“……德國未必敢利用俄國的混亂來把自己的軍隊開進俄國去支持沙皇制度。但是假如德國這樣做了，那會更好。這就會是它的現政府的滅亡和新时代的開始。把波羅的海沿岸各省歸併于它是沒有意義的和實現不了的。這樣強占對面的(?)或毗鄰的狹窄沿海地區和小塊土地的行為，以及由此而出現的荒謬的國家形

式，只有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才是可能的，而不是在現在。況且德国人在那里是微不足道的反动的少数，这对誰也不是秘密。”（我为 Ю. П. 加上这一点，因为她对这一点有极端爱国的意見。）

“我也好，馬克思也好，都认为委员会給亚历山大三世的信⁵⁵⁸，从其策略和心平气和的口气上来看是非常出色的。它证明，在革命者的队伍中間，是不乏具有政治才智之士的。”

这一切使您感到相当滿意和愉快嗎？您感謝我写的这些話嗎？但愿如此。記得否我曾說过，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嗎？恩格斯說，在布魯斯、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爭的时期，馬克思曾笑着說：“我能說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馬克思主义者！**”⁵⁵⁹.....

第一次載于 1893 年 3 月在日內瓦出版的“理論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一书

俄文譯自“理論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

1849 年的五月起义⁵⁶⁰

1849 年 5 月席卷了莱茵各省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是由于大部分小邦政府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而引起的。这个国民议会从来没有掌握过物质力量，更糟的是，它不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自己有这种力量；到它起草完不过是一纸空文的宪法的时候，它已经失去最后剩下的一点道义的影响。宪法虽然蒙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但仍然是唯一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可以团结起来，设法开始新的运动，尤其是因为某些人根本不打算在胜利后实现它。

5 月 3 日在德勒斯顿开始了起义；几天之后扩展到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和巴登大公国。大公^①看见军队与人民联欢，便慌忙逃走了。

1848 年 11 月镇压了革命运动的普鲁士政府，解除了柏林的武装，在普鲁士实行戒严，并且充当其他各邦政府的保护人。它连忙派兵到德勒斯顿，经过四天的战斗，摧毁了起义者的英勇反抗。

但是要使普法尔茨和巴登公国屈服，还需要军队；普鲁士为了组成军队不得不征召后备军。在伊塞隆（威斯特伐里亚）和爱北斐特（莱茵普鲁士），后备军兵士拒绝出动。军队派去了。这两个城

^① 列奥波特。——编者注

市筑起街垒自卫，拒绝军队入城。伊塞隆经过两天战斗以后才被占领。爱北斐特没有足够的物力来抵抗，几达一千人的起义者决定突破包围的军队，冲向起义处于高潮的南部。他们被击溃了，指挥官米尔巴赫被俘。但是很大一部分起义者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到达了南部。恩格斯当时是米尔巴赫的副官，但是米尔巴赫在实现他的计划之前就委派他到普军控制的科伦去了。这是因为米尔巴赫不愿意有一个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在他的队伍中，以免吓坏他所指望通过的地区的资产阶级。

这时起义扩展到了整个德国南部，但是革命者犯了一个与1871年在巴黎一样的致命的错误，即没有转为进攻。邻近小邦的军队士气消沉，正在寻找参加起义的借口：他们决定不与人民为敌。起义者本来可以宣布去解放被普军和奥军包围的法兰克福议会，从而发动这些邦的居民，并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被封后前往曼海姆，建议起义军领导者向法兰克福推进。他们的意见被拒绝了。借口是：军队由于旧军官逃跑而瓦解，弹药不足，等等。

当起义者持枪观望的时候，普军开始了强行军，进攻起义地区，这时他们已经联合了巴伐利亚军，并且靠小邦军队得到加强，这些军队只要起义者大胆行事本来是可以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36 000名反革命军队在一星期内清除了占领着普法尔茨的八九千名起义者；应该指出，普法尔茨的两个要塞本来就在反动势力手中。革命军的队伍里现在只有巴登的武装力量，包括约10 000基干部队和12 000名志愿兵。发生了四次大会战，反革命军队得以取胜只是由于数量上占优势和破坏了维尔腾堡的边界，这就使他们在决定性关头迂回了革命军。在开阔地上进行六个星期的战斗

之后,起义軍殘部被迫退入瑞士。

在这次最后的战役期間,恩格斯是一支共产主义者志愿兵的队伍的指揮官維利希上校的副官。他参加了三次会战和最后一次在牟尔克河的决战。維利希上校流亡到美国,死时已膺將軍銜,这是他在內战期間所得到的。

几千名起义者在既沒有充分組織,又几乎沒有火炮的情况下在開闊地的战斗中对紀律严格的普軍进行了頑强的抵抗,这表明我們萊茵河彼岸的社会主义者朋友在革命警钟响彻欧洲的那一天会做出什么事业来。

写于 1885 年 11 月中

載于 1885 年 11 月 21 日
“社会主义者报”第 13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社会主义者报”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⁵⁶¹

中世紀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事实上不存在内部统一的欧洲世界，为反对共同的外部敌人——薩拉秦人而通过基督教联合起来了。由一群在經常变化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民族組成的西欧世界，則是通过天主教联合起来的。这种神学上的联合不只是观念上的。它不仅实际体現在这种联合的君主制中心即教皇身上，而且首先体現在按封建和等級制原則組織起来的教会中。教会在每个国家大約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它在封建組織内部拥有巨大的权势。拥有封建領地的教会是各国之間的真正的联系；封建的教会組織利用宗教把世俗的封建国家制度神圣化；而且，僧侶又是唯一的受过教育的階級。因此，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

但是，市民階級的势力在封建制度内部发展起来了。一个新的階級起而反抗大土地所有者。市民首先是而且仅仅是商品生产者和商人，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基础則本质上是狭小的范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自身消費，即一部分由生产者自己消費，一部分由征收貢賦的封建主消費。按封建制度的尺度剪裁的天主教世界观不能再滿足这个新的階級及其生产和交換的条件了。但是，这个新的階級仍然长期受到万能的神学的束縛。十三世紀至十七

世紀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但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很久的。到十七世纪时宗教的旗帜最后一次在英国飘扬，过了不到五十年，新的世界观就不带任何掩饰地在法国出现了，这就是**法学世界观**，它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

它是神学世界观的世俗化。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由于达到社会规模并且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交换产生了（尤其是由于预付和信贷制度）复杂的契约关系，从而要求只能由社会提供的公认的规章亦即国家规定的法律准则，于是人们以为，这些法律准则不是从经济事实中产生的，而是由国家正式规定的。由于竞争——这个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基本交往形式——是平等化的最大创造者，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决战口号。这个新的上升的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当时保护他们的君主专制的斗争，像一切阶级斗争那样，应当是政治斗争，是争取占有国家的斗争，应当为了**法权要求**而进行，——就是这一事实，促进了法学世界观的确立。

但是资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跟着又引起了新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在资产阶级最终夺得政权之前就已爆发了。正如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一度按照传统抱有神学世界观一样，无产阶级起初也从敌人那里学会了法学的思维方式，并从中寻找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

織，以及它們的理論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他們为自己奠立的“权利基础”和資產階級的“权利基础”不同而已。一方面，就法律平等必須用社会平等做补充这一点而言，平等的要求是扩大了；另一方面，从亚当·斯密的論点——劳动是一切財富的源泉，但劳动产品必須从劳动者手中分給地主和資本家共享——中得出了一個結論：这种分配是不正义的，必須彻底废除，或者至少把它改变得有利于劳动者。但是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就已感觉到，在这个問題上如果单纯停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上，就不能消除資產階級-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現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灾难，这就使他們完全抛开法学政治領域，并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

要适当表現和全面概括工人階級因其經濟状况而产生的求解放的愿望，上面两种見解都同样是不恰当的。平等的要求也好，十足劳动收入的要求也好，当需要从法学上来具体表述它們的时候，都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問題的实质，即生产方式的改造，則多少沒有被触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放弃了政治斗争同时就是放弃了階級斗争，也就是放弃了他們捍卫其利益的那个階級的唯一可能的活动方式。两种观点都脫离了它們賴以存在的历史背景；双方都訴諸感情；一方訴諸正义感，另一方訴諸人性感。双方都給自己的要求披上虔誠愿望的外衣，至于这些要求为什么恰恰应当在現在而不是一千年以前或一千年以后实现，那是无法說的。

工人階級由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轉变为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被剝夺了生产資料的任何所有权，由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而一代传一代地处于这种毫无財產的状态，他們是不能在資

产阶级的法学幻影中充分表达自己生活状况的。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和工人无财产相适应的只能是他们头脑中无幻想。现在这个无阶级的世界观正在全球环行。

不言而喻，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自由思考的工人和仍然受旧传统支配的工人之间进行。整个说来，维护旧世界观的是通常的政治家，他们提出的是通常的论据。但是还有一种所谓的博学的法学家，他们把法学当成一种特有的职业。^①

迄今为止，这班先生们都妄自尊大，不屑于研究工人运动的理论方面。因此，当终于有一位真正的法学教授安东·门格尔博士先生肯屈尊从“法哲学”的观点来“教条地详尽阐述”社会主义史^②

① 关于这一点参看弗·恩格斯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文章，载于“新时代”杂志第4卷第206页[见本卷第347—348页。——编者注]：“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国家法理论家和研究民法的法律家那里，跟经济事实间的联系最终消失了。为了要取得法律的确认，经济事实在每一个别场合都得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并且不用说要顾到全部现存法制体系。所以人们便觉得法律形式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毫无意义了。国家法和民法被看做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历史发展，两者都可受到有系统的说明，并要求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而达到这种系统化。”

② Dr. Anton Menger. «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 Stuttgart, Cotta, 1886, X, S. 171 (安东·门格尔博士“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科塔出版社版第10卷第171页)。

的时候，我們真应当感謝不尽。

事实上，社会主义者在此以前都誤入歧途了。他們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

“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从关于人民經濟和慈善事业的无尽无休的議論中淨化出来……变成清醒的法权概念”（第 111 頁）的时候，只有当一切“国民經濟的裝飾物”（第 37 頁）都被抛弃的时候，才能着手解决“当代法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即社会主义的法学改造”。

然而，在“社会主义思想”中談的恰好就是人民經濟关系，首先是雇佣劳动与資本之間的关系，这里关于人民經濟的議論显然不单单是应予抛弃的純粹“裝飾物”。况且，經濟学还是一門所謂的科学，而且比法哲学还要科学一些，因为它研究的是事实，而不像法哲学那样，單純研究观念。但是对于职业法学家說来，这完全无所谓。經濟研究在他看来跟慈善演說的价值一样。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只要法律得胜，哪怕世界毁灭。]

其次，馬克思的“国民經濟的裝飾物”——这是我們的法学家最厌恶的东西——不單純是經濟研究。它本质上是历史的。它表明了从中世紀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起到今天发达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止的社会发展进程，表明了旧有各階級和階級对立的消失，以及具有新的对立利益的新階級的形成，这种对立的利益除了表现在其他方面外还表现在新的法权要求中。关于这一点我們的法学家似乎也有个模糊的概念，因为他在第 37 頁上发现，現代的

“法哲学……实际上不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法律程序的反映”，可以把它“称为資產階級的法哲学”，同它“并列在一起的，是以社会主义为表現形式的无产的人民階級的法哲学”。

然而，假定如此，那末原因何在呢？这些拥有特殊的、与各自

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法哲学的“资产者”和“无产的人民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法中来的呢，还是从经济发展中来的呢？马克思曾告诉我们说，各大社会阶级的法的观点都是由它们当前的阶级状况来决定的，难道除此而外，他还说过别的什么吗？门格尔是怎样加入马克思主义者之列的呢？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疏忽，是这位严格的法学家言不由衷地说出的对新理论的力量无可奈何的承认，因此，我们仅仅把它记录下来。相反地，当我们这位法学大师站在他自己的法权基础上的时候，他就流露出对经济史的蔑视。衰落的罗马帝国是他爱举的例子。

他告诉我们说：“生产资料从来没有像半个阿非利加行省都归六人所有的时期那样集中过……，劳动阶级的苦难从来没有像几乎每个生产劳动者都是奴隶的时期那样深重过。当时也不乏——尤其在教父们那里——对当时社会状态的激烈批评，这些批评可以和现代最优秀的社会主义文献相媲美，然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来的却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世纪的法律程序。”（第 108 页）

这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

“在民族面前没有呈现出一幅鲜明的，不带任何夸张的关于未来状况的图画”。

门格尔先生认为，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就已经存在了，缺少的只是对它的法学表述。因此封建主义便代替了社会主义，而唯物史观则被归结为 *ad absurdum!*〔荒谬绝伦！〕

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法学家们如此巧妙地搞出的一套东西，不是封建法，而是罗马法，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的法律。由于依照门

格尔先生的假定，法学观念是历史的动力，因此他在这里向罗马的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他们不应提供当时的罗马社会的法权体系，而应提供恰恰相反的东西，即“鲜明的，不带任何夸张的”关于幻想的社会状况的“图画”。这就是应用于罗马法的门格尔法哲学！然而门格尔断言经济条件还从来没有像罗马历代皇帝时代那样对社会主义有利，这种说法简直荒诞极了。门格尔想驳倒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胜利的保证在于生产本身的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工农业中机械化大企业的发展，生产日益社会化，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这就迫使人们要消灭阶级差别以及把私人企业的商品生产转化成直接由社会来进行并且为了社会而进行的生产。另一方面，现代生产方式产生了一个愈来愈有力量和愈来愈关心使这个发展变成现实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自由的劳动无产阶级。

现在试把帝政时期的罗马的情况和这比较一下，当时的罗马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谈不上有什么大机器生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地产的集中，然而要把这种现象和大企业中的社会化的劳动的发展等同起来，那就只有法学家才能做到。我们可以向门格尔先生举出以下三个关于地产的例子：一，有一个爱尔兰大地主，他占有五万英亩土地，租给五千个租佃者耕种，每户平均耕种十英亩；二，有一个苏格兰大地主，他把五万英亩土地变成了狩猎场；第三，一个面积为一万英亩的美国大农场，那里的小麦是用大工业的方式来培育的，门格尔先生看过这三个例子后一定会说，前两例生产资料的集中高于后一例五倍。

帝政时期罗马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牧场的面积大大扩展，使乡村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则把地产划分成许多小块租地，租给隶农

耕种，也就是建立起了依附的小农——后来的农奴的先驅——的細小农戶，确立了一种孕育着中世紀生产方式的萌芽的生产方式。最尊敬的門格尔先生，除了别的种种原因外，单是由于这一点，“中世紀的法律程序”便代替了羅馬世界。誠然，有时在个别行省也出現了大农业企业，但这不是靠自由劳动者进行的机器生产，而是使用**奴隶**，使用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往往是彼此言語不通的野蛮人来耕种的**种植园**。和奴隶相对立的是自由无产者，然而这不是**劳动**无产者，而是**流氓**无产者。今天，社会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依靠着无产者的劳动，他們愈来愈成为社会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而羅馬的流氓无产者則是寄生虫，他們对社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此，他們没有什么坚强的力量。

但是，在門格尔先生看来，生产方式和人民还从来没有像在帝政时期那样成熟到适于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同經濟的“裝飾物”离得尽可能远会得到多么大的优越性。

至于教父們的事，我們还是留給他去管吧，因为他避而不談，究竟在哪一点上他們“对現存社会状态的批評，可以和現代最优秀的社会主义文献相媲美”。关于衰落的羅馬社会的許多有趣的描述确实应归功于这些教父，但是，他們照例都没有对这个社会进行**批評**，他們只是满足于对它进行**痛罵**，而且使用的詞句如此激烈，以致現代社会主义者的最激烈的言辞，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憤怒的吼叫和它們比較起来都显得太温和。門格尔先生指的是不是这种“优越性”呢？

門格尔在第2頁上同样用我們刚刚指出的那种对待历史事实的輕蔑态度說，**特权階級不向社会做出个人酬謝而获得自己的收入**。可見，統治階級在其发展的上升阶段行使非常确定的社会职

能,并恰恰因此而成为统治阶级这一事实,他是全然不知道的。社会主义者承认这些阶级有暂时存在的历史权利,而門格尔则在这里宣称它们占有剩余产品是盗窃。因此,当他在第 122、123 頁上看到这些阶级正越来越丧失捍卫它们获得这种收入的权利的力量时,这只能使他感到惊讶。至于这个力量就包含在行使社会职能中,它将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随着这些职能的消灭而消失,这对这位大思想家說来纯粹是一个謎。

够了。教授先生是力求用法哲学的精神来解释社会主义,就是說,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些简短的法权公式,社会主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十九世纪的新版。这种基本权利当然只有

“微小的实际效果”,但是作为“口号”,“在科学领域中也不无益处”(第 5、6 頁)。

这样一来,我們已經降低到我們現在只有和口号打交道的地步了。先把一个强大运动的历史联系和历史内容取消,好单单給“法哲学”清出地方,然后,这个法哲学又被归结为实际上一錢不值的口号!这的确是費尽心机!

这位教授先生发现,全部社会主义在法学上可以归结为三个这样的口号,三个基本权利,这就是:

- (1)十足劳动收入权,
- (2)生存权,
- (3)劳动权。

劳动权只是临时性的要求,“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馬克思語)⁵⁶²。因此它与此无关。相反,統治着从巴貝夫起到卡貝和蒲魯东止的整个法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平等的要求却被遺忘了。不过門格尔先生未必能从法学上来表述这个要求,

尽管或者可能正因为这个要求是以上所提到的一切中最具有法学性质的东西。于是剩下的精华就只有 1 和 2 两个贫瘠的命题了，而且它们还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門格尔终于在第 27 頁上发现了，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断言，每种社会主义体系都必须在这些命题中运动（第 6 頁）。然而很明显，把极不相同的国家和发展阶段的极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学说硬塞到这两个“口号”中去定会歪曲整个叙述。每一种学说都有其特点，这正是该学说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但在这里这种特点不仅被当做无关紧要的东西弃置一旁，而且由于它偏离口号，和口号有矛盾，干脆被斥为虚伪的东西。

这部著作研究的只是第一号基本权利，即十足劳动收入权。

劳动者的十足劳动收入权，即每一个劳动者对他的个人劳动收入的权利，只有蒲魯东的学说这样明确地谈过。生产资料和产品应当属于全体劳动者的要求和这完全不同。这个要求是共产主义的，正如門格尔在第 48 頁上所发现的，它超过了第一号要求，这个发现使他颇为狼狽。因此他不得不时而把共产主义者归入第二号要求，时而千方百计地拉长和颠倒第一号基本权利，直到能把共产主义者纳入这一类。在第 7 頁上就是这样做的。这里预先假定，在商品生产被消灭后，商品生产仍然继续存在。因此在門格尔先生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生产交换价值，因而也将生产用来出卖的商品，劳动价格也将继续存在，因而劳动力也将和从前一样作为商品出卖，这一切完全是自然的。在此他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保存得高一点呢，还是应当产生一个“确定劳动价格的崭新原则”。

在他看来，后者对社会的震动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本身对社会的震动还要大！这种概念的混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

們的学者在第 94 頁上談到一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理論，从而按照已知的范例設想馬克思的价值理論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分配标准。而且在第 56 頁上更談到，十足劳动收入完全不是什么确定的东西，因为它至少可以按照三个不同的标准計算出来，最后我們在第 161、162 頁上讀到，十足劳动收入是“自然的分配原則”，而且只有在一个存在公共財產但归个人使用的社会中，因而只有在一个今天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会把它当做自己的最終目的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多么高明的基本权利！多么高明的工人階級的法哲学家！

这样一来，門格尔就輕易地完成了“批判地”闡述社会主义史的任务。我向你們說出三个意味深长的詞，即使它們在人們的口中沒有輾轉传誦^①，但对社会主义者在这里所应的中学毕业考試來說，仍然完全够用了。就这样，来吧，圣西門，来吧，蒲魯东，来吧，馬克思，不管你們是誰，你們发誓信第一号呢，还是信第二号，或者是信第三号呢？来吧，到我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来吧，凡是比床长的，我都当做国民經济的裝飾物和慈善事业的裝飾物砍掉！

这里重要的只是，誰最先提到門格尔欽賜給社会主义的这三个基本权利；誰最先提出这三个公式中的一个，誰就是大人物。自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不犯可笑的錯誤是办不到的，尽管参考了全部学术資料。例如，他认为，在圣西門主义者看来，oisifs 意味着有产階級，而 travailleurs 意味着劳动階級（第 67 頁），而且是圣西門主义的著作的标题：«Les oisifs et les travailleurs. — Fer-

^① 这句话是根据席勒的“信仰的話”一詩中的詩句改写而成的。——編者注

mages, loyers, intérêts, salaires» (“寄生虫和劳动者——地租,租金,利息,工资”)⁵⁶³, 在这个标题中不提利润, 这已经应当使他醒悟了。在这一页上門格尔本人引用了圣西门主义的机关报“地球报”上的一个决定性的地方, 这个地方把 industriels 即工厂主与 oisifs 相对立, 把工厂主与学者和艺术家一起誉为人类的恩人; 仅仅要求取消向 oisifs 即收地租、房租、利息的食利者的纳贡。利润在这个单子上又沒有了。工厂主在圣西门主义体系中作为力量大待遇高的社会代理人而占有卓越的地位, 所以門格尔先生今后从法哲学上对这一地位进行加工之前, 应该更仔细地研究这一地位。

在第73页上我們听说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⁵⁶⁴ 中“诚然是相当隐晦地”预示了一种在保存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条件下“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教授先生在 1886 年还感到相当隐晦的东西, 馬克思早在 1847 年就看透了, 证明它不过是一种陈腐的东西, 并且能够预言蒲鲁东在 1849 年所遭到的破产。⁵⁶⁵

然而已经够了。我們在此以前所说的一切对于門格尔先生以及他的听众说来都是无关宏旨的。如果門格尔只写了第一号权利的历史, 他的著作会无声无臭地消逝。这个历史不过是該书的一个借口, 該书的目的是要诋毁馬克思。而人們之所以讀它, 只是因为它議論的是馬克思。自从馬克思的体系深入人心, 批評家再也不能投公众无知之机以来, 要批評馬克思早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只剩下一个办法: 为了诋毁馬克思, 把他的功績归之于那些誰也不注意、已經退出舞台、政治上和学术上再也沒有有什么意义的社会主义者。他們希望用这种办法来清算无产階級世界观的創立者以及这种世界观本身。門格尔先生所干的就是这种事情。要知道他只要不是一个空头教授, 总应该搞出一点东西来。

問題解决得很简单。

現今的社会制度賦与地主和資本家取得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最大的一部分——的“权利”。第一号基本权利說，这个权利是不公平的，全部劳动收入都应当属于劳动者。如果撇开第二号基本权利不談，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因而，誰最先說出土地和其他生产資料所有者取得一部分劳动收入的現有权利是不公平的，誰就是大人物，誰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而葛德文，霍尔和湯普逊就是这样的人物。門格尔抛掉所有无穷无尽的人民經濟的裝飾物以后，在馬克思那里发现的法学殘余就只是这种同样的見解。这样一来，馬克思便剽窃了早先的英国人，尤其是湯普逊，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秘而不宣自己的来源。证据俱在。

我們絲毫无意于使固执己見的法学家明白，馬克思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沒有提出过“十足劳动收入权”的要求，他在他的理論著作中根本沒有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法权要求。連我們的法学家在責难馬克思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沒有“彻底論述十足劳动收入权”（第98頁）的时候，也逐漸模糊地意識到了这一点。

在馬克思的理論研究中，对法权（它始終只是某一特定社会的經濟条件的反映）的考察是完全次要的；相反地，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階級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討占着首要地位。任何一个人，只要把历史看做一个有联系的，尽管常常有矛盾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看做仅仅是愚蠢和殘暴的杂乱堆积，像十八世紀人們所做的那樣，首先会对这些問題的研究感到兴趣。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紀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們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們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內是人类发展的

杠杆；因而馬克思也承认剝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現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剝削不論以什么形式繼續保存下去，已經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而門格尔把这些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拖上他的狭小的法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企图，仅仅证明他自己完全不能理解超出狭隘的法学眼界以外的事物。他这样表述的第一号基本权利在馬克思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

但是从現在起才談到主题！

門格尔先生在湯普逊那里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个名詞，surplus value。因此，毫無疑問，湯普逊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者，馬克思只是一个可怜的剝窃者：

“从湯普逊的这些論述中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后来在許多社会主义者那里，其中也包括在馬克思和洛貝尔图斯那里見到的那种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第 53 頁)

可見，湯普逊无可爭辯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杰出的創始人”(第 49 頁)。但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地租和資本利潤是土地和資本所有者从十足劳动收入中所做的扣除”，这个观点“絕非社会主义所仅有，因为資产階級国民經济学的許多代表，例如，亞当·斯密，所持的观点都与此相同。湯普逊及其信徒的独到之处仅仅在于，他們把地租和資本利潤看做是和工人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相矛盾的不公平的扣除”(第 53、54 頁)。

由此可見，科学社会主义不在于发现經济事实，在門格尔看来，在他以前的經济学家已經为此操劳了，而簡單地在于宣布这个經济事实是不公平的。这就是門格尔先生的观点。如果社会主义

者真的如此輕易地看待自己的任务，那他們早就可以休矣，而門格尔先生也就免得因自己的法哲学而丢丑了。但是誰如果企图把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归结为装在坎肩口袋里的法学口号，誰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

然而，从湯普逊那里盗窃来的剩余价值又是怎么回事呢？問題是这样的：

湯普逊在他的“为人类謀取最大福祉的財富分配原則”⁵⁶⁶一书第1章第15节中研究

“劳动者为了被称为資本的东西应当〈ought〉——直譯是“有义务”，因而是“依法应当”把自己劳动产品的多大部分付給被称为資本家的資本所有者？”資本家断言，“没有这个資本，没有机器，没有原料等等，劳动本身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因此劳动者为使用資本而付出某种东西完全是合理的”。湯普逊繼續說道：“毫無疑問，劳动者如果他自己不幸没有占有資本的話，应当为使用資本而付出某种东西。問題在于，为了这种使用应当〈ought〉从他的劳动产品中扣除多大部分？”（1850年由佩尔整理出版的版本第128頁）

这看起来已經完全不像“十足劳动收入权”。相反地，湯普逊认为劳动者由于使用了賑济他的資本而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收入，是理所当然的。对他說来，問題只在于，多少呢？这里有“两个标准，劳动者的标准和資本家的标准”。劳动者的标准是什么呢？

“付出的总額要能补偿資本的損耗，如果全部資本都消耗了的話則能补偿它的价值；此外，还包括付給資本的所有者和管理人（superintendent）的追加報酬，保证他們能够与真正从事（more actively employed）生产劳动的劳动者同样舒适。”

在湯普逊看来，这就是劳动者的要求。这里誰如果不能“一下子看出馬克思的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誰就将在門格尔先生的法哲学考試中落第而得不到怜悯。

然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哪里呢？亲爱的讀者，請忍耐一下，我們馬上就来談这个問題。

“資本家的标准是同一数量的劳动由于利用机器或其他資本而生产出来的追加价值；因此这全部剩余价值都将为資本家所得，因为他有超人的才智和技能，依靠这些才智和技能他积累了自己的資本，把它提供給劳动者，或者交給他們使用。”（湯普逊，第 128 頁）

这一段逐字逐句的摘录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沒有生产資料任何生产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生产資料被置于資本的形式之下，亦即归資本家所占有。这样一来，如果劳动者不“使用机器或其他資本”而进行生产，那他就是企图做不可能的事情，他自然什么也生产不出来。但是如果他使用資本来进行生产，那末他的全部产品就将是这里被称为剩余价值的那种东西。因此我們繼續往下看。在第 130 頁上湯普逊让同一个資本家說了下面这段话：

“在机器发明以前，在作坊和工厂建立以前，那时劳动者不用輔助手段单靠自己的力量生产的产品的量有多大呢？不管这个量的大小如何，他今后还是应当得到这个量…… 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全部剩余价值則应当作为报酬属于那些建造了房屋或机器的人，或者那些通过自愿交换而获得这些东西的人”等等。

湯普逊的資本家在这里只是說出了工厂主的一个通常的錯觉，似乎一个用机器等进行生产的劳动者的劳动時間所創造的价值大于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普通的手工劳动者的劳动時間所創造的价值。产生这种幻想的依据，是說这个資本家帶着他或者可能还有几个别的資本家所独占的新发明的机器闖进在此以前属于手工劳动的部門而取得了一种特殊的“剩余价值”。这里手工业品的价格决定这一工业部門的全部产品的市場价格；而机器产品可能只值手工劳动产品的四分之一，因而給工厂主带来等于这个产品

的成本价格的百分之三百的“剩余价值”。

当然新机器的普遍采用很快就结束这样一种“剩余价值”；可是那时候资本家会看出，当机器产品决定市场价格，并且这个价格愈来愈降低到机器产品的真正价值的情况下，手工业品的价格也同时要下降，并且降低到它的原来的价值以下，这样一来，机器劳动同手工劳动相比，仍然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湯普逊在这里把这种极其常见的自我欺骗暗示给他的工厂主了。但是湯普逊自己是怎样不大赞同这种自我欺骗的，可以从他在前面紧挨着的第 127 頁上所說的話中清楚地看出来：

“原料，建筑物，工资——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给自身的价值增添任何东西；追加价值只是由劳动产生的。”

这里我们请我们的读者原谅：我们认为仅仅为了門格尔先生的利益也有必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指出，湯普逊的这个“追加价值”也绝对不是馬克思的剩余价值，而是劳动附加于原料的全部价值，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和馬克思所說的剩余价值的总和。

只有现在，在这些不可避免的“人民经济的装饰物”之后，我们才能充分评价門格尔先生的勇敢精神，他以这种勇敢精神在第 53 頁上說：

“按照湯普逊的观点……资本家把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同他们由于机器和别的资本消耗而变得更有效果的劳动的实际收入之間的那种差别……看做是应当属于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剩余价值 (surplus value, additional value)。”

这段话应当是我们在上面引用过的湯普逊的著作第 128 頁上那个地方的德文的“自由”转述。但是湯普逊的资本家所說的只是同量劳动 (the same quantity of labour) 在利用资本或不利用资

本的条件下所生产的产品的差别，即等量的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之间的差别。門格尔先生只能把“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偷运进来，其实他是在直接伪造湯普逊的話。

由此我們可以断定，湯普逊的資本家的“剩余价值”不是湯普逊的“剩余价值”或“追加价值”；这两种价值中的任何一种更不是門格尔先生的“剩余价值”；所有这三种价值中的任何一种尤其不是馬克思的“剩余价值”。

但是这絲毫也沒有使門格尔先生感到难为情。他在第 53 頁上繼續写道：

“因此，地租和資本利潤不是别的，而是土地和資本所有者由于他們法定的权力地位而从十足劳动收入中所作的不利于劳动者的扣除”——这个論点从它的全部内容来看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有了——然后他洋洋得意地大声疾呼道：“从湯普逊的这些論述中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后来在許多社会主义者那里，其中也包括在馬克思和洛貝尔图斯那里見到的那种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

換句話說：門格尔先生在湯普逊那里发现了 surplus value (以及 additional value) 即“剩余价值”这个名詞，不过他只有用直接篡改的手法才能掩盖，湯普逊所說的 surplus value 或 additional value 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这两种意义又都和馬克思所使用的“剩余价值”这个名詞的意义完全不同。

这就是他的伟大发现的全部内容！这同他在序言中所做的冠冕堂皇的广告比較起来是多么可怜的结果：

“我将在本书中证明，馬克思和洛貝尔图斯的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論是从較早的英国和法国的理論家那里剽窃来的，而沒有指出他們的观点的来源。”

在这句话之前所作的比喻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可悲：

“如果有人亚当·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著作出版之后过了三十年又‘发现了’分工的学说，或者，如果某个作家在今天想把达尔文的发展论说是自己的精神财产，他一定会被当成一个傻瓜或骗子。只有在几乎还完全没有历史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内，这样一种有成效的尝试才是可能的。”

这里我们且不谈门格尔仍然相信亚当·斯密“发现了”分工，其实配第早在斯密之前八十年就已经全面发挥了这一点。至于门格尔关于达尔文所说的话，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反转过来了。伊奥尼亚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还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提出了人是从鱼发展而来的观点，大家知道，现代进化论自然科学的观点也是如此。如果现在有人想出来声明说，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达尔文的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达尔文只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剽窃者，不过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来源隐蔽起来罢了，那么他对待达尔文和阿那克西曼德，恰恰就像门格尔先生实际上对待马克思和汤普逊一样。教授先生说得对：“只有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才有希望看到那种使“这样一种有成效的尝试”成为可能的无知。

既然我们这位精通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的大师如此重视“剩余价值”一词，而不管它的含义究竟如何，那末我们就向他揭示一个秘密，不仅李嘉图已经用过 surplus produce〔剩余产品〕一词（在论工资那一章中）⁵⁶⁷，而且，除了西斯蒙第使用的 mieux-value〔剩余价值〕一词而外，plus-value 这个用以表示商品占有者不付任何代价的价值增长的话，从很久远的时代起就在法国日常的商业生活中通用了。因此，门格尔所做的关于汤普逊发现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汤普逊的资本家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一发现，对法哲学说来究竟有多大价值，看来也是很成问题的。

但是，門格尔先生对馬克思还远远沒有清算完毕。請听：

“非常明显，馬克思和恩格斯**錯誤地引证**英国社会主义的（其实就是湯普逊的）这一**基本著作**已經有四十年了。”（第 50 頁）

馬克思不但四十年来对他的这个秘密的埃吉丽亚守口如瓶，他还必須**錯誤地引用**它！不止是一次，四十年来都是如此。这样做的不仅有馬克思，而且还有恩格斯！一堆多么卑鄙的預謀！

可怜的路約·布伦坦諾，你徒劳无功地在馬克思那里寻找哪怕仅仅是一段**錯誤的引文**已經二十年了，你在这场狩猎中不仅烧伤了自己的手指，而且也使你的輕信的朋友，劍桥的塞德萊·泰勒遭到了不幸⁵⁶⁸，——你上吊吧，路約，这不是你发明得了的。而那种可怕的，四十年来一直在頑强进行的，而且还是“非常明显的”伪造——这种伪造由于恩格斯同样达四十年之久的罪恶的合作，已經具有居心叵測的陰謀的性质——究竟何在呢？

“……在**錯誤地引证**的同时，还指明該书的初版年代是 1827 年！”

而这本书在 1824 年就已經出版了！

“非常明显”，实际上——是对門格尔先生而言。然而这远远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唯一的——路約，注意！——唯一的伪造的引文，看来他們是靠經營伪造的引文为业的（甚至可能是江湖小販？）。在 1847 年出版的“哲学的貧困”一书中馬克思把霍吉斯金誤写成霍普金斯，过了四十年（四十年好像是这两个居心不良的人命中注定的日期），恩格斯在“哲学的貧困”德譯本序言中又犯了同样的罪行。⁵⁶⁹ 由于这位教授先生对一切刊誤和笔誤有敏銳的感觉，他沒有在一家印刷厂当校对这确实是人类的一大損失。然而，不，我們必須收回这句恭維話。門格尔先生也不适宜于当校对，因

为他也有抄錯因而也就引錯的时候。他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英文标题上，而且发生在德文标题上。例如，他对“这部著作”即“哲学的貧困”“的恩格斯的譯文”的引证就是如此。从扉頁上就可以看出，这不是恩格斯的譯文。馬克思提到霍普金斯的那个地方恩格斯在上述序言中是逐字援引的，因而，他有义务援引这个不确切的地方，如果他不想錯誤地引证馬克思的話。但是这两个人从来也不能使門格尔先生感到滿意。

然而我們的法哲学家如此津津乐道的細微末节已經談得够多了。对于这个人和他这一类人說来，“非常明显”，他一般只是从馬克思的著作中才看到所有这些文献——他所引证的英国作家，沒有一个不是馬克思已經引证过的，或許除了霍尔和举世聞名的作家雪萊的岳父葛德文而外，——他居然认为必須显示一下他比馬克思“在四十年前”，即在 1847 年要多知道两三本书。口袋里装有馬克思引用过的全部书目，又拥有不列顛博物館的現代参考书和便利条件，在这方面除了发现湯普逊的“分配”一书出版于 1824 年而不是 1827 年之外不能作出更重要的发现的人，的确用不着吹嘘图书学的淵博。

对当代許多其他社会改革家說来是合适的，对門格尔先生說来也合适，那就是說大話而实际結果（如果一般有实际結果的話）微不足道。本來說要证明馬克思是剽窃者，而证明的却是，“剩余价值”这个名詞在馬克思之前已經有人使用了，虽然含义有所不同！

門格尔先生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門格尔先生在序言中宣称，他认为

“社会主义的法学改造，是当代法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正确

解决,将对通过和平改革来实现我们的法律程序的不可避免的变更做出重大贡献。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的时候,实际政治家才能认识到,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革现行法律程序以利于苦难的人民大众”⁵⁷⁰。

他想通过把社会主义作为法权体系来阐述的办法实现这个改革。

而社会主义的这种法学改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结论”中说:

“毫无疑问,制定一个完全受这些基本法权观念(基本权利第一号和第二号)支配的法权体系是遥远将来的事情。”(第163页)

在序言中看来是“当代”最重要的任务的东西,在结尾却被推延到“遥远的将来”。

“〈现存法律程序的〉必然变革,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途程中实现,就像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数世纪以来把封建制度瓦解和摧毁到要彻底消灭它,终于只需一击即可的情况一样。”(第164页)

说得很好,但是,如果社会的“历史发展”将引起必然的变革,那末还要法哲学干什么呢?在序言中说,正是法学家应该指明社会发展的途径;可是现在当法学家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的时候,他就失掉了勇气,而嘟嘟囔囔地说起一切都能自动造得出来的历史发展来了。

“然而,我们的社会发展是朝着实现十足劳动收入权的方向前进呢,还是朝着实现劳动权的方向前进呢?”

门格尔先生声明说,他不知道。他现在如此卑劣地牺牲了他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权利”。可是,如果这些基本权利连一条狗也不能引诱过来,如果它们既不决定也不实现社会发展,而是相反,它们本身要由社会发展来决定和实现,那为什么要竭力把全部社

会主义归结为基本权利呢？为什么要竭力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历史“装饰物”剥掉呢，如果我们在这之后不得不体验到，正是这些“装饰物”构成社会主义的实际内容？既然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只有通过对社会发展及其动因的研究才能认识，而不是通过把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才能认识，这全部研究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只是在最后才告诉我们呢？

門格尔先生的智慧归根到底就是声明，社会发展将朝着哪个方向进行，他无法断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就是不应人为地加深“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弊病”（第 166 页），并且他建议为了使这些“弊病”能继续保存而实行自由貿易，避免继续发行国家和地方公債！

这些建议是門格尔先生的如此大叫大嚷和自我吹嘘的法哲学的全部具体结果！遗憾的是，教授先生没有向我们透露一个秘密：现代的国家 and 市镇不发行“国家公債和地方公債”如何能办好自己的事务。如果他掌握这个秘密，那就最好不要保守这个秘密。这将会比他在“法哲学”方面的成就更快地给他铺平“向上”攀登大臣位置的道路。

然而，不管这些东西在“有权势的人物”当中受到怎样的欢迎，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可以担保，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会把門格尔先生的全部基本权利奉还给他，或者放弃同他争他的这个“十足劳动收入权”的任何企图。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者拒绝提出一定的法权要求。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政党，如同一般任何政党那样，不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

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因此每个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都必须在纲领中用法权要求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要求。但是每个阶级的要求在社会和政治的改造进程中不断变化,在每个国家中,由于各自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这些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各个政党提出的法权要求,尽管最终目的完全一致,但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中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是可变因素,并且有时重新修改,这种情况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那里可以看到。在进行这种修改时考虑到的是实际关系;相反,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党中还没有一个政党想到要从自己的纲领中造出一个新的法哲学来,就是在将来也不会想到要这样做。至少门格尔先生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可以作为前车之鉴。

这是他的小册子的唯一有用的方面。

写于 1886 年 11 月—12 月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87 年“新时代”杂志
第 2 期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 联盟綱領的修正⁵⁷¹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

(1887年5月創立于諾森伯兰)

原 則^①

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創立的宗旨是教育和組織人民群众以达到劳动的經濟解放。

社会主义联盟完全同情和支持雇佣工人旨在获得在現存制度下的更好生活条件的任何努力，同时它力图消灭資本家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雇佣工人阶级，并力图使〈整个社会的工人〉全体社会成員联合在合作制的共和国中。

企业主阶级垄断一切取得和創造財富的手段，而雇佣工人阶级被迫〈首先〉为这些企业主的利潤劳动，这种制度是压迫和奴役的制度。

这两个阶级的对抗〈导致〉表现在激烈的竞争——在工人中

① 恩格斯在綱領中删去的詞句置于尖括号内，他加上的話用黑体加重点。——編者注

間为受雇而竞争,在資本家中間为市場而竞争。这种情况〈引起阶级仇恨和阶级冲突〉使民族分裂而不利于它,使它分成两个敌对的陣营并且破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幸福。

現今的制度使寄生虫安逸和奢侈,让工人劳动和貧困,并且使所有的人退化;这种制度按其实质来說是不公正的,是应该被消灭的。現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場的任何扩大都吸收不了那种过多的产品,因此生活資料和福利資料的丰富本身成了工商业停滞、失业、从而千百万劳动者貧困的原因,既然如此,这种制度就是可以被消灭的。

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給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閑暇時間,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請所有的人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給予社会主义联盟以协助。贊同者应该承认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所有的人之間的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他們应该承认:沒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沒有无权利的义务。

写于1887年6月14日和23日之間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7年第1版第16卷第1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恩格斯亲笔修正的綱領譯的

Workers of all Countries—Unite!

THE NORTH OF ENGLAND SOCIALIST FEDERATION.

(FOUNDED IN NORTH-SHROPSHIRE, MAY, 1937.)

PRINCIPLES.

The North of England Socialist Federation has been formed to advance and organise the struggle to achieve the economic emancipation of labour.

It will fully co-operate with and help every other part of the movement to win better conditions of life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the Socialist League now aims at abolishing the Capitalist and Labour class system, transferring ownership of industry into a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An employing class monopolising all the means of getting and making wealth, and a wage-slavery class compelled to work for it, are the basis of these conditions, in a system of tyranny and slavery.

The attainment of these two class aims should bring competition—the natural outcome of the workers' need for better things, amongst the capitalists. This will give rise to class hatred and class struggle and therefore to class-consciousness, class struggle, and class rule.

The present system gives rise and leads to the slavery, exploitation and poverty of the workers, and degradation to all. It is a class system and should be abolished.

The aim is to bring about a Socialist system which will give health and wealth to all, ample leisure and leisure travel, and education and leisure for all.

All are invited to help the Socialist Federation in this great cause. Ask because we shall help you in health, leisure, and security in the land of your choice towards such a better and more desirable life. They shall acknowledge no masters except their own.

They shall acknowledge no masters except their own.

PROGRAMME

The Socialist Federation seeks to gain its ends by working on the following lines—

- (1) Propaganda and helping other Socialist bodies to form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abour Party.
- (2) Struggle to secure political power by presenting the abolition of Socialism to the people.
- (3) Struggle to secure Local Government, National Councils, and other social organisations.
- (4) Struggle to secure Co-operation, and every possible movement for the good of the workers.
- (5) Propagating a scheme for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of Labour.

All who agree with these objects are invited to become Members. For Rules see other side.

as well as the wage-slavery class
all members of society
manifest class's
divides the class against itself, for
class's the health benefits
And it has to be better, now that the
production of labour has become an
as at the very hands of those who have
abundance of the means of life
and of every man, thus becoming the
cause of the production of food, clothing
employment, a universal means of making
richer -

弗·恩格斯修改的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

恩格斯同“紐約人民報” 編輯部的談話⁵⁷²

問題：社会主义在英国是不是正在順利地发展着，就是說，英国的工人組織是不是在比过去更大的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对經濟发展的批判，并且它們是不是——在比較大的規模上——力求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呢？

恩格斯：我完全滿意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英国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主要在于群众的无产階級意識的成长。正式的工人組織即工联（它們在某些地方有成为反动組織的危險），不得不当了尾巴，就像奥地利的民軍一样。

問題：爱尔兰在这方面的情况怎样呢？那里除了民族問題以外是不是还有社会主义者能够指望的东西呢？

恩格斯：在爱尔兰还要过很久才能期待一个純粹的社会主义运动。那里的人們首先希望成为小的农民土地所有者，而当他們达到了这点的时候，抵押就会出現，并且使他們再次破产。但是，这并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帮助他們摆脱大地主，即从半封建的条件轉到資本主义的条件。

問題：英国工人对待爱尔兰运动的态度怎样呢？

恩格斯：群众是贊助爱尔兰人的。組織則像一般工人貴族一样，是跟着格萊斯頓和自由資产階級走的，但沒有比他們走得

更远。

問題：您对俄国是怎样想的呢？就是說您在怎样的程度上改变了大約六年以前，我^①在伦敦逗留期間，您和馬克思所表示的看法，这个看法认为，由于虚无主义恐怖主义者当时获得的成就，欧洲革命运动的推动力或許可能来自俄国？⁵⁷³

恩格斯：就是現在，我也完全这样认为：俄国发生革命，甚至只不过在那里召开某种国民議会，就会在欧洲整个政治局勢中引起一場变革。但是此刻这已經不是最近可能的事了。要知道，現在我們这里是另一个威廉^②。

恩格斯在回答他是怎样估計当前欧洲局勢这个問題时說道：我手头已經七個星期沒有一份欧洲的报纸了，因此，我不能对那里发生的任何事件发表評論。

談話到此結束。

載于 1888 年 9 月 20 日
“紐約人民报”第 226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紐約人民报”

① “紐約人民报”的代表泰·庫諾。——編者注

② 威廉二世。——編者注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答“正义报”⁵⁷⁴

“正义报”即“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在它 1889 年 3 月 16 日的那一号上，攻击了被它一般称之为“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些人（不管他們是誰），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正式机关报”（指伦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上述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場。

“社会民主党人报”从我們的德国朋友根据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得拥有这种正式机关报，否則即犯有加入“秘密会社”之罪⁵⁷⁵的时候起，就不再是“正式的”机关报了。該报从那个时候起，正像它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甚至已不是“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而只不过是“讲德語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引以自豪的是：它享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充分信任，而这个党的力量远远不限于 1887 年投票贊成它的那七十七万个选民。

“正义报”认为：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但在大不列顛而且在美国，都使我們事业的宣传遇到困难，因为，他們用周围每一万个人当中連一个人也不懂的語言出版自己的报纸，虽然他們自己身在美国，无论如何应该学习英語。此外，他們把自己的活动严格局限在自己的民族俱乐部里。”

这种指責簡直是聞所未聞的！按照“正义报”的說法，住在外

国的德国人，应该放弃自己的本族语言，即他们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唯一可用的宣传工具，并且应该仅仅变成他们卜居的国家所能发生的任何运动的附属品。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专供讲德语的读者阅读的德文报纸。它的印数的十分之九是直接寄往德国的。它之所以不得不在英国出版，是因为比英国用来对付爱尔兰的手段更坏的非常法，迫使编辑部把自己的活动移到国外，而瑞士政府慑于俾斯麦的压力把编辑部的全体同事都赶出了瑞士。

“伦敦自由新闻”⁵⁷⁶ 是地方性的德文报纸。它已经存在三年多了，这足以证明需要有这种刊物。其实可以让它自己为自己说话。

对于在美国的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为了说明“正义报”对他们提出的指责，我们可以指出：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⁵⁷⁷（虽然它起初、甚至现在主要是由德国人组成的）那里，有许多非德国人支部——英美人支部、斯拉夫人支部、斯堪的那维亚人支部等等；除了可以全部自给或者几乎全部自给的为数众多的德文报纸以外，它还出版一种英文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⁵⁷⁸，并且正在弥补它的平衡表中直到现在还有的那个相当大的赤字（见1889年3月2日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刊登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它自己出钱保证一位英美工人的宣传员加赛德教授的生活；在美国有人指责它，说它是一小撮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竟干涉与他们无关、他们又不理解的美国家务。尽管在美国的德国人不是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就是打算加入并且定居美国，而人们还是这样对他们说。如果住在英国、而且大多数只是那里的临时居民的德国人遵循“正义报”给他们提出的教导，如果他们开始为英国读者出版英

文报纸、积极参加在英国人中间的公开宣传、干预英国的政治生活、履行英国人的一切义务并要求英国人的一切权利，那末他们就会受到同样的指责，并且在指控者中间可能会有“正义报”。

至于在美国的德国人似乎“应该学习英语”这一主张，我只能说，这也是我的愿望。但是，很遗憾，情况远不是这样。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可能，有效而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宣传。在美国也好，在瑞士也好，在东欧和北欧也好，如果没有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德国人的活动，那末社会民主党就不会占有它今天这样的地位。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他们都是第一个在不同民族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建立互相的联系，而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现在的地址是托登楠街托登楠大院路49号）早在1840年就是第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组织。⁵⁷⁹ 如果“正义报”连这些事实也不知道，那末国际警察和国际资本对这些是了解得很清楚的。每四个被大陆的警察局迫害、缉拿或者驱逐的外国社会主义者之中，就有三个是德国人。现在美国国会正在审查的关于禁止外国社会主义者迁入的法案，主要是反对德国人的。

“正义报”继续说道：

“现在谈谈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在1886年巴黎代表大会上，德国人有了自己的代表，而在1888年伦敦代表大会上，一致同意委托可能派组织1889年代表大会。当时对这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所以，有理由期望最近几年的一切个人的小委屈都被排除。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正式机关报还在拼命嘲笑和辱骂可能派，而且它攻击到最后，就于2月28日在‘人人权利报’⁵⁸⁰的编辑部举行了秘密会议^①，这个秘密会议很像当年瓦解旧‘国际’的那些卑鄙阴谋。在这一周里，‘社会民主党

^① 此处原文系英文 caucus，德文版注释为：拥有僭夺的全权的政治委员会。——译者注

人报’又干起来了，——它从紐約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引用了攻击我們的法国同志的話。但是，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无疑，我們的拉科夫同志和一切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同我們联合起来，真誠地謀求結束这种无謂的恶意的爭吵和傾軋。”

为了弄懂所有这一切，必須知道 1871 年以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某些事实。在 1871 年公社的日子里被击潰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逐渐恢复了元气，并且重新出現在 1879 年馬賽代表大会的舞台上，在那里他們組成了工人党；但是，1882 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每个派別都把自己叫做法国工人党 (Parti ouvrier)，但是，最好是用它們彼此贈送的称号来叫它們，那就是可能派和馬克思派。除了这两个集团以外，还有一个布朗基主义者集团，它有着自己的独立組織，虽然一般說来，它起先曾同工人党合作过，而分裂后又同所謂馬克思派合作过。在这些不同派別的每一派的势力范围内，有許多工会 (chambres syndicales) 和其他工人联合会。一般說来，可能派在巴黎势力最大，而在地方却几乎完全是所謂馬克思派的天下。这两个独立的集团之間的分歧的实质，我現在不談；令人遺憾的是，这些分歧是存在着的。但是，同样分成几个不同集团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也好，只是在 1875 年才联合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好，都无权指責法国人缺乏統一。

可能派为了爭得公认他們是法国唯一的真正的工人政党，就开始召开国际代表會議和代表大会——第一次是 1883 年在巴黎，后来是在 1884 年 (这次出席的外国代表主要是英国工联主义者)，第三次是在 1886 年，当时也有其他国家的几个代表出席。在最后的这次代表會議上，决定 1889 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委托可能派組織这次代表大会。但是，無論是德国代表格里姆佩，

还是奥地利代表，都沒有投票贊成這項決議。不管怎样，这次代表會議（出席这次代表會議的除了可能派和英国工联主义者外，只有一小撮比利时人，一名澳大利亚人，一名德国人，一名伦敦德意志协会的代表，一名瑞典人和一名奥地利人）的决定，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在这次代表會議上有代表的人們，根本不认为这次代表會議通过的決議对自己有約束力，这一点已經由英国工联证明，它們在赫尔代表大会上拒絕承认这次代表會議的許多決議。

1887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瑞士的圣加伦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在1888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当工联大約同时宣布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德国的工人政党表示准备放弃自己的代表大会，如果允許它的成員——只要允許！——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話。

工联在宣布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时声明說，只有 *bona fide* [可信任的，正式的] 工人組織的 *bona fide* 代表才允許参加代表大会。但是，要知道，在德国現在实行非常法的情况下，政府会把任何胆敢选出代表并把代表派往伦敦的工会組織立即解散，并且沒收它的基金。工联理事会提出的条件，等于堵塞所有德国代表进入代表大会的道路。当时德国的工人政党派了我們著名的帝国国会成員奧·倍倍尔在本书作者的陪同下去伦敦。他拜会了議會委员会⁵⁸¹ 和工联理事会的書記，并且同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⁵⁸² 的代表們談了話。随后保持了长时期的通信，德国人試圖在通信中爭取改变参加代表大会的条件。但是，工联理事会議會委员会的決議仍旧有效，我們进入代表大会的道路被有意識地堵塞了。这以后，我們党的执行委员会对这样的代表大会发表了抗議。

代表大会举行了。在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中，从来还没有在这样屈辱的条件下召开过工人的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历次工人代表大会都认为自己是拥有主权的。它们的组织者可以初步制订规则，但是每个代表可以不同意这些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则由代表大会本身作出最后决定。而这一次，参加条件、议事规程、程序和表决的规则、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一切都是议会委员会这个反社会主义的工联伦敦理事会的反社会主义机关预先指示的。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仍然都接受了这种屈辱，因为不然，租有会址的工联理事会就会干脆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认为——而这也完全正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证明英国工会组织的行列中存在着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少数派。但是，他们是应该表示抗议的，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这样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甚至对于曾经向代表大会派出代表的那些人来说，也未必能够被认为是具有约束力的，并且它的发起者即议会委员会本身，哪怕是由于拒绝贯彻决议中的一个决议（1888年11月的报告第2页）⁵⁸³，也就是背弃这些决议了。认为这些决议对于那些不但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代表参加而且被有意识地排除在外和对此表示过抗议的人有约束力，这简直是荒谬的。不管怎样，代表大会已经决定，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委托巴黎的可能派组织代表大会。

和伦敦代表大会同时，与法国的所谓马克思派有联系的法国工会在波尔多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它也决定1889年在巴黎组织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波尔多曾向伦敦代表大会派了一名代表，但是他只是在大会快完了的时候才到伦敦。

后来，法国可能派于去年12月在特鲁瓦召开了自己的全国

工人代表大会。但是，特魯瓦的地方組織者——也是他們这一派的成員——声明，他們认为邀請法国所有社会主义組織和工人組織的代表参加这个代表大会是自己的义务。于是，可能派离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在沒有他們参加的情况下由承认波尔多通过的关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決議的所謂馬克思派和布朗基派組織的。这样做只是自卫，因为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伦敦代表大会既然委托可能派在巴黎組織自己的代表大会，就是准备把一切不受可能派影响的法国工人从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名額中排除出去，虽然伦敦代表大会实际上沒有意識到这一点。

这样，1889年在巴黎就必須召开两个对垒的代表大会。虽然“正义报”完全不让自己的讀者們知道法国各大工人团体已在1888年秋天在波尔多和特魯瓦举行了會議（在波尔多有63名代表出席，代表馬賽、利尔、里昂、魯貝和其他城市的250个地方联合会；在特魯瓦有36名代表出席，代表327个不同的組織，即各地方工会和社会主义小組），并且决定召开他們也会有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但是这些事实仍然传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于是，德国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尽一切努力来防止这两个对垒的代表大会的召开（因为他們知道，这两个代表大会将互相敌視，并且必然两败俱伤），并且試圖由这两个殘缺的代表大会組織一个真正的代表大会。

为了这个目的，德国人——組成我們党的执行委員會的帝国国会的成員——建議召开国际代表會議，并且邀請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两个派別、以及和他們保持关系和通信的其他非德国人的社会主义組織参加代表會議。这个代表會議是2月28日在海牙

(荷兰)举行的,我不是作为代表而只是以观察員的身分出席了代表會議。法国的两派都被邀請了,但是可能派沒有到会。拉法格代表了馬克思派。代表中間有两名德国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两名荷兰人(多梅拉·紐文胡斯和克罗耳)、两名比利时人(安塞尔和沃耳德斯)和两名瑞士人(賴歇耳和舍雷尔)。

当时應該解决三个主要問題:第一,召开統一代表大会的措施;第二,制定参加統一代表大会的条件,凡是愿意在統一代表大会上有自己的代表的小組,任何一个也不会被排除在外;第三,代表大会在它的內部事务方面的主权。應該指出,可能派由于跟着工联議會委员会的脚印走,已經事先把他們打算用来束縛代表大会的守則和規章公布了。不但完全預定好了日程,而且此外还有一条規則,即不應該由整个代表大会,而應該由每个全国性的小組单独来审查和批准代表資格证。虽然代表大会后来可以接受或拒絕这个日程和这个审查代表資格证的方法,但是,接受或拒絕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疑應該給代表大会本身,何况,可能派規定的审查代表資格证的方法,实际上使他們有可能只許合乎他們愿望的法国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人們記得,几个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样差一点被議事規程制定委员会排除掉的,在这个委员会里,英国工联同外国人比起来只占微不足道的多数。而巴黎是可能派的支柱,而且他們打算請求巴黎市政委员会提供5万法郎(2000英鎊)供代表大会之用,由他們支配这些款項。

于是,海牙代表會議一致通过了下面的決議:

“下面签名的人建議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可能派的正式名称),根据1888年伦敦代表大会授予它的全权,协同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組織和社

会主义組織召开巴黎国际代表大会。

由工人組織和社会主义組織的全体代表签名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应该尽快告知欧洲和美洲的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者。

在这个通知书中应该声明:

(1)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定于 1889 年 7 月 14 日到 21 日举行;

(2)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在适合每个国家的政治法令的条件下参加代表大会;

(3)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資格证和确定議程方面将是有主权的。

議程暫定如下:

(a)国际劳动立法——从法律上調整工作日(白天劳动,夜間劳动,假日,成年男工,女工和童工);

(b)对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

(c)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和途徑。

德国代表 奥·倍倍尔 威·李卜克内西

瑞士代表 亚·賴歇耳 亨·舍雷尔

荷兰代表 斐·多·紐文胡斯 科·克罗耳

比利时代表 爱·安塞尔 让·沃耳德斯

法国代表 保尔·拉法格

1889 年 2 月 28 日于海牙”

由此看来,代表會議向可能派百般让步了。根据伦敦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大会的筹备和組織工作委托給了他們,而他們的法国对手是被排除于这项工作之外的。人們要求可能派做的,只是公布一个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同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同样也由其他一切有关的党派签署,并規定:(1)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2)参加代表大会的主要条件;(3)代表大会对議事規則和議程的主权。这种让所有在上面签字的組織負有义务的共同通知书的形式,是保证代表大会的真正普遍性和国际性的最好手段,更确切些說,是唯一的手段。共同通知书提出的参加代表大会的主要条

件，可以防止重演不容許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代表参加的丑事，而由于这种丑事，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当代的无产阶级运动代表面曾經是如此不充分。在議會委员会企图創造先例和可能派仿效它的榜样之后，要求特別指出代表大会在它的一切内部事务方面享有主权，就成为必要了。这个要求涉及的仅仅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完全没有侵夺伦敦代表大会授給可能派的全权，因为伦敦代表大会并没有授权而且也不能授权世界上任何人来規定对以后的代表大会会有約束力的規章。

海牙的決議根本不是以同伦敦代表大会相抵触的精神通过的；下面的情况证明了这点，即同意这个決議并且在它上面签了字的代表当中，有两名代表——根特的安塞尔和海牙的克罗耳——也是 1888 年 11 月在伦敦的代表，并且不仅是亲身出席的代表，而且是代表外国人的执行主席。这点还可以用另一种情况来证明，即没有被允許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两名德国人和没有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法国人，都同意可能派保留在那里能够享有和已經授給他們的一切全权。他們只要求一点：根据同其他代表平等的原則，保证他們有可能参加巴黎代表大会，并且在这个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代表大会本身能够最后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由于海牙代表會議敢于以这种和解的精神行事，“正义报”就称它为“秘密會議”！

可能派拒絕了向他們建議的合作。他們同外国的社会主义者同他們一起在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上签字，但是，不属于他們这一派的任何一个法国社会主义者，都不應該签上自己的名字。由此可見，他們是在追求法国唯一的社会主义組織这个角色，并且指望我們这些外国人承认他們就是这种組織。此外，他們不

同意由整个代表大会規定代表資格证的审查方法，据說是有可能派事先指示的守則和規章，而代表大会應該毫不推諉地接受。

这些情况，会打消人們对去年11月在伦敦決定召开、并且委托可能派組織的代表大会并不只是一个假代表大会所抱的一切希望。我們可以等着看，在海牙有代表的团体現在会怎样做；不管怎样，它們已決定共同行动。

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正义报”硬說，似乎这家报纸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后“拚命嘲笑和辱罵可能派”。“正义报”号召所有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我們联合起来，真誠地謀求結束这种无謂的恶意的爭吵和傾軋”。

“正义报”用它那特有的調子批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論和行动，已經有好多年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种嘲笑和辱罵，或者对这种无謂的恶意的爭吵和傾軋，一次也沒有抱怨过。無論是在我們党内，或者是对无产階級运动的其他国家的支部，我們德国人已經习惯于进行非常坦率的批評。我們非常清楚地懂得，把这个运动变成一个相互吹捧的协会或鼓动家彼此保险的保险公司，这对我們的敌人來說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們現在已經不那么嬌嫩，已經能够忍受住“正义报”的攻击而不打一下哆嗦。但是要知道，我們来到英国，并不是为了放弃我們在俾斯麦面前曾經保持过的、英国人在过去光荣的革命战斗中爭得并有理由引以自豪的那种自由批評权。所以，在我們认为必要的时候，我們就要不客气地公开說出自己対法国社会主义者，当然也有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爭吵和傾軋”的意見。

可能派近来所奉行的政治路綫，絕對不是一向得到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遍贊同的，而他們在最近巴黎选举期間采取

的立場，也沒有任何理由。他們在把共和国从布朗热手里拯救出来的借口下同資產階級共和主义的最会卖身投靠的分子，同靠吸法兰西的血而发财致富已經有十年的机会主义派⁵⁸⁴ 联合起来；他們拥护和投票贊成政府的候选人、酿酒資本家、“下流的候选人——法国的約翰·詹姆森”(1889年1月19日“正义报”)。而当社会主义者工人布累，即不久前組織了挖土工人大罢工的那个人被提为候选人与布朗热和雅克相对抗的时候，他們附和了資產階級的合唱：不要在伟大的共和派的队伍中制造糾紛！在英国这里，伟大的自由党用同样的話不止一次地声明反对“正义报”提出的候选人。如果使工人們有可能投票贊成他們自己的代表中的一个，而不是使他們面临这样的选择，即要么投票贊成布朗热，要么贊成資本家中的一个（正是資本家想把法国的財富弄进自己腰包的貪欲，像海德門先生在1889年2月2日“正义报”上非常正确地指出的，才使布朗热成为他現在这个样子），对布朗热的斗争岂不是会更加成功。

对“正义报”應該公正^①：它既沒有为可能派的这些行为辯护，也沒有为“他們同資產階級政党在某种程度上有損名譽的联系”（1月28日“正义报”）辯护；但是，它也对自己的讀者只字未提可能派的机关报“工人党报”⁵⁸⁵ 曾經在反对布朗热的狂热中要求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可恶的出版自由”^② 和結社自由。“正义报”用尽一切办法来瞞过自己的讀者，既不讓他們知道这个事实，也不讓他們知道圍繞着工人候选人的斗争和工人候选人仍然获得了

① 双关語：《Justice》有“公正”的意思，也是該报的名称。——編者注

② “我們應該不倦地重复，在我們所处的这个危急时期，这种出版自由應該取消”——1889年3月18日（正是在这一天！）“工人党报”。

17 000 张选票。由于我們公开地談到可能派的这些可耻行徑，这个不敢为它的可能派朋友的行为辯护的报纸就指責我們，說我們是在搞嘲笑和辱罵，是在搞无謂的恶意的爭吵和傾軋。

問題在于，可能派現在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党——內閣社会主义者，并且享有这个地位的一切好处。当波尔多代表大会被当局禁止、受到警察局的迫害、并且只是由于它在一个市长有革命情緒的临近小城的市政厅里給自己找到容身之地才能举行的时候，当警察局向特魯瓦代表大会进行了几次襲击，制止悬挂紅旗的时候，——这些事实可能派的报纸既沒有譴責，甚至也沒有提到——这些“非常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却正在同巴黎的查理·沃伦之流非常和諧地合唱。当巴黎当局禁止了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筹划的要求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的时候，他們不仅不表示抗議，反而公开欢迎这个步驟。

由此看来，如果今年在巴黎举行两个代表大会的話，其中一个不但会得到警方的保卫，而且会得到贊助。它将得到政府、省当局和巴黎市政委员会的賞識。它将受到祝賀和百般的巴結。它将得到官方的外宾在資產階級共和国里所享有的一切优待和特权。

好心的共和派將躲开另一个代表大会，当局將警惕地注視着它，頂多只是不去打扰它而已。如果英国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他們會感到置身在巴黎就像突然又出現在特拉法加廣場上了。

写于1889年3月

原文是英文

1889年3月以小册子的形式
在伦敦出版，并載于1889年
3月30日和4月6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13和14号

俄文是按小册子譯的

給“工人选民”报編輯部的信⁵⁸⁶

鉴于你們对有关即将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一些問題經常发生兴趣，我相信你們会允許一个法国人，一个所謂法国馬克思派的組織(Agglomération Parisienne)的成員說几句话，作为对巴黎劳动总会通报上发表的，并由4月27日“正义报”用英文轉載的通告的答复。

巴黎劳动总会目前是一个完全掌握在可能派手中的組織。可能派在机会主义派和激进派⁵⁸⁷——巴黎市参議員——的帮助下攫取了这一組織，并且任何一个工会，只要它敢于公开反对可能派的原則和策略，就会立刻被开除。因此，上述通告虽然是以巴黎七十八个工会組織的名义发表的，但就像是可能派委员会自己发表的可能派的作品一样。

这一通告号召“法国工人阶级的一切組織，不管持什么观点(共和主义的也好，社会主义的也好)”，都在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中联合起来。看来，事情办得很公正。由于我們这一派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省里完全排除了可能派，所以当他們一听到我們允許他們前来特魯瓦出席他們自己的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們竟不敢来，由于我們在各省的組織比起法国所有可能派的組織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所以，无疑地，假如保证实行代表資格的公正原則，甚至在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上我們也会拥有法国代表的多数。但是問題的

关键恰恰就在这里。可能派委员会虽然为自己的代表大会搞出了一大堆规定，但正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从来连提都没有提过。谁也不知道，每个小组应当派多少个代表，是一个、两个还是更多，代表的人数是否应当视这个小组成员的人数而定。大家知道，可能派是巴黎最强大的组织，所以他们每个小组可以派两个或三个代表，而我们则由于自己老实，将只能派一个代表。他们想制造多少代表，就能制造多少代表。在巴黎他们的代表都是现成的，只要指定就行了。于是，这一切表面上看来很公正，而代表大会的法国支部就会变成可以对我們为所欲为的一帮可能派，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我們也必须诉诸代表大会。

仅仅出于这种考虑，我們也不能放弃代表大会在处理它的一切内部事务方面的主权，——如果一般说来有可能放弃这个头等的基本原则的话。我想，在伦敦人們还没有完全忘记，议会委员会去年11月使当时的代表大会十分明显地感到，会场是它租的，因此，代表大会在那里举行是出自它的恩情。我們不希望这种情况在巴黎重演。

写于1889年4月底

載于1889年5月4日“工人
选民”第1卷第1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譯自“工人选民”
俄譯文第一次发表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89年7月14—21日)

告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⁵⁸⁸

1888年10月，在波尔多举行了有二百多个工会——工商会和同业小组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国际博览会期间应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

1888年12月，在特鲁瓦举行的有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切派别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波尔多代表大会任命的全国委员会和特鲁瓦代表大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被委托来商定共同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并被委托来邀请欧洲和美洲一切致力于劳动解放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不分派别都来参加大会。这一点已经做到。

1889年2月28日，在海牙举行了有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代表会议。英国社会主义同盟和丹麦的社会主义者由于缺席而表示抱歉，并且预先声明，它们将赞同所通过的一切决议。

海牙代表会议决定：

1. 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定于1889年7月14日到21日举行；

2. 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在适合每个国家的政治法令的条件下参加代表大会；

3. 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确定議程方面将是有主权的。

議程暫定如下：

(a) 国际劳动立法——从法律上調整工作日(白天劳动, 夜間劳动, 假日, 成年男工, 女工和童工)；

(b) 对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

(c) 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和途径。

据此, 并根据波尔多代表大会和特魯瓦代表大会对我们的委托, 根据海牙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

(1) 我们将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定于 1889 年 7 月 14 日到 21 日举行。

(2) 議程与海牙代表会议确定者同。

(3) 我们将邀请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应当为新旧两大陆一切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奠定基础。

我们在巴黎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 委托它最终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和筹备接待外国代表的工作。

我们向全世界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国际工人解放万岁！

波尔多全国委员会：
总书记 雷·拉維涅
胥利旺街 16 号

特魯瓦执行委员会：
总书记 G. 巴提斯

巴黎执行委员会：

巴黎工团联合会：

布累，貝塞，費兰，蒙索，魯賽耳

巴黎的社会主义組織：

瓦揚，盖得，杰維尔，雅克拉尔，克雷潘，拉法格

巴黎市参議會社会主义者小组：

多馬，龙格，肖維埃尔，瓦揚——市参議員

众議院的社会主义者小组：

費魯耳，普郎托——議員

通訊处：巴黎，让·雅·卢梭街，劳动介紹所，鞋匠工会委员会，法国書記貝塞

巴黎郊区勒-佩勒，外国書記保尔·拉法格

以传单的形式在伦敦发表，并載于
1889年5月10日“柏林人民报”
第109号，1889年5月11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19号，1889年5月
18日“工人选民”第1卷第20号
和1889年5月25日“公益”杂志
第17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II. 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⁵⁸⁹

这篇登載在 1889 年 5 月 25 日“正义报”上的宣言，力图向全世界宣告有关上述代表大会的“明明白白的真相”。对这些“明明白白的真相”負責的是“社会民主联盟国际委员会”和“社会民主联盟总委员会”。我們不清楚这两个机构是由哪些人組成的。一个名字都沒有提到，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注意到宣言的作者們喋喋不休地抱怨海牙“秘密會議”，它的参加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沒有向任何人隱瞞自己的名字的話。然而社会民主联盟的总委员会也好，它的国际委员会也好，都是根本莫名其妙的东西。有人可能还記得，1888 年 10 月 23 日，社会民主联盟总委员会以七票对二票的多数做出了一个譴責海德門先生“賄买”“正义报”的決議；海德門先生以极端蔑視的态度对待这个決議（1888 年 10 月 27 日“正义报”），称它是“偶然的”，并且很快就以同样的或者还要多一点的多数票把这个決議取消了。在这以后，这个总委员会甚至甘冒自己被人称为“秘密會議”的危險而不列举人名，这是毫不足怪的；而事实上，在这以后列举人名与否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宣言是这样开始的：

“我們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同志們的一个支部和其他非社会主义者一起通过一个決議，决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和我們的可能派同志們召开和

組織的代表大會相對抗，決議要求說明大不列顛人數最多和力量最強的社會主義組織，即社會民主聯盟的真實情況。”

這裡提到的“非社會主義者”是哪些人呢，他們的名字被小心翼翼地隱瞞起來了，正如提出上面那種說法的人的名字被小心翼翼地隱瞞起來了一樣；因此不能確定，這種說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明明白白的真相”，或者不是。然而，這種說法不是有意識的誹謗，就是根本毫無意義的東西，當它從那個與可能派訂立了緊密的攻守同盟的組織的代表們的口中說出來時，聽起來是相當奇怪的，這些可能派在沒有“其他非社會主義者”的幫助的情況下還從未能召開過一次代表大會。1883年，他們在巴黎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上，出席的外國人只有以布羅德赫斯特先生為首的英國工聯主義者的首領們，並且布羅德赫斯特先生非常滿意會上的發言和通過的決議。他們的第二次代表會議就其成員而言同第一次代表會議沒有多大差別，而1888年的倫敦代表大會甚至是由工聯代表大會議會委員會召開的，大家都知道它的成員“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恰恰相反。

然而我們撇開這一點不談。宣言的作者們利用這個機會提醒我們，社會民主聯盟是“大不列顛人數最多和力量最強的社會主義組織”。這件新聞在每一號“正義報”上一周復一周地宣布幾乎已經有六年之久了，但畢竟有一些墮落的人竟敢懷疑社會民主聯盟的偉大和實力；他們甚至敢於斷言，這些發誓要人相信社會民主聯盟的偉大和實力的話，恰好在社會民主聯盟的實際偉大和力量衰敗的時期說得特別頻繁、響亮和令人厭惡。他們援引這樣的事實：去年年底“正義報”的版面“只是在節日期間”才縮小一半；可是，這些節日却一直延長到今天，而且有些熟悉報紙情況的人斷定，這

家印数号称超过四千份的报纸现在的发行量几乎只及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还断定，联盟有一些这样的分部，它们从来没有举行过集会，连门面也不装潢一下，而在许多大工业城市里根本没有人读这份报纸。应当说，像波尔顿分部的报告（1888年5月28日“工人选民”报）——它同宣言不一样，不是匿名的而是由八名联盟盟员署名的——这样的报告对于证实这些说法是很有帮助的。当向敌人透露自己的被夸大的力量的时候，无论怎样为这种军事上的计谋辩护都行；但是当这种计谋被用来蒙蔽自己的同盟者和同志们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就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了。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或许才能在联合王国找到一个绝无仅有的人会让自已受社会民主联盟的这些使人厌烦的吹嘘的欺骗。

我非常抱歉，我迫不得已用这样的口气来谈论一个做了不少好事，它本来还可以做更多好事，而且它的成员里有很多优秀分子的组织。但是，只要它像目前那样听人摆布，它就别指望获得它所企求的地位。

其次，宣言的作者们声明说，他们方面为了达成协议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既然这看来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们现在决定，仅限于“叙述从来没有争辩的，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些明明白白的事实共有十四件。

1. “法国可能派……曾受 1886 年工会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委托于 1889 年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出席这次 1886 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德国人的代表是格里姆佩。”

这件“明明白白的事实”确实是没有人争辩的；只是 1886 年会议当时不过称为“代表会议”，而现在，为了使它具有更大的分量，

就把它变成了真正的“代表大会”。其次，有一个重要的疏忽：格里姆佩沒有投票贊成这个決議，因此他出席代表會議絕對不等于“德国人”同意委托可能派办事。

2. “英国工联議會委员会不許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代表参加 1888 年工会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是完全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随后德国人宣布这个代表大会是‘殘缺的代表大会’，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一些人（目前他們正在組織一个对垒的巴黎代表大会），就号召其他民族的代表不要参加伦敦代表大会，因为他們自己沒有被允許参加这个代表大会。”

对这一点沒有異議。

3. “然而 1888 年工会伦敦国际代表大会还是举行了，并且开得很成功。德国国会社会党人的特別亲密的盟友，法国的所謂馬克思派或盖得派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法尔雅。这个代表大会一致授权可能派召开并着手筹备 1889 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法尔雅同其余的人一起投票贊成这个決議，比利时人的代表安塞尔和一个荷兰人^①也表示贊同。尽管如此，安塞尔和克罗耳却参加了海牙秘密會議。”

硬說法尔雅代表“所謂馬克思派或盖得派”是与事实不符的。法尔雅是由伦敦代表大会之前几天在波尔多开幕的法国工会代表大会派往伦敦去的。只有把所有非可能派的法国工人都当做是“馬克思派的或盖得派的”，才能把派遣了六十三名代表到波尔多的二百五十个地方工会叫做“馬克思派的或盖得派的”。波尔多代表大会也一致決議“召开并着手筹备 1889 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而且它是在伦敦代表大会做出決議之前几天做出这个決議的。可是，既然派代表去波尔多的那些人全都被可能派像对待敌

^① 科·克罗耳。——編者注

人一样地排斥了，那他们根本不可能想到授权这些可能派去召开代表大会，因此硬说“法尔雅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简直是荒谬的，就像说“马克思派”应该受法尔雅的这次投票的约束一样荒谬，其实，他根本没有投票，就算他投过票，那也只是出于错误，连他本人也不能受其约束。

至于投票赞成上述伦敦决议的安塞尔和克罗耳竟然“参加了海牙秘密会议”这一情况，那它确实能使每一个会对我们分析的宣言的“明明白白的真相”和“不可争辩的事实”感到满意的人难于置信。但是从这篇回答的附录^①中可以看出，安塞尔和克罗耳认为不仅需要到海牙去，而且需要完全避开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并支持召开一个对垒的代表大会；这样做的不仅有安塞尔和克罗耳，而且还有其他的伦敦代表，而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欧洲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代表。宣言的“明明白白的真相”他们全都早就一清二楚了，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恰好仍然——人类天生的劣根性就是这样！——同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这样费尽心机地想强加给他们的结论相反。

4. “可能派无论在巴黎(那里他们获得了五万张选票)或外省都是绝对最强大的法国社会主义党派，在接连得到这两个委托以后，它就着手——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召开和组织 1889 年 7 月底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在市镇选举中可能派的确获得了近五万张选票，其中有很多是他们的反对者，集体主义派(所谓的马克思派)所投的，他们相当宽厚，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努力抛弃派别分歧。可是断言可能派“无论在巴黎或是外省”都是“绝对最强大的法国社会主义党派”，

^① 见本卷第 613—616 页。——编者注

这纯粹是撒谎。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巴黎是可能派的堡垒，然而即使在这里，可能派的状况从他们不仅公开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而且还同机会主义派这帮成为目前法国官方集团腐败现象的化身的证券投机商人结盟以来就急剧地恶化了。可能派在同布朗热做斗争的借口下所结交的正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的渎职罪行恰好为布朗热树立了声望，并且迫使所有各阶级的数以十万计的人大声疾呼：“宁愿要布朗热，宁愿要魔鬼，就是不要这个吸干我们的全部血液的腐败制度！”——这个事实吓跑了许多可能派过去的忠实信徒；而当可能派在1月选举中支持**资产者**雅克（他在市镇参议会上一贯投票反对一切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决议），并且实际上反对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布累的时候，他们队伍中的不满迹象就开始增加了。当他们的一位演讲人雷提在集会上为雅克辩护的时候，拥护布累的工人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和打断他的话；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讲台，并大声嚷叫：“是的！我将投雅克的票，可是我要报复那些迫使我干这个卑鄙勾当的人！”而布累，尽管遭到了可能派的疯狂反对，仍然获得了一万八千工人的选票。

在这之后，巴黎可能派内出现了瓦解的征兆，这是用不着惊奇的。4月16日巴黎第十四选区小组被代表委员会开除了，反对开除的只有两个人。4月23日阿列曼要求强迫两名党员交出某些信件，否则这些信件可能被用来损害某些领袖，这个建议被交给二十六个小组去进行表决。但是十五个小组反对它，三个弃权，而第十三选区的许多重要组织都因此退出了联盟，同时声明说：

“费里、克列孟梭和兰克的同盟者再也无权妄想留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自己活动的基础的党里。他们由于背叛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义务而背弃了党；现在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支柱。”

这虽然还只是开始，但是毋庸置疑：甚至在巴黎，可能派首領們的統治也严重地动搖了。

至于断言可能派在外省是“绝对最强大的”，那末这不仅不是“明明白白的真相”和“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简直是荒誕的。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社会主义組織都沒有加入可能派的联盟，而是同它敌对的。例如，里昂（五名市鎮参議員是社会主义者）、馬賽（一名省参議員是社会主义者）、魯貝（两名市鎮参議員）、阿尔芒提埃尔（五名市鎮参議員）、蒙呂松（两名市鎮参議員）、科芒特里（市鎮参議會全体参議員以及市长都是社会主义者）、加来（两名市鎮参議員）、利尔（在最近的市鎮选举中拥护非可能派社会主义者的有四千票）、布尔日、維埃尔宗、罗昂、波尔多、納尔榜、阿累斯等等，等等。在这些市鎮参議員和省参議員中一个可能派也沒有。在所有这些城市里一切社会主义組織和工人組織都无可争辩地掌握在可能派的反对者的手中。

的确，近几年来可能派在外省甚至都不敢露面。1887年，他們想选择一个举行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哪怕是多少有点成功希望的地点，他們不得不选定阿尔登省的一个未必有人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偏僻市鎮。去年冬天，当他們宣布在特魯瓦（在他們看来，当地工人代表是可以信賴的）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的时候，特魯瓦地方委员会声明說，这一次代表大会的門将真正地，而不是仅仅虚有其表地向法国所有社会主义組織和工人組織敞开。当巴黎可能派的首領們弄清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他們就宁肯不出席自己的代表大会，也不愿同集体主义派和布朗基派見面，这两派人已来到特魯瓦，并举行了由可能派召集的，但是被他們所抛弃的、而实际上是从他們那里夺取过来的代表大会。

可見，可能派是絕對最強大的這個“明明白白的真相”同宣言中關於社會民主聯盟的偉大和實力的大吹大擂的聲明是一類貨色。

然而，不管他們強大還是不強大，他們“認為召開巴黎代表大會是自己的職責”。

這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即為此目的而授與他們的全權是否有效的問題。

1886年的巴黎代表會議只有很少外國代表參加，——一般說來很難把它稱為有代表性的會議——因此它的決議只不過是一種願望而已。這種決議頂多對那些投票贊成它的人，就是說對可能派和英國工聯主義者才有約束力。這些工聯主義者在他們最近的赫爾代表大會上已經拋棄了巴黎決議。因而，剩下的就只有這樣一件事實，即1886年可能派在巴黎自己授權自己於1889年召開巴黎代表大會。

現在談談倫敦代表大會。

倫敦代表大會不是全體工人的代表大會，這是工聯召開的、除了工聯主義者以外原則上沒有讓任何人參加的工聯代表大會。這樣的代表大會的決議對於不是工聯主義者的工人，或者對於所有社會主義者說來怎麼能有約束力——這對我說來倒是個秘密。工聯代表大會可以召開另一次工聯代表大會，但止此而已。如果它召開工人代表大會，那就越權了；這種舉動本身是可以獲得我們的同情的，因為它標誌着對陳舊的工聯主義偏見的勝利，但事實終歸是事實：召開代表大會不屬於倫敦代表們的職權範圍，因此這只不過是一種願望而已。

無疑地，波爾多代表大會也只是工會的代表大會，因而，它關

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同样程度上也是无效的。但是，这项决定在同年 12 月为特鲁瓦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批准了，甚至连可能派也没有理由能够反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因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他们自己召开的，如果说他们没有出席大会，那末这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

谈到由于故意不让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数几乎等于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数）的代表参加伦敦代表大会而使这次代表大会变成残缺的代表大会，这倒是“明明白白的真相”，真正“不可争辩的事实”；甚至连宣言也不反对这一点，它只是抱怨说，德国人给了代表大会一个这样的称呼，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呼。

况且残缺的代表大会（它的少数派，可以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在自己的活动中并不是不受拘束的。一旦英国的希普顿派工联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希普顿派就通过希普顿本人的口声明，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就宣布代表大会闭幕；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因为会场是他们租的。这样一来，一开始就令社会主义者感到，他们处在爱尔兰佃农的地位，而他们的大地主希普顿已做好准备，如果需要，就借助于女王陛下的武装力量来行使他的强迁权。

社会主义者屈服了，而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可是他们没有提出正式抗议，这是个错误。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忘记，由于奖励他们表现出来的信任，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并且，从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坚决表示，这种情况绝不允许重演。

此外，议会委员会为代表大会准备了一大堆规章和指令，指望

利用它們来堵住社会主义者的嘴，并使他們俯首听命。代表資格证的审查、議事日程、表决方式——实际上整个議事規程都是由希普頓派事先拟定好，并以立即驅逐作为威胁而强加給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的。伦敦代表大会并不比一个受雇为資本家工作的工人更自由，也不比一个从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那里租种三、四英亩土地、面临要么接受他的条件，要么餓死的抉择的爱尔兰农民更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将載入工人运动史册这已經是够可耻的了；可是还要在这样的或者类似的条件下召开一个代表大会——这是絕不容許的！

尽管如此，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者少数派仍然痛斥了希普頓多数派，以致議會委员会很快就对这一个打算冷淡下来了。它公开地把代表大会的各项決議，首先是关于召开巴黎代表大会的決議，当做一张紙片那样来对待。

因此，可能派从伦敦代表大会那里得到的委托是沒有充分根据的，第一，因为它是工联代表大会頒发的，而工联代表大会是无权拿义务来約束沒有参加工联的工人和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第二，因为伦敦代表大会不让德国人和其他人参加而成了殘缺的代表大会；第三，因为它的行动是不自由的；以及第四，因为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代表大会上构成多数派的那些人首先宣告了这个委托无效。

如果不是可能派和他們在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拥护者經常向我們提到伦敦代表大会的委托就像提到什么神圣的和沒有瑕疵的东西一样，一般說来我是不会参加这场爭論的。这个委托被看得高于一切；不用說，它一笔勾銷了早先在波尔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后来又由特魯瓦代表大会批准的決議；它不仅对于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投票贊成它的人有約束力，而且对于那些沒有到伦敦去、甚至

被有意排斥在外的人都有约束力。因此当这些奢望被提出来时，确定这个委托的真正价值就成为绝对需要的了。

应该说，虽然伦敦的委托就其实质而言是无效的，虽然它对其余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波尔多代表大会说来是当众打的一记耳光——诚然，这一记耳光并不是大多数投票赞成委托的人有意打的——毕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未参与委托的人对这个委托表示了极大的尊重，而且要不是这些可能派的无原则的行为，委托事实上或许已经终于为大家所同意了。

可能派宣布召开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通告表明，他们不仅不谴责议会委员会用以束缚伦敦代表大会的自由的方式，而且认为这种专横霸道的行为开了一个先例，并覬覦议会委员会篡夺的那些权利。他们事先拟定了议事日程、表决和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式，而且代表资格证的审查应该由各个全国性的小组单独进行。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一切都只是临时性的，并且应当由代表大会来批准。

然而，伦敦代表大会不能授与可能派任何它本身并不具有的权力。任何代表大会都不能提出下次代表大会无权废除的决议。因而，伦敦代表大会没有权利授权可能派制定巴黎代表大会必须遵循的规章和指令。而且它也根本没有这样做。然而可能派却覬覦这样的权利。正是可能派的这些无耻的野心引起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分歧和争论，由于他们不愿意明白清楚地表示放弃这些野心，因而导致了分裂和召开第二个代表大会。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者不希望再一次——这一次是他们眼睁睁地——落入圈套。

可见，争论的东西与其说是伦敦的委托，——这里要达成协议并不困难——不如说是可能派对委托的使用，他们的野心，即强行

制定代表大会必須遵循的法律，从而把議會委员会对待伦敦代表大会的专橫霸道行为推崇为今后一切代表大会的先例。

5. “馬克思派虽然受到法尔雅的投票的約束，但对此表示抗議，并且鼓动德国人起来抗議，因为，按照他們的話說，可能派有不許自己的反对者参加代表大会并利用代表大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意图。这一指責是他們提出的，尽管可能派直到現在为止从来没有拒絕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参加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他們这一次打算要这样做。邀請书已向所有社会主义組織发出。”

这个“明明白白的真相”的主要部分已經被我們駁倒了。但是断言“可能派直到現在为止从来没有拒絕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参加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們这一次打算要这样做”——这或者是蓄意制造弥天大謊，或者是证明宣言的作者們对自己写的东西根本莫名其妙。在1882年5月中央联合会联盟(法国)第三次地方代表大会上，可能派宣布，代表大会允許一切社会主义者参加。然而当三十名集体主义派（即所謂馬克思派）相信了这个声明，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时候，却被毫不容情地攆走了，借口是可笑的：他們由于采用了《Fédération du Centre》〔“中央联合会”〕的名称而同可能派的《Union Fédérative》〔“联合会联盟”〕进行了不光彩的競争。1887年，当十二名集体主义派的代表根据多次发表的关于邀請一切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声明前来出席这个联盟的第八次地方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們受到了喊叫声和嘲笑声的欢迎，并被迫离开了代表大会，当时还做了一项决定：“永远不許馬克思派参加我們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比这更妙的是，1888年，当受委托組織可能派特魯瓦全国代表大会的地方委员会威胁說，这一次要实现始終不断地重复的关于允許一切社会

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话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可能派宁肯离开他們自己的代表大会，就是不愿实践自己許下的虛夸的諾言。

在这一切发生以后，集体主义派确信“可能派有不許他們参加代表大会并利用代表大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意图”，这难道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嗎？

6. “不管怎样，拉法格、盖得和其他馬克思派配合在帝国国会的党内的德国人和他們的朋友，召开了南錫代表會議。可能派是最后，即在代表會議應該召开之前一星期才被邀請参加这次代表會議的。”

南錫代表會議是德国人而不是拉法格召开的。相反地，拉法格反对召开代表會議的時間和地点，并想尽一切办法来取消它，他成功了。可能派不是“最后”被邀請的，而是和所有其余的人同时被邀請的。因此，第六件“明明白白的真相”是彻头彻尾的撒謊；但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它证明的又是什么呢？

7. “南錫代表會議沒有举行成，而代之以海牙代表會議。可能派又是最后被邀請参加这个代表會議的。作为对邀請的回答，他們写了几封包含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問題的信。对这些信一封都沒有回答，而代表會議也就在沒有他們参加的情况下立即举行了。”

再次断言可能派是最后被邀請的，还是撒謊。他們是和所有其余的人同时被邀請的；尽管这件事情本身並沒有多大意义，我們仍然專門把它讲清楚。代表會議訂于2月28日召开，而2月17日当可能派举行他們的全国委员会會議时不仅已經接到了邀請书，而且已經收到了李卜克內西對他們的包含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問題”的信的回答，也就是对那些，用宣言的話來說，“一封都沒有回答”的信的回答。他們自己說，李卜克內西“沒有回答他們的

有关代表會議的議事日程的問題”。^① 据我所知，他告訴他們說，他們將在这个代表會議上得到對這些問題的答复。或許，可能派是希望就先決條件問題進行長期的通信，從而把代表會議拖延到代表大會本身之後。但是那些認真致力於達成一個受到一切有關方面一致尊重的協議的人則根本不希望這樣做。不管怎樣，可能派後來沒有出席代表會議，因此代表會議不得不在確實沒有他們參加的情況下舉行了。

8. “這次代表會議是在大不列顛、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國家的代表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甚至連社會民主聯盟也沒有得到它即將召開的消息。只有顯然與可能派為敵的那些人才得到了邀請書。法國的唯一代表是拉法格自己，儘管他同可能派有多年的、激烈的私人性質的紛爭！關於代表會議的總結報告，不論當時還是事後都沒有全文發表。”

9. “像這次這樣的代表會議不是別的，而是在我們看來，一個追求不良目的的秘密會議。我們不得不懷着深深的遺憾說，我們尊敬的多梅拉·紐文胡斯同志在他給社會民主聯盟的一封信中斷定，這次代表會議是有意要秘密舉行的。”

由於海牙代表會議是德國人召開的，他們邀請了那些同他們保持聯繫的外國社會主義者，即荷蘭人、比利時人、丹麥人和瑞士人，以及兩個法國黨派（當時他們需要在這兩派之間擔當調停人）。派遣威·莫利斯作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同盟是拉法格邀請的，而可能派也曾經可以用同樣的方式邀請社會民主聯盟；不管怎樣，在這裡，即在倫敦，誰也不清楚，誰被邀請了和誰沒有被邀請，以及誰被授權邀請誰。至於被邀請的只是顯然與可能派為敵的那些人，這是謊話。比利時人同他們已經保持了好幾年的友好關係，並在今

^① 見2月23日他們的正式機關報“無產階級”590。

年复活节举行的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明，最不希望因某事而引起他們的不滿。⁵⁹¹ 荷兰人、丹麦人和瑞士人也不是与他們为敌的，当然也就更談不上“显然为敌”。如果說拉法格成了法国的唯一代表，那末这只应归咎于不愿接受邀請的可能派。說拉法格同可能派的“多年的激烈的紛爭”带有私人的性质，这是撒謊。拉法格、盖得、杰維尔以及一大批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組織同党的多数派断絕了关系，是因为多数派背弃了自己的綱領，而宁肯建立一个**根本沒有綱領的党**。

在第八条和第九条里唯一正确的地方是，代表會議是“秘密的”，因为它不是公开的。公众和报刊的代表当然沒有被邀請参加代表會議。如果它对可能派說来是“秘密的”，那只是因为他們认为沒有必要出席代表會議。然而，代表會議之所以做出決議，就是專門为了要通知可能派，并且立即由沃耳德斯通知他們。在这种情况下对“秘密的”代表會議发出的这种埋怨究竟有什么意思呢？無論如何，代表會議比起要对宣言負責的两个謎一般的机构的會議来，它的“秘密”性质要少得多。全世界不仅知道它的各項決議——因为它们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甚至連代表的姓名都知道。而邀請报刊的代表参加旨在为两个意見不一致的社会主义者的团体进行調解的代表會議，这当然是荒唐的。

10. “这样一来，这个关起門来开会的會議沒有引起严重異議就通过了許多決議。可是沃耳德斯被派往巴黎，为的是把这些決議强加給可能派，好像它們起碼是世界大会的指令一样，而伯恩施坦則以同样的腔調在伦敦写作。德国領袖們的信（但愿我們將不致于被迫发表它們），也是用非常恶毒的和盛气凌人的腔調写成的，而且威胁說，如果他們的命令不立即执行，就要召开对壘的代表大会。”

在对預謀的代表會議和秘密會議的做了各种含混的暗示之

后，讀者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会对这个“在我們看来，是追求不良目的”的、陰謀家的會議的可耻行徑和卑鄙暴行进行惊人的揭露。而結局如何呢？在海牙通过了“許多沒有引起严重異議的決議”！能說社会民主联盟国际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一点幽默感都沒有了嗎？

我們的作者們企图尽快地躲开这些決議。要知道，这些決議中所做出的让步比可能派希望能夠得到的要多得多。然而未被允許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德国人，以及为伦敦代表大会所忽視的法国集体主义派表示愿意承认伦敦的委托，允許由此而废除波尔多和特魯瓦的各项決議，和保留可能派召开和組織代表大会的权力，只要他們明白清楚地表示放弃强行規定代表大会必須遵循的規章和“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切企图。終究必須指出，甚至連宣言也不能对海牙的各项決議吹毛求疵。

然而，又据說，主要的禍害不是決議本身，而是他們企图迫使可能派接受这些決議的方式。这里又开始臆造了。派沃耳德斯去为的是要“把这些決議强加給可能派”。沃耳德斯之所以被派到那里去，是因为他是海牙代表會議所有代表中唯一最坚决地为他們辯护的人！“伯恩施坦写作”的东西除了他本人以外，对任何人都沒有約束力，像宣言的作者們現在應該知道的那樣。尽管我沒有权利代表“德国領袖們”說話，但我深信，如果我建議社会民主联盟和它的巴黎盟友发表所收到的这些領袖們的任何一封来信，他們是不会反对我的。

海牙的各项決議都公布了，可能派受到警告說，如果他們不接受这些決議，那末有代表出席代表會議的那些組織就要召开另一个代表大会，也就是在波尔多和特魯瓦做出決議要召开的那个代表大会。可能派或許会觉得这是“非常恶毒的和盛气凌人的”，然

而这是开导他們的唯一办法，如果一般說来这是可能的話。

往下是最精彩的东西——的确是整个宣言的精华。

11. “虽然如此，可能派还是实际上承认了按照上述方式做出的并向他們提交的全部決議。”

12. “尽管有了这种承认，尽管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内部事务方面無論情况如何都将是主权的，尽管每一方都可以把任何爭执不下的事件提交全体代表大会解决，海牙秘密會議的信徒們現在仍然在巴黎召开了第二个代表大会。”

海牙代表會議的参加者們曾声明說，他們准备在下述两个条件下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第一，可能派應該同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組織和社会主义組織协同召开代表大会，这些組織的代表應該同可能派一起签署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可能派断然拒絕履行这个条件，無論誰来签署都行，就是同他們对抗的法国集团的代表不行。如果宣言的作者們不知道这件事，那就請向“正义报”的編輯^①打听一下吧，这件事他知道得非常清楚。

第二个条件是，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資格证和制定議事日程方面應該是有主权的。对这个条件可能派不論在“实际上”还是在別的不管什么上也都沒有承认。起初，他們規定，代表資格证的审查由每个民族的小組单独进行。对方声明說，应将这个問題提交全体代表大会解决，对此可能派回答說，特殊事件可以交由代表大会解决，然而什么事件才算是特殊的，却只字不提。不，他們在繼續爭吵哪些权利該交給代表大会，哪些不該交給，并且他們只是在接到召开“对垒的代表大会”的通告以后才終於迫不得已明确和直

^① 海德門。——編者注

截了当地声称，全国性小组对代表资格证有异議的一切事件都将由代表大会来解决。如果他们及时发表这个声明，主要的困难就已经被克服了，当然，现在太晚了。

在議事日程問題上他們也玩弄了这种花招。他們不是把自己看做受委托来拟定——为使代表大会便于进行工作——将由代表大会自行决定批准或取消的临时性措施和建議的人；相反，他們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們像支配未来代表大会的某种神秘的、实质上是无限的权力的体现者一样，如果他们愿意，他們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权利让出一部分，以討好外国組織，然而后者为此就应该承认他們窃取控制代表大会的权力的其余的野心。只要看一看他們5月13日的最近的決議就够了，那时他們已經收到关于召开对壘的代表大会的通告（見5月25日“正义报”）。他們一直同丹麦人在議事日程上討价还价，好像他們或者丹麦人受权解决唯有代表大会本身才有权解決的問題似的。后来他們慷慨地同意接受英国工联抗議委员会关于把召开和組織未来代表大会的規定列入議事日程的建議。“正义报”天真地对此补充說，即使还有不滿的理由，“我們的德国同志們和其他同志們这一次总会同意了吧”。“只是这一次”請按我們的意見去做吧，而下一次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建議当然是誘人的，可是，很遺憾，去年在伦敦設法采用了这样的路綫，并且“那一次”这样做也就已經够了。

可能派只要說一句話，協議也就达成了，即他們應該在他們所有的規章和指令里加上“临时性的”、“应由代表大会批准的”等字样。然而，就是这一点，任何力量都不能从他們那里爭得；因此，第二个代表大会对于所有不希望再次成为希普頓化[shiptonized]的人來說才成为必要。

因为这次辯論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正义报”上进行的，所以十分明显，以社会民主联盟的名义說了第十二条里的那些話的人們，要么沒有看他們自己的正式机关报，要么故意咬定与事实相抵触的东西。

13. “他們把他們的代表大会定在可能派为自己的代表大会所定的同一个時間开会，虽然他們在海牙一致做出了決議，決議中說，7月底是組織巴黎工人代表大会最不适宜和最不方便的时间，虽然安塞尔在給社会民主联盟的信中肯定，如果第二个代表大会将要召开，那它将在9月举行，而李卜克內西說，它将不在今年就在明年举行。”

可見，結論是，海牙代表會議的代表們似乎对可能派郑重承諾不在7月而“在9月”，或者“不在今年就在明年”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但是，要知道7月的第三个星期毫無疑問是“在今年”，因此对李卜克內西無論如何是无可非難的。为了尊重我們的讀者，我們將不就这些幼稚的怨言进行辯論。不过，我可以說，选定7月14日至21日这个時間，首先是为了滿足法国人的一致要求，而其次是因为，唯一的、还没有經過檢驗的使两个代表大会合并的方法，如果这一方法一般地說有可能的話，——那就是使它們同时开会。

14. “海牙秘密會議和巴黎对壘代表大会的主要筹划人是拉法格、盖得、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女士(拉法格同她的姐姐，卡尔·馬克思的女儿結了婚)、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表示完全贊同他們的活動方式。”

在最后这个“明明白白的真相”里，毕竟确实有哪怕是一部分真相。誰也不会反駁这件事实，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女士的姐姐是卡尔·馬克思的女儿和拉法格的妻子；可是，宣言的作者們是

这样表达这一思想的，即可以理解为，似乎拉法格女士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儿，而她的妹妹就不是了。虽然說伦敦的伯恩施坦或者还有什么人无论如何都是“海牙代表会议的筹划人”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同召开代表会议和确定它的组成丝毫没有关系，我想上述这些人中谁也不会否认，他们促进了“巴黎对垒代表大会”的召开，但是他们只是在可能派的行为使得这个促进成为不可避免以后才这样做的。宣言的作者们应该清楚，在4月初，“正义报”的调子刚刚变得不是那么“恶毒的”和“私人性质的”时候，爱·马克思-艾威林女士和伯恩施坦就到海德门先生那里去，以便预先获得他对缓和现存分歧问题的支持，而海德门先生也答应给他们这种支持。

在宣言末尾有下面一段不长的注。

“上述全文将译成几种欧洲文字，并向各国分发。”

附件的签字证明，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实质上问题已经解决了。大陆上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表示赞成集体主义派和布朗基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反对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唯独英国是社会主义者和一般工人直到现在意见还不一致的国家。因此，这篇答复将不译成任何一种外语。

我归纳一下：

1. 1889年在巴黎应该召开两个代表大会：第一个是根据1888年10月至11月法国工会波尔多代表大会通过、法国社会主义者特鲁瓦代表大会在圣诞节批准的决定召开的；第二个是根据工会伦敦国际代表大会迟几个星期做出的决定召开的，而且委托可能派组织的代表大会。

2. 如果可能派在最初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告里就不追求伦敦代表大会本身沒有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授予他們的权力,即追求主持代表大会内部事务的权利,事先規定审查代表資格证的方式、議事日程和整个議事規程的权利,換句話說,就是追求議會委员会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所追求和實施的那些权利,那末实现两个代表大会的合并几乎是沒有阻碍的。

3. 由于可能派过去和現在的活动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其余各小组完全无法参加他們召开的代表大会,德国社会主义者——帝国国会議員試图借助于他們与之保持联系的全国性工人政党的领导人在两派之間进行調解。这样就产生了海牙代表會議(2月28日),代表會議的各项決議,甚至我們所分析的宣言也认为,“原則上沒有引起严重的异議”。

4. 伦敦代表大会对可能派的委托在这些決議里被完全承认和批准了,但条件是可能派放弃他們想控制未来代表大会的野心。比利时人、荷兰人、德国人、瑞士人甚至非可能派的法国人表示准备参加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如果这将是個不受拘束的代表大会的話。可見,他們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然而它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和无可爭辯的。

5. 尽管如此,可能派拒絕承认这些決議,并在以后的通告里建議只做形式上的、实际上無所謂的让步。在根本問題,即关于代表大会在它的内部事务方面的主权問題上,他們坚持己見;談判一直进行到4月底,但是毫無結果。

6. 最后,由于可能派不愿做出保证不再重复伦敦代表大会发起人及其参加者的丢人行徑的明确而負責的答复,法国集体主义派贊成某些全国性組織的意見訂于7月14日召开波尔多和特魯

瓦已經通过决定要召开的代表大会。

7. 从附件里可以明白看出，絕大多数欧洲的社会主义組織和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們都表示贊成这个代表大会，不希望向世界重演可悲的場面——工人代表大会是在某某人的恩允下开会的，是被它的組織者强加給它的規章束縛住的。

海牙代表會議所承认的伦敦的委托，不仅妄图組織未来的代表大会，而且妄图操纵它并对它发号施令的可能派自己撕成碎片了。

現在，請允許用宣言的話做結束：

“同志們和同胞們，事实你們是清楚的。你們必須关心，不要让那些本来應該首先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給你們的事业，全世界工人的事业带来有意識的損害。”

1889年6月1日

1889年6月以小册子
的形式在倫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譯的

組織委員會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 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⁵⁹²

欧洲和美洲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有法国各工业中心的 200 多个工商会的代表参加的波尔多工人代表大会和有代表法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社会主义的联合力量的 300 个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的特鲁瓦代表大会决定，国际博览会期间在巴黎召开全世界无产者都得以参加的国际代表大会。

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者高兴地欢迎这个决议，他们满意地感到他们将有可能共聚一堂并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在国际劳动立法方面的要求，——这个问题将在本年 9 月由欧洲各政府代表召开的伯尔尼代表会议上讨论。

资本家邀请富人和掌权者到世界博览会来欣赏和赞叹一番工人的劳动产品，而工人却在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最大财富之中陷于贫困境地。我们，社会主义者，致力于解放劳动，消灭雇佣奴隶制和建立一切工人不分性别和民族一律有权享用他们的共同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的社会制度，我们邀请这些财富的真正生产者 7 月 14 日在巴黎同我们聚会。

我们号召他们巩固兄弟联系，这种联系能把各国无产者的努力集合在一起，从而加速新世界的开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德国^①——社会民主党：奥·倍倍尔，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貝格尔，哈尔姆，屈恩，威·李卜克内西，麦斯特，扎博尔，舒马赫，辛格尔——帝国国会议员

亚尔萨斯—洛林——社会主义共和派协会：雅克拉尔

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主义小组：亚历山大·佩雷

英国——社会主义同盟：威·莫里斯，弗·基茨；工人协会：罗·邦·肯宁安—格莱安；下院社会主义者议员：威·帕涅尔，乔·貝特曼，海·秦平，汤姆·曼；埃爾郡矿工联合会：詹·凱尔·哈第

奥地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尤·波普，維·阿德勒，艾·克腊利克，阿·青腊姆，諾·霍夫曼，安·克罗伊策，文齐希，G. 波佩尔(維也納)；馬卡尔特，H. 弗勒金格尔，K. 扎姆斯(音斯布魯克)；安·魏古尼，济格耳(林茨)；A. 弗里梅耳，T. 海因茨，維内尔，A. 博切克(施梯里亚)；K. 施内魏斯，A. 克洛法奇，阿·索博特卡，約·希貝什(布隆)；施土尔茨，F. 多舍克，T. 涅梅切克(布拉格)；T. 泽德尼切克，R. 扎哈耳卡(普罗斯尼茨)；A. 盖林，C. 烏策卡尔，拉克斯(的里雅斯特)；达尼路克(里沃夫)；斐·阿德璠(克拉根富特)；爱·里格尔(克腊曹)；戚美尔曼(埃格恩多夫)

比利时——根特社会党：安塞尔，万貝韦伦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弗朗西斯科·迪埃哥

法国——法国工商会联合会和同业小组：雷·拉維涅；法国社

① 在通知书中国家的顺序是按照它们的法文名称的字母顺序排列的。——編者注

会主义同盟：巴提斯

希腊——社会主义者希腊人小组：普拉东·德拉库利斯，雅典社会主义者机关报“阿尔登”的編輯

荷兰——社会民主党：多梅拉·紐文胡斯——議員；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列奥·弗兰克尔

意大利——阿米耳卡雷·契普里昂尼，阿耳迪西奥·薩米托（西西里島社会主义小组）；朱泽培·德夫朗切斯基，菲利浦·屠拉梯，恩利科·塞薩納，尼約基-維亚尼（米兰社会主义小组）

挪威——挪威社会民主党卡尔·耶佩森

波兰——斯·門德尔森（“階級斗争”派）；弗·阿涅累夫斯基（华沙“无产阶级”派工人委员会）

葡萄牙——卡尔瓦約（社会主义工人协会）

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維拉·查苏利奇，普列汉諾夫，阿克雪里罗得，斯捷普尼亚克；巴黎俄国工人协会、苏黎世俄国社会主义出版协会、俄文杂志“社会主义者”編輯部、彼得堡社会主义革命者小组、“民意党”国外小组；彼得·拉甫罗夫

瑞典——社会民主党：奥古斯特·帕尔姆，亚尔馬·布兰亭，阿克塞耳·丹尼尔森

瑞士——布兰特，格留特利联盟副主席；社会主义工人党：亚·賴歇耳，A. 施特克；瑞士工会：梅尔克

負責召开代表大会的組織委员会：

巴黎工商会联合会方面：布累，貝塞，魯賽耳，費兰

巴黎社会主义組織：瓦揚，盖得，杰維尔，雅克拉尔，馬隆，拉法格

巴黎市鎮参議會社会主义小组：多馬，阿尔丰斯·恩貝尔，龙

格,肖維埃爾,瓦揚,克雷潘——市鎮參議員

眾議院社會主義小組: 巴斯利,卡梅利納,布瓦埃,克呂澤烈,
費魯耳

1889年6月初用英文和法文以傳單形式發表,同時載於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報紙和1889年在巴黎出版的小冊子“巴黎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

原文是法文

俄文譯自“巴黎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

注 释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 1 “共产党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頁）附有这篇序言的一版是經作者贊同出版的德文第三版，也是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后校閱的第一版。——第3頁。
- 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頁。——第3頁。
- 3 本文是弗·恩格斯于1883年5月底写的，发表在1883年6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标题是：“格奥尔格·維尔特的‘帮工之歌’（1846年）”。早在1856年，在維尔特逝世以后不久，馬克思就打算写悼念他的文章，但是他的意图没有实现，因为发表这样的悼念文章，在德国五十年代反动势力猖獗的环境里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之一，是为了激发德国工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对德国工人运动革命历史的兴趣。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間，从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在1879—1880年間該报的編輯是格·福尔馬尔，从1881年至1890年編輯是爱·伯恩施坦。馬克思和在該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該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地帮助該报編輯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綫，批評和糾正它的一些錯誤和动摇。——第5頁。

- 4 G. Weerth. «Leben und Thaten des berühmten Ritters Schnapphahnski». Hamburg, 1849; 在“新萊茵报”上，維尔特的这部作品是以一組小品文的形式于1848年8—9月、12月和1849年1月分期刊印的。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

gan der Demokratie) 从 1848 年 6 月 1 日至 1849 年 5 月 19 日每天在科伦出版, 总編輯是馬克思。参加編輯部的有恩格斯, 以及威·沃尔弗、格·維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萊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 “新萊茵报”起了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 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論通常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萊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 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 即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 年 5 月, 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 普魯士政府借口馬克思没有普魯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驅逐出境。馬克思的被驅逐和“新萊茵报”其他編輯的被迫害, 使該报停刊。1849 年 5 月 19 日“新萊茵报”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 301 号。——第 7 頁。

5 海地共和国总统 苏路克 1849 年 8 月 26 日自立为皇帝, 他是个著名的残忍凶狠、爱好虚荣的人。反对波拿巴的报刊称拿破侖第三总统为苏路克。——第 7 頁。

6 在“启示录”(指“約翰启示录”, 聖經之一)一文中恩格斯探討了早期基督教史的若干問題。用恩格斯自己的話來說, 他早在 1841 年就对这些問題发生了兴趣, 而且在“布魯諾·鮑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327—336 頁)中已部分地涉及这些問題。后来, 在 1894 年, 恩格斯在“論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这篇著作(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523—553 頁)中, 对这些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闡述。本文发表在“进步”杂志上。

“进步”(《Progress》)——是英国的一家关于科学、政治和文学問題的月刊, 从 1883 年至 1887 年在伦敦出版。一度曾接近社会主义团体。爱琳娜·馬克思和爱德华·艾威林曾为該杂志撰稿。——第 10 頁。

7 这里指杜宾根神学学派——这个学派是斐·克·鮑尔在十九世紀上半叶創立的一个研究并批判聖經的学派。这一派人批判新約諸篇中的矛

盾和历史謬誤，但又力图把聖經里的某些說法作为符合历史的东西保留下来。可是这些从事研究的人无意中使聖經的威信受到敗坏。——第 10 頁。

8 指“約翰启示录”第 2 章和第 3 章。——第 11 頁。

9 斯多葛派——是公元前四世紀末在古希腊产生并存在到公元六世紀的一个哲学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搖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在羅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說。斯多葛派特別注意道德方面的問題，对这方面的問題用神秘主义和宿命論加以解释；他們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說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 12 頁。

10 伊里奈烏斯“反异端五书”第 5 卷第 28—30 章。

恩格斯援引塔西佗看来不很确切：在恩格斯所提到的塔西佗“編年史”中的那个地方，沒有談到尼祿，談的是別的事情，而在塔西佗的另一著作“历史”第 2 卷第 8 章中才談到本文中所提到的有关事实。——第 14 頁。

11 恩格斯在他 1894 年写的“論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523—553 頁）中对起义軍团的首領問題做了确切的說明。——第 15 頁。

12 “馬克思和‘新萊茵报’”一文是弗·恩格斯紀念馬克思逝世一周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第 17 頁。

13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79 頁）；引文中的重点是恩格斯加的。——第 18 頁。

1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503 頁。——第 18 頁。

15 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侖法典，不仅仅是指拿破侖統治下于 1804 年通过并以“拿破侖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整个資產階級法权体系，即在拿破侖統治下于 1804—1810 年通过的五种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这些法

- 典會沿用于拿破侖法国所占領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萊茵省于 1815 年合并于普魯士以后仍繼續在該省生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法典（“拿破侖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資產階級社会的法典”（見本卷第 347 頁）。——第 20 頁。
- 16 德国学生、民主主义者古·阿·施略費尔，1848 年三月革命后曾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由于 4 月 19 日在該报第 5 号上发表了她的两篇文章，捍卫劳动群众的权利，他在 1848 年 4 月受审，并以教唆暴动的罪名被判处六个月要塞监禁。——第 20 頁。
- 17 “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对德国日报“新普魯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的称呼，該报从 1848 年 6 月至 1939 年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魯士容克地主，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該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軍的十字章图样。——第 22 頁。
- 18 指恩格斯“法兰克福議會”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4—18 頁）。——第 22 頁。
- 19 恩格斯指的是載于“新萊茵报”的許多篇批評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和柏林国民議會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出自馬克思之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和 6 卷）；这一批評也以概括的形式見之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94 頁）。——第 23 頁。
- 20 阿·布日尔“馬拉，人民之友”1865 年巴黎版第 1—2 卷（A. Bougeart. 《*Marat, l'Ami du Peuple*》. T. I—II, Paris, 1865）。
“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是雅各宾派領袖之一让·保尔·馬拉于 1789 年 9 月 12 日至 1793 年 7 月 14 日出版的报纸；該报于 1789 年 9 月 16 日至 1792 年 9 月 21 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报上有这样的題字：Marat, l'Ami du Peuple。——第 23 頁。
- 21 指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53—157 頁）。——第 24 頁。

- 22 1848年2月24日是法国路易-菲力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
1848年旧历2月24日(3月7日),尼古拉一世在获悉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后,向陆军大臣发布了在俄国实行部分动员的命令,准备对付欧洲的革命。——第24页。
- 2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曾载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号。1886年,这些文章略经修改后,由恩格斯作序言(见本卷第277—289页),以单行本出版。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这本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中对这些文章做了详细的评述。——第24页。
- 2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第25页。
- 25 见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第301号所载、由编辑部署名的“致科伦工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19页)。——第25页。
- 26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之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26页。
- 27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山岳党的许多领袖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外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遭到逮捕和驱逐出境,或者被迫离开法国而流亡。——第26页。
- 28 关于恩格斯作为维利希志愿队中的一员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一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26页。

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階級社会形成的过程，闡明了階級社会的一般特征，弄清了各个不同社会經濟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剖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证明了国家随着沒有階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胜利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恩格斯在1884年3月底至5月底这两个月內写成的。恩格斯在整理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間对美国进步科学家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詳細摘要，其中包含有馬克思的許多批語和馬克思自己的論点，以及其他补充材料。恩格斯研究了這個摘要以后，确信摩尔根这本书证实了馬克思和他两人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們对原始社会的看法，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广泛利用馬克思的批語，以及摩尔根这本书中的某些結論和实际材料，来写一部專門的著作。恩格斯把这看做“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馬克思的“遺言”。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恩格斯引用了他自己研究希腊和羅馬、古代爱尔兰、古代德意志人等等的許多种类不同的补充材料（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所載的恩格斯著作“馬尔克”、“論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以及其他著作）。

起初恩格斯打算把自己的著作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公开理論刊物“新时代”上，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計劃，因为他认为，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条件下，这部著作按其政治方向來說，是不可能在德国发表的。1884年10月初，本书在苏黎世問世。最初德国当局阻撓这本书的发行，但是后来这些困难被克服了，本书的后两版（第二版在1886年，第三版在1889年）已經是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同第一版相比較，这两版未做任何修改。本书的第一批外文譯本（波兰文譯本、羅馬尼亚文譯本和意大利文譯本）于1885年出版，而且意大利文譯本是恩格斯亲自审定的。恩格斯还审定了1888年出版的丹麦文譯本。第一版也譯成了塞尔維亚文。

1890年，由于积累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恩格斯便着手准备把这本书出新版。在新版准备过程中，他研究了有关这个問題的全

部最新文献,其中包括俄国科学家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对原文作了許多修改和訂正,并且考虑到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成就,特別对“家庭”这一章还作了重要的补充(在第四版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改,在本卷脚注中都加以說明)。但是,这些修改和訂正并没有触动恩格斯的結論,相反地恩格斯的結論在新的科学資料中得到了新的证实。这些結論就是在以后也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意义;后日的科学发展证明了恩格斯著作的基本論点的全部正确性,虽然从摩尔根的书引来的某些細节,需要根据新的科学的資料做一些訂正(例如,摩尔根的原始历史分期法,以及他因此而使用的術語等)。

恩格斯这本书的經過修改和补充的第四版于1891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以后就再也没有做任何修改了;恩格斯还为第四版写了一篇新的序言,这篇序言曾以“論原始家庭的历史”为題作为单篇文章发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46—259頁)。

恩格斯生前还出版了两版——第五版(1892年)和第六版(1894年),这两版都是第四版的翻印。这一版还首次被譯成法文(1893年,譯文由劳拉·拉法格校訂,并經恩格斯审閱)、保加利亚文(1893年)、西班牙文(1894年);本书只是到1902年才用英文出版。恩格斯这本书的俄文譯本第一次于1894年在彼得堡出版,是由德文第四版譯出的;这是在俄国公开出版的恩格斯的第一部著作。在十月革命以前,在1894—1910年間,本书在俄国共出了十版。后来,本书又不止一次地用俄文和其他文字出版,有几版是十月革命后出版的。——第27頁。

- 30 指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載于“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41年俄文版第9卷第1—192頁。——第29頁。
- 31 指爱·奥·弗里曼“比較政治”1873年伦敦版(E. A. Freeman. «Comparative Politics». London, 1873)一书。——第31頁。
- 32 見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19頁(L.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1877, p. 19)以及“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4頁。——第32頁。
- 33 普韦布洛是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群体的名称,这些部落原住在新墨西哥

- (現在的美國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由於歷史和文化的一致性而聯合起來。這個名稱起源於西班牙文的 *pueblo* (人民、村莊、公社) 一詞，西班牙的征服者給他們取了這個名稱，是因為他們的村莊具有特殊性質，這種村莊是一些五、六層高的城堡式公社大屋，這些大屋可容納上千人；這個名稱也用來稱呼這些部落的村莊。——第 35 頁。
- 34 恩格斯指的是凱尤斯·尤利烏斯·凱撒的“高盧戰記”和普卜利烏斯·科爾奈利烏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第 38 頁。
- 35 恩格斯在寫他這部著作第一版的过程中，利用了麥克倫南著的下列各書：“原始婚姻。關於婚禮中搶劫儀式的起源的研究”1865 年愛丁堡版(《*Primitive Marriage.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 Edinburgh, 1865)；“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關於婚禮中搶劫儀式的起源的研究’”1876 年倫敦版(《*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comprising a Reprint of «Primitive Marriage.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 London, 1876)；後來，在準備第四版(1891 年)的过程中，恩格斯還參考了 1886 年在倫敦和紐約出版的麥克倫南後一著作的新版。——第 40 頁。
- 36 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1877 年倫敦版第 435 頁。——第 41 頁。
- 37 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 9 卷第 21 頁)。——第 41 頁。
- 38 指約·雅·巴霍芬“母權論。根據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權本質對古代世界的婦女統治的研究”1861 年斯圖加特版(J. J. Bachofen. «*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ynai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ösen und rechtlichen Natur*》. Stuttgart, 1861)。——第 42 頁。
- 39 Ch. Letourneau. «*L'évolution du mariage et de la famille*》. Paris, 1888. ——第 43 頁。
- 40 索緒爾的這種提法引自阿·吉羅-特龍的書“婚姻和家庭的起源”1884

- 年日内瓦、巴黎版第 XV 頁 (A. Giraud-Teulon. «Les origines du mariage et de la famille». Genève, Paris, 1884, p. XV)。——第 44 頁。
- 41 E. Westermarck.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London and New York, 1891. ——第 44 頁。
- 42 沙·勒土尔諾“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 年巴黎版第 41 頁。——第 44 頁。
- 43 A. Espinas. «Des sociétés animales». Paris, 1877; 恩格斯轉引自吉罗-特龙的书(見注 40)第 518 頁, 埃斯潘納斯的这一著作的片断作为附录載于該书中。——第 44 頁。
- 44 H. H. Bancroft.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Vol. I—V, New York, 1875. ——第 46 頁。
- 45 見爱·韦斯特馬尔克“人类婚姻史”1891 年伦敦和紐約版第 70—71 頁。——第 47 頁。
- 46 馬克思的这封信, 我們沒有見到。恩格斯在 1884 年 4 月 11 日給考茨基的信中提到了这封信。——第 48 頁。
- 47 指的是理·瓦格納的歌剧四部曲“尼貝龙根的戒指”的歌詞, 这部歌剧是作曲家瓦格納自己根据斯堪的那維亞史詩“艾达”和德国史詩“尼貝龙根之歌”写成的。見理·瓦格納“尼貝龙根的戒指, 第一天, 瓦尔庫蕾”第二幕 (R. Wagner. «Der Ring des Nibelungen, erster Tag, die Walküre», zweiter Aufzug)。
- “尼貝龙根之歌”是根据所謂民族大迁徙时期(三至五世紀)的古代德意志神話和传说創作出来的德意志民間英雄史詩的极其重大的文献。我們所見到的这部叙事詩是在公元 1200 年左右形成的。——第 48 頁。
- 48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維亞各民族的神話和英雄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 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十三世紀时的手稿, 1643 年为冰島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謂“老艾达”), 另一种是十三世紀初詩人和

編年史家斯諾里·斯土魯森所編的古北歐歌唱詩人詩歌論集（即所謂“小艾達”）。“艾達”中的詩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維亞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間創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

“厄萊斯德列克”是“老艾達”詩歌集中属于較晚时期的歌詞之一。恩格斯在这里引的是这首詩歌的第 32 和 36 节。——第 48 頁。

49 亞薩神和瓦那神是斯堪的那維亞神話中的两类神。

“英格林加傳說”是中世紀冰島詩人和編年史家斯諾里·斯土魯森所著关于挪威国王(从远古到十二世紀)的“地球”(《Heimskringla》)一书中的第一个傳說，該书是作者在十三世紀上半叶根据有关挪威国王的历史記述以及冰島和挪威的氏族傳說編写成的。恩格斯引的是第一个傳說的第四章。——第 48 頁。

50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425 頁。——第 49 頁。

51 見 約·維·巴霍芬“母权論”1861 年斯图加特版第 XXIII、385 和其他各頁。——第 51 頁。

52 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 9 卷第 187 頁)。——第 51 頁。

53 凱撒“高卢战紀”第 5 卷第 14 章。——第 52 頁。

54 “印度的居民”。由約·福·沃森和約·威·凱出版。1868—1872 年伦敦版第 1—4 卷(《The People of India》. Edited by J. F. Watson and J. W. Kaye. Vol. I—VI, London, 1868—1872); 恩格斯引的是这一版的第 2 卷第 85 頁。——第 52 頁。

55 指的是婚姻等級或組別，澳大利亚的大多数部落都分成这样的特別集团。每一集团的男子只能与另一个一定的集团的女子通婚；每一个部落中都有四个至八个这样的集团。——第 52 頁。

56 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 年华盛頓版(L. H. Morgan. «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Washington, 1871)。——第 54 頁。

- 57 法森和豪伊特共同取得的研究成果，載于劳·法森和阿·威·豪伊特“卡米拉罗依和庫尔奈”1880年墨尔本、悉尼、阿得雷德和布里斯本版(L. Fison and A. W. Howitt. «Kamilaroi and Kurnai». Melbourne, Sydney, Adelaide, and Brisbane, 1880)一书中。——第54頁。
- 58 見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59頁；恩格斯轉引自馬克思的記述(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28頁)。——第58頁。
- 59 阿·萊特的信，恩格斯是根据摩尔根书中(見 L.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1877, p. 455, 以及“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26—27頁)的摘引轉引的。这封信(它的确切日期是1874年5月19日，摩尔根指明是1873年)的全文发表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梅納沙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杂志(新輯)1933年第1期第138—140頁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Menasha, Wisconsin, U. S. A., 1933, № 1, p. 138—140)。——第60頁。
- 60 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紐約版第1卷第352—353頁。——第61頁。
- 61 沙特恩节是古羅馬每年在冬至时期由于农事結束而举行的紀念沙特恩神的节日。在节日期間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飲；奴隶也可以参加沙特恩节，允許他們与自由民同席。在沙特恩节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一詞成了表示纵情欢乐的盛宴和狂飲的普通名詞。——第62頁。
- 62 指路·阿加西斯和他的妻子合著的书：Professor and Mrs. Louis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Boston and New York, 1886；这一著作的第一版于1868年出版。——第63頁。
- 63 指1486年4月21日的所謂“瓜达路普詔諭”——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在卡塔卢尼亚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作出的裁决；国王在这里是以起义农民和封建主之間的仲裁人的身分出現的。裁决規定废除使

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情况,并且取消农民最痛恨的一系列封建义务,其中包括初夜权;为此农民必須付出大量的贖金。——第64頁。

- 64 賽·祖根海姆“直至十九世紀中叶欧洲废除农奴制度和人身依附的历史”1861年圣彼得堡版(S. Sugenheim. «Geschichte der Aufhebung der Leibeigenschaft und Hörigkeit in Europa bis um die Mit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St. Petersburg, 1861)。——第64頁。
- 65 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111頁)。——第68頁。
- 66 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112頁)。——第68頁。
- 67 M. Kovalevsky. «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 Stockholm, 1890. ——第69頁。
- 68 見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65—466頁,以及“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29頁。——第69頁。
- 69 見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70頁,以及“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31頁。——第70頁。
- 70 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31頁)。——第70頁。
- 71 指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在这一著作中,柯瓦列夫斯基引用了1875年奥尔山斯基和1878年亚·雅·叶菲緬科提供的关于俄国的家庭公社的資料。——第71頁。
- 72 雅罗斯拉夫的“真理”是对古俄罗斯的法典“俄罗斯真理”古本第一部分的名称,“俄罗斯真理”是十一世紀至十二世紀在当时的习惯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經濟和社会关系。——第71頁。

- 73 达尔馬威亞法典 是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在波利察 (达尔馬威亞的一部分) 通行的法律匯編; 以波利察法規著稱。——第 71 頁。
- 74 見安·霍伊斯勒“德意志私法制度” 1886 年萊比錫版第 2 卷第 271 頁 (A. Heusler. «Institutionen des Deutschen Privatrechts». Bd. II, Leipzig, 1886, S. 271)。——第 71 頁。
- 75 正文中提到的奈阿爾科斯的報道, 見斯特拉本“地理學” 第 15 卷第 1 章。——第 72 頁。
- 76 *Calpullis* 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他們被西班牙人征服時期的家庭公社; 每一個家庭公社 (*calpulli*) 的全體成員都有著共同的世系, 家庭公社占有一塊公共的土地, 土地不得讓渡, 也不得在繼承者之間分配。阿隆索·德·蘇里塔在他的著作“關於新西班牙的各種首領、居民的法律、習俗、被征服前後確定的賦稅等等的報告” («Rapport sur les différentes classes de chefs de la Nouvelle-Espagne, sur les lois, les moeurs des habitants, sur les impôts établis avant et depuis la conquête, etc., etc.») 中記述了 *calpullis*, 這一著作第一次載於“有關美洲發現史的遊記、報告和回憶錄原本, 由 H·太諾-孔龐第一次用法文發表” 1840 年巴黎版第 11 卷第 50—64 頁 («Voyages, relations et mémoires originaux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 publié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çais, par H. Ternaux-Compans». Vol. 11, Paris, 1840, pp. 50—64) 上。——第 72 頁。
- 77 指發表在 1890 年 10 月 20 日和 27 日、11 月 3 日“外國”雜誌上的亨·庫諾夫“古秘魯的農村公社和馬爾克公社” («Die altperuanischen Dorf- und Markgenossenschaften») 一文。
“外國” («*Das Ausland*») 是 1828—1893 年間出版的關於地理學、民族學和博物學問題的一家德國雜誌, 最初是日刊, 從 1853 年起改為周刊, 從 1873 年起在斯圖加特出版。——第 72 頁。
- 78 指 1804 年在拿破侖時期通過的民法典第二三〇條。——第 74 頁。

- 79 見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32頁)。——第74頁。
- 80 荷馬“奧德賽”第一首歌。——第74頁。
- 81 埃斯庫羅斯“奧列斯特。亞加米农”。——第75頁。
- 82 普卢塔克“斯巴达妇女的格言”第5章；并見格·弗·舍曼“希腊的古代”1855年柏林版第1卷第268頁(G. F. Schoemann. «Griechische Alterthümer». Bd. I, Berlin, 1855, S. 268)。——第76頁。
- 83 斯巴达人 是古斯巴达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赫罗泰 是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他們固着在土地上并且必須向斯巴达地主繳納一定的貢賦。赫罗泰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实质上毫无区别。——第76頁。
- 84 阿里斯托芬“費斯莫佛里节日中的妇女”。——第76頁。
- 85 希罗多德“历史”第8册第105章；并見威·瓦克斯穆特“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1830年哈雷版第2部分第2篇第77頁(W. Wachsmuth. «Hellenische Alterthumskunde aus dem Gesichtspunkte des Staates». Th. II, Abth. II, Halle, 1830, S. 77)。——第76頁。
- 86 欧里庇得斯“奧列斯特”。——第76頁。
- 87 恩格斯引的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提出的思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0頁)。——第78頁。
- 88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504頁。——第78頁。
- 89 庙奴 是古希腊和希腊殖民地中属于神庙的男女奴隶。在許多地方，特别是在前亚細亚的城市中和在科林斯，女庙奴都在神庙中从事卖淫。——第79頁。
- 90 見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18—19章。——第81頁。

- 91 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历史，三十一卷集”第31卷第9章；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阿斯“和哥特人的战争史”第2卷第14章（“查士丁尼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第6卷）。——第82頁。
- 92 指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法国南部的行吟詩人們的詩歌。——第83頁。
- 93 恩格斯在这里是套用了沙·傅立叶的話，見傅立叶的著作“关于普遍統一的理論”第2版第3卷；“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4卷第120頁（《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Vol. III, 2-me éd.; Oeuvres complètes, t. IV, Paris, 1841, p. 120）；这部著作第一版称作：“論家务农业协作”1822年巴黎—伦敦版第1—2卷（《Traité de l'association domestique-agricole》. T. I—II, Paris—Londres, 1822）。——第84頁。
- 94 达夫尼斯和赫洛娅是二至三世紀古希腊的一部小說的两个主人公；关于这部小說的作者郎格，沒有保存下任何資料。——第90頁。
- 95 見“尼貝龙根之歌”第十首歌。——第91頁。
- 96 “古德龙”（也称“庫德龙”）是十三世紀的德国的一部中世紀叙事詩。——第91頁。
- 97 亨·薩·梅恩“古代法：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和它与現代法律观念的关系”（H. S. Maine.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这一著作的第一版于1861年在伦敦出版；恩格斯提到的那个地方見这一版第170頁。——第93頁。
- 98 見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5—471頁）。——第93頁。
- 99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91—492頁。——第97頁。
- 100 見注56。——第98頁。

- 101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85—86頁；恩格斯是根据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来叙述这段引文的(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71頁)。——第103頁。
- 102 指1519—1521年西班牙侵略者征服墨西哥。——第105頁。
- 103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115頁。——第106頁。
- 104 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指的是塔西佗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第107頁。
- 105 新墨西哥人——見注33。——第108頁。
- 106 指格·路·毛勒的著作：“馬尔克制度、农戶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論”1854年慕尼黑版(«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 “德国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Erlangen, 1856); “德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戶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V, Erlangen, 1862—1863); “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I, Erlangen, 1865—1866); “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IV, Erlangen, 1869—1871)。——第110頁。
- 107 “中立民族”——指十七世紀时居住在伊里湖北岸的几个与易洛魁人血緣相近的印第安部落所組成的軍事联盟。这个名称是法国殖民者加給这个联盟的，因为它在易洛魁人和古朗人的战争中保持了中立。——第111頁。
- 108 指祖魯人和努比安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斗争。1879年1月英国人向祖魯人进攻，祖魯人在自己的領袖开芝瓦約的领导下非常頑强

地抵抗了英国殖民軍达半年之久。后者只是由于在武器装备方面占巨大优势而在經過一系列战斗之后才取得胜利的。直到1887年,英国人由于利用了他們在祖魯人中間挑起的連續几年的部落混战,才得以最后征服祖魯人。

以伊斯兰教传教士穆罕默德-阿罕默德(他自称“馬赫迪”,意即“救世主”)为首的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爆发于1881年,1883—1884年获得卓越的胜利,几乎全部国土都从七十年代开始侵入苏丹的英国殖民軍队手中解放了出来。在起义的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統一的馬赫迪国家。只是到1899年,英国殖民軍利用这个国家由于不断打仗和发生部落紛爭而造成的内部削弱,同时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才征服了苏丹。——第111頁。

- 109 乔·格罗特“希腊史”第1—12卷(G.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Vol. I—XII);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1846—1856年在伦敦出版;这里所引用的話,見1869年在伦敦出版的第3卷第54—55頁。——第114頁。
- 110 指狄摩西尼在法庭上反駁欧布利得的演說詞。在这个演說詞中提到在氏族墓地只能埋葬本氏族死人的习俗。——第115頁。
- 111 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134頁)。——第115頁。
- 112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古希腊哲学家狄凱阿尔科斯的没有流传下来的著作中的片断引自瓦克斯穆特的著作:«Hellenische Alterthums-kunde aus dem Gesichtspunkte des Staates». Th. I, Abth. I, Halle, 1826, S. 312。——第115頁。
- 113 威·阿·貝克尔“哈里克尔。古代希腊习俗状况。对希腊人的私生活的較詳細的介紹”1840年萊比錫版第2部第447頁(W. A. Becker. «Charikles. Bilder altgriechischer Sitte. Zur genaueren Kenntniss des griechischen Privatlebens». Th. II, Leipzig, 1840, S. 447)。——第116頁。

- 114 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136頁)。——第117頁。
- 115 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新版)第3卷第66頁(G.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A New Ed., vol. III, London, 1869, p. 66)。——第117頁。
- 116 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137頁)。——第117頁。
- 117 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新版)第3卷第60頁。引文出自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括弧內的意見是馬克思的(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138頁)。——第117頁。
- 118 卡·馬克思“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9卷第138—139頁)。——第118頁。
- 119 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新版)第3卷第58—59頁。——第118頁。
- 120 荷馬“伊利亚特”第二首歌。——第118頁。
- 121 指甫斯特耳·德·庫郎歇“古代城市”第3册第1章(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livre III, chap. I)一书; 該书第一版于1864年在巴黎—斯特拉斯堡出版。——第119頁。
- 122 哈利卡納苏的狄奥尼修斯“古代羅馬史”第2册第12章。——第120頁。
- 123 埃斯庫罗斯“七个反对忒拜的人”。——第120頁。
- 124 G. F. Schoemann. «Griechische Alterthümer». Bd. I, Berlin, 1855, S. 27. ——第120頁。
- 125 指威·尤·格萊斯頓“世界的少年时代。英雄时代的神和人”第11章(W. E. Gladstone. «Juventus Mundi. The Gods and Men

- of the Heroic Age», chap. 11) 一书; 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 1869 年在伦敦出版。——第 121 頁。
- 126 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 9 卷第 143 頁); 这段話引自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248 頁。——第 121 頁。
- 127 荷馬“伊利亚特”第二首歌。——第 122 頁。
- 128 見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 9 卷第 144—145 頁)。——第 122 頁。
- 129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1 册第 13 章。——第 123 頁。
- 13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3 册第 10 章。——第 123 頁。
- 131 这里是指賦予雅典第四階級的公民——自由的貧民担任民政职务的权利的事, 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亚里斯泰迪茲(公元前五世紀)做的。——第 132 頁。
- 132 指所謂“麦特克”——迁到阿提卡定居的外地人; 他們虽是自由人, 但没有雅典的公民权利(如担任公职, 参加人民大会, 占有不动产等等的权利)。他們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必須繳納特別的捐稅, 必須有全权的公民作为自己的“保护人”, 只有通过这些“保护人”他們才能和管理机关打交道。——第 133 頁。
- 133 公元前 510—507 年阿尔克梅奥尼德氏族的代表克利斯提尼領導了雅典平民反对旧氏族貴族的統治的斗争; 結果貴族的統治被推翻了, 实行了目的在于消灭氏族制度殘余的改革。——第 133 頁。
- 134 見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伦敦版第 271 頁。——第 134 頁。
- 135 公元前 560 年貧困破产的貴族氏族的代表庇西特拉图夺取了雅典的政权, 建立了个人統治的制度——僭主政体。这种制度在庇西特拉图逝世(公元前 527 年)之前有过中断(庇西特拉图曾两次被逐出雅典并重新返回), 直到公元前 510 年他的儿子希庇亚斯被逐为止, 此后不久, 在

雅典便建立了以克利斯提尼为首的奴隶主民主派的統治。庇西特拉图的旨在保护中小地主的利益反对氏族貴族的活动，没有引起雅典国家政治结构的重大改变。——第 136 頁。

136 十二銅表法——是最古的羅馬法文献，在公元前五世紀中叶編成，是平民反对貴族的斗争的成果，它代替了原先在羅馬有效的习惯法；十二銅表法反映了羅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国家的形成的过程；法律条文写在十二块牌子(銅表)上。——第 138 頁。

137 指公元 9 年起义反对羅馬侵略者的各德意志部落和由瓦魯斯率領的羅馬軍隊在条多堡森林进行的会战。会战以羅馬人的被歼及其統帥的自杀而告終。——第 138 頁。

138 亚庇烏斯·克劳狄烏斯在公元前 451 年和 450 年被选进十人委员会(十人团)，委员会受托制定法律，即著名的十二銅表法；在此期間，委员会享有充分权力；但是在期滿以后，亚庇烏斯·克劳狄烏斯同十人团的其他人一起企图用篡夺的方法把委员会的权力延长到公元前 449 年；但是十人团尤其是亚庇烏斯·克劳狄烏斯的专橫和暴力引起了平民的起义，結果推翻了十人团；亚庇烏斯·克劳狄烏斯被关进了監獄，不久就死在那里。

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201 年)——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羅馬和迦太基为了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統治、为了爭夺新的領土和奴隶而进行的許多次战争之一。这次战争以迦太基的失敗而告終。——第 139 頁。

139 这里恩格斯再次引用馬克思关于希腊氏族的意見(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 9 卷第 134 頁)。——第 140 頁。

140 Th. Mommsen. «Römische Forschungen». 2. Aufl., Bd. I, Berlin, 1864. ——第 140 頁。

141 梯特·李維“羅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 141 頁。

142 朗格在他的“羅馬的古代”(«Römische Alterthümer». Bd. I, Berlin, 1856, S. 195) 一书中引用了胡施克的學位論文：菲·愛·胡

- 施克“关于元老院決議賦予費策妮婭·希斯帕拉的特权（李維。第39卷第19章）”1822年哥丁根版（Ph. E. Huschke. «De Privilegiis Feceniae Hispalae senatusconsulto concessis (Liv. XXXIX, 19)». Gottingae, 1822）。——第143頁。
- 143 巴·格·尼布尔“羅馬史”第1—3部（B. G. Niebuhr. «Römische Geschichte». Th. I—III）；恩格斯引用的这段話出自第一部，該书的第一版于1811年在柏林出版。——第144頁。
- 144 泰·蒙森“羅馬史”第1卷第1册第6章（Th.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Bd. I, Buch I, Kap. 6），該书第一卷第一版于1854年在萊比錫出版。——第145頁。
- 145 杜罗·德·拉·馬尔“羅馬人的政治經濟学”1840年巴黎版第1—2卷（Dureau de La Malle.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T. I—II, Paris, 1840）。指附在第一卷书末的新旧度量衡以及貨幣单位比較表。——第147頁。
- 146 約·弗·麦克伦南“原始婚姻”1865年爱丁堡版。——第149頁。
- 147 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49頁。
- 148 英吉利人征服威尔士在1283年完成，但威尔士在这以后繼續保持自治；到十六世紀中叶它才完全并入英国。——第150頁。
- 149 1869—1870年恩格斯着手編写一部篇幅較大的爱尔兰史，但未完成（已写成的片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23—571頁，为写这本书而准备的部分材料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第100—263頁），并由于研究凯尔特人的历史也研究了古代威尔士的法律。——第150頁。
- 150 恩格斯引用的这段話出自“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規章”1841年版第1卷第93頁（«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Wales». Vol. I, 1841, p. 93）。——第151頁。

- 151 1891年9月恩格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作了一次旅行。——第152頁。
- 152 1745—1746年在苏格兰爆发了山区的克兰的起义，反对英格兰苏格兰的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夺地运动；山民为保持古老的氏族組織而斗争。苏格兰高地的一部分貴族利用了山民的不滿，他們希望保存封建家长式的氏族制，并提出恢复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王位作为起义的目的。起义軍在初期获得了短時間的胜利以后就被击潰了。起义被鎮压下去了，結果，苏格兰山地的氏族制度被破坏，氏族土地占有制的殘余被消灭，苏格兰农民从土地上被赶走的进程加剧了，氏族法庭被废除，某些氏族的习俗被禁止。——第153頁。
- 153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357、358頁。——第153頁。
- 154 貝达大师“盎格魯教会史”(Beda Venerabili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第1册第1章。——第153頁。
- 155 凱撒“高卢战記”第6卷第22章。——第154頁。
- 156 “阿勒曼尼法典”——从五世紀起占有現在的亚尔薩斯、瑞士东部和德国西南部这一地区的阿勒曼尼(阿拉曼尼)德意志部落联盟的习惯法汇编；这一法典产生于六世紀末至七世紀初和八世紀。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阿勒曼尼法典”第八十一(八十四)条。——第154頁。
- 157 指馬·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和“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論”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54頁。
- 158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英雄史詩，八世紀古代德意志叙事詩文献，保留下来的是一些片断。——第155頁。
- 159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章。——第156頁。
- 160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4卷第34章第43—44頁。——第156頁。
- 161 «Völuspá» (“女預言者的預言”)——“老艾达”中的一首歌(見注48)。

——第 157 頁。

- 162 指下列著作:安·克·班格“女預言者的預言和西維拉的卜辞”1879 年版(A. Ch. Bang. «Vøluspá og de sibyllinske orakler», 1879) 和索·布格“斯堪的那維亞关于神和英雄的傳說的起源問題探討”1881—1889 年克利斯提阿納版 (S. Bugge. «Studier over de nordiske Gude- og Heltesagns Oprindelse». Kristiania, 1881—1889)。——第 157 頁。
- 163 G. L. Maurer. «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I, Erlangen, 1869. ——第 158 頁。
- 164 威維利斯領導的德意志部落和高盧部落反對羅馬統治的起義, 發生在 69—70 年(有些史料認為發生在 69—71 年), 起義是由于增加賦稅, 加緊募兵和羅馬官吏的胡作非為所引起的, 它席卷了高盧和被羅馬統治的德意志地區的大部分, 使羅馬有失去這些地區的危險。起義者在起初獲得了一些勝利之後遭到了幾次失敗, 于是被迫同羅馬媾和。——第 158 頁。
- 165 凱撒“高盧戰記”第 4 卷第 1 章。——第 159 頁。
- 166 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第 26 章。——第 160 頁。
- 167 «*Codex Laurehamensis*» (“洛爾希寺院文書”)——授與洛爾希寺院的證書和特權的副本集子, 這個寺院是八世紀下半葉在法蘭克王國建立的, 距伏爾姆斯城不遠, 它是德國西南部的一個巨大的封建領地; 這個集子在十二世紀編成, 是八至九世紀關於農民和封建土地占有制的最重要史料之一。——第 161 頁。
- 168 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本, 第 18 卷第 17 章。——第 162 頁。
- 169 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本, 第 4 卷第 14 章。——第 167 頁。
- 170 克雷莫納的利烏特普朗德“獎賞”第 6 卷第 6 章。——第 170 頁。
- 171 馬賽的薩耳維安“論神的統治”(«*De gubernatione dei*») 第 5 冊第 8 章。——第 171 頁。

- 172 采邑 (beneficium, 字面意思是:“恩賜”)——八世紀上半叶在法兰克王国盛行的一种賞賜土地的形式。一块块的土地連同居住在土地上的依附的农民一起以采邑的形式授与領用人(采邑主)終身享用,条件是要完成一定的多半是軍事性的义务。在領用人或采邑主死亡,或未完成任务以及田园荒蕪的情况下,采邑就应当归还給原主或他的继承人,若要恢复采邑关系,就須第二次賞賜。实行分配采邑的不仅有王权,教会,而且还有豪紳巨富。采邑制度促进了封建主階級、特別是中小貴族的形成,使农民群众处于更加受奴役的地位,同时促进了藩属关系和封建等級制的发展。后来采邑变成了世襲封地。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这篇著作(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539—599 頁)中揭示了采邑制度在封建制度形成史上的作用。——第 173 頁。
- 173 郡守 (Gaugrafen) ——法兰克王国担任州郡領導的王室官吏。每一个郡守在自己的区域内都享有司法权,可以征稅和管轄軍隊,并在出征的时候統率它。郡守在任內可以享有王室在該郡的收入三分之一,并获得土地的賞賜作为酬劳。后来郡守逐漸由王室委派的官員变成了大封建領主,拥有自主权,特別是在 877 年以后,正式建立了郡守官职的世襲制。——第 174 頁。
- 174 指九世紀編成的圣热尔門-德-普雷修道院地产登記册(地产、人口和收入登記册),以“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記册”的名称而聞名。恩格斯从地产登記册中引用的材料大概載于保·罗特“从上古到十世紀的采邑制度史”1850 年厄兰根版第 378 頁 (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ins zehnte Jahrhundert». Erlangen, 1850, S. 378)。——第 174 頁。
- 175 安加利——在羅馬帝国派給居民的义务,規定居民必須提供馬匹和担夫为政府运输;后来范围更加扩大了,成为居民的沉重負擔。——第 175 頁。
- 176 依附制度——从八至九世紀起在欧洲盛行的农民受封建主“保护”,或者小封建主受大封建主“保护”的形式之一,接受保护要履行一定的条件,即为“保护人”服兵役和其他徭役,并把自己的土地交給“保护人”,

然后以有条件地占有的形式領回这些土地。这对于那些迫于暴力而不得不如此做的农民來說，意味着人身自由的喪失，而对于小封建主來說，則意味着处于大封建主的藩屬的地位，因而依附制度一方面促使农民淪入受奴役的境地，另一方面巩固了封建等級制度。——第 176 頁。

- 177 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論”第 3 版；“全集”1846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220 頁 (Ch. Fourier.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3-me éd.; Oeuvres complètes, t. I, Paris, 1846, p. 220)；該书第一版于 1808 年在里昂匿名出版。——第 177 頁。

- 178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見注 158。

1066 年侵入英国的諾曼底公爵威廉的軍隊在海斯丁斯附近同盎格魯撒克逊人发生了战斗。盎格魯撒克逊人的軍隊由于在自己的軍事組織中还保持着公社制度的殘余，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原始的，因此被击败了。盎格魯撒克逊国王哈罗德陣亡，而威廉則成了英国国王，号称征服者威廉一世。——第 186 頁。

- 179 卡·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 9 卷第 153—154 頁)。——第 188 頁。

- 180 迪特馬尔申——現在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在古代那里居住着撒克逊人，八世紀时为查理大帝所征服，后来为各种僧俗封建主所占有。从十二世紀中叶起迪特馬尔申的居民（其中多半是自由的农民）逐漸取得独立，从十三世紀初到十六世紀中叶已实际上享有独立，胜利地打退了丹麦国王和霍尔施坦公爵想征服这个地区的多次图謀。迪特馬尔申的社会发展經過了非常独特的道路：旧的地方貴族到十三世紀事实上已經消失，在独立时期迪特馬尔申乃是自治的农民公社的总和，这些农民公社的基础在許多地方都是旧有的农民氏族。到十四世紀，迪特馬尔申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大会，后来轉归三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1559 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和霍尔施坦公爵約翰和阿道夫的軍隊摧毁了迪特馬尔申居民的反抗，胜利者瓜分了这个地区。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在迪特馬尔申一直保存

- 到十九世紀下半叶。——第 193 頁。
- 181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257 和 360 节(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該书第一版于 1821 年在柏林出版。——第 194 頁。
- 182 斐·拉薩尔“既得权体系”第二部：“羅馬和日耳曼继承权在历史—哲学发展中的实质”(F. Lassalle. «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Th. II. «Das Wesen des Römischen und Germanischen Erbrechts in historisch-philosophischer Entwicklung»); 該书的第一版于 1861 年在萊比錫出版。——第 200 頁。
- 183 这段引文馬克思在他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也部分地援引了(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 9 卷第 56—57 頁)。——第 203 頁。
- 184 这个前言是恩格斯在 1884 年为了再版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資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473—506 頁)而写的; 1891 年恩格斯把前言全文收入他写的馬克思这一著作的新版导言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234—243 頁)。——第 204 頁。
- 185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魯塞尔建立的, 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們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 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 并跟佛来米和瓦龙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魯塞尔支部。1848 年法国資產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 由于該会成員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驅逐出境, 协会在布魯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 204 頁。
- 186 本文是恩格斯为卡·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頁)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这部著作是在 1847 年用法文写成并出版的, 在馬克

思生前没有全文再版过。恩格斯还为德文第一版写了許多注释，并校訂了譯文。該书于1885年1月下半月問世，书名是：《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 Stuttgart, 1885; 同年1月初，序言就已經根据恩格斯的提議以“馬克思和洛貝尔图斯”为題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序言还被收在1892年出版的該书德文第二版中；恩格斯又为这一版专门写了一个短短的前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3頁）。序言最初由維·查苏利奇譯成俄文，載于1886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內瓦出版的馬克思这一著作的俄文第一版中。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論杂志，在斯图加特出版，1883年至1890年10月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編輯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庫諾夫。在1885—1894年弗·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許多文章，并不断以自己的劝告帮助杂志的編輯部，时常因杂志上有背离馬克思主义的地方而对它提出批評。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統地登載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杂志采取中派立場，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205頁。

187 P. J. Proudhon.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 ——第205頁。

188 指馬克思的文章“論蒲魯东(給約·巴·施韦泽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頁）。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是拉薩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該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1865年約·巴·施韦泽担任編輯。——第205頁。

189 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他們停止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于1865年2月由他們寄給該报編輯部；由于馬克思采取了措施，声明不久便在許多德国报纸上发表了。因此，施韦泽才被迫于1865年3月3

- 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5—98頁)。——第205頁。
- 190 恩格斯指的是他于1885年5月5日写成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德文第一版的序言(參看“資本論”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06頁。
- 191 对馬克思的这些誹謗包含在洛貝尔图斯1871年11月29日給魯·迈耶尔的信中(見«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 Rodbertus-Jagetzow. Herausgegeben von Dr. R. Meyer». Bd. I, Berlin, S. 134. ——“洛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論文集。魯·迈耶尔博士出版”柏林版第1卷第134頁),和洛貝尔图斯1875年3月14日給J. 泽勒尔的信中(見«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 Bd. 35, Tübingen, 1879, S. 219——“一般政治学杂志”1879年杜宾根版第35卷第219頁)。——第206頁。
- 192 洛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經濟状况的認識”1842年新勃兰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Rodbertus-Jagetzow. «Zur Erkenntniß unsrer staatswirthschaftlichen Zustände». Neubrandenburg und Friedland, 1842)。——第206頁。
- 193 恩格斯指的是1850年和1851年在柏林以“給馮·基尔希曼的社会問題书簡”(«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为題出版的洛貝尔图斯的三本单独的著作。——第206頁。
- 194 洛貝尔图斯“給馮·基尔希曼的社会問題书簡。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論和我的社会理論”1850年柏林版第54頁(Rodbertus.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Zweiter Brief; Kirchmann's sociale Theorie und die meinige». Berlin, 1850, S. 54)。——第206頁。
- 195 大·李嘉图“政治經濟学和賦稅原理”1817年伦敦版(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 London, 1817)。——第 206 頁。
- 196 1821 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标题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信”1821 年伦敦版(«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 deduced from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 Letter to Lord John Russell». London, 1821)。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序言(参看“资本论”196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卷)中对这本抨击性小册子做了评价。——第 206 頁。
- 197 見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10 頁)；着重号和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加的。——第 207 頁。
- 19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177 頁。——第 208 頁。
- 19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2 頁。——第 208 頁。
- 200 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 年在伦敦出版的該书第一版中，沒有恩格斯所援引的把章分成节的情况；只是从 1819 年出版的第二版开始，李嘉图才做了这种划分；1821 年出版了經作者做了很大修改的該书第三版。——第 210 頁。
- 201 約·格雷“社会制度。論交換原理”1831 年爱丁堡版(J. Gray. «The Social System; A Treatise on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 Edinburgh, 1831)。——第 211 頁。
- 202 1871 年洛貝尔图斯发表了“标准的工作日”(«Der Normal-Arbeits-tag»)一文；文章載于 9 月 16、23 和 30 日的“柏林評論”(«Berliner Revue»)杂志，接着又于同年在柏林出版了单行本。——第 211 頁。
- 203 指参加出版洛貝尔图斯-亞格措夫的遺著，特别是他的著作“資本。給馮·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問題书簡”1884 年柏林版(«Das Kapital. Vierter sozialer Brief an von Kirchmann». Berlin, 1884)

- 的那批人；这一著作的出版者及其导言的作者是泰·科察克；而序言是德国庸俗經濟学家阿·瓦格納写的。——第 211 頁。
- 204 指卡·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的一部分，其中批判了約·格雷的观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73—76 頁)。这一部分曾經作为附录之一收入了“哲学的貧困”德文第一版。——第 211 頁。
- 205 洛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經濟状况的認識”1842 年新勃兰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第 61 頁。——第 211 頁。
- 206 指阿·瓦格納为洛貝尔图斯的著作“資本。給馮·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問題书簡”而写的序言的如下一段話：“洛貝尔图斯在这里表現了只有最伟大的睿智才特有的抽象思維的巨大力量。”(見 C. Rodbertus-Jagetzow. «Das Kapital. Vierter sozialer Brief an von Kirchmann». Berlin, 1884, S. VII—VIII)。——第 212 頁。
- 207 洛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經濟状况的認識”1842 年新勃兰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第 62 頁。后面也分析和引用了这一著作。——第 212 頁。
- 208 1871 年生效的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一一〇条規定，凡以书面形式公开号召不服从德意志帝国現行法律或命令者，判处六百馬克以下的罰款或两年以下監獄監禁。——第 218 頁。
- 209 指当时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正准备出版的“哲学的貧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 1896 年，这一版才在巴黎出版。——第 219 頁。
- 21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44—459 頁。——第 220 頁。
- 211 本文是恩格斯于 1885 年 1 月 25 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大概在同一天，他寄給保·拉法格一封信，叙述了同样一些事实和見解，只是說法上有些不同，而且更为扼要。拉法格把这封信轉給茹·盖得，后者即根据这封信写了一篇文章，于 1885 年 1 月 31 日作为“人民呼声报”的社論发表。盖得在文章中大量摘引了恩格斯的信，而没有說出他的

姓名,但是他說这封信是他从伦敦“我們伟大社会战斗中一員宿将”那里收到的。

“人民呼声报”(«*Le Cri du Peuple*»)是法国一家社会主义日报,1871年2—5月在巴黎断續出版,之后从1883年10月一直出版到1889年2月。——第221頁。

212 指俄普之間于1885年1月13日(1日)互換照会,照会是关于互相引渡那些被控犯有反对締約双方任何一方君主或其家属以及制造或貯藏爆炸物等罪行的人。——第221頁。

213 1876年塞爾維亞一門的內哥羅—土耳其战争和1877—1878年俄土战争,是在七十年代巴尔干斯拉夫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势下爆发的。在战争中,俄国女政論家奥·阿·諾維柯娃——她于1876—1877年住在伦敦,同俄国統治集团及英国自由党领导集团都有联系——同格萊斯頓密切接触,积极参与在英国和俄国开展的反对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企图把英国拖入站在土耳其一边反对俄国的战争的运动。这个运动对英国不参加这次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恩格斯所提到的奥·阿·諾維柯娃的文章叫做“英国的俄罗斯化”。

“派尔-麦尔新聞”(«*The Pall Mall Gazette*»)是1865年至1920年在伦敦出版的一家英国日报,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采取保守立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年7月至1871年6月會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1870—1871年該报會刊載恩格斯一組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还刊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的摘要。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派尔-麦尔新聞”有一段时期曾經是“伦敦唯一沒有被收买的报纸”。但是在1871年6月底,該报参加了资产阶級报刊因巴黎革命而发起的反对第一国际的全面的誹謗运动。这种情况迫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該报断絕了一切联系。——第221頁。

214 这个小册子會出过俄文版。——第222頁。

215 E. Regnault. «*Histoir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s principautés danubiennes*». Paris, 1855. ——第222頁。

216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是恩格斯为“公益”杂志写的,

后来这篇文章由他譯成德文，刊登在1885年6月的“新时代”杂志上。恩格斯以后把这篇文章全部包括到1887年出版的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見本卷第292—298頁）里，1892年他把它包括到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的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11—325、367—383頁）里。

“公益”（*The Commonwealth*）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1891年和1893—1894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1886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224頁。

- 217 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項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議會的一项法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滿二十一岁的男子），議會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議會議員候选人的财产資格限制，发給議員薪金。1839年、1842年和1849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三个請願书都被議會否决了。——第224頁。
- 218 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組織大規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議會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請願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撓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結了大批軍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許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說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敗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225頁。
- 219 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年6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資產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議會的大門。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軍——无产阶级和小資產阶级，受了自由資產阶级的欺騙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225頁。
- 220 英国的谷物稅是根据所謂的谷物法征发的。谷物法的目的是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輸入谷物，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資產阶级与土地貴族之間的斗争，由于1846年通过了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而告結束。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費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結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資

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是对土地贵族的一个有力的打击，并且加快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第 225 页。

221 这里和这一段下面的一些带引号的话是恩格斯转达人民宪章主要要求的内容。——第 226 页。

222 1867 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改革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 1867 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

1884 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 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在英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第 227 页。

223 东头 (East-End) ——伦敦的东部，包括无产阶级和贫民居住的各区。——第 229 页。

224 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 1883 年 9 月在南港举行的第五十三次会议的报告”1884 年伦敦版第 608—609 页 (《Report of the Fifty-Third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Southport in September 1883》. London, 1884, p. 608—609)。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成立于 1831 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协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形式发表。——第 230 页。

225 “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对被控号召武装反抗的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85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Karl Marx vor den Kölner Geschwornen. Prozeß gegen den Ausschuß der rheinischen Demokraten wegen Aufrufs zum bewaffneten Widerstand》. Hottingen-Zürich, 1885)，这本小册子于

- 1885年10月初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第二分册出版，这个丛书当时在苏黎世，后来于1885—1890年在伦敦用德文出版。小册子还收入了根据1849年2月19、25、27和28日“新萊茵报”第226和231—233号轉載的审讯记录。——第232頁。
- 226 指1848年11月18日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关于拒絕納稅的呼吁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頁)。——第233頁。
- 227 “普魯士的領導地位”(«preußische Spitze»)是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說中使用的一个詞；他在演說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願意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an die Spitze)”。在爭取德意志統一时期，这一詞用来表示普魯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統一国家的意图。——第233頁。
- 228 在1849年2月7日举行的对“新萊茵报”审判中，該报总編輯馬克思、編輯恩格斯和发行負責人海·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在1848年7月5日“新萊茵报”第35号上发表的一篇題为“逮捕”的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頁)中侮辱检察长茨魏費尔和誹謗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內克的宪兵。虽然法庭从7月6日起就开始偵訊，但是首次开庭审讯規定在12月20日才进行，后来又延期。在2月7日的庭审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护律师是施奈德尔第二，科尔夫的辯护律师是哈根。当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时，“出席旁听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审讯记录中这样写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次审判中的发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285頁。——第234頁。
- 229 对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在1849年2月8日进行的。卡·馬克思、卡·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他們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曾于1848年11月18日发表了号召拒絕納稅的呼吁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頁)。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馬克思在这次审讯中的辯护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6—306頁)。——第234頁。

- 230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从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八十年代成为德国西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德国人民党的机关报。——第235頁。
- 231 指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普奥战争中普鲁士起来反对德意志联邦的多数成员国(見注232),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于1867年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以代替德意志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是在德国的民族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普法战争是通过王朝战争和“铁血”政策“从上面”统一德国的完成阶段。
-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其中包括1866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需“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第235頁。
- 232 指德意志联邦,即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它包括三十四個邦和四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集中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它保存了封建分散状态的一切主要特征;它的中央组织——联邦议会——在奥地利代表的主持下举行会议。这个组织没有发挥中央政府的职能,而起了反革命的作用,它干预德意志各邦的内部事务只是为了镇压在各邦发生的革命运动。曾经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解散的德意志联邦于1850年又重新建立。联邦是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最后告終的。——第235頁。
- 233 指的是俾斯麦政府下列一些与1866年普奥战争有关的活动:
- 1866年4月8日普鲁士和意大利締結了秘密同盟条约,根据这个

条約,如果普魯士在締約后三个月內对奥地利开始采取軍事行动,意大利有义务反对奥地利;

1865 年底和 1866 年初俾斯麦同拿破侖第三举行了几次会談,在这些会談中俾斯麦希望法国保证,在他准备进行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力图給拿破侖第三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战争将会使普魯士耗費极大的力量,并且含混地暗示,法国可以侵占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及普魯士在萊茵地区的一些屬地来扩大自己的領土;

1866 年 7 月在西里西亚建立了一个由原来在奥地利軍隊中服役,后来在战争中被普魯士人俘虏的匈牙利士兵組成的軍团;这个軍团由参加过 1848—1849 年革命的匈牙利將軍迪·克拉普卡和其他参加过革命的,特别是这时从流亡中回到普魯士来参加战争的匈牙利軍官指揮;軍团越过匈牙利国界,但很快又回到西里西亚,后来由于战争結束而解散了;

在战争中曾經站在奥地利方面的汉諾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騷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被兼并,并根据 1866 年 9 月 20 日的法律划归普魯士。——第 236 頁。

- 234 指 1867 年 4 月 17 日由联邦制宪議会通过北德意志联邦(包括十九个邦和三个自由市)的宪法,这部宪法巩固了普魯士在联邦中的实际統治。普魯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在普选权基础上产生的联邦国会的立法权受到严格限制:它所通过的法律要經過成員反动的联邦會議的同意和联邦元首的批准才能生效。联邦宪法后来成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础。在 1866 年普奥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的薩克森,1866 年战争結束后不得不加入北德意志联邦,接着它又贊同了这部宪法。

提尔西特和約是拿破侖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魯士在 1807 年 7 月 7 日和 9 日簽訂的和約。和約条件对普魯士极为苛刻,使普魯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領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屬地)。俄国沒有丧失任何領土,但是被迫承认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的加强,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鎖(即所謂大陆封鎖)。拿破侖第一强迫簽訂的这个掠夺性的提尔西特和約,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滿,从而为 1813

年的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第 236 頁。

- 235 指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 1878 年 10 月 21 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个法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組織、群众性的工人組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在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分子，它能够在非常法生效期間正确地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結合起来，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 1890 年 10 月 1 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評論見“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308—310 頁）。——第 236 頁。
- 236 当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进行爭取独立的战争期間，在費拉得尔菲亚举行的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代表會議于 1776 年 7 月 4 日通过了由托·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这个文件中宣布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并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在文件中也制定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原則。——第 237 頁。
- 237 1618 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十六世紀初由条頓騎士团領地組成的、并臣属于波兰貴族共和国的普魯士公国（东普魯士）合并。作为普魯士領主的历代勃兰登堡选帝侯在 1657 年以前一直是波兰的藩臣，1657 年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利用波兰在对瑞典战争中的困难，使波兰承认了普魯士領地的主权。——第 237 頁。
- 238 1801 年 10 月法国和俄国締結了一項秘密协定，該协定借口补偿德意志各邦由于法国在反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同盟的战争后占去了萊茵河左岸屬地而受到的領土損失，規定了有利于拿破侖法国的解决德国萊茵省領土問題的办法。在协定条款实现以后，有总人口为 300 万的 112 个德意志邦（几乎包括全部教会領地和帝国城市）被取消，它們的領地很大一部分划归完全依附拿破侖法国的巴伐利亚、維尔騰堡和巴登以及普魯士。这些措施在形式上是根据所謂帝国代表會議——这是一个早在 1801 年 10 月由帝国議會选出的德意志帝国各邦代表組成的委員

会——的決議来实施的，这个決議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并在法国和俄国代表的压力下才于1803年2月25日由會議通过。——第238頁。

239 根据1805年12月26日法国和奥地利在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簽訂的和約的規定，曾經参加拿破侖法国反对第三次同盟的战争的巴伐利亚和維尔騰堡获得了建立独立王国的权利。在这次战争中也站在法国方面的巴登，在神圣羅馬帝国瓦解后，于1806年成了独立的大公国。——第238頁。

240 恩格斯引用了普魯士軍官費·利希諾夫斯基公爵在1848年7月25日的法兰克福国民議会上关于波兰問題的講話中的一句話（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16頁）。——第238頁。

241 这封信是尼·弗·丹尼尔逊建議恩格斯写的，他告訴恩格斯，在“北方通报”杂志上可能刊登馬克思給“祖国紀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Записок»）編輯部的这封未发表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頁）。但是，这一杂志没有刊登馬克思的信，第一次用俄文发表那封信的是1886年日内瓦“民意导报”（«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第5期，而刊载在俄国合法的刊物上則是1888年10月的“司法通报”（«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杂志。

“北方通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是文学、科学和政治月刊。于1885—1898年在彼得堡出版；到1891年年中，具有自由主义民粹派傾向，后来轉到頹废派手中；在八十年代末該杂志曾刊载保·拉法格和其他西欧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240頁。

242 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是作为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頁）德文第三版的引言而写的，第一次載于1885年11月12、19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7和48号，并載于1885年11月下半月出版的小册子：卡·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K. Marx.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 Neuer Abdruck mit Einleitung von Friedrich Engels und Dokumenten». Hottingen-Zürich, 1885)。在这本书中，除了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外，还包括：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26—734頁），馬克思給这本抨击性著作德文第二版写的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24—627頁），以及中央委员会1850年3月和6月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和359—366頁）。——第241頁。

243 Wermuth—Stieber.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Berlin, Erster Theil, 1853, Zweiter Theil, 1854. 該书的第一卷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轉載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卷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們的履历史表。——第241頁。

244 巴貝夫主义 是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流派之一，由十八世紀末法国革命家格拉古·巴貝夫及其拥护者創立。——第242頁。

245 *Société des Saisons*（四季社）是在奧·布朗基和阿·巴尔貝斯领导下于1837—1839年在巴黎进行活动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密謀性組織。

1839年5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起义（革命工人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是由四季社筹划的；这次起义沒有广大群众做依靠，被政府軍隊和国民自卫軍击潰。——第242頁。

246 沙佩尔在1839年5月12日起义后立即被捕，經過七个月监禁后被逐出法国；鮑威尔仍在巴黎繼續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1842年被逮捕，也被驅逐出境。——第242頁。

247 指德国民主主义者同維也納會議后在德国建立的反动統治进行斗争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被称为法兰克福的襲击崗哨事件）；1833年4月3日，一群主要来自学生界的激进分子企图通过襲击德意志联邦中央机

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議会在国内掀起变革，宣布成立全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准备得很差的发动被軍隊鎮压了下去。——第 242 頁。

248 1834 年 2 月，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馬志尼組織了他在 1831 年創建的“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員以及一群外国革命流亡者，从瑞士向属于撒丁王国(皮蒙特)的薩瓦进军，目的是在那里发动人民起义，以便統一意大利和建立独立的資產階級意大利共和国；进入薩瓦的部队被皮蒙特的軍隊击潰。——第 242 頁。

249 “蠱惑者”是德意志反动集团从 1819 年起对德国知識分子和大学生体操团体成員中間那些在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內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組織了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統一德国的要求；反动当局对“蠱惑者”实行了迫害。——第 243 頁。

250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約·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維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間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會員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 1850 年 9 月 17 日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許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該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納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閉。在二十世紀，許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訪問过协会。——第 244 頁。

251 恩格斯援引的是馬克思写的一篇文章：“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483 頁)。

“前进报”(«Vorwärts!»)是 1844 年 1 月至 12 月在巴黎出版的德国报纸，每周出两次。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該报撰稿。馬克思从 1844 年夏天起直接参与該报的編輯工作，該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

- 主义性质；該报对普魯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銳的批評。根据普魯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內閣于 1845 年 1 月下令把馬克思及該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驅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 244 頁。
- 252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編是卡·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 1844 年 2 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載有卡·馬克思的著作“論犹太人問題”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和“英国状况。評托馬斯·卡萊尔的‘过去和現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419—451、452—467、596—625、626—655 頁)。这些著作标志着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由革命民主主义轉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进分子卢格之間存在着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第 247 頁。
- 253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魯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創办的，1847 年 1 月至 1848 年 2 月出版。起初，該报的方針是以它的編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調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別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 1847 年夏天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战友在該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 年 9 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該报的經常撰稿人并对該报的方針开始发生直接的影响，1847 年最后几个月，他們实际上已經掌握了該报的編輯工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該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階級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 248 頁。
- 254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 年創刊，1852 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 1844 年 11 月起在伦敦出版。該报的創始人和編輯是非·奥康瑙尔，乔·哈尼也是編輯之一。自 1843 年至 1850 年該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論文和短評。——第 248 頁。
- 255 民主协会于 1847 年秋在布魯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階級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进步分子

團結在自己的隊伍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所領導的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對協會的成立起了積極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馬克思當選為該協會的副主席，比利時的民主主義者律·若特蘭被推選為主席。在馬克思的影響下，布魯塞爾民主協會成了國際民主主義運動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國資產階級二月革命時期，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無產階級成分曾設法武裝比利時工人開展爭取民主共和國的鬥爭。但在1848年3月初馬克思被驅逐出布魯塞爾和比利時當局懲治了協會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後，比利時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就不能領導勞動群眾反對君主政體的運動。民主協會的活動就成了更狹窄和純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它的活動實際上已告停止。

“改革報”(《*La Réforme*》)是法國的一家日報，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黨人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機關報；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該報上發表了許多文章。——第248頁。

256 指“人民論壇報”(《*Der Volks-Tribun*》)，它是德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紐約創立的週報。於1846年1月5日至12月31日出版。

“反克利蓋的通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0頁。——第249頁。

257 W. Weitling.《*Das Evangelium eines armen Sünders*》. Bern, 1845. ——第250頁。

25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5—498頁。——第250頁。

259 恩格斯援引的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第一條（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頁）。——第251頁。

260 “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頁）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3月21日和29日之間在巴黎寫成的。這些要求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剛開始的德國革命中的政治綱領。3月30日左右，“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印成了傳單，4月初發表在一系列民主報紙上。“要求”是作為指示性文件分發給回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的。在革命的進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擁護者竭力在人民

群众中宣传这个纲领性的文件。1848年9月10日以前，“要求”在科伦印成了传单，并由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莱茵省的许多地方散发。1848年10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措施纲领，这个纲领几乎完全摘自“要求”。1848年11月和12月在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各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1848年底或1849年初，“要求”在莱比锡也摘要以单行本发表。

恩格斯没有全部引用这个文件。——第253页。

- 261 指德国工人俱乐部，它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提议于1848年3月8—9日在巴黎建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第254页。
- 262 1849年5月3—8日在德勒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欽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勒斯顿起义为捍卫帝国宪法的斗争奠定了基础。这一斗争是在1849年5—7月期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斗争以民主力量的失败告终。——第256页。
- 263 1849年六月十三日——见注27。——第256页。
- 264 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257页。
- 265 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9—366页）。——第257页。
- 266 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是“国际述评(三)。从5月到10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3—514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

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間出版的“新萊茵报”(見注4)的繼續。該杂志在1850年3月到11月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編輯，在漢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紐約，因为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間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絕大部分材料(論文、短評、书評)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們也約請他們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約·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馬克思的“法兰西階級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論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資金缺乏而停办。——第258頁。

267 宗得崩德(特殊联盟)原来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諸州的单独联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諷刺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独自成立了独立的組織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維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方便了普魯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于1852年在科伦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件。——第260頁。

268 恩格斯的这个短評是給保尔·拉法格的信的片断，信中专门分析了法国在1885年10月4日众議院初选后的国内政治局势。从1879年起执政的、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温和共和派(所謂“机会主义派”)的政党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选民的信任，其原因是：国家預算出現赤字，捐稅增加，濫用公債，沒有履行它的大部分諾言(废除参議院，教会和国家分立，实施累进所得稅，等等)以及不受人民欢迎的、特别是在越南的殖民冒险。加之，党的許多领导人都与卑鄙的財政阴谋和貪污有关，这被保皇派在竞选运动中利用了。在初选的当选人中大多数是保皇派。由于法国社会主义者把这次結果估計为一个失败，恩格斯便写了这封信。信的这一片断載于10月17日“社会主义者报”上，編輯部加的标题是：“当前的形势”(«La Situation»)。接着恩格斯又写

信給“社会主义者报”編輯部，这封信載于1885年10月31日該报上（見本卷第264—265頁）。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一家法国周报，是茹·盖得1885年在巴黎創办的。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九十年代弗·恩格斯曾为該报撰稿。——第262頁。

269 指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和正統派。——第262頁。

270 1830年路易-菲力浦即位后不久，巴黎市政委员会在其致新国王的报告中曾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对法国七月王朝的态度。——第263頁。

271 这里指1885年10月4日选举的结果，大多数候选人没有获得当选所需的选票，于是规定在10月18日进行二选，在二选过程中絕大多数共和派候选人当选。结果，法国众議院中就有372名共和派（其中有許多激进派）和202名保皇派。

激进派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法国的一个議会党团。它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該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議院，教会和国家分立，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頒发殘废者撫恤金，提出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經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領。1901年激进派在組織上形成了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263頁。

272 本文批判地分析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部分（参看“資本論”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章）的英譯文，譯文載于1885年10月“今日”杂志第4卷第22期第429—436頁。譯文出自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亨·迈·海德門（笔名約翰·布罗德豪斯）之手。在恩格斯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海德門继续在“今日”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譯文直到1889年5月为止；总共发表了第一卷中的七章和第八章的大部分。由賽·穆尔翻譯并經恩格斯审訂的“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个科学的英譯本于1887年出版。

“今日”（《To-day》）是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83年4月

至 1889 年 6 月在倫敦出版；1884 年 7 月至 1886 年，亨·邁·海德門是該雜誌的主編。——第 266 頁。

- 27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3 卷第 44 頁。恩格斯在這裡把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一語譯成“在市民社會中”；在 1872—1875 年由作者親自校訂的“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中以及在 1887 年出版的經恩格斯審訂的“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中，則譯成“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第 274 頁。
- 274 亞·弗格森“市民社會史試論”1767 年愛丁堡版 (A.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Edinburgh, 1767)。——第 274 頁。
- 275 恩格斯的著作“關於普魯士農民的历史”是作為根據他的倡議出版的威·沃尔弗關於西里西亞農民狀況的文集的单行本 (見注 23) 的導言的第二部分而寫的。恩格斯於 1876 年發表的文章“威廉·沃尔弗”(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61—106 頁) 經作者做了很大刪節後，成了導言的第一部分。——第 277 頁。
- 276 条頓騎士團是 1190 年十字軍遠征時建立的德意志僧侶騎士團。騎士團在德國和其他國家奪取了許多領地。十三世紀時，用征服和消滅波羅的海沿岸的普魯士部落和一部分立陶宛部落的辦法而奪取的維斯拉河和尼門河河口之間的大片領土，都由騎士團統治。這個地方就成了騎士團對波蘭、立陶宛和俄羅斯各公國進行侵略的堡壘。在 1242 年楚德湖之戰(冰上激戰)和 1410 年格呂沃尔德之戰失敗以後，騎士團就一蹶不振，後來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領地。——第 278 頁。
- 277 世襲佃農是享有人身自由、但是有義務為了歸他們世襲占有的份地而用貨幣或實物貢賦交付一定的租金(世襲封建地租)的依附農。——第 280 頁。
- 278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戰爭是整個歐洲的戰爭，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間的鬥爭而引起的。德國是這次鬥爭的主要場所，是戰爭參加者的軍事掠奪和侵略的對象，它遭受了相互競爭的外國掠奪者的多次

入侵。这次战争于 1648 年以締結威斯特伐里亚和約而結束，这一和約加深了德国的政治分裂。

耶拿之敗指 1806 年 10 月 14 日普魯士軍隊被粉碎，結果普魯士向拿破侖法国投降，这证明霍亨索伦封建君主政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 281 頁。

279 指几种不占有耕地的依附农。

打谷工 (*Dreschgärtner*)——在德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在西里西亚，人們对那些从地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带茅屋的菜地，因而必須为地主劳动 (主要是打谷)，而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实物或錢的依附农的称呼。

茅屋工 (*Häusler*) 是从地主那里得到一間茅屋以及随带的一小块不足于养家活口的土地，而被迫要为地主做短工的依附农。

合同工 (*Instleute*) 是那些根据一定年限的合同为地主做工的日工，他們因此在这个年限內可以得到住房、一小块可耕种的土地以及极其微少的实物和貨幣报酬。——第 282 頁。

280 查理大帝敕令 是作为法兰克王国的主要立法文献之一的国王諭旨。——第 283 頁。

281 为了保证普魯士国家的物資收入和征收新兵的工作，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頒布了旨在反对地主把农民驅逐出份地的一系列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很少付諸实现。——第 283 頁。

282 1848 年 3 月 18 日 在柏林发生了武装起义，这是德国 1848—1849 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开端。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1748) 时期，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軍隊于 1741 年 4 月 10 日在莫耳維茨 (西里西亚的一个农村) 击败了奥地利軍隊。在色当 (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 地区，于 1870 年 9 月 1 日发生了普法战争 (1870—1871) 的最大会战之一，結果 9 月 2 日法軍投降了，这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破产。——第 283 頁。

283 見“从 1806 年到 1810 年 10 月 27 日頒布的普魯士王国法令汇编”1822 年柏林版第 170—173 頁 (*«Sammlung der für die Königlichen*

- Preußischen Staaten erschienenen Gesetze und Verordnungen von 1806. bis zum 27sten Oktober 1810». Berlin, 1822, S. 170—173)。——第 283 頁。
- 284 指 1808 年 2 月 14 日、1809 年 3 月 27 日、1809 年 4 月 8 日和 1810 年 1 月 9 日的几个命令（見注 283 中談到的“匯編”第 189—193、552—555、557—561、626—629 頁）；在 1809 年 4 月 8 日命令中說明，廢除世襲人身依附關係不應該理解為廢除農民履行的封建義務。——第 283 頁。
- 285 見“普魯士王國法令匯編。1811 年”柏林版第 281—299 頁（《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Preußische Staaten. 1811》。Berlin, S. 281—299）。——第 284 頁。
- 286 見“普魯士王國法令匯編。1816 年”柏林版第 154—180 頁。
英荷聯軍和普魯士軍隊於 1815 年 6 月 18 日在滑鐵盧（比利時）戰勝了拿破侖軍隊。——第 284 頁。
- 287 七年戰爭（1756—1763）是由各封建專制國家的侵略野心和法英兩國的殖民競爭而引起的一次全歐性戰爭。英國聯合普魯士共同反對奧地利、法國、俄國、薩克森和瑞典的同盟。由於戰爭的結果，法國被迫把自己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東印度領地等）割讓給英國；普魯士、奧地利和薩克森保持了戰前的疆界。——第 284 頁。
- 288 見“普魯士王國法令匯編。1821 年”柏林版第 77—83 頁。——第 284 頁。
- 289 自給戶（*Ackernahrung*）是在普魯士人們對一種農戶的稱呼，這種農戶擁有的土地和生產工具可以使家庭成員不用僱傭別人的勞力，也不用從事其他副業，而只依靠自己的勞動來維持生活。——第 285 頁。
- 290 指普魯士的薩克森省。——第 285 頁。
- 291 見“普魯士王國法令匯編。1845 年”柏林版第 502—505、682—684 頁。——第 285 頁。

- 292 “理性的国家”是一个流行的俗語，指普魯士国家，常用于譏諷的意思；源出于黑格尔 1816 年 10 月 28 日在海得尔堡大学讲授哲学史这门課程开讲时所作的开場白，黑格尔认为，正是普魯士国家建筑在理性上面。——第 285 頁。
- 293 奥·麦岑“1866 年以前普魯士国家边陲地带的土地和农业关系”1868—1871 年柏林版第 1—4 卷 (A. Meitzen. «Der Boden und die landwirth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nach dem Gebietsumfange vor 1866». Bd. I—IV, Berlin, 1868—1871)。——第 286 頁。
- 294 見“普魯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 年”柏林版第 276—279 頁。——第 286 頁。
- 295 見“普魯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 年”柏林版第 427—441 頁。——第 287 頁。
- 296 見“普魯士王国法令汇编。1850 年”柏林版第 77—111 頁。——第 287 頁。
- 297 恩格斯引的是普魯士第二議院农业委员会就 1850 年 3 月 2 日頒布的关于贖免封建义务的法律草案所作的报告；报告被提交議院 1849 年 11 月 23 日會議討論；見“根据 1849 年 5 月 30 日王室命令召集的第二議院辯論速記记录”。1849 年 11 月 23 日第五十九次會議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urch die Allerhöchste Verordnung vom 30. Mai 1849 einberufenen Zweiten Kammer». Neunundfunzigste Sitzung, 23. November 1849)。——第 287 頁。
- 298 恩格斯指的是麦岑书中的两个統計表，在第一个表中引用了从 1816 年到 1848 年的贖免情况的总計数，在第二个表中引用了从 1816 年到 1865 年底的贖免情况的总計数。——第 288 頁。
- 29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17—227 頁。——第 290 頁。
- 300 指 1848 年 12 月 10 日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务的路易·波拿巴于

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举行的政变：立法議會和国务會議被解散，許多議員被逮捕，在三十二省內宣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被驅逐出法国。1852年1月14日通过了新宪法，根据新宪法規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而在1852年12月2日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侖第三。——第290頁。

301 本文是恩格斯由于准备在美国出版他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頁）而写的，美国版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英譯本。恩格斯最初預計把这篇文章作为本版的序言或跋；但是，因为未能馬上找到出版者，书的出版大大耽擱下来，所以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先为該书写篇新的序言（見本卷第383—392頁），而本文就作为該书的附录。1892年，恩格斯把这篇文章几乎全部包括到他的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11—325和367—383頁）里。——第292頁。

302 見注220。——第293頁。

303 *Truck-system* 是工人劳动的实物工資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中对这种制度做了介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7—469頁）。1831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資制的法律；但很多厂主并不遵守。

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1847年6月8日英国議會通过的。——第293頁。

304 “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街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关于这个地方的詳細描述，見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42—343頁）。

“七日規”（《Seven Dials》）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街区。——第294頁。

305 指1885年“皇家委員會关于工人階級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ngland and Wales》, 1885）。——第

295 頁。

- 306 小宅子制——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給工人提供住所，房租由工人的工資中扣除（詳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469—470 頁）。——第 295 頁。
- 307 指 1886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26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冶工人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滿足。
关于 1844 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的罢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542—548 頁。——第 295 頁。
- 308 这封信是恩格斯应法国社会党人的請求而写的，他們請求恩格斯在紀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时公开表示与他們一致。信載于 1886 年 3 月 27 日“社会主义者报”，标题是：“恩格斯的信”。——第 299 頁。
- 309 1885 年以前在法国行使“小区”选举制，当时每一个选区选一名代表参加众議院。1885 年 6 月，根据温和的資產阶级共和派的創議，实施按各省名单选举的制度。根据这个到 1889 年以前一直有效的制度，小选区归并为較大的选区，每个选区相当于一个省。在这个选区内，选举人按照包括各党候选人在內的名单投票，但又必須按照該省应有的議席总数（每七万居民有一名議員）投票。在初选中，議員获得投票数的絕對多数，才算当选；在复选中，只要相对多数就可当选。——第 300 頁。
- 310 弗·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是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书中揭示了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驅——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費尔巴哈的关系，并对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作了系統的叙述。这本著作最初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論杂志“新时代”上，后来出了单行本，恩格斯專門为单行本写了序言（見本卷第 411—412 頁）。1889 年在彼得堡的杂志“北方通报”第 3 期和第 4 期上曾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为題刊登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俄譯文，但是沒有指明作者，而且有許多增添和脫离原文之处；文章下面是譯者格·弗·李沃維奇的署名：格·李·1892 年“劳动解放社”在日內瓦用单行本出版了由格·瓦·普列汉諾

夫翻譯的這部著作的全部譯文；同年又出版了這部著作的保加利亞文譯本。1894年，巴黎的雜誌“新紀元”第4期和第5期上登載了勞拉·拉法格翻譯并經恩格斯申閱過的譯文。在恩格斯生前沒有出版過這部著作的其他版本；後來，這部著作在德國用德文，也用俄文和許多其他文字多次再版。

“新紀元”（*«L'Ère nouvelle»*）是法國社會主義的月刊，1893—1894年在巴黎出版；茹·蓋得，讓·饒勒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漢諾夫等人都曾為該雜誌撰稿。——第301頁。

- 311 恩格斯指海涅關於德國哲學革命的言論，這些言論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中。這部著作發表於1834年，它對德國精神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進行評論（一部分發表於1833年）的繼續。海涅的這些言論貫徹了這樣的思想：當時由黑格爾哲學總其成的德國哲學革命，是德國即將到來的民主革命的序幕。——第306頁。
- 312 恩格斯在這裡套用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序言（*«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Vorrede*）中的話。這部著作的第一版於1821年在柏林問世。——第306頁。
- 313 見喬·威·弗·黑格爾“哲學全書縮寫本。第一部。邏輯學”第147節；第142節附釋（G. W. F. Hegel.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Erster Teil. Die Logik»*, § 147; § 142, Zusatz）。該書第一版於1817年在海得爾堡問世。——第306頁。
- 314 喬·威·弗·黑格爾“邏輯學”1812—1816年紐倫堡版（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Nürnberg, 1812—1816）。這一著作由三部分組成：（1）客觀邏輯，存在論（出版年代是1812）；（2）客觀邏輯，本質論（出版年代是1813）；（3）主觀邏輯，或概念論（出版年代是1816）。——第309頁。
- 315 “德國年鑑”（*«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爾派的文藝哲學雜誌“德國科學和藝術年鑑”（*«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簡稱。該雜誌曾以日報的形式在萊比錫出版。

从1841年7月到1843年1月，杂志用上述名称出版；以前（1838—1841）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1841年6月以前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主編，而从1841年7月起则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頓主編。由于“哈雷年鉴”在普魯士境內遭到停刊的威胁，編輯部从普魯士的哈雷城迁往薩克森，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即使用了新的名称，杂志也沒有出版多久。1843年1月薩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同时联邦議会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內出版。——第312頁。

- 316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是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該报是萊茵省一些对普魯士专制政体抱对立情緒的資產階級代表創办的。它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馬克思开始为“萊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該报編輯之一。“萊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許多文章。在馬克思担任編輯期間，該报日益具有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萊茵报”进行了特別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閉了。——第312頁。
- 317 大·弗·施特劳斯“耶穌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 F. Strauß. «Das Leben Jesu». Bd. 1—2, Tübingen, 1835—1836）。——第312頁。
- 318 指麦·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萊比錫版（M. Stirner.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Leipzig, 1845）一書。——第313頁。
- 319 L.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1. ——第313頁。
- 320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頁。——第313頁。
- 321 恩格斯大概指的是埃·斐·伊姆·特恩的著作“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間”1883年伦敦版第344—346頁（E. F. im Thurn. «Among

- the Indians of Guiana». London, 1883, p. 344—346)。——第 315 頁。
- 322 指 1846 年德国天文学家約翰·加勒发现的海王星。——第 318 頁。
- 323 恩格斯在这里引证了費尔巴哈的箴言。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維希·費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166 頁上引用过。引文摘自卡·格律恩“路德維希·費尔巴哈的书簡、遺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闡述”1874 年萊比錫和海得尔堡版第 2 卷第 308 頁(K. Grün. «Ludwig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sowie in seiner 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 Bd. II,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74, S. 308)。——第 319 頁。
- 324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現象学”(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該著作第一版于 1807 年在班堡和維尔茨堡問世。——第 324 頁。
- 325 自然神論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說的拥护者。这种学說承认神是世界的无个性的理性的始因，但否认神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干預。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統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論不止一次地从唯理論立場出发，批判中世紀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侶的寄生生活和招搖撞騙行为。但是，自然神論者同时又与宗教妥协，主张为人民群众保留具有合理形式的宗教。——第 324 頁。
- 326 这段引文摘自費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Nothwendigkeit einer Veränderung»), 載于卡·格律恩“路德維希·費尔巴哈”1874 年萊比錫和海得尔堡版第 1 卷第 407 頁(K. Grün. «Ludwig Feuerbach». Bd. I,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74, S. 407)。——第 326 頁。
- 327 这段引文摘自費尔巴哈的著作“駁軀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論”(«Wider den Dualismus von Leib und Seele, Fleisch und Geist»)。見“費尔巴哈全集”1846 年萊比錫版第 2 卷第 363 頁(«Ludwig Feuerbach's sämtliche Werke». Bd. II, Leipzig, 1846, S. 363)。——第 330 頁。

- 328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維希·費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54頁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費尔巴哈的著作“贫穷操纵并取消所有法律”(«Noth meistert alle Gesetze und hebt sie auf»), 載于卡·格律恩“路德維希·費尔巴哈”1874年萊比錫和海得尔堡版第2卷第285—286頁。——第330頁。
- 329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維希·費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80頁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費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Nothwendigkeit einer Veränderung»), 載于卡·格律恩“路德維希·費尔巴哈”1874年萊比錫和海得尔堡版第1卷第409頁。——第330頁。
- 330 卡·尼·施达克“路德維希·費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80頁。——第330頁。
- 331 恩格斯在这里概述了黑格尔主要发表在下述著作中的思想:“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Dritter Theil, II, 3)。后面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1832年在柏林出版。——第330頁。
- 332 見路·費尔巴哈的著作“我的哲学经历的特征描述片断”(«Fragmente zur Charakteristik meines Philosophischen Curriculum vitae»), 載于“費尔巴哈全集”1846年萊比錫版第2卷第411頁。——第331頁。
- 333 普軍在薩多瓦一役获胜(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后,德国资产阶级政論中的流行用語,意思是說普魯士的胜利似乎是由于普魯士国民教育制度的优越。这一用語源出奥格斯堡“外国”杂志的編輯奧·佩舍耳,他在該杂志1866年7月17日第29期上的一篇文章“最近的战争历史的教訓”(«Die Lehren der jüngsten Kriegsgeschichte»)中使用了这个用語。——第332頁。
- 334 指大·弗·施特劳斯“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現代科学的斗争”

1840—1841年杜宾根和斯图加特版第1—2卷(«Die christliche Glaubenslehr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und im Kampfe mit der modernen Wissenschaft». Bd. I—II, Tübingen—Stuttgart, 1840—1841); 这本著作的第二部, 根据它的主要内容, 名为“基督教教理(教义学)的物质内容”(«Der materiale Inbegriff der christlichen Glaubenslehre (*Dogmatik*)»). ——第335頁。

- 335 恩格斯指的是約·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純粹的和实践的理性的再批判”1869年汉堡版(«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 Dargestellt von einem Handarbeiter. Eine abermalige Kritik der reinen und praktischen Vernunft». Hamburg, 1869)一书。——第337頁。
- 336 見喬·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第2部第2篇(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weiter Theil, zweiter Abschnitt)。这本书的第一版于1837年在柏林問世。——第343頁。
- 337 尼西亚宗教会議——第一次所謂羅馬帝国基督教会世界主教会議。这次会議是32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細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的。会議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須遵守的信条(正統基督教会教义的基本原则), 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論。——第349頁。
- 338 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 十二至十三世紀广泛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 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抗議。法国南部的部分貴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 他們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諾森三世曾組織十字軍征伐阿尔比派。經過二十年战争和殘酷的鎮压, 阿尔比派运动終于失敗。——第349頁。
- 339 指1688年英国政变。政变驅逐了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二世, 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王; 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

- 以土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妥協為基礎的君主立憲制。——第 350 頁。
- 340 鑒於從十七世紀二十年代起對胡格諾教徒(加爾文派新教徒)所施加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加劇了，路易十四於 1685 年取消 1598 年頒布的南特勅令。這個勅令會給予胡格諾教徒以信教和敬神的自由；由於南特勅令的取消，數十萬胡格諾教徒從法國流亡他方。——第 351 頁。
- 341 指 1871 年 1 月在普魯士領導下建立的不包括奧地利在內的德意志帝國。——第 352 頁。
- 342 給“紐約人民報”編輯部的聲明是恩格斯因聖路易斯發行的一家美國民主派報紙“密蘇里共和黨人報”的記者麥肯尼斯對他的訪問而於 1886 年 4 月底寫的。恩格斯相信麥肯尼斯不會正確報道他的談話，所以他要求左爾格在報刊上一旦出現訪問記，立刻在一家美國社會主義報紙上刊登這篇聲明。
“紐約人民報”(《*New Yorker Volkszeitung*》)是美國的一家社會主義日報，從 1878 年至 1932 年用德文出版。——第 354 頁。
- 343 指弗雷西訥政府(1886 年 1 月 7 日—12 月 3 日)，這屆政府不同於過去大多數內閣，基本上是由資產階級激進派和溫和的共和派組成的，而激進派過去對於歷屆內閣總是採取反對的立場。——第 355 頁。
- 344 1886 年 1 月底，在德卡茲維耳城(法國南部)有兩千名煤礦工人開始罷工，這是因阿韋龍礦業公司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而引起的；政府派軍隊到德卡茲維耳。罷工一直繼續到 6 月中，並引起了全國的廣泛響應。在罷工的影響下，眾議院形成了一個維護工人的階級要求的不大的工人派。——第 355 頁。
- 345 指 1886 年 5 月 2 日在巴黎舉行的眾議院補充選舉，當時社會主義者候選人厄內斯特·羅什得到了 100 795 張票。——第 355 頁。
- 346 “歐洲政局”一文是 1886 年 10 月 25 日恩格斯給拉法格的一封信，只是作了不大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該文會譯成德文轉載在 1886 年 11 月 20、27 日和 12 月 4 日的紐約“社會主義者報”上，譯成羅馬尼亞文

轉載在 1886 年 12 月“社会評論”杂志第 2 期上。1886 年 12 月 12 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曾用德文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摘要。

“社会主义者报”(《*Der Sozialist*》)是一家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从 1885 年至 1892 年用德文在紐約出版。

“社会評論”(《*Revista Socială*》)是羅馬尼亚的一家杂志,从 1884 年至 1887 年在雅西出版,主編是社会主义者若·納杰日杰。——第 356 頁。

- 347** 圣斯蒂凡諾 初步和約是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結束以后,俄国和土耳其于 1878 年 3 月 3 日(2 月 19 日)在圣斯蒂凡諾(君士坦丁堡附近)簽訂的。这个条約意味着俄国对巴尔干影响的加强,它引起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在外交和軍事威胁的压力下,俄国政府被迫把条約交給 1878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13 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會議审查。出席这次国际會議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大不列顛、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代表,會議的結果,簽訂了柏林条約,根据柏林条約,圣斯蒂凡諾和約的条款被大大修改,变得不利于俄国和巴尔干半島的斯拉夫族人民了。圣斯蒂凡諾和約規定的自治的保加利亚的領土被割掉二分之一以上,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各地区成立了“东魯美利亚”自治省,仍受苏丹管轄;門的內哥罗的土地也被割去很大一部分。柏林条約承认圣斯蒂凡諾和約的規定,把 1856 年从俄国夺去的貝薩拉比亚的一部分归还俄国,同时也批准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維那的占領。在會議的前夕,英国侵占了塞浦路斯。柏林會議的決定在巴尔干造成了孕育着新战争的新的国际矛盾的策源地。——第 356 頁。

- 348** 1794 年波兰貴族共和国的民族解放起义被鎮压以后,1795 年波兰便遭到俄国、奥地利、普魯士的第三次瓜分。根据維也納會議(1814—1815)的決定,波兰王国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普魯士和奥地利在第三次瓜分波兰貴族共和国时所掠夺的大部分土地。——第 356 頁。

- 349**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国和法国利用埃及政府的財政困难,建立了对埃

及的財政監督。埃及人民為保護自己的民族獨立，進行了反對外國資本擴張的鬥爭。1882年，英國挑起了同埃及的衝突，開始了軍事行動，佔領了埃及，實際上已把埃及變成自己的殖民地。——第357頁。

350 指1866年普奧戰爭，結果是普魯士獲勝；主要的戰場是波希米亞（捷克）。

恩格斯把保加利亞在1885年11月2日開始的同塞爾維亞的戰爭中採取的軍事行動同這次戰役作了比較。戰爭的起因是塞爾維亞的統治集團在奧匈帝國政府的慫恿下，要求保加利亞賠償領土，因為東魯美利亞曾在1885年9月與保加利亞重新合併。在戰爭的头一個月里，保加利亞軍隊就擊敗了塞爾維亞軍隊，很快進入了塞爾維亞的領土。在奧匈帝國的壓力下，保加利亞的軍隊不再向前推進，在承認統一的保加利亞的邊界的基础上，於1886年3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簽訂了和約。——第359頁。

351 1886年5月13日(25日)在莫斯科舉行迎接亞歷山大三世從克里木歸來的儀式上，莫斯科市長阿列克謝也夫在歡迎詞中宣稱：“我們日益堅信：基督的十字架將在聖索菲婭閃耀”（阿列克謝也夫指的是君士坦丁堡的聖索菲婭大教堂）。——第359頁。

352 當亞歷山大·巴滕貝克在沙俄的壓力下放棄保加利亞王位和成立攝政政府以後，沙皇政府於1886年9月把尼·瓦·考耳巴爾斯將軍作為軍事委員派往保加利亞，以便恢復俄國在保加利亞的影響，並為挑選一個俄國人做保加利亞國王準備條件。考耳巴爾斯的使命並未成功，以英國為首的西歐各國在保加利亞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是其原因之一。同年11月，考耳巴爾斯被召回，同時沙皇政府與保加利亞斷絕外交關係。——第361頁。

353 宗得崩德是瑞士經濟落后的七個天主教州在1843年締結的單獨聯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實行進步的資產階級改革，維護教會和耶穌會教徒的特權。宗得崩德的反動企圖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會議里取得優勢的資產階級激進派和自由派的反對。1847年7月瑞士聯邦代表會議關於解散宗得崩德的決議成了宗得崩德11月

- 初向其他的州开始采取軍事行动的导火綫。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軍隊被联邦政府的軍隊击潰。——第365頁。
- 354 指1848年4月由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領導在巴登举行的共和派起义；到4月底，这一准备不足和組織拙劣的起义被鎮压下去了。——第365頁。
- 355 指維護帝国宪法的起义。帝国宪法于1849年3月27日由法兰克福国民議会通过，但以普魯士为首的許多德意志邦拒絕承认。1849年5月在薩克森和萊茵省，1849年5—7月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等地都會发生起义。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但是主要由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領袖們所領導的这次起义具有孤立和自发的性质，因而于1849年7月中被鎮压下去了。关于恩格斯曾亲自参加的这些起义的性质和經過，見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維護帝国宪法的运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頁）。——第366頁。
- 356 对布伦坦諾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感到不滿的巴登的左派民主主义者，于1849年6月5日建議布伦坦諾把革命扩展到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派活动家。建議遭到拒絕后，他們于6月6日試圖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資產階級的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們投降。——第366頁。
- 357 指参加过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哈瑙市（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体操团体的志愿队。——第367頁。
- 358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馬丁堂举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国际性會議，大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領導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魯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欧洲一些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決議。——第369頁。
- 359 “先驅”（《Der 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第一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

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編是約·菲·貝克尔。該杂志总的說来执行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綫，有系統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369頁。

- 360 «*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創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組織，其中包括他早先創建的阴謀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都有自己的支部。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請加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組織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巴枯宁加入国际后，实际上并未服从这个决定，而是打着国际的日内瓦支部的幌子使同盟混入国际，实则仍保留了同盟的名称。巴枯宁派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分裂活动反对国际，力图把总委员会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听从自己的指揮；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导致工人运动直接听命于资产阶级。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坚决地对同盟进行了斗争，揭露它是力图分裂工人运动并使其离开独立发展道路的敌視工人运动的宗派。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給予巴枯宁派以致命的打击，巴枯宁被开除出国际，馬克思主义对馬克思以前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取得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胜利。——第369頁。

- 361 “尼貝龙根之歌”——見注47。——第370頁。

- 36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3—321頁。——第372頁。

- 363 “人民国家报” («*Der Volksstaat*») 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萊比錫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該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論而經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編輯常被逮捕，該报編輯部成員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領導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內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奧·倍倍尔在該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該报編輯部保持着密切联系，該报經常刊載他

- 們的文章。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的活动评价很高，同时密切注視它的工作并批評它的某些缺点和錯誤，糾正報紙的路綫，該报因此成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 372 頁。
- 364** 指普法战争结束后締結的 1871 年法兰克福和約規定的法国的賠款 50 亿法郎。——第 372 頁。
- 365** 米尔柏格所写的以“住宅問題”(«Die Wohnungsfrage»)为題的六篇文章，曾不署名地載于 1872 年 2 月 3、7、10、14、21 日和 3 月 6 日的“人民国家报”上。——第 373 頁。
- 366** 艾·扎克斯“各劳动階級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 年維也納版 (E. Sax. «Die Wohnungszustände der arbeitenden Classen und ihre Reform». Wien, 1869)。——第 373 頁。
- 367** 米尔柏格对恩格斯的文章的答复載于 1872 年 10 月 26 日“人民国家报”，标题是：“住宅問題(阿·米尔柏格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Zur Wohnungsfrage (Antwort an Friedrich Engels von A. Mülberger)»)。——第 373 頁。
- 368**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256—257 頁及該卷注 231。——第 373 頁。
- 36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258 頁。——第 374 頁。
- 370** 新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編輯部的那些因該报揭露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馬德里联合会的委員們于 1872 年 7 月 8 日成立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組織新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絕接受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申請，总委员会于 1872 年 8 月 15 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新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爭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曾为該联合会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新馬德里联合会的委員們是 1879 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組織者。——第 374 頁。

- 37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頁。——第375頁。
- 372 拥有山地和大片沼地和荒地的艾費耳高原区(普魯士萊茵省),土壤气候条件不很适于农业;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是由力量单薄的小农户用落后的农业技术进行的;这一切引起了周期性的歉收和小农贫困的尖锐化;在恩格斯这篇文章中指的是1882年发生的事件,在前几年的連續歉收和农产品跌价以后,在艾費耳高原地区鬧过饥荒。——第377頁。
- 373 参看“資本論”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3章。——第381頁。
- 374 恩格斯这篇文章是作为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1887年5月在紐約出版)的序言发表的。同年,本文由作者譯成德文,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題发表在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此后,在7月又分別以德文和英文在紐約出版单行本,并譯成法文发表在7月9、16和23日“社会主义者报”上。这篇文章早在书的出版以前,未得恩格斯的同意就被譯成德文,并于1887年4月在“紐約人民报”上发表了,这引起了恩格斯正式抗議,他不滿意譯文的质量。——第383頁。
- 375 指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1887年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一組文章。

“时代”(《*Times*》)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79—1891年在伦敦出版。——第383頁。

- 376 恩格斯指的是有許多拉薩尔分子参加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艾威林的誹謗性的指責。艾威林和他的妻子——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及德国社会主义者威·李卜克內西一起,在1886年9月到12月期間到美国做了一次宣传旅行,拉薩尔分子指責艾威林向执行委员会报了假賬;恩格斯就这个問題进行了好几个月的通信,并帮助艾威林证实这种非难是完全荒謬的和誹謗性的。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于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組織合并,而在1876年費拉得尔菲亚統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基本工人联系很差。党内

在主要由拉薩尔派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代表的馬克思主义派之間进行过斗争。該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綱領，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輕視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組織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第 383 頁。

377 見注 307。——第 383 頁。

378 指美国 1886 年 5 月 1 日和以后几天以爭取八小时工作日为斗争口号的大罢工。这次罢工席卷了国内的主要工业中心——紐約、費拉得尔菲亚、芝加哥、路易斯維耳、圣路易斯、密尔窩基、巴尔的摩；罢工結果大約有二十万工人縮短了工作日。但企业主們馬上就开始了反攻：5 月 4 日，在芝加哥有人向警察队投了一枚炸弹进行挑衅，这給警察提供了用武器对付工人和逮捕好几百人的借口。进行了审讯，对芝加哥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們作出严厉的判決，其中四人在 1887 年 11 月被处絞刑；在这以后的几年中，美国工人在 1886 年五月大罢工中取得的成就全被企业主們一笔勾銷了。为了紀念这次罢工，1889 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一項決議：全世界工人每年都要庆祝五一节。——第 384 頁。

379 1886 年秋天，在准备紐約市政选举期間，为了工人階級的統一的政治行动，建立了統一工人党。建党的倡导者是紐約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即 1882 年成立的市的工会联合会。以紐約为榜样，这样政党在其他許多城市里都建立起来。工人階級在新的工人党领导下，在紐約、芝加哥和密尔窩基的选举上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統一工人党提出的紐約市长候选人，亨利·乔治得到全部选票的 31%；在芝加哥，工人党拥护者把一名參議員和九名众議員选入了州的立法議會，工人党的美国国会議員候选人只差六十四票就当选了；在密尔窩基，工人党把自己的候选人选为市长，把一名候选人选为州的立法議会的參議員和六名候选人选为众議員，并把一名候选人选为美国国会議員。——第 384 頁。

380 “劳动騎士”即“劳动騎士团”的簡称，是 1869 年在費拉得尔菲亚創建的美国工人組織，在 1878 年以前，是一个帶有秘密性的团体。該騎士团

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許多黑人,它以建立合作社和組織互助为目的,并参加工人階級的許多发动。但是,騎士团的領導实际上拒絕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階級合作;1886年,騎士团的領導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員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騎士团的普通成員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騎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第386頁。

- 381 参看“資本論”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4章。恩格斯提到的那一章在“資本論”第3版第1卷中編入第8篇,而从第4版开始这章編入第7篇。——第387頁。
- 38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和502頁。——第392頁。
- 383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国际兄弟联誼节而写的,国际兄弟联誼节由法国的一系列外国社会主义者組織发起,于1887年2月19日在巴黎举行,参加的人有德国、斯堪的那維亚、波兰和俄国的流亡社会主义者。联誼节的目的是要对欧洲的軍备竞赛和备战活动表示抗議。恩格斯的信曾在联誼节上宣讀,并載于2月26日的“社会主义者报”,还譯成德文載于3月11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同年3月19日紐約的“社会主义者报”。——第393頁。
- 384 S. Borkheim. «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dspatrioten. 1806—1807». Hottingen-Zürich, 1888. 这本书是根据恩格斯的倡議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第二十四分册出版的。“序言”的后半部分早在該书出版以前,就以“欧洲面临什么”为标题发表于1888年1月15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6頁。
- 385 1848年6月14日,因普魯士国民議会背弃三月革命(关于这点,見弗·恩格斯的“柏林关于革命的辯論”一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72—89頁)而憤怒的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攻占了軍械庫,以便武装人民捍卫革命的成果并把革命推向前进。但是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无組織的。及时赶到的援軍和資产階級的市民自卫团一起迅速地击退了人民,解除了他們的武装。——第396頁。

- 386 指 1848 年 9 月底在巴登发生的共和派起义；起义是由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为首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发动的，9 月 21 日从瑞士进入巴登地区。在巴登民主派的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几天以后，起义遭到巴登军队的镇压，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参加起义的人被逮捕，他们被判处长期徒刑。——第 396 页。
- 387 見注 355。——第 396 页。
- 388 六月六日运动——見注 356 页。——第 396 页。
- 389 “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一词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的团体的普通用语。
-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領工資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福格特在 1859 年出版的一本反对馬克思和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誣蔑性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控訴”。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歪曲了事实，称馬克思和他的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繪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齷齪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 年在日内瓦有一个玩笑地以“硫磺帮”为名的德国流亡者小集团（波克罕是它的一个成员），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里面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
- 馬克思在他的那本 1860 年写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397—754 页）里，給福格特以歼灭性的回击；同时他也駁斥了福格特关于“硫磺帮”的臆造。——第 397 页。
- 390 1860 年 2 月，馬克思請西·波克罕把关于日内瓦的“硫磺帮”的資料寄給他。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里，利用了波克罕 2 月 12 日的答复来揭露福格特（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06—409 页）。——第 399 页。
- 391 亞·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的小册子俄文版的标题是：“我們的家务事。就‘秩序在胜利’（“钟声”第 3 卷第 233 号）一文答赫尔岑先生”1867 年斐維版。在波克罕的譯本中，小册子的标题是：«Unsere Russischen

- Angelegenheiten. Antwort auf den Artikel des Herrn Herzen: «Die Ordnung herrscht!» (Kolokol Nr 233)». Leipzig, 1871. 德文版包括波克罕的序言和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小册子的本文, 后者的标题是: «Unsere häuslichen Angelegenheiten»。——第 399 頁。
- 392 “未来报”(«Die Zukunft»)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 人民党的机关报; 从 1867 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 1868 年至 1871 年在柏林出版。——第 399 頁。
- 393 指爱·赫夫内尔“一八〇六年和一八〇七年战争。普鲁士军队简史, 根据军事档案材料写成” 1855 年柏林第 2 版第 1—4 卷 (E. Höpfner. «Der Krieg von 1806 und 1807.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Armee nach den Quellen des Kriegs-Archivs bearbeitet». 2. Aufl., Bd. I—IV, Berlin, 1855) 一书。——第 400 頁。
- 394 谈到 1850 年对丹麦的征伐, 恩格斯是指普鲁士因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而同丹麦战争时期对丹麦作战的最后阶段。在 1848 年革命时期, 力求和德意志合并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居民发动了民族解放起义, 反对丹麦统治。在德意志的舆论的压力下, 普鲁士统治集团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的国家一道开始了虚张声势的对丹麦的战争; 但是, 他们每走一步都出卖革命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 并且在 1848 年 8 月 26 日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 协定的条款使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一切民主成果都化为乌有。战争在 1849 年 3 月底又重新开始。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 最后以普鲁士再一次的出卖行动而结束, 即普鲁士在 1850 年 7 月 2 日同丹麦签订和约, 让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用自己的力量继续战争。1850 年 7 月,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被丹麦军队击溃, 两公国仍属丹麦王国。
- 关于 1850 年普鲁士对南德的征伐, 恩格斯是指由于 1848—1849 年革命后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尖锐化, 普军在 1850 年 11 月进入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库尔黑森)一事。

1850年秋天，庫爾黑森發生的革命行動給奧普提供了干涉其內政的借口，而且雙方的每一方都企圖以主要的德意志國家的身分去擔當運動鎮壓者的角色。

普魯士政府看到奧地利—巴伐利亞軍隊進入庫爾黑森，便在1850年11月初宣布動員，並且它自己也往那里派了軍隊。11月8日奧地利—巴伐利亞的先頭部隊和普魯士的先頭部隊在布隆采耳附近發生一次小戰鬥。在動員過程中暴露出普魯士軍事制度的嚴重缺點和普軍的裝備陳舊，同時，在德國衝突中支持奧地利的俄國也堅決反對，這就迫使普魯士放棄了軍事行動并向奧地利投降。早在普魯士軍隊進入庫爾黑森以前，在1850年10月華沙會議上，俄皇尼古拉一世就作為奧普之間的仲裁人出來反對建立以普魯士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統一的企圖。11月29日在奧里穆茨（捷克稱作：奧洛摩茨）城，奧普之間簽訂一項協議，根據這個協議，普魯士必須放棄它的統一德意志的計劃，並且加入為奧地利所恢復的德意志聯邦。——第400頁。

- 395 指1866年普奧戰爭和1870—1871年普法戰爭。——第401頁。
- 396 “共產黨宣言”正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頁。——第403頁。
- 397 “紅色共和黨人”（《The Red Republican》）是1850年6—11月由喬·哈尼出版的憲章派周刊。“共產黨宣言”曾摘要發表在該周刊第21—24期上。——第403頁。
- 398 這句話恩格斯引自斯溫西市工聯理事會主席比萬于1887年在該市舉行的工聯年度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這篇發言的報道刊載在1887年9月17日的“公益”上。——第404頁。
- 399 “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是一家美國周刊，于1870年至1876年在紐約由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維·伍德赫爾和田·克拉夫林出版。
“共產黨宣言”于1871年12月30日在該周刊上發表（有刪節）。——第407頁。

400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1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紐約出版的法文周报,1871年12月至1872年10月是在美国的第一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第一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裂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

“共产党宣言”于1872年1—2月在該报上发表(有删节)。——第407頁。

401 “钟声”(«*Колокол*»)是一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办,1857年至1867年由赫尔岑创建的“自由俄国印刷所”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該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以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

“共产党宣言”由“自由俄国印刷所”于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該出版社是赫尔岑于1867年轉让給出版社同人切尔涅茨基的。——第407頁。

402 恩格斯在“論俄国的社会問題”一文跋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94—510頁)曾說这个譯本是由普列汉諾夫翻譯的;普列汉諾夫自己在“宣言”1900年版上也指明这个譯本是他譯出的。——第407頁。

403 这里提到的丹麦譯本——K. Marx og F. Engels «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 København, 1885——有一些删节和不确切的地方。恩格斯在“宣言”德文第四版序言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1—68頁)指出了这一点。法文譯本发表在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又作为附录轉載于1886年巴黎出版的梅尔麦“社会主义法国”(Mermeix, «*La France socialiste*». Paris, 1886)一书。西班牙文譯本发表在1886年7月至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过单行本。——第407頁。

404 这一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过;这里的提法参看“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頁和第17卷第475頁)。——第408頁。

40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5頁。——第409頁。

- 40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頁。——第410頁。
- 40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頁；這段引文中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頁）。——第411頁。
- 408 C. N. Starcke. «Ludwig Feuerbach». Stuttgart, 1885. ——第412頁。
- 409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6頁。——第412頁。
- 410 這篇文章是恩格斯用英文寫的，用作馬克思1848年1月9日在布魯塞爾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頁）美國版序言。恩格斯還審閱了由弗·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譯的這篇演說的譯文手稿，並親自把自己這篇序言譯成德文，於是序言便首先用德文發表在1888年7月“新時代”雜誌第7期上了。1888年8月下半月，序言的英文原文發表在紐約的“勞動旗幟”上。出版馬克思演說的單行本的工作延擱下來了，因為許多出版者拒絕印這本書，只是在1888年9月，小冊子才由波士頓的李-謝波德出版社出版。此外，這篇文章的結尾部分還用德文發表在1888年10月27日的紐約報紙“社會主義者報”上。
- “勞動旗幟”（《The Labor Standard》）是社會主義派的一家週報，1876—1900年在紐約出版。——第413頁。
- 411 關於討論自由貿易問題的布魯塞爾會議——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76—281和285—296頁弗·恩格斯的兩篇文章。——第413頁。
- 412 見注220。——第413頁。
- 413 見注255。——第413頁。
- 414 卡·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參看“資本論”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35頁）。——第414頁。

- 415 《*Manifest destiny*》(“天定命运”)是十九世紀美国統治集团的扩张主义政策的思想家为了为这一政策辯护而广泛使用的說法。这种說法最先是“美国杂志和民主評論”(《U. 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杂志的編輯約·奧沙利文在1845年7—8月該杂志第17卷第5頁上使用的。——第418頁。
- 416 議會火車是十九世紀英国对1844年法律規定的特別的第三等火車的諷称;根据这项法律規定,每一个铁路公司都必須在所轄的各铁路綫上每天开一趟这种火車,速度每小时不得低于是十二英里,車費每英里不得高于一辨士。——第418頁。
- 417 “財政部长关于1887年度財政状况的年度报告”1887年华盛頓版第XXVIII、XXIX頁(《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 for the Year 1887》, Washington, 1887, pp. XXVIII, XXIX)。——第420頁。
- 418 1823年威·哈斯基森当了英国貿易大臣,根据他的倡議,在二十年代中实行了一系列改組过时的关税制度的措施,废除或降低了几种原料、粮食和其他商品的进口稅,谷物稅調节制代替了谷物的禁止性关税,按照谷物稅調节制,国内粮价下跌时进口稅就提高,国内粮价上涨时进口稅就降低。
1842年,罗·皮尔政府进一步降低了关税稅率。——第421頁。
- 419 指英国議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421頁。
- 420 关税同盟是1834年在普魯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普魯士从1819年起只是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斯塔德)签订了关税协定。确定了共同稅界的关税同盟,逐漸包括了几乎德意志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卢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由于建立全德市場的必要性而成立的关税同盟,促进了于1871年完成的德国在政治上的統一。——第423頁。

- 421 指格·弗·科尔布“各国人民的状况及其国家生活比較統計手冊”1875年萊比錫第7版(G. F. Kolb. «Handbuch der vergleichenden Statistik der Völkerzustands- und Staatenkunde». 7. Aufl., Leipzig, 1875)一书; 科尔布书中引用的金額单位是百万塔勒。——第424頁。
- 422 关于必須改革关稅稅率以提高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进口稅的声明, 是1878年10月由一批国会議員提出的。1878年12月, 俾斯麦向专门建立的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初步改革方案。从1879年5月起, 定案就在国会中进行討論, 并于1879年7月12日通过。新的关稅稅率規定大大提高铁、机器、紡織品, 以及谷物、牲畜、油脂、亚麻、木材等的进口稅。——第424頁。
- 423 指1860年1月23日簽訂的英法商約, 在簽訂商約时英国的首席會議代表是自由貿易論者理·科布頓。商約規定, 法国放弃禁止性关稅政策, 代之以不得超过貨物本身价值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稅。商約授予法国向英国免稅輸入大部分法国貨的权利。商約簽訂后, 由于英国貨大量流入法国, 国内市場上的竞争大大加剧, 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滿。——第427頁。
- 424 “美孚油公司”是約·戴·洛克菲勒于1870年在俄亥俄州开办的, 拥有資本100万美元。在七十年代, 該公司广泛进行投机阴谋活动, 垄断了石油的运输业和加工业, 几乎控制了美国整个石油工业。1882年, 該公司改組成同名的托拉斯, 已經控制的資本总额达7500万美元。后来, “美孚油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义垄断組織之一, 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对的对內政策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鼓舞者之一。——第427頁。
- 425 糖业托拉斯, 又称精糖厂公司, 成立于1887年, 1891年改組成美国精糖公司。該托拉斯在成立的初年几乎垄断了美国整个制糖工业。后来, 虽然成立了許多强大的、进行竞争的公司, 但是該托拉斯根据参与制对其中一些公司建立了监督, 同另一些公司建立了联系, 因此仍然是这个工业部門中最大的垄断組織。——第428頁。

426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經濟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貿易論者主张貿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經濟生活。自由貿易論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紡織厂主：科布頓和布萊特，他們在 1838 年組織了反谷物法同盟。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貿易論者是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了英国自由党的左翼。——第 428 頁。

427 恩格斯指的是賀雷西頌詩集第三卷中的第一首頌詩。——第 430 頁。

428 本文是恩格斯写給“工人領袖”杂志編輯詹姆斯·凱尔·哈第的信，曾經发表在該杂志“矿工簡訊”栏中，沒有加标题。

魯尔的德国矿工罢工是十九世紀末德国工人运动最重大事件之一，罢工于 1889 年 5 月 4 日在格耳晋基尔恒矿区开始，之后席卷了整个多特蒙特区。在罢工規模最大的时期，参加者达 9 万人。一部分罢工者是受社会民主党人影响的。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提高工資；将工作日縮短为 8 小时，包括上下井的时间在內；承认工人委员会。罢工的規模使得政府机关害怕起来，在它們的影响下企业主們答应滿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于是在 5 月中部分地复工了。但是由于矿主們违背了自己的諾言，所以矿工代表會議于 5 月 24 日作出繼續罢工的決定。一方面受到鎮压措施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矿主們作出了新的諾許，罢工才不得已于 6 月初停止。工人的要求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是罢工使矿工的階級觉悟和組織性得到了提高，使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得到了增强。这次罢工对德国工人运动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工人領袖”（《The Labour Leader》）是从 1887 年起出版的一家英国月刊，最初刊名是“矿工”（《Miner》），从 1889 年起改用本名称，是苏格兰工党的机关刊物；从 1893 年起是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从 1894 年起改为周刊。在 1904 年以前，該刊的編輯是詹姆斯·凱尔·哈第。——第 432 頁。

429 罢工矿工三人代表团是經帝国国会某些自由派議員的努力而組成的，这些議員力图不让社会民主党对煤矿工人的影响增加，利用了部分矿工政治觉悟程度不够这一点組成了代表团。代表团于 5 月 14 日为威

廉二世所接見。——第 433 頁。

- 430 1889 年 5 月中矿工罢工运动扩展到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在这里罢工席卷了大部分矿井（2 万人），从 5 月 14 日一直繼續到 24 日；这次罢工运动还扩展到了薩克森，在这段期間当地有 1 万人罢工。在薩尔区，某些矿井的矿工罢工开始于 5 月 14—16 日，5 月 23 日罢工人数就达 12 000；烏尔姆矿区矿工的罢工开始得更早，罢工的約有 8 000 人。到 5 月 31 日才复工。1889 年 5 月 24 日在捷克的克拉德諾区也发生了矿工大罢工。

5 月底在德国不同城市和地区发生了要求提高工資，有时也要求縮短工作日的罢工。例如，在柏林 5 月 25 日約有 2 万泥瓦匠罢工；在弗萊因瓦尔德有铁路員工的罢工，在施特廷和科尼斯堡有彩画匠和木匠的罢工，等等。——第 434 頁。

- 431 “可能派的代表資格证”一文是恩格斯写来反对机会主义集团（法国的可能派及其来自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拥护者）掀起的旨在破坏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威信的运动的，这个代表大会主要受欧洲各国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影响于 1889 年 7 月 14 至 21 日在巴黎举行。最初可能派试图一手包办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并在代表大会上充当领导角色，但是遭到了失敗，于是就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平行代表大会，出席的只有少数外国代表，而且大多数人的代表資格純粹是伪造的。把两个代表大会統一起来的尝试沒有成功，因为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提出条件要求重新审查馬克思派代表大会代表們的代表資格证。关于 1889 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經過，詳見本卷第 575—612 頁。本文曾載于 1889 年 8 月 10 日“工人选民”第 32 号。

“工人选民”（《The Labour Electors》）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的周报，从 1888 年 6 月至 1894 年 7 月在伦敦出版。

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別，以 1882 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的布魯斯、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別的領袖們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則，即只爭取“可能”（《possible》）爭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关于这个派別詳見本卷第 575—577、583—585、595—599 頁。——第 435 頁。

432 “星报”(《*The Stars*》)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党的机关报,从1888年起在伦敦出版;在創办的最初几年,与社会民主联盟接近。——第435頁。

433 “三个土利街的裁縫”是一句流行話,根据是:英国国家活动家乔·坎宁說过,有三个伦敦土利街的裁縫向下院提出請愿书,开头一句話是:“我們,英国的人民”。——第437頁。

434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日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从1885年起在馬德里出版。——第437頁。

435 卡洛斯派 是西班牙的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支持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后来又支持他的后裔;它所依靠的是軍閥、天主教僧侶和一部分地主。——第437頁。

436 这篇短評看来是恩格斯写給爱琳娜·馬克思的信的片断。这个片断曾发表于“工人选民”上,并譯成德文轉載于1889年9月25日“紐約人民报”和1889年10月26日“柏林人民論壇”。

1889年8月12日至9月14日举行的伦敦碼頭工人罢工,是十九世紀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碼頭工人3万,其他行业的工人3万以上;他們之中大多数都是沒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組織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滿足。碼頭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团結(捐来的罢工基金約有5万英鎊),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組織性:成立了碼頭工人工会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工联的总人数即增加一倍多。

“柏林人民論壇”(《*Berliner Volks-Tribün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政治周报,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从1887年至1892年出版。——第438頁。

437 东头——見注223。——第438頁。

438 恩格斯的“资产阶级让位了”一文曾載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各国社会主义者里引起很大兴趣;1889年10月11日該文轉載于維也納的

“工人报”，1889年10月12日譯成英文（稍有删节）載于“工人选民”，10月26日載于“柏林人民論壇”报（文字上稍有修改，并标题为：“资产阶級所做不到的和工人所做得到的”）；該文还在德国和美国的其他一些报纸上发表。1890年該文被譯成俄文載于1890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期。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89年在維也納創刊。

“社会民主党人”是“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9年在日內瓦出版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4期。——第439頁。

439 指1889年9月22日法国众議院的初选，当时共和派共获得215个席位，而各保皇派集团（正統派、波拿巴派及布朗热派）总共获得140个席位。——第440頁。

440 見注436。——第441頁。

441 这个片断看来是恩格斯在他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时候写的。从內容上看，这个片断是同这本书的第九章談到在中世紀的貴族、城市望族和农民的血族中保存着氏族制度的殘余的地方相銜接的（見本卷第193頁）。但是，由于缺乏其他的任何資料，这个手稿片断的写作日期仍然仅仅是一种推測。这个片断写在一张单頁上。标题是俄文版編者加的。——第447頁。

442 巴力斯 即城邦，是公元前八至六世紀在古希腊形成的最典型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社会經濟和政治組織的形式之一。每个巴力斯都是由城市本身和它附近不大的地区构成的公社。只有拥有地产和占有奴隶的巴力斯本地居民，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巴力斯公民。——第447頁。

443 恩格斯的这篇未完成著作，看来是为了准备他所計劃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新版本，而于1884年最后几个月写成的。从恩格斯的书信中，特别是从他在1884年12月31日写給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他打算彻底修訂这本书，即把1525年的农民战争作为“全部德意志历史的基石”加以闡述，为此就要在书的开头和結尾做許多历史补充。从手稿的內容来判断，这篇著作看来应该是新版本的引言或第一

章中的一部分。后面发表的（見本卷第 459—460 頁）与这篇手稿的内容相衔接、恩格斯称为“关于‘农民战争’”的提綱，大概就同这个计划有关。在給这本书做补充时，恩格斯也利用了自己以前写的德国历史提綱，特别是“关于德国的札記”的手稿（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647—654 頁）。但是，由于其他工作太多，恩格斯未能实现他的出版“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新的修訂本的意图，虽然后来在九十年代他曾經又给自己提出这个计划。这篇著作的标题是俄文版編者加的。——第 448 頁。

- 444 “路易之歌”是中世紀一位无名詩人的詩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九世紀末。該詩是獻給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的頌詞，贊揚他在 881 年打敗了諾尔曼人。——第 452 頁。
- 445 指 842 年于斯特拉斯堡东法兰克王德意志路易和西法兰克王秃头查理以及他們的附庸相互間所作的效忠誓的原文，原文已保全下来，系用古代高地德意志語和罗曼語即古法兰西語写成。——第 452 頁。
- 446 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是居住在从拉巴河（易比河）到奥得河的中欧地区的西方斯拉夫人部落組成的大集团。沿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击退了德意志部落的頻繁的入侵，而从十世紀起，他們又不断遭到德意志封建主的侵犯。虽然他們頑强抵抗，但在十二世紀，由于血腥的侵略战争的結果，德意志封建主們占領了他們的土地。斯拉夫居民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受德意志征服者奴役，并且被强迫德意志化。——第 452 頁。
- 447 指中法兰克国家。中法兰克国家是九世紀中叶由皇帝洛塔尔一世撥給他的儿子洛塔尔二世的土地即些耳德河、萊茵河、麦士河和索恩河之間的土地組成的，并按照洛塔尔二世的名字得名为洛林。在 870 年洛塔尔二世死后，洛林被分給（大致按語言分界綫）他的两个兄弟即东法兰克王德意志路易和西法兰克王秃头查理。——第 452 頁。
- 448 指英国人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1337—1453）的胜利。战争的起因是两国封建貴族的侵略野心，例如英法之間爭夺弗兰德地区的工商业城市（英国羊毛的主要买主）以及英国国王覬覦法国王位。战争期間，英国人曾多次侵占法国的大块土地，但是最后終於被趕出法国。在英国人

手中只剩下加来港。——第 456 頁。

- 449 恩格斯指的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皇帝阿尔勃莱希特一世拒絕承认他的前任拿騷的阿道夫所确认的瑞士联邦的核心即瑞士各州的自主权，并企图把这些州控制在奥地利大公的权力之下。在十四至十五世紀，瑞士各州在为爭取自己独立而进一步斗争的进程中，终于粉碎了奥地利封建主的军队，最后争得了不受奥地利統治的国家地位，仅仅名义上从属于德意志帝国。——第 456 頁。
- 450 1346 年 8 月 26 日，在克雷西（法国东北部）附近进行了百年战争中的一个大战役；以自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为基干的英国军队，击败了以纪律松弛的騎士队为主力的法国军队。
关于 滑铁卢会战——見注 286。——第 457 頁。
- 451 阿腊貢王国和加斯梯里亚王国是在 1479 年合并的。——第 457 頁。
- 452 勃艮第大公国是九世紀在法国东部塞納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地区成立的，后来并入大片領土（法兰斯孔太，法国北部一部分和尼德兰），在十四至十五世紀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十五世紀下半叶在大胆查理大公时代达到鼎盛。力图扩张自己屬地的勃艮第大公国成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貴族和法国封建主結成联盟，一齐抵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并且对瑞士人和洛林进行了侵略战争。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联盟来对付勃艮第。在反对联盟的战争中（1474—1477）大胆查理的军队被击潰，他本人在南錫附近的会战（1477）中陣亡。他的屬地被分給路易十一和德意志皇帝的儿子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第 457 頁。
- 453 1494 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利用意大利的政治上的分裂和意大利各邦之間的紛爭，侵入了意大利的領土并占領了那不勒斯王国。但是第二年，法国军队就被意大利各邦联盟在德意志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的支持下驅逐出去。查理八世的远征是所謂意大利战争（1494—1559）的开端，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意大利不止一次地遭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的侵犯，成了他們爭夺亚平宁半島統治权的长期斗争的場所。——第 457 頁。

- 454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法国宗教改革,是指胡格诺运动,这个运动是十六世纪在加尔文教派的宗教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但是实质上却与该教的资产阶级内容毫不相干。参加运动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一运动被封建显贵和贵族所利用,他们对正在形成的专制国家的中央集权政策不满,力图恢复他们的中世纪的地方“自由”。由于断断续续地从1562年延续到1594年的所谓胡格诺战争,被具有了反对封建性质的人民运动的规模吓坏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联合在胡格诺教徒的前领袖纳瓦腊的亨利(波旁新王朝的代表)的周围,他接受天主教以后成为国王,号亨利四世。——第457页。
- 455 指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派和朗卡斯特派之间的战争(1455—1485)。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朗卡斯特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朗卡斯特的则有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第458页。
- 456 波兰和立陶宛合并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385年进行的,当时两国签订了所谓克雷沃合并条约,其目的主要是共同抵御日益严重的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合并曾数度废除和恢复。合并逐渐从防御性的联合变成了波兰的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民的联合。1569年签订了卢布林合并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波兰和立陶宛组成为一个国家,名叫波兰贵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权。——第458页。
- 457 本提纲是恩格斯由于打算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而写的(见注443),看来是他拟定的本书新版的导言(或绪论)计划的一个片断和草稿。提纲是在单页上写的。——第459页。
- 458 空位时期指继1254年霍亨施陶芬王朝结束之后延续到1273年的各个王位追求者之间的争夺王位的斗争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各王公、骑士和城市彼此之间的接连不断的纷争和内讧;1273年,王公之一的哈布斯堡鲁道夫被选登德意志帝国(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第

460 頁。

- 459 本著作是恩格斯打算写、但没有完成的题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小册子的一部分。原先，即在 1886 年底，恩格斯准备修改并单独出版“反杜林論”第二編中的三章，这三章所用的統一的标题是“暴力論”，目的是批評杜林的暴力論，并与此相对地闡明关于經濟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还計劃把該著作第一編中有关道德和法的两章——“永恒的真理”和“平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0 卷）加以修改同上述三章編在一起。恩格斯本来打算把这本书叫做“論世界历史中的法和暴力”。后来，恩格斯改变了自己的計劃，决定只出版一个小册子，内容包括上述三章和新加的第四章，这一章把前三章中所說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 1848 年到 1888 年的德国历史，从批判“俾斯麦的全部政策”的观点来分析这段历史。小册子的书名先定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的写作工作，恩格斯大約是在 1887 年底开始的，一直繼續到 1888 年的最初几个月。可是，他因忙于其他工作，在 1888 年 3 月中断了这一工作，看来，他后来就沒有再进行下去。恩格斯逝世以后，在他的文稿里，在一个标有“暴力論”字样的专门封套中，发现了“反杜林論”的上述三章、計劃写的小册子的未完成的第四章手稿和該小册子的前言的草稿、第四章的全部提綱、这一章的沒有写完的結尾部分的提綱，以及从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德国历史、特别是从康·布勒的“現代史。1815—1885” 1888 年柏林第 2 版第 1—4 卷(C. Bulle. «Geschichte der neuesten Zeit, 1815—1885», 2. Aufl., Bd. I—IV, Berlin, 1888)中所作的年表摘要。

未完成的一章的手稿、前言的草稿和一些准备材料，第一次由爱·伯恩施坦发表在 1895—1896 年“新时代”杂志第 22—26 期上，标题为“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的暴力和經濟”。伯恩施坦为手稿付印所做的准备工作，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肆无忌惮地对待恩格斯遺稿的一个例子：伯恩施坦竟不是复制手稿，而是擅自把手稿分成若干篇，給每一篇都按上一个他自己臆想出来的小标题，編上注释号碼，并在恩格斯的原文中添进自己的話。可能是由于伯恩施坦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草率态度，有一部分手稿（見本卷第 506—513 頁）已經遺失。1896 年，手稿譯

成法文发表在“社会发展”(«Devenir Social»)杂志第6—9期上,一起发表的还有“反杜林論”的上述三章。1899年,恩格斯的著作以意大利文在羅馬出版单行本,它是完全从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德文轉譯的。这一著作的不完全的俄譯文,于1898年发表在彼得堡的“科学評論”(«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杂志第5期上。第一个同样不完全的俄文单行本,于1905年在基輔出版。在1923年于莫斯科出版的、題为“德意志帝国形成时期的暴力和經濟”的版本中,除了第四章的手稿以外,还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曾刊載在“新时代”上的为写小册子而准备的材料。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1937年版第16卷第1部)中,恩格斯这一著作第一次不是按照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样子,而是按照手稿本身刊載,并从原文中消除了由伯恩施坦所加的一切东西(如分篇,加小标题等等)。并且使标题也按恩格斯的想法作了更改。为写該著作而作的准备材料和摘要,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48年俄文版第10卷上。

在本版中,除了“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小册子的第四章手稿以外,还发表了为小册子写的前言的草稿、第四章整章的提綱和这一章的結尾部分的提綱,該提綱揭示了該著作中还没有完成的那一篇的内容。——第461頁。

- 460 关于1850年在华沙的談判,关于当时普奧之間爭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結局——見注394。

关于联邦議會——見注232。——第464頁。

- 461 “瘋狂年”(«das tolle Jahr»)是德国一些反动作家和历史学家对1848年的称呼。这一用語是从作家路德維希·貝希施坦那里借用来的,他在1833年曾用这一名称出版了一部描写1509年爱尔福特騷动的小說。——第464頁。

- 462 戶籍立法(Heimatgesetzgebung)規定了定居在某一地点的国家公民的权利,还規定了貧困家庭从所属乡鎮得到物质帮助的权利。——第465頁。

463 普魯士塔勒合 $\frac{1}{14}$ 馬克(重量单位)純銀;1750年,它在普魯士被采用,十九世紀上半叶(直到1857年),它也在德国北部各邦以及其他一些邦被采用;普魯士塔勒分为銀格罗申、先令和分尼的情况,在德国各个邦里是各不相同的。

金塔勒是自由市不来梅的貨幣单位,它与德国的其他所有币制不同,一直到1872年还保留金本位;大約等于3.32馬克。

“新三分之二”塔勒是通行于汉諾威、梅克伦堡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北部邦的一种銀币,大約等于2.34馬克。

銀行馬克(Mark Banko)是汉堡銀行用以計算批发商业的一种鑄币,在很长时期內被用作国际計算单位。流通馬克(Mark Courant)是一种流通鑄币;从十七世紀起,就这样称呼票面額一直到0.5馬克的銀币,它是同金币、小輔币和紙币对立的。

二十古尔登币制(Zwanzig-Guldenfuß)是一种币制,按照这种币制,把一馬克(重量单位)的純銀制造成20个古尔登或者 $13\frac{1}{3}$ 塔勒;1748年,奥地利采用了这种币制,巴伐利亚、薩克森选帝侯国、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許多邦很快也采用了这种币制;在奥地利,这种币制一直存在到1857年。

二十四古尔登币制(Vierundzwanzig-Guldenfuß)是一种币制,按照这种币制,把一馬克(重量单位)的純銀制造成24个古尔登;从1776年起,通用于巴伐利亚、巴登、維尔騰堡和德国南部其他各邦。
——第466頁。

464 瓦特堡紀念大会是1817年10月18日为了紀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1813年的萊比錫会战四周年而举行的。紀念大会的发起者是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一个在反对拿破侖的解放战争影响下产生的,拥护德国統一的德国大学生的組織。紀念大会成了反对派大学生反对梅特涅反动統治和拥护德国統一的示威游行。——第467頁。

465 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資产階級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組織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團結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爭取資产階級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467頁。

- 466 指创立于 962 年的中世紀的神圣羅馬帝国；在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 (1138—1254)，它是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不巩固的联盟，其領土包括中欧的其他許多国家、部分意大利以及东欧一些由德国封建主所占領的斯拉夫人地区。——第 467 頁。
- 467 在这里，恩格斯諷刺地套用了恩斯特·摩里茨·阿伦特的名詩“德国人的祖国”中的一个叠句，該詩写于 1813 年，它号召德国人把“只要是說德語的”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在阿伦特的詩中，这个叠句原来是这样的：“让祖国变得更辽阔”。——第 468 頁。
- 468 关于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里亚和約——見注 278。
帖欣和約——是以奥地利为一方同普魯士和薩克森为另一方于 1779 年 5 月 24 日在帖欣簽訂的和約，它結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1778—1779)。根据这一条約規定，普魯士和奥地利得到了巴伐利亚的几部分領土，而薩克森則得到了金錢补偿。在簽訂条約时充当調停人的俄国，同法国一起又成了条約的保证者。——第 468 頁。
- 469 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 (1740—1748) 占領了西里西亚，引起战争的原因是欧洲許多封建国家，首先是普魯士，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野心，这些領地是在查理六世皇帝死后，鉴于沒有男嗣而留給他的女儿瑪丽-泰莉莎的。1740 年 12 月，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属于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法国和巴伐利亚对普魯士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而在奥地利軍隊遭到几次失败以后，它們就公开同普魯士联合起来。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有英国——法国在商业上的竞争者，在軍事上和外交上支持奥地利人的有撒丁、荷兰和俄国。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一战争中两次出卖了它的盟国，同奥地利单独媾和 (1742 年和 1745 年)；1742 年，确认大部分西里西亚归普魯士管轄，而在战争結束以后，則确认整个西里西亚都归普魯士管轄。——第 468 頁。
- 470 見注 238。——第 468 頁。
- 471 指累根斯堡帝国議會——神圣羅馬帝国的由德意志各邦代表組成的最高机关——討論和批准由法俄两国强加的关于解决德国萊茵河地区領

- 土問題的決議(見注 238)一事。——第 468 頁。
- 472** 恩格斯指 1859 年 3 月 3 日(2 月 19 日)俄法兩國在巴黎簽訂對付奧地利的秘密條約。根據該條約規定,以法國和撒丁為一方同以奧地利為另一方一旦發生戰爭,俄國對法國應採取友好的中立態度。法國答應提出關於修改 1856 年結束克里木戰爭的巴黎和約中有關限制俄國黑海主權的條款的問題。可是,到後來,鑒於拿破侖第三不願履行自己的諾言,又由於在其他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因而就使兩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冷淡了。——第 470 頁。
- 473** 1848 年 4 月 10 日,住在英國的路易·波拿巴參加了破壞憲章派示威游行的活動,他加入了特別警察部隊即所謂特別警察的行列。——第 471 頁。
- 474** “民族原則”是第二帝國的當權派提出的,他們普遍地利用它來從思想上掩蓋侵略計劃和對外政策上的冒險。拿破侖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衛者”,利用被壓迫民族的民族利益進行投機,以便鞏固法國的霸權並擴大其疆域。“民族原則”與承認民族自決權毫無共同之處,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運動特別是小民族的運動變成互相競爭的大國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對波拿巴的“民族原則”的揭露,見卡·馬克思的抨擊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26—587 頁)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麼關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70—183 頁)。——第 471 頁。
- 475** 指呂內維爾和約所規定的法國疆域,該和約是法奧之間於 1801 年 2 月 9 日在第二次反法同盟軍隊失敗以後簽訂的。和約確認由於反對第一次和第二次同盟的戰爭結果而擴大的法國疆域,包括對萊茵河左岸、比利時和盧森堡的兼併;和約並且准許法國實際上統治 1795—1798 年建立的依附於它的巴達維亞、海爾維第、利古里亞和南阿爾卑斯等共和國。——第 471 頁。
- 476** 法國和撒丁(皮蒙特)對奧地利的戰爭是由拿破侖第三發動的,他企圖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幟下(在戰爭宣言中,拿破侖第三蠱惑性地答應把它“一直解放到亞得利亞海”),通過對外冒險來掠奪領土並鞏固法國波

- 拿巴制度。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在皮蒙特的薩瓦王朝的統治下实现意大利的統一。战争开始于1859年4月29日。在索尔費里諾发生决战(1859年6月24日),奥軍遭到失败并退到明乔河,以后,拿破侖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增长和不愿促使建立統一而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就于7月11日背着撒丁同奥地利在維拉弗兰卡城签订了初步和約。根据这一和約,威尼斯仍然归奥地利統治,伦巴第轉到了法国手里,后来法国又把它轉交給皮蒙特,以换取薩瓦和尼斯。維拉弗兰卡条約所規定的条件成了1859年11月10日在苏黎世签署的最后和約的基础。——第472頁。
- 477 1795年巴塞尔和約是普魯士在4月5日单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的,因而普魯士就在第一次反法同盟中出卖了自己的盟国。——第473頁。
- 478 普魯士外交大臣馮·施萊尼茨在1859年以此說明普魯士在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时期所执行的对外政策。按照当权派的官方解释,这一政策就在于:既不参与斗争的任何一方,也不宣布中立。——第473頁。
- 479 «Crédit Mobilier»,全名为«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銀行,1852年創辦。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867年,該銀行破产,1871年停业。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发表的許多文章中揭示了«Crédit Mobilier»的真正本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頁)。——第473頁。
- 480 萊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侖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潰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侖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軍事政治堡垒。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維尔騰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薩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們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屬。由于拿破侖軍队战敗,萊茵联邦在1813年瓦解。——第474頁。

- 481 在拿破侖法国于 1805 年 7 月击潰了奥地利以后,在宣布同德意志帝国断絕关系的德意志各邦組成了萊茵联邦以后,1806 年 8 月 6 日,早在这以前就接受了奥皇封号(帝号弗兰茨一世)的弗兰茨二世放弃了德意志帝国的王位,因而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国,或者德意志帝国便不复存在了。——第 477 頁。
- 482 指主要靠近法国边界的德意志联邦要塞;这些要塞的駐軍由联邦中比較大的邦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由奥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組成。——第 478 頁。
- 483 指 1848 年 11 月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失敗以后成立的施瓦尔岑堡公爵的反动政府,这次革命的开端是 1848 年 3 月 13 日的維也納人民起义。——第 478 頁。
- 484 根据奥皇弗兰茨-約瑟夫的倡議,1863 年 8 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各邦君主會議,討論旨在由奥地利实际上操纵霸权的德意志联邦的改革草案。普魯士国王威廉一世拒不参加會議;一些次等的邦也不完全支持奥地利,因而會議毫无結果。——第 479 頁。
- 485 “现实政策”一詞是用來說明俾斯麦政策的,那时的人认为他的政策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第 479 頁。
- 486 指弗里德里希二世同法国駐柏林的特派公使博沃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关于这次战争,見注 469)爆发前的談話。——第 479 頁。
- 487 1796 年 8 月 5 日,普魯士和法兰西共和国在柏林簽訂了秘密条約。根据該条約規定,普魯士国王为了換取許給的領土报酬,就同意法国保持由它的軍隊所占領的萊茵河左岸的領土,这些領土先前主要属于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宗教公国。在通过唯拿破侖之命是听的所謂帝国代表會議(見注 238)解决領土問題时,普魯士于 1803 年得到了世俗化了的閔斯德主教管区以及德国西部的其他一些領地作为报酬。——第 479 頁。
- 488 普魯士拒絕参加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王国)在 1805 年組成的第三次反拿破侖法国同盟,宣布自己中立;1805 年 11 月,它在波茨坦同俄国簽訂了一項条約,条約規定;一旦它在法国和第

三次同盟之間进行調停的尝试遭到拒絕，它就要出来反对拿破侖。可是1805年12月15日，普魯士同法国簽訂了一項条約，根据条約規定，它在萊茵河地区和其他地方作一些領土上的小让步，从而換得了汉諾威选帝侯国。在拿破侖战胜了第三次同盟，从而在德国西部和南部确立了霸权以后，普魯士终于被迫于1806年9月站在第四次同盟(英国、俄国、普魯士、瑞典)一边参加反拿破侖法国的战争；1806年10月14日，在两个同时进行的会战中，即在耶拿和奧埃爾施太特会战中，普魯士軍隊被消灭，普魯士邦也被彻底摧毁。——第479頁。

489 見注420。——第480頁。

490 后备軍是普魯士陸軍的一个組成部分。1813年在反对拿破侖軍隊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魯士后备軍，包括年齡較大的在常备軍及其預备队中服役期滿的应征人員。在平时，后备軍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訓。在战时，第一类后备軍(年齡从26岁到32岁的应征人員)用来补充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軍(年齡从32岁到39岁的应征人員)則用来担任警备勤务。——第481頁。

491 “文化斗争”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給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魯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的地主、資產階級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魯士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反对天主教斗争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还在受普魯士統治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工人脱离階級斗争。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增长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糾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481頁。

492 恩格斯对自由派的諷称，这些人主张把德国变成像瑞士那样一个划分为自治州的联邦国家。——第482頁。

493 切希市长之歌 是一首譏笑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諷刺性民歌，来源于施托尔科夫市前任市长亨·切希于1844年7月26日行刺未遂一事。

馮·德羅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 是一首針對天主教教士的諷刺性民歌；在民歌中，譏笑了似乎四十年代在特利爾出現的所謂“治病奇蹟”的組織者的一套把戲。——第 482 頁。

494 指 1848 年 11—12 月的普魯士政變和繼之而來的反動時期。1848 年 11 月 1 日，勃蘭登堡—曼托伊費爾反革命內閣取得了政權；1848 年 11 月 9 日，國王下詔把普魯士國民議會會議從柏林搬到一個偏僻小城勃蘭登堡去；繼續留在柏林開會的議會多數派，1848 年 11 月 15 日被弗蘭格爾將軍的軍隊驅散；政變的最後完成是 1848 年 12 月 5 日的解散議會，以及所謂欽定憲法的公布；根據憲法規定，實行兩院制，並且承認國王不僅有權取消議院決議，而且有權修改憲法本身的各別條文。可是，在該憲法中還保留了若干民主成果，特別是普選制。1849 年 4 月，弗里德里希-威廉解散了根據欽定憲法選出的議院，並於 1849 年 5 月 30 日頒布了新的選舉法，規定了以高額財產資格限制和居民各階層選派議員不相等為基礎的三級選舉制。在新的眾議院中奴顏婢膝的多數支持下，國王使議院通過了更加反動的憲法，從 1850 年 1 月 31 日起生效。在普魯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貴族議員組成的上院（“貴族院”）。憲法規定政府有權設立特別法庭來審理叛國案件。1850 年 12 月，曼托伊費爾內閣代替了勃蘭登堡—曼托伊費爾內閣，在前者執政時期，即一直到 1858 年 11 月為止，普魯士在政治上始終是反動透頂的。——第 483 頁。

495 由於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害了不治的精神病，他的弟弟威廉親王最初（1857 年）被任命為他的代理人，而從 1858 年 10 月起又被任命為攝政。攝政期一直繼續到 1861 年 1 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死的時候，這時，攝政就變成了國王，帝號為威廉一世。1858 年攝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費爾內閣，讓溫和的自由派執掌政權。資產階級報刊高呼這個方針是“新紀元”；可是，實際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為了加強普魯士君主政體和容克地主的障地的。“新紀元”實際上給 1862 年 9 月上台執政的俾斯麥實行獨裁作了準備。——第 483 頁。

496 1860 年 2 月，普魯士議會下院（眾議院）的資產階級多數派拒絕批准陸

軍大臣罗昂提出的軍隊改組計劃。但是政府不久設法从議院那里获准了“保持軍隊战斗准备”的撥款，这事实上意味着打算进行的改組开始实现。而到了1862年3月，当議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絕批准軍費，并要求有一个对議會負責的内閣时，政府解散了議會，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底，俾斯麦內閣組成。它在同年10月又解散了議會，并且着手实行軍事改革，不經過議会的批准就开支这笔款項。普魯士政府和議会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多数之間的这一所謂宪法冲突直到1866年才得到解决，在普魯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魯士資產階級就向俾斯麦投降了。——第484頁。

497 关于1848—1850年普魯士对丹麦的战争和1850年的动員，見注394。——第484頁。

498 根据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国、英国、法国、普魯士和瑞典同丹麦代表一道签署的关于保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議定书的規定，霍尔施坦公国仍然留在德意志联邦內，同时也归入丹麦；什列斯維希公国則归入丹麦王国，它保留若干特殊权利，但丹麦統治階級并不尊重这些权利。它們繼續企图使这两个公国完全听命于自己；1855年，頒布了一个适用于丹麦王国各部分的宪法，它也被用于这两个公国；只是由于德意志联邦議會施加压力，丹麦政府于1858年才同意霍尔施坦不受宪法約束，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該公国参与国家开支；但是什列斯維希仍然完全留在丹麦王國內。1863年11月13日，丹麦議會通过了新宪法，宣布什列斯維希完全并入丹麦。——第485頁。

499 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資產階級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資產階級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組織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全德，奥地利除外。在奥普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以后，联盟于1867年11月11日自己宣布解散。——第485頁。

500 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侖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一书。——第486頁。

- 501 1863年2月8日，在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根据俾斯麦的提議，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和普魯士政府代表阿尔文斯累本在彼得堡签署了一項协定，規定两国軍队对起义者采取协同行动，甚至規定軍队有权越过国境。早在协定签署以前，普魯士軍队就封鎖了边境，旨在不让起义者轉入普魯士境內。虽然协定沒有被批准，但是协定的簽訂已大大地便利了沙皇政府对波兰起义的鎮压。——第489頁。
- 502 恩格斯指在1848—1850年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奥地利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上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当时普魯士和德意志的其他一些邦都站在两公国一边（見注394）。奥地利同欧洲其他强国一道支持丹麦君主国，在它們的压力下，普魯士于1850年7月同丹麦簽訂了和約，此后，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軍队就被粉碎了。根据奥地利的提議，1850—1851年冬天，奥軍和普軍被派往霍尔施坦，目的是加速解除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軍队的武装。——第489頁。
- 503 在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死以后，奥地利和普魯士于1864年1月16日向丹麦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它把宣布什列斯維希完全归并丹麦的1863年宪法废除。丹麦拒絕接受最后通牒，于是奥地利和普魯士就开始采取軍事行动，到1864年7月，击潰了丹麦軍队。法国和俄国在整个战争期間都对奥地利和普魯士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按照1864年10月30日在維也納簽訂的和約的規定，两个公国的領土，其中包括住有德国居民的各个部分，被宣布为奥地利和普魯士共有，而在1866年的奥普战争以后，这些領土就完全归并于普魯士了。——第489頁。
- 504 根据俄国和丹麦代表签署的1851年6月5日（5月24日）华沙議定书以及1852年5月8日伦敦議定书（見注498）的規定，确定了丹麦王位的領地（包括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公国）不可分割的原則。——第491頁。
- 505 对墨西哥的远征是1862—1867年法国最初同英国和西班牙一起进行的武装干涉；它的目的是鎮压墨西哥革命并使墨西哥淪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企图占領墨西哥，利用它的領土作为自己站在

- 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一边干涉美国国内战争的跳板。虽然法军占领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并宣布成立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皇帝的“帝国”，但是由于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斗争，法国干涉者遭到了失败并被迫在1867年把军队撤出了墨西哥。法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对墨西哥的远征，使第二帝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第491页。
- 506 “活泼快乐的战争”（«ein frischer fröhlicher Krieg»）这一用语，最初是由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利奥于1853年6月在“城乡人民小报”（«Volksblatt für Stadt und Land»）第61号上使用的，在以后的年代中，军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也采用了这一用语。——第492页。
- 507 指俾斯麦对1866年普奥战争所作的外交准备。1866年3月初，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冯·德·哥尔茨同拿破仑第三谈判的结果，终于使法国皇帝声明：一旦普鲁士同奥地利进行战争，他将支持普鲁士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将支持它在统一德国北部各邦中起领导作用的要求，条件是要给法国以一定的报酬。同时，俾斯麦还在柏林同意大利果沃内将军就意大利和普鲁士共同进行反奥战争一事举行了谈判。在同果沃内会谈时，俾斯麦估计拿破仑第三会知道会谈的内容，就表示：如果法国不阻挠成立普意反奥同盟，他将不反对把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的德国领土转让给法国。同果沃内谈判于1866年4月8日结束，签署了一项普意之间关于攻守同盟的秘密条约。条约规定，一旦战胜了奥地利，就把威尼斯转让给意大利。——第492页。
- 508 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黑森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斯塔德以及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都站在奥地利一边；站在普鲁士一边的有：梅克伦堡、奥登堡和其他德国北部各邦，另外还有三个自由市。——第493页。
- 509 1866年春天，奥地利向联邦议会控诉普鲁士破坏关于共同治理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协定；俾斯麦拒绝服从议会根据奥地利的提议而对普鲁士宣战的决议。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普军取得了胜利，联邦

- 議会被迫从法兰克福迁往奥格斯堡，它于1866年8月24日在那里宣布停止活动。——第493頁。
- 510 “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刊登在1866年7月11日“普魯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第164号上。——第493頁。
- 511 普奥战争結束以后，1866年8月23日在布拉格签署了一项和約。
关于普魯士兼并三个王国和一个自由市，見注233。——第493頁。
- 512 1866年9月，普魯士众議院以230票对75票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一项法案，旨在解脫政府对宪法冲突时期未經立法手續批准的經費开支所負的責任(見注496)——即所謂豁免責任法。因此，冲突的結果是資產階級反对派彻底投降。——第495頁。
- 513 指奥普战争的决战，决战于1866年7月3日发生在捷克薩多瓦村附近的凱尼格列茨城(今名为赫腊德茨-克腊洛佛)。薩多瓦会战以奥軍遭到严重失敗告終。——第495頁。
- 514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資產階級的報紙，是自由貿易維護者(自由貿易論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創刊于曼彻斯特。——第497頁。
- 515 关税議会是关税同盟的領導机构，該同盟是在1866年战争和普魯士于1867年7月8日同德国南部各邦簽訂条約以后成立的；根据条約規定，建立了这一机构。議会由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議員和德国南部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維尔騰堡和黑森——专门选出的代表組成。它本来只应当研究商业和关税政策問題；俾斯麦却力图逐步扩大它的权限，把它扩展到其他政治問題上去，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南德代表的頑强反抗。——第497頁。
- 516 美因河是北德意志联邦和德国南部各邦間的分界綫。——第497頁。
- 517 卢森堡王朝的皇帝最初只占有一个小小的伯国——卢森堡，从1308年起至1437年止数度占据神圣羅馬帝国(德意志帝国)的帝位；同时，这

一王朝还占有捷克王位(1310—1437)和匈牙利王位(1387—1437)。
——第498頁。

518 根据1866年10月3日在維也納簽訂的对奥地利和約,把威尼斯归还站在普魯士一边参加普奥战争的意大利,但由于普魯士的反对,意大利所提出的把原属于奥地利的南提罗耳和的里雅斯特轉让給它的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滿足。——第499頁。

519 梅特涅的“地理概念”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用于意大利(“意大利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一个用語,他在1847年8月6日給駐巴黎大使阿波尼伯爵的一个紧急通知中使用了它,后来,他还把它应用于德国。——第499頁。

520 伦敦會議是奥地利、俄国、普魯士、法国、意大利、尼德兰和卢森堡的代表为討論卢森堡問題从1867年5月7日至11日在英国外交大臣主持下举行的。按照5月11日簽署的条約,卢森堡公国(公爵的封号像过去一样經常由尼德兰国王享有)被宣布为一个中立国,它的中立由締約国来保证;普魯士应立即从卢森堡要塞撤出自己的駐軍,而拿破侖第三应放弃把卢森堡并入法国的要求。——第500頁。

521 見注389。——第501頁。

522 在1870年8月6日的施皮歇恩(洛林)和維尔特(亚尔薩斯)会战中,普魯士軍隊击败了几个法国軍团。1870—1871年普法战争初期,普魯士在这兩場会战中得手,使它的司令部能实行进攻,在进攻的过程中,法国軍隊被驅散,后来又被包围和各个击破。

关于色当会战,見注282。——第502頁。

523 在获悉法国軍隊在色当被击潰一事以后,1870年9月4日巴黎出現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結果引起了第二帝国制度的崩潰和宣布共和国成立。可是,参加这个新組成的临时政府的,除了温和的共和派以外,还有君主派。这个以巴黎軍事总督特罗胥为首的政府(它的实际鼓舞者是原先不担任政府正式职务的奥尔良君主派首領——反动分子梯也尔),反映了法国資产階級和地主的投降情緒和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心

理,并走上了出賣民族和背叛性地勾結外敵的道路。——第 503 頁。

- 524 “民軍條例”是普魯士在 1813 年 4 月 21 日通過的一項法律,它規定了建立志願軍部隊(“自由射手”),他們不穿軍服,用游擊戰的方法在拿破侖軍隊的後方和翼側行動。一切不屬於軍隊的能作戰的男性居民都要應征加入民軍。

關於普魯士軍隊野蠻地對待法國的自由射手一事,見恩格斯的“戰爭短評”一組論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176—180、214—218 頁)。——第 504 頁。

- 525 恩格斯指德國軍隊同布爾巴基指揮下的法國東方軍團於 1871 年 1 月 15—17 日所進行的埃里庫爾(在伯爾福附近)會戰,東方軍團進入佛日山脈東部地區,以便在那兒對圍困巴黎的德國軍隊的主要交通綫進行側擊。東方軍團的進攻被德國人擊敗了,它不得不退却,在退却過程中,它被緊逼到瑞士邊界,被拘禁在瑞士境內。在實行這種退却期間,國防政府的代表法夫爾於 1871 年 1 月 28 日同俾斯麥簽署了關於停戰和巴黎投降的議定書。——第 504 頁。

- 526 指普魯士 1848 年三月事件中的下面一件事情:柏林 3 月 18 日人民起義勝利以後,起義者於 3 月 19 日早晨強迫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皇宮陽台,要他向陣亡的街壘戰士的屍體脫帽致敬。——第 505 頁。

- 527 關於停戰和巴黎投降的議定書在 1871 年 1 月 28 日簽訂以後,法國和普魯士之間的軍事行動就沒有再起。以梯也爾為首的法國投降派統治集團於 1871 年 2 月 26 日匆忙地按照俾斯麥規定的條件簽署了初步和約。1871 年 5 月 10 日在法蘭克福簽署了最後和約,確認由德國兼併亞爾薩斯和洛林東部。根據法蘭克福條約,法國支付五十億法郎賠款的條件更苛刻了,德軍佔領法國領土的期限延長了,——這是俾斯麥幫助凡爾賽政府鎮壓公社的代價。——第 506 頁。

- 528 根據結束了全歐三十年戰爭(1618—1648)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規定,雖然亞爾薩斯成了法國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斯特拉斯堡仍然留在德意志帝國版圖內。按照路易十四於 1681 年 9 月 30 日發布的敕令,法

国军队占领了属于亚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市。以菲尔施坦堡主教为首的斯特拉斯堡天主教派欢迎归并于法国，并促使对法国人采取不反抗行动。——第 506 頁。

529 “归并議會”是路易十四在 1679—1680 年建立的，其任务是从法律上和历史上來論证法国对邻国某些領土要求的合理性，此后即由法国军队进占这些領土。——第 506 頁。

530 見注 477。——第 506 頁。

531 指奥地利和法国于 1735 年 10 月 3 日在維也納簽署的、結束了所謂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的初步和約；在这場战争中，俄国和奥地利支持薩克森选帝侯（从 1734 年起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王位继承人，而法国則支持国王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根据和約的条件，路易十五放弃了让自己的岳父取得波兰王位的要求，并向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作了其他一系列让步，以便把洛林公国（在这以前統治該公国的洛林的弗兰茨·斯蒂凡得到托斯卡納作为补偿）換給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而該公国应于他逝世以后轉交給法兰西王室。初步和約的条件最后由 1738 年的維也納和約固定下来。——第 507 頁。

532 指由北意大利的要塞——維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所組成的极其坚固的筑垒陣地。关于作为奥地利在北意大利进行統治的堡垒的这个四边型要塞区的作用，見恩格斯的著作“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和“波河与萊茵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13—220、247—299 頁）。——第 510 頁。

533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第 285—294 頁）。——第 510 頁。

534 在改組德国武装力量法案的討論期間，俾斯麦在他的 1888 年 2 月 6 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說中，坚持有必要加强德意志帝国的軍事威力，实际上承认有可能产生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反德同盟，然后就百般贊揚亚历山大三世的对德政策，把这一政策同当时俄国报刊上进行的反德运动对

立起来。——第 510 頁。

- 535 1886—1887 年冬天，俾斯麦利用对法关系中的某些紧张局面和报刊上掀起的关于“战争威胁”的叫嚣，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大大扩充军队和批准今后七年军事预算的法案。大多数議員都拒絕通过俾斯麦所要求的七年预算，而只限于三年，于是帝国国会解散。在 1887 年 2 月 21 日的选举中，表示支持俾斯麦的各个党派（保守党、“自由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得到了多数票，它們在这一基础上联合成所謂“卡特尔”。新的帝国国会批准了俾斯麦所要求的预算。——第 513 頁。
- 536 恩格斯指 1871 年 1 月 18 日在凡尔赛宮宣布普魯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国皇帝一事。——第 513 頁。
- 537 指 1873 年 5 月在德国开始的經濟危机，在危机以前，工业曾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同时还出现了狂热的創業活动和大規模的投机活动。——第 515 頁。
- 538 进步党人 是 1861 年 6 月成立的普魯士資產階級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召开全德議會，建立对众議院負責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內閣。1866 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組織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 1871 年德国完成統一以后繼續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純粹是一紙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階級和仇視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魯士容克的統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資產階級、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 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第 516 頁。
- 539 指 1863 年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薩尔派）和 1869 年在爱森納赫举行了成立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工人階級的全德政治性組織，但它是受拉薩尔及其追隨者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影响的，他們力图把工人运动导向改良主义道路，他們反对罢工斗争和組織工会，支持俾斯麦实行的从上面統一德国的政策，并企图同他达成協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建立

的,是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该党曾加入第一国际。尽管它的綱領有一系列錯誤的論点,但整个說来它还是站在馬克思主义基地上的,它在統一德国問題和其他問題上还是实行革命无产階級路綫的,它揭露拉薩尔派首領的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德国工人有要求合并的愿望的影响下,同时由于拉薩尔派組織中的普通成員对自己首領的教条和策略感到失望,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成了一个統一的党,这个党在1890年以前一直叫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就克服了德国工人階級队伍中的分裂状态。可是,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統一党的綱領却包含着严重的錯誤和对拉薩尔派的让步,因而遭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銳批判。在哥达种下的思想上的妥协,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內机会主义分子进一步加强。——第 517 頁。

540 保守党是普魯士容克、軍閥、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侶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魯士国民議會中极右的君主专制集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滿好战的沙文主义和軍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主义的殘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人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派,他們耽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魯士“溶化”于德国。但是从1866年起,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 517 頁。

541 見注 231。——第 517 頁。

542 关于南德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維尔騰堡)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約,是在1870年11月簽訂的。条約規定对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作若干修改,使加入联邦的各邦享有比較大的独立性。

在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中,根据上述条約給予南德若干邦的特权得到了确认。特別是在巴伐利亚和維尔騰堡,还保留了烧酒和啤酒的特別稅以及管理邮电的特权;巴伐利亚除此以外还在管理自己軍队和管理铁路方面保留了某种独立性。——第 520 頁。

543 根据北德意志联邦宪法的規定,联邦會議由参加联邦的所有德国各邦

的政府所任命的代表組成。會議的职能是批准法律。——第 520 頁。

544 見注 494。——第 521 頁。

545 陪審員法庭是德意志帝國的最低級的法庭，1848 年革命以後在許多德意志邦內建立，自 1871 年以後則在整個德國建立。法庭當時由一個皇室法官和兩個代表（陪審員）組成，和革命前的陪審員不同，他們不僅確定被告的罪行，而且同法官一道規定懲罰的辦法；執行陪審員职能，要求一定的年齡條件、定居期限以及相當數量的財產。陪審員法庭受理較輕的罪案。——第 524 頁。

546 是指 1872 年普魯士的行政改革，按照這次改革，廢除了地主在農村中的傳統的世襲領地權力，並在地方上實行了某些自治：在各鄉鎮設立選舉產生的鄉鎮長、在縣長下面設立按等級選舉的縣議會，等等。改革的目的是鞏固國家機構和加強集權，以利于整個容克階級。同時，容克地主們親自或通過自己的傀儡佔據了大部分選舉產生的職位，實際上保持了他們在地方上的權力。——第 524 頁。

547 指英國的地方行政改革，改革法案於 1888 年 3 月由索耳斯貝里政府（1886—1892）提出，於同年 8 月由議會通過。根據這一改革，郡長的职能轉交給由選舉產生的管理徵稅和地方預算等等的郡參議會。凡享有議會選舉權的一切人以及年滿 30 歲的婦女，都可以參加郡參議會的選舉。保守黨政府企圖通過實行這一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來鞏固自己的地位，轉移廣大階層對用於軍隊、艦隊和侵略性對外政策的費用日增的注意。——第 525 頁。

548 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的一個極端反動的派別，它反對民族教會的獨立性，捍衛羅馬教皇干涉任何國家內部事務的權利。教皇至上派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影響的加強，表現在歐洲若干國家建立了天主教黨，表現在梵蒂岡宗教會議於 1870 年通過了教皇“永無謬誤”等等教條。——第 526 頁。

549 1870 年 9 月 20 日，意大利王國軍隊開進了在這以前處於教皇權力之下的羅馬。根據教皇國 10 月 2 日舉行的投票（在投票時，絕大多數居

- 民都贊成合并于意大利),意大利政府宣布把这一地区划归意大利王国版图。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国内的政治统一。教皇的世俗权力被废除了。1871年通过的“保障法”把教皇的国家主权仅限于梵蒂冈和拉特兰宫以及城外府邸的范围以内。针对上述一切,教皇把夺取罗马的策划者革除出教会,拒绝承认“保障法”,并宣布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教皇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延续了多年之久的冲突,一直到1929年才得到正式解决。——第526页。
- 550 指帝国国会中波兰人和亚尔萨斯人的議員小团体以及1866年以后在汉諾威形成的分立派,該派成員主张恢复以韦耳夫王朝为首的独立的汉諾威君主国,这个王朝在1866年汉諾威合并于普魯士以前一直占据那里的王位。——第527页。
- 55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162—189页。——第528页。
- 552 指恩格斯的小册子“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4年日内瓦版);这个小册子是由“劳动解放社”作为“現代社会主义丛书”的第2分册出版的。——第528页。
- 553 指俾斯麦于1876—1877年把保守派的某些新聞記者和政治活动家交付法庭审判,給他們定了一个在报刊上对他进行侮辱的罪名,因为他們曾揭露他参与交易所的投机和濫設企业的狂热。这件事反映了俾斯麦政府和从右边批評他的政策的保守派之間当时已經尖銳化了的磨擦。
反社会党人法——見注235。——第530页。
- 554 恩格斯借用“卡諾薩之行”一語暗諷俾斯麦在1878—1887年間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奧十三所作的巨大让步;这些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毫无效果,“文化斗争”完全取消。俾斯麦当他同天主教会冲突之初于1872年5月在帝国国会中曾声言:“我們决不到卡諾薩去”,但到七十年代末却需要天主教的中央党的支持(他以前的支柱——民族自由党已經失去影响),并向教皇献殷勤,把冲突时期頒布的反天主教的法律差不多全部废除,迫使一些反天主教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辞职。
“卡諾薩之行”一語出自如下事件:德皇亨利四世于1077年屈辱地

- 到卡諾薩城堡(意大利北部)去朝見教皇格雷哥里七世, 懇求教皇收回开除他的教籍的成命。——第 532 頁。
- 555 七年期限法(Septennate) (来自拉丁文 septem——七)是指 1874 年俾斯麦在他煽起的关于从法国方面来的“战争危险”的喧嚷声中, 通过帝国国会实施一项关于批准以后七年的軍事預算并在此期間把平时的常备軍扩充到 401 000 人的員額規定下来的法律。——第 532 頁。
- 556 这个片断是恩格斯 1888 年 9 月下半月在他从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归来所乘的“紐約号”輪船上写的。恩格斯同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以及他自己的朋友卡尔·肖萊馬一起,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从 8 月 17 日到 9 月 19 日), 在这段時間里, 他从紐約出发, 先到波士頓和附近的城市, 再到尼亚加拉瀑布和安大略湖, 并且順便到加拿大作了一次旅行。恩格斯本想写一点这次旅行的旅途特写, 描述一下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 像这个片断和其他殘稿所证明的。但是, 他的这个想法未能实现。这里发表的写在輪船公文用箋上的片断, 仅仅是想写的文章的开头。——第 534 頁。
- 557 这里发表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格·亚·洛帕廷給“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員瑪·尼·奧沙尼娜的信的片断, 記述了他同弗·恩格斯談話的內容, 不言而喻, 写信人自己的闡释, 是带有他的民粹派观点的痕迹的。但是, 根据記憶犹新的談話印象写下的恩格斯的許多思想, 看来洛帕廷是大致准确地传达出来了。信里写到的同恩格斯的会見, 是在 1883 年 9 月 19 日, 即在洛帕廷从沃洛果达省流放地逃到国外以后又过了几个月。由彼·拉·拉甫罗夫倡議并經恩格斯同意, 这个片断第一次发表在 1893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理論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一书中。——第 539 頁。
- 558 指 1881 年 3 月 10 日(1881 年 3 月 1 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之后)“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执行委员会在信中答应停止自己的恐怖活动, 条件是: 沙皇宣布对政治监禁犯普遍大赦, 同意根据普选制实行人民代議机关的普选, 并保证出版、言論、集会和提出竞选綱領的完全自由。执行委员会还声明, 它将服从将来的

人民會議的決定。——第 541 頁。

- 559 指馬克思由于法国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可能派的机会主义傾向的斗争中犯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性质的錯誤而說出的一句諷刺話。后来恩格斯在 1890 年 10 月 27 日給拉法格的信中重新提到这句话时指出，馬克思当时针对这些錯誤說：“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第 541 頁。
- 560 “1849 年的五月起义”一文的基础是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請求在 1885 年 11 月 14 日写的一封信，他請恩格斯写这封信是因为他正在为国际社会主义杰出代表传记丛书編写恩格斯传，恩格斯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文章作为恩格斯传第二部分于 1885 年 11 月 21 日在該报发表，发表时沒有署名。——第 542 頁。
- 561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在 1886 年 10 月間計劃写的，起因是当时出版了一本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門格爾的著作“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討”，該书企图证明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沒有独创性”，他的結論似乎是从英国李嘉图学派空想社会主义者（湯普遜等人）那里抄襲来的。恩格斯认为不能对門格爾的这些誹謗譏言，以及他对馬克思学說本身的实质的伪造置之不理，因此，決定在报刊上予以反击。但是，恩格斯考虑到，亲自出面反对門格爾，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人利用来替这个在资产阶级科学界也只属三流的人物吹嘘，所以他认为用“新时代”杂志編輯部文章的形式，或者用該杂志編輯卡·考茨基的名义发表书评的形式回击門格爾是恰当的。因此恩格斯要后者写反对門格爾的文章。他本人起初打算写文章的基本部分，但是疾病中断了他已經开始的工作，文章也就由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写成了。該文发表在 1887 年“新时代”杂志第 2 期上，沒有署名，后来在 1905 年出版的“新时代”杂志索引中指出了文章作者是恩格斯和考茨基。1904 年該文被譯成法文作为恩格斯的的文章发表在“社会主义运动”（«Mouvement socialiste»）杂志第 132 期上。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只发表了文章的开头，把它同文章的基本部分人为地分开了。由于不能可靠地判明文章的哪一部分是恩格斯写的，哪一部分是

考茨基写的(文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在本版中文章全文发表在“附录”部分。——第 545 頁。

562 引自卡·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7 頁)。——第 553 頁。

563 1831 年 3 月 7 日在“地球报”上以这个名称发表了巴·普·安凡丹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这些文章从 1830 年 11 月 28 日至 1831 年 6 月 18 日陸續刊載在“地球报”上,然后于 1831 年又在巴黎出版单行本,总标题是:“政治經济学和政治”(«Économie politique et politique»)。

“地球报”(«*Le Globe*»)是 1824—1832 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从 1831 年 1 月 18 日起成为圣西門学派的机关报。——第 556 頁。

564 指比·約·蒲魯东“經济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1846 年巴黎版第 1—2 卷(«*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I—II, Paris, 1846)一书。——第 556 頁。

565 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頁)。

1849 年 1 月蒲魯东企图根据他所發揮的“无息”貸款的空想原則建立“人民銀行”。蒲魯东打算通过这种銀行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消灭利息和实行无貨幣交换,从而用和平的办法来实现他的社会改革。这种銀行建起来后过了两个月就破产了。——第 556 頁。

566 見威·湯普遜“为人类謀取最大福祉的財富分配原則”。威廉·配尔准备的新版本。1850 年伦敦版(W.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A New Edition by William Pare. London, 1850); 本书的第一版于 1824 年发行。——第 559 頁。

- 567 見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賦稅原理”1817年伦敦版第90—115頁 (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1817, p. 90—115)。——第563頁。
- 568 指德国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布伦坦諾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進行的反對馬克思的敵視運動。布伦坦諾指責馬克思有意偽造格萊斯頓1863年4月16日的演說中的一句話。格萊斯頓的這句幾乎在1863年4月17日倫敦各家報紙(“泰晤士報”、“晨星報”、“每日電訊”等等)關於這次議會會議的所有報道中都引用了的話，在漢薩德出版的半官方議會議事錄中被刪掉了，因為議事錄中收入的全文均由演講者本人作了修改。這就給予布伦坦諾一個指責馬克思在科學上不老實的借口。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寫給“人民國家報”編輯部的信中对這一誹謗提出了回答(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0、118—127頁)。馬克思逝世後，在1883年11月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泰勒又重復了這一指責。關於馬克思偽造引文的說法，由愛琳娜·馬克思1884年2月和3月在寫給“今日”雜誌的信中，其後，由恩格斯1890年6月在“資本論”德文第四版序言(參看“資本論”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中，以及在1891年寫的一本小冊子“布伦坦諾 contra 馬克思。關於所謂捏造引文問題。事情的經過和文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154頁)中揭穿了。——第564頁。
- 569 馬克思的書的原文中這個不確切的地方，恩格斯在1892年出版的“哲學的貧困”德文第二版中已經更正了。恩格斯為德文第一版寫的序中引證的話在第二版中也作了相應的訂正(見本卷第209頁)，同時湯普遜的書的出版日期也訂正了。——第564頁。
- 570 見安·門格爾“十足勞動收入權”1886年斯圖加特版第III頁 (A. Menger. «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Stuttgart, 1886, S. III)。——第566頁。
- 571 恩格斯對英國北方社會主義聯盟綱領的修正，是他應英國工人社會主義者約·L·馬洪的請求寫成的。恩格斯把自己的修正附在他6月22

日給馬洪的信中，他在这封信中对这个綱領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工人階級的本能的原則宣言”，同时力求提高这个反映英国先进工人在英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嘗試的文件的理論水平。恩格斯的修正列入綱領的序言部分；它写在印有綱領本文的传单上。

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工人組織，它是在从1887年2月底延續到同年6月24日的矿工大罢工的中期即1887年4月30日在諾森伯兰(英国北部)成立的。創立这个組織的发起人都是工人——社会主义同盟盟員約·L·馬洪、宾宁、唐納德等。在1887年期間，联盟在諾森伯兰的工人中間，主要是在矿工中間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但是它未能把自己的最初成就巩固下来，并且很快就不再存在了。——第569頁。

572 这是恩格斯于1888年9月19日在美国的旅行結束时同“紐約人民报”代表的一次談話。恩格斯不愿意同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組織的許多代表会晤(他对这些組織持否定态度)，所以他是化名完成自己的旅行的，并且竭力避免同新聞界代表的任何接触。但是，“紐約人民报”的編輯約納斯获悉恩格斯留在紐約之后，就派第一国际过去的活动家泰·庫諾作为他的代表往訪恩格斯，結果就有了这一次的談話。談話是在該报发表的，談話全文預先沒有同恩格斯商量过。这篇看来恩格斯沒有異議的談話，后来在10月13日曾轉載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71頁。

573 这个思想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5—326頁)中談过的。——第572頁。

574 这篇抨击文的初稿是伯恩施坦根据恩格斯的倡議写成的，用以答复刊載在1889年3月16日“正义报”上的編輯部短評“德国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和巴黎国际代表大会”。抨击文的原文經恩格斯修改后，用英文在伦敦出了单行本，同时譯成德文用本报編輯伯恩施坦的名义載于“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抨击文在揭发法国可能派的陰謀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可能派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会主义領袖的支持下，曾企图把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权和这次代表

大会的领导权拿到自己的手里。

“正义报”（《Justice》）——从1884年1月起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周刊，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在1884—1925年用这个名字出版。——第573页。

575 指帝国法院刑事厅批准1886年8月4日夫赖堡萨克森法庭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批领导人（倍倍尔、奥艾尔、弗罗梅等）同副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有联系而犯了加入“秘密会社”罪所作的判决。被告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法庭是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5）作出判决的。在帝国法院批准判决以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带有党的机关报的比較正式的性质是适宜的，所以从1886年11月5日起，报纸就用“讲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这个副名出版了。这个决定得到恩格斯的赞同。——第573页。

576 “伦敦自由新闻”（《Londoner Freie Presse》）——社会主义者周刊，由德国流亡者出版。从1886年起用“伦敦工人报”（《Londoner Arbeiter-Zeitung》）的名称出版，而从1887年10月至1890年6月用本名出版。——第574页。

577 见注376。——第574页。

578 “工人辩护士报”（《Workmen's Advocate》）——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1885年在纽约创刊；1891年4月以前用本名出版。——第574页。

579 见注250。——第575页。

580 “人人权利报”（《Recht voor Allen》）——荷兰社会主义者报纸，斐·多·纽文胡斯于1879年创办。——第575页。

581 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提出工联的議員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

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貴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年，議會委员会被不列顛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577頁。

- 582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社会主义組織，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組織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識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領導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門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馬克思主义者（爱·馬克思-艾威林、愛·艾威林、湯·曼等人），与海德門的路綫相反，进行了爭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組成了独立的組織——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緒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繼續产生不滿机会主义領導的革命分子。

社会主义同盟——英国社会主义者組織，1884年12月由一批不滿社会民主联盟領導的机会主义路綫而退出来的社会主义者創建。同盟的組織者中有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厄內斯特·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們會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員中无政府主义分子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許多組織者，其中包括爱·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便瓦解了。——第577頁。

- 583 这里提到的議會委员会关于1888年伦敦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对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新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的适宜性表示怀疑。——第578頁。

584 机会主义派——見注268。——第584頁。

585 “工人党报”（*«Parti Ouvrier»*）——法国报纸，可能派的机关报，1888年3月在巴黎創刊。——第584頁。

586 这封信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根据恩格斯的提議写給英国“工人选民”报編輯部的，博尼埃当时在伦敦积极参加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向英国工人揭露可能

- 派在筹备代表大会方面的阴谋。从恩格斯 1889 年 5 月 7 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可以看出,这封信是恩格斯写的,而以博尼埃的名义发表。——第 586 页。
- 587 激进派——见注 271。——第 586 页。
- 588 这一呼吁书是在保·拉法格的积极参加下写成的,目的是向一切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报道各国社会主义者海牙代表会议(1889 年 2 月)关于即将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并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代表大会。1889 年 5 月 6 日保·拉法格把呼吁书全文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书,把它译成德文,并促成用英文和德文加以发表。该呼吁书的恩格斯的德文译本发表在 1889 年 5 月 11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李卜克内西的译本发表在 5 月 10 日“柏林人民报”上,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发表过,并且在 5 月 18 日“工人选民”报、5 月 25 日“公益”杂志上先后发表。本版中的呼吁书全文是根据恩格斯的德文译本译出的。——第 588 页。
- 589 这篇抨击性文章的初稿是伯恩斯坦根据恩格斯的倡议,针对社会民主联盟的机会主义领导继续进行着支持可能派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阻碍马克思派筹备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成功的运动而写的。抨击文曾由恩格斯校订并以英文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见本卷第 613—616 页)作为附录收入了单行本。本文有一段摘要译成德文刊载在 1889 年 6 月 1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两段英文摘要同时转载在同一天的“工人选民”报上。——第 591 页。
- 590 “无产阶级”(«*Proletariat*»)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可能派法国劳动社会主义者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从 1884 年 4 月 5 日至 1890 年 10 月 25 日在巴黎用这个名称出版。——第 604 页。
- 591 指 1889 年 4 月召开的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即既派代表参加马克思派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也派代表参加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第 605 页。

592 这个通知书是保·拉法格在法国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参加下写成的，并于1889年5月14日寄給恩格斯，恩格斯对通知书的文字做了一些修改。1889年6月通知书以传单的形式在巴黎用法文印出，在伦敦用英文印出，并且用德文发表在6月1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6月2日的“柏林人民报”上。此外，还用英文刊载在6月8日的“公益”杂志上，并作为6月初发行的小册子“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II. 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見本卷第591—612頁）的附录发表。通知书在最初几次发表的时候还缺少許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签名；随着贊成通知书的声明紛紛出現，签名的数目也增加了。在本卷，这一通知书是根据巴黎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后出版的代表大会材料和決議的正式法文版发表的。——第613頁。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83年5月—1889年12月)

1883

- 5—12月** 恩格斯认为，完成馬克思未完成的理論著作和出版他的遺著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繼續整理馬克思的遺稿，尤其是“資本論”的手稿，对其中的一些部分加以記述，选择馬克思的某些著作准备再版，整理馬克思的书信。
- 5月10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繼續进行活动，恩格斯写信給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奥·倍倍尔，強調指出必須同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同他們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指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不宜加速这一分裂。
- 5月底** 恩格斯在馬克思的遺稿中發現德国无产階級詩人格奥尔格·維尔特的一首詩“帮工之歌”，便写了一篇关于維尔特的傳記性文章。詩和文章一起以“格·維尔特的‘帮工之歌’”为題，发表在6月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6月—10月中** 恩格斯审阅“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校样，这一版的准备工作馬克思沒有做完。

- 6月上半月** 为了使“資本論”第一卷英文本早日出版，恩格斯同伦敦基根出版公司商談；他打算让他的朋友、前第一国际会员、英国法学家賽·穆尔担任本卷的翻譯工作。
- 6月12日—8月27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一部分人仍然受到拉薩尔的关于除了无产階級以外一切階級都是反动的这一教条的影响，恩格斯多次写信給該党领导人，闡明关于在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中无产階級的同盟軍問題和无产階級政党的策略問題；他还建議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統治階級不同派別之間的矛盾；他指出，德国最近的任务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国，这种資產階級共和国只能是走向无产階級专政胜利的短暫的过渡阶段。
- 6月下半月** 恩格斯审阅由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帕·馬尔提涅蒂翻譯的他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意大利文譯文，并对譯文质量給以好評；这本小册子于7月在貝內万托出版。
- 6月28日**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三版写序言；“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三版于1883年在苏黎世出版。
- 8月** 恩格斯关于早期基督教史的一篇文章“启示录”在伦敦社会主义派杂志“进步”上发表。
- 8月中—10月初** 恩格斯閱讀法国社会主义者加·杰維尔写的“資本論”第一卷淺說的手稿；他得出結論說，虽然作者对理論原理的闡述還不錯，但是对历史内容和經濟事实的叙述却应当受到严厉的批評；他指出，这一部分写得草率、馬虎，其中有許多东西被簡單化了，甚至被歪曲了，它不能使人正确了解馬克思的这一著作。
- 8月17日—9月14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英国南部海濱)休养。
- 8月底** 恩格斯着手审訂“資本論”第一卷英譯文的头几章；他一面做其他工作，一面繼續审訂英譯文約达三年之久。

- 8月30日** 恩格斯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诉倍倍尔，同时指出亨·迈·海德門领导的民主联盟声明它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論这一事实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他还指出，这个組織同仍然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的群众性工人运动没有联系。恩格斯强调指出，英国在工业上和貿易上的垄断地位是这一影响的經濟基础，这种垄断地位使资产阶级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收买工人阶级的某一特定部分，因此英国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运动很可能只有在摧毁这种垄断地位后才能产生。
- 9月下半月** 恩格斯开始准备出版未經馬克思审訂的“資本論”第二卷的手稿；在几乎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这一工作；他核对手稿中各种不同的方案，确定全卷的结构，根据馬克思的最后研究成果写出定稿，以及对全文进行总校訂。
- 9月19日和23日** 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格·亚·洛帕廷拜訪恩格斯；洛帕廷在他給俄国女革命家瑪·尼·奥沙尼娜的信中說，恩格斯在同他談話时表示相信，新的社会改造的首倡权理所当然地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酝酿成熟的俄国。
- 10月—12月17日** 恩格斯患病。
- 約10月** 恩格斯认为，吸引德国农业工人和劳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准备把他的著作“馬尔克”印成新的普及本，这一著作以“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为題，于11月在苏黎世印成单行本出版。
- 10月中** 恩格斯接到德国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弗·列斯納的来信，要求給他寄去几本“資本論”第一卷，以便在伦敦的德国工人中間传播。
- 約10月底—11月初** 恩格斯收到俄国社会主义者維·伊·查苏利奇的来

- 信，信中告訴他在日內瓦建立了一个俄国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恩格斯同时还收到了这个組織的第一个綱領性文件——关于出版“現代社会主义丛书”的传单。
- 11月7日 恩格斯为“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写序言。
- 11月13日 恩格斯写信給查苏利奇，指出俄国政治局勢紧张，并預料革命危机在那里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 1883年12月—
1884年10月 恩格斯一面做其他工作，一面审訂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貧困”的最早的德文譯文，并为这本书写注释和序言。
- 1883年底 恩格斯把10月間出版的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德文第三版寄給俄国学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馬·馬·柯瓦列夫斯基。

1884

- 1月—8月初 恩格斯繼續密切注意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同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爱·艾威林、厄·貝·巴克斯和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保持經常接触，贊成他們反对民主联盟領袖海德門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綫的斗争，他认为海德門是不择手段的钻营家和隱蔽的沙文主义者；他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訴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同时強調指出，客观情况愈来愈有利于在英国工人中間进行社会主义的鼓动工作，并指出，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同工人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
- 1—3月 恩格斯繼續整理馬克思的遺稿和藏书。
- 1月上半月 恩格斯讀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并給以高度評价。

- 1月28日 恩格斯通知波兰社会主义者路·克尔日維茨基，表示同意出版“資本論”第一卷波兰文譯本。
- 1月28日—3月7日 恩格斯查看了馬克思收藏的俄文书籍，决定将其中很大一部分轉贈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以建立图书馆；为此他和当时在巴黎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彼·拉·拉甫罗夫通信，并于2月底把这些书寄給了拉甫罗夫。
- 2—3月 恩格斯仔細研究馬克思在1861—1863年写的、作为“資本論”各卷第一个系統草稿的經济学手稿；这些以“剩余价值理論”为題的手稿，大部分都是批判性的經济学說史，是馬克思打算在“資本論”第四卷中叙述的。
- 2月 恩格斯断然拒絕了德国流亡者农涅頑固的企图，他要恩格斯支持建立一个有恩格斯不大熟悉或者根本不熟悉的人組成的国际社会主义組織的計劃。后来农涅被揭露是德国政府駐巴黎的警探。
- 2月上半月 恩格斯研究馬克思在1881—1882年所做的美国著名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这个摘要是恩格斯在整理馬克思的遺稿时发现的。鉴于馬克思想就摩尔根这本书的出版发表意見的意图未能实现，恩格斯决定写一部著作，根据馬克思在这个摘要中提出的意見，同时也利用摩尔根的实际材料和某些結論，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場出发对原始社会以及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历史做一个扼要的概述。
- 2月初 “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出版。
- 2月中—3月初 恩格斯写“馬克思和‘新萊茵报’”一文，文中揭示了馬克思和他所领导的无产階級革命家在1848—1849年資产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策略；文章发表在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2月14日和3月7日 恩格斯繼續密切注意德国工人階級在实行反社会党人

非常法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斗争，他写信给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约·菲·貝克尔和弗·阿·左尔格，对这一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满意，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革命思想得到愈来愈广泛的传播，而无产阶级群众也取得丰富的革命经验。

2月下半月—3月初 由于准备出版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法文第二版，恩格斯把1865年发表的馬克思“論蒲魯东(給約·巴·施韦泽的信)”一文譯成法文；这篇經法国工人党的領袖之一保·拉法格校訂过的譯文在恩格斯逝世后发表在“哲学的贫困”1896年法文版上。

2月20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左尔格的来信，信中有关于美国工人状况的若干材料，也提到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约·狄慈根即将迁居美国的事情。

2月底—3月初 恩格斯閱讀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他确信摩尔根根据自己对北美印第安人和許多古代民族的社会制度的研究自发地达到了唯物史观，他在摩尔根的著作中找到了新的事实根据，可用以证实馬克思和他自己对原始社会历史的观点。

恩格斯把馬克思藏书中的法文书籍寄給在巴黎的保·拉法格和他的妻子——馬克思的女儿劳拉。

3月 恩格斯同汉堡出版者奥·迈斯納商談关于出版“資本論”第二卷的事情。

3月5日左右 恩格斯应維也納大学讲师 G. 格罗斯的請求，把馬克思生平的某些事迹告訴他，供編写“德国人名大辞典”中的馬克思传略之用。

3月6日 恩格斯写信給查苏利奇，对俄国对社会主义理論的兴趣日益浓厚一事表示满意，欢迎“劳动解放社”用俄文出版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想法，答应把他为

该书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以及别的一些材料寄去。同时，恩格斯还把他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发现的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副本寄给了她，这封信写于1877年，但是没有寄出。马克思的这封信由查苏利奇译出后于1886年发表在秘密杂志“民意导报”上。

3月7日

恩格斯把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诉左尔格，指出以茹·盖得和拉法格为首的法国工人党正在外省积极活动，并在巴黎进行着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

3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爱·伯恩施坦，批评该报3月20日社论中对“民主”这一概念所做的错误的、抹杀问题的阶级实质的解释；他指出，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彻底的形式，但同时这种共和国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也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3月底—5月26日

恩格斯写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书中对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对抗性阶级和阶级统治的产生做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了家庭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更替对生产关系的发展的从属性，揭露了阶级社会中家庭所固有的矛盾，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本性以及它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描绘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利用了马克思所做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而且还吸收了大量其他材料。

4月2日和15日之间

恩格斯收到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寄来的关于在鲁贝举行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详细报道，他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法国工人运动的重大成就。

4月11日

恩格斯在获悉他的著作“反杜林论”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在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通知“社会民

主党人报”編輯說，他決定準備再版這一著作。

- 5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法國工人黨的活動；他多次寫信給拉法格，就巴黎市鎮選舉結果向該黨領導人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他們對待從該黨脫離出去的可能派機會主義集團的策略的意見，並建議他們在選舉中提出自己的候選人。
- 5月初** 恩格斯讀拉法格關於唯物史觀和杰維爾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演講稿，他們為了宣傳馬克思主義，曾經在巴黎向工人聽眾做了這些演講，恩格斯對這兩篇演講稿給以好評。
- 5月22日** 恩格斯寫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的前八章，並把手稿寄往蘇黎世出版；在隨手稿寄去的附信中，他強調指出，在德國不可能公开发表這一著作，因為這一著作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做了激烈的批判，並做出了這個社會必然要滅亡的結論。
- 5月23日以前** 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之一保·辛格爾拜訪了恩格斯；恩格斯在同他談話時建議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將於10月舉行的國會選舉中採取靈活的策略，不要拒絕同其他反對黨達成臨時協議，如果這樣做不要求做原則性的讓步並有助於增加社會民主黨議員人數的話。
- 5月26日** 恩格斯寫完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
- 5月29日—6月4日** 恩格斯去海斯丁斯（英國南部海濱）德國民主派政論家、1849年巴登起義的積極參加者西·波克罕家中作客。
- 6月** 恩格斯準備重新出版馬克思的著作“僱傭勞動與資本”，閱讀這一著作的本文，寫了一篇簡短的前言。小冊子於10月間在蘇黎世出版。
- 6月5—6日** 由於威·布洛斯、布·蓋澤爾等機會主義者繼續在德

国社会民主党内，特别是在国会党团内加紧进行活动，恩格斯在給倍倍尔和該党其他领导人的信中要求对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調和的斗争，首先对他們損害和攻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反击。恩格斯指出，归根到底同机会主义者的彻底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建議該党领导尽可能推迟分裂的发生，以争取逐步孤立机会主义者和把他們开除出党。

- 6月21日和26日之間** 恩格斯讀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考茨基的批評文章“洛貝尔图斯的‘資本’”的手稿，并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他，建議他特別要強調指出普魯士經濟学家、資產階級化了的容克地主的思想家卡·洛貝尔图斯的經濟学观点同法国小資產階級社会学家比·約·蒲魯东的观点的相似之处。
- 6月26日** 恩格斯写信給俄国流亡者叶·帕普利茨，信中对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尼·亞·杜勃罗留波夫和俄罗斯文学中的整个历史的和批判的学派給予高度的評价，指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按其科学水平大大超过了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的著作。
- 7月16日** 俄国民粹派革命家謝·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欽斯基拜訪了恩格斯。
- 7月底—10月3日** 恩格斯审閱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校样。
- 8月1日和11日之間**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請求閱讀刚刚在巴黎出版的法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勒卢阿-博利約的“集体主义，对新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考察”一书，在这本书中博利約企图“駁倒”馬克思的經濟学說；恩格斯也閱讀了拉法格批判該书的文章的手稿，并把自己对这篇文章的意見寄給他。这篇文章在拉法格根据恩格斯的意見作了修改

以后載于 1884 年“經濟学家杂志”(«Journal des économistes»)上。

- 8月初** 恩格斯收到約·菲·貝克尔的来信, 信中告訴他瑞士工人运动的状况和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的影响縮小的情形。
- 8月5日左右—9月1日** 恩格斯在沃信(英国南部海濱)休养。
- 8月13日和20日之間** 恩格斯答应設在日内瓦的波兰流亡者社会民主派团体“階級斗争”的代表瑪丽亚·楊科夫斯卡婭-門德尔森(S. 列奧諾維奇)的請求, 同意她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譯成波兰文。
- 9月** 恩格斯閱讀了几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杂志“新世界”(«Die Neue Welt»), 并指出了这个杂志上发表的布·盖泽尔和威·布洛斯的几篇关于哲学和历史問題的文章的肤浅庸俗性质。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刊物“新时代”上登載了一篇編輯部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本新书”, 这篇文章是为正在印刷中的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写的; 文章中摘引了这本书的序言的某些段落。
- 9月上半月** 恩格斯讀美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劳·格朗隆德的“合作国家”一书, 并对該书做了尖銳的批評。
- 9月中** 恩格斯讀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卡·施拉姆的“考茨基和洛貝尔图斯”一文的手稿, 施拉姆在这篇文章中企图为普魯士国家“社会使命”的預言家洛貝尔图斯辯护, 反駁馬克思主义者对洛貝尔图斯的批評; 恩格斯同时也讀到了考茨基答施拉姆的文章的手稿, 恩格斯对考茨基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 极力建議他对施拉姆的文章做出更尖銳有力的回答。

-
- 10月** 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日益临近，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同该党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保持经常联系；他在給他們的信中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有很大的意义，并且指出，在已经形成的条件下，机会主义者必然会钻进未来的国会党团，因此将不得不同他們进行坚决的斗争。
- 10月2日** 为了进行国会选举的竞选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片断，这些片断说明，无产阶级应当利用普选制以利于开展革命斗争。
- 10月3日左右** 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苏黎世出版。
- 10月11—14日** 恩格斯把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别寄給倍倍尔、約·菲·貝克尔、拉甫罗夫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
- 10月15日** 恩格斯写信給約·菲·貝克尔，高度评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演说家倍倍尔的活动。
- 10月23日** 恩格斯写完卡·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尖锐地批判了洛貝尔图斯的庸俗空想主义的观点，并且駁斥了这样一种无稽之谈，即洛貝尔图斯在馬克思之前已经做出了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发现。这篇序言以“馬克思和洛貝尔图斯”为题发表在1885年1月“新时代”杂志上，接着又載于1885年1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 10月28—29日**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刚举行完的帝国国会选

- 举中获得的成功告诉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活动家；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表示相信，这件事将推动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 10月30日左右—12月30日** 恩格斯就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译成意大利文的事情同马尔提涅蒂通信，后者告诉他，在意大利出版这本书的事情已达成协议。
- 11月8—18日** 恩格斯继续分析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结果，他写信给倍倍尔以及社会民主党其他活动家，认为该党在选举中所获得的成就证明，虽然有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但是该党由于运用革命策略而得以大大巩固了自己在工人中间的阵地并赢得了一系列新的选区；恩格斯建议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帝国国会的讲坛上揭露政府和统治阶级的行为，经常提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案；由于在新选出的国会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分子，他警告倍倍尔要提防向统治阶级作任何原则性让步的危险。
- 11月12日** 恩格斯开始进行“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最终审订工作，这一篇的内容是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 11月底—12月** 恩格斯积极支持社会民主联盟内的革命分子反对该联盟以海德门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的斗争，他为这件事情不止一次地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巴克斯、英国社会主义者、诗人威·莫利斯、工人社会主义者约·马洪等人会晤；他赞同这个联盟中以艾威林、巴克斯、莫利斯等人为首的大多数盟员于12月底退出该联盟以抗议海德门及其支持者的政策并建立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的举动。
- 12月11—30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决定不反对政府关于给予轮船公司以国家津贴的法案，恩格斯同辛格尔谈话，写信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尖

銳地斥責了這一立場，認為這是对德國統治階級的殖民政策的實際支持。恩格斯建議國會黨團採取如下策略：向政府提出一些它決不會接受的要求，作為投票贊成上述法案的條件，這些要求如果被拒絕，就會暴露政府政策的反人民的實質；恩格斯認為，這些要求之一就是提出一項關於把國有農莊出租給農業工人合作社并由國家給予財政幫助的法案。恩格斯解釋說，以法案形式提出這項要求對於把農業工人和小農吸引到社會民主黨方面來會有巨大的宣傳意義。

1884年底

恩格斯計劃重新出版自己的“德國農民戰爭”一書并為此進行了工作。在新版中他本想表明，十六世紀的農民戰爭是德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的最高峰，是德國歷史上的轉折點；他草擬了準備為該書新寫的一篇導言的綱要，并已動筆寫這篇導言，但未完成。別的刻不容緩的事情迫使恩格斯停止了這項工作。

1885

1月—2月4日

恩格斯審訂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部分英譯文，它是由美國社會主義者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為了在美國出版該書而譯成英文的。

1月

恩格斯準備出版他的“反杜林論”一書的德文第二版。

1月25日

恩格斯寫“帝俄高級炸藥顧問”一文，文中揭露了沙皇政府力圖使英國統治集團引渡俄國政治流亡者的陰謀；文章發表在1月29日“社會民主黨人報”上。他在給保·拉法格的信中也談到了這個問題；由蓋得撰寫的法國社會主義報紙“人民呼聲報”1月31日的社論摘引了這封信的某些段落。

2月—6月初

恩格斯審閱“資本論”第二卷的校樣。

- 2月4日** 恩格斯写信給威·李卜克內西，批評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分子采取調和态度。
- 2月中** 恩格斯由于打算为他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美国版写序言，写了“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文中說明了四十年来英国經濟和无产階級状况的变化。文章发表在三月份英国社会主义杂志“公益”第2期上，并由作者譯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6期上。
- 2月11日** 恩格斯答应“資本論”第一卷俄譯者之一、民粹派經濟学家尼·弗·丹尼尔逊的要求，同意把“資本論”第二卷德文版的校样寄給他翻譯，以便加速出版“資本論”第二卷的俄文版。
- 2月23日** 恩格斯完成了“資本論”第二卷的最后部分手稿的整理工作，并把它寄給出版社。
- 2月底** 恩格斯开始整理“資本論”第三卷手稿准备付印。这一工作进行了一年左右。在此期間，恩格斯辨认手稿，根据保存下来的馬克思的提示确定了本卷的綱目和結構，把材料重新做了相应的安排，补撰某些只有草稿的篇章，写出馬克思拟写而未写的某些部分，而且还根据自己对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資本主义經濟中的某些新現象的研究做了一系列的补充；他对本卷的文字做了大量修飾和修改，写了序言和跋，对最后的定稿做了总校訂。
- 3月初**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C. 法伦霍耳茨的一封信，写信人企图歪曲社会民主联盟发生分裂的真正原因并維護海德門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綫，恩格斯建議艾威林答复这封信，并帮助他起草答复，答复发表在3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上。

- 4—6月** 恩格斯审訂馬尔提涅蒂翻譯的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意大利文譯文。
- 恩格斯憤怒地注視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者的企图。这些机会主义者因为在关于給予輪船公司补助金問題上的立場受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批評而提出抗議，企图使这个机关报的編輯部受他們支配。恩格斯在給德国社会民主党領導人的信中，以及同他們当中某些人的个别談話中坚决主张編輯部对国会党团保持独立，以保证能够进一步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并执行彻底的革命路綫。
- 4月** 恩格斯讀查苏利奇寄給他的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劳动解放社”領導人格·瓦·普列汉諾夫的“我們的意見分歧”一书的俄文原著。
- 4月23日** 恩格斯写信給查苏利奇，对俄国出現馬克思理論的拥护者一事深表滿意，认为这个事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具有伟大的意义；同时他还指出，俄国革命危机的因素正在增长，真正的人民革命必然来临。
- 5—11月** 恩格斯审閱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論”德文第二版的校样。
- 5月5日** 恩格斯写完“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使完成日期赶上馬克思誕辰；在这篇序言中他戳穿了企图誣蔑馬克思剽窃洛貝尔图斯的德国資产階級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誹謗，同时还证明洛貝尔图斯的观点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 5月15日** 恩格斯写信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建議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捍卫馬克思主义理論，不許机会主义者歪曲和攻击上面，放在維護党在一切实际問題上的彻底革命的路綫上面。

- 5月底—6月** 恩格斯审阅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校样；該版于1885年出版，恩格斯专门为该版写了序言。
- 6月13日左右** 恩格斯认为，正确阐明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問題并且揭穿把德国古典哲学同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企图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此他答应給“新时代”編輯部写一篇关于路·費尔巴哈哲学的文章；后来他写了“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这一著作，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 6月16日** 恩格斯通知苏黎世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的领导人海·施留特尔，表示同意以单行本分别出版馬克思的有关“新萊茵报”編輯案件、1849年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案件以及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科伦案件的著作和其他有关材料，并答应为这些小册子写序言。
- 7月—9月中** 恩格斯审訂由法国社会主义者爱·福尔坦翻譯的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法譯文，他还同福尔坦通信，商談关于在法国社会主义报纸“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这一譯文的可能性；直到1891年这个譯文才在該报上发表并印成单行本出版。
- 7月1日** 恩格斯为小册子“卡尔·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写序言，这一小册子收集了馬克思以及1849年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案件中其他被告的发言；恩格斯的序言全文发表在10月初于苏黎世出版的該书上，同时还摘要发表在10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 7月初(不迟于10日)** “資本論”第二卷出版。
- 7月下半月** 恩格斯結束了对“資本論”第三卷手稿的辨認。
- 8月14日—9月14日** 恩格斯在泽稷島休养，审阅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論”第

二版的校样。

- 8月21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丹尼尔逊关于“資本論”第二卷已全部譯成俄文的通知,后者还告訴他,出于书报检查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对他的序言做某些删节。
- 8月25日** 恩格斯根据丹尼尔逊的建議,写信給俄国民粹派合法杂志“北方通报”編輯部,建議它发表馬克思給“祖国紀事”杂志編輯部的信。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发表在另一家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
- 9月23日** 恩格斯写完他的著作“反杜林論”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強調指出必須在自然科学中运用辯证法,并指出,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证明必須这样做。
- 10月** 恩格斯写“不應該这样翻譯馬克思的著作”一文,文中尖銳批評了在1885年10月份的英国社会主义杂志“今日”上发表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的部分譯文,它是由海德門翻譯的,用的笔名是約翰·布罗德豪斯;恩格斯的文章发表在11月“公益”杂志上。
- 10月8日** 恩格斯写完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概要,这篇概要作为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三版的导言而写的。概要以“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为題发表在11月12、19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載于10月間在苏黎世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三版中。
- 10月8日和12日** 恩格斯分別写信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和拉法格,分析了法国在10月4日众議院初选后的政治形勢。在初选中执政的温和共和党遭到了巨大的失敗。恩格斯指出,选举結果有可能使激进党执政,这将为社会主义者的活动造成有利的形勢。第一封信的片断发表在10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論中(未指明作者),第二

- 封信的一部分以“当前的形势”为題发表在 10 月 17 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 10月10日和11月24日之間** 恩格斯写“关于普魯士农民的历史”一文,对从中世紀起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止普魯士农民的状况做了簡要的历史概述。这篇文章发表在根据恩格斯的倡議再版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威·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中,作为該书导言的第二部分。这本小册子于 1886 年 4 月在苏黎世出版。
- 10月中** 由于由劳拉·拉法格譯成法文的“共产党宣言”从 8 月份开始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恩格斯給她写了几封信,把自己对譯文质量的一些意見告訴她,并建議以后做某些修改。
- 10月下半月—12月** 由于塞尔維亚和保加利亚之間的战争以及欧洲列强在保加利亚問題上矛盾的增长引起了欧洲国际局势的尖銳化,恩格斯研究了俄国的經濟和財政状况,并得出結論說,俾斯麦帮助沙皇政府从德国銀行家那里获得貸款,就是对巴尔干半島軍事冲突的爆发起挑撥作用,同时也是力图支持沙皇政府同革命运动作斗争。他把关于这个問題的某些材料寄給了李卜克內西,后者在国会发表演說时利用了这些材料。
- 10月21日** 恩格斯写信給“社会主义者报”編輯部,对該报 10 月 17 日以“当前的形势”为題发表的恩格斯給拉法格的信的片断中所闡述的某些論点做了明确的解释。这封信以“致‘社会主义者报’編輯委员会”为題发表在 10 月 31 日該报上。
- 10月28日** 恩格斯写信給倍倍尔,分析了英国的經濟状况和工人运动的状况,指出联合了熟练工人的旧工联实质上起着反动的作用;同时他尖銳地批評了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宗派主义立場和脱离工人群众。在談到法国的状

- 况时,恩格斯指出,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理論上还不够成熟;他表示相信,随着资产阶级政党日益暴露出其不可信賴,法国工人将加入社会主义运动。
- 11月—12月初** 恩格斯讀德国资产阶级政論家格·阿德勒的“德国第一次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該书伪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并歪曲了馬克思的活动;恩格斯在书的頁边上写下了批評意見,并就考茨基写书評批判該书一事向考茨基做了一系列指示。根据恩格斯的这些指示写成的书評发表在1886年2月“新时代”杂志上。
- 11月14日**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要求,告訴他关于德国西部和南部1849年五月起义的一些詳情,当时拉法格正在准备为“社会主义者报”撰写恩格斯传略;根据这些材料写成的文章,作为恩格斯传的第二篇,以“1849年的五月起义”为題,发表在11月21日“社会主义者报”上,文章沒有署名。
- 11月13日** 恩格斯写信給丹尼尔逊,感謝他寄来了馬克思书信的摘录,并告訴他打算在以后出版馬克思的书信选集。
- 11月17日** 恩格斯写信給倍倍尔,分析了欧洲国际形势,指出有爆发欧洲战争的危險;他在強調社会主义者必須反对統治阶级的軍国主义計劃时指出,如果統治阶级终于发动了这样的战争,那末,战争将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潰。
- 11月26日** 恩格斯写信給德国女作家敏·考茨基,指出社会主义文学在现实主义地和真实地描写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关系时,应当通过这种描写揭露这些关系的真正本质,不仅要表明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而且要向人們灌輸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 12月2日左右**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一书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

12月7日

恩格斯写信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告訴他海德門曾秘密地从保守党那里領取經費来从事十一月議會选举的竞选活动，这一事实已經众所周知并引起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地方組織領導人的憤慨；恩格斯強調指出，海德門的这种行爲是不能容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在該报 12 月 17 日发表的一篇短評中利用了恩格斯的信和他寄去的有关这个問題的材料。恩格斯在 12 月 17 日給拉法格的信中也把这些情况告訴了他。

1886

1月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关于俄国經濟状况的札記。

恩格斯应李卜克內西的請求，对李卜克內西的政論活动和在帝国国会上的发言提出了一些意見，指出必須繼續对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

1月7日和2月25日之間

恩格斯审訂准备在美国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的英譯文，并为这一版写了跋，概括地論述了英美两国无产階級的状况；这篇跋作为附录收入該书中。在附录中还插进了恩格斯的“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該书于1887年5月在紐約出版。

不迟于1月20日

恩格斯讀机会主义者施拉姆的小册子“洛貝尔图斯、馬克思、拉薩尔”，并把自己对这本小册子的批評意見告訴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1月21日和28日，2月5日和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一組反对施拉姆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家以及洛貝尔图斯和拉薩尔的辯護士的編輯部文章“道德的批評家和他的批評道德”中引用了恩格斯的意見。

1月20—23日

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再次強調指出，把德国劳动农民作为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具有

巨大意义；他指出，在保持生产资料 and 土地国有制的条件下建立小农和农业工人合作社的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实现，这样的要求应当是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必经阶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劝倍倍尔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赴美宣传旅行；恩格斯把这次旅行看做是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手段之一。

1月底

恩格斯收到穆尔和艾威林寄来的由他们两人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的全部手稿。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刚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版。

2月4日

恩格斯写信给荷兰社会主义者斐·多·纽文胡斯，对他的“我国是如何管理的”一书给以好评；与此同时，他指出，荷兰历史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它没有发达的官僚主义管理机器；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向纽文胡斯做了某些解释，以供“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译成荷兰文之用。

2月8日和15日之间

由于2月8日伦敦失业工人在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下举行群众大会时有一批游民进行挑衅活动，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倍倍尔等人，尖锐批评了该联盟的领导，特别是海德门的行动，海德门实际上鼓励了这些游民。

2月中

恩格斯指出，以德卡兹维尔矿工的罢工为标志的法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具有巨大意义，同时他对三个法国工人议员，即艾·巴斯利、泽·卡梅利纳和昂·布瓦埃的行动表示敬意，他们坚决捍卫罢工者，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党团决裂，并且实际上为独立的工人党团在议会中的存在奠定了基础；恩格斯认为这个事件是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胜利，它意味着法国工人开始摆脱激进派的影响。

- 2月25日—8月5日** 恩格斯審訂“資本論”第一卷英譯文的手稿，他在審訂時特別利用了馬克思在1877年當美國最初有人試圖從事這部著作的翻譯時所做的書面指示。
- 3月中** 恩格斯多次寫信給拉法格，勸告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繼續爭取團結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鬥爭，孤立可能派機會主義集團並揭露他們妨礙工人階級團結的行動；他贊許工人議員們嚴辭捍衛德卡茲維耳罷工礦工而迫使議會通過了一個敦促政府考慮勞動利益的決議的行為；他認為這一事實是工人運動的巨大勝利，恩格斯把議員們演說的全文寄給了倍倍爾。
- 3月15日** 恩格斯寫信給法國社會主義者，就巴黎公社十五周年紀念之際表示與他們團結一致。恩格斯的信發表在3月27日“社會主義者報”上。
- 3月底** 恩格斯感謝查蘇利奇給他寄來了由她本人譯成俄文出版的卡·馬克思的著作“哲學的貧困”。
- 4—7月** 恩格斯患病。
- 4—5月** “新時代”雜誌發表了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該書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同它的哲學先驅的關係，並考察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問題。
- 4月上半月** 由於俾斯麥在3月31日的帝國國會演說中企圖把1866年對他行刺的弗·布林德說成是馬克思的門徒，恩格斯堅持要勞·拉法格、愛·馬克思-艾威林予以駁斥；馬克思兩個女兒的聲明發表在4月15日“社會民主黨人報”和4月24日“社會主義者報”上。
- 4月初** 恩格斯研究了德意志帝國國會關於延長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問題的討論情形，他贊同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對政府和反動議員進行尖銳駁斥的言論；他指出，其他

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尤其是法国德卡兹维尔矿工的罢工和法国工人议员在议会中的行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正在产生革命化的影响。

4月中

恩格斯接见圣路易斯（美国）民主党报纸记者麦肯尼斯，并就劳动立法问题同他进行了谈话；由于7月初在“密苏里共和党人报”上刊登的一篇关于这次谈话的简讯歪曲地报道了恩格斯所说的话，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这封信发表在7月8日社会主义报纸“纽约人民报”上。

4月底—9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美国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群众性斗争的扩展，芝加哥、费拉得尔菲亚、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城市工人的五一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他写信给左尔格、倍倍尔和其他著名社会主义者，强调指出美国无产阶级的这些行动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恩格斯指出，美国工人运动的缺点和弱点——无政府主义者的巨大影响、缺乏明确的纲领和鲜明的目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很少——在运动的初期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后的斗争过程中将被克服。

4月29日和5月12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和李卜克内西，描述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时指出，从社会民主联盟中脱离出去的社会主义同盟未能成为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它的领导人莫利斯和巴克斯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

5月初

由于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在5月2日巴黎市镇选举中获得了大量选票，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和李卜克内西，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证明工人正日益摆脱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影响。恩格斯把载有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新时代”杂志和附有他的导言的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

- 亿”一起寄給馬尔提涅蒂。
- 5月15日** 恩格斯关于枪杀里昂玻璃厂罢工工人事件的一篇短評在“公益”杂志上发表。
- 5月22日** 恩格斯同伦敦斯万·容涅先一劳里出版公司商談关于出版“資本論”第一卷英譯本的問題。
- 5月底—6月3日** 恩格斯审閱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美国版的校样。
- 6月25日左右—7月7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勒恩疗养,他的朋友、著名的德国化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卡·肖萊馬在这里拜訪了他。
- 8—11月** 恩格斯审閱“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的校样。
- 8月7日—9月4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勒恩休养,在这里李卜克內西會在他家作客数日。
- 8月下半月—10月** 由于沙皇俄国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島竞争的加强、法国复仇主义情緒和德国統治集团侵略意图的增长、以及英国对近东和中东所实行的掠夺政策,欧洲列强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了,因此恩格斯仔細研究欧洲的国际形势。他在指出全欧战争有爆发的现实危险时,得出結論說,这个战争将滋长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从而会使国际工人运动遭到沉重打击,但同时也必然会加速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俄国革命危机的成熟。
- 8月18日** 恩格斯写信給倍倍尔,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訴他,指出社会民主联盟和其他社会主义組織仍然脱离群众,而社会主义同盟由于它的部分领导人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正經受着内部危机。恩格斯还強調指出,美国和法国階級斗争的尖銳化证实了馬克思的下述論点,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在其范围内进行决战的資产階級国家的一种形式。

- 鉴于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許多其他积极活动家因参加哥本哈根党代表大会和散发为德国当局禁止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而被夫賴堡薩克森法庭判处監獄監禁，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认为，这个判决以及其他警察恐怖行为是德国政府无力对付工人运动的高涨的证明。
- 8月20日** 恩格斯通知施留特尔表示同意重新出版他的“論住宅問題”这一組文章，同时还建議再版1885年12月去世的波克罕的小册子“紀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并答应写一篇波克罕的传记作为这本小册子的引言。
- 8月29日** 恩格斯离开伊斯特勃恩到伦敦去了一天，以便会见从德国前往美国的李卜克内西。
恩格斯在伦敦会晤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乔·哈尼。
- 9月5日和13日之間** 社会主义同盟领导人巴克斯和莫利斯不止一次地拜訪了恩格斯，恩格斯同他們交談了同盟內部的状况。
- 約9月5日和11日之間** 恩格斯閱讀考茨基“卡·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书的手稿，并提出自己的意見。
- 9月17日—9月27日左右** 約·菲·貝克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 10月2日** 由于巴黎陪审法庭宣判因公开揭露政府和大銀行有联系而受法院审讯的拉法格和盖得无罪，恩格斯在給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指出，这个事实证明，組織起来的无产阶级能够利用资产阶级各个派系之間的矛盾；同时恩格斯警告法国社会主义者要防止过高估計这些矛盾的危险，并強調指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政治上的不稳定性是必然的。
- 10月8日和9日** 恩格斯建議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他活动家考

慮,由党来保证約·菲·貝克尔的生活需要,以便使他能够写完对德国革命运动史有很大意义的回忆录。

10月23日

恩格斯写信給倍倍尔,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关于在警察統治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将不再称为党的正式机关报的决定是适宜的;恩格斯指出,这一步驟不但将使国会党团进行公开活动更方便,而且也将为该报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創造更有利的条件。

10月25日

恩格斯写欧洲国际形势簡評,分析了各大强国之間,特别是俄国同奥匈帝国之間以及德国同法国之間矛盾尖銳化的情形,并指明了全欧战争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恩格斯指出,这些大国的統治阶级都把战争看做是一种镇压革命运动和保持反动統治的手段,因此他向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项坚决反对战争危险的任务。恩格斯把这篇簡評寄給了拉法格,在略加删节和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以后以“欧洲政局”为題发表在11月6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11月—12月初

恩格斯写“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批判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安·門格爾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討”一书,該书充滿了对馬克思和他的学說的攻击。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恩格斯不得不停止这一工作,由考茨基把該文写完。文章发表在1887年2月“新时代”杂志上,沒有署名。

11月5日

恩格斯写完“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

11月下半月

恩格斯繼續密切注意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他多次写信給其他国家著名社会主义者,指出工人群众,尤其是失业工人的不滿情緒正在增长;他认为,社会民主联盟內存在健康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尽管它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它仍有可能提高自己在工人中的威信,而社会主义同盟却越来越变成脱离实际斗争的宗派組

織；恩格斯強調指出，必須把社会民主聯盟的領導同它的普通擁護者區別開來。

11月底—12月

恩格斯寫信給左爾格和其他社會主義者，分析了美國工人運動發展中的新因素——“勞動騎士團”團員的劇增、紐約統一工人黨的成立、在某些州的選舉中工人候選人所獲得的勝利；他指出，在工人階級的鬥爭蓬勃高漲和最廣泛的工人組織——“勞動騎士團”缺乏有理論根據的社會主義綱領的條件下，在美國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同時恩格斯嚴厲地批評了基本上是由德國流亡者組成的、和美國工人階級的实际鬥爭沒有聯繫的北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他強調指出，美國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在不脫離現有各種群眾運動形式的情况下，努力爭取建立一個美國無產階級的全國性政黨。

約1886年12月—
1887年3月

恩格斯閱讀早先寄給他的施留特爾的小冊子“英國憲章運動”的手稿，編寫憲章運動的年表，對小冊子的正文做某些修改和補充。小冊子於1887年10月初在蘇黎世出版，沒有指明作者是誰。

12月5—10日

李卜克內西夫婦訪美歸來，順道至恩格斯家中作客。

12月6日

辛格爾拜訪恩格斯。

12月9日

由於貝克爾去世，恩格斯撰文紀念這位著名的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文章以“約翰·菲力浦·貝克爾”為題發表在12月17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51號上，略加刪節後轉載在1887年1月1日和8日北美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機關報——紐約“社會主義者報”上。

約1886年12月23
日—1887年1月中

保爾·拉法格和勞拉·拉法格在倫敦恩格斯家裡作客。

1887

- 1—7月 恩格斯因患眼疾不得不在閱讀和写作方面对自己加以限制。
- 1月初 “資本論”第一卷英譯本出版。
- 1月10日 恩格斯写完自己的著作“論住宅問題”第二版的序言。他在序言里批判了資產階級社会主义的空想理論；他在分析德国农村家庭工业的状况时证明，資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使工人階級革命化而且也使小农革命化，因此小农是无产階級在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軍。这篇序言发表在1月15日和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載于1887年3月上半月出版的“論住宅問題”一书上。
- 1月26日 恩格斯写完他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美国版的序言。他在这篇序言里研究了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批判了美国經濟学家亨·乔治的理論，揭露了他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要求的資產階級性质，指出，美国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全国規模的无产階級政党。該书于5月初在紐約出版；这篇序言經恩格斯譯成德文后又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題发表在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于7月在紐約以同一标题用英文和德文印成单行本。
- 2—6月 鉴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艾威林掀起了一个誹謗运动，誣蔑他在旅美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理論期間在财务方面有舞弊行为，恩格斯同左尔格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进行了頻繁的通信，以便駁斥这种誹謗和为艾威林恢复名誉。
- 2月上半月 恩格斯閱讀发表在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观察”上的他的

- 文章“欧洲政局”的罗马尼亚译文，并借此学习了罗马尼亚文。
- 2月12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米·叶·萨尔特柯夫-谢德林的“童话”。
- 2月12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本寄给丹尼尔逊。
- 2月13日** 鉴于2月19日将在巴黎举行由俄国、德国、波兰和其他国家的流亡社会主义者在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组织的、旨在反对欧洲扩军备战的国际联谊会，恩格斯给组织委员会写了一封贺信。贺信曾在联谊会上宣读，并发表在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上，后又译成德文发表在3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及3月19日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
- 2月24日和3月19日之間** 恩格斯写信给劳·拉法格、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分析了2月21日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在选举过程中尽管警察当局逞凶肆虐，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仍得到了巨大的增长，恩格斯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巨大胜利，它证明该党在工人中的影响正不断增长。
- 1887年3月—
1888年1月** 恩格斯一面做其他工作，一面阅读穆尔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对译文进行修改并为英文版写注释。
- 3月4日**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片断以“平等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为题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 3月10和12日** 恩格斯告诉劳·拉法格和倍倍尔说，“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已经售完，第二版正开始印刷。
- 3月下半月—5月** 恩格斯指导英国社会主义者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伦敦工人街区，尤其是在受自由党人影响的东头区工人激进俱乐部进行宣传活 动；他认为这种宣传是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的重

- 要步驟。
- 3月18日** 由于巴黎公社紀念日来临，恩格斯打电报給法国工人党巴黎組織，电文如下：“3月18日于伦敦。公民們！我和你們一起衷心地紀念三月十八日。”电文发表在3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 約3月底** 恩格斯閱讀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丹麦文譯文。
- 4月23日左右** 由于美国社会主义报纸“紐約人民报”編輯部事先沒有征求恩格斯的意見擅自把“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的美国版序言譯成了德文，而且对原文做了歪曲，并于4月10日加以发表，为此，恩格斯向該报提出抗議。
- 4月24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馬克思写給丹尼尔逊的书信。
- 4月底—5月初** 恩格斯同西班牙社会主义者霍·梅薩通信，梅薩告訴他关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衰落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情形，同时还寄給他几份1886年的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这些报纸上刊载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一个西班牙譯文。
- 5月初**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的第一个英譯本在紐約出版。
- 6月4日和7日** 恩格斯告訴左尔格和劳·拉法格說，5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社会主义同盟代表會議上无政府主义分子获得了胜利，他們投票通过了旨在反对一切議會活动的決議。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为首的馬克思主义者将不得不退出同盟，因为同盟現在只能是开展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絆脚石了。
- 6月14日和23日之間** 恩格斯研究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的綱領，并对綱領

- 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恩格斯把綱領的原文和他的修改意見寄給聯盟的組織者之一馬洪，并在給馬洪的信中強調指出，只有真正的工人群众运动才能使独立的工人政党在英国建立起来。
- 6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給乔·哈尼，表示打算編写馬克思传。
- 7月** 恩格斯閱讀考茨基为“1888年奥地利工人历书”編写的恩格斯傳記的手稿，并对原稿做了一些更正和补充。
恩格斯閱讀施留特尔的小册子“英国宪章运动”的校样。
- 7月23日—9月2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 8月初** 英国社会主义者巴克斯在伊斯特勃恩恩格斯家里作客。
- 8月下半月** 恩格斯应考茨基的請求閱讀他的“托馬斯·莫尔及其烏托邦”一书的校样，并提出自己的意見。
- 9月3日** 恩格斯得到洛帕廷去世的消息（后来弄清，这是誤传）以后，告訴拉甫罗夫說，他打算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一篇悼念洛帕廷的文章。
- 9月中** 恩格斯获悉根据亨·乔治的倡議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被开除出紐約州統一工人党以后，在給左尔格以及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預料說，乔治同社会主义者的决裂并組織資产階級改良派类型的政党将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因为这样一来会向工人們暴露出乔治的真面目，阻止他去領導运动。
- 10月下半月** 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 11月底—12月初** 恩格斯同伦敦出版者里夫斯商談在英国发行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的美国版和該书序言的单行本。

- 1887年12月—
1888年1月 恩格斯学习羅馬尼亞文。
- 12月初 恩格斯把自己的著作“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的手稿寄給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者約·狄茨，以便出版单行本，同时还把馬克思在1845年写的、应作为附录收入該书的关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寄給他。
- 12月7日 恩格斯复信給施留特尔，表示同意施留特尔以“弗·恩格斯1871—1875年短文集”为題出版他的文集的建議。文集未能出版。
- 12月15日 恩格斯写完波克罕的小册子“紀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第二版的引言，这一版是根据恩格斯的建議准备付印的。在引言中，他对日益迫近的全欧战争的規模和可能的結局做了深刻的預測，并表示深信，这场战争一旦爆发，迟早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引言載于1888年6月在苏黎世出版的上述小册子中。
- 1887年12月底—
1888年3月 恩格斯写他計劃写的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第四章，該书的前三章本为“反杜林論”第二篇中的几章，这几章总称“暴力論”。在这一章中，恩格斯打算对俾斯麦的全部政策进行批判的分析，并以德国1848年以后的历史为例說明在“反杜林論”中所做的关于經濟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理論結論是正确的。因忙于其他工作，特别是忙于准备“資本論”第三卷手稿的付印工作，恩格斯没有写完这一章。
- 12月29日 恩格斯把被揭露是俾斯麦的雇佣間諜的奥地利拉薩尔派社会党人亨·奥伯温德过去在政治上的表現的一些材料告訴拉法格。

1888

- 1—3月 恩格斯由于又患眼疾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工作和通信。
在写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同时，恩格斯还阅读刚刚出版的德国历史学家 C. 布勒的“现代史”一书的第四卷，并详细摘录了1871年以后的德国历史。
- 1—2月 由于战争的危险性不断增加，恩格斯仔细研究欧洲的国际形势。
- 1月2日和4日之間 恩格斯定购在彼得堡用德文出版的俄国经济学家伊·奥·凯斯列尔的四卷本著作“关于俄国农民的村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和评论”。
- 1月4日 恩格斯写信给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若·纳杰日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中的传播表示满意；他强调指出欧洲各社会党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一致具有重要意义，并表示深信用革命方法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将会推动革命事件在德国、奥地利和全世界的开展。这封信的片断曾译成罗马尼亚文发表在“现代人”（《Contemporanul》）杂志第8期上。
- 1月30日 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序言载于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该书中。
- 2月13日和25日之間 恩格斯审阅“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校样。
- 2月21日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单行本写序言。该书于5月上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
- 2月底 恩格斯为已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卡·普芬德的妻子和女儿组织物质援助。

3月19日

恩格斯写信給拉法格，說明了威廉一世死后德国形勢的特点；拉法格在他发表在3月26日法国激进派报纸“不妥协派报”（«L'Intransigeant»）上的短評中利用了这封信。

4月—5月9日

恩格斯审阅和修改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为在美国出版单行本而翻譯的馬克思的演說“关于自由貿易”的英譯文，并为这篇演說写了序言，其中利用了从紐約給他寄来的有关美国关税政策的材料；序言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貿易”为題发表在7月份的“新时代”上和8月份的“劳动旗帜”周刊上，并載于9月間在美国出版的馬克思这篇演說的单行本中。

4月初

恩格斯写信給英国女作家瑪·哈克奈斯，对她的小說“城市姑娘”給予好評，并發揮了他自己对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表現活动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把巴尔扎克評为现实主义大师。

4月16日

恩格斯获悉德国社会民主党圣加伦代表大会决定按照党的倡議于1888年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消息后，写信給李卜克內西，反对在非常法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倡議者；他还指出，由于在英国没有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不宜在伦敦举行这种代表大会；他建議代表大会由法国社会党人安排在紀念法国1789年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召开，大会应该具有純粹社会主义的性质。

5月—7月中

由于聚集在与保皇派集团有联系的前陆军部长若·布朗热將軍周围的一批复仇主义分子在法国大肆活动，恩格斯写信給拉法格夫妇，強調指出布朗热主义的危险性；他认为这种运动是沙文主义运动，是波拿巴主义

的变种，同时也批评了拉法格和法国工人党其他领袖对布朗热主义的错误评价，他们把布朗热的某些成功错误地说成是人民群众支持他的结果。恩格斯要求法国社会党人同布朗热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揭穿布朗热及其拥护者的蛊惑性的复仇主义口号。

7月6日和8月初之間 恩格斯把英国诗人派·雪莱的诗译成德文，供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写“社会主义者雪莱”一文之用，该文于12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8月8—17日 恩格斯同爱·马克思-艾威林、艾威林和肖莱马一起动身去美国旅行，从伦敦乘“柏林号”轮船到纽约。

8月17日—9月19日 恩格斯同肖莱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艾威林一起在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在纽约住了几天，在左尔格处作客，然后乘火车前往波士顿；在那里住了一星期左右，顺便参观了附近几个城市，其中包括剑桥和康克德；从波士顿乘火车去参观尼亚加拉瀑布，在那里休息了五天；从那里乘轮船沿安大略湖和圣劳伦斯河到蒙雷阿勒，顺便参观了加拿大的多伦多、侯普港和金兹顿等城市；从蒙雷阿勒乘火车回到美国的普拉茨堡，又从那里去阿德朗达克山脉游览，然后乘轮船经香普冷湖和乔治湖到沃耳巴尼，再乘轮船沿哈德逊河回到纽约。

9月19日 恩格斯对“纽约人民报”的代表、前第一国际活动家泰·库诺发表谈话，回答了库诺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强调指出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正在提高，认为爱尔兰的土地运动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并表示深信俄国革命一定会对整个欧洲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谈话发表在9月20日该报上，并转载在10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9月19—29日 恩格斯结束在美国的旅行，乘“纽约号”轮船回伦敦，同时开始为“新时代”写他这次旅行的观感，文章没有

写完。

1888年10月—
1889年1月初

恩格斯进行“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付印前的准备工作；确定这一篇的结构和各章的标题，根据馬克思的个别提示编写第一、二、三章和只有一个标题的整个第四章。

10—12月

恩格斯写信給拉法格夫妇，尖锐地批評了某些社会党人打算同布朗热分子結成竞选联盟的意图，繼續坚持要法国工人党的領袖們正式地和公开地声明毫无保留地譴責布朗热主义是极端敌視无产阶级的派別。

11月17日

恩格斯会晤英国社会主义者馬·巴里，后者把在伦敦举行的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經過和結果告訴了他，这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决定，于1889年夏天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委托法国可能派这个机会主义派負責組織这次代表大会。

11月底—12月

受法国工人党领导的法国工团全国联合会波尔多代表大会決議，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以对抗由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恩格斯从拉法格夫妇那里得到关于这两个代表大会筹备經過，特别是关于可能派力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他們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詳細报道。

1889

1月5日

恩格斯写信給倍倍尔，說明由于两个国际代表大会同时召开而形成的局势；他认为可能派是同政府当局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直接代理人，并且坚决地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可能派断絕关系，参加由法国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1月14日

恩格斯建議法国馬克思主义者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 倡議在南錫召开的、邀請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可能派)参加的、旨在为召开統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創造条件的預备會議；恩格斯把这个會議看做是揭露和孤立可能派的一种手段。
- 2月10日** 恩格斯完成了“資本論”第三卷第四篇付印前的准备工作,从而使全卷的三分之一以上都已脫稿。
- 2月11日** 恩格斯告訴勞·拉法格說,可能派由于受到海德門的支持,陰謀通过他来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使之参加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
- 2月14日和20日之間** 恩格斯审阅考茨基“1789年的階級矛盾”一文的校样并提出自己的意見;該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 2月下半月** 恩格斯积极参加原定在南錫召开后来改在海牙召开的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會議的筹备工作。
- 3月—7月14日** 恩格斯认为,不让以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分子占据国际工人运动的領導地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他积极参加由法国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此同各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进行广泛的通信:揭露可能派及其同盟者的机会主义实质,批評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社会主义者对可能派所抱的調和主义情緒,也批評了法国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了解在这个問題上必需采取灵活的策略而犯的宗派主义錯誤。
- 3月17日和22日之間** 恩格斯审訂伯恩施坦根据他的倡議为答复社会民主联盟机关报“正义报”3月16日編輯部文章而写的抨击性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正义报”編輯部文章歪曲了与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有关的事实,并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这篇抨击性文章于3月23日左

右出版了英文的单行本,并用德文发表在3月30日和4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4月底

由于4月27日“正义报”上轉載的巴黎劳动总会的通告断言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得到了法国大多数有組織工人的支持,恩格斯写了一篇短評加以駁斥;短評由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署名以給編輯部的信的形式发表在5月4日伦敦报纸“工人选民”上。

5月7—10日

恩格斯收到拉法格夫妇寄来的法国各社会主义組織和工人組織代表邀請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参加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把它譯成德文并安排譯成英文的事情。呼吁书发表在德国和英国的許多社会主义报纸上。

5月下半月—6月初

恩格斯积极参加将以代表大会組織委员会的名义印发的关于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的起草和审訂工作,安排把这个文件譯成各种文字,印刷和散发等事,并爭取各国社会主义者在通知书上签名。

5月底

恩格斯审訂伯恩施坦根据他的倡議为答复“社会民主联盟宣言”而写的第二篇抨击性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社会民主联盟宣言”粗暴地歪曲了法国馬克思主义者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筹备經過。这篇抨击性文章于6月8日左右用英文印成单行本出版。

不迟于5月27日

恩格斯写信給苏格兰工党杂志“工人領袖”編輯詹·凱·哈第,信中描述了5月4日开始的魯尔区矿工罢工,他认为这次罢工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該信作为一篇沒有标题的文章載于該杂志6月号“矿工簡訊”。

7月17日

由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它为第二国际奠定

- 了基础)于7月14日在巴黎开幕,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者争取各国社会主义者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团结事业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他指出,可能派妄想夺取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 約8月8日—9月6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 8月10日** 恩格斯在“工人选民”报上发表“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一文,揭穿了可能派妄想破坏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声誉的企图,同时证明出席可能派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实际上并不代表任何组织。
- 8月底—10月初** 由于法国众议院选举即将来临,恩格斯继续注视法国政治局势和法国社会党人的活动,并从拉法格夫妇处收到详细报道;写信给他们,表示深信布朗热主义的拥护者在选举中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他建议法国社会党人执行独立的路线,并为他们组织金钱上的帮助。
- 8月底—9月初** 恩格斯密切注意在伦敦发生的码头工人罢工;在给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许多信中,他认为这次罢工是英国工人运动中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无产阶级尚未组织起来的阶层已经积极地参加了斗争;他给爱·马克思-艾威林的信的片断发表在8月31日“工人选民”报上,他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的一部分被该报8月31日社论所引用。
- 9月6日左右** 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在伦敦拜访了恩格斯。
- 9月下半月—10月** 恩格斯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重新核对引文,改正错误和刊误,补写了一些注释。
- 9月底—10月初** 恩格斯写“资产阶级让位了”一文,以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经验和英国工人运动的其他一些事实为依据,说明英国资产阶级开始失去国家领导阶级的作用;该文

发表在 10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10—12月

恩格斯对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和其他英国社会主义者在伦敦非熟练工人中的活动給予帮助；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这些阶层走上了罢工斗争的道路，他们加入了同主要是联合工人贵族的老工联相对抗的新工联，这是英国工人运动发展中新阶段的开端。

10月8日和29日

恩格斯写信給劳·拉法格，对 9 月 22 日和 10 月 6 日举行的法国众議院选举做了评价；他指出，尽管社会党人失掉一些当选证，但是选举的结果对他们說来还是一个相对的胜利，因为馬克思主义者得到的选票比可能派多一倍；恩格斯指出，布朗热分子遭到彻底失败这个事实是选举的主要结果。

11月

恩格斯为准备出版“資本論”第三卷又重新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同时就有关問題浏览和閱讀各种經濟文献。

12月4日

恩格斯就如何翻譯和加工法国激进派历史学家若·阿韦奈耳的书“阿那卡西斯·克罗茨，人类的演說家”一事对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維·阿德勒做了指示。

12月7日

恩格斯写信給左尔格，指出在奥地利工人运动中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成就，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在急剧下降。

12月18日

恩格斯写信給丹麦社会主义者格·特利尔，闡述了自己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的观点；他一方面強調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另一方面又指出，在个别情况下，只要不做原則性的让步，可以同其他政党結成暫时的联盟，以便共同为实现某些对无产阶级有利害关系的进步措施而斗争；同时恩格斯批評了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因为他们把反对无原則地同各资产阶级政党結成同盟的特利尔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

人名索引

三 画

大胆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 1433—1477)——勃艮第公爵(1467—1477)。——第 453 頁。

万貝韦伦, 艾德蒙(Van Beveren, Edmond)——比利时社会党人。——第 614 頁。

万德比尔特(Vanderbilt)——美国最大的金融和工业巨头世家。——第 294、486 頁。

小拿破侖——見拿破侖第三。

四 画

巴貝夫, 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1760—1797)(真名弗朗斯瓦·諾埃爾 François-Noël)——法国革命家, 杰出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平均派”密謀的組織者。——第 553 頁。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革命家和政論家,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第一国际中是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在 1872 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 313、335、369、374、399、407 頁。

巴霍芬, 約翰·雅科布(Bachofen, Johann

Jakob 1815—1887)——杰出的瑞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母权論”一书的作者。——第 42、51、53、60、62、64、68、95 頁。

巴尔貝斯, 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团体和密謀的领导人之一; 1848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因参加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 1854 年遇赦; 被赦后流亡国外, 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第 242 頁。

巴斯利, 艾米尔·約瑟夫(Basly, Emil-Joseph 1854—1928)——法国工会活动家, 矿工, 众議院議員, 德卡茲維耳煤矿工人罢工(1886)的积极参加者,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616 頁。

巴滕貝克, 亚历山大(Battenberg, Alexander 1857—1893)——黑森亲王的儿子, 1879—1886 年为保加利亚王, 称亚历山大一世, 实行亲奥地利的政策。——第 357、358、360、361 頁。

巴提斯(Batisse, G.)——法国社会党人, 工人,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589、615 頁。

巴伊, 让·西尔万(Bailly, Jean-Sylvain 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 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自

- 由立宪資產階級領導者之一，他任巴黎市長時（1789—1791）曾下令向馬爾斯廣場上的要求共和國的遊行示威群眾開槍射擊（1791），因此在1793年被革命法庭處以死刑。——第23頁。
- 比萬（Bevan）——斯溫西市工聯理事會主席，1887年為在該市舉行的工聯代表大會主席。——第404頁。
- 丹尼爾森，阿克塞耳·斐迪南（Daniels-son, Axel Ferdinand 1863—1899）——瑞典社會民主黨人，政論家。——第615頁。
- 丹尼爾斯，羅蘭特（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國醫生，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和領導人之一；科倫共產黨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審法庭宣告無罪；做了一次把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到自然科學領域的最初嘗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259頁。
- 戈克，阿曼特（Goegg, Amand 1820—1897）——德國新聞工作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9年是巴登臨時政府成員；革命失敗後逃離德國；七十年代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第258頁。
- 毛勒，格奧爾格·路德維希（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著名的德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古代和中世紀的日耳曼人社會制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世紀馬爾克公社的歷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第110、158、160頁。
- 切希，亨利希·路德維希（Tschech, Heinrich Ludwig 1789—1844）——普魯士官員，1832—1841年是施托爾科夫（普魯士）市長，民主主義者；因謀刺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處以死刑。——第482頁。
- 韋爾凱爾，卡爾·泰奧多爾（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國法學家，自由派政論家；1848—1849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屬於中間派右翼。——第482頁。
- 韋斯特馬爾克，愛德華·亞歷山大（Westermarck, Edvard Alexander 1862—1939）——芬蘭資產階級民族學家和社會學家。——第44、45、47、62頁。
- 文齊希（Winzig）——奧地利工人，社會民主黨人。——第614頁。
- 尤利（Julii）——羅馬貴族氏族。——第154頁。
- 尤維納利斯（德齊姆斯·尤尼烏斯·尤維納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約60—140）——著名的羅馬諷刺詩人。——第9頁。
- 扎博爾，阿道夫（Sabor, Adolf 1841—1907）——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職業是教師，1884年起是國會議員。——第614頁。
- 扎哈耳卡（Zahálka, R.）——捷克工人，社會民主黨人。——第614頁。
- 扎克斯，艾米爾（Sax, Emil 1845—1927）——奧地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第373頁。
- 扎姆斯（Sams, K.）——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第614頁。

五 画

白拉克，威廉（Bracke, Wilhelm 1842—1880）——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社會民主工黨（愛森納赫派）創始人（1869）和領導人之一，接近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進行反對拉薩爾派的鬥爭，反對社會民主黨內的机会主義分子，但還不夠徹

- 底。——第 238 頁。
- 布尔巴基, 沙尔(Bourbaki, Charles 1816—1897)——法国將軍,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和 1859 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时曾先后任近卫軍指揮官、第十八軍軍长和东方軍团司令。——第 504 頁。
- 布格, 埃耳泽烏斯·索富斯(Bugge, Elseus Sophus 1833—1907)——挪威語文学家, 克利斯提阿納(奥斯陆)的教授, 写有古斯堪的那維亚文学和神話方面的著作。——第 157 頁。
- 布萊特, 約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 資产階級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 从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領袖; 历任自由党内閣大臣。——第 224 頁。
- 布萊希勒德, 格尔森(Bleichröder, Gerson 1822—1893)——德国金融家, 柏林大銀行經理, 俾斯麦的私人銀行家、财务方面的私人顧問和从事各种投机倒把活动的經紀人。——第 197、488、493 頁。
- 布兰特, 保尔(Brandt, Paul 1852—1910)——瑞士政論家, 1889 年为改良派格留特利工人联合会副主席。——第 615 頁。
- 布兰亭, 卡尔·亚尔馬(Branting, Karl Hjalmar 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工党首領, 改良主义者,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的首領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615 頁。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許多秘密社团和密謀活动的組織者,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秘密的“四季社”的領導人, 1839 年 5 月 12 日起义的組織者, 法国无产阶级运动最著名的領導人, 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 242 頁。
- 布朗热, 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瑪朗(Boulanger, Georges-Ernest-Jean-Marie 1837—1891)——法国將軍, 政治冒險家, 陸軍部长(1886—1887); 企图依靠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惑, 在法国建立自己的軍事专政。——第 363、584、596 頁。
- 布雷, 約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經濟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职业是印刷工人。——第 207、213 頁。
- 布累(Boulé)——法国社会党人和工会活动家, 职业是石匠; 1889 年 1 月为社会党的众議院議員候选人,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584、590、596、615 頁。
- 布魯斯, 保尔(Brousse, Paul 1854—1912)——法国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国外, 追随无政府主义者; 1879 年加入法国工人党, 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机会主义派——可能派首領和思想家之一。——第 541 頁。
- 布伦坦諾, 路約(Brentano, Lujo 1844—1931)——德国庸俗的資产階級經濟学家, 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 228、564 頁。
- 布伦坦諾, 罗侖茲(Brentano, Lorenz 1813—1891)——巴登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1849 年領導巴登临时政府,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 失敗后流亡瑞士,后侨居美国。——第 366、397 頁。
- 布罗德豪斯, 約翰 (Broadhouse, John) ——見海德門, 亨利·迈尔斯。
- 布罗德赫斯特, 亨利 (Broadhurst, Henry 1840—1911) ——英国政治活动家, 工联領袖之一, 改良主义者, 职业是泥瓦工, 后为工会官僚, 工联代表大会議会委员会書記 (1875—1890), 自由党議会議員, 內政副大臣 (1886)。——第 592 頁。
- 布日尔, 阿尔弗勒德 (Bougeart, Alfred 1815—1882) ——法国左派政論家, 写有許多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史著作。——第 23 頁。
- 布瓦埃, 昂提德 (Boyer, Antid 1850—1918) ——法国社会党人, 1885 年起为众議院議員。——第 616 頁。
- 弗格森, 亚当 (Ferguson, Adam 1723—1816) ——苏格兰資產階級历史学家,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 274 頁。
- 弗萊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 ——德国詩人, 初期为浪漫主义者, 后来成为革命詩人, 1848—1849 年是“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五十年代脫离革命斗争。——第 8、9、259 頁。
- 弗兰克尔, 列奥 (Frankel, Leo 1844—1896) ——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首飾匠; 巴黎公社委員,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1871—1872), 匈牙利全国工人党 (1880) 的創始人之一;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 615 頁。
- 弗兰茨-約瑟夫一世 (Franz Joseph I 1830—1916) ——奥地利皇帝 (1848—1916)。——第 478 頁。
- 弗兰茨一世 (Franz I 1768—1835) ——奥地利皇帝 (1804—1835), 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的皇帝 (1792—1806), 称弗兰茨二世。——第 477 頁。
- 弗勒金格 (Flöckinger, H.) ——奥地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 614 頁。
- 弗雷德里克七世 (Frederik VII 1808—1863) ——丹麦国王 (1848—1863)。——第 489 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 (弗里德里希大帝)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 ——普魯士国王 (1740—1786)。——第 238、283、284、468、479、487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edrich-Wilhelm 1620—1688) ——勃兰登堡选帝侯 (1640—1688)。——第 237、487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 ——普魯士国王 (1797—1840)。——第 283、284、306、310、479、484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 ——普魯士国王 (1840—1861)。——第 312、505 頁。
- 弗里曼, 爱德华·奥加斯特斯 (Freeman, Edward Augustus 1823—1892) ——英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 自由党人, 牛津大学教授。——第 31 頁。
- 弗里梅耳 (Friemel, A.) ——奥地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 557 頁。
- 弗罗梅, 卡尔·弗兰茨·埃貢 (Frohme, Karl Franz Egon 1850—1933)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政論家, 七十年代是拉薩尔分子, 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首領之一, 1881 年起是国會議員,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

- 表大会代表。——第 614 頁。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編輯之一,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員。——第 254 頁。
- 古耳德,杰伊(Gould, Jay 1836—1892)——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和金融家。——第 486 頁。
- 古斯塔夫一世·瓦薩(Gustav I Wasa 1496 左右—1560)——瑞典国王(1523—1560)。——第 459 頁。
- 汉泽曼,大卫(Hansemann, David 1790—1864)——德国大資本家,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1848 年 3—9 月任普魯士財政大臣,实行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 482 頁。
- 加尔巴(塞尔維烏斯·苏耳皮齐烏斯·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 公元前 5—公元 69)——羅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代为西班牙塔腊果納省总督(执政者);尼祿死后,在 68 年 6 月被推为皇帝;69 年 1 月奥托趁軍隊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統治的时机,策动禁卫兵把他杀死。——第 15 頁。
- 加尔文,让(Calvin, Jean 1509—1564)——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教創始人,这一宗派反映了資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資產階級利益。——第 350 頁。
- 加勒,約翰·哥特弗利德(Galle, Johann Gottfried 1812—1910)——德国天文学家,1846 年根据勒威耶的計算发现了海王星。——第 318 頁。
-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五十至六十年代領導意大利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全国統一的斗争;1860 年領導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反对奧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1866)。——第 236、369、473、509 頁。
- 加賽德(Garside)——美国教授。——第 574 頁。
- 加特曼,列甫·尼古拉也維奇(Гартман,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0—1908)——俄国革命家,民粹主义者,1879 年参加“民意党”反对亚历山大二世的一次恐怖活动,事后流亡法国,后迁英国,1881 年又迁美国。——第 221 頁。
- 卡貝,埃蒂耶納(Cabet, É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論家,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記”一书的作者。——第 408、553 頁。
- 卡耳諾基,古斯塔夫(Kálnoky, Gustav 1832—1898)——奧匈帝国国家活动家,駐彼得堡大使(1880—1881),帝国内閣首相兼外交大臣(1881—1895)。——第 360 頁。
- 卡尔-路德維希-約翰(Karl Ludwig Johann 1771—1847)——奧地利大公,元帅,在历次对法战争(1796、1799、1805 和 1809)中任总司令;曾任陸軍大臣(1805—1809)。——第 507 頁。
- 卡尔大公——見卡尔-路德維希-約翰。
- 卡尔瓦約,沙維埃(Carvalho, Chavier 1862—1919)——葡萄牙作家和記者,社会主义者。——第 615 頁。
- 卡富尔,卡米洛·本佐(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意大利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貴族的思想家和領袖;撒丁政府首腦(1852—1859 和 1860—1861),实行在薩瓦王朝领导下“自上”

- 統一意大利的政策，同时指望得到拿破侖第三的支持，1861年领导第一届意大利政府。——第474頁。
- 卡利古拉(Caligula 12—41)——羅馬皇帝(37—41)。——第15頁。
- 卡梅利納，泽菲兰(Camélinat, Zéphirin 1840—1932)——法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职业是青銅匠，第一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鎮压后流亡英国，大赦后回到法国，1885年起是众議院議員；1920年起是法国共产党黨員。——第616頁。
- 卡緬斯基，加甫利尔·巴甫洛維奇(Каменский, Гавриил Павлович 1824—1898)——俄国資产階級經濟学家，沙皇政府的国外間諜，1872年由于制造假的阿西格那齐紙币而受到瑞士法庭缺席审判，并被判处徒刑。——第222頁。
- 兰克，阿尔图尔(Ranc, Arthur 1831—1908)——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温和的資产階級共和党人，八十至九十年代在資产階級共和党人刊物上起显著作用；曾一度是众議院議員，后为参議員。——第596頁。
- 龙格，沙尔(Longuet, 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魯东主义者，后为可能派分子，职业是新聞記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巴黎公社委員；八十至九十年代被选为巴黎市参議会議員，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丈夫。——第590、616頁。
- 卢格，阿尔諾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派，資产階級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員，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領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258頁。
- 卢森堡王朝(Luxemburg)——捷克王朝(1310—1437)，匈牙利王朝(1387—1437)和神圣羅馬帝国皇朝(1308—1437断續地)。——第498頁。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資产階級的思想家，自然神論哲学家。——第324頁。
-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 Barthold Georg 1776—1831)——著名的德国資产階級历史学家，写有許多古代史方面的著作。——第116、118、144、193頁。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第464、469、470、489頁。
- 尼祿(Nero 37—68)——羅馬皇帝(54—68)。——第14—16頁。
- 尼約基-維亞尼，奧斯瓦多(Gnocchi-Viani, Oswaldo 1837—1917)——意大利民主主义者，加里波第派，七十年代起是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政論家，积极参加第一国际在意大利的活动(1872—1873)，意大利工人党(1882)創建人之一。——第615頁。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領袖，曾任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2年实行稅率改革，降低了許多商品的进口稅，根据新的調节制調整了谷物的进口稅；1846年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第421頁。
- 圣西門，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

- 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47、555、556 頁。
- 司各脱, 瓦尔特 (Scott, Walter 1771—1832)——杰出的英国作家, 西欧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 苏格兰人。——第 153 頁。
-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 (Struve, Gustav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记者; 1848 年 4 月和 9 月巴登起义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 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曾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方面。——第 396 頁。
- 瓦德西, 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 (Walderssee, Friedrich Gustav 1795—1864)——伯爵,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陆军大臣 (1854—1858)。——第 484 頁。
- 瓦格纳, 阿道夫 (Wagner, Adolph 1835—1917)——德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律学派的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第 212 頁。
- 瓦格纳, 理查德 (Wagner, Richard 1813—1883)——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第 48 頁。
- 瓦克斯穆特, 恩斯特·威廉·哥特利勃 (Wachsmuth, Ernst Wilhelm Gottlieb 1784—1866)——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莱比锡的教授, 写有许多关于古希腊罗马的著作和欧洲史著作。——第 76 頁。
- 瓦鲁斯 (普卜利乌斯·昆提利乌斯·瓦鲁斯) (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 公元前 53 左右—公元 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 日耳曼行省总督 (7—9), 日耳曼部落起义时在条多堡森林会战中阵亡。——第 138 頁。
- 瓦扬, 爱德华·玛丽 (Vaillant, Édouard-Marie 1840—1915)——法国社会党人, 布朗基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1884 年起是巴黎市参议会委员,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之一; 法国社会党 (1901) 创始人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590、615 頁。
- 瓦茨, 格奥尔格 (Waiz, Georg 1813—1886)——德国资产阶级的中古史学家, 写有许多中古德国史著作, 哥丁根的教授。——第 160 頁。

六 画

- 艾德門茲, 托马斯·娄 (Edmonds, Thomas Rowe 1803—1889)——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曾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第 207 頁。
- 艾威林, 爱德华 (Aveling, Edward 1851—1898)——英国社会主义者, 作家, 政论家,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之一; 1884 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 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丈夫。——第 383 頁。
- 艾韦贝克, 奥古斯特·海尔曼 (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 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脱盟。——第 249、259 頁。

- 艾曾巴尔特, 約翰·安得列阿斯 (Eisenbart, Johann Andreas 1661—1727) —— 德国医生, 眼科医师和外科医师, 在行医时运用真正的医学知識, 同时兼用江湖治疗方法; 是德国民間創作“艾曾巴尔特医生”中的江湖医生的典型。——第 216 頁。
- 安塞尔, 爱德华 (Anseele, Eduard 1856—1938) —— 比利时社会主义者, 改良主义者, 比利时工人党創始人和領袖之一, 比利时合作运动活动家, 政論家;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 后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积极活动家。——第 580—582、594、595、614 頁。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 —— 德国激进派政論家, “莱茵报”撰稿人 (1842—1843), 1848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員, “新莱茵报”編輯之一;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判处六年徒刑, 六十至七十年代是进步党人。——第 20、259、260 頁。
- 毕克列尔, 約翰 (Bückler, Johann 1780 左右—1803) —— 德国强盜, 莱茵区匪帮的魁首, 綽号施因德汉斯 (意即屠夫汉斯), 在德国文学中施因德汉斯作为“俠盜”, 抱打不平的斗士, 穷人的保护者的形象久享盛名。——第 223 頁。
- 毕希納, 格奥尔格 (Büchner, Georg 1813—1837) —— 德国剧作家和作家, 革命民主主义者, 1834 年吉森秘密的革命組織人权协会的組織者之一, “告黑森农民书”的作者, 提出了“給茅屋和平, 对宮廷宣战”的口号。——第 242 頁。
- 毕希納, 路德維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 —— 德国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第 320 頁。
- 达尔文, 查理 (Darwin, Charles 1809—1882) —— 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 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 3、322、339、408 頁。
- 达尼路克 (Daniluk) ——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作家。——第 614 頁。
- 多博希 (Dobosy) —— 匈牙利面包师。——第 436 頁。
- 多馬, 奧古斯丹·奧諾萊 (Daumas, Augustin-Honoré 生于 1826 年) —— 法国政治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 七十至八十年代被选入众議院, 八十年代未被选入参議院, 1889 年巴黎市参議會議員, 加入社会主义小組;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590、615 頁。
- 多舍克 (Došek, F.) —— 捷克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 614 頁。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瑪丽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 (眞姓为阿魯埃 Arouet) —— 法国自然神論哲学家, 諷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324、351 頁。
- 吉尔斯, 尼古拉·卡尔洛維奇 (Гирс, 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 1820—1895) —— 俄国外交家, 駐德黑兰 (1863 年起)、伯尔尼 (1869 年起)、斯德哥尔摩 (1872 年起) 公使; 外交副大臣 (1875—1882), 外交大臣 (1882—1895)。——第 360 頁。
- 吉芬, 罗伯特 (Giffen, Robert 1837—1910)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統計学家, 財政問題专家, 貿易部統計局

- 局长(1876—1897)。——第 228 頁。
- 吉罗-特龙,阿列克西斯(Giraud-Teulon, Alexis 生于 1839 年)——日内瓦的历史教授。——第 43、45、73 頁。
- 考耳巴尔斯,尼古拉·瓦西里也維奇(Каульбарс,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42—1905)——俄国將軍, 1886 年是沙皇政府駐保加利亚軍事專員。——第 361 頁。
- 考茨基,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論家,“新时代”杂志編輯(1883—1917),八十年代接受馬克思主义;后来完全轉到机会主义立場,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派的思想家。——第 413 頁。
- 列奥波特(Leopold 1790—1852)——巴登大公(1830—1852)。——第 542 頁。
- 列斯納,弗里德里希(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縫;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被告之一,被判处三年徒刑, 1856 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在国际中为馬克思的路綫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250、259、260 頁。
- 米尔巴赫,奥托(Mirbach, Otto)——退伍的普魯士炮兵軍官,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司令;起义失敗后流亡国外。——第 543 頁。
- 米尔柏格,阿尔都尔(Mülberger, Arthur 1847—1907)——德国小資产階級政論家,蒲魯东主义者,职业是医生。——第 373 頁。
- 米尔德,卡尔·奥古斯特(Milde, Karl August 1805—1861)——西里西亚大工厂主,德国自由資产階級代表人物之一;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会議长(5—6 月),属于右派,普魯士貿易大臣(6—9 月)。——第 482 頁。
-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諾維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論家和文学批評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著名思想家,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社会学中的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維護者;“祖国紀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編輯之一。——第 240 頁。
- 米涅,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瑪丽(Mignet, 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資产階級历史学家,曾着手解释階級斗争在資产階級社会創建史中的作用。——第 344 頁。
- 乔治,亨利(George, Henry 1839—1897)——美国政論家,資产階級經濟学家;宣传資产階級国家把土地国有化作为解决資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的思想;企图领导美国工人运动,并把它导向資产階級改良的道路。——第 386—388 頁。
-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納尔·西蒙·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經濟学家,批評資本主义的小資产階級批評家,經濟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第 563 頁。
- 休謨,大卫(Hume, David 1711—1776)

——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論者，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經濟学家。——第 317 頁。

亚庇烏斯·克勞狄烏斯 (Appius Claudius 約死于公元前 448 年)——羅馬国家活动家，执政官(471、451)，公布十二銅表法的十人委员会(451、450)成員之一，力图实行独裁。——第 139 頁。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搖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奴隶主階級的思想家。——第 123 頁。

亚里斯泰迪茲 (Aristides 公元前 540 左右—467)——古希腊政治活动家和統帥，雅典奴隶主貴族的代表。——第 132 頁。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 (1801—1825)。——第 463、504 頁。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 (1855—1881)。——第 361、489、492 頁。

亚历山大三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俄国皇帝 (1881—1894)。——第 299、357—362、510、541 頁。

伊尔米农 (Irminon 約死于 826 年)——圣热尔門-德-普雷修道院院长 (812—817)。——第 174 頁。

伊格列西亚斯，帕布洛 (Iglesias, Pablo 1850—1925)——西班牙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政論家，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員(1871—1872)，新馬德里联合会委員 (1872—1873)，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1879) 創建人之一，后为该党改良派首領之一；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 614 頁。

伊里奈烏斯 (Irenaeus 約 130—202)——基督教神学家，小亚細亚希腊人，177 年起为里昂主教；曾著书反对异教和闡明基督教教义。——第 14 頁。

伊姆·特恩，埃弗腊德·斐迪南 (im Thurn, Everard Ferdinand 1852—1932)——英国殖民官吏，旅行家和人类学家。——第 315 頁。

伊万三世 (Иван III 1440—1505)——莫斯科大公 (1462—1505)。——第 458 頁。

七 画

貝达大师 (Beda Venerabilis 673 左右—735)——盎格魯撒克逊僧侶学者，神学家和历史学家。——第 153 頁。

貝克，亚历山大 (Beck, Alexander)——德国裁縫，正义者同盟盟員，1846 年底因同盟案件被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证人。——第 245 頁。

貝克尔，奥古斯特 (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論家，瑞士正义者同盟盟員，魏特林的拥护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年代初流亡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第 244 頁。

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論家，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委員，“西德意志报”发行人 (1849 年 5 月—1850 年 7 月)；1850 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259、260 頁。

- 貝克尔, 威廉·阿道夫(Becker, Wilhelm Adolf 1796—1846) —— 德国历史学家, 莱比锡大学教授, 写有古代史著作。——第 116 頁。
- 貝克尔, 約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 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以瑞士军队军官身分参加反对拿破仑的战争;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人民自卫团; 1848—1849 年革命后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 六十年代为第一国际著名活动家之一, 参加了国际各次代表大会, “先驅”杂志的編輯(1866—1871);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65—371、396、397 頁。
- 貝伦兹, 尤利烏斯(Berends, Julius 生于 1817 年) —— 柏林印刷厂主,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翼。——第 22 頁。
- 貝納里, 弗兰茨·斐迪南(Benary, Franz Ferdinand 1805—1880) —— 德国东方学家、語文学家和聖經研究者, 在柏林任教授。——第 13、15 頁。
- 貝內代提, 文桑(Benedetti, Vincent 1817—1900) —— 法国外交家, 1864—1870 年駐柏林大使。——第 500、501 頁。
- 貝塞(Besset) —— 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590、615 頁。
- 貝特曼, 乔治(Bateman, George) —— 英国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印刷工人。——第 614 頁。
- 貝贊特, 安娜(Besant, Annie 1847—1933) —— 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活动家, 她曾一度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八十年代是費边社社員和社会民主联盟盟員, 曾参加組織非熟练工人的工联运动。——第 435 頁。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 —— 羅馬教皇(1846—1878)。——第 366 頁。
- 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os 公元前 600 左右—527) —— 雅典僭主(公元前 560—527 断續地)。——第 136 頁。
- 伯恩施太德, 阿达尔貝特(Bornstedt, Adalbert 1808—1851) —— 德国政論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編輯(1847—1848), 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 年 3 月被开除出同盟;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1848 年是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軍团(以后参加了 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組織者之一, 后来知道他同警察机关有联系。——第 254 頁。
- 伯恩施太因, 阿尔諾德·伯恩哈特·卡尔(Börnstein, Arnold Bernhard Karl 1808—1849) ——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志愿軍团(以后参加了 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第 254 頁。
- 伯恩施坦, 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政論家, “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1881—1890);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恩格斯逝世后, 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馬克思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領之一。——第 413、577、605、606、609、610 頁。
- 伯罗斯, 赫伯特(Burrows, Herbert 1845

- 1922) ——英国官員，資產階級激進派，參加過社會主義運動；社會民主聯盟創始人之一；曾參加組織非熟練工人的工聯運動。——第 435、437 頁。
- 伯寧，格奧爾格(Böning, Georg 1788 左右—1849) ——德國軍官，反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戰爭的參加者，二十年代曾參加希臘民族解放運動，後居住在德國，1848 年 7 月起居住在瑞士；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時為起義者一志願軍團指揮；起義被鎮壓後根據普魯士軍事法庭的判決被槍殺。——第 366 頁。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偉大的意大利詩人。——第 438 頁。
- 狄奧多里希(Theodorich) ——三個哥特國王的名字；兩個是西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希一世(418 左右—451 年執政)和狄奧多里希二世(453 左右—466 年執政)，一個是東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希(474—526 年執政)。——第 145 頁。
- 狄奧多羅斯(西西里的)(Diodorus Siculus of Sicily 公元前 80 左右—29) ——古希臘歷史學家，世界史“史學叢書”的作者。——第 156、166 頁。
- 狄奧尼修斯(哈利卡納蘇的)(Dionysios ho Halikarnasseus 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一世紀) ——古希臘歷史學家和雄辯家，“古代羅馬史”一書的作者。——第 120 頁。
- 狄德羅，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 ——傑出的法國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無神論者，法國革命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之一，啟蒙運動者，百科全書派領袖，1749 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監禁。——第 324 頁。
- 狄凱阿爾科斯(Dikaiarchos 公元前四世紀) ——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学生，寫有許多歷史、政治、哲學、地理和其他方面的著作。——第 115 頁。
-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 384—322) ——傑出的古希臘演說家和政治活動家，雅典的反馬其頓派的領袖，奴隸主民主制的擁護者。——第 115 頁。
- 狄茨，約翰·亨利希·威廉(Dietz, Johann Heinrich Wilhelm 1843—1922) ——德國書籍出版者；社會民主黨人，社會民主黨出版社創辦人，1881 年起為國會議員。——第 614 頁。
- 狄慈根，約瑟夫(Dietzgen, Joseph 1828—1888)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自學成功的哲學家，獨立地得出了辯證唯物主義若干原理；職業是制革工人。——第 337 頁。
- 杜羅·德·拉·馬爾，阿道夫·茹爾·塞扎爾·奧古斯特(Dureau de la Malle, Adolphe-Jules-César-Auguste 1777—1857) ——法國詩人和歷史學家。——第 147 頁。
- 杜林，歐根·卡爾(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 ——德國折衷主義哲學家 and 庸俗經濟學家，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代表；在哲學上把唯心主義、庸俗的唯物主義和實證主義結合在一起；是個形而上學者，1863—1877 年為柏林大學副教授。——第 528 頁。
- 甫斯特耳·德·庫郎歇，努馬·德尼(Fustel de Coulanges, Numa Denis 1830—1889) ——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寫有許多古代世界史和中古法國史著作。——第 119 頁。
-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 ——法國國王(1589—1610)。——第 506

- 頁。
- 克拉夫欽斯基, 謝尔盖·米哈伊洛維奇 (Кравчинский,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51—1895) (笔名斯捷普尼亚克 Степняк) ——俄国作家和政論家, 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派著名活动家; 1878年在彼得堡对宪兵长官进行了一次恐怖行动, 事后流亡国外; 1884年起住在英国。——第 221、615 頁。
- 克拉普卡, 迪約尔吉(格奧尔格)(Klapka, György 1820—1892) ——匈牙利將軍,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揮匈牙利一支革命軍队; 1849年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 1866年奥普战争时指揮普魯士政府在西里西亚組織的、派遣参加这次战争的匈牙利軍团; 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 236、493 頁。
- 克腊利克, 艾米尔(Kralik, Emil)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政論家, 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614 頁。
- 克莱因, 約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約生于 1818年) ——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 六十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第 259、260 頁。
- 克劳狄 (Claudii) ——羅馬貴族氏族。——第 138 頁。
- 克劳狄烏斯 (Claudius 公元前 10—公元 54) ——羅馬皇帝(41—54)。——第 15 頁。
- 克劳塞維茨, 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 ——普魯士將軍和資產階級最杰出的軍事理論家; 1812—1814年在俄国軍队中服务。——第 400 頁。
- 克雷潘, 若尔日 (Crépin, Georges) ——法国社会党人, 1889年起为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員。——第 590、616 頁。
- 克里斯提安, 格呂克斯堡公爵 (Christian, Herzog von Glücksburg 1818—1906) ——1852年起为丹麦王位继承人, 1863—1906年为丹麦国王, 称克里斯提安九世。——第 464 頁。
- 克利盖, 海爾曼 (Kriege, Hermann 1820—1850) ——德国記者,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四十年代后半期在紐約領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团。——第 249、250 頁。
- 克利斯提尼 (Kleisthenes) ——雅典政治活动家, 在公元前 510—507年实行改革, 肃清了氏族制的殘余, 并在雅典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第 133 頁。
- 克列孟梭, 若尔日·本扎曼 (Clemenceau, Georges-Benjamin 1841—1929) ——法国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八十年代起为激进党領袖; 內閣总理 (1906—1909和1917—1920), 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第 263、264、596 頁。
- 克魯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謝也維奇 (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 ——俄国革命家, 地理学家和旅行家, 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思想家之一, 馬克思主义的敌人; 1876—1917年侨居国外。——第 221 頁。
- 克呂澤烈, 古斯塔夫·保尔 (Cluseret, Gustave-Paul 1823—1900) ——法国政治活动家, 第一国际會員, 追随巴枯宁派, 里昂和馬賽革命起义(1870)的参加者, 巴黎公社委員, 公社被鎮压后流亡国外; 大赦后回到法国, 1888年起是众議院議員, 后为社会党人, 1889年国

- 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616 頁。
- 克罗耳, 科尔奈利斯 (Croll, Cornelius 1857—1895) ——荷兰社会民主党人, 政論家。——第 580—582、594、595、615 頁。
- 克罗弗德, 艾米莉 (Crawford, Emily 1831—1915) ——英国女記者, 巴黎好几家英国报纸的通訊員。——第 497 頁。
- 克罗伊策, 安东 (Kreutzer, Anton 1851—1929)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面包工人。——第 614 頁。
- 克洛法奇 (Klofáč, A.) ——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紡織工人。——第 614 頁。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 ——英国經濟学家, 資产階級古典經濟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第 206—210、219、415、563 頁。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第一国际会員, 德国工人运动中反对拉薩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則的积极战士, 1867 年起为国会議員,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創始人和領袖之一, “人民国家报”編輯 (1869—1876); 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立場; 在某些問題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調和主义立場;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主席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99、496、580、581、594、603、609、614 頁。
- 李維, 梯特 (Livius, Titus 公元前 59—公元前 17) ——羅馬历史学家, “羅馬建城以来的历史”的作者。——第 141、143 頁。
- 里格尔, 爱德华 (Rieger, Eduard 生于 1869 年) ——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政論家。——第 614 頁。
- 里維, 萊昂 (Levi, Leone 1821—1888) ——英国資产階級經濟学家, 統計学家和法学家。——第 228 頁。
- 利特内尔 (Litner) ——普魯士工人, 无政府主义者, 侨居法国。——第 355 頁。
- 利烏特普朗德 (Liutprand 約 922—972) ——中世紀教会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伦巴德人; 961 年起是克雷莫納(北意大利)主教, “奖賞”一书的作者。——第 170 頁。
- 利希諾夫斯基, 費里克斯 (Lichnowski, Felix 1814—1848) ——公爵, 普魯士軍官, 反动分子, 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員, 属于右翼; 在 1848 年 9 月法兰克福起义时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詩“阿塔·特洛尔”和維爾特的著作“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諷刺人物的典型。——第 7、238 頁。
- 麦岑, 奧古斯特 (Meitzen, August 1822—1910) ——德国資产階級統計学家和經濟史学家; 写有許多德国土地关系史方面的著作, 1867—1882 年在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国統計管理局工作。——第 286、288 頁。
- 麦克法林, 艾琳 (Macfarlane, Helen) ——革命宪章派領袖喬·哈尼出版的“民主評論”(1849—1850)和“紅色共和党人”(1850)的积极撰稿人, 她曾把“共产党宣言”譯成英文。——第 403 頁。
- 麦克伦南, 約翰·弗格森 (McLennan, John Ferguson 1827—1881) ——苏格兰資产階級法学家和历史学家, 写有

- 婚姻和家庭史方面的著作。——第 40、59、73、100、149 頁。
- 麦肯尼斯 (McEnnis) ——圣路易斯城 (美国) 的“密苏里共和党人报”通訊員。——第 354 頁。
- 麦斯特, 亨利希·恩斯特·奥古斯特 (Meister, Heinrich Ernst August 1842—1906)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烟厂厂主, 1884 年起是国会議員,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614 頁。
-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員, 1849 年 2 月 8 日該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 1849 年 2—5 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領袖之一; 1856 年重新同馬克思接近;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第 233、242、243、249、254、256、259、260 頁。
- 苏里塔, 阿隆索 (Zurita, Alonso) ——十六世紀中叶的中美的西班牙殖民官。——第 72 頁。
- 苏路克, 法斯廷 (Soulouque, Faustin 1782 左右—1867) ——海地黑人共和国总統 (1847—1849), 海地皇帝, 称法斯廷一世 (1849—1859)。——第 7 頁。
- 忒俄克里托斯 (Theokritos) ——公元前三世紀古希臘詩人。——第 90 頁。
- 沃耳德斯, 让 (Volders, Jean 1855—1896) ——比利时社会党人, 政論家, 比利时工人党創始人之一,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580、581、605、606 頁。
- 沃尔弗, 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論家, 职业是教員, 西里西亚一个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34—1839 年被囚于普魯士監獄; 1846—1847 年是布魯塞尔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委員, 从 1848 年 3 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1848—1849 年是“新萊茵报”編輯之一; 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议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7、24、26、251、254、255、277、285、287 頁。
- 沃尔弗拉姆·馮·埃申巴赫 (Wolfram von Eschenbach 約 1170—1220) ——中世紀德国詩人。——第 83 頁。
- 沃伦, 查理 (Warren, Charles 1840—1927) ——英国軍事工程师和殖民官, 1886—1888 年是伦敦警察局长, 血腥鎮压 1887 年 11 月 13 日伦敦工人示威游行的策划者之一。——第 585 頁。
- 沃森, 約翰·福布斯 (Watson, John Forbes 1827—1892) ——英国医生, 殖民官, 1858—1879 年是伦敦印度博物館館长, 写有許多关于印度的著作。——第 52 頁。
- 希貝什, 約瑟夫 (Hybeš, Josef 1850—1921) ——著名的捷克和奧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織工, 后为政論家;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1897 年至 1917 年是下院議員; 后来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創建工作。——第 614 頁。
- 希尔什菲尔德, 卡尔·烏尔利希·弗里德里希·威廉·摩里茨 (Hirschfeld, Karl 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Moritz 1791—1859) ——普魯士將軍, 1849 年指揮一个軍参加鎮压巴登—普

- 法尔茨起义。——第 367 頁。
- 希罗德 (Herodes 公元前 73—4) ——犹太国王 (公元前 40—4)。——第 145 頁。
- 希罗多德 (Herodot 約公元前 484—425) ——古希腊历史学家。——第 52、76 頁。
- 希普頓, 乔治 (Shipton, George)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 改良主义者, 彩画匠工联書記, 1871—1896 年为工联伦敦理事会書記。——第 599、600 頁。
- 肖維埃爾, 艾曼紐尔·让·茹尔 (Chauvière, Emmanuel-Jean-Jules 1850—1910) ——法国社会党人, 布朗基主义者, 政論家, 巴黎公社参加者, 1888 年起是巴黎市参議會議員;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590、616 頁。
- 辛格尔, 保尔 (Singer, Paul 1844—1911)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87 年起为德国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委員, 1890 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1884 年起为国会議員, 1885 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 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 614 頁。

八 画

- 阿庇安 (Appian 一世紀末至二世紀七十年代) ——古羅馬历史学家。——第 347 頁。
- 阿德勒, 維克多 (Adler, Victor 1852—1918)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創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1889—1895 年曾与恩格斯通信,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派首領之一。——

- 第 435、436、614 頁。
- 阿德瑙, 斐迪南 (Adenau, Ferdinand)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政論家。——第 614 頁。
- 阿耳貝迪耳, 艾米尔 (Albedyll, Emil 1824—1897) ——德国將軍, 1888—1893 年为閔斯德 (威斯特伐里亚) 第七軍軍长。——第 433 頁。
- 阿尔勃萊希特, 卡尔 (Albrecht, Karl 1788—1844) ——德国商人, 曾因参加“蠱惑者”的反政府运动被判处六年徒刑。1841 年移居瑞士, 在那里以宗教神秘主义形式鼓吹近似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第 250 頁。
- 阿尔勃萊希特一世 (Albrecht I 1250 左右—1308) ——奥地利大公; 1298 年起为日耳曼皇帝。——第 456 頁。
- 阿尔塔薛西斯 (Artaxerxes) ——阿契美尼德王朝三个古波斯国王的名字: 阿尔塔薛西斯一世 (約公元前 465—425 年执政), 阿尔塔薛西斯二世 (約公元前 405—359 年执政) 和阿尔塔薛西斯三世 (約公元前 359—338 年执政)。——第 145 頁。
- 阿加西斯, 路易·让·魯道夫 (Agassiz, Louis-Jean-Rudolphe 1807—1873) ——瑞士自然科学家, 旅行家, 1846 年起住在美国; 在他的自然科学見解中含有极端反动的观点, 达尔文主义的敌人。——第 63 頁。
- 阿克雪里罗得, 巴維尔·波利索維奇 (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1850—1928)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劳动解放社”的参加者之一, 后为孟什維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615 頁。
- 阿里斯东 (Ariston 公元前六世紀) ——

- 斯巴达国王(公元前 574—520), 阿拿克散德里德的共同执政者。——第 75 頁。
-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約公元前 446—385)——著名的古希臘劇作家, 写有政治喜劇。——第 76 頁。
- 阿列克謝也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羅維奇(Алексе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893)——莫斯科市杜馬首腦(1886—1893)。——第 359 頁。
- 阿列曼, 让(Allemane, Jean 1843—1935)——法国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 印刷工人; 巴黎公社委員, 公社被鎮压后被流放服苦役, 1880 年遇赦; 八十年代为可能派分子; 1890 年领导同可能派断絕关系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派的“工人社会革命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 596 頁。
- 阿伦特, 恩斯特·摩里茨(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国作家, 历史学家和語言学家; 曾积极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斗争; 仍未摆脱民族主义的束縛。——第 468 頁。
- 阿米亚努斯·馬尔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 約 332—400)——羅馬历史学家, “历史”一书的作者, 該书包括公元 96 至 378 年的羅馬历史。——第 82、107 頁。
- 阿拿克散德里德(Anaxandridas 公元前六世紀)——斯巴达国王, 公元前 560 年起执政, 阿里斯东的共同执政者。——第 75 頁。
- 阿那克里翁(Anakreon)——公元前六世紀下半叶的古希臘抒情詩人。——第 90 頁。
- 阿那克西曼德(米利都的)(Anaximander of Miletus 公元前 610 左右—546)——古希臘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563 頁。
- 阿涅累夫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Аниелевский, Wladislaw 1864—1899)——波兰社会党人, 职业是泥瓦工; 1888 年为“无产阶级”党华沙工人委员会委員, 1890 年因革命活动被捕, 1892 年被判处徒刑, 1895 年流放西伯利亚, 死于該地。——第 615 頁。
- 波尔恩, 斯蒂凡(Born, Stephan 1824—1898)(真名西蒙·布特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德国排字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曾参加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 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的改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革命后脱离了工人运动。——第 255、256 頁。
- 波克罕, 西吉茲蒙特·路德維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德国政論家,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 1851 年起是伦敦商人;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誼关系。——第 396—400 頁。
- 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三。
- 波旁王朝(Bourbon)——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344 頁。
- 波佩尔(Popper, G.)——奧地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 614 頁。
- 波普, 尤利烏斯(Popp, Julius 1849—1902)——奧地利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皮鞋工人;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614 頁。
- 波伊克尔, 爱德华(Peucker, Eduard 1791—1876)——普魯士將軍, 曾任法

- 兰克福的所謂帝国政府陸軍大臣(1848—1849),曾指揮反革命軍隊鎮壓 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第 367、368 頁。
- 法比(Fabier)——羅馬貴族氏族。——第 144 頁。
- 法爾雅,加布里埃爾(Farjat, Gabriel)——法國社會主義者,職業是紡織工,法國工人黨(1879)的創建人之一;1886 年是法國工會全國聯合會總書記,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代表。——第 594、595、602 頁。
- 法森,勞里默(Fison, Lorimer 1832—1907)——英國的澳大利亞民族學家,菲吉群島(1863—1871、1875—1884)和澳大利亞(1871—1875 和 1884—1888)的傳教士;寫有許多關於澳大利亞和菲吉群島各部落的著作,1871 年起同阿·威·豪伊特合作,著有“卡米拉羅依人和庫爾納依人”和“庫爾納依部落及其平時和戰時的習俗”。——第 54、56 頁。
- 果沃內,朱澤培(Govone, Giuseppe 1825—1872)——意大利將軍和國家活動家,反對奧地利戰爭(1848—1849、1859 和 1866)的參加者,1866 年 4 月同俾斯麥進行談判,陸軍大臣(1869—1870)。——第 492、494 頁。
- 杰維爾,加布里埃爾(Deville, Gabriel 生于 1854 年)——法國社會黨人,法國工人黨的積極活動家,政論家,寫有“資本論”第一卷淺釋以及許多哲學、經濟學和歷史著作,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代表;二十世紀初脫離了工人運動。——第 590、605、615 頁。
- 金克爾,哥特弗利德(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國詩人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被普魯士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850 年越獄逃跑,流亡英國;在倫敦的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領袖之一,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第 258 頁。
- 居維叶,若爾日(Cuvier, Georges 1769—1832)——法國大自然科學家,以比較解剖學、古生物學和動物分類學方面的著作而聞名,提出了反科學的唯心主義激變論。——第 41 頁。
- 肯寧安-格萊安,羅伯特·邦廷(Cunninghame-Graham, Robert Bontine 1852—1936)——英國作家,貴族出身,八十至九十年代參加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議會議員,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代表;後為蘇格蘭民族運動活動家。——第 614 頁。
- 昆提利(Quintilier)——羅馬貴族氏族。——第 138 頁。
- 拉法格,保爾(Lafargue, Paul 1842—1911)——國際和法國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和政論家,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法國工人黨的創始人之一(1879);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的組織者之一和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生和戰友;馬克思的女兒勞拉的丈夫。——第 580、581、590、603—605、609、615 頁。
- 拉法格,勞拉(Lafargue, Laura 1845—1911)——法國工人運動活動家;馬克思的女兒,1868 年起為保·拉法格的妻子;曾積極參加 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的組織工作。——第 610 頁。
- 拉斐德,瑪麗·約瑟夫·保爾(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 1757—1834)——

- 法国將軍，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的大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在当国民自卫軍長官时（1789—1791）曾指揮士兵向馬克萊斯廣場上的共和派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1792年是一个軍团的指揮官，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工具，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1830年資產階級七月革命的領袖之一。——第23頁。
-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維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論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1870年起侨居国外；第一国际會員，巴黎公社参加者；許多民粹派定期刊物的編者；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七十年代初曾同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第615頁。
- 拉克斯(Lax)——奥地利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第614頁。
- 拉科夫，亨利希(Rackow, Heinrich)——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879年起侨居伦敦，烟店老板；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576頁。
- 拉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詩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資產階級共和派；1848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腦。——第254頁。
- 拉馬克，让·巴蒂斯特·比埃尔·安都昂(Lamarck, Jean-Baptiste-Pierre-Antoine 1744—1829)——杰出的法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上第一个完整的进化論的創立者，达尔文的先驅。——第321頁。
- 拉薩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小資產階級政論家，律師，1848—1849年曾参加萊茵省的民主运动，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人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創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魯士的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創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別。——第200、404頁。
- 拉維涅，雷蒙·費里克斯(Lavigne, Raymond Félix 1851—1930)——法国社会党人，政論家，法国工人党黨員，1888年起是法国工会全国联合会書記，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589、614頁。
- 拉辛，让(Racine, Jean 1639—1699)——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的著名代表。——第511頁。
- 罗伯斯比尔，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領袖，革命政府的首腦(1793—1794)；他企图用“最高存在物”的崇拜来代替基督教，沒有成功。——第328頁。
- 罗赫納，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約生于1824年)——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細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50頁。
- 罗素，約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輝格党領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第489頁。
- 罗泰克，卡尔(Rotteck, Karl 1775—1840)——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第482頁。

- 門德爾森，斯塔尼斯拉夫 (Mendelson, Stanislaw 1858—1913)——波蘭社會黨人，政論家，波蘭社會黨 (1892) 創建人之一；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代表；九十年代中脫離工人運動。——第 615 頁。
- 門格爾，安東 (Menger, Anton 1841—1906)——奧地利資產階級法學家，維也納大學教授。——第 548、550—559、561—568 頁。
- 門克，亨利希·泰奧多爾 (Menke, Heinrich Theodor 1819—1892)——德國地理學家，曾改編施普魯奈爾的“中古史和近代史常用地圖集”。——第 451 頁。
- 門特爾，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 (Mentel, Christian Friedrich 生于 1812 年)——德國裁縫，正義者同盟盟員，1846—1847 年因同盟案件被關在普魯士監獄中。——第 245 頁。
- 奈阿爾科司 (Hearchos 約公元前 360—312)——馬其頓海軍統帥，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戰友和他的各次征戰的參加者，曾寫書記敘馬其頓艦隊從印度遠征美索不達米亞的事 (公元前 326—324)。——第 72 頁。
- 帕爾姆，奧古斯特 (Palm, August 1849—1922)——瑞典工人運動活動家，職業是裁縫，後為政論家，社會民主工黨 (1889) 創建人之一。——第 615 頁。
- 帕麥斯頓子爵，亨利·約翰·坦普爾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國國家活動家，初為托利黨人，1830 年起為輝格黨領袖之一，依靠該黨右派；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內務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470、489 頁。
- 帕涅爾，威廉 (Parnell, William)——英國工會活動家，職業是細木工，倫敦工聯工人選舉協會名譽書記。——第 614 頁。
- 佩爾，威廉 (Pare, William 1805—1873)——英國經濟學家 and 合作社活動家，歐文的追隨者，職業是細木工，寫有許多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著作。——第 559 頁。
- 佩雷，亞歷山大 (Peyret, Alexandre)——阿根廷社會主義者。——第 614 頁。
- 青臘姆，阿道夫 (Zinnram, Adolf)——奧地利工人，社會民主黨人。——第 614 頁。
- 屈恩，海爾曼·奧古斯特 (Kühn, Hermann August 1846—1916)——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職業是裁縫；1889 年起多次當選為國會議員。——第 614 頁。
- 舍雷爾，亨利希 (Scherrer, Heinrich 1847—1919)——瑞士社會民主黨人，職業是律師。——第 580、581 頁。
- 舍曼，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 (Schömann, Georg Friedrich 1793—1879)——德國語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寫有許多古希臘史著作。——第 76、120 頁。
- 叔爾茨，卡爾 (Schurz, Karl 1829—1906)——德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政論家，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曾流亡瑞士，後遷美國，站在北部方面參加美國內戰，美國共和黨領袖之一，後為國家活動家和內政部長 (1877—1881)。——第 257 頁。
- 欣克耳，卡爾 (Hinkel, Karl 1794—1817)——德國大學生，爭取德國統一的反政

府的学生运动的参加者。——第 467 頁。

泽德尼切克 (Zedníček, T.) ——捷克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 614 頁。

泽特貝尔, 格奥尔格·阿道夫 (Soetbeer, Georg Adolf 1814—1892)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 522 頁。

九 画

柏拉图 (Platon 約公元前 427—347)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第 9 頁。

柏西阿斯 (奧魯斯·柏西阿斯·弗拉克斯) (Aulus Persius Flaccus 34—62) ——羅馬諷刺詩人, 曾斥責当时羅馬社会的堕落风气, 斯多葛派哲学的追随者。——第 12 頁。

柏修斯 (Perseus 公元前 212—166) ——最后一个馬其頓国王 (公元前 179—168)。——第 167 頁。

拜特洛, 比埃尔·欧仁·马尔塞伦 (Berthelot, Pierre-Eugène-Marcelin 1827—1907) ——著名的法国化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曾研究有机化学和热化学以及农业化学和化学史。——第 327 頁。

勃兰登堡, 弗里德里希·威廉 (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1792—1850) ——伯爵, 普魯士將軍和国家活动家, 反革命內閣的首腦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11 月)。——第 232、286、287 頁。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員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

場;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 255、258、327 頁。

查理八世 (Charles VIII 1470—1498) ——法国国王 (1483—1498)。——第 457 頁。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742 左右—814) ——法兰克国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 173—175、283、460 頁。

查苏利奇, 維拉·伊万諾夫娜 (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 ——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家, “劳动解放社” 創始人之一; 后来轉到孟什維克立場。——第 407、615 頁。

迪埃哥, 弗朗西斯科 (Diego, Francisco) ——西班牙社会党人,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員。——第 614 頁。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領袖之一, 十九世紀下半叶为保守党領袖; 曾任首相 (1868 和 1874—1880)。——第 356 頁。

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er) ——自 1273 年起至 1806 年 (断續地) 所謂神圣羅馬帝国王朝、奥地利帝国王朝 (1804 年起) 和奥匈帝国的王朝 (1867—1918)。——第 24 頁。

哈第, 詹姆斯·凱尔 (Hardie, James Keir 1856—1915)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改良主义者, 职业是矿工, 后为政論家, 苏格兰工党 (1888 年起) 和独立工党 (1893 年起) 的創始人和領袖, 工党的积极活动家。——第 614 頁。

- 哈尔姆, 弗里德里希 (Harm, Friedrich 1844—1905)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商人, 1884 年起是国会议员,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614 頁。
- 哈林, 哈罗 (Harring, Harro 1798—1870) —— 德国作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从 1828 年起曾断續地流亡各国。——第 249 頁。
- 哈尼, 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 —— 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红色共和党人”和其他宪章派刊物的編輯,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来往。——第 248、403 頁。
- 哈斯基森, 威廉 (Huskisson, William 1770—1830)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貿易大臣 (1823—1827), 主张在經濟上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 曾制定降低某些商品进口税的稅率。——第 421 頁。
- 胡施克, 格奥尔格·菲利浦·爱德华 (Huschke, Georg Philipp Eduard 1801—1886) —— 德国资产阶级法学家, 写有許多羅馬法方面的著作。——第 143 頁。
- 济貝耳, 亨利希·馮 (Sybel, Heinrich von 1817—1895) ——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67 年起是民族自由党人; 主张在普魯士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思想家之一; 普魯士国家档案馆館长。——第 490 頁。
- 济格耳 (Siegl) —— 奥地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 614 頁。
- 柯普, 海爾曼·弗蘭茨·摩里茨 (Kopp, Hermann Franz Moritz 1817—1892) —— 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家。——第 327 頁。
- 柯瓦列夫斯基, 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 —— 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 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写有許多原始社会制度史方面的著作。——第 68、70、72、149、154、160 頁。
- 科布頓,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 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派領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創始人之一; 議會議員。——第 427 頁。
- 科采布, 奧古斯特 (Kotzebue, August 1761—1819) —— 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論家。——第 370 頁。
- 科尔布,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Kolb, Georg Friedrich 1808—1884) —— 德国政治活动家, 政論家和統計学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 424 頁。
- 科尔夫, 海爾曼 (Korff, Hermann) —— 普魯士軍官, 民主主义者, 因政治信仰于 1847 年被革除軍职; 1848—1849 年是“新萊茵报”的負責发行人; 后流亡美国。——第 234 頁。
- 科苏特, 拉約什 (路德維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 ——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領導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脑; 革命失敗后逃离匈牙利。——第 258 頁。
- 洛貝爾图斯-亞格措夫, 約翰·卡尔 (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 —— 德国庸俗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化的普魯士容克的思想家; 普魯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 205—208、211—219、558、562 頁。

- 洛帕廷,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維奇(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俄国革命家, 民粹派,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俄譯者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539—541 頁。
-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約公元前 480—40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写有多部古典悲剧。——第 76 頁。
-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47 頁。
- 契普里昂尼, 阿米耳卡雷(Cipriani, Amilcare 1845—1918)——意大利社会主义者, 六十年代为加里波第派, 巴黎公社参加者,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第 615 頁。
- 施达克, 卡尔·尼古拉(Starcke, Carl Nicolai 1858—1926)——丹麦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 305、318、323—326、330、331、412 頁。
- 施蒂納, 麦克斯(Stirner, Max 1806—1856)(卡斯巴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 的笔名)——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313、335 頁。
- 施略費尔, 古斯塔夫·阿道夫(Schlöffel, Gustav Adolf 1828 左右—1849)——德国大学生和新聞工作者, 革命者, 德国和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在战斗中牺牲。——第 20 頁。
- 施洛塞尔,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自由党人, 德国历史編纂学中海得尔堡学派領袖。——第 480 頁。
- 施納普汉斯基—利希諾夫斯基——見利希諾夫斯基, 費里克斯。
- 施奈德尔第二, 卡尔(Schneider II, Karl)——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科伦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9 年 2 月 7 日“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护人; 1849 年 2 月 8 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辯护人。——第 233、234 頁。
- 施内魏斯(Schneeweiß, K.)——奥地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 614 頁。
- 施普魯奈尔·馮·麦茨, 卡尔(Spruner von Merz, Karl 1803—1892)——德国历史学家和制图家, 曾編过許多历史地图集。——第 451 頁。
- 施泰因, 尤利烏斯(Stein, Julius 1813—1889)——西里西亚教师, 政論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第 19 頁。
- 施特克(Steck, A.)——瑞士社会民主党人, 职业是律师。——第 615 頁。
- 施特克尔, 阿道夫(Stoecker, Adolf 1835—1909)——德国教士和反动政治活动家, 基督教社会党的創建人(1878)和領袖, 接近保守党的极右派,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和反犹太主义的鼓吹者; 1881 年起是国會議員。——第 524 頁。
-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論家, 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耶穌传”一书的作者;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10、312、314、335 頁。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魯士警官, 普魯士政治警察局长(1850—1860), 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第 241、252 頁。

施土尔茨, 瓦茨拉夫(Šturc, Václav 1858—1939)——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鑄工, 后为新聞記者。——第 614 頁。

施韦泽, 約翰·巴普提斯特(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薩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1864—1867 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 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 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魯士霸权下“自上”統一德国的政策, 阻撓德国工人加入第一国际, 反对社会民主工党, 1872 年他同普魯士当局的勾結被揭露, 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 205 頁。

施因德汉斯——見毕克列尔, 約翰。

威尔逊, 丹尼尔(Wilson, Daniel 生于 1840 年)——法国政治活动家, 1871 年起是国民議會議員, 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党人, 共和国总统茹·格雷維的女婿, 参加过許多次金融舞弊; 1887—1888 年被控出卖勳章而受到司法追究。——第 263 頁。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魯士亲王, 摄政王(1858—1861), 普魯士国王(1861—1888)和德国皇帝(1871—1888)。——第 364、478、483、505、532 頁。

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普魯士国王和德国皇帝(1888—1918)。——第 433、434、572 頁。

威廉三世(Wilhelm III 1817—1890)——尼德兰国王(1849—1890)。——

第 499 頁。

威灵頓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統帥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08—1814 和 1815 年在反对拿破侖法国的战争中指揮英軍, 历任軍械总长(1818—1827), 英軍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 首相(1828—1830), 外交大臣(1834—1835)。——第 456、504 頁。

耶佩森, 卡尔·克利斯提安(Jeppesen, Karl Christian 1858—1930)——挪威社会党人, 政論家, 挪威工人党創建人之一;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615 頁。

約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奧地利女皇瑪麗-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 奧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0), 神圣羅馬帝国皇帝(1765—1790)。——第 477 頁。

祖根海姆, 賽米尔(Sugenheim, Samuel 1811—1877)——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第 64 頁。

十 画

埃尔哈特, 約翰·路德維希·阿尔伯特(Erhardt, Johann Ludwig Albert 約生于 1820 年)——德国店員,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陪審法庭宣告无罪。——第 259、260 頁。

埃尔斯納, 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西里西亚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激进派, 1848 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新奧得报”編輯之一。——第 22 頁。

- 埃卡留斯, 約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工人政論家, 职业是裁縫; 侨居伦敦, 正义者同盟盟員,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的代表; 1872年以前支持馬克思, 1872年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領袖。——第 250 頁。
- 埃斯庫罗斯 (Aischylos 公元前 525—45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古典悲剧作家。——第 75、120 頁。
- 埃斯潘納斯, 阿尔弗勒德·維克多 (Espinas, Alfred-Victor 1844—1922)——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进化論的拥护者。——第 44、45 頁。
- 班格, 安东·克利斯提安 (Bang, Anton Christian 1840—1913)——挪威神学家, 写有斯堪的那维亚神話和挪威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 157 頁。
- 班克罗夫特, 休伯特·豪 (Bancroft, Hubert Howe 1832—1918)——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写有許多北美和中美的历史和民族志方面的著作。——第 46、61、64、180 頁。
-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职业是旋工; 1867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 第一国际會員, 1867年起为国会議員, 德国社会民主党創始人和領袖之一, 曾进行反对拉薩尔派的斗争, 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場, 支持巴黎公社; 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錯誤, 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第 496、577、580、581、594、609、614 頁。
- 俾斯麦, 奥托 (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 普魯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普魯士容克的代表; 曾任駐彼得堡大使 (1859—1862) 和駐巴黎大使 (1862); 普魯士首相 (1862—1872 和 1873—1890), 北德意志联邦首相 (1867—1871) 和德意志帝国首相 (1871—1890); 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統一; 工人运动的死敌, 1878年他实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 75、197、221、227、235、238、239、260、299、300、356、360—362、364、434、474、485—495、497、501—506、509—513、515、517—522、525、526、529—532、574、583 頁。
- 恩貝尔, 阿尔丰斯 (Humbert, Alphonse 生于 1844 年)——法国社会党人, 政論家; 巴黎公社参加者, 公社被鎮压后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島, 大赦后回到法国, 1886年起为巴黎市参議會議員, 1893年起是众議院議員; 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615 頁。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傳記材料)——第 3、4、6—9、13、17、19—26、29—31、78、83、125、150、152、202、205、207、220、234、239—241、245—252、254、257—259、261—266、289、291、292、294—298、335—337、354、370、373、375、382—384、392、395、397、399、402、403、407—413、418、419、431、432、438、474、481、

- 528、534—536、539—541、543、544、564、565、571、572、609 頁。
- 哥白尼，尼古拉 (Kopernik, Nikolaus 1473—1543) ——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說的創立者。——第 317、318 頁。
- 格夫勒雷尔，奧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Gfrörer, August Friedrich 1803—1861) ——德国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許多基督教史和教会史方面的著作，曾一度追随杜宾根学派；1846 年起是夫賴堡大学教授。——第 10 頁。
- 格萊斯頓，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十九世紀下半叶是自由党領袖；曾任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 121、221、357、571 頁。
- 格勒本，卡尔 (Gröben, Karl 1788—1876) ——伯爵，普魯士將軍，曾指揮一个軍参加鎮压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1854 年起是普魯士貴族院議員。——第 367 頁。
- 格雷，約翰 (Gray, John 1798—1850) ——英国經濟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劳动貨幣”論的創始人之一。——第 211、213、217、220 頁。
- 格雷哥里(图尔的)(格雷哥里·弗洛伦修斯)(Grégoire de Tours (Gregorius Florentius) 約 540—594) ——基督教教士，神学家和历史学家，573 年起是图尔的主教；“法兰克人史”和“奇迹七卷”等书的作者。——第 159 頁。
- 格里姆佩，海尔曼 (Grimpe, Hermann)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細木工，七十年代末起侨居法国，1886 年巴黎国际工会代表會議代表。——第 576、594 頁。
- 格里伦貝格尔，卡尔 (Grillenberger, Karl 1848—1897)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工人，后为政論家，1881 年起为国会議員；九十年代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第 614 頁。
- 格林，雅科布 (Grimm, Jacob 1785—1863) ——杰出的德国語文学家和文化史家，写有許多德国語言史、法学史、神話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第 155 頁。
- 格律恩，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 ——德国政論家，四十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以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身分出現，普魯士国民議会议員；1874 年出版了路·費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遺著。——第 314 頁。
- 格罗特，乔治 (Grote, George 1794—1871) ——英国资产階級历史学家，写有多卷著作“希腊史”。——第 114—118 頁。
- 海德門，亨利·迈尔斯 (Hyndman, Henry Mayers 1842—1921) (八十年代化名为約翰·布罗德豪斯 John Broudhouse) ——英国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民主联盟的創始人 (1881) 和領袖，該联盟于 1884 年改組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中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綫，后为英国社会党領袖之一，1916 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傳被开除出党。——第 266、267、269—275、584、591、607、610 頁。
- 海尔維格，格奧尔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 ——著名的德国詩人，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1848 年二月革

- 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1848年是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以后参加了1848年4月巴登起义)组织者之一。——第254頁。
- 海涅, 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7—9、306、508頁。
- 海因茨(Heinz, T.)——奥地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614頁。
- 庫尔曼, 格奥尔格(Kuhlmann, Georg)——奥地利政府的密探; 自命是“预言者”的骗子; 四十年代用宗教的詞句对瑞士的德国魏特林派手工业者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第250頁。
- 庫郎歇·德(Coulanges de)——見甫斯特耳·德·庫郎歇, 努馬·德尼。
- 庫諾, 弗里德里希·泰奧多尔(Cuno, Friedrich Theodor 1846—1934)——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社会主义者, 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 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侨居美国, 后为美国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的领导人之一; “紐約人民报”撰稿人。——第572頁。
- 庫諾夫, 亨利希·威廉·卡尔(Cunow, Heinrich Wilhelm Karl 1862—193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 八十至九十年代追随马克思主义者; 后为修正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72頁。
- 郎格(Longos)——二世紀末至三世紀初的古希腊作家。——第90頁。
- 馬卡尔特(Mackart)——奥地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614頁。
- 馬考萊, 托馬斯(Macaulay, Thomas 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輝格党人, 議會議員。——第237頁。
- 馬克思-艾威林, 爱琳娜(Marx-Aveling, Eleanor 1855—1898)——八十至九十年代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政論家, 馬克思的女儿, 1884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子; 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 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 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 曾参加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第383、609、610頁。
- 馬克思, 卡尔(Marx,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第3、4、6—8、17、19—26、29、48、78、81、204—209、211、219、220、227、233、234、240、241、247—252、254、257—261、266、267、290、291、313、334—337、370、375、392、399、403、404、407—413、415、416、430、438、474、510、539、541、543、548、555、556、563—565、572、609、610頁。
- 馬克思, 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父姓为馮·威斯特华伦 geb. von Westphalen)——卡尔·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250頁。
- 馬拉, 让·保尔(Marat, Jean-Paul 1743—1793)——法国政論家, 十八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的领袖之一。——第23頁。
- 馬隆(Malon)——法国社会党人。——第615頁。
- 馬隆, 貝努瓦(Malon, Benoît 1841—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 第一国际会员, 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 后迁居瑞士, 追随无政府主义者;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

- 能派領袖和思想家之一。——第 541 頁。
- 馬其頓王亞歷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323)——古代著名的統帥和國家活動家。——第 72 頁。
-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領袖之一, 1849 年為羅馬共和國臨時政府首腦, 1850 年是倫敦歐洲民主主義者中央委員會組織者之一; 1864 年成立第一國際時企圖置國際於自己影響之下, 1871 年反對巴黎公社和總委員會, 阻礙意大利獨立工人運動的發展。——第 242、246、258 頁。
-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國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20、74、80、100、238、283、284、326、362、463、468、473、477、479、510、523 頁。
- 拿破侖第三 (路易-拿破侖·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國總統 (1848—1851), 法國皇帝 (1852—1870)。——第 7、227、235、290、357、358、469—471、473、474、477、486—489、491—494、497、499—503、509、513、529、532 頁。
- 涅梅切克 (Němeček, T.)——捷克工人, 社會民主黨人。——第 614 頁。
- 紐文胡斯, 斐迪南·多梅拉 (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 1846—1919)——荷蘭工人運動活動家, 荷蘭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 1888 年起為議會議員; 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副主席之一; 九十年代轉到無政府主義立場。——第 580、581、604、615 頁。
- 配第, 威廉 (Petty, William 1623—1687)——杰出的英國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 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始祖。——第 563 頁。
- 秦平, 亨利·海德 (Champion, Henry Hyde 1859—1928)——英國社會主義者, 出版者和政論家; 1887 年前社會民主聯盟盟員, 後為倫敦工聯工人選舉協會領導人之一, “工人選民”的編輯兼出版者; 曾一度同保守黨人有暗中聯繫; 九十年代流亡澳大利亞, 在該處積極參加工人運動。——第 614 頁。
- 茹柯夫斯基, 尤利·加拉克提昂諾維奇 (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俄國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論家; 國家銀行行長, 他在“卡爾·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一書”一文中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惡毒攻擊。——第 240 頁。
- 桑得, 卡爾·路德維希 (Sand, Karl Ludwig 1795—1820)——德國大學生, 德國知識界自由主義運動的參加者, 因殺死反動作家科采布被處死刑。——第 370 頁。
- 索博特卡, 阿路易斯 (Sobotka, Aloys)——捷克社會民主黨人, 職業是紡織工, 後為政論家。——第 614 頁。
- 索緒爾, 昂利 (Saussure, Henri 1829—1905)——瑞士動物學家。——第 43 頁。
- 泰勒, 塞德萊 (Taylor, Sedley 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世紀初)——英國合作運動參加者, 鼓吹工人參與資本家分紅的制度。——第 564 頁。
- 烏策卡爾 (Učekar, K.)——奧地利工人, 社會民主黨人。——第 614 頁。
- 烏爾菲拉 (或武爾菲拉) (Ulfilas (Wul-

fila) 311 左右—383) ——西哥特教会政治活动家, 主教, 使哥特人信基督教, 創造了哥特文字, 把聖經譯成哥特文。——第 145 頁。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伟大的德国作家。——第 323、555 頁。

修昔的底斯 (Thukydides 約公元前 460—395) ——古希腊历史学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第 123 頁。

十 一 画

笛卡儿, 勒奈 (Descartes, René 1596—1650) ——杰出的法国二元論哲学家, 数学家和博物学家。——第 318、320 頁。

第欧根尼 (西諾普的) (Diogenes of Sinope 約公元前 404—323) ——古希腊哲学家, 昔尼克学派創始人之一, 該学派反映了人民中貧困阶层对有产者統治的消极抗議。——第 593 頁。

都鐸王朝 (Tudor) ——英国王朝 (1485—1603)。——第 458 頁。

盖得, 茹尔 (巴集耳, 馬蒂約) (Guesde, Jules (Basile, Mathieu) 1845—1922) ——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初期是資產階級共和党人, 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者; 后为法国工人党 (1879) 創始人之一和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 好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領導人, 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590、603、605、609、615 頁。

盖尔温努斯, 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 (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 ——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海得尔堡的教授。——第 480、481 頁。

盖林 (Gerin, A.) ——奥地利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第 614 頁。

盖尤斯 (Gaius 二世紀) ——罗马法学家, 著名的罗马法系統化者。——第 69 頁。

荷馬 (Homerus) ——半傳說中的古希腊叙事詩人, “伊利亚特”和“奥德賽”的作者。——第 9、37、38、74、75、119、120 頁。

基茨, 弗兰克 (Kitz, Frank) ——英国社会党人, 社会主义同盟盟員,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614 頁。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間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內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 344 頁。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1804) ——德国古典哲学創始人, 唯心主义者, 德国資產階級思想家。——第 307、317、318、320、323、333 頁。

康普豪森, 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 ——德国銀行家, 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領袖之一; 1848 年 3—6 月任普魯士首相, 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贩卖政策。——第 482 頁。

朗格, 克利斯提安·康拉德·路德維希 (Lange, Christian Konrad Ludwig 1825—1885) ——德国語文学家, 写有許多古罗马史著作。——第 143 頁。

勒南, 厄内斯特 (Renan, Ernest 1823—1892) ——法国語文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10、256、

- 335 頁。
- 勒土尔諾, 沙尔·让·瑪丽(Letourneau, Charles-Jean-Marie 1831—1902)——法国資產階級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第 43、44、46 頁。
- 勒威耶, 烏尔本·让·約瑟夫 (Le-Verrier, Urbain-Jean-Joseph 1811—187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1846 年計算出当时还不知道的海王星的軌道, 并确定这一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第 318 頁。
- 勒泽尔, 彼得·格尔哈特 (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制雪茄烟工人; 1848—1849 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副主席;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主席,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处六年徒刑; 后来成为拉薩尔派。——第 259、260 頁。
- 琉善 (Lucianus 約 120—180) ——杰出的古希腊諷刺作家, 无神論者。——第 48 頁。
- 曼, 湯姆(Mann, Tom 1856—1941)——英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 加入社会民主联盟(1885 年起)和独立工党(1893 年起)的左翼; 八十年代末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和把非熟练工人統一成工联的組織工作; 許多次大罢工的领导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国际主义立場; 英国工人反对反苏維埃武装干涉斗争的組織者之一, 英国共产党成立(1920)时起就是該党党员; 为爭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統一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而积极斗争。——第 614 頁。
- 曼托伊費尔, 奧托·泰奧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 貴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內务大臣(1848 年 11 月—1850 年 11 月)和首相(1850—1858)。——第 232、286、287、483、521 頁。
- 梅恩, 亨利·詹姆士·薩姆納 (Maine, Henry James Sumner 1822—1888)——英国法学家和法学家史家。——第 93 頁。
- 梅尔克(Merk, A.)——瑞士工会活动家,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615 頁。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維克 (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波兰政治和軍事活动家,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曾参加 1846 年波茲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1848 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監獄释放出来; 曾领导 1848 年波茲南起义, 后来领导西西里島起义者的斗争;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間指揮革命軍;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求援; 1863 年波兰起义初期指揮起义軍, 后流亡法国。——第 367 頁。
- 梅特涅, 克雷門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派; 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 477、499 頁。
- 莫尔, 約瑟夫(Moll, Joseph 1812—184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钟表匠; 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1848 年 7—9 月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 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委員; 1848 年科伦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 不久改名回到德国, 在各地进行宣传鼓

- 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牟尔克河战役中牺牲。——第243、251、254、256頁。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 (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 ——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侖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立法議會議員 (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組織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 (1851年12月—1852年1月)，立法团議長 (1854—1856、1857—1865)。——第487頁。
-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 (Molière, Jean-Baptiste 1622—1673) (眞姓为波克兰 Poquelin) ——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191頁。
- 莫利斯，威廉 (Morris, William 1834—1896) ——英国詩人、作家和艺术家，八十年代参加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1884—1889年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起处于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之下；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604、614頁。
- 莫斯赫 (Moschos) ——公元前二世紀中叶古希腊詩人。——第90頁。
- 培尔，比埃尔 (Bayle, Pierre 1647—1706) ——法国怀疑論哲学家，宗教独断論的批評者。——第351頁。
- 威美尔曼 (Zimmermann) ——奥地利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第614頁。
- 威維利士，尤利烏斯 (Civilis, Julius 一世紀) ——日耳曼族巴达維亞人的領袖，曾領導日耳曼和高卢部落起义反对羅馬的統治 (69—70 或 69—71)。——第158頁。
- 梭伦 (Solon 約公元前 638—558) ——聞名的雅典立法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許多反对世襲貴族的法律。——第117、127、131、146、200頁。
- 梯勒，卡尔·海尔曼·馮 (Thile, Karl Hermann von 1812—1889) ——普魯士外交家，普魯士外交副大臣 (1862—1871)，德意志帝国外交副大臣 (1871—1873)。——第500頁。
- 梯也尔，路易·阿道夫 (Thiers, Louis-Adolphe 1797—1877) ——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首相 (1836、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憲議会和立法議會議員，奥尔良党人；政府首脑 (內閣总理) (1871)，共和国總統 (1871—1873)，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344、505、513頁。
-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 (Thierry, 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 ——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大致理解了物质因素和階級斗争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資本主义社会的建立的历史中的作用。——第344頁。
- 屠拉梯，菲力浦 (Turati, Filippo 1857—1932) ——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政論家，意大利社会党的創始人 (1892) 和领导人之一，后为社会党改良主义右派首領之一。——第615頁。
- 雪莱，派尔希·毕希 (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 ——杰出的英国詩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第565頁。

十二画

- 博切克 (Boček, A.) ——奥地利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第614頁。
- 斐迪南五世 (天主教徒) (Ferdinand V

- le católico 1452—1516) ——加斯梯里亞國王(1474—1504)和執政者(1507—1516), 阿臘貢國王, 稱斐迪南二世(1479—1516)。——第 64 頁。
- 斐洛(亞歷山大里亞的)(Philo of Alexandria 約公元前 20—公元 54) ——亞歷山大里亞派猶太人宗教哲學的主要代表, 對基督教神學的形成有很大影響。——第 12 頁。
- 費策妮婭·希斯帕拉(Fecenia Hispalla) ——被釋放的羅馬女奴隸。——第 141 頁。
- 費爾巴哈, 路德維希(F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 ——馬克思以前德國最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第 301、313、314、317—319、321—323、325—335、411、412 頁。
- 費爾柴耳德, 查理·斯特賓斯(Fairchild, Charles Stebbins 1842—1924) ——美國法學家和金融家, 財政部長(1887—1889)。——第 421 頁。
- 費蘭, 若爾日(Féline, Georges) ——法國工會和合作社活動家, 社會主義者, 布朗基主義者, 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代表。——第 590、615 頁。
- 費里, 茹爾·弗朗斯瓦·卡米爾(Ferry, Jules-François-Camille 1832—1893) ——法國律師, 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領袖之一; 國防政府成員, 巴黎市長(1870—1871), 積極鎮壓革命運動; 內閣總理(1880—1881、1883—1885), 奉行殖民掠奪政策。——第 263、596 頁。
- 費魯耳, 約瑟夫·安都昂·讓·弗雷德里克·厄內斯特(Ferroul, Joseph-Antoine-Jean-Frédéric-Ernest 1853—1921) ——法國醫生, 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 社會黨人, 1888 年起是眾議院議員, 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代表。——第 590、616 頁。
- 費奈迭, 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 ——德國激進政論家, 三十年代是巴黎流亡者聯盟領導人之一, 1848—1849 年是法蘭克福議會議員, 屬於左派; 1848—1849 年革命後成為自由派。——第 242 頁。
- 富爾德, 阿希爾(Fould, Achille 1800—1867) ——法國銀行家 and 國家活動家, 奧爾良黨人, 後為波拿巴主義者; 1849—1867 年曾多次任財政大臣, 後任國務大臣和皇廷事務大臣(1852—1860)。——第 488 頁。
- 傅立叶, 沙爾(Fourier, Charles 1772—1837) ——偉大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 84、177、202、547 頁。
- 賀雷西(昆圖斯·賀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 ——傑出的羅馬詩人。——第 9、430 頁。
- 黑爾富特, 恩斯特·路德維希(Herrfurth, Ernst Ludwig 1830—1900) ——普魯士國家活動家, 內務大臣(1888—1892)。——第 433 頁。
- 黑格爾, 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國古典哲學最大的代表, 客觀唯心主義者, 極全面地發展了唯心主義辯證法; 德國資產階級思想家。——第 194、305、306、309—314、316—319、321、323、329、330、335—338、340、342、343、345、411、412 頁。
- 黑克爾, 弗里德里希·卡爾(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 ——巴

- 登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北美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第366頁。
- 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弗洛伦斯 (Kelley-Wischnewetzky, Florence 1859—1932) ——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流亡国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第383、409頁。
- 凱撒(凱尤斯·尤利烏斯·凱撒) (Caius Julius Cæsar 公元前100左右—44) ——著名的羅馬統帥，国家活动家和作家；著有“高卢战记”一书。——第37、52、105、151、153、159—161、163、166頁。
- 凱，約翰·威廉 (Kaye, John William 1814—1876) ——英国殖民官和历史学家，写有印度的历史和民族志方面的著作以及英国在阿富汗和印度进行的殖民战争史方面的著作。——第52頁。
- 萊特，阿瑟 (Wright, Arthur 1803—1875) ——美国传教士，1831—1875年和印第安族塞訥卡人生活在一起，編过一部該部落的語言辞典。——第60頁。
- 普芬德，卡尔 (Pfänder, Karl 1818左右—1876) ——德国工人，細密画家，正义者同盟盟員，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50頁。
- 普郎托，弗朗斯瓦·爱德华 (Planteau, François-Édouard 生于1838年) ——法国政治活动家，激进党人，1885年起是众議院議員，1887—1889年为社会主义者，1889年起是布朗热主义者。——第590頁。
- 普列汉諾夫，格奧尔基·瓦連廷諾維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 ——杰出的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哲学家和俄国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第一个馬克思主义組織——“劳动解放社”創建人；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八十年至九十年代曾与民粹派进行斗争，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后为孟什維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615頁。
- 普林尼(凱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 ——羅馬博物学家，“博物志”(三十七卷)的作者。——第162、167頁。
- 普卢塔克 (Plutarchos 約46—125) ——古希腊作家，道德論者，唯心主义哲学家。——第76頁。
- 普罗科皮阿斯(凱撒里亚的) (Procopius of Cæsarea 五世紀末—約562) ——拜占庭历史学家，許多軍事远征的参加者，他在“查士丁尼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八卷)中描写了这些远征。——第82頁。
- 普特卡默，罗伯特·維克多 (Puttkamer, Robert Victor 1828—1900) ——普魯士反动国家活动家，內务大臣(1881—1888)，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組織者之一。——第483頁。
-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 (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 ——德国资产阶级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属于

- 中間派左翼；六十年代是資產階級進步黨的首領之一；他企圖用組織合作社的辦法來使工人脫離革命鬥爭。——第 22 頁。
- 舒馬赫，格奧爾格(Schumacher, Georg 生于 1844 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職業是制革工人，後為商人，1884 年起是國會議員，屬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派，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代表；1898 年國會選舉時轉向自由黨人方面，因此被開除出社會民主黨。——第 614 頁。
- 斯捷普尼亞克——見克拉夫欽斯基，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
- 斯密，亞當(Smith, Adam 1723—1790)——英國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大代表之一。——第 415、547、558、562、563 頁。
- 斯密斯，阿道夫(斯密斯·赫丁利)(Smith, Adolph(Smith Headingley))——英國社會黨人，記者，1871 年加入敵視第一國際總委員會的倫敦 1871 年法國人支部；八十年代起是社會民主聯盟盟員，接近法國可能派，曾發表反對馬克思和他的擁護者的污蔑性文章。——第 435 頁。
- 斯廷斯特蘭德(Steenstrand)——荷蘭商業家，在英國的商人。——第 442 頁。
- 湯普遜，威廉(Thompson, William 1785 左右—1833)——愛爾蘭經濟學家，利用李嘉圖的理論來論證社會主義；歐文的信徒。——第 207、557—565 頁。
- 提比利烏斯(Tiberius 公元前 42—公元 37)——羅馬皇帝(14—37)。——第 15、145 頁。
- 雅克，愛德華·路易·奧古斯特(Jacques, Édouard-Louis-Auguste 生于 1828 年)——法國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企業主，溫和的共和黨人；1871 年起是巴黎市參議會議員，1887 年起是塞納省總委員會主席，1889 年 1 月是聯合起來的資產階級共和黨人的眾議院議員候選人。——第 584、596 頁。
- 雅克拉爾，沙爾·維克多(Jaclard, Charles-Victor 1843—1903)——法國社會黨人，布朗基主義者，政論家，第一國際會員，巴黎公社的積極活動家；公社被鎮壓後流亡瑞士，後遷居俄國；1880 年大赦後回到法國，繼續參加社會主義運動。——第 590、614、615 頁。
-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 Abraham 1830—1919)——德國醫生，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科倫共產黨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審法庭宣告無罪，但因被控“侮辱國王陛下”而繼續被監禁；1853 年流亡英國，後又遷居美國，在美國的刊物上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站在北部方面參加美國內戰；後為紐約醫學科學院院長(1885—1889)；許多醫學院的教授和院長，寫有許多醫學著作。——第 259、260 頁。
- 雅羅斯拉夫(智者)(Ярослав Мудрый 978—1054)——基輔大公(1019—1054)。——第 71 頁。

十三 画

- 奧博爾斯基，路德維克(Oborski, Ludwik 1787—1873)——波蘭上校，革命家，1830—1831 年波蘭起義的參加者，流亡倫敦，國際性民主團體“民主派兄弟協會”的活動家，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時為革命軍師長。——第 397 頁。
- 奧多亞克(Odovakar(Odoaker)434 左右—493)——西羅馬皇帝的日耳曼僱傭

- 兵首領之一；476年推翻了皇帝罗慕洛·奥古斯图路，成为意大利境内第一个“蛮族”王国的国王。——第164頁。
- 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浦·阿尔伯，巴黎伯爵(Louis-Philippe-Albert, comte de Paris 1838—1894)——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孙子，法国王位追求者，称菲利浦七世。——第362頁。
- 奥尔良王朝(Orléans)——法国王朝(1830—1848)。——第362頁。
- 奥尔斯瓦特，汉斯·阿道夫·埃尔德曼(Auerswald, Hans Adolf Erdmann 1792—1848)——普鲁士将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时被人民打死。——第7頁。
-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因行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472頁。
- 奥古斯都(Augustus 公元前63—公元前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第15、138、140、167頁。
- 奥古斯滕堡，弗里德里希(弗雷德里克)(Augustenburg, Friedrich 1829—1880)——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宗德堡-奥古斯滕堡亲王，1852年起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王位追求者；1863年起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大公，称弗里德里希八世。——第490頁。
- 奥里珈(Ольга 死于969年)——基辅女大公，945年起(她的丈夫伊哥尔死后，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伊哥列维奇年幼时)执掌古代俄罗斯国家。——第153頁。
- 奥托(马可·萨耳维·奥托)(Marcus Salvius Otho 32—69)——罗马国家活动家，卢济塔尼亚省(比利牛斯半岛西南部)总督(执政者)；69年1月他趁军队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统治的时机策动禁卫兵推翻加尔巴，加尔巴被杀后被推为皇帝；69年4月在绵延不绝的内战中战败后自杀。——第15頁。
- 奥托，卡尔·乌尼巴特(Otto, Karl Wunibald 约生于1809年)——德国化学家，1848—1849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第259、260頁。
- 奥托一世(Otto I 912—973)——日耳曼王(936—973)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962—973)。——第460頁。
- 奥沙尼娜，玛丽亚·尼古拉也夫娜(Ошанина, 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1853—1898)(父姓为奥洛维尼科娃 Оловеникова)——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82年起侨居巴黎，为“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国外代表。——第539—541頁。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佣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中作了揭露。——第320、397、399頁。
- 葛德文，威廉(Godwin, William 1756—1836)——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 557、565 頁。

雷尼奧, 埃利阿斯(Regnault, Elias 1801—1868)——法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政論家。——第 222 頁。

雷提(Reties)——法国社会党人, 可能派。——第 596 頁。

路德, 馬丁(Lü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創始人; 德国市民階級思想家; 在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 站在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貧民。——第 350 頁。

路易·波拿巴——見拿破侖第三。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1830—1848)。——第 242、263、264 頁。

路易-拿破侖——見拿破侖第三。

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第 457 頁。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 351、506、513 頁。

蒙森, 泰奥多尔(Mommsen, Theodor 1817—1903)——著名的德国資產階級历史学家, 写有許多古羅馬史著作。——第 116、140—142、144、145 頁。

蒙索(Monceau)——法国工会活动家,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 590 頁。

塞尔維烏斯·土利烏斯(Servius Tullius 公元前 578—534)——半傳說中的古羅馬第六个国王。——第 146 頁。

塞涅卡(魯齊烏斯·安涅烏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公元前 4 左右—公元 65)——羅馬哲学家, 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所謂新斯多葛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反动的唯心主

义伦理学学說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有过影响。——第 12 頁。

塞薩納, 恩利科(Sesana, Enrico)——意大利社会党人。——第 615 頁。

塔克文(高傲的)(Tarquinius Superbus 公元前 534—約 509)——半傳說中的古羅馬最后一个(第七个)王, 据傳說人民起义把他驅逐出羅馬, 废除了王政, 建立起共和制度。——第 145、148 頁。

塔西佗(普卜利烏斯·科尔奈利烏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約 55—120)——羅馬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編年史”的作者。——第 14、31、37、81、107、156—164、166 頁。

十四画

歌德, 約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 同时, 因写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而著名。——第 9、48、307、310、321、511 頁。

豪普特, 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約生于 1831 年)——德国店員,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捕者之一, 在偵查期間变节招供, 在审判前由警察局释放, 逃往巴西。——第 259 頁。

豪伊特, 阿尔弗勒德·威廉(Howitt, Alfred William 1830—1908)——英国的澳大利亚民族学家, 駐澳大利亚的殖民官(1862—1901); 写有許多关于澳大利亚各部落的著作, 1871 年起同劳·法森合作, 著有“卡米拉罗依人和庫尔納依人”和“庫尔納依部落及其平时和战时的习俗”。——第 56 頁。

赫夫內尔, 弗里德里希·爱德华·亚历

山大 (Höpfnér, Friedrich Eduard Alexander 1797—1858) ——普魯士將軍, 軍事著作家。——第 400 頁。

赫爾岑,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 ——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 唯物主義哲學家, 政論家和作家; 1847 年僑居國外, 在國外建立了“俄國自由印刷所”, 並出版“北極星”文集和“鐘聲”報。——第 399、407 頁。

蒲魯東, 比埃爾·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國政論家, 經濟學家 and 社會學家, 小資產階級思想家, 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之一。——第 205—207、211、213、217、255、335、373—376、404、553—556 頁。

維爾穆特 (Wermuth) ——漢諾威警察廳長,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2) 的證人; 與施梯伯合編“十九世紀共產主義者的陰謀”一書。——第 241、252 頁。

維爾特, 斐迪南 (Weerth, Ferdinand 1774—1836) ——德國牧師, 利珀河公國教會管理委員會教區監督; 格奧爾格·維爾特之父。——第 6 頁。

維爾特, 格奧爾格 (Weerth, Georg 1822—1856) ——德國無產階級詩人和政論家,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1848—1849 年為“新萊茵報”的編輯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5—9、466 頁。

維利希, 奧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 ——普魯士軍官, 因政治信仰退職,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 是 1850 年從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出來的冒險主義宗派集團的領袖之一; 1853 年流亡美國, 站在北部方面參加美國內戰。——第 26、256、257、259、260、366、544

頁。

維內爾 (Wiener) ——奧地利工人, 社會民主黨人。——第 614 頁。

十五画

德夫朗切斯基, 朱澤培 (Defrancechi, Giuseppe) ——意大利社會主義者。——第 615 頁。

德拉庫里斯, 普拉東 (Drakulis, Platon) ——希臘社會主義者, 政論家。——第 615 頁。

黎塞留公爵, 阿爾芒·讓·杜·普勒西 (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 ——法國專制政體時期最著名的國家活動家, 紅衣主教。——第 506 頁。

魯賽耳, 斐迪南 (Roussel, Ferdinand 生于 1839 年) ——法國社會黨人和工會活動家, 職業是裁縫, 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代表。——第 536、615 頁。

摩爾根, 路易斯·亨利 (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 ——傑出的美國民族學家, 考古學家和原始社會史學家, 自發的唯物主義者。——第 27、29—32、34、38、39、41、42、47、49、50、54、58、78、97—100、103、110、117、121、123、125、134、143、144、153、159、179、202、203 頁。

摩萊肖特, 雅科布 (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 ——資產階級生理學家和哲學家, 庸俗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 生于荷蘭; 曾在德國、瑞士和意大利的學校中任教。——第 319、320 頁。

十六画

鮑爾, 斐迪南·克利斯提安 (Baur, Fer-

- dinand Christian 1792—1860)——德國神學家和基督教史學家，杜賓根學派的領袖，杜賓根的教授。——第 10 頁。
- 鮑格雷夫，羅伯特·哈利·英格利斯 (Palgrave, Robert Harry Inglis 1827—1919) ——英國銀行家和經濟學家，“經濟學家”雜誌的出版者 (1877—1883)。——第 230 頁。
- 鮑威爾，布魯諾 (Bauer, Bruno 1809—1882) ——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著名的青年黑格爾分子之一，資產階級激進派；1866 年後成為民族自由黨人；寫有許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 312、314、335 頁。
- 鮑威爾，亨利希 (Bauer, Heinrich) ——德國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之一，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職業是鞋匠；1851 年流亡澳大利亞。——第 242、243、254、257、259 頁。
- 霍布斯，托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 ——杰出的英國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具有鮮明的反民主的傾向。——第 318 頁。
- 霍爾，查理 (Hall, Charles 約 1745—1825) ——英國經濟學家，空想社會主義者，“文明對歐洲各國居民的影響”一書的作者。——第 557、565 頁。
- 霍夫曼·馮·法勒斯累本，奧古斯特·亨利希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August Heinrich 1798—1874) ——德國資產階級詩人和語文學家。——第 468 頁。
- 霍夫曼，諾伯特 (Hoffmann, Norbert)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職業是琥珀匠。——第 614 頁。
- 霍亨施陶芬王朝 (Hohenstaufen) ——所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朝 (1138—1254)。——第 460、467 頁。
- 霍亨索倫，列奧波特 (Hohenzollern, Leopold) ——親王，1885 年起為公爵，霍亨索倫王室代表人物之一，1870 年是西班牙王位追求者。——第 500—501 頁。
- 霍亨索倫王朝 (Hohenzollern) ——勃蘭登堡選帝侯世家 (1415—1701)、普魯士王朝 (1701—1918) 和德意志皇朝 (1871—1918)。——第 24、474 頁。
- 霍吉斯金，托馬斯 (Hodgskin, Thomas 1787—1869) ——英國經濟學家和政論家；他從空想社會主義的立場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批判資本主義，他利用李嘉圖的理論來論證社會主義。——第 207、564 頁。
- 霍伊塞爾，路德維希 (Häusser, Ludwig 1818—1867) ——德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自由黨人，海得爾堡的教授。——第 480 頁。
- 霍伊斯勒，安得列阿斯 (Heusler, Andreas 1834—1921) ——瑞士資產階級法學家，巴塞爾的教授，寫有許多瑞士和德國法律方面的著作。——第 71 頁。
- 賴德律-洛蘭，亞歷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 ——法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領袖之一，“改革報”編輯；1848 年是臨時政府成員，制憲議會和立法會議員，在議會中領導山岳黨；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遊行後流亡英國，在倫敦的小資產階級流亡者領導人之一。——第 258 頁。
- 賴夫，威廉·約瑟夫 (Reiff, Wilhelm Joseph 約生於 1822 年) ——科倫工人

联合会會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1850年被开除出同盟，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被告人之一，被判处五年徒刑。——第259、260頁。

賴歇耳，亚历山大(Reichel, Alexander 1853—1921)——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律师。——第580、581、615頁。

穆尔，賽米尔(Moore, Samuel 1830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會員，曾將“資本論”第一卷(与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譯成英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10頁。

諾特柴克，彼得(Nothjung, Peter 1823左右—1866)——德国裁縫，科伦工人联合会會員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第259、260頁。

諾維柯娃，奧里珈·阿列克謝也夫娜(Новикова, Ольга Алексеевна 1840—1925)——俄国女政論家，长时期住在英国，七十年代在格萊斯頓內閣时期实际上充当俄国政府的外交代表。——第221頁。

十七画

謝尔諾-索洛維也維奇，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維奇(Серно-Соловье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8—1869)——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隨者，曾参加六十年代

初俄国的革命运动，后侨居日内瓦，第一国际會員，瑞士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第399頁。

十八画

薩耳維安(Salvianus 約390—484)——基督教传教士和著作家，馬賽的教士，“論上帝的治理”一书的作者。——第171、174頁。

薩米托，阿耳迪西奧(Sammito, Aldisio)——意大利社会党人。——第615頁。

薩瓦王朝——意大利王朝之一，1720年至1861年統治撒丁王国，1861年至1946年統治統一的意大利王国。——第474頁。

魏古尼，安东(Weiguny, Anton 1851—1914)——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裁縫，后为政論家，1907年起为下院議員。——第614頁。

魏勒妲(Veleda 一世紀)——日耳曼族布魯克泰人的女祭司和女預言家，曾积极参加威維利斯酋长领导的日耳曼和高卢部落反对罗马統治的起义(69—70或69—71)。——第158頁。

魏特林，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論家之一；职业是裁縫。——第206、244—247、249、250、257、259、408頁。

文学作品和神話中的人物

四画

木利奧斯——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人

物之一，使者。——第122頁。

以諾——据傳說是未收入聖經的以諾书的作者。——第13頁。

五 画

布龙希耳德（布林希耳德）——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国長詩“尼貝龍根之歌”中的人物，冰島國女王，后为勃艮第人國王貢特爾的妻子。——第 91 頁。

弗萊雅——古斯堪的那維亞神話中的農神和愛神，古斯堪的那維亞民間敘事詩“老艾達”中的人物，為自己的兄弟弗萊爾神的妻子。——第 48 頁。

古德龍——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主要人物，也是十三世紀中古德國長詩“古德龍”中的主要人物，黑蓋林格人國王黑特耳和愛爾蘭的希爾達的女兒；西蘭島黑爾維希的未婚妻；被諾曼人哈爾特木特搶走，因不從他的婚事而被囚十三年；最后得到黑爾維希的解救，成為他的妻子。——第 91 頁。

加尼米德——古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被諸神竊至奧林帕斯山，成為宙斯鍾愛的人和司酒童。——第 77 頁。

尼奧德爾——古斯堪的那維亞神話中的農神，古斯堪的那維亞民間敘事詩“老艾達”中的人物。——第 48 頁。

六 画

達夫尼斯——郎格（二至三世紀）的古希臘小說“達夫尼斯和赫格亞”中的人物，熱戀中的牧人的典型。——第 90 頁。

灰姑娘——在許多民族中流傳大家喜愛的童話中的女主人公，一個受虐待的溫柔而勤勞的姑娘。——第 244 頁。

米莉塔——伊施塔爾的古希臘名字，巴比倫神話中的愛神和農神。——第 62 頁。

齊格班特（愛爾蘭的）——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人物，也是十三世紀中古德

國長詩“古德龍”中的人物，愛爾蘭人國王。——第 91 頁。

齊格弗里特——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中古德國長詩“尼貝龍根之歌”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91 頁。

齊格弗里特（莫爾蘭的）——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人物，也是十三世紀中古德國長詩“古德龍”中的人物，為古德龍所拒絕的求婚者之一。——第 91 頁。

喬治·唐丹——莫里哀的喜劇“喬治·唐丹，或被欺騙的男子”中的主角，憨頭憨腦的富裕農民的典型，同一個巧妙地欺騙他的破產的貴族女人結了婚。——第 191 頁。

西芙——古斯堪的那維亞神話中雷神托爾的妻子，古斯堪的那維亞民間敘事詩“老艾達”中的人物之一。——第 155 頁。

亞伯拉罕——據聖經傳說，是古猶太人的族長。——第 65 頁。

亞爾古船英雄——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曾乘“亞爾古”船前往科耳希達尋求由巨龍看守的金羊毛。——第 156 頁。

亞加米農——古希臘神話傳說中的阿爾哥斯國王，“伊利亞特”中的人物之一，特洛伊戰爭時希臘軍隊的領袖；埃斯庫羅斯同名悲劇中的人物。——第 74、75、118、121、122 頁。

伊托克利斯——古希臘神話中忒拜國王奧狄浦斯的兒子，他同他的弟弟波呂涅克斯爭奪底比斯王位，在對陣中兩人互傷身死；埃斯庫羅斯根據這個神話故事寫成悲劇“七雄攻打忒拜”。——第 120 頁。

尤瑪士——荷馬長詩“奧德賽”中的人物之一，伊大卡島國王奧德賽的放豬人，

在奧德賽多年流浪在外期間始終忠實于自己的主人。——第 122 頁。

七 画

但以理——聖經中的先知，据傳說是聖經中但以理书的作者。——第 13 頁。

克里姆希耳德——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國長詩“尼貝龍根之歌”中的人物，勃艮第人國王貢特爾的妹妹，齊格弗里特的未婚妻，后为其妻子，齊格弗里特死后为匈奴人國王埃特策耳的妻子。——第 91 頁。

克利奧帕特腊——古希臘神話中北風神博雷阿的女兒。——第 156 頁。

希爾達——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人物，也是十三世紀中古德國長詩“古德龍”中的人物，愛爾蘭國王的女兒，黑蓋林格人國王黑特耳的妻子。——第 91 頁。

希爾德布蘭德——古日耳曼英雄史詩“希爾德布蘭德之歌”中的主要人物。——第 155 頁。

八 画

阿耳泰婭——古希臘神話中國王鐵斯忒士的女兒，梅里格爾的母親。——第 156 頁。

阿芙羅狄蒂——古希臘神話中的愛神和美神。——第 79 頁。

阿基里斯——古希臘神話中圍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臘英雄，荷馬“伊利亞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 74、122、230 頁。

阿娜伊蒂斯——古希臘神話中水神和農神阿娜希塔的古希臘名字，對阿娜希塔的崇奉盛行在阿爾明尼亞，在那里人們把她的形象和小亞細亞的女農神的形

象合而為一。——第 62、79 頁。

阿斯塔爾塔——腓尼基神話中的農神和愛神阿施托蕾絲的古希臘名字。——第 61 頁。

阿塔·特洛爾——熊，海涅同名諷刺詩中的主要人物。——第 7 頁。

波呂涅克斯——古希臘神話中忒拜國王奧狄浦斯的兒子，他同他的哥哥伊托克利斯爭奪忒拜王位，在對陣中兩人互傷身死；埃斯庫羅斯根據這個神話故事寫成悲劇“七雄攻打忒拜”。——第 120 頁。

拉達曼——古希臘神話中的賢明公正的法官。——第 333 頁。

羅慕洛——傳說中的古羅馬的奠基人和第一個國王。——第 139、144 頁。

奈斯托爾——希臘神話中參加特洛伊戰爭的希臘英雄中最老最賢明的英雄。——第 118 頁。

宙斯——古希臘神話中最高的神。——第 122、310 頁。

九 画

哈杜布蘭德——古日耳曼英雄史詩“希爾德布蘭德之歌”中的人物之一，是這一史詩中的主人公希爾德布蘭德的兒子。——第 155 頁。

哈爾特木特——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人物，也是十三世紀中古德國長詩“古德龍”中的人物，諾曼人國王的兒子，古德龍所拒絕的求婚者之一。——第 91 頁。

珈桑德拉——古希臘神話中特洛伊國王柏里亞的女兒，女預言家；特洛伊攻陷后被亞加米農當做奴隸帶走；埃斯庫羅斯的悲劇“亞加米農”中的人物之一。——第 75 頁。

洛基——古斯堪的那維亞神話中的惡魔，火神，古斯堪的那維亞民間敘事詩“老艾達”中的人物。——第 48 頁。

施納普漢斯基——海涅的“阿塔·特洛爾”和維爾特的“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漢斯基的生平事跡”中的諷刺人物；普漢士反動分子利希諾夫斯基公爵是這一類人物的典型。——第 7、238 頁。

耶洗別——據約約傳說，是暴虐殘忍的以色列王后，廢古猶太教，改奉阿斯塔爾塔女神；耶洗別這個名字在新約啟示錄中作為淫亂和賣神的化身。——第 11 頁。

約翰——據傳說是四福音之一約翰福音的作者。——第 13 頁。

約翰——據傳說是聖經中啟示錄（默示錄）的作者。——第 13—16 頁。

約翰——據傳說是收入新約的約翰三書的作者。——第 13 頁。

約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代名詞；1712 年啟蒙作家阿伯什諾特的政治諷刺作品“約翰牛傳”問世後，這個代名詞就流傳開了。——第 415 頁。

十 画

埃策耳——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國長詩“尼貝龍根之歌”中的人物，匈奴人國王。——第 91 頁。

埃吉麗亞——按羅馬神話是一位聰慧的有預知能力的女神，常暗中向羅馬王努瑪·龐皮利烏斯出謀獻策。——第 564 頁。

貢特爾——古日耳曼敘事詩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國的長詩“尼貝龍根之歌”中的人物，勃艮第人國王。——第 91 頁。

海格立斯——古希臘神話中為大家喜

愛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氣和勇武的功績著稱。——第 156 頁。

唐·吉訶德——塞萬提斯同名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第 518 頁。

特夫克爾——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人物，曾參加特洛伊城的戰鬥。——第 75 頁。

特里曼珠——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人物，伊大卡島國王奧德賽的兒子。——第 74 頁。

鐵斯特士——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傳說中的埃托利亞地方的普洛伊朗的國王。——第 156 頁。

鐵拉孟——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之一，遠征特洛伊的參加者。——第 75 頁。

烏黛（挪威的）——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人物，也是十三世紀中古德國長詩“古德龍”中的人物。——第 91 頁。

十一 画

基督（耶穌基督）——傳說中的基督教的創始人。——第 12、14 頁。

梅里格爾——古希臘神話中亞尼雅士（傳說中的卡利登城國王）和阿耳泰婭的兒子，殺死了自己的舅舅們。——第 156 頁。

十二 画

博雷阿德——古希臘神話中的北風神博雷阿和雅典公主奧萊蒂婭的兒子。——第 156 頁。

菲尼士——古希臘神話中的盲預言家；由於聽從了第二個妻子的慫恿，他殘酷地折磨第一次同博雷阿的女兒克利奧帕特爾結婚所生的孩子，因此受到諸神的懲罰。——第 156 頁。

黑爾維希——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

人物，也是十三世紀中古德意志長詩“古德龍”中的人物，西蘭島國王，古德龍的求婚者，後為她的丈夫。——第 91 頁。

黑特耳——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人物，也是十三世紀中古德意志長詩“古德龍”中的人物，黑蓋林格人國王。——第 91 頁。

普羅克拉斯提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身材高大的強盜，他把旅客誘來後強使躺臥床上，若比床長則砍足，短則拉長。——第 555、558 頁。

提修斯——古希臘神話中最主要人物之一，傳說中的雅典國王，人們認為雅典國家是他奠基的。——第 126 頁。

十三画

奧德賽——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的主人公，傳說中的伊大卡島國王，特洛伊戰爭時希臘軍隊領袖之一，以大胆、機智和善辯著稱。——第 121、122 頁。

福耳克爾——古日耳曼民間敘事詩中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古德意志長詩“尼貝龍

根之歌”中的人物之一，騎士和音樂家。——第 370 頁。

十四画

赫洛婭——郎格（二至三世紀）的古希臘小說“達夫尼斯和赫洛婭”中的人物，熱戀中的牧女的典型。——第 90 頁。

十五画

德羅斯特-菲舍林——德國民間諷刺歌曲中的人物。——第 482 頁。

德莫多克——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人物之一，傳說中的法雅西亞人國王阿爾基諾斯宮廷中的盲歌手。——第 122 頁。

摩西——據聖經傳說，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帶領古猶太人擺脫了埃及的奴役，並給他們立下了約法。——第 12、65 頁。

十九画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劇“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48、307 頁。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莱比錫出版。——第 372、373、399 頁。
 “人民論壇报”(《*Der Volks-Tribun*》)——紐約出版。——第 249 頁。
 “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巴黎出版。——第 23 頁。
 “人人权利报”(《*Recht voor Allen*》)——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 575 頁。
 “十字报”(《*Kreuz-Zeitung*》)——見“新普魯士报”。

三 画

- “工人辯護士报”(《*Workmen's Advocates*》)——紐約出版。——第 574 頁。
 “工人党报”(《*Parti Ouwriers*》)——巴黎出版。——第 584 頁。
 “工人領袖”(《*The Labour Leader*》)——卡姆諾克、倫敦出版。——第 434 頁。
 “工人选民”(《*The Labour Electors*》)——倫敦出版。——第 437、438、586、587、590、593 頁。

四 画

- “公益”(《*The Commonwealth*》)——倫敦出版。——第 231、276、298、355、590 頁。
 “今日”(《*To-day*》)——倫敦出版。——第 266 頁。

五 画

- “北方通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圣彼得堡出版。——第 240 頁。

-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里子、倫敦出版。——第 248 頁。
 “外国”(《*Das Ausland*》)——斯图加特出版。——第 72 頁。
 “未来报”(《*Die Zukunft*》)——科尼斯堡、柏林出版。——第 399 頁。
 “正义报”(《*Justice*》)——倫敦出版。——第 573—575、579、582—584、586、591、592、607—610 頁。

六 画

- “地球报”(《*Le Globe*》)——巴黎出版。——第 556 頁。
 “伍德赫爾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紐約出版。——第 407 頁。
 “先驅”(《*Der Vorbote*》)——日內瓦出版。——第 369 頁。

七 画

-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出版。——第 248 頁。
 “进步”(《*Progress*》)——倫敦出版。——第 16 頁。
 “劳动旗帜”(《*The Labor Standard*》)——紐約出版。——第 431 頁。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柏林出版。——第 205 頁。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苏黎世、倫敦出版。——第 9、26、223、261、371、382、392、399、444、483、573—575、583、585、590、609 頁。
 “社会主义者”(《*Социал.ист.*》)——巴黎

出版。——第 615 頁。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巴黎出版。——第 263—265、300、364、395、407、544 頁。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紐約出版。——第 407 頁。

“社会主义者报”(《*Der Sozialist*》)——紐約出版。——第 574、576 頁。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馬德里出版。——第 437 頁。

“时代”(《*Time*》)——伦敦出版。——第 383 頁。

八 画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第 235 頁。

九 画

“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blatt*》)——第 590 頁。

“紅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伦敦出版。——第 403 頁。

“前进报”(《*Vorwärts*》)——巴黎出版。——第 244 頁。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26、266、504 頁。

“科学”(《*Sciences*》)——美国出版。——第 352 頁。

“派尔-麦尔新聞”(《*The Pall Mall Gazette*》)——伦敦出版。——第 221 頁。

“星报”(《*The Star*》)——伦敦出版。——第 435 頁。

“钟声”(《*Колокол*》)——伦敦、日内瓦出版。——第 407 頁。

十 画

“伦敦自由新聞”(《*Londoner Freie Presse*》)——第 574 頁。

“紐約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tung*》)

——第 354、571、572 頁。

十一 画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497 頁。

“密苏里共和党人报”(《*Missouri Republican*》)——圣路易斯出版。——第 354 頁。

十二 画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伦出版。——第 312、481 頁。

十三 画

“新萊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第 6—9、17、19—21、24—26、204、234、255、287、543 頁。

“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伦敦、汉堡出版。——第 258 頁。

“新普魯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22、235 頁。

“新时代”(《*Die Neue Zeit*》)——斯图加特出版。——第 220、231、301、412、431、461、528、533、548、568 頁。

十五 画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出版。——第 247 頁。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萊比錫出版。——第 312 頁。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第 248 頁。

地名索引*

二 画

七日規——見倫敦。

三 画

大湖——第 166 頁。
 大西洋——第 296、449、450 頁。
 凡尔登——第 170、452 頁。
 凡尔賽——第 513 頁。
 士瓦本——历史区。——第 278 頁。
 土耳其——第 356、357、362、398、469、470 頁。
 小爱尔兰——曼彻斯特的街区。——第 294 頁。

四 画

巴登, 巴登公国——第 25、204、238、365、370、396、397、494、542、543 頁。
 巴登魏勒尔——德国的居民点。——第 399 頁。
 巴尔干半島——第 222 頁。
 巴伐利亚——第 238、494、522 頁。
 巴伐利亚普法尔茨——見普法尔茨。
 巴拉圭——第 63 頁。
 巴拉克拉瓦——第 398 頁。
 巴勒斯坦——历史区。——第 11 頁。

巴黎——第 18、24、26、41、174、205、242、243、245—247、251、252、254—256、299、355、370、372、381、386、397、403、436、437、472、483、497、500、504、505、513、529、543、575、576、578—583、585—598、600、601、605—607、609、610、613、615、616 頁。

巴利阿里群島——第 63 頁。

巴門(烏培河谷)——第 372 頁。

巴塞尔——第 158、473、479 頁。

比利牛斯半島——第 457 頁。

比利时——第 229、370、374、375、392、404、434、450、451、456、498、506、509、581、588、614 頁。

不列顛——第 167 頁。

丹麦——第 392、400、459、484、485、489、490、502 頁。

厄尔河岸阿姆布兰庫尔(阿姆布兰庫尔)——第 452 頁。

厄尔士山脉——第 277、377 頁。

日德兰半島——第 489 頁。

日内瓦——第 350、365、369、370、397—399、407 頁。

什列斯維希——第 162、167、485、489、490 頁。

五河——見旁遮普。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 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 則加有簡短の説明。——編者注

五 画

白令海峡——第 46 頁。
 北海——第 167、449 頁。
 北明翰——第 230 頁。
 布尔日——第 597 頁。
 布拉格——第 614 頁。
 布萊得弗德——第 6、7、372 頁。
 布兰肯洛赫——第 397 頁。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255、259、396 頁。
 布列頓——第 367 頁。
 布列塔尼——第 508 頁。
 布隆(布尔諾)——第 614 頁。
 布魯塞爾——第 4、6、204、247—252、255、409、411、413、415 頁。
 布宜諾斯艾利斯——第 614 頁。
 东普魯士——第 278、279、284 頁。
 东头——見倫敦。
 弗兰德——历史区。——第 449 頁。
 汉堡——第 8、255、258、292、441 頁。
 汉諾威——第 236、479 頁。
 加来——第 397、597 頁。
 加利福尼亚——第 61、261、293、300、407、417、464、515 頁。
 加利西亚——历史区。——第 457 頁。
 加斯梯里亚——历史区。——第 64 頁。
 卡尔斯卢厄——第 366—368、396、397、399 頁。
 卡諾薩——第 532 頁。
 兰道——第 494 頁。
 立陶宛——第 458 頁。
 卢昂——索恩—卢瓦尔省的区。——第 71 頁。
 卢森堡——第 233、494、498—500、509 頁。
 尼喀河——第 366、397 頁。

尼斯——第 472、492、509 頁。
 尼韦尔內——历史区。——第 71、153 頁。
 尼西亚(伊茲尼克)——小亚細亚的城市。——第 349 頁。
 皮蒙特——第 470、472、481、492 頁。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18、540、615 頁。
 圣加伦——第 577 頁。
 圣路易斯——第 354 頁。
 圣斯蒂凡諾(耶希耳克伊)——第 356、358 頁。
 圣亚田——第 576 頁。
 田納西——美国的州。——第 259 頁。
 瓦格霍伊泽尔——德国的居民点。——第 367 頁。
 幼发拉底河——第 36、65 頁。

六 画

艾宾根——第 367 頁。
 艾費耳——第 377 頁。
 艾契(阿迪杰)河——第 468 頁。
 安斯巴赫——德意志的侯国。——第 506 頁。
 安特卫普——第 441 頁。
 达达尼尔海峡——第 362 頁。
 达尔馬威亞——历史区。——第 357、437 頁。
 达令河——第 55 頁。
 地中海——第 62、168、170、362、449 頁。
 多瑙河——第 153、162、167、361 頁。
 多瑙河各公国——第 469 頁。
 多維尔海峡(加来海峡)——第 266 頁。
 伏尔姆斯——第 370 頁。
 刚果——第 230 頁。
 圭亚那——第 315 頁。
 华沙——第 400、464、490、615 頁。
 吉森——第 242 頁。

米兰——第 24、168、615 頁。
 牟尔克河——第 256、368、397、544 頁。
 汝拉地区——第 369 頁。
 色当——第 283、502 頁。
 色雷斯——历史区。——第 156 頁。
 西伯利亚——第 261、300、407 頁。
 西班牙——第 7、8、168、170、236、350、
 374、375、392、404、456、457、460、500、
 501、604、614 頁。
 西里西亚——第 255、278、280、284、286、
 377、434、436、465、468、493、513、527
 頁。
 西西里島——第 369、615 頁。
 西印度——第 7 頁。
 西藏——第 73 頁。
 匈牙利——第 24、25、204、227、235、356、
 463、464、472、478、529、615 頁。
 亚得利亚海——第 472 頁。
 亚尔薩斯省——第 357、363、498、505—
 508、510—512、529、530、614 頁。
 亚該亚——古羅馬行省。——第 14 頁。
 亚克薩尔特河(錫尔河)——第 36、65 頁。
 亚細亚——羅馬行省，在小亚細亚西部。
 ——第 11、14 頁。
 伊佩庫尔——法国的居民点。——第 452
 頁。
 伊塞隆——第 25、204、542 頁。
 伊斯的利亚——第 357 頁。
 印度——第 36、40、62、63、72、73、79、94、
 183、275、293、358、414、450 頁。
 印度支那半島——第 46 頁。
 印度斯坦半島——第 40 頁。

七 画

伯尔尼——第 613 頁。
 伯尔尼——瑞士的州。——第 365 頁。
 伯桑松——第 366 頁。

貝耳特海峽——大貝耳特海峽和小貝耳
 特海峽。——第 468 頁。
 杜拉赫——第 367、368、371 頁。
 佛日山脉——第 507、509 頁。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168、
 356、357、359、360、362、407、511 頁。
 克拉根富特——第 614 頁。
 克腊曹(赫腊斯塔瓦)——第 614 頁。
 克雷弗尔德——第 426 頁。
 克雷西——法国的居民点。——第 457
 頁。
 克里木——第 359、469、470 頁。
 克罗地亚——第 437 頁。
 克尼林根——德国的居民点。——第 397
 頁。
 里昂——第 355、426、579、597 頁。
 里沃夫——第 614 頁。
 里約热內卢——第 259 頁。
 里子——第 372 頁。
 利珀河——第 158 頁。
 利尔——第 579、597 頁。
 利物浦——第 398、441 頁。
 呂恩比——丹麦的居民点。——第 489
 頁。
 麦士河——第 452、468 頁。
 麦茨——第 505、509 頁。
 芒特-甘比尔——第 54、55 頁。
 那不勒斯王国——第 473 頁。
 沙罗特皇后群島——第 180 頁。
 苏格兰——第 150、152、162、350、459
 頁。
 苏黎世——第 615 頁。
 忒拜——第 120 頁。
 条多堡森林——山脉。——第 138 頁。
 希腊——第 30、49、76、163、191、343 頁。
 希沃斯島——第 76 頁。
 辛斯海姆——第 367 頁。

芝加哥——第 384 頁。

八 画

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第 63 頁。
 阿德朗达克山脉——第 536 頁。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納)——第 167 頁。
 阿尔登——山脉和省。——第 504、597 頁。
 阿尔及利亚——第 72 頁。
 阿尔芒提埃尔——第 597 頁。
 阿尔明尼亚——第 79 頁。
 阿非利加, 阿非利加行省——古羅馬行省。——第 168、550 頁。
 阿拉斯加——第 46、63 頁。
 阿腊貢——历史区。——第 64、457 頁。
 阿累斯——第 597 頁。
 阿姆斯特丹——第 441 頁。
 阿速夫海——第 162 頁。
 阿提卡——古希腊的地区。——第 119、125—127、130、133 頁。
 阿韦龙省——第 300 頁。
 彼得堡——見圣彼得堡。
 波恩——第 257 頁。
 波尔頓——第 593 頁。
 波尔多——第 398、578、579、585、588、589、594、597、598、600、606、610、611、613 頁。
 波洪——第 433 頁。
 波兰——第 21、237、278、356、458、463、468、470、479、491、529、540、615 頁。
 波罗的海——第 162、167、449 頁。
 波美拉尼亚——第 216、218、278、284 頁。
 波士頓——第 536 頁。
 波斯尼亚——第 356、357 頁。
 波托馬克河——在美国。——第 166 頁。
 波托西——玻利維亞的省和城市。——第 94 頁。

波希米亚(捷克)——第 359、434、436、493—495 頁。
 底格里斯河——第 36、65 頁。
 的里雅斯特——第 357、437、614 頁。
 的黎波里——第 357 頁。
 法兰克尼亚——历史区。——第 243、278、506、507 頁。
 法兰克王国——第 172、452 頁。
 法蘭斯孔太——历史区。——第 71、153、506 頁。
 阜姆(里耶卡)——第 437 頁。
 昆士兰——澳大利亚的州。——第 55 頁。
 拉-繆拉提埃尔——里昂郊区。——第 355 頁。
 拉施塔特——第 367、368 頁。
 林茨——第 614 頁。
 罗昂——第 597 頁。
 羅馬——第 15、30、37、49、90、109、137—141、143—148、156、158、161—165、167—178、190—194、196、200、306、328、347、349、366、387、502、526、550—552 頁。
 羅馬尼亚——第 162 頁。
 罗騰菲尔斯——德国的居民点。——第 256 頁。
 明乔河——第 472 頁。
 帕德波恩——第 527 頁。
 帖欣(策欣)——第 468 頁。
 图兰平原——第 184 頁。
 易北河——第 277、278、281、513 頁。

九 画

柏林——第 20、22—24、84、207、232、233、245、254、255、283、292、356、358、372、381、396、465、480、482、500、505、512、542 頁。
 拜罗伊特——德意志的侯国。——第 506

頁。
 保加利亚——第 356—358、360、361 頁。
 波利尼西亚——第 49、51 頁。
 勃艮第——历史区。——第 162、498 頁。
 勃兰登堡——第 105、232、278、284、285 頁。
 迪特馬尔申——德国的地区。——第 193 頁。
 俄亥俄河——第 166 頁。
 革利夫斯瓦特——第 396 頁。
 哈佛尔——第 441 頁。
 哈瓦那——第 7 頁。
 恒河——第 52、62、65 頁。
 科布伦茨——第 509 頁。
 科迪亚克島——第 46 頁。
 科林斯——第 79、191 頁。
 科伦——第 6、8、20、26、233、234、241、243、259、260、403、543 頁。
 科芒特里——第 597 頁。
 科西嘉島——第 508 頁。
 洛林省——第 357、363、451、452、498、505—508、510—512、529、614 頁。
 美因河——第 492、497 頁。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5—7、22、23、26、233、238、255、478、493、542、543 頁。
 美因茲——第 233、494、509 頁。
 南港——第 230 頁。
 南錫——第 603 頁。
 施皮歇恩——第 502 頁。
 施梯里亚——国家。——第 467、614 頁。
 威尔士——第 150 頁。
 威尼斯——第 473 頁。
 威斯特伐里亚——第 25、233、377、411、425、432、433、468、479、527、542 頁。
 耶拿——第 281、283、400、479 頁。
 音斯布魯克——第 614 頁。

十 画

埃尔郡(埃尔)——城市和郡。——第 614 頁。
 埃格恩多夫(克尔諾夫)——第 614 頁。
 埃及——第 357 頁。
 埃伊納——城市。——第 191 頁。
 爱北斐特(烏培河谷)——第 25、204、372、542、543 頁。
 爱尔兰——第 71、149—152、162、224、225、377、380、571、574 頁。
 爱琴海——第 125 頁。
 俾尔——第 365 頁。
 宾夕法尼亚——美国的州。——第 295、383、427 頁。
 高加索——第 72 頁。
 高卢——历史区。——第 15、158、166、168、171、506 頁。
 哥本哈根——第 407 頁。
 哥伦比亚河——第 35 頁。
 格拉斯哥——第 418、441 頁。
 格洛高(格沃古夫)——西里西亚的城市。——第 396 頁。
 根特——第 582、614 頁。
 海得尔堡——第 367、371、480 頁。
 海地島——第 7 頁。
 海尔布朗——第 250 頁。
 海斯丁斯——第 186、399 頁。
 海牙——第 579—582、588、589、591、594、595、603、604、606、607、609、611、612 頁。
 庫本海姆——德国的居民点。——第 397 頁。
 庫尔黑森——見黑森—加塞尔。
 郎卡郡——在英国。——第 442 頁。
 伦巴第——意大利的省。——第 509 頁。
 伦敦——第 8、29、221、222、229、242—

246、250—252、256、258、259、267、360、
370、372、398、403、418、438、440—443、
490、500、535、572、575、577—583、587、
592、594、595、598—602、604—606、
608、610—612 頁。
馬德里——第 18、407 頁。
馬格德堡——第 245 頁。
馬其頓——历史区。——第 356 頁。
馬賽——第 366、576、579、597 頁。
秘魯——第 72 頁。
拿騷——德意志的公国。——第 236、
242、255 頁。
納尔榜——第 597 頁。
紐伦堡——第 506、507 頁。
紐約——第 259、384、386、407、413、535
頁。
紐約——美国的州。——第 39、40、102、
108 頁。
挪威——第 615 頁。
旁遮普——第 72 頁。
热那亚——第 369 頁。
索恩—卢瓦尔省。——第 71 頁。
索非亚——第 362 頁。
特拉斯卡拉——墨西哥的城市。——第
104 頁。
特利尔——第 168 頁。
特魯瓦——第 578、585、586、588、589、
597、599、600、602、606、610、611 頁。
特洛伊——第 122 頁。
烏布施塔特——第 397 頁。
夏威夷群島——第 40、49、52 頁。

十 一 画

盖尔曼尔斯海姆——第 367 頁。
荷兰(尼德兰)——第 10、305、350、450、
459、498、581、588、615 頁。
教皇国——第 526 頁。

康乃尔斯威尔——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区。——第 295 頁。
勒恩山脉——在德国。——第 377 頁。
勒吉利——古代意大利的居民点。——
第 138 頁。
累根斯堡——第 468 頁。
理森山(克尔科諾舍山)——第 277 頁。
琉森——第 365 頁。
曼彻斯特——第 6、207、230、247、372、
428、512 頁。
曼海姆——第 543 頁。
密尔窩基——第 384 頁。
密苏里河——第 68 頁。
密西西比河——第 35、108 頁。
莫耳維茨(馬魯尧維策)——西里西亚的
居民点。——第 283 頁。
莫拉維亚——第 436 頁。
莫納根——爱尔兰的郡。——第 152 頁。
訥卡格芒德——第 367 頁。
紹林吉亚——第 250 頁。
紹林吉亚山——第 377 頁。

十 二 画

博斯普魯斯海峽——第 356、398 頁。
敦克尔克——第 508 頁。
黑海——第 167、184、362 頁。
黑林山脉——第 396 頁。
黑森—达姆斯塔德(黑森)——国家。——
第 480、494 頁。
黑森—加塞尔——第 236 頁。
喀尔巴阡山脉——第 167 頁。
凱克罗普斯——历史区。——第 125 頁。
凱尼格列茨(赫腊德茨—克腊洛佛)——第
495 頁。
凱則尔斯劳頓——第 158 頁。
萊茵巴伐利亚——見普法尔茨。
萊茵河——第 6、20、107、153、162、166、

167、233、235、255、278、287、343、357、
367、377、448、450、465、469、473、474、
477、479、482、491、492、494、500、501、
506、508、510、515、544 頁。
萊茵河各省——見萊茵區。
萊茵黑森——第 255、492、494 頁。
萊茵普魯士——見萊茵省。
萊茵區——第 25、287 頁。
萊茵省——第 20、25、235、256、479、542
頁。
閔斯德——第 527 頁。
普法爾茨——第 25、26、204、365、370、
371、397、542、543 頁。
普魯士——第 21、206、207、236—238、
283、284、287、357、360、400、401、427、
464、470、472、473、478—485、488—
507、509、513、514、519、520、524—527、
529、542 頁。
普魯特河——第 472 頁。
普羅斯尼茨(普羅斯帖約夫)——第 614
頁。
散得維齒群島——見夏威夷群島。
斯巴達——第 75 頁。
斯拉窩尼亞——歷史區。——第 437 頁。
斯泰福郡——在英國。——第 230 頁。
斯特拉斯堡——第 397、505、506、508、
509 頁。
斯溫西——第 404 頁。
提爾西特(蘇維埃斯克)——第 236 頁。
提羅耳——國家。——第 468、499 頁。
雅典——第 76、77、90、125—127、130、
132—136、147、190、191、193、194、196、
200、615 頁。
智利——第 46 頁。

十三 画

奧埃爾施太特——第 283 頁。

奧德——印度北部的省。——第 52 頁。
奧登林山——第 366 頁。
奧格斯堡——第 158 頁。
奧克蘇斯河(阿姆河)——第 36、65 頁。
奧里繆茨(奧洛摩茨)——第 400 頁。
奧斯坦德——第 481 頁。
頓河——第 36 頁。
福蘭肯塔爾——第 365 頁。
滑鐵盧——第 284、457 頁。
雷庫爾-勒-克勒——法國的居民點。——
第 452 頁。
蒙呂松——第 597 頁。
葡萄牙, 葡萄牙王國——第 8、392、457、
615 頁。
瑞典——第 392、459、615 頁。
瑞士——第 10、21、135、197、236、244、
245、250、365、368、369、392、394—397、
407、414、417、456、459、471、509、544、
574—577、581、588、615 頁。
瑞士羅曼語區——見瑞士。
塞爾維亞——第 356、358 頁。
塞瓦斯托波爾——第 470 頁。
新墨西哥——歷史區。——第 35、36 頁。
新南威爾士——澳大利亞的州。——第
55 頁。
意大利——第 25、148、164、168、169、
227、235、236、357、358、369、374、404、
448、452、458、460、463、469、471—478、
491、493、495、499、502、529、604、615
頁。

十四 画

赫爾——第 441、577、598 頁。
維埃爾宗——第 597 頁。
維爾特——德國的居民點。——第 502
頁。
維爾騰堡——地區。——第 238、368、

373、494、522、543 頁。
 維爾茨堡——第 507 頁。
 維斯巴登——第 256 頁。
 維斯拉河——第 153、166 頁。
 維也納——第 24、232、238、254、360、
 363、373、435、463、468、482、506、614
 頁。

十五画

德干高原——第 40 頁。
 德卡茲維耳——第 355 頁。
 德勒斯頓——第 25、204、256、542 頁。
 德隆赫姆(特隆海姆)——第 245 頁。
 德涅泊河——第 36 頁。
 德特莫耳特——第 6 頁。
 劍橋——第 564 頁。
 魯貝——第 579、597 頁。
 魯美利亞——历史区。——第 356、358
 頁。
 摩塞尔河——第 152 頁。
 墨西哥——第 64、72、94、491 頁。
 撒丁——見皮蒙特。

十六画

澳洲——第 40 頁。

澳大利亚——第 54—57、62、259、293、
 417、464、515 頁。
 霍尔施坦——第 485、489、490、507 頁。
 霍赫瓦尔特山脉——第 152 頁。
 默尔弗里斯博罗——第 259 頁。
 默麦尔河(尼門河)——第 468 頁。
 默茲河岸提埃爾維耳——法国的居民点。
 ——第 452 頁。
 諾森伯兰——英国的郡。——第 569 頁。

十八画

薩多瓦——捷克的居民点。——第 332、
 498、500、521 頁。
 薩尔布呂肯——第 494 頁。
 薩爾茨堡——第 436 頁。
 薩爾魯伊——第 494 頁。
 薩克森——第 236、278、465、480、494 頁。
 薩克森——普魯士的省。——第 285、
 433 頁。
 薩克森森林——第 105 頁。
 薩羅尼加——第 356 頁。
 薩瓦——第 242、472、492 頁。
 魏耳堡——第 242 頁。
 魏伊——古代伊特刺斯坎城市。——第
 144 頁。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族名索引

A

阿勒曼尼人——日耳曼人部落群体，三世紀至四世紀从奧得河和易北河之間地区迁至萊茵河上游地区，并逐渐分布居住在今亚尔薩斯、瑞士东部和德国西南部地区。——第 107 頁。

Ao

澳大利亚黑人，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的土著。——第 33、52、54、56、57 頁。

奧及婁人(奧季拉人)——奧季拉綠洲(利比亚东北部)的柏柏尔族居民。——第 63 頁。

奧季布瓦人(契普瓦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生活在大湖北部和西北部。——第 103 頁。

奧馬哈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居住在密苏里河中游流域(今内布拉斯加州)。——第 103 頁。

奧嫩多加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居住在今紐約州境内。——第 108 頁。

Ba

巴达維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公元初居住在麦士河、萊茵河和伐耳河之間地区(今荷兰)。——第 158 頁。

巴里人——居住在与东苏丹接壤的今西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地区的部落。——第 63 頁。

巴斯塔尔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属于哥特族；公元初居住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地区。——第 167 頁。

Bei

北美印第安人——見印第安人。

北蕭胡人——格魯吉亚民族的一个族支，主要居住在阿腊格維河中游沿岸山区和約里河上游。——第 149 頁。

Bi

比利时人——高卢克尔特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居住在塞納河和萊茵河間的北高卢，以及不列顛西岸地区。——第 158 頁。

Bo

波利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东部一些小島的土著。——第 33 頁。

勃艮第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属于哥特族；公元初从斯堪的那維亚迁至維斯拉河和奧得河之間地区；逐渐向西南方向迁移，五世紀中叶定居在罗尼河流域。——第 154、155、167 頁。

Bu

布列吞人——凯尔特人的一个部落群体，組成不列顛最古的居民；因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入侵，一部分被同化，一部分被排挤到威尔士、苏格兰和布里塔尼半島。——第 52 頁。

布魯克泰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公元初居住在利珀河和埃姆斯河之間地区。——第 158 頁。

Che

彻罗基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原住阿帕拉契亚山脉南部地区。——第 106 頁。

Chi

赤北韦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原住落基山脉和哈德逊湾之間地区。——第 46 頁。

Da

达科塔人——北美若干属于西烏—霍卡語族的印第安人部落群体（易洛魁人、达科塔人等等）曾經使用过的一个通称。——第 108 頁。

达科塔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群体，居住在密苏里河流域和东起密西西比河西至落基山脉、北从加拿大南迄阿肯色河的大草原地区。——第 103 頁。

达罗毗荼人——印度的一些土著民族，今住印度南部；古时是印度斯坦半島的基本居民。——第 40 頁。

De

德拉韦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十七世紀初居住在德拉韦河和哈德逊河下游流域（今新泽西、德拉韦、紐約和宾夕法尼亚等州）；十八世紀中叶被欧洲人和易洛魁各部落所排挤，迁至俄亥俄河谷，十九世紀初被美洲殖民者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第 68 頁。

Deng

邓克泰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原住萊茵河下游右岸；公元前一世紀中叶迁至左岸，但被羅馬人击败，又返回原地。——第 166 頁。

Di

蒂庫尔人——印度的一个部落，原住奧德（今北方邦的一部分）。——第 52 頁。

Duo

多立斯人——古希腊人的基本部落群体之一，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紀从北部迁至伯罗奔尼撒半島和爱琴海南部島屿。——第 75、114 頁。

Fa

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群体，三世紀前称易斯卡伏南人或易斯泰伏南人；原住萊茵河中下游地区，三世紀起开始侵占高卢，至六世紀初才完成。——第 164、167、173—175 頁。

Fei

腓尼基人——古代腓尼基的居民。——第 61、125 頁。

Gao

高卢凯尔特人，高卢人——凯尔特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居住在古高卢（今法国、北

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荷兰和瑞士的一部分)；公元初被羅馬人征服。
——第 166、168、173、174 頁。

Ge

戈拉(戈达)——西孟加拉的一个印度人部落。——第 40 頁。

哥特部落——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群体之一；公元初从斯堪的那维亚迁至維斯拉河和奧得河流域。——第 154、155、167 頁。

哥特人——哥特族的主要日耳曼人部落，公元初从斯堪的那维亚迁至下維斯拉河地区，三世紀迁至黑海北岸地区，四世紀被匈奴人赶走；哥特人分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东哥特人于五世紀末在亚平宁半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西哥特人于五世紀初先后在高卢和比利牛斯半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第 145 頁。

Gu

古波斯人——第 46 頁。

古丹麦人——第 105 頁。

古德意志人(古日耳曼人)——第 31、37、71、81、82、91、105、107、120、148、149、153—164、166、167、170、172、175—177、179、191、193、200、201 頁。

古羅馬人——第 46、69、81、98、111、143—145、154、158、159、162—166、168—173、176、179、201 頁。

古斯巴达人——第 75—77、81、109 頁。

古斯拉夫人——第 105 頁。

古希腊人——第 37、38、42、46、69、74—77、81、98、105、111、114、116、117、119—122、129、145、156、163、165、179 頁。

古雅典人——第 76、125—131、135、136

頁。

Hai

海达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居住在沙罗特皇后群島和威尔士太子島南部。——第 180 頁。

海魯萊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公元初居住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島，三世紀一部分海魯萊人迁至黑海北岸，后被匈奴人赶走。——第 82 頁。

He

赫米奧南人——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群体之一，公元初居住在易北河和美因河之間地区；苏維汇人、伦巴德人、馬克曼尼人、卡滕人等等均属赫米奧南人。——第 154、167 頁。

Hua

华拉耳人——印度的一个部族，居住在今孟买邦，部分居住在今中央邦北部地区。——第 149 頁。

Huo

霍人——印度的一个部落，居住在今比哈尔邦南部。——第 62 頁。

Ji

基姆布利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原住日德兰半島；公元前二世紀末和条頓人部落同时迁移欧洲南部；被羅馬人击败；殘余的人分布居住在麦士河、美因河和尼喀河流域地区。——第 153 頁。

Jia

加勒比人(加里比人)——南美的一个印

第安人部落群体；原住巴西北部和中
部，以及同委内瑞拉、圭亚那和哥伦比
亚相邻的地区。——第 46 頁。

加惟提人(加惟基人)——北美的一个印
第安人部落，原住白令海峽沿岸。——
第 46 頁。

Ka

卡比尔人——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柏柏尔
人部落群体，居住在朱尔朱腊山脉，君
士坦丁省山区和奥雷斯高原。——第
72 頁。

卡尔梅克人——蒙古族源的一个部族；十
六世紀末以前居住在中央亞細亞准噶
尔草原，十七世紀后半期向俄国的东南
地区迁牧，并分布居住于伏尔加下游。
——第 149 頁。

卡弗尔人-祖魯人(正确的称呼是祖魯人)
——非洲东南部的一个部族。——第
111 頁。

卡米拉罗依人——澳大利亚人的一个部
落，原住达令河流域(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第 55 頁。

卡尤加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原住今紐約州地
区。——第 108 頁。

Ke

科塔尔人——印度的一个部落，居住在尼
尔基里丘陵地带(今馬德拉斯邦和迈索
尔那西部)。——第 62 頁。

克尔特人——古时居住在欧洲中部和西
部的血緣部落群体。——第 31、62—
64、71、105、149、150、158 頁。

克伦人——部落群体，現今是部族；居住
在緬甸东南部。——第 46 頁。

Ku

庫庫人——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原
住今智利境内。——第 46 頁。

La

拉丁部落——古意大利人的两个主要部
落群体之一；古羅馬人属于这一群体。
——第 69、139、144 頁。

Li

利古里亚人——远古时居住在亚平宁半
島大部分地区的部落群体；公元前六世
紀被意大利部落排挤到亚平宁半島西
北部和高卢东南部沿海地区；公元初被
羅馬人征服并逐渐被羅馬化。——第
168 頁。

Lun

伦巴德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五世
紀初以前居住在易北河下游左岸，后迁
至多瑙河中游流域，最后迁至意大利北
部和中部。——第 154、155 頁。

Ma

馬加尔人——部落，現今是部族，居住在
尼泊尔西部地区。——第 149 頁。

Mai

迈阿米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
十七世紀居住在密歇根湖西岸；十八世
紀初迁至今伊利諾斯州、印第安納州和
俄亥俄州境内，后被美洲殖民者排挤到
密西西比河以西。——第 68 頁。

Man

曼尼普尔人——印度的一个部族，居住在
今曼尼普尔邦。——第 149 頁。

Mei

美洲印第安人，美洲人——見印第安人。

Mi

秘魯人——秘魯人的土著居民。——第
35、108 頁。

Mo

摩霍克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属易洛魁人群体；原住今紐約州境內。——第 108 頁。

墨西哥人——墨西哥的基本居民。——第 35、108、123、156 頁。

Na

納伊尔人（納耶尔人）——印度馬拉雅拉族的高等武士种姓，原住馬拉巴尔海岸地区。——第 73 頁。

Nie

涅涅茨人——部族，居住在苏联白海东岸到叶尼塞河下游的北部地区和科耳古耶夫島、瓦加奇島以及新地島部分地区。——第 149 頁。

Nu

努比亚人——非洲的一个部族，居住在东苏丹北部和埃及南部。——第 111 頁。

努特卡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小部落群体，居住在温哥华島西南部和弗拉特里角沿岸地区。——第 180 頁。

Nuo

諾里克人——伊利里亚—克尔特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居住在古羅馬諾里克省（今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部分地区）。——第 168 頁。

諾曼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居住在日德兰和斯堪的那維亚；中世紀初期对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的统称。——第 37、174 頁。

Ou

欧奈达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居住在今紐約州境內。——第 108 頁。

Pa

帕提亚人——古伊朗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居住在伊朗高原东北部；公元六至七世紀被邻近各族同化。——第 46 頁。

Pan

潘札人——印度的一个部落。——第 62 頁。

Pei

佩夫金人——日耳曼族巴斯泰尔人一个部落分支的名称；許多古希腊羅馬著作家常把它和其他部落混同起来。——第 167 頁。

Pi

皮克特人——古时居住在今苏格兰境內的部落群体；九世紀中叶被苏格兰人征服。——第 153 頁。

皮拉斯基人——远古时居住在巴尔干半島南部和小亚細亚西部沿岸的部落群体。——第 114 頁。

Pu

普韦布洛人——北美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群体的名称，居住在今新墨西哥州、阿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墨西哥西北部等地。——第 35、36、108、123 頁。

Qie

切尔克斯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对高加索西北部一些阿迪盖山部族（阿迪盖人、切尔克斯人和卡巴尔达人）的通称。——第 149 頁。

Sa

撒利法兰克人——日耳曼族法兰克部落群体的两个主要分支之一，四世紀中叶

居住在北海沿岸自莱茵河口至些耳德河这一段地区；后来定居在北高卢。——第 172 頁。

薩伯力安人（薩伯力安部落）——古代意大利人的两个主要部落群体之一。——第 137 頁。

薩莫耶特人——見涅涅茨人。

Sai

塞訥卡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原住今紐約州境内。——第 39、40、60、99、100、102—104 頁。

Sang

桑塔尔人——印度的一个部落，现在是部族，居住在比哈尔邦桑塔尔-帕尔加納斯区境内。——第 62 頁。

Se

色雷斯人——古时居住在巴尔干半島东部的部落群体。——第 63 頁。

Shan

閃米特人——十九世紀对閃含語族閃語支各族的通称。——第 36、65、70、183 頁。

Si

斯基台人——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初几世紀居住在黑海沿岸北部地区的部落群体。——第 46 頁。

斯万人——格魯吉亚民族的一个族支，居住在斯瓦涅提亚，大高加索山脉西南山坡。——第 149 頁。

Su

苏格兰人——克尔特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居住在古爱尔兰；公元 500 年左右部分苏格兰人迁至今苏格兰境内；九世紀中叶征服了皮克特人。——第 153 頁。

苏維汇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公元初居住在易北河流域。——第 105、153、159、160 頁。

Ta

塔胡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原住今墨西哥北部地区。——第 64 頁。

Tai

泰发耳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同哥特人有血緣关系，三世紀前迁至黑海北岸地区，四世紀后半期被匈奴人赶走。——第 82 頁。

泰米尔人——居住在印度斯坦半島最东南部的部落群体，现在是部族。——第 40 頁。

Tiao

条頓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原住日德兰半島和易北河下游地区；公元前二世紀末和基姆布利人同时开始迁至欧洲南部；被羅馬人击败；残余的人分布居住在麦士河、美因河和尼喀河地区。——第 153 頁。

Ti

提納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原住加拿大西部森林和阿拉斯加腹地和基奈半島（阿拉斯加南部）临太平洋沿岸地区。——第 46 頁。

Tu

图兰人——过去对图兰平原居民的称呼。——第 183 頁。

吐斯卡罗腊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原住今弗吉尼亚州和大西洋沿岸北卡罗来納州境内。——第 102 頁。

Wei

威尔士人——克尔特族源的一个部族；居

住在威尔士半島和安格尔西島。——第 153 頁。

Wu

烏濟佩特人——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原住萊茵河下游右岸；公元前一世紀中叶迁至左岸，但被羅馬人击败，又返回原地。——第 166 頁。

Xian

显胡苏人——格魯吉亞民族的一个族支，居住在格魯吉亞东部山区。——第 149 頁。

Xiao

肖尼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原住薩凡那河流域（今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納州境內）。——第 68 頁。

Xin

新墨西哥人——見普韦布洛人。

Xiong

匈奴人——中央亞細亞的游牧民族，公元初居住在黃河西北部；一世紀起一部分匈奴人开始西移，五世紀中叶到达高卢，在高卢被羅馬人和欧洲其他民族击败。——第 46 頁。

Ya

雅利安人——十九世紀对印欧語系各民族的通称。——第 36、65、70、176、183 頁。

Yi

伊奥尼亚人——古希腊人的基本部落群体之一，自古居住在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島的东北部，后来也居住在爱琴海

部分島嶼上和小亞細亞半島沿岸。——第 75、76 頁。

伊比利亚人——部落群体，古时居住在比利牛斯半島部分地区、邻近的地中海島嶼和今法国东南部；公元初被羅馬人征服，并逐渐被羅馬化。——第 168 頁。

伊利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属于易洛魁人群体；原住伊利湖地区。——第 111 頁。

意大利各部落，古意大利人——古时居住在亚平宁半島的部落；拉丁人和薩伯力安人是这些部落的两个主要群体。——第 37、69 頁。

易洛魁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群体；居住在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及以南地区，圣劳伦斯河流域以及阿帕拉契亞山脉南部。——第 39、40、58—60、99—102、104、106、108—112、114、115、120、121、128、140、148、163、166 頁。

易斯卡伏南人（易斯泰伏南人）——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群体之一，公元初居住在萊茵河中下游地区；三世紀起称为法兰克人。——第 167 頁。

Yin

印第安人——美洲的土著。——第 30、34—36、40、54、58、59、63、66、68、81、98、102、103、105—108、110、111、114、118、121、137、139、159、163、164、179、180 頁。

印度人，印度人部落——印度的土著。——第 40、149 頁。

印格伏南人——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群体之一，公元初居住在須德海海湾至丹麦的北海沿岸；五至六世紀該部落群体中的盎格魯人、撒格遜人等侵占不列顛。——第 167 頁。

譯 后 記

本卷包括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1883年5月到1889年12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本卷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一卷(1961年出版)譯校的。“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文及其“序言”，是在张仲实同志的譯本的基础上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二十一卷校訂的，校訂时参考了俄、英等譯文和其他有关的中譯文。其他有些著作，在校訂或翻譯时也根据恩格斯原著所使用的文字作了核对，并参考了有关的中譯本和其他文字譯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在人民出版社1961年单行本譯文的基础上校訂的，并由原譯者张仲实同志审閱一遍。“‘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馬克思与新萊茵报”、“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等五篇文章，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基础上校訂的。“馬克思和洛貝尔图斯(“哲学的貧困”一书序言)”一文，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的貧困”单行本譯文的基础上校訂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在譯校时参考了曹汀、何思敬同志的譯文。

参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有徐若木、高叔眉、张奇方、刘暉星、李俊聰、朱中龙、籍維立、韓文臣、刘功勛、孔令釗等同志。参加“費尔巴

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文及其“序言”譯文校訂工作的有謝寧、顧錦屏、王治平、洪佩郁等同志。參加本卷資料工作的有劉功勛、孔令釗、籍維立、馮如馥、陳瑞林、陳家英等同志。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